

731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实录

金成民　主编

日本细菌战

（上）

金成民　编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实录

金成民　主编

日本细菌战

（上）

金成民　编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细菌战 / 金成民编著 . -- 北京 : 中国和平出
版社 , 2015.8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实录 / 金成民主编）
ISBN 978-7-5137-0979-8

Ⅰ . ①日… Ⅱ . ①金… Ⅲ . ①日本关东军 — 战争罪行 —
史料 Ⅳ . ①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0198 号

日本细菌战
（上下册）
金成民　编著

出 版 人：肖　斌
责任编辑：安宏涛
装帧设计：北京光大印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印务：石亚茹

出版发行：中国和平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甲 13 号 7 号楼 10 层（100088）
发 行 部：（010）82093860
网　　址：www.hpbook.com
投稿邮箱：hpbook@hpbook.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 毫米 ×1194 毫米　1 /16
印　　张：53.25
字　　数：842 千字
版　　次：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37-0979-8　　定价：300.00 元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实录》

编委会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实录》项目工作小组

肖　斌　和　龚　冈　宁　吕　淼　杨　隽　张志强　安宏涛

杨　光　程力华　黄　鲁　佘朝辉　于　亮　孙玉莹　朱云波



前　言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与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七三一问题国际研究中心合作，由七三一问题研究专家金成民先生主编，推出了大型专题丛书《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实录》（60册）。本丛书编纂工作历时两年，收录了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和学术研究成果，全面深刻地揭露了抗战期间以七三一部队为代表的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犯罪史实，这套丛书也是研究日本细菌战罪行史和人体实验犯罪的重要参考资料。

本丛书分为两部分。其一为学术研究，收录了当前国内外对日本细菌战和人体实验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如《日本细菌战》、《七三一问题国际研究中心文集》、《七三一部队旧址调查与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名录》、《战争与医学》、《解密日本细菌战历史：军医中将石井四郎的故事》等。其二为文献资料，大部分据史料原件影印整理出版，如《七三一部队炭疽菌实验A报告》、《七三一部队鼻疽菌实验G报告》、《七三一部队鼠疫菌实验Q报告》、《美军调查日本细菌战总结报告书》、《七三一部队见证人口述史料集》、《日本细菌战部队命令·文件集》、《关东军·华

中军·南方军防疫研究报告》、《“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档案》、《师团防疫给水部档案》、《日本细菌战史料集：细菌实验类》等。

本丛书收录的相当一部分文献是首次在中国公开出版：如《日本细菌战部队命令·文件集》中收录的大量日军参谋本部、陆军省、关东军的命令文件，这些文件涉及到日本政府、军队、医疗机构等各个方面；《七三一部队见证人口述史料集》和《日本细菌战档案选编》收录了加害者、受害者和见证人三方面的证言，并结合了中国、美国和日本三方的历史档案，使其内容更具客观性和真实性。总体来看，本套丛书以美国、日本保存的细菌战及人体实验相关档案为主，结合中国学者多年来的调查寻访取证，辅以长期收集整理研究的受害者名录、旧址调查报告、研究文集、日本细菌战史料档案等成果，这些档案和研究成果多数都是首次公开的新资料、新证据和新发现。

本次整理出版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编者将其中部分文献译成中文，并在外文文献分集前撰写了《导语》，对其内容做了简要介绍、编辑说明和总体评价。

本丛书使用的大量历史档案和口述史料，以及中日美三国学者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全面揭露了日本细菌战部队反人类、反文明和反伦理的本质，集中反映了日本细菌战和人体实验是自上而下、有组织、有预谋的集团犯罪，揭示了其战时犯罪、战争责任和战后贻害。编辑本套丛书的目的正是启示世人认知、铭记、思考和汲取历史教训，进而全面深刻反思战争与医学、战争与良知、战争与和平，尊重人权与自由，倡导文明与和平。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实录》编委会

2015 年 7 月 7 日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实录》总目

18. 日本细菌战部队命令·文件集（上下）

19. 七三一部队兵要地志班调查报告集（上下）

20. 关东军·华中军·南方军防疫研究报告

21. “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档案（一）

22. “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档案（二）

23. 师团防疫给水部档案（一）

24. 师团防疫给水部档案（二）

25. 日本细菌战史料集：细菌实验类（1~9 册）

26. 日本细菌战史料集：战时给水类（1~5 册）

27. 日本细菌战史料集：预防免疫类（1~7 册）

28. 日本细菌战史料集：细菌战情报类（1~2 册）

29. 日本细菌战史料集：流行病与传染病类（1~3 册）

30. 日本细菌战史料集：寄生虫类（1~2 册）

目　录

综　述

一、细菌战的起因

细菌战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为了“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即建立一个由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国家，日本军国主义者确定了进行细菌战的战略，想以低廉的代价，赢得侵略战争的胜利。

日本崛起于 19 世纪末。1886 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运动，在产业革命过程中产生了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日本资本主义遂告形成。日本虽然实行了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但由于明治维新这一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不彻底性，仍然保留了较多的封建残余因素，从而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明治政府成立后，掌握实权的资产阶级改革派，发扬封建时代武士道精神，确定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国策，其中所谓“富国强兵”即实行侵略扩张政策以强国。

在日本天皇的支持下，明治政府积极推行军国主义路线。1874 年日本首次用武力入侵中国台湾。1894 ~ 1895 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甲午战争，获胜后，从中国索取巨额赔款，并割取台湾及澎湖列岛等地。1900 年，日本又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 ~ 1905 年，日本发动了日俄战争，日本又获得胜利，攫取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殖民特权。20 世纪初，日本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开始进入帝国主义时期。日本经济被置于大财阀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日本军阀势力增强，军阀获得军令制定权，军国主义思想甚嚣尘上。1926 年，大正天皇死，昭和天皇（裕仁）即位。1927 年 6 月，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向天皇呈奏《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宣称“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制定了侵略中国的战略方针。田中内阁上台标志着法西斯势力占据了统治地位，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进一步扩张。1931 年“九一八”事变，关东军推行大陆政策，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军国主义分子的侵略野心更加膨胀，战争升级，矛头对准了苏联。与此同时，细菌战的主张得到日本上层军事集团的青睐，开始研制细菌武器，准备进行细菌战。到 1945 年 8 月日本战

败为止，细菌战活动长达30多年。

据史学家研究，日本帝国主义研究细菌由来已久。1916年，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在细菌学教学中，就讲授过如何“进行家畜战”。1918年11月，日军少佐长谷部照信获悉俄国密探亚历山大正在搞细菌战研究并拥有大量细菌的情报后，他将细菌战作为主要问题向参谋部汇报。此后，陆军省医务局就开始研究细菌战。日本大本营的军部曾要求东京科学研究局“研究出一种或多种为人力无法抗拒的秘密杀人武器”。由于在限期内没有完成任务，局长伊藤工学博士在“工作不力”、“浪费国家财力”等罪名下被逮捕法办，参加研究的40多名科学家也全部被降薪并调转其他工作。后来，细菌研究工作一度中断。

日本再度研究细菌战的发起人是石井四郎，他提出了准备细菌战的主张。日本是个岛国，人口少，兵源不足，又缺乏五金矿藏，发动侵略战争是难以取胜的。石井四郎顺应日本统治阶级的意愿，抛出关于细菌战的构想，为此，他经常到陆军参谋本部游说。他的前期思想核心是用细菌战弥补日军在侵略战争中的资源不足问题，他认为细菌武器杀伤力大、传染性强、死亡率高，而投资又少，节省钢铁，是一种很有力的进攻武器。他献计说：“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他的主张得到日本著名军事“科学家”小泉亲彦、陆军军务局课长永田铁山等人的支持，派他出国考察。回国后，他积极倡导创建细菌部队。在这种形势下，日本陆军省军医署课长梶塚隆二推荐石井四郎研制细菌武器。于是，在日本当局及一大批军国主义分子的策划下，开始筹建细菌研究所。

二、细菌部队的组建及准备细菌战

1932年8月，在日本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创立了细菌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1933年，细菌研究室进行扩建，对外改称防疫研究所。同年8月，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秘密设立了石井部队，其附属细菌实验场设在背荫河，化名为“加茂部队”。1936年，日军参谋本部扩编了石井部队；设立了关东军兽医预防部，即后来的满洲第100部队。1938年6月，石井部队迁驻哈尔滨平房地区。1941年，该部队正式改称为满洲第731部队。日军在不断扩充731部队的同时，还在我国各地陆续成立了18个师团

的防疫给水部（即细菌部队）。随着日本军队活动范围的扩大，又补设了机动性部队。主要细菌部队有关东军第 100 部队、北京北支甲第 1855 部队、南京荣字第 1644 部队、广州波字第 8604 部队、新加坡冈字第 9420 部队。而 731 部队则是日本细菌武器研究中心和细菌战指挥大本营。至此，日本细菌部队形成了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完整的细菌战体系。日军细菌部队的公开身份是某方面军或师团的防疫给水部队，每一个方面军均设有防疫给水部本部，每一个师团设有防疫给水部，另外，每个防疫给水本部均设有支部。各防疫给水部表面上是负责部队的防疫、给水等项工作，实质上是研究、生产细菌武器，实施细菌攻击，杀害和平居民。

（一）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细菌研究室（防疫研究所）

1932 年 8 月，在日本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创立了细菌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由石井四郎领导，开始研究细菌武器。这个防疫研究机构规模较小，只有 5 个人，一间经过改建的地下室。1933 年，细菌研究室进行扩建，对外改称防疫研究所，成为日军准备进行细菌战的研究中心。在石井四郎的主持下，大批研究人员开始从事霍乱、伤寒、炭疽等各种传染病菌的研究工作，探求和制造细菌武器以及研究使用此种武器的方法。

（二）关东军第 731 部队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准备把细菌实验基地转移到中国东北，其原因就是需要在邻近苏联边境的地方建立细菌战根据地，以供将来实行进犯苏联之用，因为苏联远东地区是包括在日本军阀侵略计划以内的。再就是在满洲境内有可能获得大量非日本籍的活人来做进行细菌实验的材料。怀着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1932 年 8 月，石井四郎和增田知贞等 4 名科研者、5 名雇员来到中国东北地区考察。1933 年，日军大本营批准了石井四郎在我国东北地区建立细菌研究基地的报告。同年 8 月，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秘密设立了石井部队，其附属细菌实验场设在 70 公里以外的黑龙江省五常县的背荫河，石井四郎任部队长。在关东军内部，称这支部队为“加茂部队”、“东乡部队”、“石井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开始了细菌战的研究、生产和人体实验。

背荫河细菌实验场也称“中马城”，因有个叫中马的大尉管辖这个“兵营”，因此

人们称它为“中马城”。它与世隔绝，极端保密。后来因为“中马城”监狱暴动以及抗联第三军的不断袭扰，沉重地打击了石井四郎，使“中马城”的秘密暴露无疑，日军的细菌实验准备工作受到重大挫折，促使石井四郎对“中马城”做出迁移的决定。1935 年，他命令士兵炸毁房屋，拆除设备，运往哈尔滨，“中马城”陆续迁移。同时，他酝酿出一个更大的阴谋，决定移师哈尔滨平房。

石井四郎的计划得到了日本裕仁天皇的批准。1936 年 4 月，关东军板垣征四郎中将向日本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递交了一份《关于充实在满兵力的意见》，其中包括关东军防疫部、关东军兽医预防部等部门的建议。5 月 30 日，日本裕仁天皇发布了天皇敕令——军令陆甲第 7 号。8 月，石井部队扩编成一支正式作战部队。关于天皇的这份敕令，梶塚隆二曾经见过，他曾读过这份敕令以及关于该部队人员表的附件，并盖了私人图章。根据战略需要，1940 年 12 月，石井部队又在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分别建立了 4 个支队。1941 年，为保密起见，石井部队采用番号，命名为第 731 部队。该部队名义上编在关东军序列，实质上是日军参谋本部直接领导的特种部队，编制 3 000 人，但经常缺员 500 人左右。其隶属关系是：大本营（陆军大臣）——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长——各分部部长及卫生研究所所长。731 部队长：1936 年至 1942 年 7 月为石井四郎少将；1942 年 8 月至 1945 年 2 月由北野政次少将接任；1945 年 3 ~ 8 月，石井四郎重任部队长，并晋升为中将。

早在背荫河细菌实验场暴露后，石井四郎就开始物色新的细菌实验基地，他选中了平房站。1933 年，日本侵略者修筑拉滨铁路，在平房屯附近设置一个小站，称平房站。1935 年，石井部队开始在平房站以北 4 公里处勘测，圈占土地。1936 年春季，“石井部队”突然设营驻扎，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一年，平房地区开始大兴土木。1938 年平房细菌基地基本竣工，到 1940 年工程才结束。1938 年 6 月 30 日，日本关东军发布了“关于设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 1539 号令后，平房镇与日本空军 8372 部队营区、石井部队营区构成特别军事区域，面积达 120 平方公里。平房镇占地约 16 万平方米，主要建筑物有 70 多座，中心建筑为本部 1 栋和四方楼。731 部队少年班队员秋山浩（化名）称“平房镇为建筑在旷野里的高楼大厦，那座四方形满镶着瓷砖的大楼，是一座一路上不

论在大阪、新京和哈尔滨从未见过的那样大的楼房。那耸人云霄的炼人炉的大烟囱在那里冒着黑烟……”这是日本人笔下的细菌战的魔窟。

石井部队营建细菌基地、从事细菌生产等强征了不少中国劳工。在背荫河时期，该部队通过日伪当局，在附近村屯强征近千名劳工和几百辆马车，兴建细菌基地。1936 年，平房细菌基地开工后，劳工需求量大大增加，从外地骗来不少劳工。平时保持 2 000 左右，最多达 3 000 多人。在 731 部队的劳工主要从事建筑、维修、养殖、种植、缝纫、烹饪、锅炉以及各种杂活。731 部队附近的劳工虽说苦，但还能坚持下去。外地劳工遭受非人的待遇，他们住的是夏不遮雨，冬不御寒的席棚；每个劳工每天只发给 3 个玉米面、高粱面、橡子面混合制成的窝窝头。穿的是破旧衣服，有的劳工甚至穿单衣服过冬。干的是重活，稍有不慎，或生病无力时，就会遭受日本监工的毒打。这些外地劳工在 731 部队或病死、或累死、或被打死、或被当作“实验材料”、或抽去修筑秘密工程而被杀人灭口，除少数人逃跑外，绝大多数都死在了 731 部队。刚开始，劳工死了，日本人还用薄板给钉口棺材。后来，劳工死得多了，就用席子一卷抬出去，有的还有一口气，也给活埋了。再后来，日本人把死去的劳工的衣服扒下来，留给活着的劳工穿。埋劳工的坟一个挨一个，没地方挖新坟了，日本人就派人挖一个大坑，里面埋好几个劳工。最后，连挖坑的地方都没有了，就把尸体扔在荒郊野外。据不完全统计，731 部队在中国强征劳工 5 000 多人，除本地的 2 000 多个劳工外，其余 3 000 多个外地劳工大多数都死在了平房，尸体掩埋在正黄旗五屯北边的劳工坟里。劳工坟面积达 1 万多平方米，掩埋着数千个冤魂。

平房站前后约 60 华里铁路线被称为“60 里地国境线”，火车路过时必须挂窗帘，严禁旅客向窗外张望。飞机也要远离这条航线，对违航飞机，强迫其着陆，否则，无论是日军其他部队的飞机还是民航飞机，731 部队都将予以击落。特别军事区域的老百姓实行联保联坐制度，一人有事，殃及四邻。日本宪兵、日伪警察及其汉奸走狗相互勾结，对“平房特区”实行法西斯管制，百姓稍有不慎，便遭祸殃。

平房镇成为石井部队细菌研究、生产、实验的中心，是日本殖民地的军事重镇，是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实验魔窟。731 部队下设总务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

训练教育部、资材部、诊疗部。第一部为细菌研究部，也称基础研究部。该部专为细菌战研究培养各类烈性传染病菌；管辖秘密监狱，关押受细菌实验的人，下设研究班，由佐级军医或技师任负责人。第二部为细菌实验部，也称实施研究部，负责在打靶场条件下和战斗环境内实验细菌武器。第三部设在哈尔滨市南岗，为防疫给水部。它管辖滤水器制造厂和细菌瓷弹壳制造厂。第四部为细菌生产部，任务是培养生产细菌，制造细菌武器。总务部是731部队的中枢部门，主要任务是拟定细菌战计划，负责人体实验的资料搜集与管理，起草及传达命令，掌管财务、警备等。训练教育部负责对关东军的卫生部军官、下士官以及对本部、各支部的士兵进行细菌战、防疫、给水教育，培养善于使用细菌武器的专业人才。资材部负责贮存、供应各种器材、承担实验动物的运输和菌苗、疫苗的保管。诊疗部设在哈尔滨南栋，设传染病栋、诊疗室、家属诊疗所，主要为日本人防病、治病。

731部队利用优厚的待遇和人体实验等难以得到的研究条件，从日本国内网罗了一批专家学者，从事细菌武器研制；并在内部加强对本部队及其他部队卫生兵的培养，特别是从日本国内把刚从中、小学毕业的少年逐批招来作为后备力量培养，向学员灌输效忠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传授细菌学知识，培养细菌实战人才。据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供称，他们所培养的细菌战干部完全足以供实际使用细菌战武器时的需要。

731部队是日本天皇的宠儿，有充足的军费用于进行细菌战。1940年以后，日军加紧进行细菌战，该部队的军费超过1 000万日元。其中300万日元为人头经费，另700万日元则是去制造细菌和进行研究工作的。该部队装备有培制细菌的良好仪器。细菌生产分部内有用以大批生产细菌的设备：制造供繁殖细菌用的营养液大锅炉4具，每一具容量均约为一吨；营养液特种消毒器14具，每具长3米，直径1.5米。每一消毒器内可放置大约30个培养器，14具消毒器内可同时放置420个培养器。第一分部有两个冷藏室，每个房间内能同时容下100个培养器。该分部内还有5个调温器，总共可容620个石井式培养器。第二分部内有大锅炉两具，每具容量为2吨，消毒器8具，每一消毒器内可容60个培养器。第四部内还有保存细菌产品的冷藏器。1944年，北野政次部队长又从日本国内运来新设备，这些仪器比旧设备更加完善，细菌培养可以在传送带系统上进行。

各支队也拥有高压蒸汽灭菌罐、细菌培养基箱、干热灭菌等设备以及细菌培养基原料，具备独立生产各类细菌的能力。

731部队第四部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来满足日军细菌武器的需要，该部部长川岛清供认，在充分利用第四部所有生产能力及全部设备的条件下，该部每月能出产约300公斤净鼠疫菌，或500 ~ 600公斤净炭疽热菌，或800 ~ 900公斤净伤寒菌、副伤寒菌或痢疾菌，或1 000公斤净霍乱菌。该部分部部长柄泽十三夫供述说，理论上该部在一个月内可培养出鼠疫菌达300公斤，但实际上为此总共只利用过500个培养器，这500个培养器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可能培养出10公斤鼠疫病菌，因为每一个培养器出产量是20公分。他供认，理论上每月培养伤寒菌800 ~ 900公斤，炭疽热菌大约600公斤，霍乱、副伤寒症、赤痢等细菌各为1吨。事实上，当时该部细菌的产量足以满足日军进行细菌战的需要，理论上细菌产量大得惊人，但是日本当局及一批军国主义分子并不满意。1944年开始，731部队已经向各支队输送了大批细菌生产设备，还想继续要扩大部队制造细菌的生产能力，另有一个目的就是疏散细菌生产设备，本部细菌工厂一旦被轰炸，其它分厂好继续生产。由于日军731部队的覆灭，细菌生产能力才未能进一步扩增。该部队生产出的细菌用于细菌战，如果外部条件具备，足可以毁灭全人类。

731部队大量生产传染病菌，包括鼠疫、霍乱、伤寒、炭疽、赤痢等各类细菌。这些菌种都具有毒性大、传染力强，便于生产，对自然条件抵抗力强等特点，便于细菌战的应用。

731部队被称作“老鼠部队”，因为该部队用染有鼠疫的跳蚤作为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731部队需要大量的老鼠，石井四郎曾多次召开会议，命令各支队大力动员部下进行捕鼠工作。对外声称捕捉老鼠是为了防止鼠疫，实际上是制造鼠疫菌。1945年，按大本营指示，731部队为细菌战作准备，需要一吨到两吨的跳蚤，鼠疫菌生产要求达到300公斤以上，最高要求达到800公斤，于是731部队提出了计划增收300万只老鼠的目标。鼠类缺乏，已经阻碍了细菌战的实施。在这种情况下，731部队的各支队都设立了老鼠捕获班，并强制中国老百姓捕捉老鼠，中国东北地区到处是捕鼠的人群；日本关东军命令各军团、陆军医院以及各地军用仓库，都要饲养老鼠，以便供给731部队；

各部队把老鼠和跳蚤源源不断地送到 731 部队里去。日本民众也纷纷为细菌战饲养、输送鼠类，日本的春日部市和庄和町的农家，当时几乎家家都饲养过老鼠。养鼠规模之大，以海拉尔支队为例，单在 1945 年夏天就饲养了 1.3 万只老鼠。

731 部队使用老鼠及其它鼠类动物培养鼠疫跳蚤，该部队内拥有 4 500 具用鼠类血液繁殖跳蚤的孵育器，这种孵育器在一个生产周期内（3 ~ 4 个月）就能培养几公斤染有鼠疫的跳蚤。据川岛清供述，一个生产周期内，该部队最高可以培养出约 45 公斤能传染鼠疫的跳蚤。把这种被毒化的跳蚤施放后，就能达到攻击的目的，杀害人命。这里之所以强调 731 部队大量培养鼠疫跳蚤的工作，是因为鼠疫战在日军细菌战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石井四郎、北野政次所领导的第 731 部队，经过多年的研究后，已经研究好了用感染鼠疫菌的跳蚤作为细菌武器的方法，水平是相当高的，这方面所达到的成绩可以大规模地实际用于战争目的。

（三）关东军第 100 部队

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是日本关东军第 100 部队的前身，于 1931 年 11 月在奉天（今沈阳）成立。1933 年从奉天（今沈阳）迁到新京（今长春）宽城子。当时，该收容所主要是对民用马匹传染病进行病源、病理调查、研究，并到病发区采集菌苗加以保存。1936 年，根据日本裕仁天皇的敕令，在关东军马匹防疫厂的基础上设立了关东军兽医预防部。部长先后为兽医大佐高岛一雄、兽医大佐并河才三。 1938 年迁至长春市以南 10 公里的孟家屯。该部队占地面积 36 万平方米，拥有百余间房屋、特种设备和大片的土地。它的规模略小于第 731 部队。 1941 年，该细菌部队正式称为第 100 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兽医防疫部”，细菌学家、兽医若松侑次郎少将任部队长。该部队聚集了生物、细菌、解剖、军医、兽医、工程、农艺等多方面的研究人员。他们中还有一些人员具有博士学位，拥有日籍研究和工作人员 800 名，中国劳工 300 名。本部下设总务部和 4 个细菌生产研究部门。第一部，是实战研究部门，下设若干分部。研究炭疽、牛瘟、羊痘等各类细菌，并进行实验，取得并总结制造鼻疽菌、炭疽菌、传染性贫血菌以及植物的效能和传染方法。第二部，也称生产部，主要负责各种细菌、病毒的研究和制造，是第 100 部队的主

要部门。该部下设5个分部：第一分部为细菌分部；第二分部为病理学分部；第三分部为实验动物管理分部；第四分部为有机化学分部；第五分部为植物学分部。1943年12月，该部队在第二分部内成立第六分部，即所谓细菌分部，大量生产、制造细菌武器，并在地下特种仓库内保藏这种细菌。第三部，养马，并从马身上抽血，制造血清疫苗。第四部，豢养大批啮齿类动物。总务部，负责规划和总体研究问题以及后勤、医疗、卫生工作，管辖一处占地60多垧的实验农场和一处占地20多垧的牧场。教育部，又称531部队，主要负责培训专业技术人员。1940年后，该部队在大连、海拉尔（后迁至克山）、佳木斯、拉古（位于牡丹江市附近）等地建立所属各支队。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第100部队在关东军所属的部队里都设立了军团兽医部队，分别驻扎在四平、克山、东安、鸡宁、东宁等地区，侧重研究在野外大量使用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大规模杀害牲畜和人的方法及其效果。1943年后，关东军所属各军马防疫队均由第100部队指挥，其骨干人员由第100部队输送。

第100部队从事炭疽、鼻疽、腺疫、媾疫和传染性的贫血以及血清的制造，技术上由关东军兽医部长指导。据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供认，第100部队的活动，就是制造供细菌战用的细菌武器，此外，还负责进行军事破坏活动，即用病菌去传染牧场、牲畜和蓄水池。前日本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也供认，第100部队的主要罪恶行径是研究生产摧毁人类包括庄稼和牲畜的致命细菌，大量散布鼠疫、霍乱、伤寒、鼻疽、炭疽等致命细菌，藉以引起瘟疫，使无数人染疫死亡。

第100部队与731部队一样，都是特殊的细菌部队，其经费特别是细菌研究经费十分充足，军费来源秘密，开支巨大，甚至连日本国会议员也无从知道。该部队的经费一部分是日本陆军省拨给该部队人员的给养费，另一部分是日本陆军省拨给关东军制造防疫药品的费用。从1944年4月1日至1945年4月1日，日本陆军省拨给第100部队共计100万日元，必要时还可按需要增拨款额。

第100部队的设备是较完善的。有细菌研究室，其下又分三室：病理室、化学室和细菌研究室。另外有个农事研究室。细菌研究室内有孵卵器室、冷藏库、培养室、制剂室、小动物室（兔、老鼠、海老鼠），还有动物实验室。病理研究室内有小动物室、解剖室、

锅炉和实验用的马房，是检验细菌结果的地方。化学室内也有小动物室、天秤室、药物室，实验室有两个。

第 100 部队第六分部大量研制细菌武器，试验各种细菌的性能，生产有效的各种细菌武器。在具有充足设备条件下，该部队一年内能制造炭疽热细菌 1 000 公斤，鼻疽细菌 500 公斤，细菌 100 公斤……后来，即 1943 年 12 月起，设备已开始运来，并安置在第二部第六分部内，但这一计划未能完成……只制造出了炭疽热菌 200 公斤，鼻疽细菌 100 公斤，锈菌 20 到 30 公斤。此外，关东军所属其它兽医研究部门研制的细菌苗也必须供应给第 100 部队，用于研究和准备细菌战。自 1938 ~ 1942 年，安达诚太郎任马疫研究处处长时，供应第 100 部队细菌苗的种类有炭疽、鼻疽、腺液、媾液等 4 种。他们供应的细菌都是毒力强的细菌。

第 100 部队与第 731 部队是同时扩编的，两支细菌部队均为准备和进行细菌战而设立，只不过研究的课题有所侧重罢了。

（四）北京甲字第 1855 部队

日军北京甲字第 1855 部队，1938 年建立，其总部设在北平（今北京）城。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他们侵占了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利用原有设施和设备的基础，筹建细菌战基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称“北支甲第 1855 部队”，对外称第 151 兵站医院，又称西村部队，隶属日本陆军参谋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和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直辖，并由石井四郎担任技术指导。部队长先后为黑江、菊池、西村英二，定员 1500 人。下设庶务科，负责经营，传达指示及同上下左右的联系；经理科，负责制定预算、分配和处理经费。调配物资，发放工资、给养等业务；材料科，关于当地资源的药理研究，保证并提供作战、防疫以及研究所需之各种卫生材料等；计划科，制定有关华北作战的防疫、给水及细菌制造等多项业务；卫生研究科，负责生理化学实验，昆虫类、毒气及其他当地作战所需有关卫生学方面的研究业务；防疫科，研究并生产预防接种液、疫苗、痘苗、血清类，以及有关各队之菌检索、消毒、预防注射等防疫业务；生菌科，研究并生产细菌战所需各种瘟疫菌；给水科，负责野战及宿营期间的检水、滤水、饮用水灭菌，用水消毒以及运水等

给水业务。第 1855 部队支队遍布华北各地，主要有天津、塘沽、张家口、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运城、济南、青岛、郑州、新乡、开封、包头、徐州、碓山等 16 个办事处、支部或分遣队，编制在数十人至 100 人左右。此外，日本关东军第 731 部队还在承德、赤峰等城市设立了支部。第 1855 部队还在华北各地配属了防疫给水班，其性质属细菌部队，其作战行动受驻地军、师团司令官节制，但其编成人事权力属第 1855 部队。日军各军、师团均设有野战医院等常规战地卫生机构，这些医院有时也担负细菌战任务。第 1855 部队还设有临时性野战分队，随时执行细菌攻击任务，任务完成后即行解散，人员回原部队。

第 1855 部队，对初任将校和新配属的将校，要实施有关业务之特性、以及防疫和防疫给水教育。一般来说，该部队本部工作人员以及华北地区各细菌部队的卫生兵都要接受细菌战教育，目的是适应进行细菌战的需要。

第 1855 部队在北京城内，利用原有设施和设备加以改建，建有大批房屋，其中包括 7 栋病房、100 多间工作室、70 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剧毒菌种的 192 平方米的地下冷库。这里成为日军大量生产细菌战剂的场所。并于 1941 年 12 月 8 日，强占了北平协和医院和中国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该部队各主要支部也有精良的设备，具备独立研制细菌武器的能力。该部队主要培养鼠疫菌和跳蚤，作战时最大生产能量是 2.47 万瓦 (24.7 公斤)。平时养蚤最适合的数量是 1 600 瓦 (1.6 公斤)。该部队还有 70 多间小动物室饲养老鼠，每间房子可饲养上千只老鼠。第 1855 部队除生产鼠疫菌外，还生产伤寒、霍乱等其他细菌。这里还制作猩红热、白喉、破伤风、伤寒、斑疹伤寒、麻疯、脑膜炎等疫苗及血清。此外，还饲养苍蝇、蚊子、虱子等，用于细菌实验。第 1855 部队各支部，同样具有大规模生产细菌的能力。据竹内丰供述，济南支部为了实验感染力，用 11 名八路军俘虏进行了伤寒菌的培养，制造了 16 桶半细菌战用的伤寒生菌，桶的容量为直径 40 厘米、高 50 厘米。

（五）南京荣字第 1644 部队

荣字第 1644 细菌战部队设在南京中山东路原南京中央陆军总医院（现址为解放军南京总医院），对外称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也称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又称多摩部队

或桧字部队，1941 年 12 月以后，又称登字第 1644 部队。该部队隶属日军参谋本部第九登户研究所密谋暗杀部队，归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领导。该部队于 1939 年 4 月创建，原班人马大多是 731 部队的成员，重要设备、器材等也都是从 731 部队运来的，总人数 1 500 人。部队长先后为石井四郎、太田澄、增田知贞、佐藤俊二、山崎新直。该部队拥有一批学者、医师，总计 120 多人，还有一些从日本国内各大学挑选出来的年轻而优秀的医学者，组织一支科研队伍，专门研制各类细菌。本部大楼设在原南京中央陆军总医院旧址，为 6 层楼。部长室、总务部、防疫给水课均在此楼。大院内的主楼后面，有一幢 4 层楼为副楼，细菌武器与毒气武器试验都在这里进行。这座大楼的第一层为霍乱、伤寒、鼠疫研究室，二层为饲养老鼠和繁殖跳蚤的地方。三层为人体实验室，四层为监禁受试者的地方。院内其它建筑有动物舍，平房建筑；文职人员及一般军人宿舍；锅炉房；讲习楼，二层楼房；车库、食堂，平房建筑；药草种植场；日军空军部队兵舍，四层楼房；伪军军官学校。附近有陆军总司令部、宪兵司令部、日本总领事馆以及艺妓馆和日本人办的电影院、百货大楼等。马路对面有植物园和飞机场，有自备飞机 3 架。本部下设总务部，负责管理部队全部事务以及人事、教育、指导等事项；防疫科掌管细菌检索、培养、传染病防疫及其它防疫业务；材务科掌管各种卫生材料、给水器具及其它一般材料业务；理化学科主要负责毒物检查、制造预防注射液、水质调查和理化学方面的研究；经理科主管部队的财务。第 1644 部队在上海、苏州、常州、杭州、九江、南昌、安庆、汉口、岳阳、宜昌、荆州等地设立了 12 个支部。杭州分部是华中细菌战的主要据点，是中心转运站，设在杭州郊区原笕桥中央航空学校。

荣字第 1644 部队的细菌战剂生产工厂位于南京城东北角，对外称“血清疫苗制造厂”，无任何标志。该细菌工厂拥有巨大的细菌战剂生产能力，一个生产周期就能生产 10 公斤浓缩活细菌浆。该厂还制造血清，有马 60 多匹。经专家勘察，该厂是细菌战剂生产工厂。该部队还在日军在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 1878 号前日本办的福民医院（现为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建立了细菌武器中转站。由此转运大批毒菌，以期到处传播造成剧烈之传染病。

1644 部队内设训练部，每年培养出 300 名细菌学干部，以供进行细菌战的需要，

新兵培训后才允许上岗。该细菌部队让学员学会防疫知识，进行自我保护，这是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培训细菌实战人才，他们采用残酷的人体实验，活体解剖等手段，让学员观摩实习，从而达到研制细菌武器、从事细菌战的目的。

1644部队拥有巨大的细菌战剂生产能力，主要设备有孵育室、消毒器，以及“石井式”培养器约200具、孵育器40 ~ 50具；蒸汽灭菌器40 ~ 50具；科哈式锅炉40至50具。此外，还有蒸馏营养液的大玻璃蒸馏器。该部队能大规模地培养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各类致命细菌，在利用全部设备时，该部队每一生产周期能制造出10公斤细菌。该部队还进行繁殖跳蚤的工作，备置有100多个汽油桶。据石田甚太郎证实，该部队曾进行过气球“炸弹”上的“鼠疫跳蚤”的开发研究。部队中将吸了老鼠血的鼠疫跳蚤作为生物武器大量生产，并进行传播途径的研究。该部队所进行的全部工作都是为了准备进行细菌战。

（六）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

广州侵华日军华南防疫给水部，代号为波字第8604部队，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隶属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下的谋略（暗杀）部队。该部队编制1 200人，在华南各城市设立了12个支部。部队长先后由田中严大佐、佐佐木高行中佐、佐藤俊二、龟泽鹿郎大佐担任。该部队创建于1938年9月7日，同年10月12日在广东大亚湾登陆，于10月30日抵达广州，在现在的中山大学医学院所在地设立总部，原中大医学院图书馆就是日军在华南细菌战本部。该部队本部下设6个课。总务课负责后勤保障、人事、财务管理工作；第一课为细菌研究课，下设庶务班、研究班、检索班、培养班、消毒班和动物班；第二课从事防疫给水研究；第三课从事各种传染病治疗的研究工作；第四课从事鼠疫培养和病体解剖；第五课是器材供应部门。该部队还占据了原设在广州北郊江村的国民党第四军野战医院和军医学校旧址长达3年之久，主要从事防疫（侦察水源、收集疫情）、病源检验、验水、消毒检诊、净水等作业。8604部队还设有广州伪粤海关港检疫所、南石头难民收容所等秘密进行人体实验的场所，其主要任务是进行细菌实验。

8604部队从事细菌研制工作，平时每月饲养1万只老鼠，制造鼠疫跳蚤10公斤。

1944年发出了增产的命令，每月生产15公斤鼠疫跳蚤。据佐藤俊二供认，该部队曾生产过用以攻击中国军民的致命细菌。附近居民曾发现日本军人用军车收集老鼠，一车一车活老鼠运往8604部队。

（七）南方军（新加坡）冈字第9420部队

1942年5月5日，南方军冈字第9420防疫给水部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成立，该部队隶属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部队长先后为羽山好夫大佐、佐藤大佐和小野寺中佐。本部设在新加坡昭南爱德华七世医院（现为新加坡卫生部药品管理局）。该部队编制208人，实有人员最多达590人。下设3个队，井村队，负责捕鼠、饲养老鼠，它在马来西亚的中部设有一个小分队；中安队，负责繁殖和研究跳蚤；江本队，负责研究收集鼠疫菌，保存和繁殖以及感染老鼠，并制造少量疫苗。细菌武器的制造主要在马来西亚淡环精神病院进行。在缅甸和泰国也设有支队。

9420部队井村队主要从事捕鼠、养鼠工作，他们编成小分遣队长期驻扎在马来半岛中部山林地带，使用当地人捕鼠。捕获到一定的数量就和总部联络，再运送到井村队。井村队在稍南面山坡上病房和屋外饲养老鼠。中安队主要从事跳蚤的养殖及研究工作。他们把多条宽1米多、长5米左右的饲养床连接在一起饲养跳蚤。竹花京逸曾见过满罐子滚成一个团子的跳蚤。江本队（研究室）主要负责保持鼠疫菌株，繁殖培育细菌，进行毒化作业（把鼠疫菌注射给老鼠，然后使跳蚤吸老鼠的血液），并制造少量疫苗，以及和免疫有关的研究等。该部队同其他细菌部队一样开发制造细菌武器，准备进行细菌战。

三、细菌传染实验及活体解剖

石井四郎发明了利用动物、植物、甚至活人进行细菌实验。他认为探索细菌战和自然界发生流行病的规律，必须用活人作实验来加以验证，以达到研究细菌武器的效能、解决医学上的难题的目的。进行这种实验时用的“马路大（731部队用来做实验的活人）”，既可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也可在野外条件下进行。各种研究材料证明，日军各细菌部队及陆军医院都曾利用残酷的方法进行人体实验，成千累万地杀害活人。凡是被用作“实验的材料”，他们包括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都不可能有生还的希望。

这种罪恶的实验，曾施之于中国人、蒙古人、苏联人、朝鲜人，甚至包括荷兰人、美国人、英国人……，有大量资料证实，731 部队曾在奉天战俘营利用中、美、英等国战俘进行人体实验。所有各种罪恶的实验都是经过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的认可和同意的，从关东军到日本参谋本部都曾支持各细菌部队进行细菌实验，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第 731 部队的细菌实验

1. 动物、植物实验

731 部队养马是为了抽血，搞细菌实验 ，制造血清等。石井四郎部队利用马匹进行栽种炭疽菌实验，用炭疽菌大批注射，杀死马匹，观察实验结果，目的是实验炭疽菌的效力。种村文三在铁道第三联队第一大队任卫生曹长时，在黑河线辰清站，曾督促 15 名中国劳工掩埋石井部队用细菌杀死的 100 多匹马。731 部队还饲养牛、羊、骆驼、江豚、老鼠、狗、鸡、猪等动物，用以充当细菌实验材料。各支队也养有各种供细菌实验用的动物。

731 部队八木班专门从事植物病毒研究，经营一个实验农场，有土地 10 多垧。该实验农场有一大片麦田，专门培植“乌米”麦子，麦子长成后，麦穗为黑穗，称“乌米”。日军的“乌米”是培植出来的，又运到各地进行撒播，其根本目的是用细菌大面积破坏农作物，从农业经济上给人类带来危害。

2. 人体实验

有事实表明，石井四郎早在东京陆军军医学院研究细菌武器时，就已在活人身上从事罪恶的实验。1990 年，在原东京细菌研究室旧址施工时，曾经挖出了 28 具尸骨。据考证，这些尸骨都是在当时是细菌实验过程中被无辜杀害者的遗骸。迁移中国东北后，在哈尔滨南栋的诊疗部，日本军医就拿“犯人”进行过人体实验。在背荫河时期，石井部队除少数暴动越狱的人外，监狱里数以千计的“犯人”无一幸免。

在哈尔滨平房镇，731 部队第一部管辖“四方楼”秘密监狱里关押着受实验的人，这些人都是日本宪兵队机关确定要用残酷手段加以杀害的。第 731 部队内在实验室条件下有系统地对活人进行过实验，强迫被实验者染上各种细菌，然后就来观察这些受实验者的病症，以求研究出最有效的传染病媒介物，研究出最厉害的细菌战武器以及大量传染人的方法。731 部队究竟有多少人死于细菌实验呢？川岛清说，每年被押进监狱里用

作实验材料的有400 ~ 600人。每年因受实验而死去的大约至少有600人，5年间至少有3 000人丧失性命，这是最低限度的数目。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第三课长吉房虎雄中佐回忆说，据估计至少有5 000名爱国者，通过我们宪兵转到石井部队，最后成了实验品。

在实验室条件下，对人进行的各种实验的同时，731部队还使用一部分“实验材料”在野外进行实验。这种实验由731部队第二部在最接近于战斗环境的条件下，组织实施进行。该部队在东北有固定的野外实验场地，主要有安达特别实验靶场、城子沟、佳木斯、陶赖昭等地设置的实验场。另外，还有一种临时实验场，在东北山区及呼伦贝尔草原等地都进行过野外实验。在野外实验中，731部队既使用细菌、病毒，也使用毒气，大规模地杀害“马路大”及无辜的平民百姓。在野外对活人进行实验时，最常用的办法是投掷细菌炸弹，或从低空飞行的飞机上，直接撒布细菌和染有鼠疫的跳蚤。在地面上传染居民点、蓄水池和牧场等等。在打靶场上，日本人把细菌弹放在离被绑在柱子上的受实验者一定距离的地方，然后由实验者在战壕内用电器设备来引爆。实验后，经过两小时左右的观察，把受实验者押回监狱，继续观察他们的病情。受实验者一般不进行治疗，能使他们全体致死，是实验者最为得意的。对各种细菌的效能，731部队在打靶场上都用活人实验过，最常用的是鼠疫菌、炭疽热菌、霍乱菌和伤寒菌。

731部队的人体实验花样繁多，冻伤实验是731部队重要的实验种类，在严寒的冬季，731部队吉村班人员强迫“犯人”裸露身体或仅穿单衣到室外接受冷冻，如果是夏季，他们就把人赶入冷冻室。冷冻达到一定程度后，他们便拿着小木棒打“犯人”的肢体，当发出很硬很脆的声音后，他们便把人抬入另外的实验室以不同的方式给予解冻。有的用冷水浇，有的用温水泡，有的用滚开的热水烫，以求最佳解冻方法。被实验者在极大的痛苦中，有的当场死掉，有的烂掉皮肉露出白骨。为了病理实验的需要，他们有时给被实验者的冻伤处涂上各种药膏，以观察病变过程。经过无数次这种毫无人性的实验，731部队得出的结论是用摄氏37度的温水浸泡是治疗冻伤的最佳方法。731部队第二部设毒气研究班，以活人为材料进行毒气实验。实验人员把“马路大”推进密封的玻璃柜内，分别进行一度、二度、三度的毒气实验，直至把他们毒死为止。该部队平时对监押的实验材料进行防毒和施放毒气的实验，一旦遇到受实验者的反抗，日本人就使用毒气将牢

房的人全部毒死。真空环境实验，即把受实验者关进密封的实验室内，用真空泵将实验室内的空气抽净，使人窒息而死。还有“烤人”即以“马路大”为实验材料，进行一般武器的杀伤力的实验。他们把受实验者关进旧坦克和装甲车里，用火焰喷射器射出白热的火焰，炙烤车辆，里面的受实验者全被烧焦了。另一种实验是731部队队员把受实验者当作用枪弹穿射的“实验材料”，进行穿透实验。此外，还有人、马之间的血液交换实验；在妇女身上进行梅毒实验以及空气静脉注射实验等等。

731部队采用多种方法在活人身上进行各种实验，要是受实验者染菌后又痊愈起来，那他也不免要受接二连三的实验，直至致死人命，肢解尸体，焚化灭迹。其主要方法有菌液注射，即把带菌溶液或输入“马路大”的血管里，或皮下注射，而后观察被细菌感染者的病情变化，进行活体防疫及毒力实验。口服染菌食品，他们把实验用的细菌掺入饭食、饮料、水里或注入瓜果、蔬菜里，对受实验者强迫灌服或让人误食，以观察各类细菌的效能。石井部队用霍乱菌、赤痢菌、伤寒菌、鼠疫菌进行过实验。该部队把蔬菜、水果、鱼、肉类等食物都掺入细菌进行比较实验，结果最容易感染细菌的是蔬菜，特别是叶子多的蔬菜，如白菜类，块茎表面光滑，较少使用。把细菌注射到水果类的食物里，效力更大。据石井说，散布传染病最适当的媒介物是蔬菜，其次是水果，再其次是鱼类，最后是肉类。比较实验，日本军医在受实验者身上交叉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细菌实验。他们把这些“实验材料”分成若干组，或在每组人的身上使用的细菌菌液剂量不同，注射的次数不同；或分别使用注射、灌服、埋入等方法，以观察其结果，写出比较表。

最为残酷的是活杀解剖，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要经过临床观察、解剖观察、病理观察3个阶段。人体解剖观察，一般是人感染细菌患病死亡后解剖尸体。石井部队也进行人体活杀解剖，把人当作动物来宰杀实验，而且不打麻药。活人解剖最早只在731部队进行，以后扩展到日本在华所有的医院。他们把被肢解的尸体，制成标本后，放在陈列室里。人的各部位的器官，种类齐全，都浸泡在标本瓶里，供教学研究使用。

在活人身上进行细菌实验，是日军细菌部队最残暴的罪行，日本侵略者根本不把那些受实验者当人看待，而把他们称为“马路大”，即“圆木”。最新研究资料表明，日

军在中国进行人体实验，至少有 5 000 人被杀害。实际上这个数字只限于 731 部队在背荫河、平房细菌基地长达 13 年之久的人体实验中所为，其他细菌部队以及来华的军医们拿活人做细菌传染实验和人体解剖那是很普遍的事，因此，被日军所虐杀的人数可能还要更多。

（二）第 100 部队的细菌实验

关东军第 100 部队专门繁殖和培养鼻疽、炭疽热、牛瘟等兽疫的病菌，该部队利用家畜和活人来实验细菌武器的效能。该部队有自己的大牧场，他们在牧场上撒下各种细菌进行实验。第 100 部队平常养的马起码也有 2 000 匹以上。他们养马是为了抽血，制造血粉，搞细菌实验。第 100 部队曾在安达特别实验场进行炭疽菌传染实验，结果导致 10 匹马当场死亡。另有一种方法就是给马注射不同剂量的毒药液，实验马的抗病毒能力，目的是取得氰化钾、马前霜碱致死马的剂量，研究在军事破坏时使用毒药的手段。该部队也利用老鼠等其它动物进行实验，被解剖的疫鼠量每天至少有 30 多斤。

第 100 部队强占当地农田种植农作物，用于细菌实验。该部队曾研究斑驳症和小麦锈症菌来破坏农作物。据当地村民说，日军实验田里的苞米不结棒，稻子正在灌浆时，却被他们灌进去一些污水，稻子立即蔫死了……

第 100 部队还进行人体实验。三友一男曾多次参加过活人实验，他供认，进行这种实验的办法是用一种使受验者觉察不到的方式发给他们一剂催眠药或毒药去吃，受实验的都是俄国人和中国内地人，共计七八名。实验时所用的药品有朝鲜的“韩颜”，海洛因及蓖麻毒。这类毒品都是掺进到食物内去，让受实验者误食。为了保持秘密，所有这些受实验的活人都被害死了。另据当地农民说，战后，他们到第 100 部队的“牲畜掩埋场”挖取马骨卖钱或做肥料时，结果挖出来的有马骨头也有人的遗骸。距掩埋场西边 1 里来地，有一块长条地，下面埋的全是人的尸体，浅处有尸骨，再挖 6 尺甚至 1 丈深还有人的尸骨。另有劳工曾看见过该部队的 3 个炼人用的火化炉，上面有厚厚的骨灰。据《死亡工厂》记载：“在若松的‘科学工作员’们进行人体实验当中，鼠疫、炭疽和鼻疽实验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长春细菌工厂运行的 9 年之中，用于上述这些疾病实验的“实验材料”，即使不是成千上万，至少也是成百上千。

（三）第 1855 部队的细菌实验

第 1855 部队把“实验材料”称作“猿” 。据平川喜一他证实说，1944 年夏天，第 1855 部队曾用 17 名俘虏进行细菌实验，日本军医给俘虏注射细菌，然后观察感染后的变化……过一夜，俘虏们都死了。俘虏们的尸体都被解剖了。第 1855 部队的人体实验，经常在它的支部济南细菌实验场进行，据竹内丰笔供，1943 年 8 月 1 日至 31 日，被派到济南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该支部长为了做研究实验，从济南宪兵分队要来了 11 名八路军俘虏，用来实验细菌战用的伤寒菌感染力，最后将他们做了活体解剖。曾在济南支部当中文翻译的韩国人崔亨振说，这支细菌战部队曾用鼠疫、伤寒、霍乱等细菌做人体实验，每年要杀死 400 到 500 名俘虏。山西细菌部队也进行细菌实验，他们在河南新乡一带作战时，以救济为名，把伤寒菌掺入大米、白面里，传染人群，杀害无辜平民。日军在华北各地的细菌战部队支部、办事处、分遣队，及各地日本陆军医院、各野战部队的军医，为了研制细菌武器和医学上的疑难问题，经常地做活体解剖。山西省潞安县日军陆军医院汤浅谦军医说，来华的日本军医们，拿中国人做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那是家常便饭。

（四）第 1644 部队的细菌实验

第 1644 部队侵占南京期间，一直不断从事细菌战研究与活体试验，杀害了大量中国人。1942 年 10 月，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俘虏收容所所长森田中尉将 100 多名俘虏送往 1644 部队，供注射细菌实验。这些人均被该部队长山崎新等人实验致死。日本方面也有人证实 1644 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罪恶行径，据《每日新闻》记者朝野富三调查，该部队实验楼三层为人体实验室，受试者一旦进入，就不可能活着回去。他们的尸体还要被日军试验人员作解剖研究。朝野富三还采访记述了 1644 部队和“九研”（登户研究所）联合进行的一次人体实验情形，受试者最后被注入氰酸，仅数十秒钟，就抽搐而死。该部队第一课用活人来进行各种各样有关传染病和毒素的活体试验。由医生组成的专门小组，对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病毒以及蜈蚣、蝎子、蝮蛇等小动物的毒液、毒草、毒药对人体会产生何种影响进行了人体试验。该课的医生都参加了人体试验。也有的医生专程从日本本土赶来参加试验，取得研究成果后立即将资料归结起来再返回日本。实

验后的尸体或骸骨或被烧掉，或被埋在 1644 部队附近一带。第二课负责从宪兵队提取活人体，其中成年男性居多，也有女子和儿童。日军投降后，为掩盖罪状，将埋在 1644 部队辖区内的尸骨重新开掘，堆聚在一科大院里焚烧，骨灰抛进长江里。但其部分遗骸还是遗留下来。1998 年 8 月 19 日至 9 月 5 日，南京九华山附近搞基建深挖时，无意中挖到几十具被肢解的尸骨，散发着浓烈的刺鼻药味，经化验，里面含有霍乱弧菌肠毒素基因。

华中地区各日军部队都直接用人做实验，进行活杀解剖。这种活杀原本是研究细菌武器，进而扩展到杀人方法的研究以及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的研究，并对日军卫生新兵进行培训，借活杀进行各类实验，屠杀中国人民。

（五）第 8640 部队的细菌实验

广州市河南南石头难民所是第 8604 部队秘密进行细菌实验的场所。在日军侵占香港期间，大量香港难民涌入广州，第 8604 部队以难民营中缺少食品为由，向难民提供掺入细菌的食品，致使大批难民死亡。佐藤俊二部队长指挥他的部下在难民营进行了细菌实验。他们先在收容所的 4 个水井里投放了伤寒菌、副伤寒菌，由于难民不喝生水，这一计划没有成功。于是部队长派飞机从东京军医学校取来肠炎沙门氏菌（副伤寒菌），再次投毒进行细菌实验，杀害了成千上万的难民。难民的尸骨多在“化骨池”和南箕路处理掉了。南石头地区船上还有一个难民所，难民坐着“大眼鸡”船（有帆，船头画有两只眼睛）涌入广州后，难民所里住不下，只好留在船上。日军又在船上实施细菌实验计划，他们施放鼠疫跳蚤，致使船上天天死人。每天，日本人还往外带人搞细菌实验。一船 480 人除少数逃走外，其余的不是死在船上，就是被日本人抓走了。该部队在附近村屯也进行人体实验，日本兵把附近村民捉去喂蚊吸血，进行人体实验，甚至活杀解剖。日本人还强迫威胁村民刺耳朵取人血和打针抽血做实验。8604 部队还进行尸体解剖，每天解剖 3 具左右。被解剖的尸体男性青壮年居多，也有少数女性、小孩和老人的尸体。还有不少受实验者或受伤者被活体解剖了。他们的脏器被制成标本，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

从 1939 年到 1945 年间，8604 部队在广州从事各种细菌实验和活体解剖，有学者说，上十万粤港难民成了日军细菌实验的牺牲品。

四、特别移送

特别移送，也称特别输送，日文称“特移扱”，它是由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等高层领导与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等人秘密策划的。为此，日本关东军发布了特别移送的密令，即1938年1月26日，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警务部下发的58号文件，规定并实行“特别移送”。日本宪兵队机关和伪满当局根据731部队的要求，经常把他们认定的重犯，不须提交法庭审判，秘密地押送到731部队，供细菌试验之用。被押送的人大多数是被俘的八路军、新四军、苏联红军以及反满抗日地下工作者等。在运送期间，日本宪兵队官方给被押送人员规定了一个专用名词：“特别移送”。1943年3月12日，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警务部长又颁发了第120号文件，该文件把“犯人”划分为“间谍（破坏分子）”和“思想犯”，并确定了特别移送的标准，即预料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没有被收买和利用价值的人等。关东军内部大体有4条规定：所谓谍报工作者，将处以死刑的；没有家属、亲戚或其家属、亲戚很少者；没有同案关系者；将来不能利用者。各日军宪兵队在执行过程中，随意逮捕并进行特别移送的范围更广些，甚至把无辜平民、流浪少年也随便抓来进行人体实验。特别移送范围先是在石井部队，后又扩展到侵华各细菌部队以及日本在华的医院。

据勃利宪兵队庶务主任伍长高木贞次郎供认，1937年12月，就有“特别移送”的案例，他们将逮捕的抗日联军第八军2名战士押送到石井部队。自1938年开始，大批的抗日志士被各地宪兵队移送到731部队，他们中间有中国人、蒙古人、苏联人和朝鲜人等，他们的身份大多是抗日反法西斯志士。这一罪恶行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

哈尔滨宪兵队备有专用的囚车负责押送“犯人”，每次行动都是日本军人武装押送，大约每周运送一次，输送的数量不等，有时二三十人，有时四五十人。特别移送有时也使用列车，1939年8月8日，关东宪兵司令部发出第224号作战命令，途经山海关站，一次就特别移送90名中国军人，其中押送到石井部队本部30人，孙吴支队60人。设在哈尔滨市郊香坊一带的“保护院”集中营也向石井部队移送“实验材料”，据“保护院”集中营主任饭岛良雄供认，仅1945年，他就从“保护院”集中营几次总共向731部队移送了约40个苏联人去遭受实验。这些被抓来的人都关押在平房的特设监狱里，用来做灭绝

人性的细菌试验。过去的研究资料都是依据川岛清口供，认为平房杀人工厂至少有 3 000 人死于细菌实验。从新近发现的特别移送档案判断，保守估计，731 部队在长达 13 年的时间里以各种试验的手段残杀的中国抗日军民及世界反法西斯志士达 5 000 多人。

历史档案中共发现“特别移送”案例 134 个，移送人员 1 203 人，其中中国人 1 173 名，苏联人 16 名，蒙古人 7 名，朝鲜人 7 名。这些人涉嫌情报工作、反满抗日地下工作等“罪名”。他们被关押在特别监狱里，失去人身自由，其姓名用号码来代替，但仍查出 59 个被害者的姓名。实际上现存资料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案例，大部分尚待挖掘。1997 年，笔者发现 31 起特别移送档案，这些档案都是宪兵队审讯被捕人员的详细经过及向上级要求特别移送的报告的日文原始记录。同以往发现的关于特别移送的资料不同的是，这批档案里详细记载了被俘人员的姓名、年龄、原籍、身份和用以掩护身份的职业以及他们被俘的详细经过。但档案中记载的 43 名活体试验受害者的证人却很难找到。2000 年 10 月，笔者得知受害者朱云岫和王振达有亲属在鸡西市这一重要线索后，多次前去寻找，先后找到受害者朱云岫的侄女朱玉芬等王振远夫人金玉珍、曹 ×× （原臻）证人，他们回忆了当年受害者失踪的情况，并写下翔实的证言。

五、细菌战及其遗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使用生物武器残害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日军在我国哈尔滨、长春、北京、南京、广州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先后组建细菌部队，又在我国 63 个大中城市建立了细菌战基地，大量生产细菌武器，准备进行细菌战。据中外学者研究，日军曾先后对我国 20 多个省、区发动细菌战，采用飞机撒播、用特务、汉奸在地面施放以及掺入食品等多种方法进行细菌攻击，以达到高度的命中率和不为人所知的效果。在细菌战中，日军投放了鼠疫、炭疽、伤寒、霍乱、赤痢等各类细菌残害人类，屠杀牲畜、毁灭庄稼，造成大范围的疫病流行，生灵涂炭、农作物绝产，遗留下毁灭性的灾害。

从 1939 年开始，日军细菌部队先后在内蒙古的诺门罕、王爷庙，浙江的宁波、衢州、金华、义乌，浙赣铁路沿线，华北地区，湖南的常德、滇西地区以及广州的南石头难民营等地区实施细菌攻击，致使这些地区疫病大流行，数以万计的人死亡。被日军细

菌武器杀害的中国人有据可查的就有27万人（不包括军人），这是个大大压缩了的数字。从近年来的调查研究来看，死亡人数至少在200万以上。如果加上疫病蔓延所造成的遗害，其死亡人数更是难以计数。

在日军发动的细菌战实例中，一部分档案资料较为翔实，加之战后日本老兵的披露，专家学者的调查，因此，这些地区的细菌战为世人熟知，如诺门罕、王爷庙、宁波、衢州、常德、滇西、鲁西、南石头等地的细菌战；而另一部分零星资料，只提供了线索，而无详细的记载，又难以调查，因此，细菌战规模虽大，却缺少系统的研究资料。华北地区的细菌战即如此。现举例说明，据中岛京子笔供，太原市西羊市华北派遣军直属部队防疫给水部在河南新乡一带曾将伤寒菌掺入大米和白面里，杀害了很多中国人，而对细菌施放后的疫病流行情况没有交代，后人也没有调查研究。诸如这样的事例还很多。因此推断，华北地区的细菌战更为猖獗，达到了“整个西北前哨顿呈严重局面，惨绝寰宇，无复人性”的程度。据新华社50年代报道，在8年抗日战争中，边区患传染病的人数约1 200万。再就是日军对牲畜和农作物进行的细菌战所造成的灾害，尚待进一步挖掘，第100部队平樱全作等人供述了日军曾在额尔古纳河支流撒放细菌，进行传染牲畜的实验。同样对这一细菌战所造成的后果没有交代。其根本原因是，当时处于战争年代，日军细菌战往往在秘密中进行，在一些地区我方当时无人也无法调查，民众认为疫情是自然发生的，尤其是畜间疫情更是无人问津了。因此，日军所犯下细菌战的罪行，现在所披露的也不过是冰山一角，不少史实被隐瞒下来。

1939年7月，石井部队首次在诺门罕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敢死队长碇常重带头在血书上签字，并指挥敢死队员在哈拉哈河里撒了22.5公斤霍乱、伤寒、赤痢和鼻疽等细菌液。在这场战争中，石井部队企图用细菌攻击苏、蒙军队，削弱其战斗力。结果事与愿违，苏、蒙军前线部队由后方水源地直接向前线铺设了专用供水管道，供参战部队饮用。因此，在细菌战中没有造成大的伤亡。而日军和伪满国军作战时主要靠当地水源，在后方给水不到位的情况下，一些士兵误饮了哈拉哈河的水，再加上敢死队员匆忙作业，使一些队员不慎感染了细菌，他们成了细菌战的牺牲品。

1940年，石井部队带领第一个远征队对浙江宁波等地发动了细菌战，直接指挥浙

东地区细菌战的是荣字第 1644 部队长太田澄大佐。10 月 27 日下午 2 时许，增田美保药剂大尉驾驶一架单翼飞机在宁波上空撒下染有鼠疫杆菌的跳蚤、麦粒、面粉，两天后，宁波市内爆发鼠疫，市民死亡有姓名可查者 106 人，发病幸存者仅钱贵法一人。为彻底消灭疫源，当地政府烧毁疫区 137 间住房。石井四郎认为这次远征实行细菌战是有成效的，标志着该部队用细菌武器攻击已经进入实战阶段。这次细菌战给当地居民带来了致命的鼠疫病。

在 1940 年 10 月和 1942 年 4 ~ 8 月，日军先后在衢州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细菌战，撒播了大量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炭疽等各类细菌。日军采用多种手段进行细菌攻击，或用飞机在居民聚集区投撒细菌，或派遣阴谋破坏小分队把细菌散布在水井、河流、厕所及各种建筑物上，或把细菌掺入食品中，强迫或引诱战俘和居民食用，从而导致细菌传播，使衢县变成了多种传染病的疫源地及流行区。据衢州各县统计资料及衢州防疫专家分析，（1940 ~ 1948）8 年中该地区累计发病约 30 余万人，病死约 5 万余人。

在宁波实战中，石井四郎积累了一些战斗经验，但也有弄不清的问题，例如空投跳蚤究竟能散布多大面积等。因此，石井部队策划再次远征，企图在实战中探索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消灭对方的兵力，从而更大规模地进行细菌战。1941 年夏季，石井四郎派出了第二个远征队到中国内地去，领导人是太田澄大佐。该远征队的基本任务是要破坏中国军队的交通线，其重要枢纽是常德城，所以要在常德城居民中间引起鼠疫流行病。该远征对内曾有 30 个细菌学专家参加，全队人员总数达 100 人。11 月 4 日上午 5 时许，敌机一架，于大雾弥漫中在常德投下鼠疫菌，随后又在常德城东北 30 公里处的石公桥镇撒播了鼠疫跳蚤。常德鼠疫发生后，据当时当地的记载死亡百余人。据常德细菌战疫死人数 7 年的调查，常德鼠疫流行 5 次，死亡 7 643 人，但这仍不是最后的数字。

衢县第二次细菌战是浙赣铁路线细菌战役的一场重要战役，它是石井四郎的第三次远征，第 1644 部队也参加了这次行动。第 731 部队给远征队提供了 130 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热菌，还供给了大量的鼠疫跳蚤；其余的致命细菌，则是由第 1644 部队培养出的。日军使用了多种细菌进行攻击，企图摧毁浙赣铁路线的衢县、丽水、玉山等机场，浙赣

铁路线的玉山、江山、丽水、金华、义乌、东阳、上饶等城市及农村遭到细菌攻击，造成大范围的疫病流行。衢州是重灾区，它所辖的柯城、衢县、龙游、江山、常山、开化6县（区）相继发生了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炭疽、脓包疮、头癣等传染疾病。衢州境内有90%的乡镇都发生过疫病流行。石井四郎对浙赣行动颇为得意，他认为在浙赣战区使用细菌武器，已收到颇大的成效，造成了几种极厉害的传染病。石井的看法与实际情形相符合，细菌战区域内发生了强烈的瘟疫。

1942年春，日军为了切断我军援的通道滇缅公路，发兵进攻云南，在战争中，731部队和南方军所属各防疫给水部队联合行动，在云南实施了霍乱、鼠疫等细菌攻击。5月，日军飞机在昆明使用细菌炸弹时被击落。5月4日，日本54架飞机轰炸保山，投掷炸弹、燃烧弹及霍乱菌弹300多枚，引起了保山等滇西数十县霍乱大流行。除空袭外，日军还收买缅奸与汉奸在滇西公路沿线的水沟、水池、水井中投放霍乱病菌，导致云南58个县、市霍乱病大流行。霍乱病症从日机轰炸中心保山、施甸发作，随着疫区百姓向滇西各县逃难，瘟疫迅速蔓延开来，波及滇西数十个县，因霍乱而死亡近10万人，其中保山县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死亡6万多人。1944年，日军南方军冈字9420部队与731部队联合行动，在云南进行了鼠疫菌战。日军利用施放染有带鼠疫菌的老鼠、给老百姓注射鼠疫菌毒液，造成鼠族及人类相互感染鼠疫菌，从而爆发了鼠疫流行，致使云南鼠疫流行时间达10年之久，死亡四、五万人。

1943年8～10月，日军抓住卫河流域普降大雨，卫河河水猛涨的机会，由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冈村宁次、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等亲自部署，日军第12军59师团和北支甲第1855部队联合行动，在山东西部发动了霍乱战。在59师团团长细川忠康的指挥下，日军在临清县小焦家庄、临清县尖冢镇、南馆陶以北5公里的拐弯处等3个地方先后挖掘卫河堤放水，并往河里散布了大量的霍乱细菌。借助洪水传播霍乱细菌，致使鲁西地区聊城等18个县爆发霍乱，根据地军民有20多万人死于霍乱。日军发动鲁西细菌战，杀害中国军民，目的在于摧毁冀鲁豫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并检验日军大部队在霍乱盛发区行军、作战的防疫力、持久力。另外，将卫河决堤，把水放于地势低洼的冀南，还能保住日军控制的津浦铁路和后方重要军事基地德州。

日军在内蒙古地区曾多次实施细菌攻击，1941 年，华北第 1855 部队驻包头分部，就在当地大量收买老鼠，制造鼠疫菌，准备在内蒙古西部实施鼠疫菌攻击。731 部队 543 支队在呼伦贝尔地区经常撒播细菌，进行阴谋破坏活动。1941 年以来，543 支队采用给牧民注射毒菌，然后再把带菌者放回家等卑劣手段进行细菌传染，该支队在伊敏等苏木撒播了染有鼠疫的跳蚤，造成鼠疫爆发，死亡 80 余人，使人口不多的当地蒙古族牧民濒临灭绝的边缘。1942 年，侵华日军在绥西实施了鼠疫攻击，主要采用地面袭击的方法，日军有毒菌密谋队，多由汉奸当队员，他们冒充难民，将细菌投入民房，水井内。当时，绥远省为日军细菌攻击的重点区域，临河县、五原县、包头县、安北县、杭锦后旗先后爆发了鼠疫，并蔓延开来。疫区达到 17 个、疫点 60 多个。1945 年 8 月，为阻止苏联红军进攻，日军在王爷庙（乌兰浩特）实施了鼠疫攻击。驻王爷庙的日军有细菌生产基地，他们饲养了不少白鼠，也大量捕捉、收购黄鼠进行细菌研究。1945 年 8 月，日本人撤离王爷庙时，从伪兴安医学院的细菌室拿出疫鼠，放进王爷庙所有的粮库里，同时在粮食里掺入了细菌，造成乌兰浩特——通辽县——奈曼旗——敖汗旗——赤峰等地的鼠疫大流行。1945 ~ 1948 年，4 年间仅内蒙古地区的发病人数就达 47 522 人，死亡 39 097 人。

日军占领我国东北后，1940 年，石井部队在新京（今长春）、农安等地撒播了鼠疫菌，致使新京一带发生鼠疫流行。关于新京鼠疫的发生，最先揭密的是爱新觉罗・宪均，他供认了日军撒播鼠疫菌的事实：7 月下旬，卫生技术厂长阿部某把带有百斯笃（鼠疫）菌的昆虫，散布在城里兴运路和日本桥一带的所谓贫民区之间。于是在该地带首先在小孩中感染了 3 名，继而蔓延，至 8 月下旬，共发现 80 余名百斯笃患者，死亡率在 90% 以上。这一次的新京百斯笃流行，是日军在大都市密居的地方，试验感染情况的罪恶行为。农安鼠疫的制造者是石井部队，石井四郎曾说过："既往事实：农安县，由田中技师以下 6 名投放，据密探报告，最有效果。"这说明农安鼠疫是石井四郎指使其部下实施的。石井部队新京、农安细菌谋略，实际上是为了配合其在浙赣进行的细菌战。农安鼠疫初发时为 6 月，终息时为 11 月 27 日，总共发病 551 人，死亡 471 人，其中农安县城 354 人，死亡 298 人。日军在王爷庙施放染疫老鼠疫战后，鼠疫迅速蔓延开来，波及吉林 17 个县市，

主要发生在乾安、扶余等县。

731 部队在平房地区搞细菌实验，前后造成许多地区疫病流行。该部队生产细菌的污水，不作任何处理，随意排放。1940 年，平房地区裴家窝堡的村民饮用何家沟子被细菌污染的水，导致霍乱症发生，全屯死亡 40 多人。日军投降后，731 部队搞细菌实验的老鼠四处逃散，导致附近村屯鼠疫流行。1946 年 6 ~ 10 月，731 部队附近各村屯发生了鼠疫。大东井屯死亡 38 人，后二道沟屯死亡 42 人，义发源屯死亡 41 人，哈尔滨市发现 14 个病例，死亡及发现共计 135 人。该部队撤退时炸毁了安达打靶场。他们留下了 50 头牛和 28 匹马以及 10 万斤掺有鼻疽菌的大麦饲料、猪肉等食品。当地居民把牲畜牵回家使用，结果这些牲畜没过多久就患病死亡，还传染了其他耕畜，致使该地区连续几年发生牛瘟和马炭疽病。

日军侵略香港后，以逐出香港市民为企图，开始征收香港、九龙的粮食和物资，大批香港难民被迫返回广州。日军不让难民进入广州，把他们关在南石头难民收容所里。由于收容所里人满为患，部队长佐藤俊二军医大佐口头命令秘密地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了大批香港及广东本地的难民。日军波字 8604 部队起先是在收容所的 4 个水井里投放伤寒菌、副伤寒菌，但因难民只吃煮过的食物，不喝生水，所以投放细菌没有效果。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日军从东京军医学校专程运来了沙门氏菌，在难民营使用。沙门氏菌不耐热，日军就降低饮用汤的温度，然后再把细菌放进去，让难民们食用。这个方法获得了成功，杀害了大批的难民。该部队还在粤北、粤西、海南等地进行细菌攻击活动，造成疫病大流行。

华北地区的细菌战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所进行的，日军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使用细菌武器极其隐蔽，散布细菌与扫荡作战相结合，疫病传染猖獗，死亡人数巨大。据专家研究：8 年抗战期间，日军在华北地区散播细菌在 70 次以上，被感染病者 60 万人以上，其中致死亡者 20 万人以上。这个数字只是大大压缩了的数字。另据《日寇侵华暴行录》一书记载，新华社在 50 年代揭露，边区患传染病的人数约 1 200 万人。八路军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曾两次通电呼吁全国、全世界人民抗议敌暴行，设法制止日寇施放细菌的罪行。据历史资料记载，从 1938 年开始，日军在华北各地投

放鼠疫、霍乱、伤寒菌等细菌，细菌战范围极广，波及北京、河北、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等华北所有省区，致使华北地区疫病蔓延，传染迅速，大面积流行，民众染疫者非常多，局面相当严重。日军在华北地区大量使用细菌武器，杀害我根据地军民，但由于资料不全，事件的始末记载不详，尚缺乏系统研究。

在侵华细菌战中，日军还针对牲畜和农作物实施细菌攻击，进行军事破坏活动，借传染牲畜、庄稼来造成经济损失。1942 年，第 100 部队远征队在苏联边界上的呼伦贝尔草原三河地区进行过用鼻疽细菌传染结尔布勒河及各蓄水池的实验，以及用炭疽热菌传染田地和草场的实验。目的是在最近似苏联国境的气候条件下来检验细菌武器的效能。1945 年夏季，平樱全作在北兴安省采办了 500 只羊、100 条牛，90 匹马。随后，将这些牲畜运到海拉尔西北约 40 公里的山区，由日本人饲养，并分别用炭疽、牛瘟、羊痘等细菌进行传染，并将染疫的牲畜放到附近牧场。第 100 部队逃跑前，他们放出几十匹疫马，叫附近村民捉了去，结果造成附近一带马鼻疽病流行，死了许多马。该部队支队也同样用鼻疽菌传染马匹，第 100 部队 2630 支队曾用鼻疽传染马匹，并放到附近各村庄里去，进行细菌传染。第 731 部队也对牲畜实施过细菌攻击，造成周边地区牲畜疫病流行。日军细菌部队还研制小麦黑穗病菌，导致农作物大面积枯萎死亡。

六、细菌部队的覆灭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红军向日宣战。日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提前发出了 731 部队准备撤退的指令。731 部队溃退前，开始炸毁设备设施，烧掉档案资料，虐杀用于做实验的“马路大”，焚尸化骨，挖坑掩埋，另一部分尸骨被抛入松花江中。8 月 13 日，731 部队约 2 500 名成员全部乘坐特别列车逃走，石井四郎则乘专机逃回日本，他严厉命令复员者“要把秘密带到坟墓里”。各支队收到本部关于撤退的命令后，纷纷烧毁资料、文件，炸毁设施，仓皇溃逃。他们有不少人被苏军俘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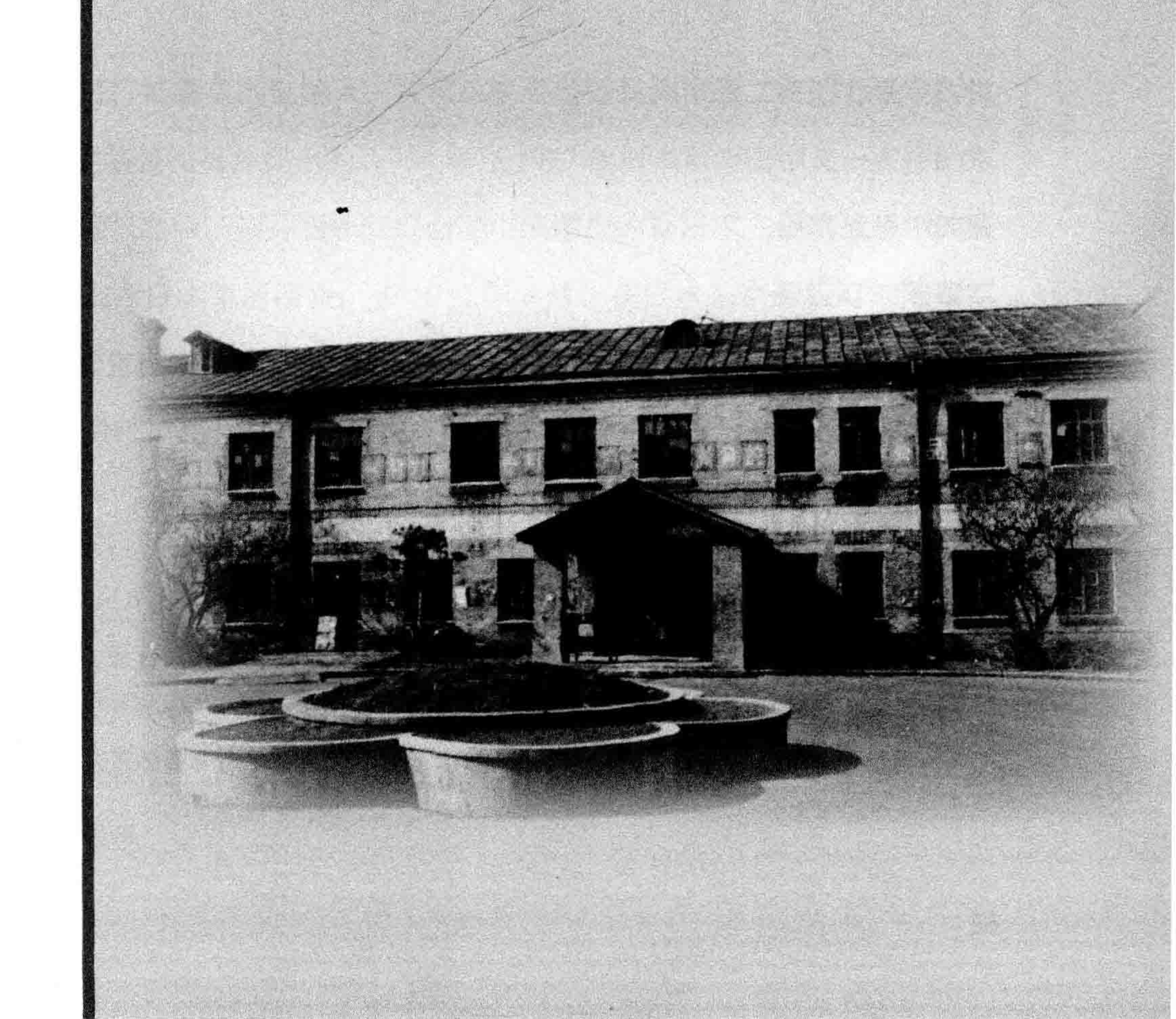
第 100 部队溃逃前把各种动物或杀死，或注射细菌后放跑。所属各支队也都这样做。有不少染疫马匹、带鼠疫的老鼠被放出来，向四处逃散，致使当地疫病流行。第 1855 部队的破坏工作持续了三天三夜，同时下令解散部队 ，把“北支那防疫供水部” 的名称从华北派遣军的名册上涂去，所属官兵都转属到各陆军医院去……该细菌部队的成员

全体回国了。其他细菌部队溃逃前纷纷运走所有的贵重设备，炸毁建筑物，烧毁全部器材和档案资料，绝大部分成员逃回日本，逃脱了战犯的审判。侵华细菌部队成员疏散以后，所有队员都隐瞒了身份，隐居起来。

1949 年 12 月 25 日至 30 日，山田乙三等 12 名细菌战犯在苏联伯力滨海军区军事法庭接受审判，被判处徒刑。石井四郎等一大批细菌战犯把准备进行细菌战的数据交给美国，美国免除对石井等战犯起诉。1950 年 7 月，根据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达成的协议，969 名日本战犯被移交给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 年，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了适当的处理，有 1017 名次要或者悔罪表现好的日本战犯受到宽大处理，被释放回国。同年 6 至 7 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对 45 名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被判处徒刑。后分别于 1959 年 12 月、1961 年 12 月、1964 年 3 月被特赦回国。此后，日本政府以“没有资料”为由，很长时间一直不肯正式承认事实，作家森村诚一 1981 年出版的《恶魔的饱食》首次披露了 731 部队的罪行，后来直到 2002 年 8 月 27 日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才首次承认了 731 部队的存在。

第一编

关东军第 731 部队



第一章　部队建制

第一节　沿　革

日本军研究细菌由来已久，日本战犯河本大作受审时供称：“日本军是从 1918 年 11 月前后开始研究细菌的。当时，长谷部照信少佐同宪兵队和特务机关进行联系，并获得情报。得知上述机关捕获了一名俄国密探，名叫亚历山大，在瑞典红十字会任职。在审讯中知道他正在搞细菌战研究并拥有大量细菌。于是，1918 年末，长谷部将细菌战作为主要问题向参谋部汇报。此后，由陆军省医务局开始研究。后来曾一度中断。”①

日本大本营的军部曾要求东京科学研究局“研究出一种或多种为人力无法抗拒的秘密杀人武器”。由于在限期内没有完成任务，局长伊藤工学博士在“工作不力”、“浪费国家财力”等罪名下被逮捕法办，参加研究的 40 多名科学家也全部被降薪并调转工作。②

石井四郎是日军进行细菌战的创始人，关东军医务处处长梶塚隆二在伯力受审时供称：“准备细菌战的主张是由石井提出的。”③早在 1927 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的东方会议出笼“大陆政策”之后，石井四郎就提出了用细菌战弥补日军在侵略战争中的资源不足问题。他的主张为日本军所接受，于 1932 年 8 月，在日本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创立了细菌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由石井四郎领导，开始研究细菌武器。1933 年，细菌研究室进行扩建，对外改称“防疫研究所”，成为日军准备进行细菌战的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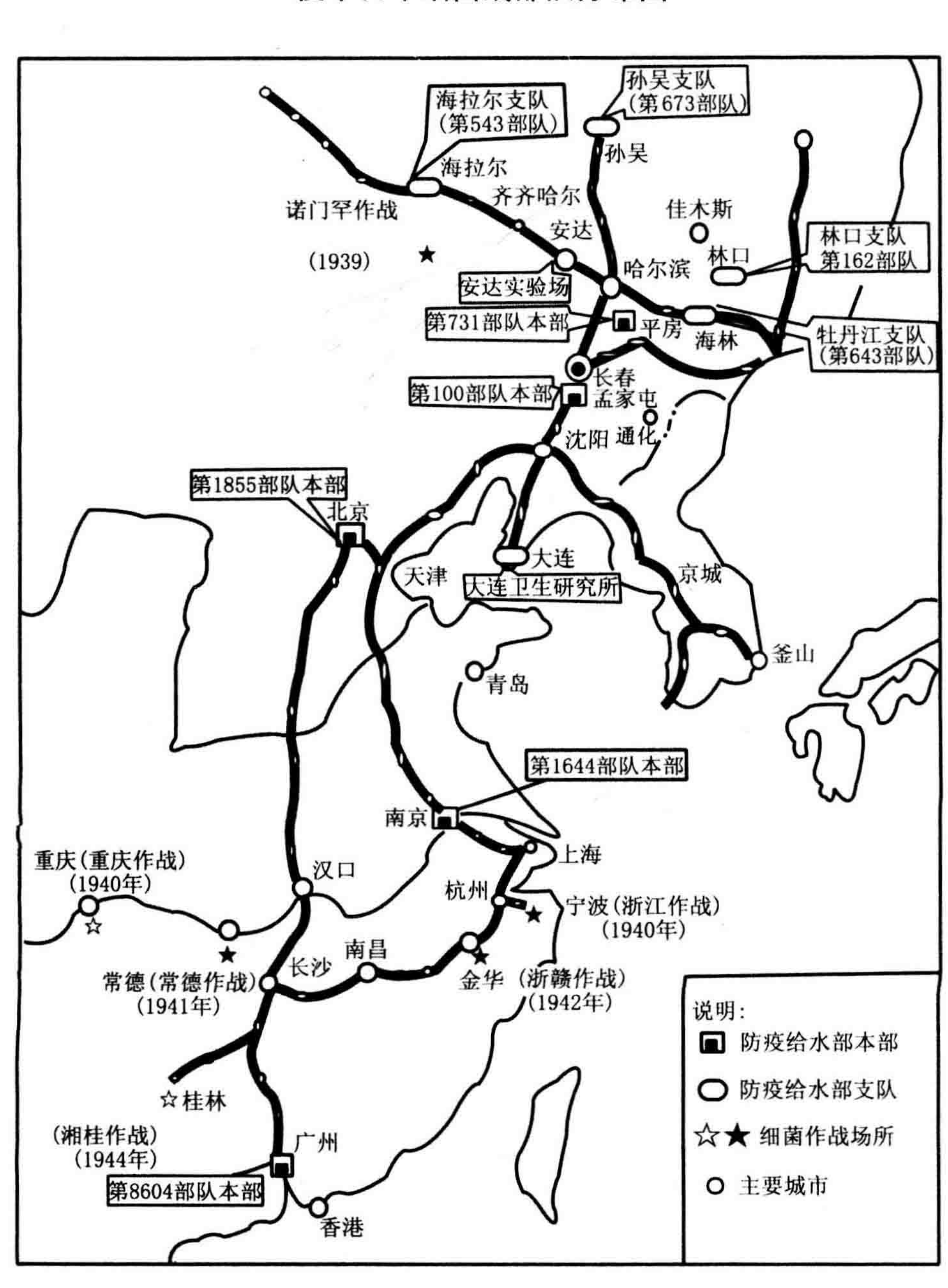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47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韩晓、辛培林：《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第 1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

③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109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1933 年，日军大本营批准了石井四郎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细菌研究基地的报告。同年 8 月，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秘密设立了石井部队，其附属细菌实验场设在 70 公里以外的黑龙江省五常县的背荫河，化名为“加茂部队”。“加茂”是石井四郎家乡地名，由于大部分队员都来自这一地区，所以这样称谓。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开始了细菌战的研究、生产和人体实验。

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分布图



1936年，日本裕仁天皇发布敕令，这份天皇的敕令梶塚隆二曾经见过，他在伯力受审时供称："第731部队是奉日本天皇裕仁1936年敕令建立的……我个人读过这份敕令以及关于该部队人员表的附件，读后我就盖了私人图章，以示签署。"[①] 根据天皇敕令，日军参谋本部扩编了石井部队；设立了长春市孟家屯的若松部队，即后来的满洲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兽类防疫部"。

1937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开始时，日军已进行了将近20年的细菌研究工作，细菌武器经过在实验室内及用人体实验的方法检查后，成为关东军手中异常厉害的武器。石井向参谋本部报告说："第731部队已经研究好了用感染鼠疫菌的跳蚤作为细菌武器的方法，说这方面所达到的成绩可以大规模地实际应用于战争目的。"[②]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旗

1938年6月，因"中马城"泄密，石井部队迁驻哈尔滨平房地区，改称"东乡部队"，"东乡"是石井的化名，用以纪念他心目中的英雄东乡平八郎。秘密番号为"满洲第659部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107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②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第41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队”，编制 2 000 名。同年接收了满铁卫生研究所，并将其改称“大连卫生研究所”。日军在不断扩充 731 部队的同时，还在中国东北、华北、华南、华中各地陆续建立了特种细菌部队。日本战败后，石井四郎向美军招供：“1938 年 7 月成立了 18 个师团的防疫给水部（即细菌部队）在战场上的各师团中进行活动。随着日本军队活动范围的扩大，又补设了机动性部队。[①] 主要细菌部队有关东军第 100 部队、北京甲字第 1855 部队、南京荣字第 1644 部队、广州波字第 8604 部队、新加坡冈字第 9420 部队。1855、1644、8604、9420 部队直属陆军参谋部登户研究室，技术性指导归石井四郎。

1939 年开始，日军在中国各地陆续开展细菌战，杀害中国军民。1940 年 12 月，日本天皇裕仁发布敕令，要求在中国东北的西、北和东部靠近苏联的战略要地建立细菌战基地。据此，石井部队在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分别建立了 4 个支队，编制扩充到 3 000 人。1941 年，关东军总司令下令全军所属部队及机关都采用番号时，石井部队才命名为“满洲第 731 部队”。

1945 年 5 月，又改称“满洲第 25202 部队”。同年 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日军命令 731 部队解散。部队炸毁主要设施，销毁档案文件，用毒瓦斯杀害了当时关押在 731 特设监狱中的 400 余人，731 部队队员和家属溃逃回国。

第二节　机　构

731 部队名义上编在关东军序列，实质上是日军参谋本部直接领导的特种部队。其人员配备比其他部队高出一等，配有 1 名中将、80 余名校级军官、300 余名判任官，编制约 3 000 个，但经常缺员 500 人左右。其隶属关系是：大本营（陆军大臣）——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长——各分部部长及卫生研究所所长。

①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第 42 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



731 部队长石井四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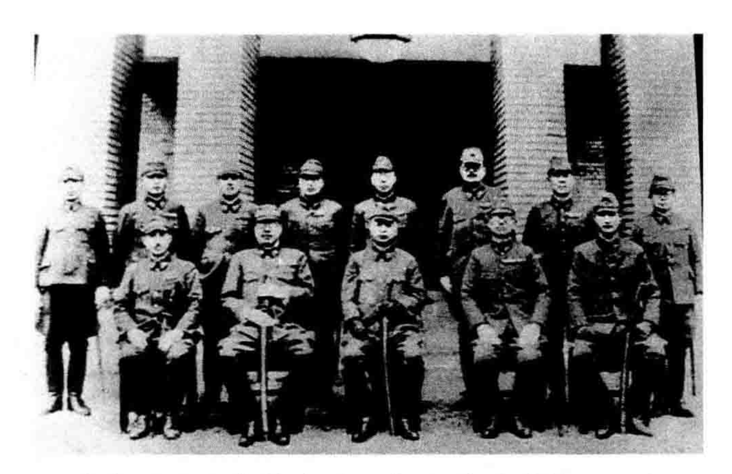
731 部队长北野政次



各支队长于 1943 年 2 月在 731 部队本部合景



石井四郎（前排左五）北野政次（前排右四）在日本医学家集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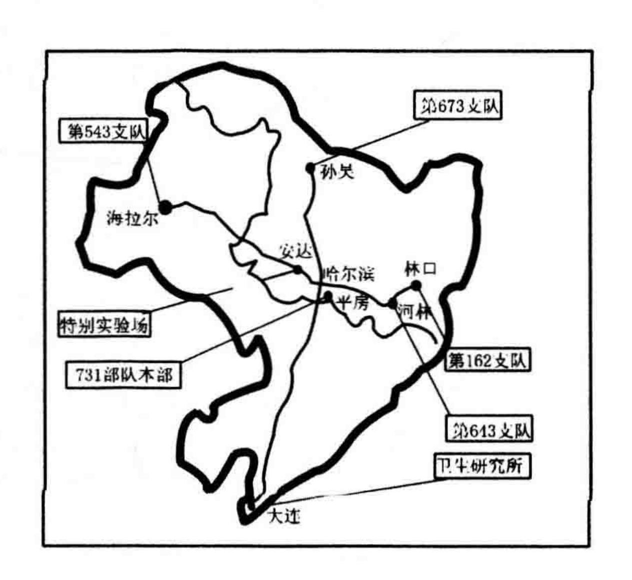


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大将（前排左三）
视察时与731部队高级官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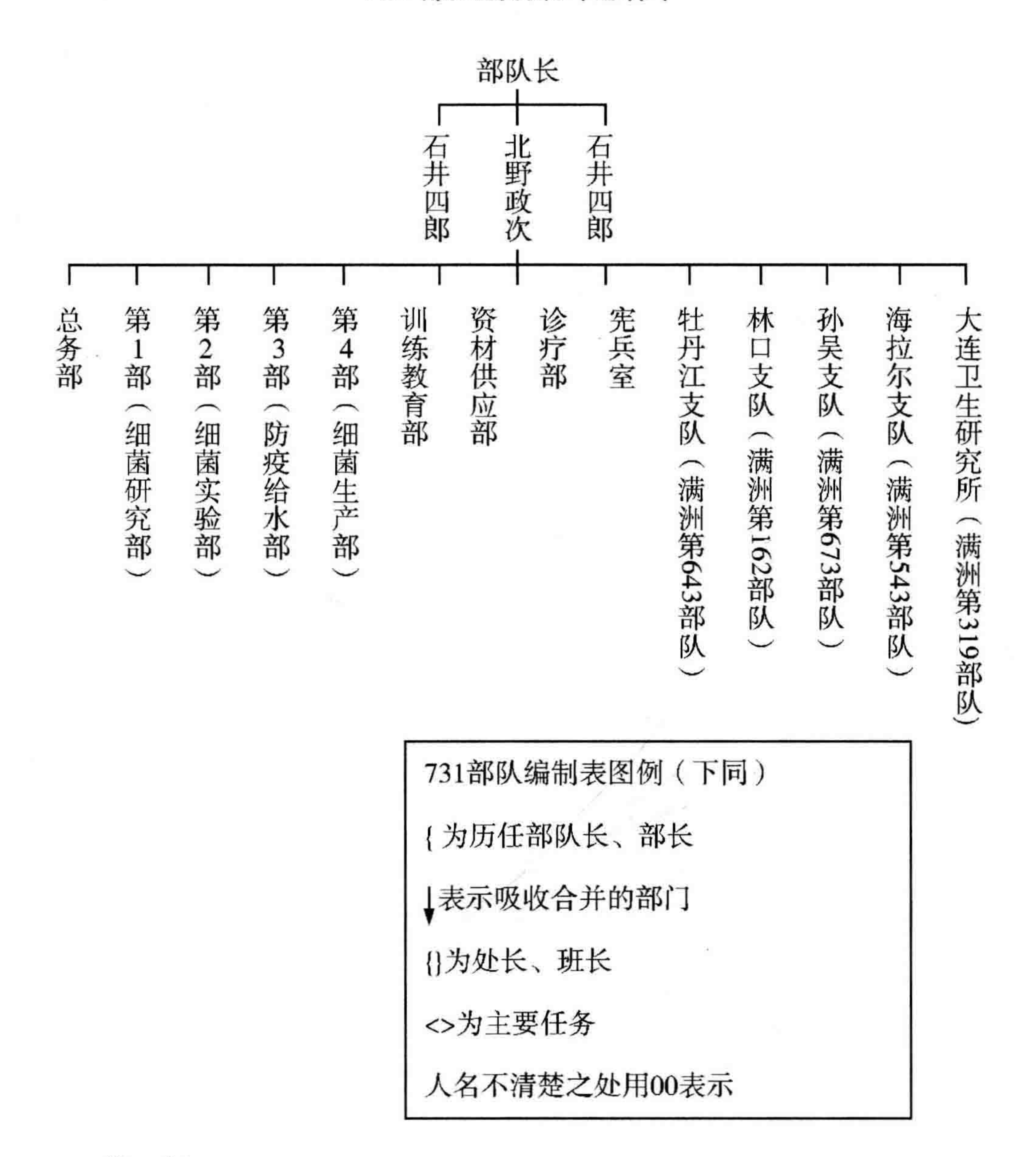
731部队部队长：1936年至1942年7月为石井四郎少将(1942年石井四郎因贪污军费被撤职)；1942年8月至1945年2月由北野政次少将接任；1945年3～8月，石井四郎重任部队长，并晋升为中将。

731部队下设总务部、第1部、第2部、第3部、第4部、训练教育部、资材部、诊疗部、宪兵室，辖牡丹江支队（满洲第643部队）、林口支队（满洲第162部队）、孙吴支队（满洲第673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大连卫生研究所（满洲第319部队）。

731部队所属支队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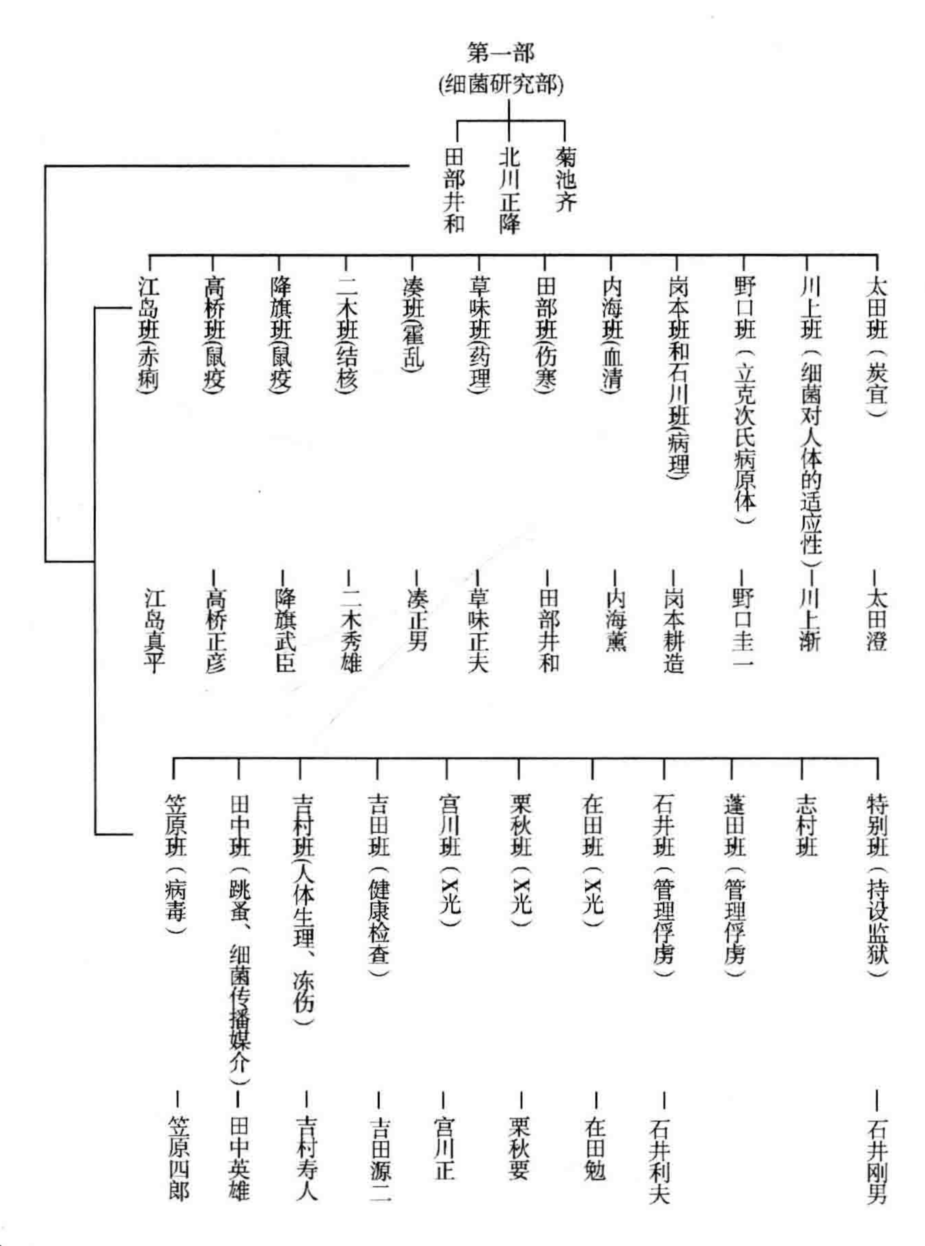
731 部队编制表（总体）



一、第一部

设在平房镇，为细菌研究部，也称基础研究部。部长菊池齐军医少将，其前任依次是田部井和、北川正隆。该部的主要任务是制作细菌兵器的基础研究，即专为细菌战研究培养鼠疫菌、霍乱菌、坏疽菌、炭疽热菌、伤寒菌、副伤寒菌和其他细菌。管辖秘密监狱，关押受细菌实验的人，下设研究班，由佐级军医或技师任负责人。

731 部队第一部编制表



附注：

笠原班　　负责人是陆军技师笠原，研究病毒。

田中班　　负责人是陆军技师田中，研究及培养跳蚤，从事细菌传媒介物研究。

吉村班　　负责人是军医技师吉村寿人，从事人体生理、冻伤研究 。

江岛班　　负责人是陆军技师江岛，研究赤痢菌。

降旗和高桥班　　负责人先后是军医降旗武臣和军医少佐高桥正彦，研究鼠疫。

二木班　　负责人是陆军技师二木，研究结核菌。

凑班　　负责人是陆军技师凑正男，研究霍乱。

草味班　　负责人是药剂中佐草味，研究药理。

田部班　　负责人是陆军技师田部，研究伤寒。

内海班　　负责人是陆军技师内海，研究血清。

岗本班和石川班　　负责人是陆军技师岗本，研究病理。

野口班　　负责人是陆军技师野口，研究立克次氏病原体。

川上班　　负责人是陆军技师川上，从事细菌对人传染适应性研究。该班仅存在 4 个月，因川上病死而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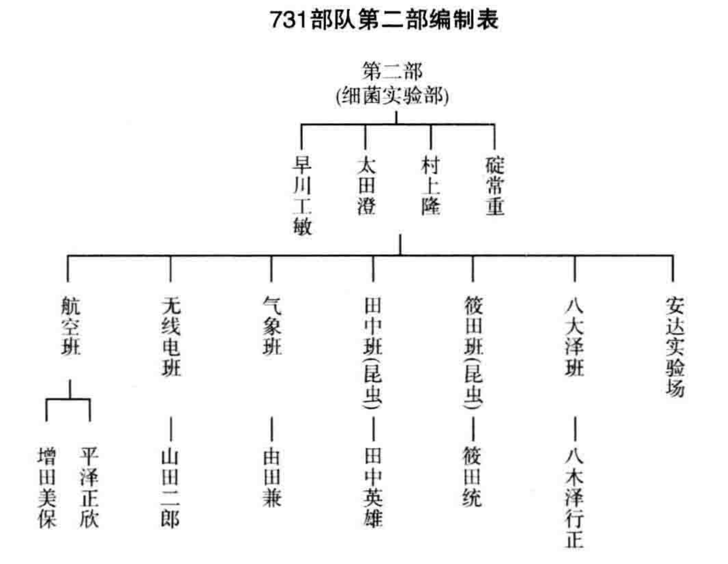
太田班　　负责人是医学博士太田澄，从事炭疽菌研究。

此外，第一部还管辖特设监狱，班长是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石井班和蓬田班管理俘虏；吉田班，负责健康检查；X 光班，先后由宫川正、栗秋要、在田勉任班长。

二、第二部

设在平房镇，为细菌实验部，也称实施研究部。部长是碇常重，其前任依次是早川工敏、太田澄、村上隆。研究实验细菌武器的效力，即攻击方法，制造细菌弹，繁殖毒化昆虫。该部中心任务是利用动植物和活人进行细菌实验，负责在打靶场条件下和战斗环境内实验细菌武器。

731部队第二部编制表



附注：

八木泽班　负责人是陆军技师八木泽行正，研究农作物病菌、害虫和传染实验。

田中、筱田班　负责人是陆军技师田中英雄和筱田统，研究昆虫，其方法是毒化昆虫，即把鼠疫菌注射在老鼠身上，让跳蚤吸老鼠的血，培养毒化跳蚤。

石井班　负责人是石井四郎的三哥畜牧技师石井三男，负责实验动物饲养。

该部附属班有航空班、无线电班和气象班，还设有城子沟和安达野外细菌实验场。

三、第三部

设在哈尔滨市南岗，为防疫给水部。部长由增田知贞担任，其前任依次是今江一夫、江口丰洁。第三部管辖滤水器制造厂和细菌瓷弹壳制造厂。其任务是领导实施关东军管区内部队的防疫和供水，制造滤水器和“石井式”土陶细菌弹壳。它在平房镇设有细菌武器研究、生产场所，领导731部队的运输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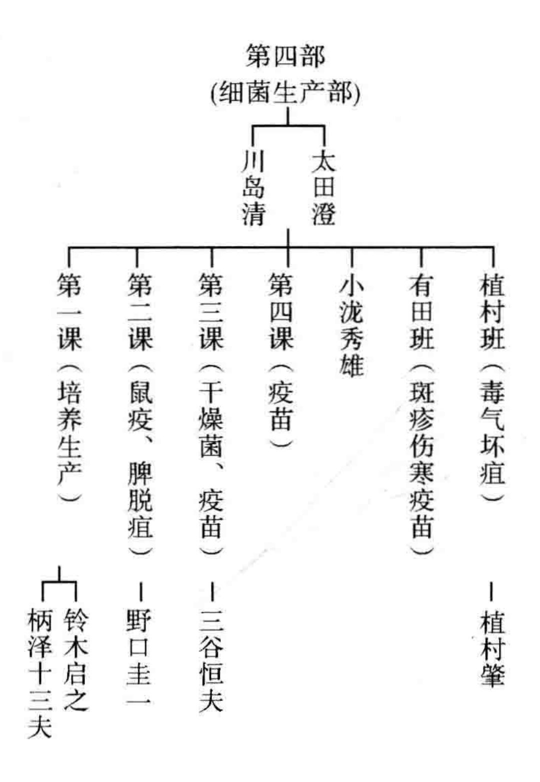
731部队（第三部）编制表

- 第三部（防疫给水部）
  - 今江一夫
  - 江口丰洁
  - 增田知贞
    - 庶务课
      - ××
      - 田中秋市
    - 第一课（检索）
      - 佐藤××
    - 第二课
      - 河岛三德
    - 第三课
      - 滤水班
      - 给水班
      - 烧成班
        - 铃木重夫
      - 工作班（滤水机）
        - 小原定夫
    - 滤水机、弹壳制造厂

四、第四部

设在平房镇，为细菌生产部。由太田澄任部长，其前任是川岛清少将。该部下设第一课，由柄泽十三夫负责，任务是培养生产细菌；第二课，由野口圭一负责，生产鼠疫菌和脾脱疽菌；第三课，由三谷恒夫负责，生产干燥菌、疫苗；第四课，由小泷秀雄负责，生产疫苗；有田班生产斑疹伤寒疫苗；植村班生产瓦斯坏疽菌。各课、班分工独立制造各种细菌，其工序为从细菌繁殖到细菌武器装配。

731部队第四部编制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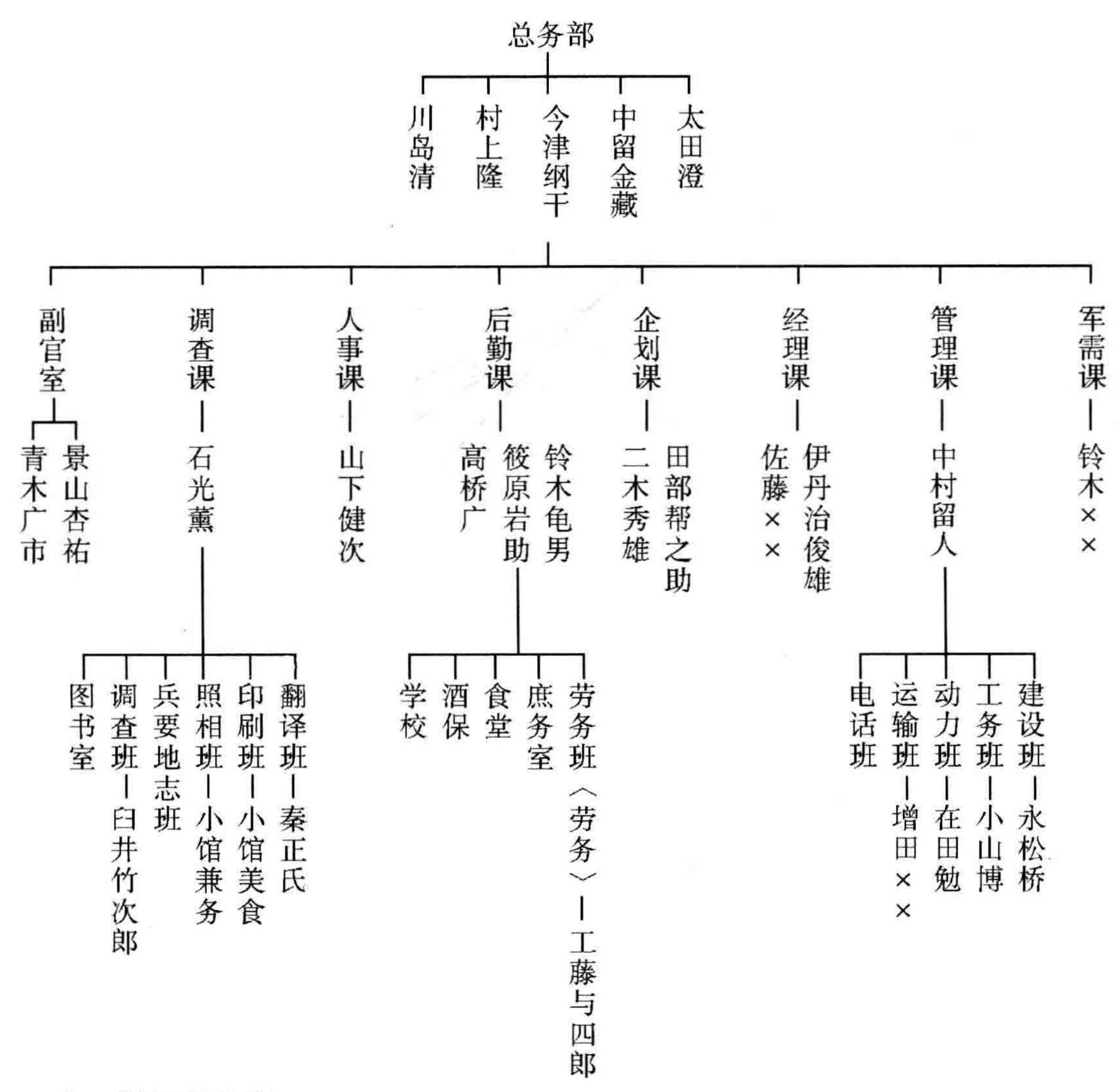


五、总务部

设在平房镇。由太田澄大佐兼任部长，其前任依次是川岛清、村上隆、今津纲干、中留金藏。该部是731部队的中枢部门，主要任务是拟定细菌战计划，负责人体实验的资料搜集与管理，起草及传达命令，掌管财务、警备等。下设副官室、调查课、人事课、后勤课、企划课、经理课、管理课、军需课。副官室负责人先后是景山杏佑、青木广市。调查课负责人石光薰，设翻译班、印刷班、照相班、兵要地志班、调查班、图书室。人事课，负责人是山下健次。后勤课，负责人先后是高桥广、筱原岩助、铃木龟男，设劳

务班、庶务室、食堂、酒保、学校。企划课负责人先后是田部帮之助、二木秀雄。经理课，负责人先后是伊丹治俊雄、佐藤 ××。管理课，负责人是中村留人，设建设班、工务班、动力班、运输班、电话班。军需课，负责人是铃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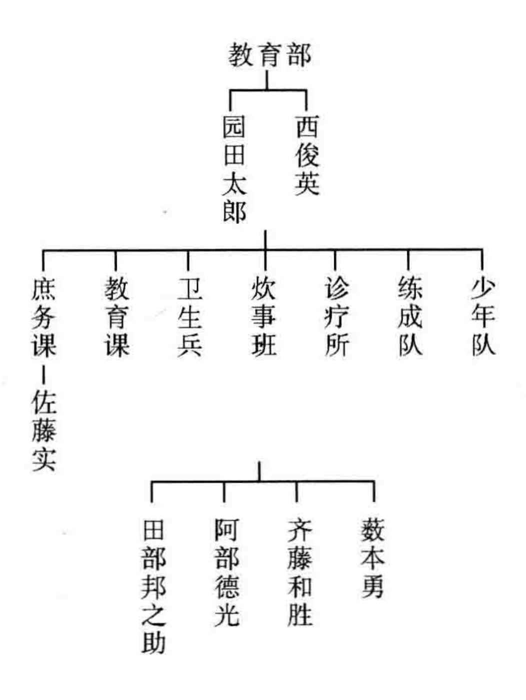
731部队(总务部)编制表



六、训练教育部

部长由西俊英担任，其前任是园田太郎。设庶务课、教育课、卫生兵、炊事班、诊疗所、练成队、少年队，其任务是对关东军的卫生部军官、下士官以及对本部、各支部的士兵进行细菌战、防疫、给水教育，培养善于使用细菌武器的专业人才。

731部队训练教育部编制表



七、资材部

由柴野金吾任部长，其前任是大谷章一少将。负责贮存、供应各种器材、承担实验动物的运输和菌苗、疫苗的保管。下设庶务课；第一课，负责药品合成，辖山口班和堀口班；第二课，负责采购补给；第三课，负责滤水机；第四课，负责仓库管理；第五课，负责武器保管；第六课，负责动物饲养。

731部队(资材部)编制表

- 资材部
  - 大谷章一
  - 柴野金吾
    - 庶务课 获原博治
    - 第1课（药品合成）
      - 山口班（细菌弹） 山口一孝
      - 堀口班（玻璃制品） 堀口铁夫
    - 第2课（采购补给）—滨武正喜
    - 第3课（滤水机）—铃木××
    - 第4课（仓库）—获原兼
    - 第5课（武器保管）—目黑××
    - 第6课（动物饲养）—石井三男

八、直属队

（一）诊疗部

设在哈尔滨南栋，部长为永山太郎。设传染病栋、诊疗室、家属诊疗所，主要为日本人防病、治病。

（二）宪兵

（三）林口支队（162支队）

1940年建，支队长榊原秀夫，有研究人员226人，驻林口镇和古城镇之间。

（四）牡丹江支队（643支队）

1940 年建，支队长尾上正男，有研究人员 200 人，驻海林镇东北的后腰屯。

（五）孙吴支队（673 支队）

1940 年建，支队长西俊英，有研究人员 136 名，驻孙吴镇的西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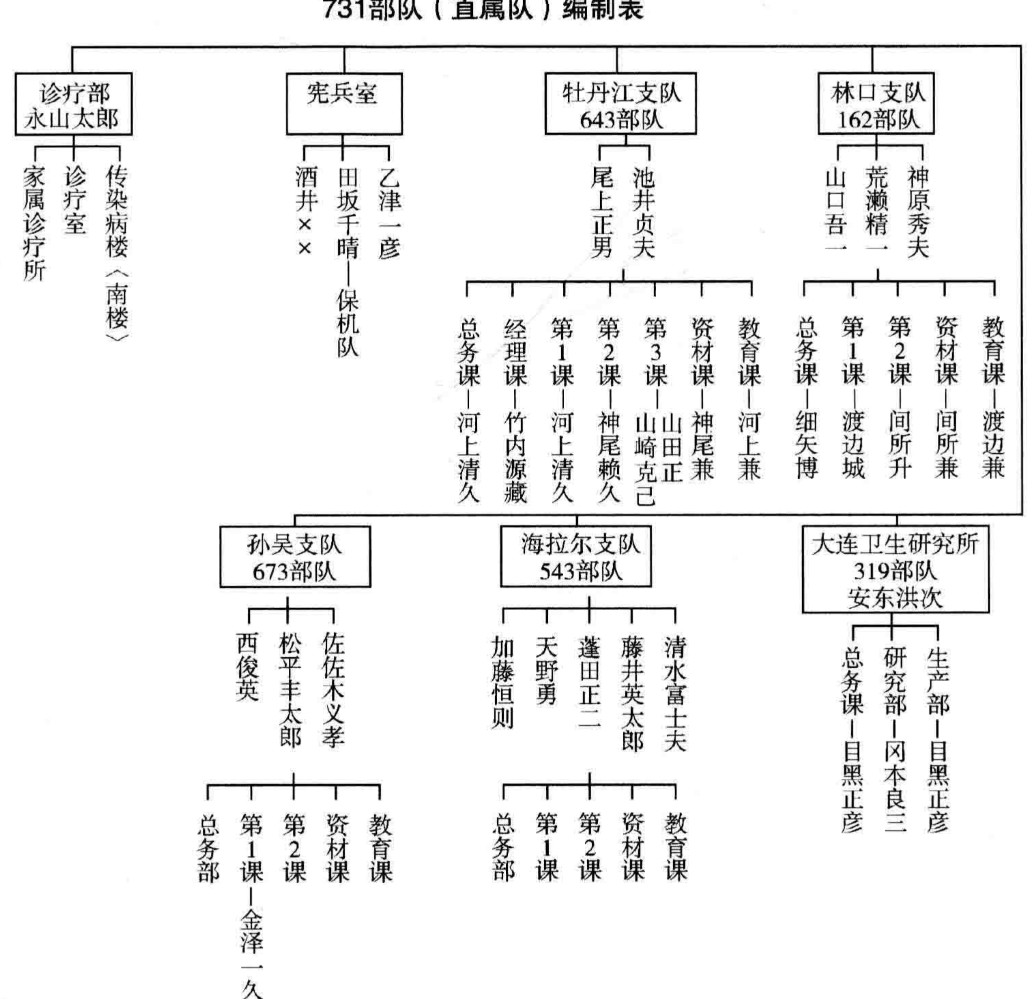
（六）海拉尔支队（543 支队）

1940 年建，支队长加藤恒则，有研究人员 226 人，驻内蒙古海拉尔伊敏河东岸的东南山下。

（七）大连卫生研究所（319 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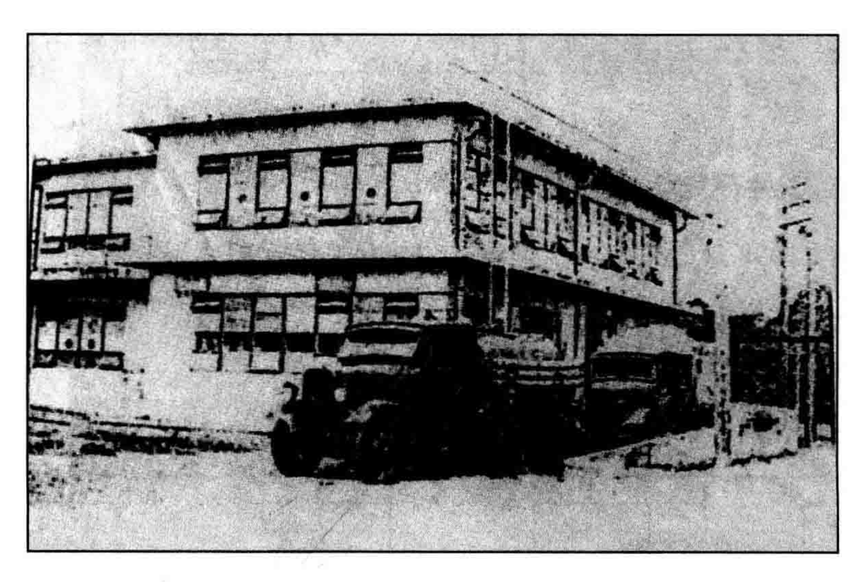
1925 年建，1938 年为 731 部队接收，其前身是满铁卫生研究所，安东洪次任所长，有研究人员 92 人，驻大连市下葭街 20 号。

731部队（直属队）编制表



第二章　细菌研究实验基地

第一节　日本东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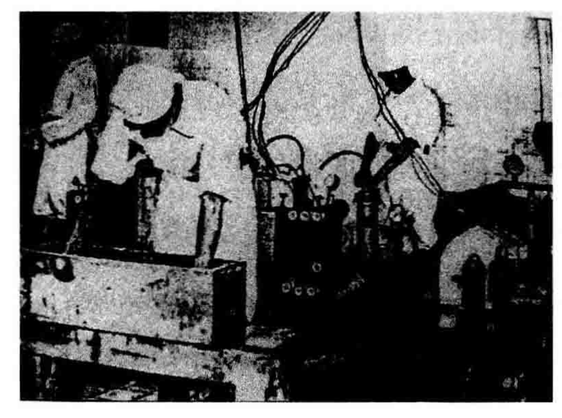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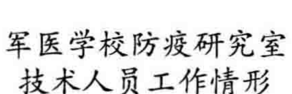
日本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内的防疫研究室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石井四郎“研究细菌武器”的主张得到了日本当局的赏识，受到日本陆军省军务局课长永田铁山、日军参谋本部战略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大佐和梶塚隆二的支持，石井四郎因此晋升为军医少佐。从此，石井四郎开始研究细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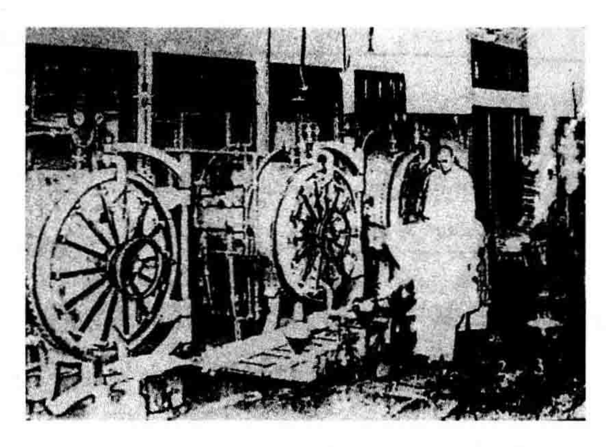
1932 年 8 月，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内建立细菌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细菌研究室规模较小，设在防疫部的一个地下室里，石井四郎仅有 5 名助手。他们在防疫名义的掩护下，进行细菌研究和培养。

1933 年，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批准，拨出 20 万日元军费，扩建了细菌研究室。增设了研究室、办公室、机械室、变电室和仓库，还修建了小型木结构的动物饲养室，对外改称防疫研究所。大批研究人员从事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鼻疽菌、瓦斯坏疽菌的培养、使用和预防方法的研究，研制装置带有细菌的地雷、榴弹、枪弹和在水面上使用的玻璃弹。在陆军军医学校，石井四郎重点研究了细菌战中的两个问题，一是防护用的滤水净化器；二是石井式细菌培养箱及细菌战剂。





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
技术人员工作情形



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的技术人员
正在制造细菌培养基

1950 年 2 月 8 日，《赤旗报》发表文章《东京是细菌战的中心》，揭露了石井四郎将 200 份细菌实验致死的人员登记表作为绝密材料锁在地下室里的历史事实。1990 年，在原东京细菌研究室旧址施工时，挖出了 28 具尸骨。据专为此事件成立的“人骨问题研究明会”考证，这些人骨为中国东北人。经分析得知，这些尸骨是当时在细菌实验过程中被无辜杀害者的遗骸。①

第二节　中国东北背荫河的“中马城”

一、选址背荫河



背荫河村遗址

① 王一汀：《白衣恶魔》，第 10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为了扩大细菌实验范围，大规模生产细菌，石井四郎请陆军省军医总监西汉行藏中将转交给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一份报告，要求把细菌研究中心转移到中国东北。日本大本营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由石井四郎负责，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实验基地。

据日本 731 部队第 4 部部长川岛清军医少将在伯力受审时供称，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实验基地："第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在邻近苏联边境的地方建立细菌战根据地，以供将来实行进犯苏联之用，因为苏联远东地区是包括日本军阀侵略计划以内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在满洲境内有可能获得大量非日本籍的活人来做进行细菌实验的材料，并且满洲地域也很辽阔。"①

1933 年 8 月，在哈尔滨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中间地带，设立了细菌研究所，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其附属细菌实验场设在背荫河。石井四郎化名"东乡"，挂名"满洲医大"教授的虚衔，住在长春遥控指挥这支细菌部队。

"背荫河"，距哈尔滨市南约 70 公里。传说乾隆皇帝北巡，路经此地，因天气炎热，曾驻马今镇南边的一条小河乘凉，小河因此得名背荫河，河旁小村称"背荫河村"。

1932 年秋，石井部队派黑田大尉带领一队日军选场址，看中了背荫河。



加茂部队背荫河细菌实验场遗址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122 ~ 123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二、“中马城”的建立

“中马城”是石井部队（加茂部队）在背荫河细菌实验场的别称，与石井部队本部同时建立。因有个叫中马的大尉管辖这个“兵营”，因此人们称它为“中马城”。

背荫河，是拉（拉法）滨（哈尔滨）铁路线的一个小站，大约有200户居民，是一个农副产品小集散地。村东头有杂货店、果子铺、饭店。1932年秋，石井部队通过伪满拉林当局强令20多户居民及日盛祥杂货店、王家果子铺等商号在3天内全部搬迁，违者格杀勿论，强占并烧毁民房百余间。1933年春，日本人通过村公所，由伪村长逢凤充当“把头”，强征劳工建房筑城墙。据久居背荫河村的老人毕超回忆说：“当时正处于春耕大忙季节，许多劳力被迫撂下地不种去服劳役，结果那年几乎颗粒没收。”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远藤三郎也记载了这件事：“通过日伪当局，在附近村屯强征近千名劳工和几百辆马车，昼夜不停地修筑‘兵营’。”不到一年时间，这个“兵营”建成，有营舍、铁路专用线和飞机场。1933年12月8日，远藤三郎视察这里后说“初具规模达600平方米的大兵营，令人产生一种要塞的印象。这虽然是他们努力的结果，二十几万元的经费开支看来还是值得的”①。

“中马城”设三重围墙，最高的有三米多，墙顶上架设着两道铁丝网，中间有一道高压电网，围墙四角各修筑一座坚固的炮楼，安设两盏活动式探照灯。墙外有两米深的护城壕，正门朝北，一座吊桥横跨护城壕。吊桥里侧是两扇黑漆城门，由两名日本兵把守。西正门设双岗，门口立着一块白色大木牌，上面写着:“未经关东军司令批准，不得入内。”

“中马城”与世隔绝，极端保密。“兵营”截断了北面的沙石道路，来往行人必须绕道而行。中国人一律不准靠近，一旦有靠近的，就以政治犯给抓起来。村里实行“十座联保”，一人惹事，祸及9户。夜间一律实行戒严，当时背荫河附近，时常有人失踪。陈家岗有个叫王老二的青年好奇，一天夜里去偷看“中马城”。第二天，人们就在附近发现了他被子弹打穿的尸体。中国劳工进去从事特殊劳动，来回头上戴着“柳罐斗子”，由日本人牵引，什么也看不见。火车经过背荫河站，也必须拉上窗帘，严禁旅客向外看。

① 〔日〕远藤三郎：《将军的遗言——远藤三郎日记》。

日本军人严禁外出，禁止使用真名。化名与家属通信，须经关东军司令部审查。其他部队的日本人不经批准，也进不去“中马城”。背荫河村的老人毕超讲过一件事，一天傍晚，有个日本校官带着十来个日本兵，想进“中马城”休息、吃饭，被哨兵挡了驾。校官火了，要打哨兵。这时，从里面来了个翻译，和校官说了几句话，那校官立即带兵走开了。

“中马城”的秘密，当地百姓无人知晓。有人猜测它是一座“兵营”。毕超回忆说，1932 年秋天，我们去刚建成的背荫河站看热闹，看见从拉林开来一辆满载日本兵的大汽车，找村长逄凤到村东头查看地盘，说是要建“兵营”。也有人说它是一座监狱，背荫河村北有个拉林镇，镇上日军建有一座监狱，名为“小岛监狱”。“中马城”竣工后，小岛监狱连同 600 名犯人迁移至此。有人发现了这一情况，猜测它是一座新建的监狱。因此，当时又称它“东满大狱”。即使在它成为废墟后，当地仍然有人认为它是一座监狱。据当地老人毕超回忆说，从“中马城”的遗迹看，院内有 3 座砖瓦房，偏西有两幢，构成拐把子型。房屋宽 8 米，长 45 米，两侧共有 100 多个房间，猜测可能是东满大狱。房东 10 米外的一座小砖房，猜测是弹药库。

三、“中马城”揭密

“中马城”渐渐地引起附近村民的怀疑。夜深时，人们经常听到从“中马城”里传出来微弱的惨叫声。夜幕下，村民间或看见从哈尔滨方向开来的蒙着苫布的大汽车。“中马城”里那座大烟囱时常冒着浓烟，散发出一股焦臭味，不时飘出一片片带布纹的飞灰。在“中马城”成为废墟后，村民还在一个大烟囱的地基旁边挖出过骨灰和未烧透的碎衣片。村民们确信“中马城”的大烟囱是炼人炉了，但不知道这里是细菌基地。

“中马城”的“囚车”是在夜里秘密进城的。毕超经历过这样一件事：1934 年夏季的一天深夜，大雨一直下个不停。外面公路上传来连续不断的汽车声，像是误车了。不一会，有人来敲毕超家的门，日本人带着翻译找他帮忙往外拽汽车。毕超来到公路上，见日本人已经找来十来个人和两匹马，一辆带铁篷汽车陷在路旁的沟里。日本人亲自动手把七米多长的绳套拴在汽车尾部，套上马，让人帮着拽。由于绳子长，人、马使不上劲，眼见天快亮了，车还是拽不上来。毕超他们建议缩短绳套，日本人就是不同意。实在没办法，日本人才勉强同意了。车拽上来之后，立即开往“中马城”。拽车时，毕超他们

听见了车篷里有人的“哼哼”声。

“中马城”的秘密是在“监狱暴动”后被揭开的。东北抗联领导人之一冯仲云根据暴动人王子扬的叙述，在《东北抗联十四年苦斗史》中作了如下记载：“中马城”监狱里关押的人是日伪当局从中国东北各“矫正院”、“收容所”秘密运来的。监狱里伙食很好，主食是大米、白面，逢年过节，还给肉吃、给酒喝。只是都戴着手铐、脚镣，没有人身自由。奇怪的是，被提审的人多数回不来。监号里人减少后，又押来新的“犯人”。对此，日本看守蒙骗说，被提审的人都送到外面看病去了，为了打掩护，日本人还时不时地把“病”得奄奄一息的人提回来，押在牢房单间里。

时间不长，监狱里的人才知道了日本人的险恶用心：被提审的人都被秘密地押进地下室，分别绑在墙壁的铁钩子上，任穿着白大褂的日本人用粗大的针管在他们的动脉上抽血。日本人天天采血。那些失血过多、身体极度衰弱的人，有的被砍死，有的被注入毒药毒死。尸体全部拖进炼人炉火化，骨灰就地埋掉。火葬炉在监狱西侧。“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负责这里的工作，当时化名细谷。被实验致死的爱国者，由日本人将其尸体秘密运到这里进行火化，骨灰就地埋掉，不留下一点痕迹。”[①]

至此，人们才明白“中马城”是731部队建立的细菌实验基地。从1933年“中马城”建成后，石井四郎部队便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人体实验。东满大狱监押着一千多人，每天实验数量达数十人。边实验边补充“活体实验材料”，屠杀中国人民。

1985年，《每日朝闻》披露了远藤三郎的日记。他在侵华战争中一次视察背荫河时亲自目睹了人体实验的情况。他在日记中写到：“（1933年）11月16日，星期四，晴朗。午前8点半，同安达大佐、立花中佐一起到交通中队（日军对中马城的代称）内的实验场视察试验情况”，“按第二班担当毒气、毒液试验和第一班负责电气试验的分工，分别各用两名‘共匪’进行试验。使用炭酰氯在毒气室经过5分钟的试验，引起严重肺炎者，迄至昨日依然生存，而被注射15毫克氰酸化合物者，约20分钟后即失去知觉；对用两万伏高压电流进行多次试验者仍未使其致死，最后注射毒液始将其杀死。第二个

① 冯仲云：《东北抗联十四年苦斗史》。

人，通过以五千伏高压电流反复试验，并未使其致死，最后连续通电流数分钟，始将其烧死。”远藤三郎高度评价了石井四郎的暴行。此后，关东军司令部大力支持石井四郎，通过各地宪兵队向“中马城”大批输送“活体实验材料”。

四、“中马城”秘密的暴露与迁移

（一）监狱暴动

有时，监狱里“活体实验材料”供不上，日本宪兵队就采用“圈街”的办法，到大街上去抓人。抗联老战士王子扬就是在“圈街”时被抓进监狱的。他回忆说，1933 年中秋节前半个月，他和老李在哈尔滨的一条街上走动，突然发现日本宪兵、伪警察正在抓捕体力强壮的年轻人。他们 40 多个人不幸被抓上“囚车”，从香坊车站被押上火车，连夜送往背荫河。在东满大狱里，王子扬的监号关押着 40 多人，整个监狱关押着千余人。监狱里不断有人被提审而回不来。王子扬发现情况异常，从难友口中得知日本人采血的秘密。为了生存，他和难友决定找机会越狱。9 月 30 日，这一天是中秋节，晚上，乌云密布，下着小雨。“中马城”的日本人大都饮酒作乐去了。深夜，日本看守爪生荣二才醉醺醺地来牢房送饭，因为过节，还特意给了一瓶白酒。王子扬伺机站起接过菜桶，主动和看守搭话，并示意对面的老李。老李接过酒瓶，冷不丁向看守头上砸去，看守重重地倒在地上。王子扬趁机从看守腰上解下牢房钥匙，打开牢门，指挥难友越狱，向监狱东面逃去。监狱里有几个体力衰弱的人无法逃走。高墙耸立，电网拦路，难友们几乎无路可行。正在十分危机之际，天赐良机，“中马城”突然停了电。抓住机会，王子扬迅速把难友带到墙下，搭起人梯，扒开电网，逾墙而过。老李帮着众人翻墙，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墙上的人拉他上去，可是他终因体力消耗过大，怎么也爬不上去。这时，日本哨兵发现了情况，开始用机枪扫射，老李毅然转身向牢房走去，壮烈牺牲。20 多名难友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剩下的 10 多个人，趁着黑夜向四下逃走。

当天夜晚，背荫河附近的村民都听见了从“中马城”里传出的刺耳的警报声和激烈的枪声。第二天，人们听说“中马城”有 30 多人越狱，跑出来 18 人。

越狱的 18 人中有 3 人跑到八家子屯，他们不幸被伪自卫团抓了去。伪自卫团总吴连元枪杀了抗联战士杨志俭，并残忍地割下他的头挂在树上示众，剩下的 2 人被送回“中

马城”。有 3 人体力不支，饥饿寒冷，死在雨夜中。有 5 人跑到新发屯，5 人跑到程家岗屯，2 人跑到阎家洼子屯。他们 12 人被当地村民所救，在抗联交通员的引导下，随王子扬投奔了抗联。后来，王子扬担任了抗联三军三师师长职务，在木兰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关于“中马城”的越狱事件，笔者和韩晓老师曾作过采访，当地居民讲述了当时营救 12 个人的经过。



帮助越狱者逃脱的背荫河村民吴泽民



731 部队见证人付连举

程家岗屯吴会民说：“那天夜晚，我和哥哥吴化民护地回家暖和一会儿。忽然，有人敲门用山东口音说‘老乡，请帮帮忙，我们是从中马城跑出来的’。我和哥哥打开了门，看见 5 个戴脚镣子的人。我俩把他们带到村东头的黄泥坑里，用斧子砸坏他们的脚镣，当我俩砸第 4 副时，发现村西头手电筒乱晃，知道日本人进村了。我们赶紧剁开最后一副脚镣链，让他们往蛤蟆塘那边跑去了。”

新发屯 81 岁的李宪章说，当年住在阎家洼子的大舅哥段子君帮助 2 个越狱人砸开脚镣子，指引他俩跑到东山里去了。段子君知道情况，可惜他已不在人世。

新发屯 74 岁的老人付连举已半身不遂，吐字不清。在他儿子的“翻译”下，老人讲述了当年的情况，他说：“那年秋季的一天夜里，下着毛毛雨，有人敲门。我哥哥付连科开门一看有 5 人，都是三四十岁，光头，上身穿对襟的灰色小褂，下身穿着青色裤子，戴着脚镣，病恹恹的。他们说是从中马城跑出来的，要我们帮着把脚镣子砸开。哥哥让我找来三把小斧子，我们走到门外僻静处，我扶着垫在脚镣子下边的斧头，哥哥一手扶正斧刃，一手用斧头砸。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将 5 副脚镣子砸开，接着把脚镣子都扔进我家旁边的一口井里。日本宪兵追来时，那 5 人在我家喝完大楂子粥，已经奔往东山里

去了。”

对“中马城”的越狱事件，曾在“中马城”做过工的荻原英夫（石井四郎的亲属）供认：“爪声荣二，我的舅父，从1933年起在五常研究所做石井部队特别班（活人实验所）的看守。被收容者逃跑时，他的头部被打伤，留下伤疤，变成秃头。”[①]爪生荣二回日本后不久，再次被雇用，直至战败。

（二）抗联第三军的活动

据张林（原抗联三军侦察员）回忆，1933年农历5月，抗联第三军掌握了日军建“中马城”的确切情报。为了打击日本人建据点，军首长决定，组织抗联小分队在五月节（公历6月27日）那天攻打日本据点。由于抗联小分队地形不熟，带路人带错了路，惊动了日军守备队，没有打成，小分队转向五常堡。

“中马城”建成后，抗联三军得知监狱里关押着普通百姓、抗联战士和中共地下党的同志。日本人天天杀人，至于用什么手段杀人却不清楚。抗联三军首长决定：派人侦察“中马城”，设法营救难友，毁掉“中马城”，侦察任务交给了张林。

1934年4月，张林准备打入“中马城”侦察。可是“中马城”戒备森严，无法靠近。张林了解到一个叫刘国会的人，他在“中马城”当伙夫，后来当采买，是日本人的密探，认日本人中马做干爹。张林想利用刘国会，通过熟人关系，以找活干的名义，张林来到刘国会家，佯装认他母亲为干妈。刘国会经常不在家，几天时间，张林和刘国会的妹妹混熟了，闲谈中，得知“中马城”里的确关押着抗联战士。一天，趁着刘国会的妹妹进“中马城”找哥哥的机会，张林跟了进去。日本守备队员严加盘查，刘国会的妹妹一口咬定张林是她的表兄，是找工作而来，这才混了进去，守备队员向中马大尉作了汇报。见到张林，刘国会先是一愣，后听他妹妹说是亲属，才向中马打保票说张林绝不是密探。中马相信了刘国会，没再追查。

回到抗联后，张林向赵尚志军长作了汇报。赵尚志军长决定派出分队，与迟呼章、张连科、兰志远等3个大队联合，并有抗日地方武装力量配合，再次袭击“中马城”。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37页，中华书局，1989年。

那天深夜，抗联主力军行至程家岗屯时，被日本守备队员发现，攻城计划又没有实现。

“中马城”越狱后，抗联三军主动配合，派交通员接应王子扬等 12 人加入了抗联。

（三）“中马城”弹药库爆炸

1934 年夏季的一天，“中马城”武器弹药库突然爆炸。原因不明，一说是日本人操作不慎引起爆炸；一说是抗联炸毁了日本的弹药库。事故发生后，中马大尉追查过责任，致使日本警备队两个班发生流血冲突。

（四）“中马城”迁移

接二连三地发生事故，沉重地打击了石井四郎。石井四郎部队加强了警戒，一方面在“中马城”外围实行“并屯政策”，严密控制中国人；一方面继续进行细菌实验活动。1933 年 11 月 16 日，远藤三郎一行还视察了细菌工厂。同时，石井四郎感到把细菌实验场建在抗联游击区是错误的选择，他确信“中马城”的秘密已暴露无疑。加上抗联三军不断袭扰，促使石井四郎对“中马城”做出迁移的决定。1933 年 12 月 27 日夜，石井四郎才用电话向远藤三郎通报“细菌实验准备工作受到重大挫折。”

12 月 28 日，远藤三郎和石井四郎视察了“中马城”。中马大尉、太田澄大尉、石井的二哥细谷刚男少尉前来迎接。视察监狱时，石井四郎大发雷霆，严厉训斥了中马和细谷。事故由没有直接责任的太田澄作了汇报。听取汇报后，远藤三郎和石井四郎还作出了“必须排除障碍，继续迈进”的决定。此时，石井四郎对迁移“中马城”的想法丝毫没有透漏。

远藤三郎的日记记载了这次视察活动。日记中写着：“12 月 28 日，星期六，晴。昨日深夜，石井军医打来电话，说是细菌试验准备工作受到重大挫折。为了进行实情调查，决定今天上午前九时半，从长春出发去哈尔滨。我和石井军医正同乘一辆车赶赴拉林（背荫河）视察设备情况，并听取关于发生事故的实际情况说明。作出必须排除障碍，继续迈进的决定之后，于午后三时返回（长春）部队。”

1934 年，“中马城”武器弹药库爆炸后，石井四郎以“失火”为由，将“中马城”转移的报告递交日本陆军大本营，并得到批准。不久，“中马城”陆续迁移，拆除设备，运往哈尔滨。人员一部分转移到哈尔滨，另一部分回国。

第三节　哈尔滨南栋



731 部队前身加茂部队本部旧址

“中马城”的日军撤到了哈尔滨“南栋”。“南栋”是加茂部队的本部，位于哈尔滨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中间地带，在日本陆军医院的南院。它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实质上是细菌研究的“石井部队”。本部的主要任务是制造滤水器和“石井式”土陶细菌弹壳。它临街的大铁门经常关闭，由日本兵把守。细菌实验活动在里面二层楼内由日本军医秘密进行。

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食人魔窟》中描述，哈尔滨市新区吉林街有个“白桦别墅”，主体为两层红砖大楼，部分是三层楼。731 部队队员乘车从“白桦别墅”出去，都要换成市民装束，严格保密。这里对外是满洲国政府接管的一个建筑物，实质上这里是 731 部队的秘密联络站。当时，即使在哈尔滨的日本人也很少有人知道内情。

731 部队原少年队员中村回忆说，1941 年 5 月，他调到哈尔滨“南栋”诊疗部当卫生兵。他住在马家街一处日本建筑风格的平房里，他的一位朋友住在“秋林”南边不远的白桦寮（别墅）。白桦寮这个欧式建筑物原是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1936 年迁至车站街（现中山路）以后，这里变成了 731 部队的宿地白桦寮。当时，令中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他的那位朋友看到本部宪兵室的人经常出入白桦寮的地下室，而住在白桦寮的单身

队员谁也没进去过。后来才知道那地下室是监押俘虏的牢房。731部队需要人体实验时，就派宪兵把俘虏提走。

后来，中村考察过白桦寮，他说：“那地下小屋都有牢房的痕迹，监视窗口、锁门的加固铁板和吊人上刑的滑轮还依然存在。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设有‘马路大’转运站的事是确实的，那么，日本领事馆迁移后，这个地下牢房是否继续使用，外人一无所知。”

如此神秘的细菌部队，在大城市进行大规模的细菌实验活动有诸多不便，会遭受世界舆论的更大谴责。于是，石井四郎酝酿出一个更大的阴谋，决定移师哈尔滨平房。石井四郎的计划得到了日本裕仁天皇的批准。在伯力城，川岛清供称：“由于这个缘故，（731部队增员，扩大细菌生产基地）日本天皇就于1940年颁发了一道新敕令，责成把部队内主要部分移到哈尔滨城南约30公里处平房站地区，部队基本活动，如研究、试验和生产事宜，都在那里进行。”①

第四节　哈尔滨平房镇

一、特别军事区域

（一）平房变迁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在吉林通往哈尔滨、阿城的驿道上，兴建了义和屯等村屯。嘉庆年间，这一带村屯经常遭受盗匪骚扰，义和屯村民组织起来抗匪，保卫了村屯平安。因此，村民将义和屯改名为平房屯，希望给大家带来平安吉祥。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灾难降临了这个小村庄。

1933年，日本侵略者修筑拉滨铁路，在平房屯附近设置一个小站，称平房站。1935年，石井部队开始在平房站以北4公里处勘测圈占土地。1936年春季，“东乡部队”突然设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116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营驻扎，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一年，平房地区开始大兴土木。1938 年平房细菌基地基本竣工，到 1940 年工程才结束。平房成为日本军事重镇，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实验魔窟。

（二）营　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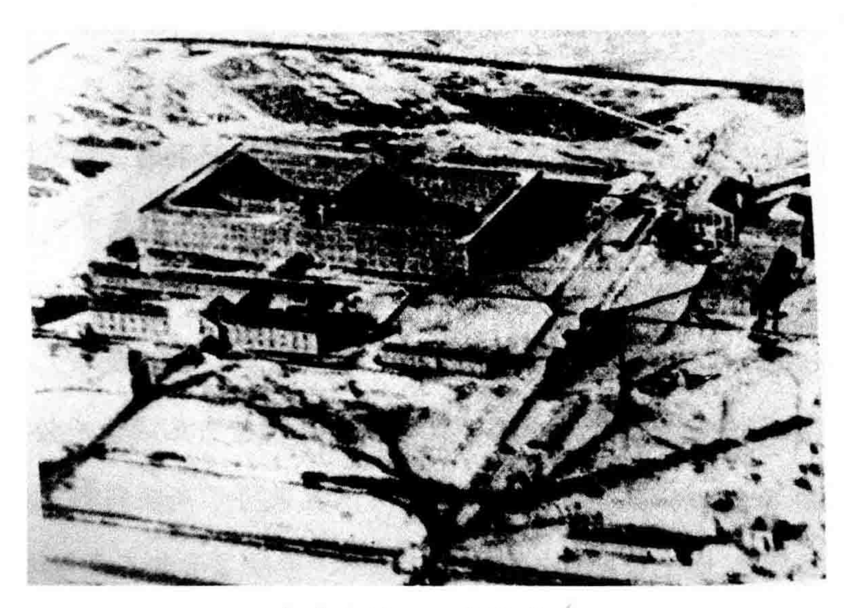
迫使中国劳工圈设存放建筑器材的场地

石井部队选中了黄家窝堡、三家子、刘家窝堡、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三屯等 6 个村屯的中间地带，圈占土地 6 平方公里，划为军事用地。幸存劳工侯安钦儿时见过日本人圈地，他说，那年他正和小伙伴在草甸子上玩，看见日本人把一面小旗插在一棵榆树上，圈了很大一块地，四周钉了标桩。后来。侯安钦进 731 部队当劳工，见那棵榆树还在，旁边盖起了四方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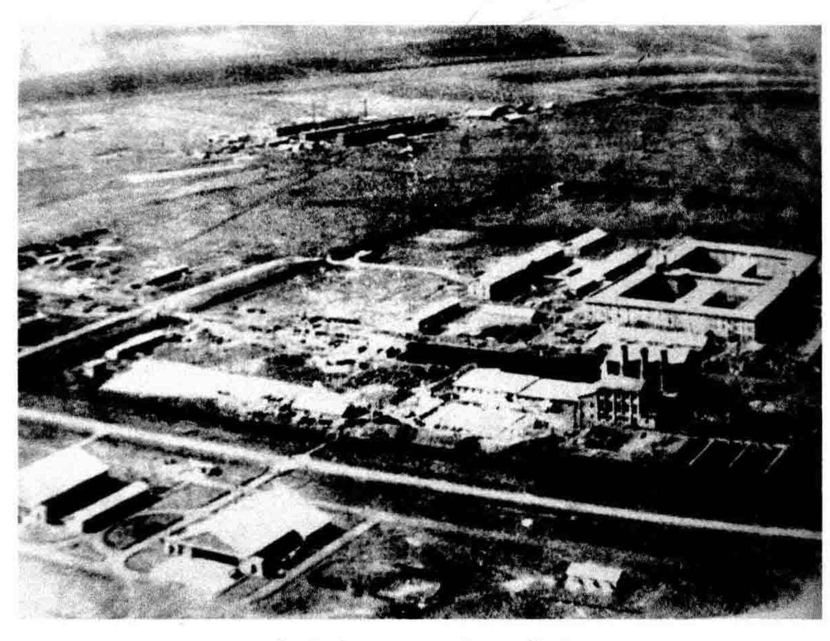
石井部队对外说是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东乡部队营舍”。行文中用“17 号军事基地”。

担任施工任务的是日本株式会社派来的铃木组、松村组、藤田组和大林组。其中铃木组最受器重。铃木茂是一个普通的木匠，来自日本加茂地区，和石井四郎是亲属。铃木的儿子是工地材料员，他把工地的钢材偷运到哈尔滨道外区太古街变卖，中饱私囊。石井四郎知道后，虽很气愤，却未追究，仍把各类细菌实验室、特设监狱、焚尸炉等重

点保密工程交给铃木，收尾工程也由铃木负责。承包这项工程，铃木发了财。后来，发展成为工程大承包商。铃木组前后两批共来了 60 多个日本人，大都来自加茂地区。其余劳工是从锦州、山海关、海城、牡丹江、大兴安岭等地骗招来的。竣工后，这些人绝大多数被杀害，其中不少人被细菌实验迫害致死。



建造中的 731 部队基地



建造中的 731 部队基地

仅用 3 年多时间，平房工程基本竣工。主要工程有水源地、供水室、备用火力发电

厂、平房站和孙家站两条铁路专用线、本部办公大楼、四方楼及附属设施、监狱、飞机场、军用物资仓库及东乡村生活住宅区各类建筑物。

外围工程分给大林组、藤田组和松村组。中国劳工有雇佣的本地劳工，工资待遇较高；有骗招的外地劳工，实行强制劳动。

1939 年，远藤三郎视察平房后，发出感慨，实验场的“惊人规模”与背荫河相比，“大有不胜今昔之感。”[①]

曾在铃木班做过杂工的荻原英夫详细供述了铃木班建筑平房细菌基地的情况：

“当在五常设研究所时 (1934 年前后)，石井故乡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加茂的人们 (约二十人)，经石井的动员来到满洲，作为石井部队的职工参加各种业务活动，获得大量财富。我的叔父石井正雄、舅父青柳雄、爪生荣二、表兄荻原武夫、伯父荻原薰也都来过满洲，在经济上获得大量收益。此外，石井还将自己的亲戚铃木茂 (当时是打零工的木工) 召至五常，从事各种建筑业务，铃木也获得了高额利润。后来，铃木将企业逐渐扩大，成立承包土木建筑的铃木组，自任组长。他除了承包石井部队的工程建筑外，还向若干其他企业进行投资。

曾在五常研究所工作的叔父石井、舅父青柳、表兄荻原等人都是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所以他们在满洲工作一年以后，便都回乡务农去了。但是舅父爪生、伯父荻原薰等人仍然留在满洲，继续工作，当然铃木也是其中的一个。

石井在五常研究所，以活人作为试验材料，获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于是便将研究所加以扩大，在哈尔滨平房附近，强占了大片农田，建起了拥有数十幢建筑物的庞大的研究所和附设的机场。

从五常返乡的人们被严禁泄漏机密，同家属亲戚等任何人都不准谈论在石井部队的工作情况，这些人后来都一直从事农业生产。而 1938 年再次招募石井部队职工时，舅父青柳、叔父石井和表兄荻原又都带头应募。

我在舅父青柳和叔父石井的动员下，经过父母同意，我也应募了。因为我作为佃农

① 韩晓、辛培林，《日军 731 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

家的长子，一心向往着能够使家庭生活过得稍稍富裕些，在我这一代成为自耕农。

1937年8～9月间，我和其他20名应募者一起，在东京都牛込区军医学校参加考试（无一落榜，考试纯属形式），1938年我等一行20人一同来到满洲。募集当时曾签定合同，规定我们都是石井部队的职工。但是，当到达哈尔滨后，20人无一例外地全部被铃木组所接收。被带到工地平房后，一切工作安排、工资发放等，也都是同铃木组发生联系。在身份上，享受石井部队临时工的待遇。如安排伙食、发放工作服，宿舍也在陆军官舍中（后来同部队共同起居）。当时我21岁，作为长年雇佣的工人，日工资是2.8元。木工和瓦工的日工资是3.5元～4.5元，杂工是2.8元～3.2元，我的工资是杂工中的最低工资。

当时的部队的外部建筑已基本竣工，灭菌器和其他研究器材，在站台上堆积如山，正着手安装内部设备的阶段。据说外部建筑是由松村组承包修建的。至于内部的机密业务，诸如研究器材的搬运、开箱、安装，尤其是七、八两栋（活人实验所）的各种内部建筑和器材的安装等，任凭再廉价的劳动力，也不会雇佣中国人。石井之所以招募了我们这些同乡，首先就是为了防止泄密，这是不言而喻的。

研究器材是由日本特殊工业株式会社发出的，当我到达该地时，就有二三名由特殊工业会社派来的人，还有五六名就地采用的人（全部是日本人），配合特殊工业会社的社员共同从事除七、八栋以外的器材安装工作。

我们主要的作业地点是活人实验所的第七、八两栋。当我们到达时，建筑物的内部，只有入口处和最里面间隔成若干房间，中间像一个大礼堂一样，完全没有隔断。第七、八栋被第三、四、五、六栋所包围，从外面完全看不到。而且入口处有一座坚固的大铁门，在三、四、五、六栋三楼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安装有探照灯，直接射向七、八栋。包围在七、八栋周围的三、四、五、六栋（砖结构）和连接第三和第五两栋的走廊（四楼，砖结构）的底部涂有高达四米的水泥；三栋的屋顶上还建有更高的瞭望台。

当我们到达工地时，建设班的工藤技术员向我们传达了石井部队长的命令：‘七、八两栋的内部工程今年内(1938年）必须完成。有关业务问题，同部队的任何人都不许议论，如有人议论，必予以重罚。’

我们的工作首先是为第八栋已间隔好的房间涂墙，同时，为了再间隔房间，还从站台上搬运砖、沙和木材等。七、八两栋是两层楼房，一楼和二楼的入口处有 3 个房间，里边有 4 个房间，将这些房间的墙壁涂好后，再去涂第七栋。凡出入于第七、八两栋的人，每次出入时，都要由保机班（为保密而成立的机构）检查身份证明书，并进行搜身。木工和瓦工的负责人每天必须将内部设计图交回保机班。舅父青柳是我们这20人的负责人，他必须向保机班报告当天到作业现场的人数、作业种类和场所。

当作业开始时，我们 20 人都由于没有执行合同规定，把我们作为部队职员对待而心怀不满，同时，还由于发给‘固定工资’和来到满洲只让干一些苦力的活等原因，工程迟迟没有进展。而且，认为‘只有千叶班在待遇方面受歧视’而十分不满。铃木曾派一个姓佐藤的人作现场监督员，他在的时候大家干活，如果不在就怠工。因此，铃木经石井同意，又从家乡招募了 40 名工人，参加七、八两栋的内部施工。他们于当年 4 月到达满洲。至此，千叶班的人数增至 60 名，青柳仍继续担任千叶班长的职务。

第二梯队到达后，开始实行承包制度，工程有了一定的进展，将七、八两栋一、二楼入口处和里面共 28 个房间的墙壁涂好后，开始将中部的空间隔成小房间，并浇铸混凝土。在此之前，曾在五常的石井部队工作过的人，似乎也都不知道七、八两栋建筑物的用途。我也是开始工作两三个月之后，才听青柳说的。这两栋建筑物是收容被送来做实验的活人的监牢。牢房的入口处有铁门，其他上下和四周都是用的混凝土，宽约 2.5 米，长约 3 米的牢房一个接着一个，每个牢房中有厕所，混凝土的地面上铺着木板。一层楼有 20 个牢房，1939 年 1 月我回乡时，七、八栋的 40 个牢房已经建成，二楼的工程正在开始（如二楼的牢房数目同一楼一样，全部就有 80 间牢房）。

我们还向里面的房间（一楼）搬运并组装了各种器材（活人试验用？）。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种叫作“八角堂”（我们这样称呼它）、直径约 3.5 米的八角形器材，内部的底面和从下部起 1 米高的地方都嵌有磁砖。每一面都有一个 1 厘米厚、40 平方厘米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内部。实际情况虽不清楚，但据说可以使内部变成真空，也可以注入空气。安装“八角堂”的楼梯下，还有一间动力室，装有 4.5 马力的发动机，用直径约 20 厘米的管子同“八角堂”相连接。我还记得里面的 4 个房间，地面和墙围都镶

有磁砖，面南的房间里安装着灭菌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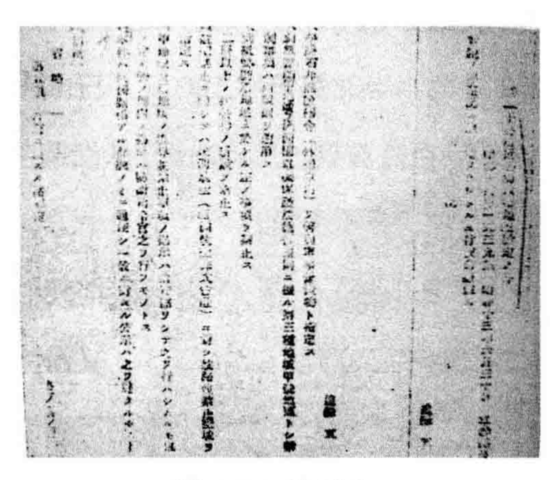
此外，由于材料不足等原因，我们也曾一度中断七、八栋的工程。这时，便在三栋的一楼安装灭菌器，或向各栋搬运研究用器材。例如搬运X光器材、试管和其他各种形状的玻璃器皿、书架、图书、装动物的笼子、纱布、脱脂棉、药品、消毒用浴缸以及其他大型沉重的器械，或将上述物品开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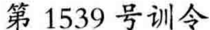
自从实行承包制后，我每天有10～20元的收入，有的人收入多达30～40元。我刚来时，扣去每月的20元伙食费，再往家里寄50～60元，我手中就没有太多的余钱了。可是，后来，我每月寄回100元，还可以添置西装和其他衣物。而且，星期天去哈尔滨时，我也可以出入于妓院、咖啡馆等地，生活富裕了。我前后向家中寄钱约1 000元左右。

我在哈尔滨接受征兵检查，结果是甲种合格，我领取了1939年3月18日于黑河第七国境守备队步兵第五中队入伍的现役证明。我决定在家乡入伍，所以，于1939年1月，由铃木组解雇，便返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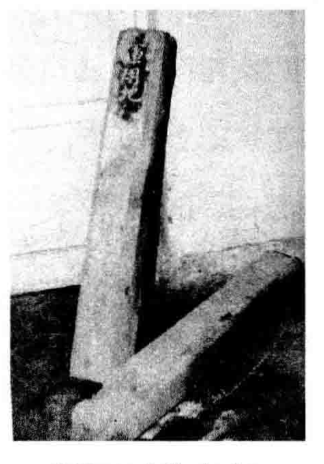
我返乡时，七、八两栋尚未完工，因此尚未收容用于试验的活人。但是，我积极参与了这一活人试验所的内部设备，以及其他各栋的研究器材的搬运、开箱、安装等工作，为石井部队完成任务出了大力。”①

（三）“特别军事区域”的划定





第1539号训令



“军用地”标桩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24～28页，中华书局，1989年。

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发布了“关于设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1539号令后，平房镇与日本空军8372部队营区、731部队营区构成特别军事区域，面积达120平方公里。

特别军事区域分为甲号区域和乙号区域。甲号区域为特别控制的“无人区”，地段为731部队周围的5公里左右地域；乙号区域为一般控制区，为甲号地段以外的方圆115平方公里的区域。日军将731部队区域内的黄家窝堡、刘家窝堡、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头屯的村民全部赶走，强迁居民546户，拆除和占用民房1 638间，良田610垧，这一带成为“无人区”。

曾在731部队当过劳工的金方良说：“平房地区甲号区域村屯有韩家店、张家店、三家子、韩四家子、正黄旗四屯、正黄旗三屯、正黄旗二屯、大南沟、小南沟、瓦盆窑、新五屯、新发屯、阎家岗、西大坝、东井子、后二道沟、义发源、东二道沟、平房屯、山嘴子、腰二道沟等21个村屯；乙号区域包括了孟家屯、朝阳屯、夏家屯、穆家沟、邓家沟、双榆树、腰大坝、杨家店、东大坝、后柳条沟、二门子家、柳条沟、后哈达屯、东戴家、西戴家、南戴家、前柳条沟、狼窝屯、张斌屯等19个屯。”[①] 石井部队在甲号区域内毁掉了黄家窝堡等4个屯。1945年，日本投降后，另外3个屯得以恢复，部分村民重返家园，黄家窝堡灭迹。

日军清村占地，划定特别军事区，致使当地村民流离失所。

正黄旗五屯的老户陈芳盛（现国营东安发动机制造公司退休工人）回忆说，1936年，日本人在我们屯南建厂子，占屯里200垧地。当时每垧地500元，日本人只给120元，强行把地收去了。又过了两年，日本人怕老百姓看到工厂（731部队细菌工厂）的秘密，强占了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头屯、刘家窝堡、黄家窝堡。那年八月十五，从平房来了几个日伪警察，还有日本宪兵队的人在村公所门前贴上“告示”，限期我们4个屯的村民一个月内迁走，违者，格杀勿论。当时庄稼还没收割，又快冷了，又毁房子又毁地，谁也不想搬家。日本人不准呀！村民金志福、张世宝、文道周流露出不满情绪，当即被日本宪兵抓走，送到鞍山铁矿。没过多久，他们都死在了矿上。金志福的儿子被逼上了吊，

①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第2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媳妇也改嫁了。屯里200来户人家全都撵走了。我们百十户人家被撵到裴家窝堡，都没房住，只好搭“马架子”、挖“地窨子”栖身。此后，就把正黄旗五屯称“老五屯”，裴家窝堡称“新五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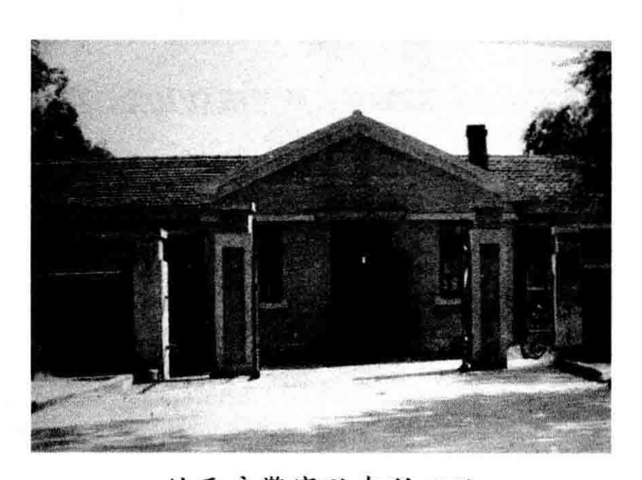
搬进“新五屯”的人家遭遇悲惨。屯里就有一口土井，前后拥进去200户人家，井水不够喝，又没钱打新井。村民只好喝何家沟的桃花水（雪融化后流下来的水）。何家沟的上游是日本工厂，日军每天都排泄废水，给新五屯百姓带来灾难。

住在新五屯当过劳工的潘义勇说：“1940年7月的一天，我从日本厂子下工回家，听说屯里发生了瘟疫。全屯有好几百人上吐下泻。当天就死了七、八个人。我妈还有陈芳金、孙成富的妻子发病，不到一天就折腾死了。发生瘟疫后两天，日本人派来军医化验粪便，说是霍乱症。这次瘟疫，全屯死了40多人。”后来，日本人又在沟里取水化验，撒过消毒粉。当时村民都不知道发病的原因，现在看来“新五屯”的瘟疫是731细菌部队造成的。

当地老户陈芳新、朱谦、张兴宽、杜兆林都讲述了住“马架子”、“地窨子”的痛苦经历。不少人家没地，连“马架子”也没地方搭，不得不流落他乡。“马架子”四面透风，“地窨子”潮湿阴暗。入冬后，老百姓缺衣少食，老人、孩子体弱，连冻带饿，死了七八十人。

（四）特别军事区事务所

1. 伪平房区事务所



伪平房警察驻在所旧址

根据日本关东军1539号令，日伪哈尔滨市公署在平房站附近设立平房区事务所，

名义上隶属香坊区公署，实质上为日本人所控制。香坊警察署在平房设立了警察驻在所，在平房屯、腰二道沟、正黄旗三屯设立警察分驻所。日本军派了宪兵分遣队，后升格为宪兵分队。

平房区事务所下设总务股、动员股、实业股。区长董志军，副区长宫本聿郎、袁明礼，事务长力松赖次郎（前任为高木、佐藤）。平房特区辖8个分区，即平房分区（管辖4个屯）、新发分区（辖7个屯）、朝阳分区（辖5个屯）、东井子分区（辖6个屯）、腰二道沟分区（辖7个屯）、后哈达分区（辖7个屯）、正黄三分区（辖2个屯）、正黄二分区（辖2个屯）。每个分区设有区划长1名，副区划长1～2名。[①]

日伪警察机构权力由日本人控制。据曾在伪平房警察驻在所任过警长的王学德被捕后供任："平房警察驻在所所长都由日本人担任。第一任所长是田村守义（警佐），第二任所长是越义美（监督警尉），第三任所长是土井智（警佐）。并先后派日本人加藤秀岭、石川掌握内勤工作实权。各分驻所长也都由日本人担任。"

2. 协防班

731部队进驻平房后，日本宪兵分遣队在中国劳工头目当中秘密发展了一批"特工"联络员。1938年，平房特别军事区域建立后，平房日本宪兵分遣队又把平房特区区长、副区长、各分区区划长吸收为"特工"联络员。在此基础上，1942年4月，日本宪兵队在平房地区秘密建立了协同防谍班，简称协防班。731部队协防班总班长由中国劳工大队翻译李初亭担任，各劳工队的协防班班长由各劳工中队长担任。

731部队协防班在"汉芳饭馆"秘密召开了成立大会。宪兵室翻译官春日中一通知各劳工中队长参加会议，宣布李初亭任总班长，各劳工中队长分别任各班班长，各小队长为成员。编为8个班。由李初亭颁发委任状。会上，劳务班长工藤与四郎、宪兵室特工关冈、中国翻译李初亭向协防班员灌输防"谍"观念，监督劳工思想动向，要求每个班员都注意发现抗日政治嫌疑分子，即"间谍"，诱惑说每抓获一个"间谍"，奖赏100元钱。

①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第2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在协防班成立之前，春日中一和李初亭就在劳工经常聚集的场所密设了谍报据点。李初亭的哥哥李汉芳开的“汉芳饭馆”就是日本宪兵室的谍报点。李初亭的女儿也被安插在“汉芳饭馆”当跑堂的，他们都是日本宪兵室和协防班的耳目。1945 年 8 月 10 日，有个外号叫“傻柱子”的海城劳工探亲回来，听到了日本垮台的消息。他在“汉芳饭馆”喝酒，和对面的劳工闲谈说：“小鬼子要完蛋了。”这话被李初亭的女儿听到后，向日本宪兵告密，结果“傻柱子”被抓去拷打。

劳工去看病的“敬修诊所”也是日伪谍报据点。医务所大夫是协防班成员。劳务班的“洗衣房”也在协防班监视之下，不少劳工由于协防班告密而被关“禁闭”，于是劳工称协防班成员为“灰色劳工”。劳工处处受监视，没有人身自由，稍不注意，就要遭逮捕、受审讯。

1942 年，平房特区协防班成员从周家站“鸿顺魁”杂货店刘福芝口中得知，周家站村民张宗武家有枪，就报告给日本宪兵。结果张宗武被抓受审，并从他家搜出一支手枪。张宗武一再说枪是护院用的，可是仍然遭到日本宪兵的毒打。后虽被保释，但终因伤势过重死亡，其妻也服毒自杀。

1943 年，李放文从海城来劳工大队看望儿子，没有办理临时居住证明书。结果被当作“特嫌”抓去拷打刑讯，最后被日本宪兵打死。同年 4 月，有个过路的朝鲜人也因没有办理临时居住证明书而被日本宪兵杀害。平房特区，日伪横行，许多无辜平民惨遭杀害。

1944 年秋，平房特区又成立了一个协防总班，日本宪兵队颁发了委任书。总班长由伪区长董志军兼任，副总班长由副区长袁明礼兼任，各分区设 8 个协防班，班长由各区划长兼任。从此，平房特区日伪协防组织密布，层层设防，无论是村屯，还是劳工大队都处在白色恐怖之下。

日本宪兵室极力收买拉拢伪协防班成员。曾担任过协防班班长的侯玉书说：“我们协防班的大小头目都享受特殊待遇，晚上一有任务，就给每人各发一件军用棉大衣和一台富士牌自行车，总班长还特殊地佩带一支匣子枪。我们一出动，不管能不能抓到‘特嫌’，一元钱夜餐补助费照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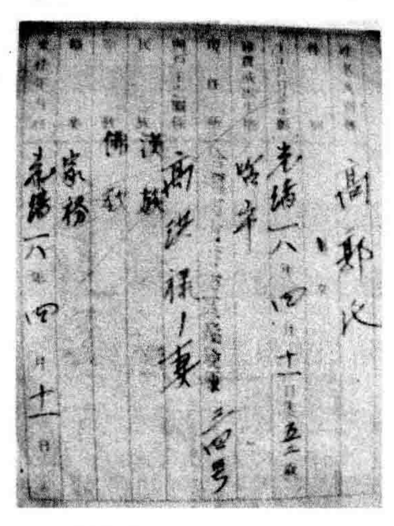
1944 年元旦，731 部队宪兵室以劳务大队的名义召开了“劳工庆功奖励大会”，劳工大队头目和部分劳工参加了会议。会上，日本宪兵向有功“劳工”发了奖，并宴请他们，每人还发了一条香烟。其实，这些“劳工”都是暗藏的协防班成员。

（五）“特别军事区域”的管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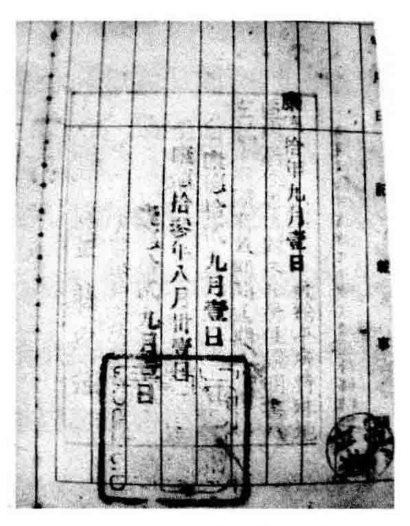
日伪军平房特别军事区边界屯外 1.5 公里的交通路口处设立木制界碑，上面写着汉字，大意是：非特别军事区域的人，未经批准不得入内，如有违者，按满洲《治安保护法》论处。在甲号区域外设立“军用地”界标。


居住證明書

在平房特区使用的居住证明书



居住证明书第四页



居住证明书第五页

居住在特别军事区域的居民凡年满 16 周岁者必须办理由伪香坊警察署颁发的“特别居住证明书”，其封皮为紫色，有效期 1 年。证明书要随身携带，随时接受检查，否则立即逮捕。外来人员一律到伪警察署所属的派出所登记，办理限定期限的白皮“临时居住证明书”，离开时，必须办理注销手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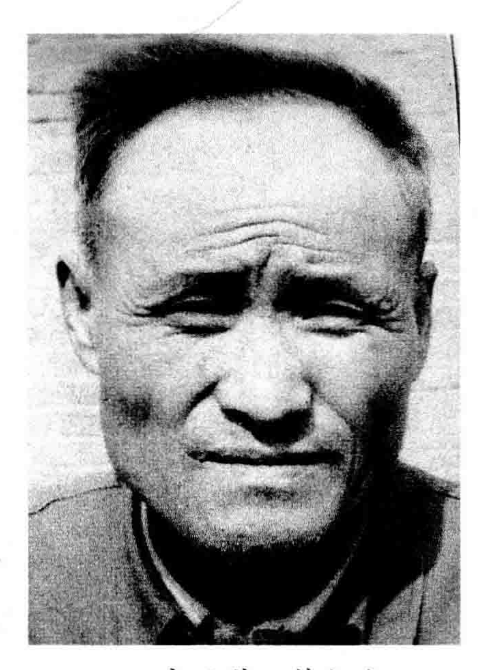
平房站前后约 60 华里铁路线被称为“60 里地国境线”，火车路过时必须挂窗帘，严禁旅客向窗外张望。有不少旅客因不知规定向窗外张望，成为政治嫌疑犯，被投入日伪警察署和宪兵队。飞机也要远离这条航线，对违航飞机，强迫其着陆，否则，无论是日军其他部队的飞机还是民航飞机，731 部队都将予以击落。

特别军事区域内各村屯都组织成立了“协和班”，协助观察可疑人的动向。老百姓实行联保联坐制度，每 10 户联保，一人有事，其他 9 户连同遭殃。

日本宪兵、日伪警察及其汉奸走狗相互勾结，对“平房特区”实行法西斯管制，百姓稍有不慎，便遭祸殃。

劳工金国忠(现平房区平新乡退休干部)说，1940年以后，平房地区各屯都给731部队出劳工，因此，屯里各家普遍缺少劳动力。夏锄秋收季节，有钱人家常到特区外雇短工。外来雇工办不下来“临时居住证明书”，就偷偷地做短工。正黄旗四屯地主老方家雇了20多人铲地，其中有4人是特区外的人。一天，伪警官徐警尉到地里巡查，吓得几个外地人扔下锄头就跑。被徐警尉抓住拳打脚踢，还用锄杠打。有熟人担保，才没被送进警察署。还有不少做短工的常以“特嫌”罪被抓进日本宪兵分遣队拷问。实在没证据，还是要敲诈一笔钱财。最后由熟人担保，亲属出钱，才把人赎回来。

被当成嫌疑人的遭遇极其悲惨。劳工庄振芳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1943年冬季的一天，一个穿长袍、高个子、40多岁的男人向我问路，我提醒他这里是平房特区，让他快点离开。那人疾步往南逃跑，还是被日本宪兵发现，骑三轮摩托追来，将那人抓走。后来，我给劳工食堂送豆腐，路过日本宪兵队关卡，被日本宪兵截住，押进宪兵队后院。这时，我发现后院狼狗圈里绑着一个人，被狼狗撕咬得鲜血淋漓，那人正是向我问路的人。日本宪兵见我是本地村民，就放走了我。”



731部队劳工韩行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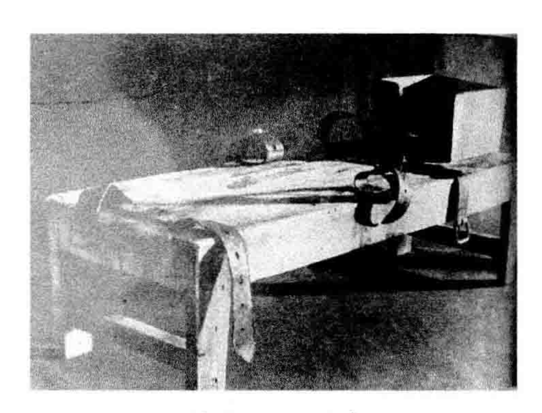
东井子屯劳工李海楼也讲了一件狼狗撕咬人的事：“1944 年春季的一天，有个南方口音的人向我打听 731 部队的情况，我怕担嫌疑，劝他快离开这里。那人转悠时被日本宪兵发现，拔腿向南逃跑。日本宪兵开汽车追去。不一会，我看见汽车返回来，尾部用绳子拖着那个南方人。那人被拖得遍体鳞伤，只剩下一口气。日本宪兵审问未果，残忍地把那人扔进狼狗圈。顿时，两条狼狗扑上来撕咬，那人惨叫几声就断气了。日本宪兵借此吓唬我们，让我们老实点，不然也喂狼狗。”

当地居民韩行岩、王绪贵也见过日本人的狼狗吃人的场面。韩行岩说，这是 731 部队惯用的手法，明抓的人一般都公开处置；暗抓的人，关押在“四方楼”，秘密处置。

日本宪兵对“嫌疑人”心狠手辣，从不放过；对误入“禁区”的老百姓，也常下毒手。金国忠还讲过这样一件事：1943 年 4 月 15 日，正黄旗四屯农民文业志去野外搂茅草，误入 731 部队飞机场旁边，被日本哨兵发现，蒙上眼抓走，打得皮开肉绽。夜里，又蒙上眼扔到荒野。第二天，被熟人发现抬回家，因伤势过重，含恨而死，撇下一家老小 6 口人。

日本宪兵凶残暴虐，对中国人施以各种酷刑。

劳工方振玉讲，1943 年冬季的一天，我们几个劳工下工时，被堵在宪兵队北门哨所，看见 6 个陌生人跪在地上。日本人问我们认不认识这几个人，我们确实不认识，都不敢吱声。这时，只见有个日本宪兵从屋里拎出个烧红的炉钩子，挨个刨那 6 个人的脑袋，那几个人喊叫得撕心裂肺，令人目不忍睹，有的当场晕倒。另有个日本人用木棒，将他们全部打死，日本宪兵叫我们把 6 具尸体抬到老五屯北的劳工坟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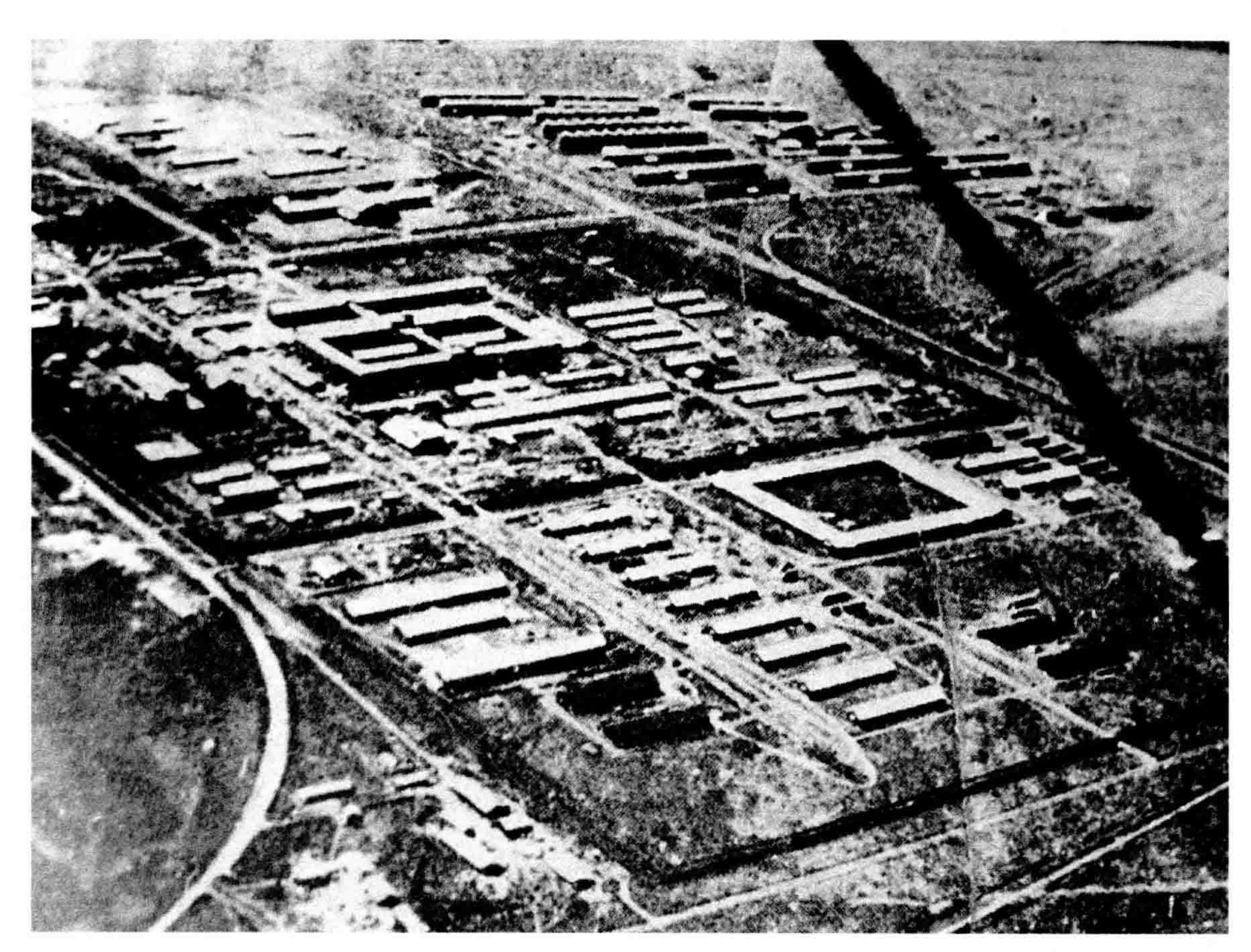


刑具——匣床

还有一种刑法叫“灌水刑”，也叫“匣刑”。曾在 731 部队工务班当白铁工的白武斌叙述了这种“匣刑”：“匣床”是一种刑具。它像个木床，床上有两道皮带卡子，用来捆胳膊绑腿。床一头有镶着两扇门的木匣，匣上端有圆孔。人仰在匣床上，再扣上盖，头就固定住了。施刑时，就从圆孔往人嘴里灌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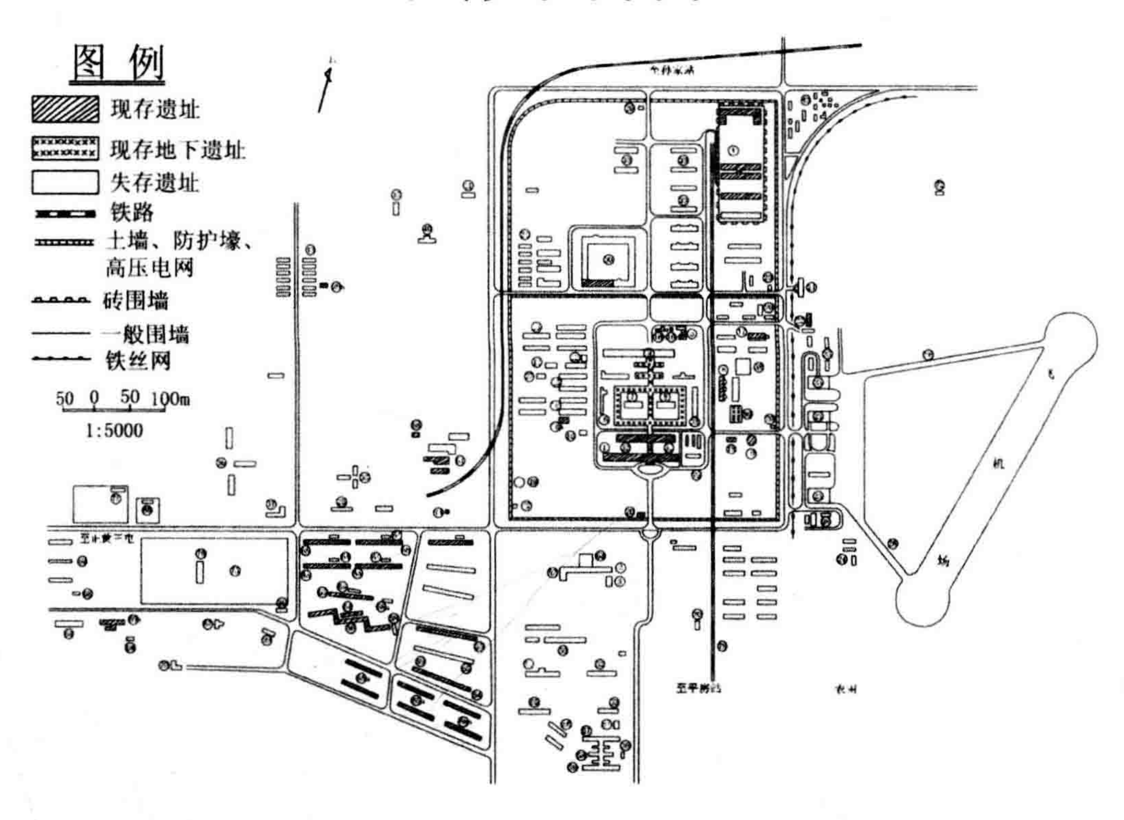
白武斌和他的木工师兄佟玉臣见过这种“匣刑”。一天，日本人让他俩儿去“刑房”修房子。忽然听见人的喊叫声。透过半开的门，见一个人正被施“匣刑”。佟玉臣见状，脸色刷白——他说，那“匣床”是日本人让他做的。后来佟玉臣逃出了劳工营。

二、731 部队本部



731 建筑群全貌

平房平面图



1 731部队本部
　1F总务部 宪兵室诊疗部
　2F队长室总务部
2 1F邮电 电报室
　2F教育部实习室
3 书库
4 田中班昆虫动物饲养室
5 吉村班冷冻实验室
6 动力锅炉 发电室
7 特设监狱
8 特设监狱
9 笠原班(病毒研究)
10 高桥班(鼠疫研究)
11 解剖室
12 焚尸炉
13 石井班(动物饲养室)
14 放血室
15 马舍
16 野口班
16a二木班(结核研究)
16b黄鼠饲养室
16c小动物地下饲养室
17 山口班(细菌弹装配)
18 毒瓦斯发生室
19 毒瓦斯地下储藏室
20 卫兵室
21 川上班(人体对菌苗适应性研究)
22 航空班 气象班
23 飞机库
24 天线班
25 八木班(植物病毒研究)
26 滑行路
27 石井班事务所
28 第三部运输班
29 北岗焚尸炉
29a北洼地焚尸炉
30 兵器班(汽车库、各类特种武器研制与装配)
31 器材供应部
32 兵器库
33 第一仓库
34 第二仓库
35 仓库
36 饭店
37 酒保
38 养鱼池
39 建设班
40 制酒房
41 火磨
42 卫生所
43 劳工棚
50 教育部办公室
51 原少年队宿舍
52 少年队实习室
53 少年队食堂、浴池
54 猪圈
55 汽车库
56 三角兵舍
57 卫生兵教育队舍
58 特别队舍
59 少年队舍
60 东乡神社
61 医院
62 1F伙房.雇员佣员食堂
　2F判任官 高等官食堂
63 大礼堂
64 浴池
65 日本军人家属宿舍
65a判任官家属宿舍
66 独身宿舍
67 水库
68 锅炉房
68a洗衣房
69 高等官家属宿舍
69a高等官独身宿舍
70 给电所
71 东乡国民学校
72 毒气试验室
73 运动场
74 给水塔
75 工务班
76 游泳池
77 平房警察驻在所
78 平房站
79 铁路专用线
80 地下蓄水库

采访佟玉臣时，他已半身不遂，吐字不清。他吃力地讲了制造“匣床”的经过，和白武斌说的情况吻合。现仿制了一个“匣床”，摆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里。

平房镇是731部队细菌研究、生产、实验的中心，包括第1部、第2部、第4部、

教育训练部及生活区域东乡村。它占地约16万平方米，主要建筑物有70多座，中心建筑为本部1栋和四方楼，四周筑有土墙，高2米，周长5公里，土墙上架设着铁刺电网。墙外有护城壕，宽3米，深2.5米。四面都有大门，其中东门两个，门旁建有卫兵所。南门为正门，为对开铁栅栏大门，门西有偏门。门内设卫兵所、岗楼。门口竖立一块警示牌，上面写着："未经关东军司令部批准不得入内"。南门为日本人专用门，设双岗，配备日本警力1个班。东、北门供中国劳工上下班出入，西门非特殊情况不开启。

平房规模宏大。731部队少年班队员秋山浩（化名）称平房镇为"建筑在旷野里的高楼大厦"，他描述说："隔着几幢建筑物望过去，矗立在中央的那座四方形满镶着瓷砖的大楼，是一座一路上不论在大阪、新京和哈尔滨从未见过的那样大的楼房。它反射着阳光，闪耀着白色的光辉，遮住了半边天。而且在围着这座大楼的那道砖墙上，还架设着森严的铁丝网"。他笔下的围墙和四方楼是："这道外墙的周长，约有五公里，仅仅当中的这一座大楼，就有东京丸之内大楼三倍那么大。"炼人炉的烟囱"可以说是耸入云霄的大烟囱在那里冒着黑烟……那个锅炉房的大烟囱，据说在全满洲居第二。"①这是日本人笔下的细菌战的魔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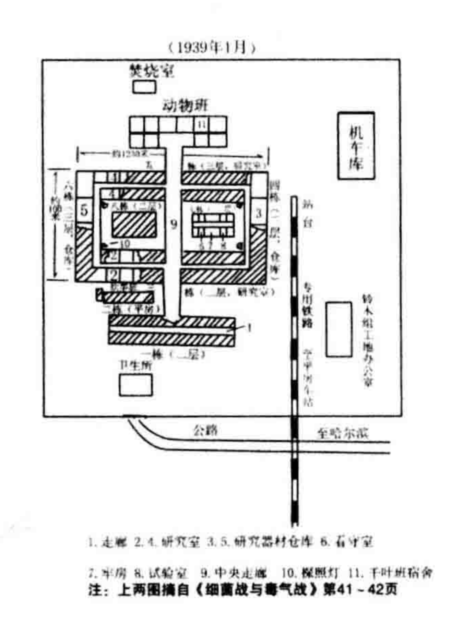


731本部大楼旧址

① 〔日〕秋山浩：《七三一细菌部队》，第8～9页，群众出版社，北京编译社译，1982年。

1939 年 731 部队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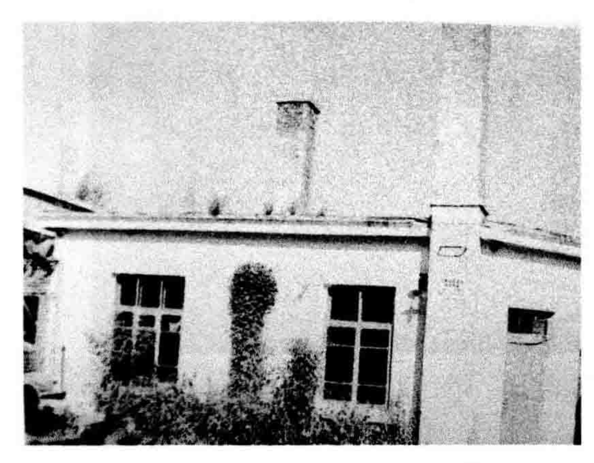
1939 年 731 部队建筑物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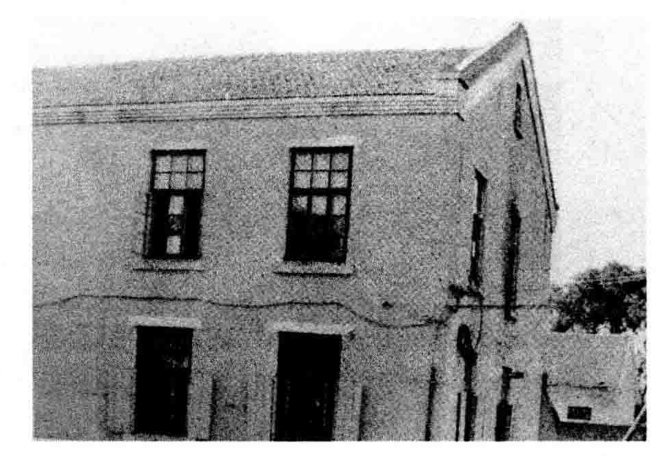
注：上两图摘自《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1－42页

（一）本部——1 栋

本部 1 栋是 731 部队指挥中心，正对南门，砖瓦结构，为人字型屋顶的两层楼，建筑面积 2 350 平方米。二楼自东而西依次为 731 部队长办公室、卫生间、副官室。一楼为侍卫官室、总务部、安灵室、宪兵室。一楼一层西侧为诊疗部，二层西侧为陈列馆。楼内走廊向北延伸，与四方楼连接；地下暖气管道也与四方楼相通。楼内地上、地下均有更衣室。楼东、西两侧均连接着平房。东侧为配电室和器材供应部办公室，面积为 711.5 平方米；西侧为日本人食堂，后改为兵器库，面积为 884 平方米。紧靠西侧平房是卫生间，面积 35.8 平方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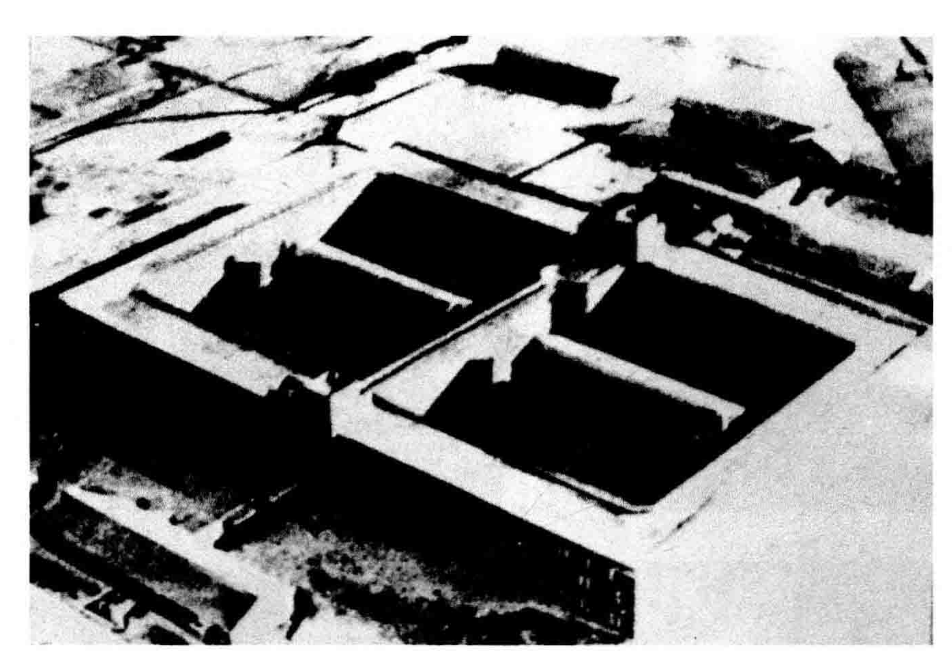
731 部队南门卫兵所



731 部队长办公室

（二）四方楼

“四方楼”是由3栋、4栋、5栋、6栋所组成的方型的高大建筑物，也称为“口”型楼，建筑面积15 000平方米。3、4栋轴心部分为5层楼，其余部分为3层楼。楼外表瓷砖为灰白色，格外刺眼。“四方楼”为院中院，东、北为砖墙，西侧为铁丝网。日本警备队昼夜设岗，戒备森严。楼内一层有柄泽班，为细菌工厂；二层有吉村班、凑班、江岛班、太田班、冈本班、石川班、内海班，均从事各类细菌研究工作；三层有田部班、二木班、草味班。



731部队四方楼鸟瞰图

“四方楼”有地下通道，连接监狱、各实验室、解剖室、焚尸炉。地道高约3米，宽3米多，每隔6米左右，安装1个电灯。地道东南有地下室，为对开铁门。西边有个小实验室，室内墙壁上端每隔半尺探出一根铁管；墙壁是用水泥浇注的，夹层镶着铁板；通风窗口镶嵌着铁栅栏；地面有一根2尺高的铁桩子，顶端挂着铁环，旁边有手铐。地面铺有小铁道。

“四方楼”北侧连接的平房为高桥班、笠原班细菌研究室，西侧平房为野口班细菌研究室。再往西有饲养动物的石井班，建有事务所、动物棚舍7座，饲料加工房及大型菜窖。再往西北约200米，驻有“兵训班”，它是类似四合院的“方型栋”。南面房屋为制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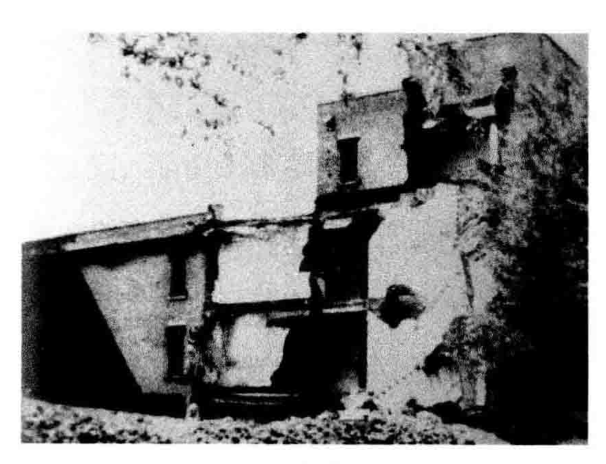
小型细菌武器的高、低温实验室和灭菌室、研究室、菌苗及疫苗贮藏室。东、西、北面房屋为汽车、坦克、火炮等机动车库，也称“实验器材室”。“四方楼”北部为吉村班的冷冻实验室，为两层楼平顶建筑物，面积235平方米，房顶部有许多通气孔，内壁有固定隔热的铁钩，室内有固定冷冻设备的水泥基座。与此连栋的是冷冻室配套使用的实验室，上下楼有3个单间，面积80平方米。东北角有4栋房舍，为田中班的昆虫动物舍，周围砖院墙高2.2米。临近还有5栋房舍，为装配和贮存细菌弹的场所。“四方楼”以东，铁路专用线附近的二层小楼是瓦斯发生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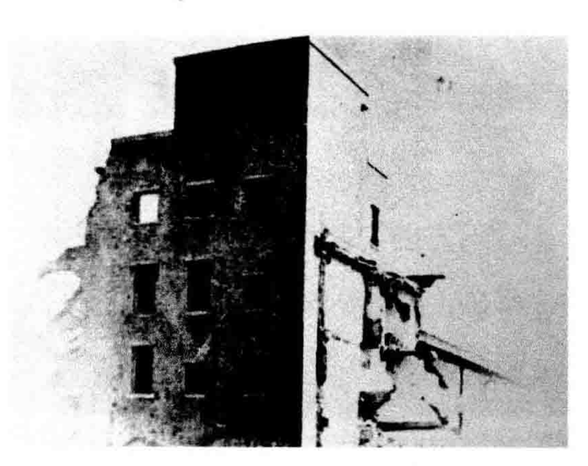
四方楼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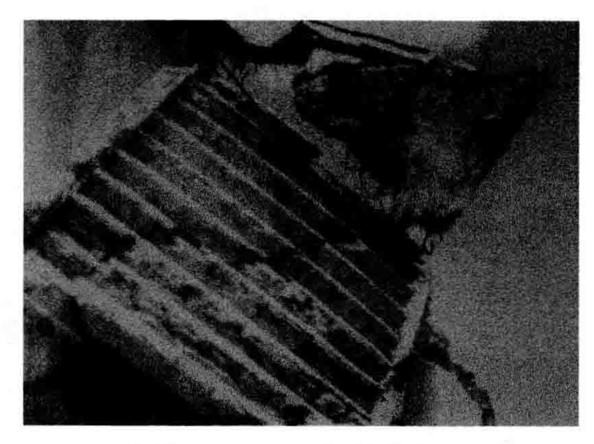
四方楼残迹



四方楼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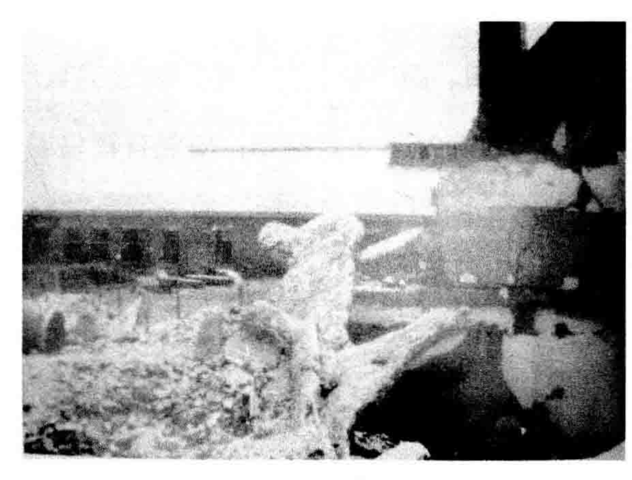
四方楼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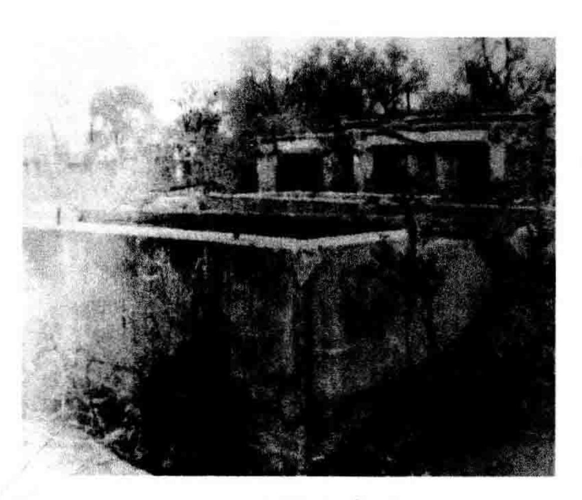
被炸毁的四方楼的楼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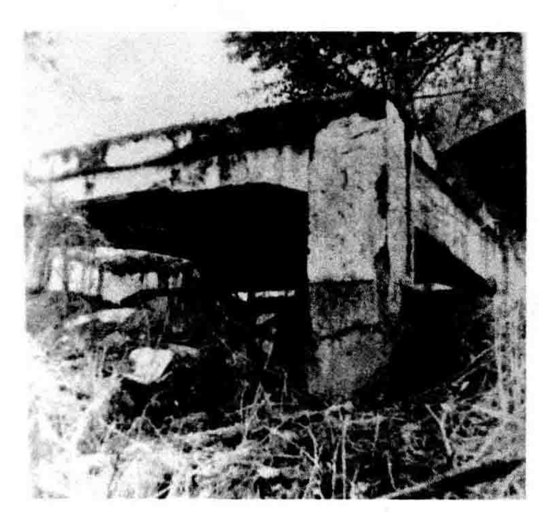
被炸毁的四方楼中心走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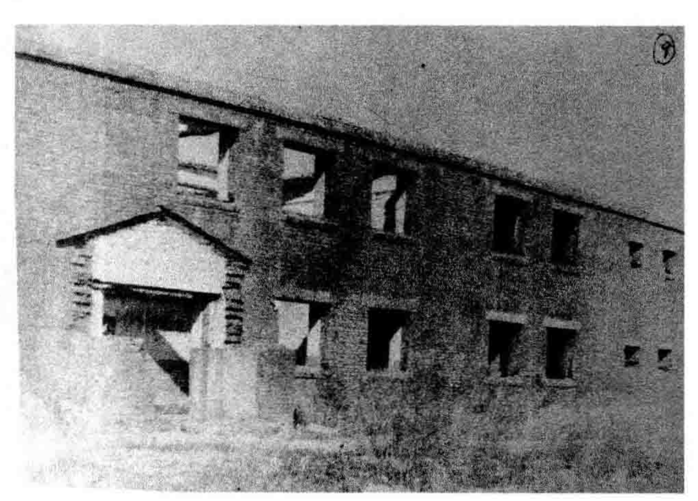
近景四方楼残迹远处平房为被烧毁的武器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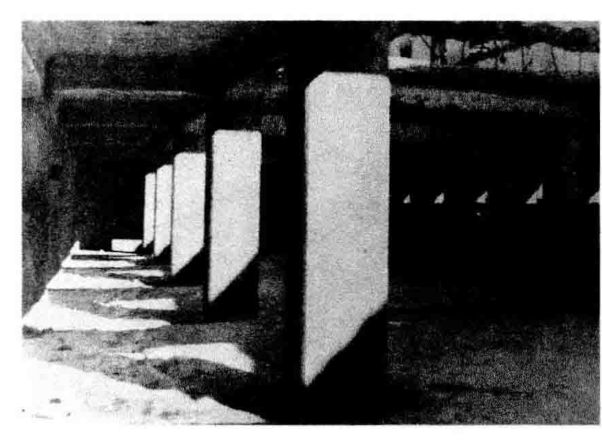
兵器班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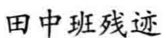
兵器班残迹



田中班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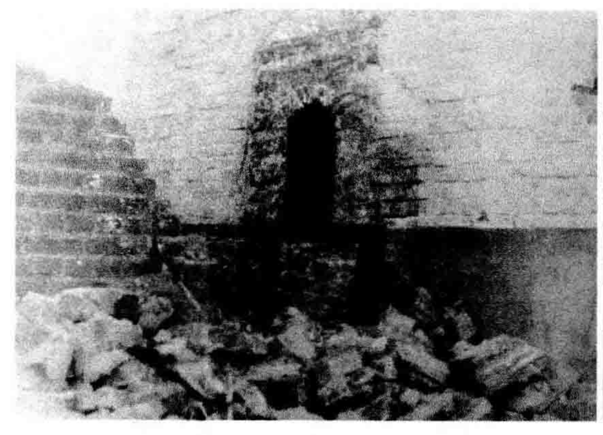
田中班残迹　　育鼠所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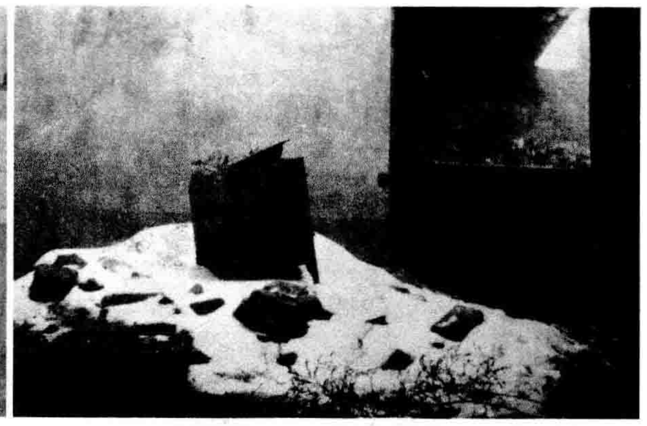
（三）训练教育部

该部位于本部 1 栋南部，围墙为长方形，东、南、西三面开门。东门旁设卫兵所。院内有宿舍、食堂、实习室、仓库、浴池、练兵场。院外东北有操场；南部有赛马场。该部主要培养细菌战专用人才。学员为十四五岁的少年见习技术员，前后培养了数百名。[①]

（四）焚尸炉与解剖室

1. 焚尸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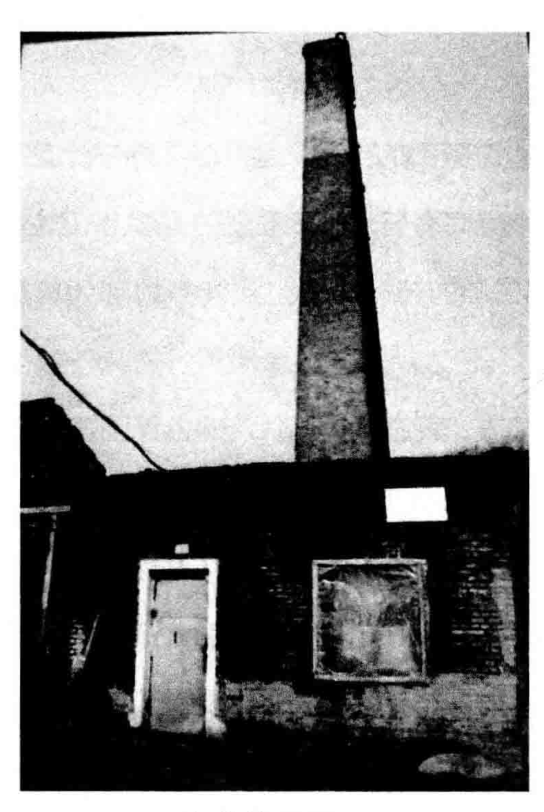


焚尸炉炉口

731 部队有 3 座焚尸炉，一座位于“四方楼”西北角，主要是焚化被细菌实验致死

① 韩晓、辛培林著《日军 731 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

的人的尸体；一座位于北岗上，以焚化动物尸体为主，偶尔也焚化人的尸体；一座位于原“八木班”的农田里，日本人死后在这里焚化。据劳改犯张朝清（第731部队劳工大队副）供认：“四方楼的北边紧接该楼有一栋不明的楼房，在这两栋楼房中的西角有一个锅炉，见日寇在此炼过马，并经常闻到好像炼人的恶臭味，使人发呕。”另据双城县周家屯杨维昌（在该厂做过劳工）讲：“他们的炼人炉我看见过，像个大铁柜子，里面有许多大铁匣子，一个铁匣子正好能装下一个人，把人装上，倒上火油，关上炉子炼。”根据当地群众反映，过去时常闻到从731部队细菌工厂冒出来的烟是炼人的味，烟色特殊。据在该厂做过长期劳工的傅景奇谈：“烟囱里时常冒黄烟，顶风闻着让人发呕。”[①]据731部队见习士官山下升供：“将试验死的人拉去火炼；有的当时还有气，也拉去火炼。火炼场的大烟囱每天冒着烟。”[②]




北岗焚尸炉



洼地焚尸炉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3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79页，中华书局，1989年。

2. 解剖室

731部队“口”字楼，有一条秘密地下隧道，这条地下道同关押“马路大”的特设监狱的7栋和8栋相连接，由“口”字楼一层走廊的一角，一直往前走，走到头往左拐，有一个连扶手也没有的楼梯。这里就是地下隧道的入口。从没有扶手的楼梯下去向右拐，在地下隧道中约走30秒钟，再从一个混凝土楼梯上去。这个上去的楼梯也没有扶手，走到头有一个向外边开的铁门，这里就是地下隧道的“出口”。从地下隧道的“出口”上去，是一间相当大的铺水泥地的房间。房间里面，很高的天花板上，吊着许多特别大的灯泡（相当现在的无影灯），在这些灯的下面，有铁制的手术台。乍一看，好像大学附属医院的手术室。和手术室不同的是，除了铁床（手术台）以外，看不到像样的医疗器械，却有好几个水桶和装着福尔马林溶液的大型玻璃标本容器。这就是731部队的解剖室。[①]

（五）陈列室

陈列室位于1栋总务部二楼的左端，规模有总务部的庶务、会计、人事三个课合起来那么大。陈列室的周围，是雪白的墙壁。整个房间有普通公寓里的三居室带卫生间的单元的四倍那么大。在靠着雪白墙壁的两层或三层的架子上，整整齐齐地陈列着宽45公分、高60公分的盛着福尔马林溶液的玻璃容器。

福尔马林溶液里泡着被细菌实验杀害的中国人、蒙古人、苏联人的各种脏器：人头、人腿、没有四肢的躯干、胰脏、肠子、妇女的子宫和胎儿。人的所有部位，都泡在大大小小的容器里。

原731部队一队员说：“部队的上层人物说，‘这是从诺门罕事件的战场上采集来的标本’，但这种话是谁也不相信的。因为标本的数量，在随着“马路大”的活体解剖而增加，新的标本越积越多。”[②]

另据日本731部队原少年队员田村良雄供称：“在庶务主任饭田大尉指挥下，二名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56～57页，群众出版社出版，1984年。

②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37页，群众出版社出版，1984年。

少年队员布置了陈列室，我也参加了。即用由各部门拿来的石井式细菌大量生产用培养罐，石井、胜矢式毒检知器、卫生滤水器、各种炸弹破片、各种弹套、中国各地区气候图、活体实验中的照片等加以陈列。”[①]

731部队原第4期少年队员佐藤回忆说：“有一次，班长派他到标本陈列室去搞卫生……他一进去，就闻到让人发呕的福尔马林消毒水味。四下一看，挨墙摆放着数不清的各种规格的标本缸，里边浸泡着人体各部位的标本。”731部队原少年队员小笠原等3名少年队员进标本陈列室打扫卫生时，他看见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他说：“我们一打开标本室的门，走进去，那扑鼻的消毒水味熏得我们几乎要呕吐出来。我抑制住恶心，往里一看，那不同规格的浸泡标本瓶很规矩地摆在四周和地中间。一个装有人头的标本瓶首先映入我的眼帘，蓝色的眼球，高高的鼻梁，白色的脸经福尔马林溶液一浸泡显得更加苍白，那金黄色的头发在药水里漂浮着……这显然不是东方人。我很纳闷‘西方国家的人头怎么会跑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里呢！’……在一个装有消毒液的立式大型标本缸里面有一具完整的人体，那身躯弯曲着，注明文字上写着，那是一具‘破伤风’患者的尸体……标本瓶里还有肺、胃、肾、肝、脾、食管、肠等脏器标本。还有浸泡着手、脚、胳膊、大腿的标本瓶。”

这个房间，不单单是“陈列室”，也是发表各种研究成果的“大厅”。被许多人头围在中央发表各种研究成果的医生的形象，看着比人头还要可怕。

（六）“安灵室”

“安灵室”借以稳定军心，麻醉731队员的精神。它在总务部庶务课和规划课的中间。“安灵室”的正面是祭坛，室内安放着许多照片，点着长明灯。这些照片，是在准备、研究和进行细菌战的过程中死去的731队员的遗像。队员们从“安灵室”前边走过的时候，必须低下头来。

731队员死了，进安灵室。原731部队一队员说：“731队员死得相当多，这一般人是不知道的。仅就我认识的，就有30多人死于鼠疫。”另一个队员说，在细菌战研

---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20页，中华书局，1989年。

究过程中死亡人数“一年之内，不下 30 人。”[①]

秋山浩在《731 细菌部队》一书中对灵堂进行了描写：“灵堂设在总务部正门的楼上，这里供着防疫给水部成立以来的战死者和在研究中受到感染而病死的三百几十名牺牲者。这里的面积能有四、五十坪（一坪等于 3.24 平方米），在台阶式的长台正面和两侧，都密密地镶着黑框的相片。”731 部队原少年队员在一次炭疽热菌实验时，不知是谁不小心打碎了培养皿，培养皿掉下来把煮沸的试管也砸碎了。带细菌的玻璃碎片溅到“阿布的半边脸、作实验的那个人的下颚以及前胸和转过身去的佐佐的背上”。受感染后，阿布极度恐惧，当天夜里喝升汞水自杀了。731 部队把阿布的死当作战争中的病死者来处理，并在安灵室举行了祭祀活动：“或许因为自杀的原因吧，既不念经，也没读祭文。由于这是同事中死去的第一个，当我们悲惨地拈香吊祭时，愈加感到‘生’的恐怖在威胁着自己，因而精神十分紧张。这和追悼故人的悲痛心情，多少有些不同，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观情绪。依次行礼的同事们，脸上都是冷冰冰的毫无表情。”[②]可见，731 部队士兵也同样是细菌战的受害者，内心充满了反抗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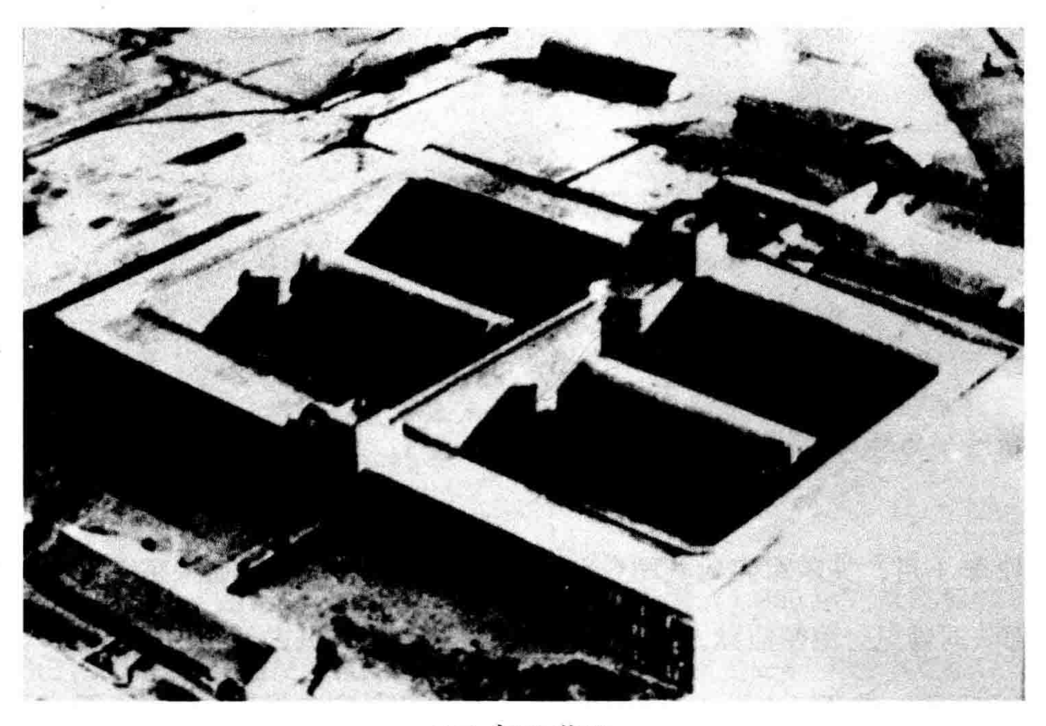
看管特别班班长石井刚男少佐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 38 页，群众出版社出版，1984 年。

② 〔日〕秋山浩：《731 细菌部队》，第 59 ~ 61 页，群众出版社，北京编译社译，198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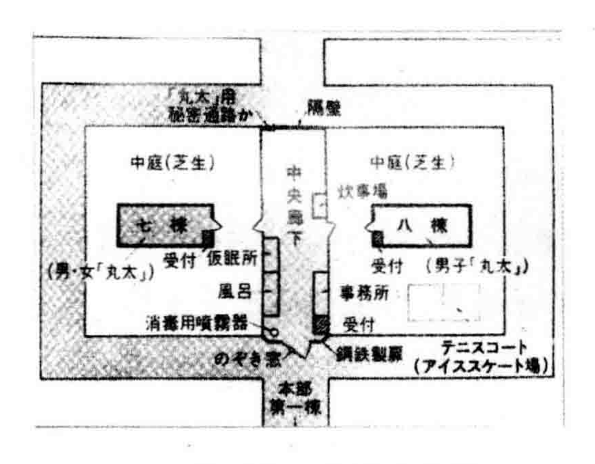
（七）监　狱

位于“四方楼”内侧，由中心走廊间隔，分成东、西两个大院。东、西院里各有一座两层楼，这就是秘密监狱，石井四郎称：“这是采用德国式的‘秘密建筑法’。”东院为8栋，系女监；西院为7栋，为男监。两座监狱外部建筑结构相同，楼房长约35～40米，宽约20米，钢筋水泥结构，设有地下室，为活体实验室。外墙为灰色水泥面。内部构造也相同，每层楼南北两侧各6间牢房，共12间，上下两层24间，两所监狱。共48间牢房。牢房四周走廊为环形，牢房大小不一，多数是集体牢房，也有关押“重犯”的单间，牢房内有水洗式便池。观察窗长约30厘米、宽25厘米，距地面1.2米；投饭口与观察窗一般大小，距地面0.5米。



731部队监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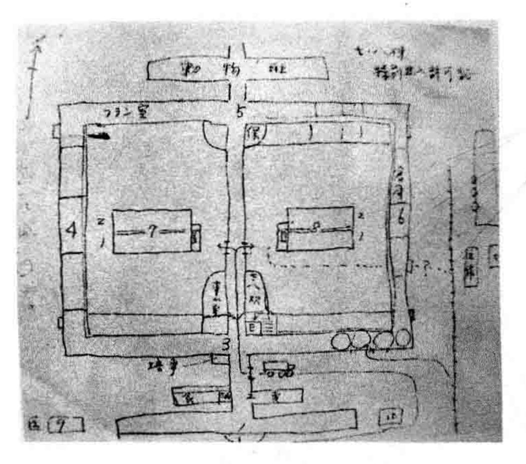
各个牢房安装着串通的通气管道，门为双层铁门。门外西侧为特别班管理室，东侧为监狱食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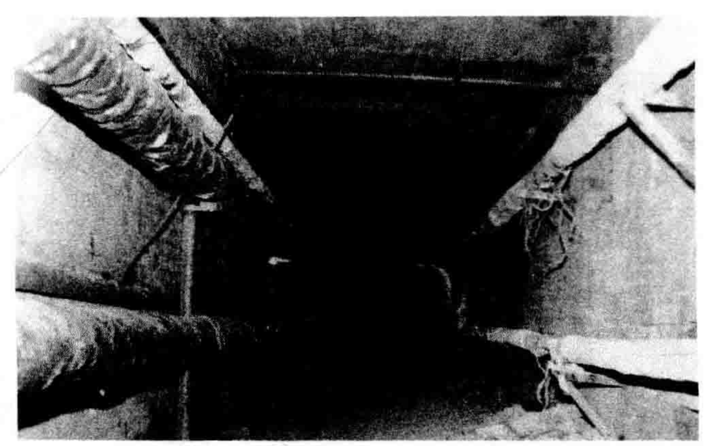
特别监狱布局示意图



特别监狱内部构造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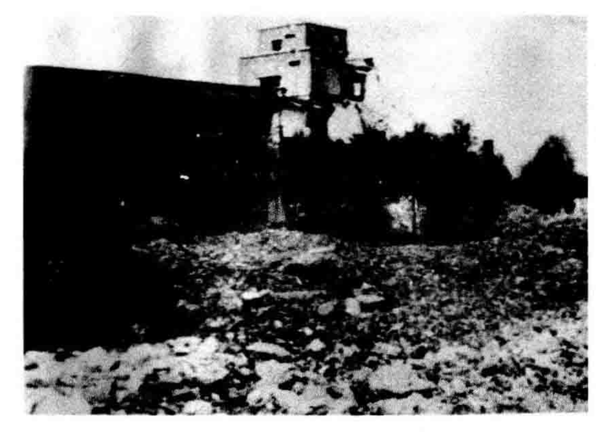
731 部队特别班队员 1986 年访问平房所绘制的特别监狱示意图



731 部队本部大楼里通往特别监狱的地下通道

1942 年 1 月，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第三课长吉房虎雄中佐随关东军宪兵司令官视察 731 部队时曾见过秘密监狱，他回忆说：“从本部正门进去，再打开几层厚实坚固的门才能进到里面。在宽 1.5 米、长 15 米的中心走廊深处向右拐有个通道，通道两侧便是焊有铁栏杆的一大排拘留所，这就是进行鼠疫感染的地方。”

在日本投降前夕，石井四郎为了毁灭罪证，下令将秘密监狱炸毁。东北光复初期，还存在着明显的残墙断壁，砖石瓦砾堆积如山。“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部分遗址夷为平地。



特别监狱遗址



特别监狱遗址



特别监狱的地下实验室残迹



特别监狱第七栋遗址

（八）实验农场

实验农场位于“四方楼”西边。建有八木班事务室、1 000 平方米的植物温室，还有大面积的农田。该部是从事植物病毒研究的实验场，主要研究实验小麦等农作物的锈病和黑穗病，即“乌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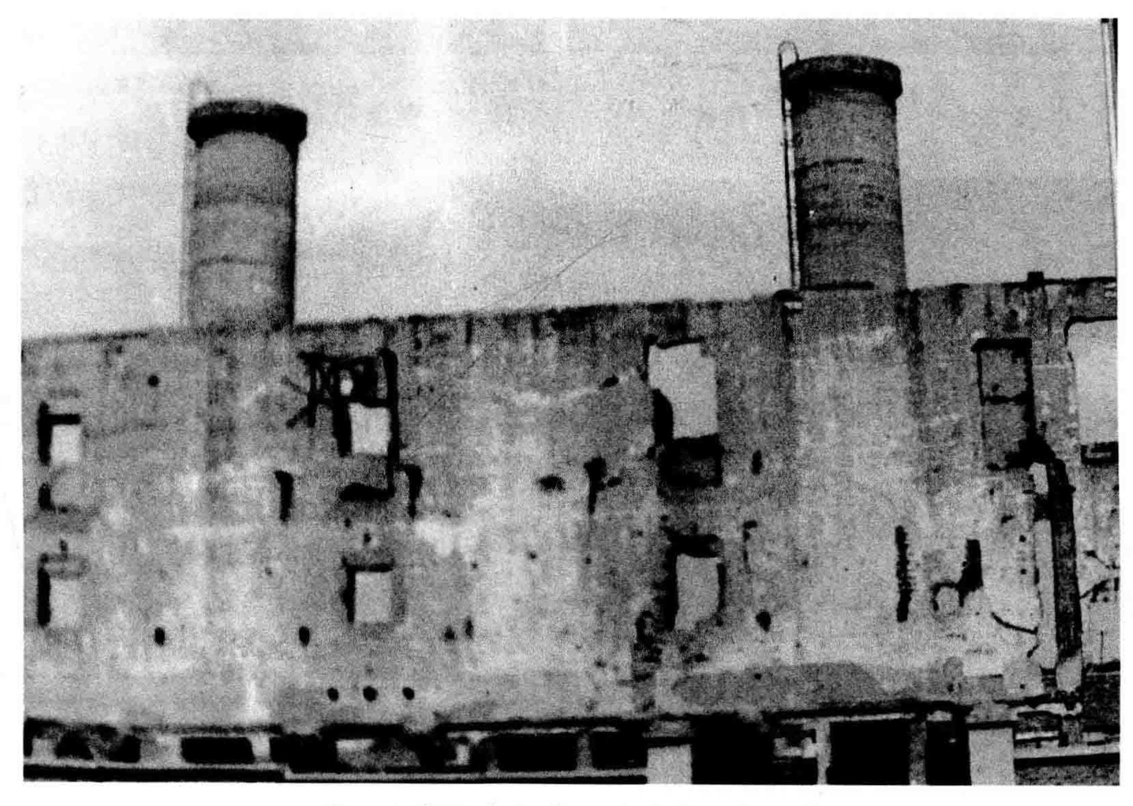
（九）物资仓库

位于“四方楼”北面。东侧为第一仓库，是军事物资仓库，有库房 4 栋，砖木结构。第一栋是仓库事务室，兼作物资包装室；第二栋为仪表、仪器库；第三栋为机器设备库；第四栋为玻璃器皿、布匹、军用服饰类库。还有两栋板房仓库，一栋装有硫酸、水银、酒精、石炭酸等物资；另一栋装有“牛肉松”，生产用糖，用于细菌实验。露天堆放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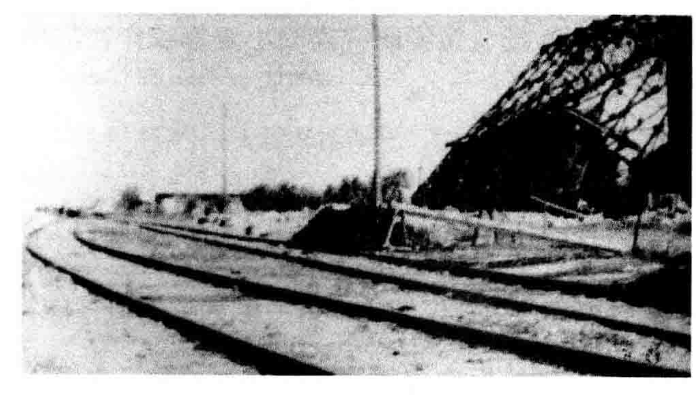
许多木箱和铝箱，还有地下室。第二仓库为生活物资仓库，有两栋砖瓦结构的库房，存放办公设备、服装、生活日用品。有被服加工和修鞋部。物资仓库还供应所属各支队物资，铁路专用线修至各库房门口。

（十）后勤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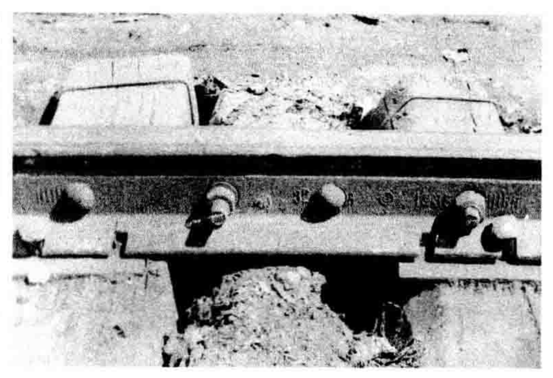
后勤班包括供热、供电、供动力的动力班和工务班、运输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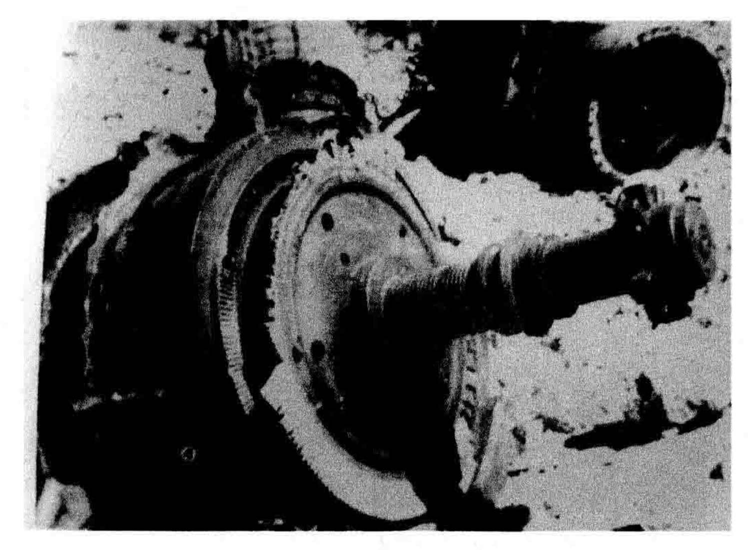
被 731 部队自行炸毁的动力班锅炉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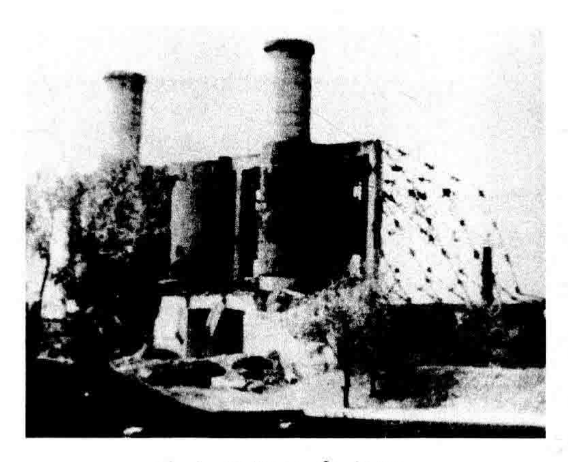
残留的部队铁路专用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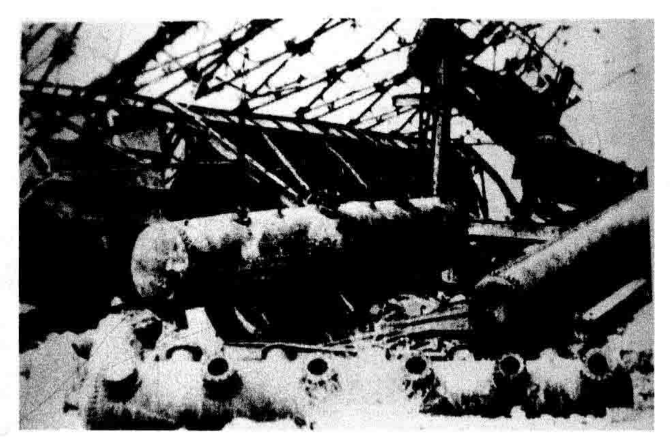


带有“1935”字样的 731 部队铁路专用线上的铁轨


被炸毁的发电机


动力班锅炉房残迹


动力班锅炉房残迹


被炸毁的动力班锅炉房

动力班位于“四方楼”东面，厂房为三层楼房，钢筋水泥结构，为自动化锅炉房，有 3 台“科哈式”锅炉，负责供暖和备用电。锅炉房东南角有一个地下水库，面积为 1 000 平方米。

工务班负责维修房屋及各种设备。运输班负责物资运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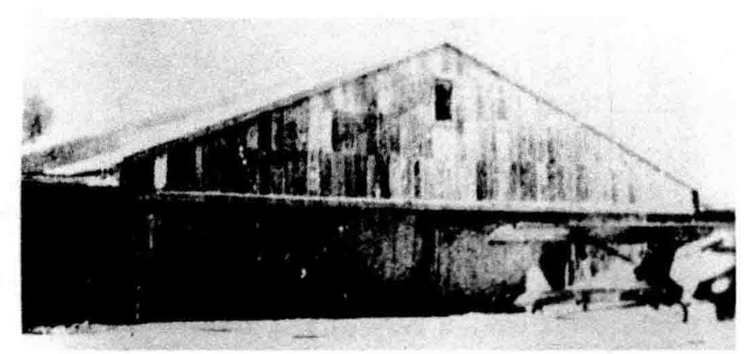
（十一）航空班和气象班

航空班和气象班位于锅炉房道东，为三层灰色楼，还有 3 座飞机库。航空班拥有飞机 11 架，分 8 个机种：吞龙式轰炸机、七九式重 1 型轰炸机、七九式 2 型轰炸机、九九式双发轻型轰炸机、九九式单发轻型轰炸机、隼式战斗机、100 式运输机、患者运输机。各类战斗飞机内部设备都进行了改装，装有载运细菌炸弹、细菌喷雾器、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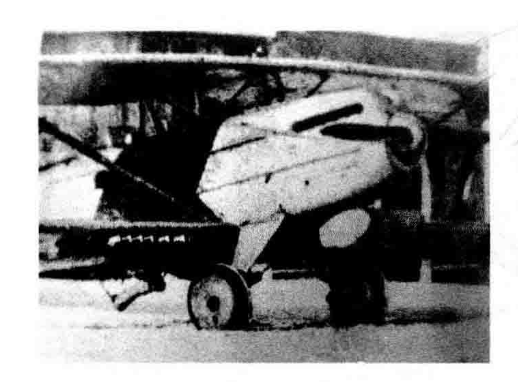
菌投撒器，用于细菌战和细菌实验。运输机有 731 部队将校级军官专用机，也有押运“活体实验材料”和菌苗、实验器材的专用飞机。机场设有两条飞机滑行道。飞机跑道长 1 200 米，宽 120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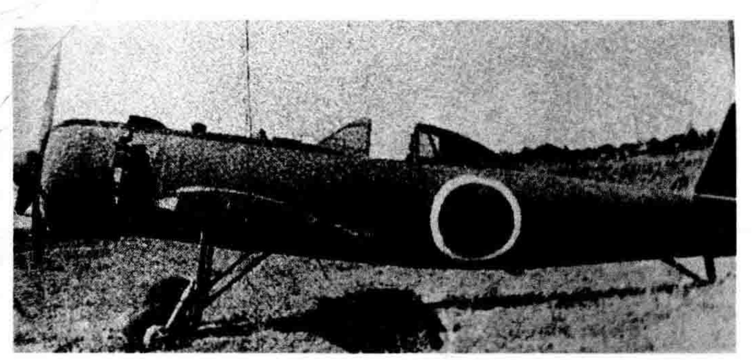
731 部队航空班遗址



731 部队的飞机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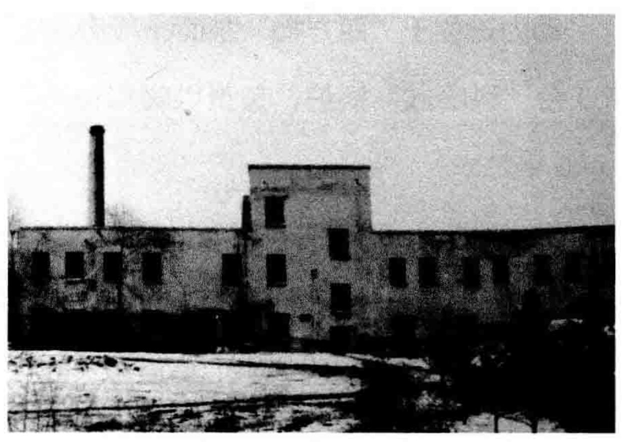
731 部队飞机



731 部队也使用过这种战机



731 部队飞行员



731 部队气象班遗址

（十二）东乡村



东乡村宿舍楼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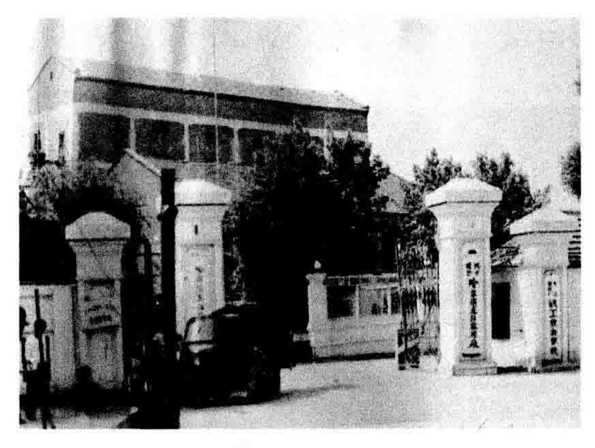
东乡村是731部队生活区域。主要建筑物有日军三层家属楼6～8幢；日本军人独身宿舍楼3幢，号称“连三楼”，东乡宿舍事务所在这座楼下办公；西岗上有三层楼3座，两层楼2座。这些楼装饰豪华，设备齐全，为高级军官及享受同等待遇者的宿舍楼。

东乡村内有中心广场、礼堂、剧场、日军家属鱼菜供应部、饭店、体育场、游泳池、酒吧、神社、学校、医院、花园。62栋楼为综合楼，一层东侧驻有劳务班、邮政局、电报局、兵要地志班、图书室、教育部实习室，西侧有食堂。二层楼是高等官、判任官餐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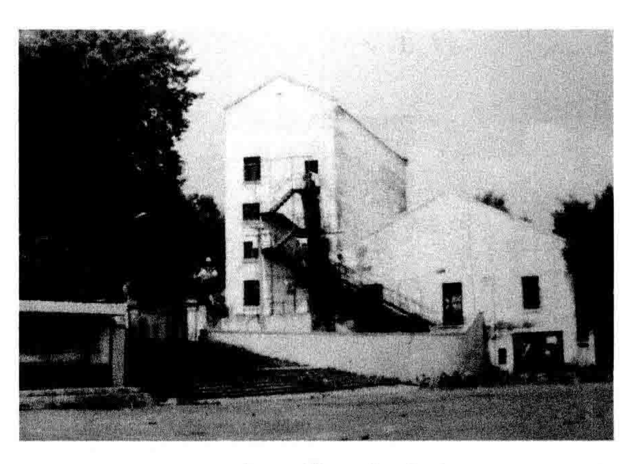
（十三）第3部——南栋

南栋设在哈尔滨市宣化街与文庙街一带，为731部队前身“加茂部队”，对外称“防疫给水部”。1938年，731部队迁移到平房后，改为731部队第3部。设有研究室、工作科、整备队。主要生产滤水器和土陶细菌弹壳。[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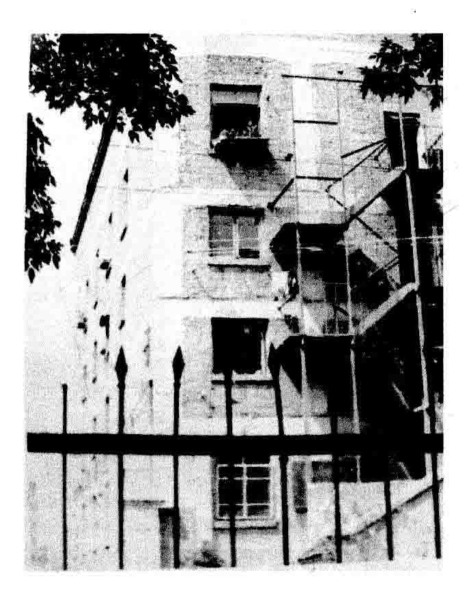
①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位于杨马架子的原731部队
土陶细菌弹壳制造厂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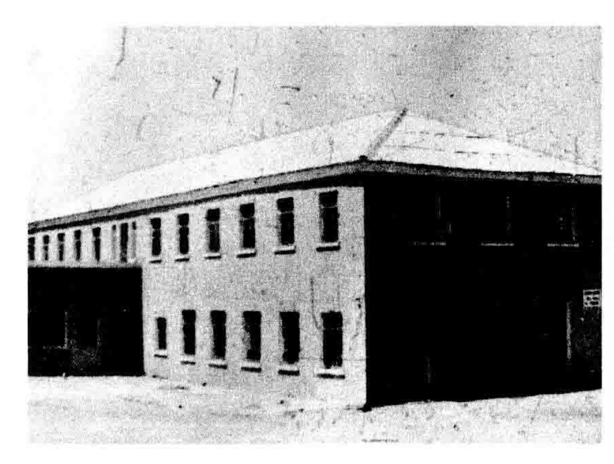
731部队第3部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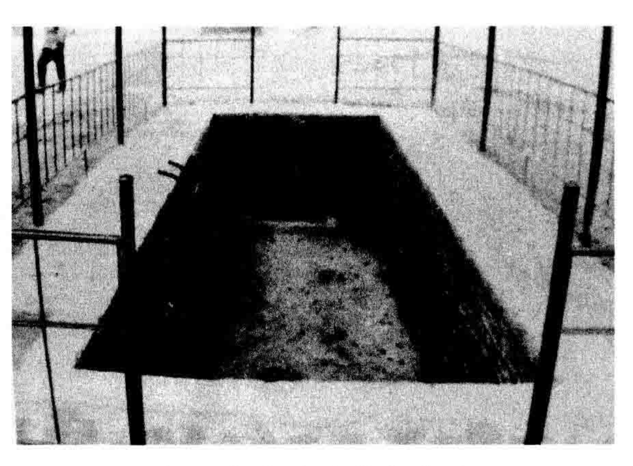
位于杨马架子的原731部队
土陶细菌弹壳制造厂遗址



焙烧土陶细菌弹壳的窑体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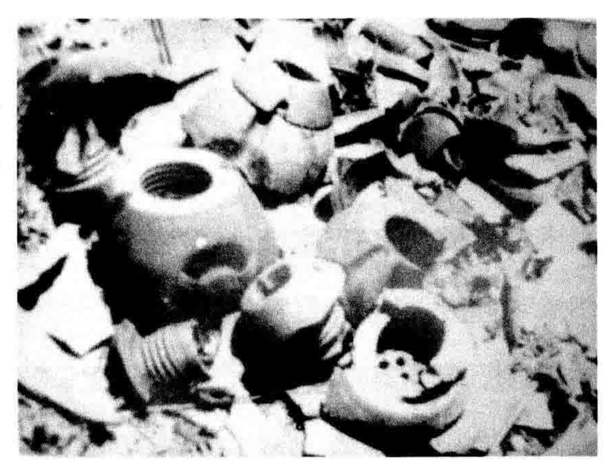


研制和装配细菌炸弹的山口班遗址



山口班地下贮藏室遗址







731 部队在败退前将土陶细菌弹壳移送至山口班外捣毁

731 部队在败退前将土陶细菌弹壳移送至山口班外捣毁

（十四）细菌工厂

1. 平房细菌工厂

该厂为 731 部队第四部，设在平房，位于四方楼一楼。本部 1 栋后面有镶瓷砖的消毒槽和更衣室。设有浴室，浴池里装满了石炭酸溶液。一楼左边是培养基室。设有冷却室、无菌室。无菌室为玻璃房，约 60 平方米，从天花板往下喷洒消毒液。细菌培养室很宽敞，墙壁全部镶着铜板，天花板上吊着两个电灯，光线暗淡。操作仪表自动调节温度。

“该部具有强大的仪器装备，分为两个分部，每一分部都能生产细菌。第一分部有以下基本设备：制细菌营养液的大锅炉 4 具，每具溶量为 1 吨；营养液消毒器 14 具，每具长 3 米，直径 1.5 米。每个消毒器内可容 30 个由第 731 部队长官石井发明的特种培养器。第一部分内有两个冷却细菌营养液的房间。每个房间内同时容下 100 个培养器。该分部内还有 5 个调温器，总共可容 620 个石井式培养器。

第二分部内有大锅炉两具，每具容量为两吨，消毒器 8 具，每一消毒器内可容 60 个培养器，此外还有其他设备。第四部内尚有保存现成‘产品’的特种冷藏器。”[①]

2. 安达细菌工厂

该厂在安达城东 38 里五区富本村鞠家窑东碱甸子小丘上。小丘高约 15 米，四周无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 年。

居民。1942 年前，该地无建筑物，为野外实验场，实验致死的动物掩埋在炸弹坑内。1943 年，该细菌工厂开始建筑。主要建筑物多为地下室，有消毒室、实验室、宿舍、食堂、浴室、仓库，还有牲畜棚圈，另有帐篷群落。

1941 年，日军在该地空投装有药品的磁炸弹，炸弹坑深面积 5 米见方。

安达飞机场为日军野外特别细菌实验场地。1943 年春，当地居民鞠守忠给日本人劁猪时，曾看见穿白大褂、胶皮靴子，戴胶皮手套、口罩的日本人出入地下室。同年冬，张子臣在场内扫雪，曾见过装在笼子里的老鼠、鹅、鸽子，还有马、牛、羊、猪。日本人不吃自己养的牲畜肉，全在当地老百姓家买肉吃。1950 年，吴殿有从飞机场内挖出 3 000 多斤家畜骨头，全卖了。新中国建立后，鞠守忠、刘兴州、杨君在飞机场烧毁的房子旁边见过装老鼠、麻雀、大眼贼的铁笼子及地下室里的玻璃碎瓶子，瓶内有黄、白色药面。

1943 年春，富本村闹过瘟疫，症状是上吐下泻。全村百余户，死亡 70 多人，黄继芳一家死亡 12 人。现在看来，瘟疫是 731 部队细菌实验造成的。①

（十五）安达飞机场

安达飞机场位于安达城东 35 公里处的富本村鞠家屯东南的草甸子上，建于 1942 年 9 月。飞机场面积为 3.75 平方公里，飞机场周围东西 12 公里、南北 17 公里内为禁区。场内有个延长百米左右的土岗，日军就着山势挖沟建地下室，约 30 多间。地面东边有仓库 5 间，北面有浴室 3 间，西南有两间板房。场内有马、牛、羊、猪圈。飞机场东南约 5 公里处有 4 个高架子。飞机场内没有跑道，但地势平坦，稍加休整，飞机可自由降落。

（十六）地下秘密工程

三家子屯的机械修配厂退休干部韩行岩回忆说，1939 年春天，乍暖还寒，他在 731 部队服劳役。一天，他们从工务班到第三现场运木料。日本人驾驶汽车，他坐在车大厢里，面朝西。汽车沿着 731 部队铁路专用线往北行驶。当走到四方楼东侧时，他看见一个洞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13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口，看样子是伸向四方楼地下的。那里有一伙人，都穿着青色棉袍，戴着瓜皮式的皮帽，看不清穿什么裤子。有2人推转着绞盘机，一条很粗的钢丝绳在缓慢地往上滑行，看来像是往上提土，挖地洞。这伙人在这儿干了好几天。

731部队工务班的白武斌回忆，1943年8月，日本监工派他和陈洪起、梁万选到兵器班干活。到了兵器班大院往北一看，远处停放着许多汽车、坦克和炮车。日本人原田让他们在一个突出地面1米高、3米见方的水泥建筑物上修个防雨棚。这个水泥建筑物卧入地下，分两层，有10多米深。他们事先准备了一些白铁皮和一根直径30厘米、长10米的钢管。这根钢管顶部焊有十字架，管头用木塞堵着。原田让他们把这根钢管下进地下，上端用木方支撑，下端用螺丝固定在一个铁架上。然后用铁皮把这座水泥建筑物盖住，但要把十字型钢管头露在外边，这是一个秘密地下室的通气管。新中国建立后，白武斌曾到那里去看过，那儿已被炸毁。那水泥建筑物底下果然是个地下室，破碎的药瓶子堆满一地，也有完好的瓶子，瓶子里还装着药水。2000年8月8日，地下遗址开始挖掘。施工人员在基址北侧发现了地下细菌实验室。细菌实验室的上半部已经毁掉，底部框架较为完整，三级台阶保存完好，同时在这一遗址内发现一个平台，施工人员在8号监狱找到了电器开关。根据专家认定，这一房间可能是细菌实验中心的防热、消毒室。8月9日，在8号地下监狱的地道里，发现了许多暖气件。专家认定，都是日本制造的。据此分析，此处可能是暖气沟或电缆沟。

1943年夏季的一天，日本监工“小胖腚”来到工务班找郑喜祥、李帮广去干活。水暖工都知道，地道黑暗，必须照亮，按惯例，李帮广准备好一盏嘎斯灯。“小胖腚”领着李帮广他们来到四方楼东侧，揭开一个洞口，走了进去。“小胖腚”路熟，让他们打开嘎斯灯，在岔路很多的地道里走了20来分钟，来到了暖气管道出毛病的地方。他们正想干活，嘎斯灯灭了。“小胖腚”去取照明工具，让他俩原地等候。“小胖腚”走了1个多小时，还没有回来。他俩担心“小胖腚”不再回来了，摸索着往外走，可是怎么也找不着出口。忽然发现头顶上有一束光线，见上面是一块欠了缝的水泥板。李帮广用力将水泥板掀开，就听“妈呀”一声，被日本人拽了上去。郑喜祥吓得返回原地。“小胖腚”回来后，见少了一个人，知道惹了祸，没干活就把郑喜祥带回工务班。下午两点

多钟，李帮广回到了工务班，脸上被打成了青紫色。后来，李帮广对郑喜祥说，他刚掀开水泥板，便被日本人从工作台上拽下一条毯子，蒙住了头，把他抬到一个小屋里。日本人问他看见了什么，他回答什么也没看见。其实他看见了几部机器的轮子都在转动，那轮子一转，直往外崩血。

一天，731 部队的车夫张有才往四方楼里送面包，早去了半个小时，没见日本人来接面包，他想亲自送进去。于是，他扛了一箱面包进了角门。他见四外没有去路，惟独迎面有个地洞口，门没上锁。他顺着水泥台阶往下走，走到底，往前看，地洞很长，洞顶间隔不远有电灯。忽然，来了个日本人，审问张有才，打了他一顿嘴巴子。又打电话叫来了翻译官春日、头目石冈。审来审去，知道他是送面包的，打了他一顿，再也不用他送面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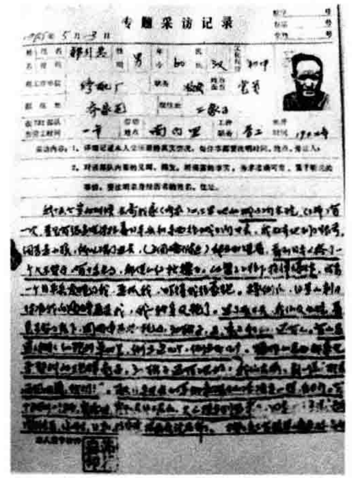
郑喜祥也往四方楼送过粮食、蔬菜。他说那些粮食、蔬菜被日本人抬进地洞里去了。

曾在 731 部队石井班喂马的朱景臣回忆说，1944 年春季的一天下午，他刚喂完马，被一个日本小头目叫到石井班事务室。屋里已有 13 个人，他们都是马厩的饲养员。工务班负责人工藤让那个日本小头目把 14 个劳工领到工务班大院去搬运水泥。工务班院子里有一马车水泥。日本人让 14 个劳工自己把眼睛蒙上，每人扛一袋水泥，送到工地去。由日本人带路，每人摸一袋水泥扛在肩上，拽着前边人的衣襟，在院子里转了几圈，拐入地下。他们感觉走了 50 多个台阶到了洞底。地道很平坦，他们走了 10 来分钟，听见了机器的隆隆声。卸下水泥袋后，他们才被带回工务班。他们知道这是一项秘密地下工程，猜测在四方楼下面，但谁也不敢说，因为修筑秘密工程的劳工都要被杀害的。日本人认为已经把他们转悠懵了，他们才幸免于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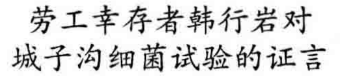
（十七）野外实验场

731 部队的野外实验场大体分两种，一种是固定的。如 731 部队附近地区的城子沟和安达、佳木斯、陶赖昭等地设置的实验场。另一种是非固定的。如在肇东县的满沟、呼伦贝尔草原、东北东部的山区等地设置的临时实验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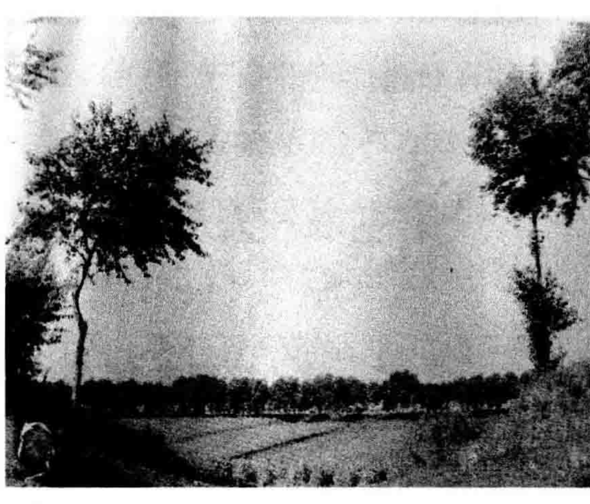
1. 城子沟实验场



专题采访记录



劳工幸存者韩行岩对城子沟细菌试验的证言



731 部队利用平房附近的城子沟辽金古城址进行细菌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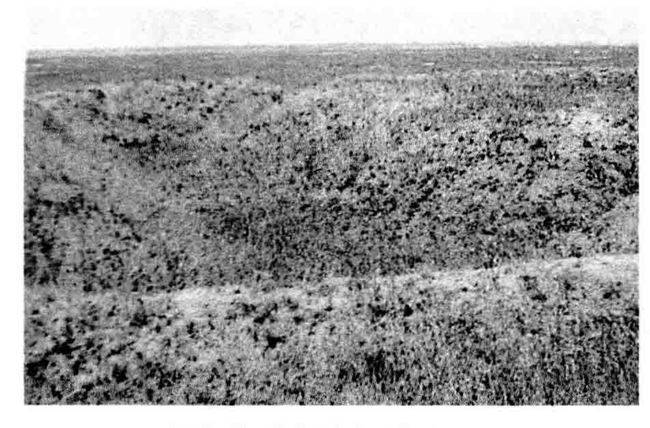


被当作毒气实验对象的幸存者傅景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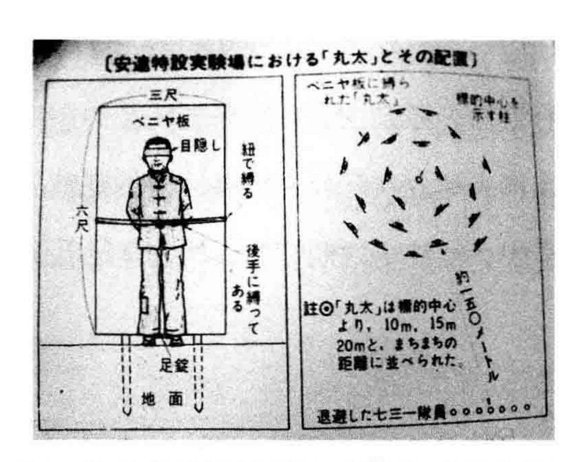
城子沟是辽金时代的古城址，方圆 9 万多平方米，四周筑有土墙，并有城门四处。距 731 部队西南 5 公里，是 731 部队的野外细菌与毒气实验场，1941 年建。

2. 安达特别实验场

安达镇位于滨洲铁路线上。1941 年，731 部队在距该镇东 18 公里处的鞠家窑附近建立了一个特别实验场，也称安达特别靶场，周围是平坦的大草原。它隶属于 731 部队第二部（细菌实验部）。地面为没有跑道的飞机场，飞机在稍加修整的跑道上，可以正常起飞。实验场本部设在距鞠家窑 1 公里处的土岗上，地下室有 4 栋约 30 多个房间，为营舍、细菌实验室、汽车库、食堂、浴池等。



安达特别实验场遗址



安达特别实验场被试验对象配置示意图

3. 陶赖昭实验场

陶赖昭实验场距陶赖昭车站 1 公里左右，是靠近松花江的一个天然沙场，为 731 部队野外细菌实验场之一，1941 年建。

第三章　人员培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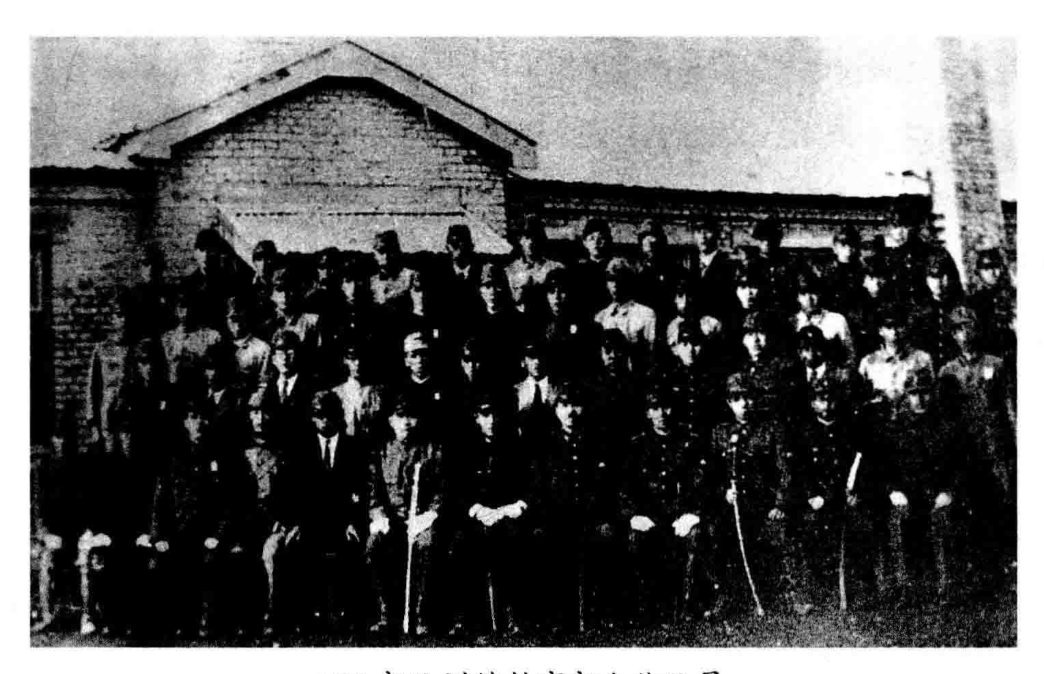
第一节　培训教育

731 部队设教育训练部，负责培养造就善于使用细菌战武器的专门人才。石井部队仅有 400 名专业人员，从事细菌战准备及实战工作，力量不足。石井四郎除从日本国内网罗有数的专家学者外，还加强了对 731 部队以及其他部队卫生兵的培养，特别是从日本国内把刚从中、小学毕业的少年逐批招来作为后备力量培养。主要向学员灌输效忠日本军国主义思想，重点传授细菌学知识，培养细菌实战人才。各类培训班不定期举行，每期参加学员 200 人左右。少年队员培训班一共举办了 4 期，每期学员人数不等，第一期有 90 多名，最后一期从日本全国各地招收了 50 多名，总共培训了数百名。学员入学要参加考试，考试及格后，大都能录取。新队员入学头一个月，先学习“军人敕语”和有关军事学知识。然后学习细菌学、生理学、生物学知识。细菌人才培养工作，关东军司令部也非常重视，据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供称：“关于培养使用细菌的专门干部一事，我应当说，在第 731 部队和第 100 部队内，确实培养过这样的干部。这些干部受过训练后就被分派到上述部队各支队及关东军各部队和兵团里去，一到作战时，这些干部就应当用去建立实际使用细菌武器的细菌战斗部队。我不知道究竟这样的干部总共训练出了多少，但我认为他们的人数完全足以供实际使用细菌战武器时的需要。[①]

---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46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据731部队训练部部长西俊英供认："从1944年7月至1945年8月止，我担任第731部队训练部长时，培养过干部并将此种干部供给本部队及各支队，以备进行细菌侵略战之用。培养干部的办法是由训练部开办各种训练班和短期班，为新从日本招收到第731部队来工作的人员（主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开办过一年期的讲习班。凡直接或从远方来本部队工作的人，均先在训练部下面受到7天的训练和训示；然后由训练部给每人一个鉴定，决定他能否在本部队内工作。在进行训示时，特别注意到使受训者保守部队工作的秘密。当我任第731部队训练部长期间，经过训示和考核的共有军官15名，自愿雇员60名，兵士150名。"①



731部队训练教育部全体队员

731部队原队员高桥在《未公开的手记》中也记载了举办细菌培训班的事："我被分配到关东军第八军团独立山炮旅第4联队，那是诺门罕战争后期的昭和十四年（1939年）11月。两年以后，我与另外1名卫生下士官一起被派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731部队）。在距哈尔滨市南郊20公里的平房本部，约有3个月时间学习了细菌传染及其防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65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疫供水和预防毒气方面的知识。参加培训的有担任研究、演习器材准备的雇员 20 余名，包括第八师团步兵第 17 联队、军直部队及陆军病院的卫生人员，共 200 名。”

731 部队 643 支队长尾上正男供认：“在我领导的第 643 支队内训练过细菌实验员干部，当我在支队供职期间总共培养出了 160 人。”①

第二节　任课教官

担任教官的都是部队军官，有高木陆军教授（数学）、羽野陆军翻译（英语）、春日陆军翻译（北京汉语）、阿部药剂中尉（化学）、斋藤陆军教授（物理）、堀内陆军助教（地理、历史）、八木泽陆军技师（博物学）、有木陆军技术员（国语与汉语）、长屋陆军文职人员（军事学）、白井军医中尉（生理学）、伊藤军医大尉（细菌学，包括细菌检查法、染色法、培养基制法、灭菌消毒法、动物解剖等。）

短期班授课内容为细菌学，教官多为 731 部队上层军官和细菌学专家。731 部队林口第 162 支队军医少佐支队长榊原秀夫供认说：“1943 年 7 月，根据关东军的命令，我去 731 部队参加对师团防疫给水部长进行的特殊防疫教育 3 天。这一特殊防疫教育是为准备细菌战的教育。其内容是：第一天上午由 731 部队长北野军医少将报告有关教育的指示。下午由总务部长太田大佐以‘细菌战的概念’为题，报告有关能使用于细菌战的细菌，即解释鼠疫菌、炭疽菌、鼻疽菌、瓦斯环疽菌、破伤风、狂犬病、霍乱菌、伤寒菌、副伤寒菌、赤痢菌、斑疹伤寒菌、流行性出血热、疟疾等病菌；还报告了攻击方法（用炮弹、飞机撒布），攻击目标为敌人的重要工业地带、兵站、飞机场、敌军高级司令部所在地、交通要道、粮库、军港、水源及部队密集的地方。第二天上午，由教育部长园田中佐以‘中日战争中阴谋破坏的事例及其教训’为题进行了造谣欺骗的报告。下午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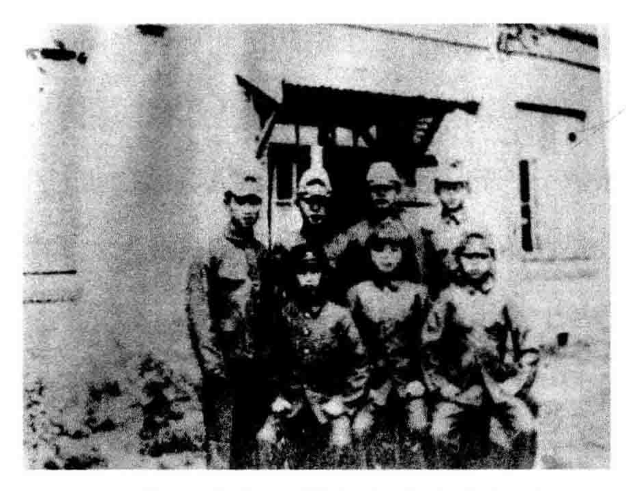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73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第四部草味药剂少佐以‘毒物中毒’为题，报告了关于清酸、砒霜、磷、硝酸奎宁、升汞水等中毒问题。第三天上午，由四部河岛药剂中佐以‘简易毒物检查法’为题作了报告，并参观了消毒车的实际演习。结束后，我向部下进行了上述内容的教育。”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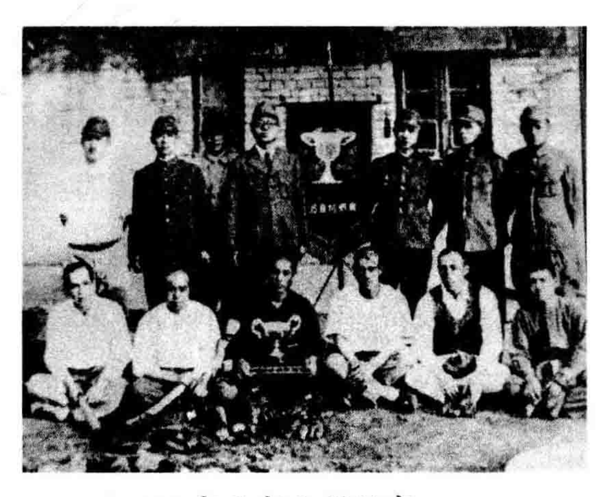
第三节 学 员

短期班学员包括关东军的卫生部军官、下士官以及本部、各支部的军属（日军里的文官）、士兵等，这些人不定期参加细菌学培训。

到 731 部队学习的少年队员们集训时间至少 3 个月，最长 1 年。这些学员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他们的家庭的经济状况都不富裕。第二，少年们在国民学校(现在的小学)学习时，都是成绩优异、头脑聪颖、好学心切、求知欲旺盛的学生。”② 关东军司令部或 731 部队教育训练部派遣少年兵到日本国内各地招生，他们诱骗那些想升学但又读不起书的少年们说：“到军队里来当少年见习技术员吧！”



731 部队少年队员在东乡宿舍门前



731 部队部分判任官

当时，家境贫困、无力升学的少年们只知道到军队里当见习技术员有若干好处：其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6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 168 页，群众出版社，1984 年。

身份是部队文职人员、能挣工资、吃住有保障，还有学校。再加上那个时代，日本全国都向青少年灌输“要为国家效力”的思想。因此，在校方和 731 部队的劝诱下，许多少年们都应征入伍了。

当时，少年们对部队的工作性质一无所知，而应征入伍的条件极具诱惑力。731 部队是神秘的。秋山浩是第 4 期学员，仍然不了解 731 部队的工作性质。他描述说：“我想知道的关于工作性质的问题，他（仲野雇员）并没有作一点具体的说明。然后，交给我 350 元所谓置装费……这 350 元置装费，在当时的确是一笔巨款……当时的情况是：一个邻居的长子，从中学毕业，在村公所工作，每月的工资才 35 元；一个小学校长，每月工资也不过是 100 元上下。”①

后来，731 部队有不少少年队员描述了离开日本去哈尔滨平房的情景：

731 部队原少年队员鹤田回忆说：“我们 90 名首批少年队员是 1938 年末来到这里的，当时少年队舍尚未建成，就住在这本部大楼一阶西头，共分 3 个班，每个班占用 2 个房间。我在第 2 班。石桥先生当时在第一班。”

鹤田和石桥等首批少年队员多数是千叶县加茂地区的人。当时他们没有专门的教室，只好利用宿舍上课。他们每天到第 2 栋的集体食堂去吃饭。原少年队员北岛信夫保留了首批少年队员的一张照片，他说：“我是 731 部队早期的少年队员……（和我同期队员现在在世的有）田村良雄、石桥直方、鹤田兼敬……这张照片是我们入队集训结业时在训练教育部事务所门前照的。为留作纪念，我是在撤退时上级不让携带的情况下，偷着保留下来的。”经过 3 个月集训，就被分配到各个班了。

经过 1941 年关东军的特别演习和同年 12 月 8 日爆发的太平洋战争，这批少年队员中的大多数都转移到中国南方日军其他部队，当然还是卫生兵。

其实，首批少年队员还应更早些，只是招兵时打的旗号不一样。在哈尔滨“南栋”期间，731 部队就招收了一批飞机少年驾驶员，事实上这批学员集中培训，主要学习细菌学，结业后从事细菌研究、实验或生产工作。据日本军医镰田回忆：“1937 年 3 月，

① 〔日〕秋山浩：《七三一细菌部队》，第 3 页，群众出版社，北京编译社译，1982 年。

我从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毕业，那年我 14 岁。增田药剂大尉和降旗军医大尉回日本岩手县来，为石井部队招收飞机少年驾驶员。飞机驾驶员是青少年羡慕的职业，加上两位大尉对‘从少年培养必要性’和部队优厚待遇的宣传，我高兴地报名参加应征。本来经身体检查因我耳聋而不合格，但岩手县出身的增田大尉从我聪明这点，发表了倾向性意见，降旗大尉也同意以少年军属的名义招收了。我和其他应征人员来到哈尔滨，先在部队的吉林街联络站接受政治审查并办理入队手续，然后集中在‘南栋’集中培训 7 个月，于那年 10 月我们被先后分配到北川班、高桥班、降旗班、笠原班。我被分配在‘降旗’班，作为鼠疫、疫苗的研究助手，和我一起去的还有金野、松本、吉田军医……我不知道是谁把跳蚤确定为鼠疫传染媒介物，反正我去时，就有田中技师指导我们繁殖它。”

据原 731 部队少年队员小笠原说，1943 年 4 月，日本九州有一批少年队员参加了日本陆军少年航空学校的招生考试，并体检合格，正待入学时，却取消了录取通知。九州宪兵队的小仓说关东军军部命令这批学员直接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去工作。小笠原不得不随应招的 20 多名少年队员应征入伍。他们从下关港乘军用轮船到朝鲜的釜山，再改乘火车抵达新京（长春）。在关东军司令部接受面试时问他是否愿意做飞机，他说：“愿意”，就合格了。4 月中旬，他们被送到 731 部队本部平房教育训练部受训。集训两个月，学习细菌学、生理卫生学、生物学等专业知识，而后让他们在飞机上投撒细菌。

1942 年 4 月，731 部队从日本北自青森县南至鹿儿岛县招收了 107 名少年队员。这批少年队员起程时，憧憬未来理想的工作，内心十分激动。一位少年队员回忆入伍时的情景：“……火车开动了。‘万岁，万岁！’‘好好干呀！’”他的哥哥送行时也嘱咐说：“你要好好干！”当时，这批未脱稚气的孩子们，还有他们的家长根本就不知道 731 部队是一支特殊部队。

1945 年 4 月，731 部队从日本国内招募了 50 名学员，这是第四期少年队队员。山内应征入伍后，乡亲们送行时，都说他谋到幸运的差事，他也表示干出个样子来。到哈尔滨平房集训 3 个月被分配到细菌生产班，见到生产人员个个提心吊胆，山内产生了极度恐惧的心理。

部队对外绝对保密，队员写家信必须经过宪兵室检查，工作、学习、部队驻地等秘

密都不允许透漏，只能写“工作顺心”、“身体健康”一类的话。寄钱也不准多寄，怕高薪收入引起家人的怀疑。工资结余部分由部队统一储存起来。结果在溃逃时，那些存款全报废了。

从 731 部队原少年队员的回忆来看，办班日期及培训班人数都不一定确切，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少年队员们都是被诱骗来的，都是以学习细菌学为主，最终成为 731 部队进行细菌战的工具或牺牲品。

第四节　学习活动

少年班为讲习班，管制很严，讲课是枯燥的。一个担任班长的 731 部队原队员描述说：“那是一种填鸭式的教育……上课的时候，有教育部的人拿着木枪站在教师的后边监视着学生，看到有要打瞌睡的，马上就给他一木枪……可是少年们都有一种‘要成为国家有用之材’的责任感和求知欲……他们从未被难以理解的课程所吓倒，进步的速度是惊人的。”

初入学时，队员们都能专心听课。化学分子结构式使基础薄弱的少年队员感到力不从心；刺杀术、格斗术等特殊军事训练使队员感到讨厌，但是队员们学习都很满足，部队每月都发工资，免费住宿、吃饭，成绩优异，还可以继续深造，成为医务人员。孩子们暗自高兴：“来到这么好的地方，决不能掉队。”[①]

可是，一接触到细菌生产，特别是人体实验，干些伤天害理的勾当，而且细菌实验对操作人员也很危险，队员们就为选错了职业而后悔，但是严格的管制，谁也不敢离开。

细菌学、免疫学实习课在 63 号楼左侧二楼进行，使用显微镜。显微镜的数量和种类相当多。实验室靠窗处，有一排计算机式的镜检台，台上有本生灯和 150 余台奥林巴斯牌光学显微镜。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 172 页，群众出版社，1984 年。

队员们都穿着白色防疫服，戴上防护帽和防毒面具。每人的桌子上都放着一台显微镜和实验器具、药品和消耗品。教官让学员随便看显微镜。把细菌标本放入显微镜中，接通电源，细菌的周围就变为黑色，细菌就开始游动。在教官的指导下，学员们吸收了很深的细菌学知识。为配合讲解，还在暗室里放映细菌实验方面的记录影片。影片是设在哈尔滨市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拍摄的，它映出了731部队在我国华中战线某城市投放细菌武器的具体场景：机场上，一架关东军的双翼上插着太阳旗的九九式双引擎轻型轰炸机旁边，地面勤务人员正在往飞机里搬运炸弹样的东西，炸弹样的东西装了15～20个以后，一个航空兵晃着小白旗通知飞机起飞，掠过广阔的原野，“好象是在中国大陆某处都市的上空”，[①]轰炸机打开了弹舱，连续投掷小型白色容器样的东西。投掷完毕后，出现了中国某地的街道中国军队医务人员消毒的镜头。几秒钟之后，飞机返回基地，出现了日本卫生兵拿着喷雾器消毒的镜头……

学习结业后，由考核官写评语，一般都是“良好”或“优良”，一些刻苦学习的学员，得到“成绩最优秀”的评语。接受细菌专家的教育和训练，他们畸形成长，变为魔鬼部队的接班人。

第五节　实　习

少年队员完成基础课学习之后，就被分配到各个班实地学习。少年们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目睹了各种残酷的情景：活体解剖、冻伤实验、真空试验室里的实验、抱小孩的女“马路大”、戴着脚镣子干活的“囚犯”……，种种场景令少年队员感到心情阴郁，彻夜难眠。最可怕的是让少年队员们实际操作：

731部队原少年队员镰田回忆说：

“（繁殖跳蚤时），每个鼠笼里放有20只疫鼠，每只疫鼠上附着千余个跳蚤，当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136页，群众出版社，1984年。

疫蚤培养成以后，那些疫鼠就死了。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把疫蚤收进专用盒里带走，再把死鼠用火烧掉。我还从实习角度参加过对活人进行细菌传染的野外试验，试验对象都是健壮的'马路大'，这样才能了解真实的细菌传染效果。因此，'马路大'平时的营养要绝对保证，当然这是特别班的事。我们研究班多是在野外搞'雨下试验'，也就是把霍乱菌液或者伤寒菌液装进喷撒器里，到空中往下喷撒。经过验证，用这种方法喷撒霍乱、伤寒菌效果好，但不适用于鼠疫菌。"

参加各类培训班的学员都安排实习，其实习过程也就是各类实验过程，沾满了中国军民的鲜血。

高桥在《未公开的手记》中也介绍了实习的情况："我们200多人以实习的名义去了齐齐哈尔，参加了北大营举行的一次对'马路大'的毒气实验的实习，第二天返回平房。"高桥还听说，731部队把"马路大"当作了细菌实验材料，同时，还把人肉掺入菜食里让人当作猪肉吃的事。

潞安日本陆军病院军医汤浅谦原是一名内科军医，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医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上级要求医生成为多面手，汤浅谦极想成为一名外科专家。为培养外科医生，日军经常安排手术训练演习。汤浅谦讲述了他参加人体解剖的实习经过：

"我是以实习名义参加的培训，那是第一次，我们解剖两个男性中国人，他们都是从一个叫野良的地方抓来的，其中一人比我个头高，宽脸盘；另一人比我个头矮，是一位40多岁的普通百姓。他们分别地被推上并排摆着的两张手术台上绑好，我和另一名军医按照一名外科军医的指导进行操作。没给打麻药，简单地用消毒棉抹一下，直接地把腹部切开，疼得他俩哎呀哎呀的直叫，当摘出第一件内脏器官时，那两人都不叫唤了。随着解剖的程序，担任指导者的师团军医部长讲解消毒、切腹、摘除器官和缝合的方法。就这样，两个无辜的中国人变成了我们实习的实验品。在解剖标本装入玻璃容器里的同时，那表面上似乎完整的躯体被送进焚尸炉烧掉。在我以后的三年军医生涯中，又解剖了12名中国爱国者，可以说练就了一身外科军医的高超本领。"

少年队员们自身还要进行实验。有一次，队员们在吉村班做冻伤试验：他们面前有几个装满了水的水槽。水槽里放有温度表，还有几根电气导线。在实验室的一角，有空

气压缩机在旋转。教官让队员们把双手放到水槽里边反复进行实验，直至队员们感到刺痛，“冷劲儿过去了，皮肤疼痛”为止。若是“马路大”的话，实验还得继续进行下去。[①]

第六节　队员生活

731部队少年队员作息时间严格。早6时起床，到练兵场集合做早操。白天安排课程学习和军事训练。对于学员来说，“731的日子，是一连串的惊叹，一连串的斯巴达式的训练和学习。”（原少年队员语）

731部队是日本陆军中伙食最好的一支部队，因为这是一支制造大量细菌的部队，制作细菌需要丰富的营养，养肥老鼠和“马路大”也需要大量的高级食物，以备细菌实验。鉴于此，731部队领到了大批肉类、果类、糖类、面粉、大米、小麦等物资。部队伙食标准按官职高低来制定，分高等官、判任官及普通队员两等。少年队员的伙食也很好，经常能吃到猪肉、白米饭及各类蔬菜、水果。这对来自农村的贫穷少年来说，是梦寐以求的盛馔。



卫生兵在进行担架救护训练

“为了使少年队员亲身体验一下清洁的概念和大小便与防疫的关系”，731部队少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群众出版社，198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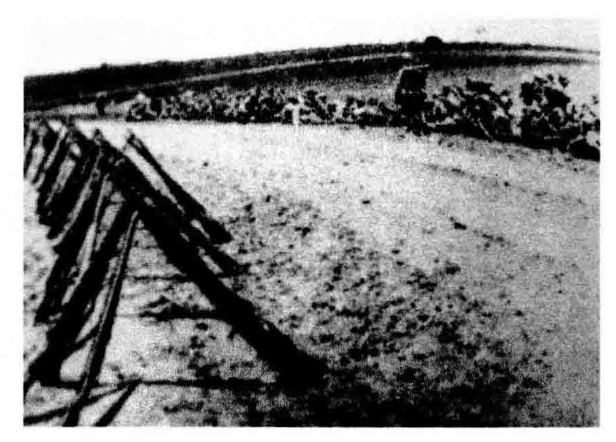
年队员的宿舍没有卫生间，室外厕所由值班队员清理，冬季清理厕所，溅一身粪沫，被火炉融化后，散发出一股臭味。用仓库改造的宿舍也比较寒冷，少年队员生活起居条件相对偏低。

少年班各班班长由教育训练部选派擅长刺杀技术的下级军官（雇员）担任，其任务是管理训练少年队员。对那些行动自由、衣装不整、成绩低劣的学员进行说服教育。有些班长管理失当，严格制裁有不良行为的少年队员，动辄训斥、体罚。有的少年队员的面颊被班长用皮带打得红肿发紫；有的被打掉了牙；有的让脱掉裤子，用枪柄猛打他的屁股；也有被烫伤的，被打得口鼻流血的……，种种体罚，引起学员的强烈不满情绪，甚至反抗。①

秋山浩在《731 细菌部队》一书中记载了少年队员殴伤一个叫小宫的班长事件："大家商量好，在熄灯后，当值勤的小宫来巡视时，瞧着适当时机，由林田来作个信号，以便开始行动……林田躺着把小绳缠在手指上，这根小绳的另一端即拴着立在那里的木枪枪托上，一拽小绳木枪就会倒下，以此作为信号"。小宫进来后，大声呵斥，触怒了林田，他一发信号，好几个人用木枪朝着小宫打。小宫被打得满脸是血，逃到外边。小宫在慌乱中，把步枪上的菊花徽章碰坏了，这是使用武器的大忌。因此小宫还受到了"降级处分"。



卫生下士官在进行队列操练



卫生兵野战演习

填鸭式的教学，严格的训练、制裁所有这些，在 731 部队少年队员来说算不了什么，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群众出版社，1984 年。

使队员们感到恐惧的是无时不在的细菌。一接触细菌实验、生产，少年队员们就感到恐惧，为选错了职业而后悔，秋山浩描述说："在培养细菌工作中，连一瞬间也不能疏忽大意。偶一不慎，弄掉试管，或在移植的时候万一失手，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在不知不觉之间，指尖或皮肤沾上细菌，就会立刻感染上细菌，以致丧失生命。并且，身体上沾上细菌，因为肉眼看不见，事后无法察觉，这就是我们所以一直不得不经常在神经紧张情况下生活着的缘故。"[①] 在实际操作中，不少人感染了鼠疫、伤寒，有的死于非命。有个队员感染了鼠疫，而自己怀疑得了性病，不好意思去检查治疗，结果不治而亡。原少年队员镰田以实习的名义对患鼠疫的尸体进行解剖，不慎感染了鼠疫，被送回日本治疗。11 个月后痊愈，又返回 731 部队。还有一个豆包事件：731 部队，作实验材料用的面粉、小豆、砂糖很多，高压蒸气也很充足。各研究室的队员们都自己做豆包当夜餐吃。有个队员吃了豆包，感染了伤寒病，高烧到四十三、四度。后被送进医院治疗。这个队员回忆："黄色注射液的效用，在于使人体内部产生高烧……用高烧和白血球的力量把伤寒菌全部消灭干净。"这个队员住了 4 个月医院后痊愈。奇怪的是他的大脑比发病前更清楚了。军医解释说，这是因为高烧把脑子里的毒素和体内细菌全部烧死了的缘故。

整日被细菌包围着，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少年队员们都提心吊胆，疲惫不堪，产生强烈思乡甚至逃跑的念头。不过，在严密控制下，他们只好把愿望埋在心底。

他们惆怅，沉闷，经常躺在被窝里暗自以泪浇愁。他们给亲人写信却很少接到回信。在他们眼中"夕阳也太凄凉了！"（秋山浩语）

731 部队原少年队员岛田道出了在日军败逃之际的心情，他们早就为落入这个杀人魔窟而后悔，此时更痛悔万分了。他回忆说："当听说部队让我们少年队员提前撤退的消息后，高兴得没有一点睡意，连夜准备携带行李和途中需要的食品。心想，我们不久就可能与父老兄弟团聚了……"可是一次杀人灭口焚尸行动，使队员们的提前回国的希望成为泡影。

这种压抑感、厌倦情绪、思乡念头在少年队员心中是普遍存在的。

---

① 〔日〕秋山浩：《七三一细菌部队》，第 80 ~ 81 页，群众出版社，北京编译社译，1982 年。

第四章　细菌研究

第一节　起因与目的

细菌战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和发动的，是其侵略战争中的一部分，细菌研究是适应细菌战的需要而进行的，其研究活动自始至终都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上层集团的领导和统筹规划下完成的。

多年来，日本军、政、财阀沆瀣一气，不断扩张侵略势力。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使日本额外获赔白银2亿两，尝到了战争的好处。但在日本人眼中这场战争算是小规模的，实质上正是这场战争使日本从民主主义、国家主义蜕变为帝国主义，跻身于世界列强的行列。1904 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夺取了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侵华野心进一步膨胀。1927 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上呈给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中写道：“惟欲征服支那（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大陆政策”的出笼，从理论上提供了侵华战争的依据。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 年所谓“七七卢沟桥事件”后，日本完成了对整个中国的侵略。

但是，日本毕竟国土小、人口少、兵员不足，又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制造武器，难于承担大规模的战争。鉴于此，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另谋出路，把目光放在研究制造细菌武器上。有学者说，日本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了细菌战的准备和计划工作。据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供认，日本军在 1918 年 11 月前后开始研究细菌武器。后来，东京科学研究局伊藤工学博士受命研究细菌武器，而因工作不力被逮捕法办。正在日本军国主义当局苦于缺乏这方面人才之际，石井四郎应运而生。身为细菌学专家的石井四郎把进行细菌战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到处宣扬说：“各强大国家都在进行准备细菌战工作，日本若不进行此种准备，那它在将来的战争时会遇到严重的困难。”他献计说：“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他还说：“从战略作战的观点

来看，细菌武器乃是一种很有利的进攻武器。”在这种氛围下，石井四郎提出细菌战的构想，与日本当局及一批军国主义分子一拍即合，得到大力支持。在日本陆军省军务局课长永田铁山大佐、日军参谋战略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大佐和日本陆军省军医署课长梶塚隆二等人的推荐与支持下，日本天皇批准了石井四郎细菌战的主张，于1932年8月，在东京若松町陆军军医学校成立细菌研究室，石井四郎开始进行细菌研究的罪恶生涯。石井四郎所进行的细菌研究和实验、生产工作是紧密相关的，就其专门性质和特别内容来看，就是“要探求和制造细菌武器以及研究使用此种武器的方法。”[①]而根本目的就是发动和进行细菌战。石井部队入侵我国后，其在日本以细菌研究为主的准备阶段转为以实验和实战为中心的实施阶段。1933年8月至1939年7月，石井四郎部队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实验活动。1939年7月至1945年8月，石井四郎部队在继续进行细菌实验活动的同时参加了我国各地的细菌战。期间，石井部队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大本营、日本天皇的授意和支持下进行的。

在日本，细菌研究工作之所以受到重视，其根本原因就是它顺应了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需求。石井四郎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被发现、成长起来的。他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的器重，以细菌专家著称，极力主张细菌战，一手创立了731部队。据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供称“第731部队是石井四郎一手创立的。”尽管他生活放荡、劣迹斑斑，又因贪污军费而被撤职，但出于细菌战的考虑，日本当局还是再次起用了他。1945年“他又被任为该部队长。”[②]换句话说，他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最合适的人选。同样，731部队也成为最受日本军国主义当局重视的特殊部队。据山田乙三供认“第731部队受关东军司令部管辖，这是在该部队成立时就由日本陆相明令规定了的。”[③]但是该部队“供研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431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46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③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91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究和生产细菌武器用的经费，是由日本陆军省拨给而经由关东军司令部支付的。经费数目以及拨款方式等详细情形，我（山田乙三）却不清楚。”[①] 甚至该部队对于某些局部问题可以越级上报，“如研究某种细菌武器效能的报告，视其内容如何，或呈报给帝国大本营，或呈报给陆军省，或呈报给军医研究院。”其建立、迁移乃至人员编制都是奉日本天皇裕仁的敕令实施的，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性、特殊性。

第二节　机构人员



731 部队长石井四郎

日军 1918 年 11 月开始研究细菌，当时长谷部将细菌战作为主要问题向参谋本部汇报。此后，由陆军省医务局开始研究，局长伊藤工学博士，参加研究的专家有 40 人。1932 年 8 月，在东京若松町军医学校内成立了细菌研究室，由石井四郎负责，配备 5 名助手。1933 年，对细菌研究室进行了扩建，改成为防疫研究所，成为日军准备细菌战的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102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研究中心。1933 年 8 月，在哈尔滨南岗区秘密设立了细菌研究所，其附属实验场设在背荫河。1938 年迁至哈尔滨平房镇，第 1 部为细菌研究部，也称基础研究部。部长菊池军医少将，其前任依次是田部井和、北川正隆。管辖秘密监狱，关押受细菌实验的人，下设研究班，由佐级军医或技师任负责人。有笠原班、田中班、吉村班、江岛班、高桥班、二木班、凑班、草味班、田部班、内海班、岗本班和石川班、野口班、川上班。



731 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

在日本，细菌研究的核心人物是石井四郎。他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后从军，任军医，官阶不断晋升。1924 年，石井四郎以军队委托生身份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主要学习和研究细菌学、血清学、病理学、预防医学。1927 年 6 月，他获得微生物专业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是《革兰氏阳性双球菌的研究》。他凭借对细菌的研究，以专家身份提出细菌战的主张。他在欧洲大陆考察时，对欧洲 1348 年爆发的鼠疫很感

兴趣。这次鼠疫几乎席卷整个欧洲大地，死亡 2 500 万人。石井四郎以此为借鉴，疯狂研究发展细菌武器。他多次提出细菌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并到处鼓吹宣传。他的理论是"军事医学不仅仅是治疗和预防，真正的军事医学的目的在于进攻。"他对部下说："将来的战争必然是科学战，其中的细菌战尤为重要，因此必须努力研究细菌武器，发展科学是没有国境的，但研究者必须为祖国而积极研究。"他的研究发展到人体实验，形成了一整套以鼠疫研究为中心的罪恶理论。他说："鼠疫流行病在自然条件下是容易发生的，但要用人工办法来造成流行病却就不那么容易了。原因是，仅有传染源和传播媒介还不足以促成疾病的流行，为此还要明白知道人的生理条件和生理特点。只有在研究人的生理特点条件下，才能知道用人工办法引起疾病的流行的条件。研究生理特性的工作，是要用活人作实验的。进行这种实验时用的是中国人，它既可以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也可以在野外条件下进行，这就是本部队的秘密中的秘密。"石井四郎的研究取得了很高的成效，他向参谋本部报告说："第 731 部队已研究好了用感染鼠疫菌的跳蚤作为细菌武器的方法，说这方面所达到的成绩可以大规模地实际应用于战争目的。"[①] 其研究水平是相当高的。

当时，日本地方卫生试验所的研究经费很少，而 731 部队有充足的研究费，它以优厚的待遇和人体解剖、活人实验等研究条件吸引了一批中、高级医学人才，如医学博士川岛清、太田澄、增田知贞，病理学博士增田美保、吉村寿人等 400 余人，集中了各研究所及大学的有名学者进行细菌研究工作；同时举办各类培训班培养细菌研究后继人才，用以满足细菌战的需求。

细菌研究工作由关东军司令部直接领导，从组织到经费都有保障。据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供认："为了研究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曾组织有几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为关东军参谋长，作战部长，第 100 细菌部队长或 731 部队长以及司令部的个别军官。各专门

①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第 41 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

委员会主席由参谋长担任。”经费由“日本陆军省拨给而经由关东军司令部支付。”[①]

第三节 研究活动

一、研究内容

石井四郎及其部下几乎对当时所拥有的各种细菌及烈性传染病进行了研究。它包括鼠疫、霍乱、炭疽、赤痢、伤寒、气性坏疽、猩红热、流行性出血热、百日咳、性病、结核病等等。为配合研究，提供实验材料，731部队关押了大批的活人，饲养着鼠类、跳蚤以及马、牛、羊、鸡、鸭等动物，还有麦子、高粱、苞米等毒株植物。

与此同时，731部队也研究防疫各种细菌和烈性传染病的疫苗。渡边博士利用超声波装置研究细菌学，取得成效，在《石井纪要》上发表过许多实验报告，引起学术界和石井四郎的重视。石井四郎千方百计地把渡边博士调到731部队，委派他领导菌苗班，专门研究制造各种疫苗。

该班用半年时间改良霍乱菌苗，取得了初步成绩。渡边博士的助手山内丰纪供认：“防疫研究职员约有80名做了接种（霍乱菌苗）试验，成绩良好。”该班供给关东军需要的菌苗，“即伤寒、副伤寒、四种混合菌苗及赤痢菌苗、霍乱菌苗、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菌苗等各60万人份，保管3个月就放弃，然后另做新的。”[②]该班还“就各种伤寒菌苗及军医学校伤寒菌苗之效果进行了研究，并就传研（传染病卫生研究所）、北研（北里卫生研究所）、卫研（大连卫生研究所）菌苗和军医学校菌苗之效力，作了研究报告。同时还和江岛技师共同研究赤痢本型菌耐久培养法，但没得出结果而终止了……（1939年）10月末，在北满孙吴发生病原不明之热性传染病，由部队编成调查班进行调查，班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97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75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长是渡边博士，同时命令我也参加。到孙吴陆军医院，约逗留 3 周，收集各种材料进行研究，但未得到什么结果，结论是‘大概是滤过性病毒’”。[①]

二、细菌研究会

日军军医中尉秦正氏供述了 731 部队细菌研究会开展活动的情况，他说：

“这个研究会是 731 部队长北野主持的，平常每个月召开一次。参加的人除了经理官、卫生军官以外，各部少尉以上人员及相当于少尉以上的技师都可以参加。平常只有四五十个人参加研究会。在研究会上发表的主要是各部门一个月来研究工作的报告，但不一定每个部都要报告。在我参加的期间，发表研究报告最多的是第一部关于武器生产的基础研究报告。发表人主要是二木技师、高桥正彦军医少佐、吉村寿次等人。我自己在这个会议上做过两次补充报告。1945 年 1 月，高桥正彦报告了关于用 3 名中国人注射鼠疫菌，使其发生肺鼠疫和腺鼠疫后，用日本制的磺胺剂试行‘治疗’，终于使其死亡。我当时正译苏联关于鼠疫研究的论文，以此内容作了补充报告。1945 年 1 月间，第 1 部吉村班武藤技师用一名中国人，用很多的食盐的增加将使基础代谢提高的结论。在武藤做这个报告时，我提出了‘基础代谢的提高有潜伏期吗？’从而帮助了他的研究。”[②]

三、资料翻译

日军军医中尉秦正氏是细菌研究会成员，他在 731 部队一年期间翻译了 150 篇有关细菌方面的文章，主要译的是流行性传染病、营养学及捕鼠方面的书刊，这些翻译作品是细菌研究会的参考资料。

731 部队细菌研究会借助翻译资料搞人体实验。秦正式供认：“诊疗部长永山太郎军医大佐，对于染患炭疽的爱国者，实行了各种‘治疗’之后，终于使之死亡，我翻译的‘炭疽的二例’中的治疗法，曾被永山用来进行试验。”他在另一份供词中说：“1944 年 12 月前后，我介绍了苏联医学关于‘瓦斯坏疽治疗血清力价测定’及其他瓦斯坏疽的治疗的文件约 3 篇，唆使第一部二木技师进行了如下残忍实验。即二木以我所翻译的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75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11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材料为基础材料，提高菌毒力的研究。于1944年12月前后，将一名中国爱国者的大腿局部切开，在刀口的一面接种上瓦斯坏疽菌，在刀口的另一面接种上坏疽菌和沙土的混合物，然后对两边的发病状态作对比研究。确认了沙土混入可使瓦斯坏疽病毒力增强。被实验人的肢体肿胀得非常厉害而陷于坏疽的状态。然后施以外科的切开手术及其他各种'治疗'，终于使之死亡，尸体由诊疗部的所军医中尉作了病理解剖。"[①]

四、观看影片

为731部队细菌研究会放映细菌实验的影片作为参考资料进行人体实验。1944年12月前后，在北野政次部队长，第二部部长碇军医大佐指挥下，在安达实验场进行了一次实验。这次实验被拍成影片。影片内容是："将约6名爱国者戴着脚镣从押送的汽车上拖下来，将他们倒背手绑在间隔约20米的木桩子上，叫他们跪在地上……(然后)，飞机从100 ~ 200米的高空投下炭疽菌的细菌弹，随着细菌弹的爆炸，使纯粹培养的炭疽菌散布在这几名爱国者的鼻子、咽喉的粘膜上。"[②]影片放映数日后，诊疗部永山太郎军医对1名爱国者进行了炭疽菌实验，致使这名爱国者死亡。

第四节　研究成果

一、石井四郎的"发明"

（一）石井式滤水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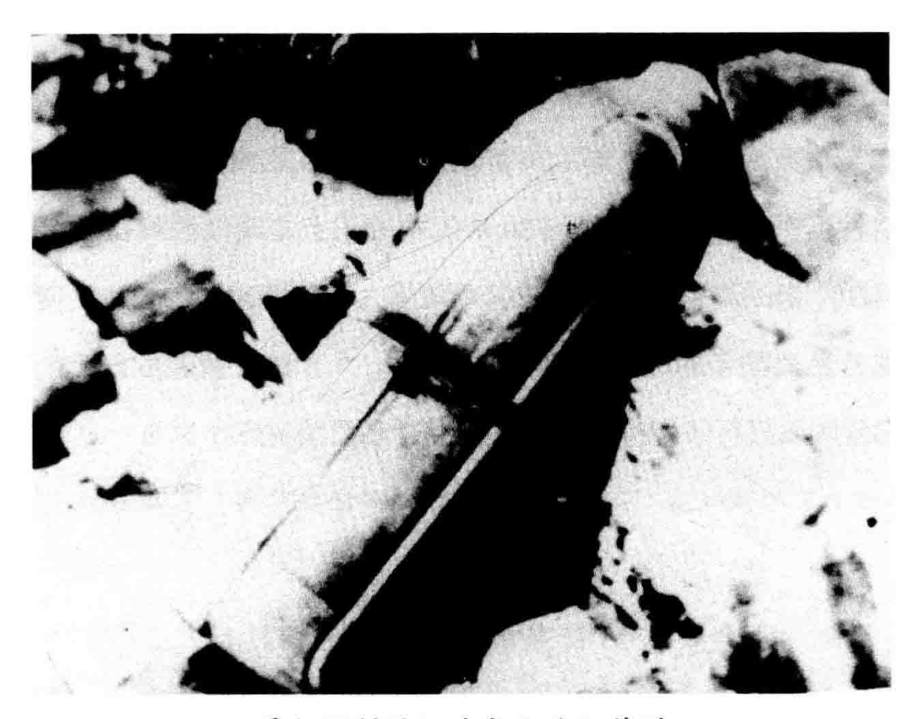
石井四郎任陆军中佐时借鉴19世纪欧洲细菌学家巴斯德的弟子张伯伦所发明的家庭日用品"沙滤缸"（在实验室里使用时称"过滤烛"），发明改进了滤水器，以备进行细菌战防护之用。这种过滤器为硅藻土烧成的瓦器，让水通过瓦器的细微粒子，排除细菌，确保饮用水的清洁。为推行滤水器，石井四郎曾在参谋本部附近池水塘进行试验，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73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72页，中华书局，1989年。

在众参谋面前，将池水盛进滤水器里加以过滤后，他当场喝下，证明没有细菌。另据说石井四郎曾把自己的尿用滤水器过滤成清水，带到陆军参谋总部，当众喝下。滤水器由“帝国医疗株式会社”承担生产，以后又经过多次改良，制成各种规模的滤水器，大的为汽车上的水槽，小的像水枪般大小，可随身携带。当时，日军在作战期间携带这种滤水器。后来，这种滤水器被淘汰，因为它阻挡不了病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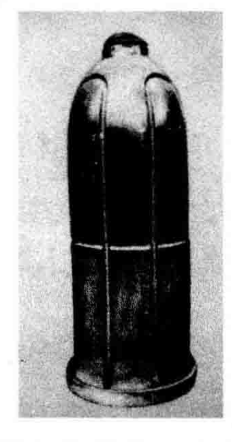
（二）石井式陶瓷细菌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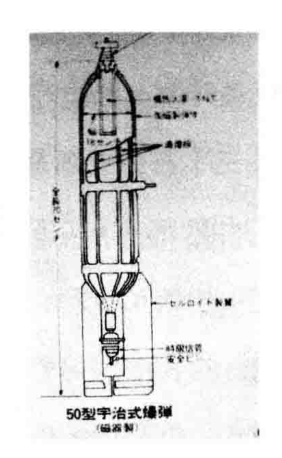
最初研制的石井式土陶细菌弹

石井四郎设计出以陶瓷或硅藻土烧制的弹壳，用少量炸药从外部引爆，爆炸时热量小，不会伤害弹壳内的细菌或带菌跳蚤。731 部队原队员濑越说明了陶瓷细菌弹的制作过程：“先将泥土碾成土粉，渗上水，然后将其制成具有必要密度的泥浆，把这种泥浆灌进到特制的石膏模型内去。这模型是炮弹式的。因为石膏能吸收水分，于是这泥浆外层就干硬起来。以后把石膏模型取下来，并把里面剩下的泥汁倒出来，就得到炮弹壳样式的陶器。然后把制好的炸弹壳放到特备的炉里去烘干。这种炸弹长七八十公分，口径为 20 公分。下面有一个螺旋孔。弹壳里面是空的。螺旋孔是预备安放雷管的。这种弹壳外边刻上有一些曲线槽沟。炸弹顶端有一些安放调剂降落器的设备。在弹壳里面那些

沟槽里放上炸药，炸弹就是借此爆裂的……


最初研制的石井式土陶细菌弹


为引爆细菌弹而用的瞬发信管



宇治50型细菌弹构造示意图

这种炸弹里面放的是装有鼠疫跳蚤的磁瓶子……这种炸弹壳是陶瓷制品并且很薄，只要放上很少炸药就行，所以爆炸力不大，结果使跳蚤免于死亡，因为无论爆炸力，空气抵抗力及热度都不能对跳蚤发生什么实际影响。”①

梶塚隆二供认了这种细菌弹的实验结果，他说：

“据石井说……将细菌直接装在飞机弹内投散的方法是很少有成效的，因空气阻力强大以及温度过高的缘故，像赤痢菌、伤寒菌、副伤寒菌、霍乱菌、鼠疫菌这类不大坚韧的细菌，几乎是百分之百地死去……至于炭疽热菌一类最坚韧的细菌，石井说可能用这种方法去使用……石井向我叙述说，不能从高空散布细菌，否则细菌统统死掉，说细菌只能在500公尺以下投掷，但在低空投掷时，细菌散布的面积又太小……石井告诉我说，在敌区散布霍乱菌，不仅效力小，且难于实施。第一，因为细菌要低空投掷，但在低空投掷便使敌方能自由地扫射飞机；第二，因为使用这种方法就需要有极多的细菌……效力更大得多的投掷法是不把细菌赤裸裸投掷下去，而是把它同媒介物，即虫类，特别是同跳蚤一块投掷下去。跳蚤是最富有生命力的虫子，把跳蚤染上鼠疫后，就从飞机上投掷下去，而寄存在跳蚤体内的鼠疫菌，便能顺利地同跳蚤一起落到地面上。这种情况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405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就可减少飞机有被敌方高射炮击落的危险。”①

用硅藻土烧制的炮弹是专为填装带鼠疫菌的跳蚤而设计的，它有一定的透气性，可保证跳蚤存活。因生产较晚，未在实战中使用。

（三）石井式细菌培养箱

石井四郎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任教时开始研制细菌培养箱。1932 年以生产人用疫苗为理由申请了专利，说研制细菌培养箱是为了解决当时部队痢疾流行问题而生产疫苗之用的。这种细菌培养箱不能用来制造痘苗，因为它难于保证消毒；不能避免空气中的杂菌进入；细菌箱铝板上刮下的细菌，不可避免地带有金属碎末和氧化铝；在铝箱板壁上的细菌是不透明的，无法看到培养膜背面所产生的厌气性细菌，这是生产痘苗最忌讳的。因此，这种细菌培养箱是专为进行细菌战而研制的。它生产孵育出的存活的各类细菌，大量保存下来，用以传染人群。

梶塚隆二在伯力受审时供认石井式培养器繁殖细菌过程的种种特点就决定这种培养器不能来制造痘苗，只能制造用于细菌战的各类细菌。田村良雄曾使用过这种培养箱，他说：“石井式培养箱比普通玻璃制偏瓶大 40 倍。但由于它的暴露面大，因此不管怎么小心，也不能防止杂菌的混入。我用此箱做细菌培育时，那些来监督的少校和班长说‘有少量杂菌没关系。’制作人用疫苗时如有杂菌混入，就会发生很多副作用，所以很显然，它不是为了做人用疫苗的”②

（四）带有鼠疫菌的老鼠和跳蚤

根据石井的理论，731 部队把带鼠疫菌的老鼠和跳蚤作为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石井认为，这种细菌武器杀伤力优于枪、炮，不用发射器瞄准，便可大面积地攻击具体目标。只需将细菌战剂注入带跳蚤的老鼠体内，使细菌寄生在跳蚤体内，得到一种活的保护壳，使其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然后将老鼠施放，就等于达到了发射枪炮的目的，通过带菌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105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② 〔日〕《1993 年日本城北县 731 展报告集》，第 59 页。

跳蚤去传播细菌，老鼠死后，跳蚤还会袭击其他老鼠、人或牲畜，造成鼠疫流行。跳蚤成为保护细菌、传播细菌的媒介物。带鼠疫菌的跳蚤，通过特务施放后，立即开始传播细菌，且传染面广，杀伤力极强。侵华日军在空袭宁波和常德时使用了这种方法。

（五）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观察

石井部队首先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实验，他们把各种细菌，如鼠疫菌、炭疽菌、伤寒菌等，注入或灌入人的体内，系统地、大规模地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并全部杀死解剖焚尸。他们还在特种装备的打靶场上，把人固定在铁桩子上，然后从飞机上投撒细菌弹，进行野外实验，从而检查各种细菌武器的效能。最为残酷的是活杀解剖——不用麻药，直接解剖活人。所有这些，是石井四郎最残忍的暴行。

此外，石井部队还发明了自来水笔式或手杖式施放鼠疫跳蚤器。

二、细菌研究报告

731 部队细菌研究会每月召开一次。研究会上，各细菌研究小组分别作研究报告，有价值的发表在《石井纪要》上。后因石井部队销毁证据，大部分研究报告未能公布于世。现搜集到的报告有 7 篇，即 1.《因“黄弹”射击引起的皮肤伤害及一般临床症状观察》2.《关于破伤风毒素及芽孢接种的肌肉“时值”》3.《关于航空体质的研究——冻寒期航空对人体的影响》（节选自《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研究报告》第一卷第一号别册，1943 年 7 月）4.《关于南京攻克战的中国军伤兵的血型》（同上，第一卷第三号别册，1943 年 9 月）5.《在一定浓度的硝基三氯甲烷熏蒸下动物生存时间等的观察》（同上，第一卷第五号别册，1943 年 11 月）6.《发热疹的实验室工作感染例》（同上，第一卷第五号别册，1943 年 11 月）7.《满洲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生及分布（其三）——八面通附近部队的流行性出血热调查报告》（同上，第一卷第六号别册，1943 年 12 月）。下面重点介绍 3 篇报告：

（一）“孙吴热”及其研究报告

1938 年 5 月，在虎林、二道岗、绥芬河等地发现一种不明原因的疾病，当时称“虎林热”或者二道岗病。1939 年 9 ~ 12 月，中苏边境孙吴地区侵华日军中有 20 多人又感染上这种不明原因的疾病，死亡 6 人。其症状为发热、蛋白尿、皮肤出血并呈现紫斑。当时按发病的地名命名为“孙吴热”。到 1941 年，日军中先后有 10 000 人患“孙吴热”，

患病死亡率约占15%。孙吴县是我国流行性出血热最早的疫区之一。“孙吴热”这一病名被沿用多年，后定名为“流行性出血热”，但在我国医学文献中，仍然提及“孙吴热”这一原始名称。

这一疾病的迅速传播，引起日本侵略者的关注。1939年10月至1940年9月，731部队先后派渡边博士、安东洪次博士、冈本良三博士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当时并没有得出什么结果。1942年12月9日，在日本陆军军官学校，日本卫生部首脑对“孙吴热”进行了协议研究，认为对该病尚未明确诊断。这以前，可以用主要症状命名，如“传染性出血性紫斑病”或“地方性紫斑病热”等。以地名称呼本病不妥。鉴于该病按流行病处理，则正式命名为“流行性出血热”，并签发了第989号文件。文件内容为“北满发生的以发热、蛋白尿及出血性素质为主症的所谓孙吴热、虎林热、地方性紫斑病热等暂定的病名疾病，对此流行病定如下病名：‘流行性出血热’”。

731细菌部队对“孙吴热”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对该病的流行特点、病情变化、临床表现、治疗措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在1939年12月召开的东京关东军医官会议上和1940年3月召开的陆军军医学研究会上均作了专题报告。先后发表了7篇关于“孙吴热”的研究报告。731部队长北野政次对“孙吴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陆军卫生史》卷七中写道：“昭和十三年（1938年）夏季以来，在北满边境地区闪电般地流行一种罕见的怪病，以蛋白尿、特殊的容貌、出血倾向以及严重的自觉症状为主要症状，由于发展迅速，许多人病死，造成极大的威胁。”[①] 北野政次还写道：“昭和十七年八月被任命为关东军防疫部队长之时，至前任石井部队长时期发现流行性出血热已经过了整整四年了，然而无论是病原体还是感染途径都尚未确定，成为防疫史上重大的障碍。因此，为了确立防疫方针，痛感首先发现感染途径是先决问题。于是重新组成研究班，并对其进行直接领导”[②]

某日本军医就是在北野政次领导下的研究班人员，他在《满洲流行性出血热的发

①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第14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第14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生及分布（其三）——八面通附近部队的流行性出血热调查报告》写道："为调查昭和十七年以来在满洲牡丹江八面通附近部队多次发生的流行性出血热，我们自昭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月二十九日奉命前往该地。"该报告书的完成者是北野政次、某日军军医等3人。据该报告书介绍，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满洲第七〇部队的流行性出血热患者为153人。调查结果表明，病源媒介动物是老鼠，特别是附在黑线姬鼠身上的北满螨及跳蚤等。1943年9月，北野政次在满洲医学会及日本传染病学会上报告说病原体是病毒。1944年4月，笠原四郎作了同样报告。[①]

731部队后来利用"孙吴热"进行了人体实验，详见下面章节。

（二）新发现的两篇实验报告书

1983年秋，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儿岛俊郎在东京神田的旧书店中发现了两份731部队使用人体进行细菌实验的报告书，篇名是《因"黄弹"射击引起的皮肤伤害及一般临床症状的观察》《关于破伤风毒素及芽孢接种时的肌肉"时值"》。同年8月15日，日本的《每日新闻》对报告书的有关情况作了报道。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日本发现原关东军细菌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报告书》为题发表了消息。1985年3月，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太平洋战争史研究会的松村高夫教授等4人来哈尔滨731部队遗址考察，赠送了两份报告书的影印件及其介绍文章。《黑龙江文史资料》(1985年第19期)在国内首次刊发了这两篇报告书及介绍文章的译文。按照庆应义塾大学太平洋战争史研究会的要求，删去了报告书作者的姓名。

《因"黄弹"射击引起的皮肤伤害及一般临床的症状观察》报告书记载了1940年9月7日至10日进行人体实验的情况。该实验是向人体发射芥子气毒气弹（是致死性的糜烂性的毒气，原是无色的，但通常混杂夹杂物，呈淡黄色，因此被称作"黄弹"）的实验。让人饮用芥子气和路易氏毒气的水溶液的实验等5种实验结果。报告书由日文打字成册，共40页，末附5幅症状一览表和3幅毒气弹发射时的人员安置图。封面的左下角印有"加茂部队"的字样。右上角盖有"极秘"的红色印章。另有作者署名。

①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第14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关于破伤风毒素芽孢接种时的肌肉“时值”》是一篇记载把破伤风毒素和芽孢接种于人体，测定发生症状时肌肉电位变化“时值”的实验报告。将破伤风杆菌的毒素分为最低致死量的十倍、百倍、千倍进行接种。该报告书共有正文 12 页、3 幅附表。署有实验指导者及承担者姓名。①

第五章　细菌生产

第一节　机构人员

731 部队第 4 部为细菌生产部，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细菌工厂，它负责培养生产各类细菌。凡第一研究部和第二试验部工作所得的结果，都由该部来具体实现。凡选定作为细菌战用的传染细菌，经过实验并在实验过程中证明有效时，就在该部大量地繁殖生产。

细菌生产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细菌战的中心环节，由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直接负责。他供认：“第 731 部队是直接由我以关东军总司令资格来管辖的。对第 731 部队的战术领导，即解决一切有关细菌武器生产和使用方面的问题，都是由我负责的。”②当时，增加细菌武器生产的训令由日本陆军省颁发，山田乙三是忠实的贯彻者和执行者，他采取一切必要办法扩大细菌武器生产。他供认：“我记得，当时我委托第一作战部部长松村在作战方面根据所奉训令，设法保证增加各种细菌的生产。同时我又命令用必要的专门军官去充实第 731 部队，并保证该部队以必需的设备。”③

731 部队长石井四郎是研制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的始作俑者，他认为，“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他种制造细菌武器的必需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

① 韩晓、辛培林：《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31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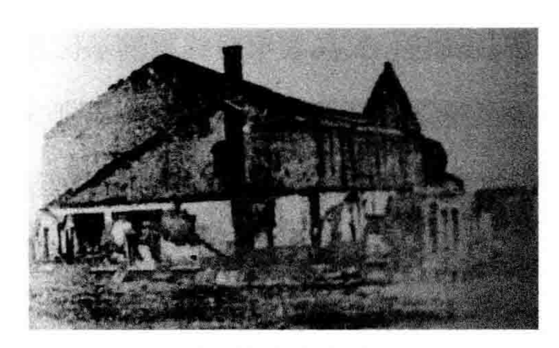
③ 同上。

菌武器便是其中一种。”“制造生物武器既省钱、省料，又具有不可估量的杀伤力，这对经济危机、钢铁缺乏的日本帝国来说，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石井四郎研制细菌武器的主张得到了日本当局及一批军国主义分子的大力支持。从此，石井四郎便在“防疫”之名的遮掩下，从事细菌武器的研制。他经过20多年的细菌战研究，发明了石井式滤水器、石井式细菌培养箱、石井式陶瓷细菌弹、带鼠疫菌的老鼠和带鼠疫菌的跳蚤弹、人体试验和活杀观察。从日本东京的小小细菌研究所到祸移中国东北后平房的细菌工厂，石井四郎创立了一个又一个“制造军火工厂的楷模”。[①] 作为细菌部队领导，他全面负责细菌生产工作，号召部队加紧进行细菌生产。1941年6月，他从东京回来后，召集部队各部部长开会，对大家说，他向日军参谋本部报告过，第731部队已经研究好了用染有鼠疫跳蚤作为细菌武器的方法，说这方面所达到的成绩可以大规模地实际用去达到战争目的。在石井的多次指示下，第四部扩大了细菌武器生产，大大提高了各类细菌的生产率。731部队所有各支队也加紧生产细菌材料，首先加紧捕鼠养鼠，以供繁殖跳蚤并使跳蚤染上鼠疫菌。北野政次继承了石井未完成的事业，他接任731部队长职务后，为满足细菌战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细菌生产的规模。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网罗了许多细菌学专家，培养了一大批细菌研制后备人才，从事细菌生产工作。该部部长川岛清供称：“关东军第731部队曾从事研究细菌武器，并由我积极参加大量培制过作为战争武器用的传染病菌……731部队颇大一部分人员是受过细菌学专门训练的，他们把自己的知识用于进行科学研究和试验工作，目的是要制造出新式武器并大量生产这种武器，作为积极进攻的手段。”[②] 他所领导的第四部负责制造各类传染细菌，川岛负有直接责任。该部分部长柄泽十三夫从1939年到1944年间，他在731部队任职期间，“这个部队内积极研究过大批生产细菌和使用此种细菌作为细菌战武器的最完善方法”[③]，他所领导的那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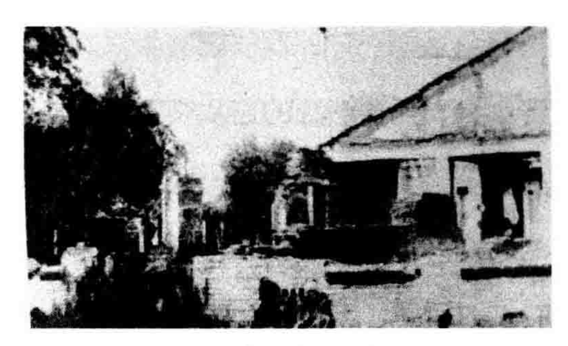
① 《赤旗报》，1950年2月8日。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59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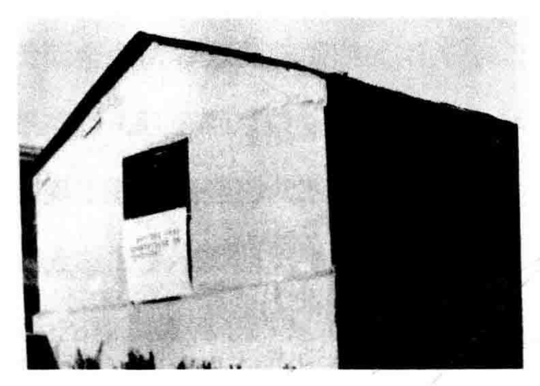
③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68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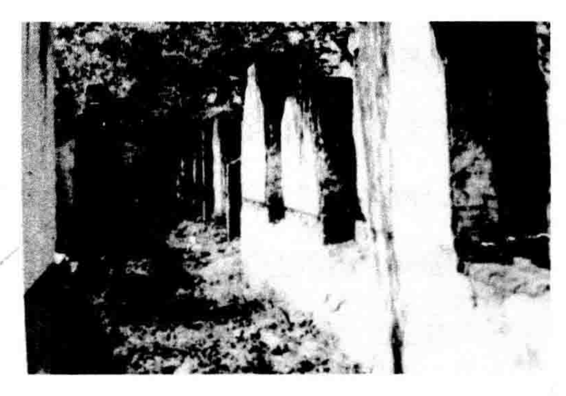
细菌研究室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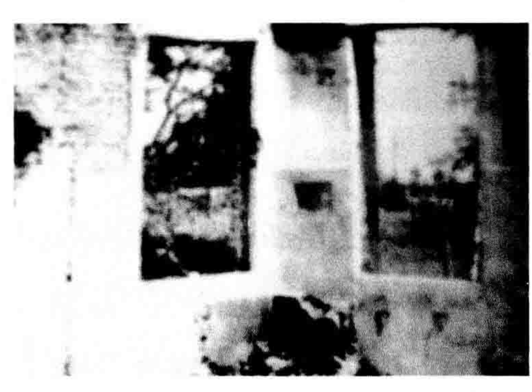
细菌研究室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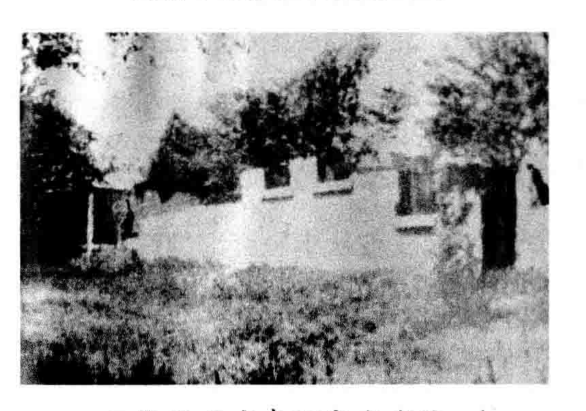
结核菌研究的二木班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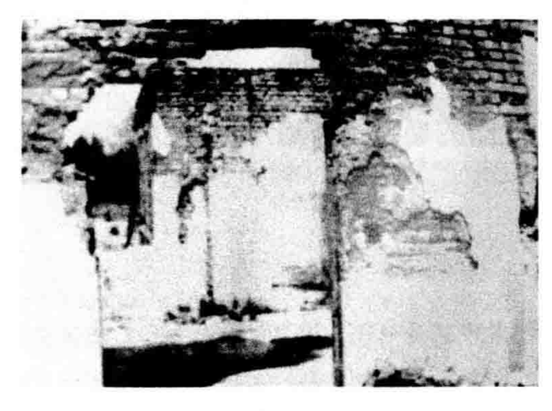
高桥班鼠疫研究室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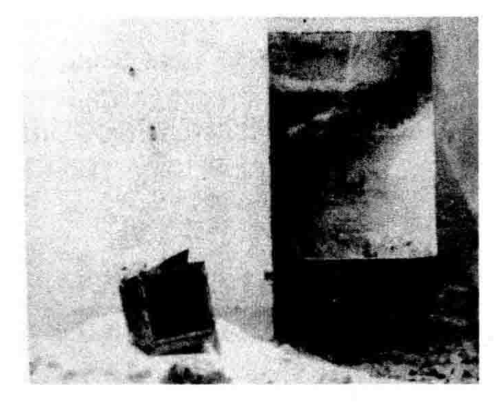
高桥班鼠疫研究室残迹



笠原班病毒研究室残迹



笠原班病毒研究室残迹



菌种贮藏室内部残迹

分部，曾按需要程度大批培养过伤寒、副伤寒、霍乱、鼠疫及炭疽热等病菌，以供实际使用。他承认：“我既是个细菌外科医生，所以我在大量生产细菌时知道这些细菌是用去消灭人命的。”[①] 他所领导的分部，有军官及雇员共 50 ~ 70 人，并且具有大量培养细菌的一切必要设备。在川岛清的麾下，聚集着诸如细菌学博士渡边等许多军医、技师、技手作为细菌生产的中坚力量，还有一批培养成长起来的少年队员。田村良雄从 1939 年被招募为少年队员，到 1943 年应征入伍参加关东军 54 师团山形联队期间，从事细菌生产准备、研制及菌株制造工作，成为细菌生产的骨干成员。据不完全统计，经他参与制造的各类细菌达 600 多公斤。田中英雄虽不是生产部人员，但他所从事的昆虫研究，特别是鼠疫传播媒介跳蚤的研究和生产，与鼠疫菌生产有直接联系。731 部队从事细菌生产的人形成一支庞大的队伍，秋山浩听说：“单单从事移植和保存细菌的就在 1 000 人以上。”[②]

第二节　设备设施

石井部队有充足的军费用于进行细菌战，用于购置设备，繁殖细菌的款项占有主要地位。1940 年以后，日军加紧进行细菌战，因此 731 部队的军费超过 1 000 万日元。这 1 000 万日元中有 300 万用于供养 731 部队人头经费，其余 700 万元则是去制造细菌和进行研究工作的。731 部队内有足以大批制造细菌战武器的必要装备，它能够充分保证关东军在细菌武器方面的需求。细菌部内装备有培制细菌的良好仪器。第 4 部生产分部长柄泽十三夫说：“（细菌生产分部内）有用以大批生产细菌的设备，是由两个系统构成的。我先从第一个系统说起。这种设备首先是一些专门制造供繁殖细菌用的营养液大锅炉。这种大锅炉共有 4 具，每一具的容量均约为一吨。先把营养液放到石井式的特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69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② 〔日〕秋山浩：《731 细菌部队》，第 30 页，群众出版社，北京编译社译，1982 年。

种培养器内，而后再把培养器放到特种消毒器里面；这种消毒器共有 14 具，每一消毒器内可放置大约 30 个培养器。所以，在尽量放满的条件下，14 具消毒器内可同时放置 420 个培养器。为了使培养器散热起见，设备有两个冷藏室。在营养液凝固之后，则进行栽种细菌苗。这种细菌繁殖之后，就将其取下来。专门设备有两个房间来进行此事。”① 第一分部的两个冷藏室，每个房间内能同时容下 100 个培养器。该分部内还有 5 个调温器，总共可容 620 个石井式培养器。第二分部内有大锅炉两具，每具容量为 2 吨，消毒器 8 具，每一消毒器内可容 60 个培养器。第四部内还有保存细菌产品的冷藏器。

731 部队原队员上田弥太郎供称：“培养室的设备是这样的：有长 15 米、宽 10 米、高 4 米的房子，能容纳（30cm × 30cm × 40cm）的铁皮管 450 个，每日能生产细菌 10 公斤，通过输运机运入培养室进行培养，经过 12 小时或 24 小时即成，然后将细菌装入瓶中分送于各班。我所在的第三班是用孵卵器造菌，共有 4 个电器孵卵器，是（1m × 2m）专做鼠疫菌用的。”②

这个大规模生产细菌的工厂，设备先进，仪器精良。1944 年 8 月，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巡视了 731 部队。他供认：“当时我亲身考察了这部队内研究和大量制造细菌武器的工作。并且，当我考察该部队工作时，我见到此种大量生产细菌已作为细菌武器的工作规模，实在感到惊奇。我视察了这种工作之后，便嘉许了这种工作，因而也就批准了要继续进行这一工作。所以，在我任关东军总司令期间，第 731 部队和 100 部队是经我认准去继续研究最有效细菌武器，并大批生产作为战斗武器的致命细菌。”③

1944 年，731 部队从战备分散角度考虑，将高压蒸汽灭菌罐、细菌培养基箱、干热灭菌等设备以及细菌培养基原料，分别发往各支队，要求各支队进行细菌的保存培养。同年，柄泽十三夫奉该部队长北野政次的命令，到孙吴、海拉尔、海林和林口各支队巡视。

---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277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22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③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42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他供述："（这次巡视的）目的是要就地研究可否在这些支队内装上大批培养细菌的设备。北野将军在我出发前指示我说，在各支队内建立起培养细菌的工作是必要的，一方面是为要增大细菌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是当本部队内设备一旦被敌方炸坏时，不致使细菌生产工作陷于停顿。根据我所作出的结论，于是同年间就运送了一些设备到孙吴、海林和林口诸支队去，但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些什么设备，也不知道这些设备是否在那里装设了起来。"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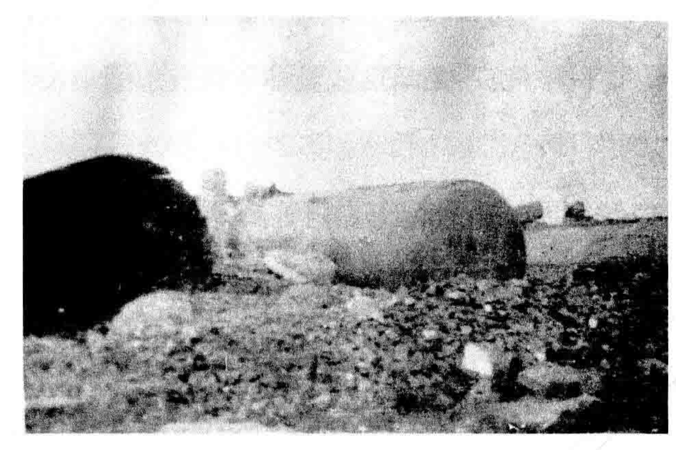
各支队确实收到了这批设备。牡丹江（643）支队长尾上正男证实，1943 年底，北野政次给 643 支队规定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扩增供大批制造细菌用的设备。他还证实，柄泽十三夫少佐到 643 支队调查可否在支队内设置蒸汽培养锅炉，以及调查设置这种锅炉的条件。1944 年，643 支队收到了 6 具高压蒸汽灭菌锅炉。尾上正男说："这是口径为 1 公尺半而长达 2 公尺半的一种锅炉。"② 该支队还收到了 75 吨蛋白消化素、液汁、盐以及其他各种为制造营养液的资材。如果装置好这 6 具锅炉而利用这批器材，那么 643 支队便可大量生产各类细菌。后来，日本侵略军节节败退，分身无术，来不及安置各支队生产细菌的设备这项任务才未落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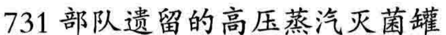
当地劳工也曾见过这批运往各支队的细菌设备。1944 年夏天，731 部队铁路专用线上一列火车在动力班卸下了 1 个包装严密的大木箱。这个木箱高约 2 米多、宽约 1.5 米，外面包着苇席。卸车后，派来两个日本兵持枪把守，不让无关人员靠近，一整天无人搬运。731 部队工务班白铁工白武斌去修库房，路过动力班，无意间看见了站台上的大木箱。箱子标签上写着日文字，品名用号码代替。白武斌知道这是日本货，像是大型设备，他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午，白武斌和几个劳工去四方楼附近工房做工，发现四方楼东院墙有 3 米多宽新修补的痕迹，附近路面有拖痕。劳工们猜想日本人在夜里把大木箱秘密运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71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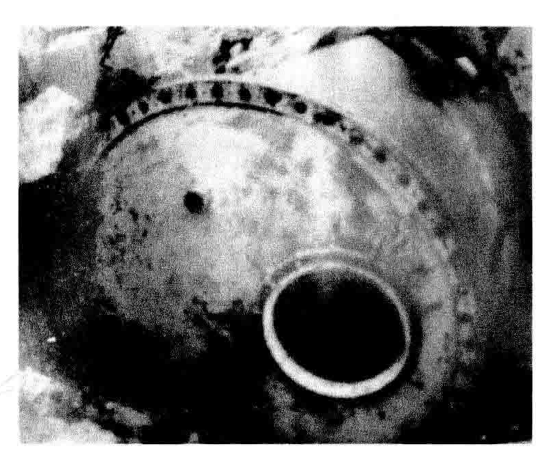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358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进了四方楼，但他们不知道大木箱里装的是什么设备。几天后，劳工们在第一仓库看见了 10 来个同样大小包装密实的木箱，在日本人的看护下，劳工们把这些木箱和其他物资分别装在火车上。从标签上看，这批货是发往海拉尔、孙吴、海林、林口的。





731 部队遗留的高压蒸汽灭菌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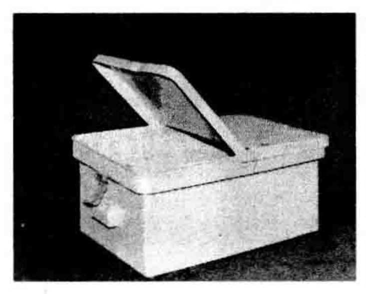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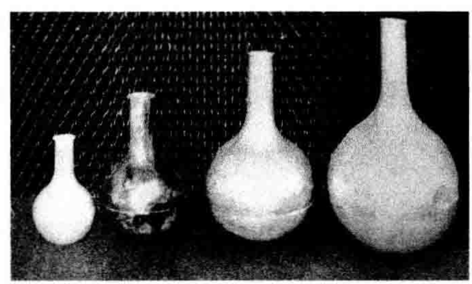
731 部队遗留的高压蒸汽灭菌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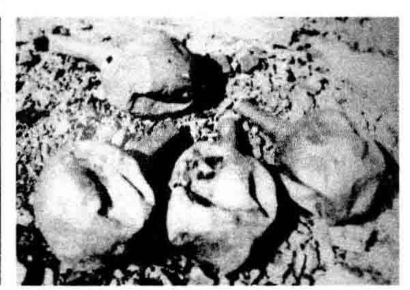
1988 年，林口支队某原队员回忆说，当年，他在林口支队见过高压蒸汽灭菌罐。原 731 部队特别班成员石桥在第四部灭菌室见过 3 台高压灭菌罐，也是这种规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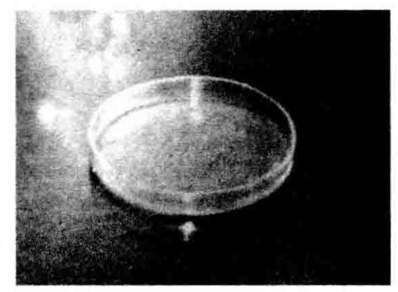
当地劳工马车夫王志洪见过一种装血粉的铝箱。1941 年的一天，日本人让王志洪把马车赶到四方楼外西南的一座大筒子房的南门口，门为双扇包铁皮的大门，宽 3 米，推测还有对称的北大门。这座房子很大，宽 18 米，长 40 米。这是野口班，马车赶到房门口后，有个日本兵接过马车赶进房内。王志洪从门外看见屋内铺设的铁路，旁边摞着不少铝箱，有 3 个日本人正在装马车。车装满后，日本人把马车赶出来，让王志洪送到铁路专用线的货台上。铝箱长 75 厘米、宽 45 厘米、高 30 厘米，箱盖中间带折页，两面开合，合上后由扣卡锁锁住，重 10 来公斤。卸车时，不小心碰开了一只铝箱卡锁，王志洪看见箱里镶着格槽，槽里插着玻璃试管。见四周无人，王志洪抽出一根试管，发现试管外面贴着编号的纸条，管里有凝固的血粉。他匆忙把箱子扣好，继续卸车。这天，他运了四五趟。第二天，铝箱装火车运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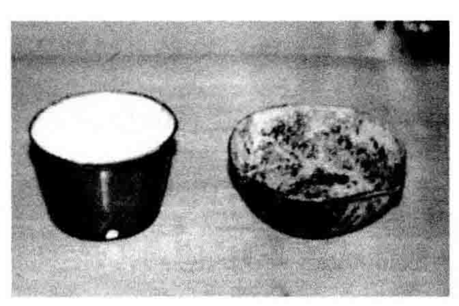
铝箱是石井式细菌培养基箱：铝合金制作，方型箱体，箱子内设有多层铝制格子。但王志洪有两个问题始终没弄明白：试管里装的到底是人血，还是动物血呢？是少数铝箱里有血粉呢，还是所有铝箱里都有血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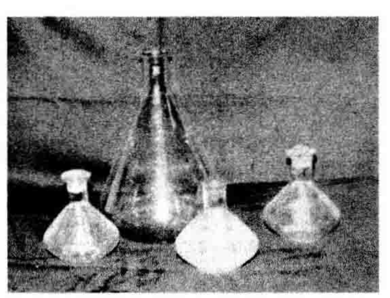

细菌培养基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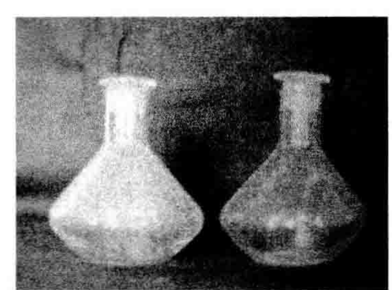

铝制烧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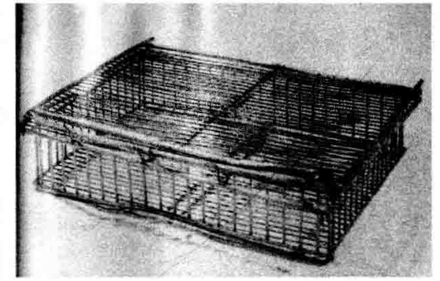

在四方楼挖出的铝制烧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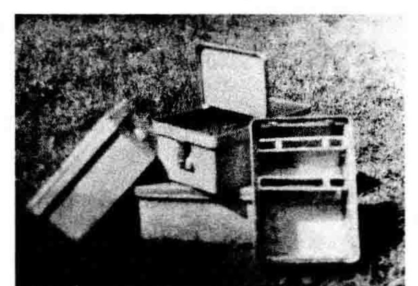

平皿


搪瓷器皿


培地瓶


培地瓶


器具消毒用的格筐


细菌培养基箱

第三节　细菌种类

石井部队进行了各类传染病细菌的研究生产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鼠疫、伤寒、霍乱、炭疽、赤痢等细菌。

一、鼠疫菌

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病原体是鼠疫杆菌。其传播途径是用带鼠疫菌的跳蚤去感染当地的老鼠，再通过带菌老鼠和跳蚤这种媒介传染人或动物，从而造成鼠疫流行。疫

鼠解剖后，其淋巴结和脾脏肿大，有米粒状结节，粘液膜及内脏充血并呈溢血斑。将疫鼠淋巴腺穿刺液涂片，经美兰染色镜检，找到两端染色较深，肥大短小的革兰式阴性杆菌。这种杆菌就是典型的鼠疫杆菌形态。疫鼠和疫蚤制成的细菌弹为731部队的王牌武器。

鼠疫临床分为三种类型，即腺型、肺型、败血症型，也有几种症状交替感染的。一般症状是：高烧、打冷颤、呕吐、眼睛充血、浑身乏力，随之淋巴结肿大，皮肤干皱发紫。腺型较常见，病死率50%至90%；肺型，因心力衰竭、出血而死亡，死亡率达70%至100%；败血症型发病迅速，全身中毒，中枢神经系统遭到破坏，神志不清、心力衰竭、七窍出血，患者在24小时之内死亡，死亡率100%。

二、霍乱菌

该菌为肠道传染病菌。一般症状是：呕吐、腹泻，大便稀释如淘米泔水，四肢痉挛冰凉，手指、脚趾干瘪，眼窝凹陷，病程3～5天，因脱水休克致死。731部队成吨生产这种细菌。

三、伤寒菌

该菌为肠道传染病，也称“战争伤寒”，是战时常见的一种疾病。病原体是伤寒杆菌。患者持续高烧，体温达39～40度，最高43度。脉搏迟缓，脾脏肿大，白血球减少，严重时腹部可能出现玫瑰色斑疹。传染媒介为虱子或跳蚤。731部队研制出一种疫苗，可防治伤寒病。731部队大量生产这种细菌。

四、炭疽菌（脾脱疽菌）

这种传染病是人畜共患的一种疾病，致死率高。病原体是炭疽杆菌。该病菌耐高温，在摄氏100度高温下可以生存，牲畜感染炭疽菌病死后，血不凝固。患者水肿或长痈，枪伤极易感染，伤口四周红肿，难愈合，体温急剧上升，引起肌肉坏疽并产生炭气。潜伏期6小时左右发病，很快死亡。731部队使用这种细菌研制榴弹炮，用于进行细菌战。

五、破伤风菌

这是一种寄生在土壤里的细菌，耐高温，可以制成细菌弹。

六、巴比斯菌

石井部队发现了一种巴比斯菌，能耐1 000度的高温，可生存20年。当时还没有

发现预防这种细菌的方法。[①]

此外，在731部队研制的细菌中还有狂犬病菌、结核菌、梅毒菌，以及白喉、传染性黄疸、猩红热、流行性出血热、百日咳等各种传染病。731部队对在孙吴地区发生的“孙吴热”，即流行性出血热进行了重点调查和研究实验。

第四节　细菌培育采集

731部队生产细菌实施流水作业。其生产流程为，先用高压蒸汽灭菌锅炉蒸煮营养液。营养液的主要原料有蛋白消化素、干燥肉精等。营养液制出后，装进培养器里。再把培养器放到消毒器里进行消毒。之后，进行冷却，植菌苗。把植入菌苗的培养器送到培养室里进行培养。一般24 ~ 48小时后，便可采集细菌。

森村诚一对细菌生产流程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制造细菌的）柄泽班班员，一定要先更衣‘入浴’以后才能工作。在更衣室里脱光了身子，穿上白色工作服，戴上有七、八层纱布的口罩和白颜色的帽子，胸前系上从脖子到脚面的橡皮围裙，脚上穿上到膝盖的高腰靴子，再戴上橡皮手套和特制的眼镜，这样装备齐全以后，再到浴室里去。浅浅的浴池里是满池子的石炭酸溶液，在消毒液中哗啦哗啦地走到浴池的另一头，膝盖以下就成了无菌状态……（然后进入细菌培养基室），在蒸汽锅里把琼脂溶解以后，放入培养基容器中，然后再放入中央走廊右边的高压锅里。高压锅的温度180 ~ 250度，使溶解了的琼脂处于无菌状态。接着，把经过灭菌的琼脂放入冷却室冷却，再把固体化的琼脂放入无菌室。在这里，要把培养的细菌抹在琼脂上……（在无菌室里），从天花板往下喷撒消毒液，给队员全身消毒。这是为了防止要培养的细菌以外的细菌附着在琼脂上面。往琼脂（培养基）上植菌，使用一根叫做‘棉棒’的长50公分像铅笔那样的硬铝制圆棒，在棉棒的头上缠上棉花，在棉花上粘满细菌后，即刻就涂在琼脂上。必须一次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31页，中华书局，1989年。

就均匀地把菌母涂在琼脂上面……植菌以后，把培养基运到培养室去……培养室的温度保持在摄氏 20 ～ 80 度之间，操作门口的仪表可以自由调节温度。这是因为培养细菌的种类不同，需要对室内温度进行调整的缘故。繁殖的时间也各不相同，有的细菌一天就能繁殖起来，有的则需要一个星期……细菌在适当的暗度和气温下，摄取琼脂的营养进行繁殖，在培养基的表面形成一种白色的乳液状的物质……（细菌成熟时，生产人员）就把细菌刮取下来，刮取细菌时，使用一种‘刮棒’，刮棒长 50 厘米，头上有一个 5 ～ 7 厘米长的小竹刀，利用它把在培养基上繁殖起来的活菌，刮到直径 10 厘米、高 30 厘米的特殊玻璃容器里……把刮去细菌的培养基，再放到高压锅里，彻底灭菌以后，将溶化了的琼脂扔掉。这就是细菌制造的一个周期。”① 一般情况下，培养基使用 3 次后就不能再用了。

细菌生产是繁重而复杂的劳动，731 部队雇员小关重雄所从事的工作是大规模地生产细菌。他供认：“培养细菌所用的是液汁或蛋白消化素及肉汤，把这些东西放到特设的锅炉内做成营养液，用以培养细菌，然后就把这种营养液倒进石井培养器内去，这种培养器是放置在特设的高气压消毒器内的。然后又把这营养液放到特备的冷器内弄冷，接着就把培养器送到特备的房舍内去进行栽种细菌苗。随后，细菌经过自动传送器进入特制的孵育器内，那里面保持有一定的温度，例如，在繁殖鼠疫细菌时，温度为零上 35 度。孵育器四周都是由金属板保护着，里面安置有保持经常温度和相当湿润程度的设备。培养器从孵育器内经过自动传送器转入另一个柜子里去。为了取出细菌，备置有一种特种器具，即小匙子，用这种匙子把细菌取出来放到瓶子里。”②

小关所说的就是细菌生产的一个周期。

秋山浩参加了鼠疫菌培养采集工作，他们的工作是从保菌鼠身上捉跳蚤，或把疫鼠放进特殊装置的笼子里去，致使老鼠相互传染。然后帮助技术员进行鼠疫菌的分离培养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 30 ～ 33 页，群众出版社，1984 年。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409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工作。工作之前，先用石炭酸消毒，穿上致密的白色衬衣和衬裤，外罩防疫服。然后到解剖室去工作。他们“把用氯仿毒死的鼠取出来，用梳子梳取跳蚤，进行检查和采取血样，取出内脏制造涂片标本……在解剖为数极多的、传染上鼠疫的鼠而采取细菌时，先把从外部就能看出淋巴腺肿胀的鼠马上切开，把其中像血块似的部分取下来；对于看不清的鼠，就从下腹切开，把那粘连在胃内侧的肿脏摘出来。据说，鼷鼠有这样一种特征：在心脏血液里可以发现许多细菌，所以这时候在采血之后，立即就可以进行净培养。”[①]这种提取鼠疫菌的方法比培植病原菌，再进行生产细菌的方法简单。只要把鼠疫菌培养在易于繁殖的培养基里，别使杂菌混入，等到鼠疫菌形成了群落挑上来就行了。“培养（鼠疫菌的）方法，虽然间或也用胃蛋白酶或鸡蛋做培养基，可是，差不多全是采用琼脂斜面培养。把白金耳插入繁殖细菌的试管里，把细菌群落挑上来，然后，把它移植在新的培养基的试管里。斜面培养室的一边，有很多层格子。横格子上边摆着无数斜放着的经过移植的试管……每次移植时，都把试管口和白金耳烧灼一下，以免混入杂菌；还要注意不使白金耳碰到琼脂块上渗出来的凝固体，并且，当烧灼带着细菌的白金耳时，要逐渐接近火焰，徐徐地烤热，再放到火焰上，以免骤然放在火焰上，致使细菌飞散。我们全神贯注地反复作着这样的工作。从移植完了直到管口塞上棉花，其间始终是把试管口对着实验台上的火焰那边。这是为了防止空气中的细菌随风进入试管里。移植完毕后，就贴上写着细菌名字（因为间或也有不是鼠疫菌的时候）和移植日期的标签，摆在架子上。大约经过一天半或者两天的时间，按着日期顺序装箱，然后用手推车，运往正厅的保藏室里。”[②]

生产细菌耗费了大量的体力、精力，是极其危险的工作。队员们提心吊胆地从事细菌培养采集工作。在细菌室操作时，全面防护，把自己装在套子里。彼此连话都不敢说，相互打手势交换意见，惟恐把细菌吸进口里。停工后，不停地咀嚼苹果，然后吐出去，把口里的细菌带出去。夜间不敢独行，总好象后边有人追过来，耳边传来阴森森的声音：

① 〔日〕秋山浩：《七三一细菌部队》，第 27 ~ 28 页，北京编译社译，群众出版社，1982 年。

② 〔日〕秋山浩：《七三一细菌部队》，第 28 ~ 29 页，北京编译社译，群众出版社，1982 年。

“下一个，该轮到你死了……”[①]，仿佛出现了幽灵，经常吓得拼命奔跑。不少队员认为从事细菌繁殖工作，这是违背医学理想的一种危险工作，是见不得阳光的事业，他们厌倦、反悔这种工作。他们知道细菌武器杀伤力极强，上田弥太郎供认：“一瓦细菌能感染1 000人，死亡率100%。(我参与)先后制造的47.8公斤鼠疫菌能杀伤4 700多万人。”[②]这种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行径，使不少有良心的日本人，内心深处受到强烈的谴责。也有不少人在制造细菌过程中因感染了鼠疫等烈性传染病而死亡，成为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牺牲品。另有一些军国主义分子明知道制造这些细菌是用去消灭人命的，但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身任日军军官者应尽的职责，所以我（柄泽十三夫）就尽力去执行上级长官命令我执行的任务。”[③]

第五节　生产能力

731部队第四部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来满足日军细菌武器的需要，该部有充足的资金和培制细菌的专门技术设备，特别是具有一批细菌学专门人才。在这种条件下，该部能在一个生产周期短短几天时间生产出大量细菌。该部生产人员培养出供制造细菌武器用的大量细菌胶状体的重量以公斤来计算。该部部长川岛清供认：“生产部内装备有培制细菌的良好武器，使我们每月能出产约300公斤净鼠疫菌，或500 ~ 600公斤净炭疽热菌，或800 ~ 900公斤净伤寒菌、副伤寒菌或痢疾菌，或1 000公斤净霍乱菌。事实上并不是每月都曾培制出此种数量的细菌，因为这种数量是预定供战时消费的。实际上生产部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34页，群众出版社，1984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61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③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69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所培制出的细菌量，只足供部队内日常工作中的需要。”①

川岛清对细菌生产能力解释说：“在充分利用第四部所有生产能力及全部设备的条件下，该部在一个月内可制造出：鼠疫菌300公斤或伤寒症菌800～900公斤，炭疽热菌500～700公斤，霍乱菌达1吨。”问及多少时间才可繁殖出某一种细菌呢？他回答说：“繁殖鼠疫菌和炭疽热细菌需要48小时，而繁殖霍乱菌、伤寒症菌及其他各种细菌则需要24小时。”②一个培养器内每次可繁殖的细菌数量为：炭疽热菌50～60公斤，伤寒症菌40～45公斤，鼠疫菌30公斤，霍乱菌大概是50公斤。短期存放细菌，就把细菌保藏在冷藏室内。转运就把细菌装到特制的瓶子里，每瓶装50公斤。然后把这种瓶子放在用金属制的盒子内，再把这种盒子装到内面放有冰块的特制大箱内，每一口大箱可容几个盒子。

该部分部部长柄泽十三夫供述：“在充分利用第四部的生产能力及在良好条件下，理论上在一个月内可培养出鼠疫菌达300公斤，但实际上为此总共只利用过500个培养器，这500个培养器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可能培养出10公斤鼠疫病菌，因为每一个培养器出产量是20公斤。”③他供认，理论上每月培养伤寒菌800～900公斤，炭疽热菌大约600公斤，霍乱、副伤寒症、赤痢等细菌各为1吨。

他对生产部第一分部细菌的实际产量作了如下供述：“我所领导的那个分部，运用自己所具有的设备，每月内可培养如下数量的某一种细菌：鼠疫菌100公斤，炭疽热菌200公斤，伤寒菌300公斤，副伤寒菌（A）300公斤，霍乱菌330公斤，赤痢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59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261～262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③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277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菌 300 公斤。”①

事实上，当时该部细菌的产量足以满足日军进行细菌战的需要，理论上细菌产量大得惊人，但是日本当局及一批军国主义分子并不满意。1944 年开始，731 部队已经向各支队输送了大批细菌生产设备，还想继续扩大部队制造细菌的生产能力，另有一个目的就是疏散细菌生产设备，本部细菌工厂一旦被轰炸，其他分厂好继续生产。据 731 部队军医中尉秦正氏供认：“1945 年 7 月初旬，我受调查课长口头命令：于哈尔滨、长春、沈阳三大城市内寻找制造斑疹伤寒瓦克辛的工厂，条件是面积要 800 到 1 000 平方米，交通方便又不太使人注意的地点。寻找时要着便服，使用关东军司令部嘱托某医学士的名片。这个工厂实际上是为制造鼠疫菌武器用，但表面上是关东军司令部第四课经营的斑疹伤寒瓦克辛制造厂。后来我和柴田雇员在沈阳东边找到一座已歇业的纺织厂，遂决定利用。又到哈尔滨五马路和地段街联接的路旁找到了一座三层楼房。我和柴雇员绘制了建筑物的平面图，附上地址及其他条件，回队后作了报告。”② 由于日军 731 部队的覆灭，细菌生产能力才未能进一步扩增。

第六节　产品产量

川岛清、柄泽十三夫供认了理论上每月生产各类细菌的数量，也说明了该部第一分部各类细菌的实际产量，即鼠疫菌 100 公斤，炭疽热菌 200 公斤，伤寒、赤痢等其他细菌分别为 300 公斤左右。据各种资料分析，731 部队大量生产细菌是从 1940 年开始的，这是因为在我国各地进行细菌战的需要。

关于各类细菌的产量及生产情况，田村良雄供认的最为详尽。他供述了生产细菌的时间、地点、领导者及生产人员，细菌种类、产量，细菌生产的材料准备、试验和检定工作，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69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10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细菌转运及使用情况以及菌株的生产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他从1939年被招募为少年队员开始，到1942年离开731部队（1945年又调回731部队）结束，经他参与制造的各类细菌达600多公斤。下面是他的供词：

“1939年7月初旬至8月初旬，在总指挥早川少佐第一队长小林准尉、第二队长渡边准尉的指挥命令下，约60名队员，昼夜分成两队，在培养器调制班、无菌室班、培养罐洗涤装置班进行培养霍乱、伤寒、副伤寒菌，估计制造了22.5公斤的细菌。在这个期间我犯了如下的罪行：7月初旬在濑川户班（霍乱研究室）与另外一人，灭菌及洗涤了150支霍乱菌生产所用之造菌株试管。7月中旬至8月初旬，于小林队无菌室班与其他12名，在今野信次技手直接指挥下，为完成培殖150罐细菌任务，以3人为一组，我为助手，我们这组培养了约600瓦的细菌。8月初旬，我奉队长小林准尉的命令，与其他3人制造了两罐含有0.03瓦的菌液，分装在石油罐里密封起来。我与雇员奥富克两人，送往伪兴安北省将军庙，交给碇挺进队难波准尉了。

1940年5月初，奉班长野崎少佐的命令，约20多名人员参加，在生产班制造了航空班演习用的大肠菌。在此期间，我与其他2人一起，培养了30瓦大肠菌。

1940年5月中旬约7天时间，奉野崎少佐的命令，在生产班有班员及后期少年队员约20余名，制造了约2公斤伤寒菌。

1940年7月初旬至9月下旬，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编制了临时大量生产细菌队，从各部召集了约120名人员，在总指挥川岛大佐、本部野崎少佐、第一大队长早川清少佐、第二大队长铃木启之少佐的指挥命令下，在两个细菌工厂里制造了约270公斤伤寒、霍乱、副伤寒、鼠疫、脾脱疽菌。这些细菌都由航空班送往南京及华中地区的“远征队”使用了。在这个期间，我犯下了如下罪行：

从7月初旬至8月下旬期间，在无菌室中队，奉中队长神崎知大尉的命令，在今野信次的指挥下，进行细菌的培养与采集，我与其他2人一起，一天采集了约150瓦的细菌，这个期间合计约采集了7.5公斤的副伤寒菌及霍乱菌。

8月下旬起约两个星期，在本部材料班里，奉小林松藏少尉的命令，与其他10人一起，准备了一天搞1 000个培养罐操作所需的材料。我与其他2人协助三谷班雇员河合美人，

一天制造了30个搬运细菌所需的冷冻剂的人造冰，共制造了约420个。另外还制造了约1 000根培养细菌用的棉棒。

9月初旬有3天时间，在本部菌苗班在铃木启之少佐指挥下，我参加制造鼠疫疫苗约2 000支（50c.c.装）。

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在本部菌苗班今野技手指挥下，与其他2人一天洗涤了约300只试管，与其他4人一起制造3%“普通寒天培地”约3 000c.c.，营养液约5 000c.c.。3%“普通寒天培地”分注在300支试管里，为菌株制造提供材料。

1941年1月中旬至2月初旬约20天期间，在柄泽班（以后的第四部第一课），依班长柄泽十三夫大尉的指示，约有13人参加，在上述期间内，我推定约制造了9公斤的鼠疫菌、脾脱疽菌，交给了三谷班。我参加了这次的细菌制造，我们制造的这些细菌又由三谷班制造成干燥细菌了。1941年5月初旬起约20天，在第四部一课柄泽班里，奉班长柄泽大尉的命令，约有30名制造员，制造了脾脱疽菌、鼠疫菌，每天平均操作100余罐，推定制造约9公斤的细菌。第四部的三谷班将这些细菌制成干燥细菌。

1941年7月中旬至9月初旬，于第四部第一课，奉班长命令，约30名班员，在柄泽班细矢博指挥下，一天平均操作200个培养罐。制造出伤寒菌、霍乱菌、副伤寒菌，推定约70瓦。我从8月初参加无菌室，奉细矢博的命令。在今井信次军曹指挥下，与其他12人一起，一天培养200罐的伤寒菌、副伤寒菌。在此期间我和其他2人采集了副伤寒菌、霍乱菌约3.7公斤。制造的细菌由航空班用飞机运往南京去了。1941年8月中旬的某一天，在第四部一课柄泽班里，奉班长命令，约30名班员，制造了航空班用的伤寒菌约800瓦，提供给航空班使用。这时我和其他2人培殖了25罐的细菌。生产的细菌作为菌液装在石油罐里交给航空班在哈尔滨市郊撒布，使之流行起伤寒病，然后宣传说“策源地是哈尔滨市郊的洗菜场，是苏联撒布的细菌”。

1941年9月中旬至11月初旬，于第四部一课柄泽班，奉班长的命令，约30名班员，制造了约70公斤的鼠疫菌，交给前大连卫生研究所。我在无菌室里，奉今井信次军曹的命令，与其他2人一起，一天培殖50罐的细菌，采集了约8.7公斤的细菌。制造的鼠疫细菌，由柄泽班的人员逐次运往大连卫生研究所去了。我在10月初旬约10天，奉班

长柄泽大尉命令，与另一人一起，把两瓶装有5 000c.c.的鼠疫菌株，运往大连卫生研究所。

1941年12月初旬约10天，于第四部一课柄泽班里，奉班长命令，约30名班员参加，一天操作100罐培养罐，推定制造了约5公斤的鼠疫菌。在这个期间，我参加制造这次大量生产所需的菌株有半数，约170根。

1942年4月初旬至5月初旬，制造了供给第四部三谷班的脾脱疽菌、鼠疫菌约24公斤，我在柄泽班研究室里，协助宇野诚技手研究脾脱疽菌的毒力。另外还和其他2人一起制造50根菌株，提供给制造细菌使用。这次细菌生产期间，三分之一的菌株是我制造的。三谷班将这些细菌制成了干燥细菌。

1942年6月中旬至9月中旬，于第四部一课，奉班长命令，约30名班员及其他部门来帮忙的15名，共同制造了霍乱菌、副伤寒菌、伤寒菌，推定约有140公斤。每天操作300罐培养罐。生产的细菌逐次由航空班用飞机运往中国关内去，为细菌战使用。我在这个期间犯了下列罪行：6月中旬至7月初旬，我协助宇野进行生产细菌的杂菌试验、生菌数计算和用20天的小鼠做毒力试验，并进行了生产细菌的质量检定。另外还与其他4人一起进行菌株的制造等工作。8月初旬至9月中旬，我协助宇野技手，与另一人一起，进行了生产细菌的毒力试验、杂菌试验、生菌数计算、生产细菌的检定等工作，又制造了细菌战研究所需的伤寒、霍乱、副伤寒菌的免疫血清。”①

田村良雄还供述了为细菌战输送细菌的情况，将在下文叙述。

上田弥太郎在731部队第四部统计事务室兼研究室工作，他供认：“我先后共制造出干燥细菌7 ~ 8公斤，及细菌培养原料123万c.c.，共同制造的细菌约40公斤。”②

田村良雄和上田弥太郎所供述的是一般细菌生产人员生产细菌的情况，从侧面反映了731部队大量生产细菌的事实。

据测算，每3克纯细菌用科学的手段撒布，可以污染8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各种水源。而731部队所制造的细菌以吨计数，这给人类造成多么大的灾难。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7 ~ 60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61页，中华书局，1989年。

第七节　细菌输送

731部队见习士官山下升曾做过细菌输送工作。他供认："731部队有50多处细菌输送点，主要有安达、长春、沈阳、白城子、新京、海拉尔、黑河、孙吴；关内有天津、青岛、南京、上海、杭州。这些城市的收发点都在郊外。"山下升总共输送了3次，他说："我第一次送细菌是1944年1月，从哈尔滨乘飞机到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第二次是1944年4月（时间记得不准），送到上海，住在防腐部队（他是撒布和防腐的细菌部队，距上海很远，在一个山里）有两个月，听防腐课。第三次带鼠疫、白喉、肠伤寒菌各一箱，送往南京。一般送到收发室就可以了。"[①]

1939年，日军在诺门罕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后，731部队开始大量输送各种细菌，用于细菌战。田村良雄供认了他多次输送细菌的情况：

"1939年7月上旬至8月下旬，731部队生产供'诺门罕事件'中细菌作战使用的伤寒病菌、霍乱病菌、发疹伤寒病菌。每天培殖约30桶（培养细菌用的）细菌。这些大量生产的细菌，由生产人员逐次运到将军庙、海拉尔等地，供'诺门罕事件'使用了。

1940年9月初旬，（我们）将装在蛋白质水溶液空瓶中的大约10公斤伤寒病菌放在两个木箱内（木箱内部钉有铁板），将'人造冷冻剂'装进后封起来，第二天，由航空班运到南京去了。同年7～9月，生产了伤寒、霍乱、鼠疫、炭疽等各种细菌，合计270公斤，运到南京及华中地区。1941年7～9月，所制成的伤寒、发疹伤寒、霍乱病菌，大约70公斤，由航空班运往南京使用。同年，输送给大连卫生研究所约70公斤鼠疫菌。1942年6～9月，制造伤寒、霍乱、发疹伤寒等细菌140公斤，输送到南京去了。"

柄泽十三夫也供述了石井率领的远征队使用细菌的情况，他说："1940年下半年，我所主持的一组人曾培养出70公斤伤寒菌和50公斤霍乱菌，供给由731部队另一部分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80页，中华书局，1989年。

工作人员所组成，经前该部队长石井将军率领到华中一带去的特别远征队之用。除伤寒菌和霍乱菌外，该远征队还使用过染上鼠疫的跳蚤去反对中国军队。”[①]1942 年石井所率领的远征队又在华中地区使用了 130 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热菌。川岛清也供认了这件事，他说：“当时（1942 年）第四部所执行的任务，是供给第 731 部队派出的远征队以各种细菌；此种细菌培制有 130 公斤，随即用飞机送到华中去了……（这次）只培制了副伤寒症和炭疽热两种细菌。”[②]

731 部队撒放鼠疫跳蚤，引起鼠疫流行情况，将在下文叙述。

第六章　细菌实验

第一节　动物实验

一、鼠类与跳蚤实验

（一）老鼠部队

1941 年 6 月，石井四郎从东京向日军参谋本部汇报回来后，他主持召开了本部队各部长会议。会上，他说，第 731 部队已研究好了用染有鼠疫跳蚤作为细菌武器的方法，并用这种武器去进行细菌战争。他还说，参谋本部对本部队工作极为赞赏，指示其部下继续研究生产细菌作战武器，加紧工作，提高繁殖跳蚤的生产率，在最顺利的情况下，由每三四个月内繁殖跳蚤 60 公斤，提高到 200 公斤。因为跳蚤需要依附在老鼠身上进行传播细菌，所以 731 部队需要大量的老鼠。据川岛清供认：“（石井说），一切扩大细菌武器生产办法之所以必须实行，是因为国际形势已发生变化，即德国对苏战争已经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69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271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开始，以及因为关东军中已在实施反苏军事措施准备的‘关特演’计划，所以我们军队应当充分具备有细菌武器，以便能在必要时用去反对苏联。”①

1944年以后，石井多次召开会议，命令各支队大力动员部下进行捕鼠工作。对外声称捕捉老鼠是为了防止鼠疫，实际上是制造鼠疫菌。在这种情况下，731部队的各支队都设立了老鼠捕获班，并强制中国老百姓捕捉老鼠，同时从日本本国发运大量的老鼠。各支队把主要力量都投入到捕捉饲养老鼠工作上。1945年，按大本营指示，731部队为细菌战作准备，需要一吨到两吨的跳蚤，鼠疫菌生产要求达到300公斤以上，最高要求达到800公斤。当时，731部队现存老鼠25万只，每千只老鼠能生产1公斤鼠疫菌，25万只老鼠仅能生产250公斤鼠疫菌，因此需要大量老鼠。于是731部队提出了计划增收300万只老鼠的目标。



日军细菌部队队员捕捉野生小动物



日军细菌部队队员捕捉野生小动物



日军细菌部队队员捕捉野生小动物

据林口支队长榊原秀夫供认，1945年4月，石井四郎再一次召开了支部长会议。会上，石井指示各支队要全力进行捕鼠和繁殖白鼠。会议还讨论了有关捕鼠的人员、方法、运输、防谍等问题。他说：“（会议决定）捕鼠班以军官或下士官为首组成，并按各支部人员多少为原则编成常设班。捕鼠方法以掘土捕鼠和器具捕鼠兼用。为了防谍，参加捕鼠的人员要穿便衣。所捕活鼠运交731部队第二部田中班。各支部所需捕鼠器具可到731部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120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队领取。”[①]

榊原秀夫回到林口后，他“召集了支队的干部会议，决定在林口设置一个以间所少尉为首的 25 名常设捕鼠班，专门从事捕鼠工作；另外还组织渡边中尉、岛田准尉为首的几个临时性的捕鼠班，派到‘千振开拓团’、‘龙爪开拓团’等地，以消灭‘鼠害’为名，宣传、鼓励日本开拓民以及中国的居民大量捕鼠，捕的老鼠交林口支队。”[②]

孙吴支队自从 1945 年 3 月起，由于日军在南洋一带遭到挫折以及由于对苏作战的缘故，各项工作大大加紧了，特别是捕鼠、养鼠工作。该支队长西俊英供认：“养育鼠类、搜捕鼠类和培养跳蚤以便送往第 731 部队去的工作，也加强起来，因为用染有鼠疫的跳蚤来散播鼠疫细菌，已经认为是进行细菌战的最有效手段。”[③]

牡丹江（643）支队长尾上正男供述：“（该支队供给部长神尾少尉）兼任过老鼠捕获队队长职务，并同时进行过繁殖白老鼠的工作。该队起初是由 10 人组成的。他们的任务是到各个部队及居民那里去领取捕获的老鼠，将其送到支队来，然后再由支队送到 731 部队的库房去。除此而外，由神尾少尉带领的一队人又在牡丹江城内进行过大批捕获老鼠的工作。该队内原先约有 10 ~ 14 个或 15 个人，后来在 1945 年间已增到 30 人，那时大批捕获老鼠的工作就加紧起来了。此外还有 5 个人的一个小队开始来繁殖白田鼠，而另一个也是由 5 个人组成的小队则繁殖白家鼠。我记不清楚这是在哪一月进行的。但当时支队内部的白家鼠和白田鼠很少，因而就从哈尔滨第 731 部队供给部那里领到白家鼠和白田鼠各 500 只来开始大批繁殖。支队内接着就开始了这种繁殖工作。”[④] 该支队去捕鼠的日军官兵也是穿便服。证人斋藤说：“(643 支队) 捕鼠的工作在牡丹江本城内进行得最有成效。虽然该支队位置在城外，但常常专门派士兵到牡丹江城内去捕鼠。我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146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147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③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64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④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362 ~ 363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曾亲眼看见过在牡丹江城内捕鼠的士兵。(捕鼠时)，他们全都换上了便衣免得别人知道他们是军人。(捕获的老鼠)相当部分的鼠类是留在第643支队第3部使用的，而大部分则是发送到第731部队中去。”[①]

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总务课负责捕鼠和养鼠工作。他们利用呼伦贝尔草原老鼠多的有利条件，大量进行捕捉和繁殖饲养。鼠类主要有土拨鼠(旱獭)、松鼠、黄鼠和灰田鼠。

731部队大量捕捉和饲养老鼠，用于制造鼠疫菌，因此人们称这支部队为“老鼠部队”。

(二)鼠类搜集计划、要领、协定书

1945年，日军积极准备对中国和苏联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但老鼠不足，缺乏大量生产鼠疫跳蚤的生产能力，阻碍了细菌战的实施。日军为老鼠不足而感到困惑，于是他们打着防止鼠疫、消灭鼠害的幌子，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大量捕捉、饲养老鼠。

1945年2月12日，日本关东军向伪满洲国兴农部提出索要黄鼠计划，要求所辖各省本年捕鼠30万只，协和会、青年团协办。同年4月1日。石井四郎又与伪满兴农合作社中央社理事长松岛钅 监签署了捕鼠协定书，规定了黄鼠的捕捉、收购等事宜。下面摘录有关731部队和伪满政权驱使部队和群众捕鼠和养鼠的几个文件：[②]

康德十二年度兴农部、文教部、协和会中央本部军需活田鼠搜集要领

(1945年2月24日)

第一　方针

本年度以行政力量确保军需试验用活田鼠三十万只。

第二　实施要领

一、各省负责搜集数量及搜集日期确定如附表。(附表略)

---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413～414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

二、各省根据中央计划，责成各县旗向村屯下达分配量，责成兴农合作社负责搜集。

三、由第六五九部队—氏与兴农合作社中央会理事长签署征购协定。

四、兴农合作社收购活田鼠并就地交付第六五九部队。

五、兴农合作社之收买价格为每只一元：兴农合作社向部队交售价格为成本价格。

六、所需容器及饲料由部队提供。

七、有关现场指导及验收等具体计划另定。

八、为推动征购工作，可考虑特配学用文具等。

九、对于捕获成绩优良者，政府应予以表彰。

第三　措施

一，为指导并研究有关田鼠的捕获、饲养、验收方法等事宜，在搜集开始前，由部队及兴农部派出办事人员。

二、关于此项捕获工作，须有协和青少年团之配合。

（一）149，1

关东军第731部队昭和二十年（1945年）度田鼠搜集计划

第一　方针

本年度搜集田鼠事宜，在关东军之支援下，督促满洲国行使行政权力，配合部队之现场指导，绝对确保所需数万只。

第二　实施要领

一、关于满洲国政府提出协助问题，须向总司令官提出申请。

二、政府指令与部队之现场指导相配合，要求有关各省切实执行此项任务。

三、与省方的指导相配合，部队须对有关各县旗给予具体指导。

四、同各省间的征购协定由第六五九部队长签订；同各县旗间的征购协定由第六五九部队经理课长签订。

五、各省搜集数量、搜集时期及搜集县旗见附表一。[附表略]

六、为圆满切实地开展业务，根据需要，可在各省及县旗设临时嘱托一名。

七、各县旗搜集之田鼠，可在当地合作社进行验收。但根据部队情况，可责成各县旗押运至哈尔滨，在哈尔滨吉林街分室进行验收。

九、验收仅限于活田鼠。

十、验收后的饲料由部队负责供应。

十一、有关现场指导及验收等具体计划，可同省、县、旗联系，分别制定。

十二、为推动征购工作，可特殊供应与征购数量相当之生活必需物资。就此问题，可同省、县、旗协商解决。

十三、为圆满完成运输任务，可同大陆野铁司令部、车站司令部及发送站站长联系实施。

十四、运输箱由部队准备，有关向产地运输事宜，须由验收班制定周密计划，以防产生差错。

十五、验收人员旅费另定。

（一）149，1

兴农部次长稻垣征夫致龙江省次长函
(1945 年 2 月 26 日)

目前，曾就本年度军需试验用田鼠之捕获、搜集一事，同有关机关进行磋商，决定按附件要领实施。虽因时局关系，各项业务繁忙，困难重重，但鉴于此项任务重要，仍希督促所属各机关，绝对按下列分配额超额完成捕获与征购任务，务请严格执行为荷，特此通知。

另外，为具体研究此事，将向贵省派出需要田鼠部队之负责官、合作社中央会和该部队之办事人员，望接洽是盼。

同时，在执行中，应争取协和青少年团之配合。故贵省在会商时，望邀请省督学官、

协和会省本部人员以及合作社省支部有关人员出席。

计　开

一、贵省分担只数：五万只以上。捕获期间：自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末。

二、贵省指定参加捕获的县旗：龙江县、泰来县、富裕县、讷河县。

指定县旗系去年捕获成绩优异、田鼠分布量大的地区。但可由省负责调整。

鼠疫流行地区务须绝对避免。距铁路沿线过远地区，因运输不便，亦需考虑。

三、贵省磋商日期：三月十三日上午。

（一）149，1

关子征购军用田鼠协定书 (1945 年 4 月 1 日)

（甲方）满洲第六五九部队长石井四郎

（乙方）兴农合作社中央会理事长松岛

兹根据昭和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于关东军司令部协商的有关搜集军用田鼠各项事宜，签定军用田鼠征购协定如下，

第一条 本年度军用田鼠（活鼠）的收集数为只以上，由乙方搜集并向甲方缴纳。

因作战计划变更或其他不得已之原因，甲方在数量或其他方面需要改变时，由甲、乙方协商决定之。

第二条 分配各省之田鼠征收数量及具体执行之县旗，以本协定所附计划 (C 计划略) 为基准，责由各省制定具体方案，经甲方同意后决定之。

第三条 乙方因系收买按原状活着的田鼠，故在距当地火车站最近之合作社交易场或国民学校（由当地决定）交付甲方。

第四条 甲方的验收仅限于活田鼠。

第五条 甲方在当地车站备妥验收后所需容器、装运材料和运输途中所需饲料。乙方负责车站至验收场之间的运输（包括装车），并协助甲方之装运作业。

第六条　乙方向甲方缴纳田鼠之价格包括补偿、特配品价款和各种手续费，每只一

元一角。

第七条 除第三条和第五条外，乙方可事前同甲方联系，得自行将缴纳品押运至哈尔滨交付甲方。

在此场合，关于验收场所及交售价格等按附件二 \[附件略 \] 记载办理。

第八条　关于价款支付，在各省交纳限期终结时，甲方根据兴农合作社省支部（下称省支部）申请，按正式手续支付省支部。

省支部提出该项申请时，须附以甲方任命之验收员所制定并提交之检验报告。

第九条 如因甲方负而使乙方或其协助机关蒙受损失时，甲方须考虑赔偿损失。

第十条　乙方及其协助机关须根据甲方指示严守军事机密。

第十一条 本协定书制定两份，双方签字用印后，各执一份，以作上述各条款之证据。

（一）149，1

康德十二年龙江省活田鼠搜集要领

(1945 年 4 月 1 日)

第一　方针

通过行政力量，确保于本年度提供军需试验用活田鼠六万只（使用目的：药品制造原料）。

第二　实施要领

一、各县负责搜集数量及期限见附表一。

二、各县根据省的计划，向国民学校、省立国民高等学校（协和青少年团）和村、屯、牌（邻保组织），以及开拓团的在满国民学校分配任务，责成兴农合作社负责搜集。

三、兴农合作社收购活田鼠，就地交付第六五九部队。

四、兴农合作社的收购价格为每只一元，于验收时支付。

但对于国民学校、省立中等学校、开拓团国民学校缴纳之田鼠，向各该学校统一付款，或给予相当于该项款额的学用文具。

五、所需容器及验收后的饲料由部队提供。

六、距离铁路沿线过远的地区，运输困难，应予考虑。

七、对捕获成绩优秀者，由省予以表彰。

第三　措施

一、为就有关活田鼠的捕获、饲养、验收方法等进行指导与研究，在搜集开始前，按附表二（附表二略）由部队及省派出人员。

二、此项捕获工作应争取协和会配合。

附表

第一

各县负责搜集数量及搜集期限表

一、各县分配数量

县旗	分配数量	摘要
镇东县	4，000	4，000
泰来县	9，500	9，000
杜尔伯特旗	3，000	3，000
林甸县	4，500	4，000
景星县	2，000	3，000
龙江县	2，500	15，000
富浴县	3，000	3，000
甘南县	4，000	4，000
讷河县	14，500	15，000
计	60.00	

二、各县搜集期限

县旗	搜集期限	摘要
镇东县	5.25—5.31	7日
泰来县	6.1—6.9	9日

杜尔伯特旗	6.10—6.16	7 日
林 甸 县	6.17—6.23	7 日
景 星 县	6.24—6.30	7 日
龙 江 县	5.25—6.2	9 日
富 裕 县	6.3—6.9	7 日
甘 南 县	6.10—6.16	7 日
讷 河 县	6.17—6.25	9 日

（一）14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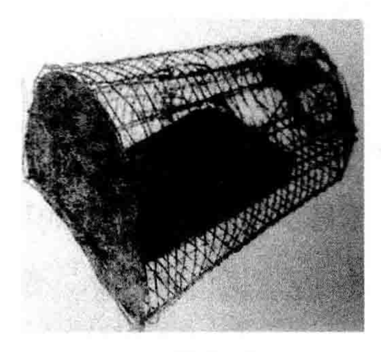
（三）鼠类征集、捕捉、输送

日军主要从四个方面成千上万地征集鼠类，即 731 部队本部及其各支队的队员亲自捕鼠；关东军给所属其他各部队、开拓团下达捕鼠任务；日伪当局向群众征集老鼠；从日本国内发运老鼠。

如上文所述，731 部队下达了以增产 300 万只老鼠为目标的命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该部队组织了专业捕鼠队，与关东军其他部队协同捕鼠，并动员群众参加捕鼠活动。该部队队员把大量的捕鼠器装在汽车上，在哈尔滨、新京等地各条街道宣传，动员居民、学生参加捕鼠活动。各支队队员也身着便装，四处散发消灭“鼠害”的小册子。各支队捕鼠量是非常大的，曾在林口支队工作过的上野雇员说，他们的捕鼠队在千振、佳木斯一带，仅用两三个星期就捕捉了 5 万只老鼠。731 部队卫生兵久留岛参加两次捕鼠活动，每次 7 天，捕鼠二三百只。各支队把捕获的老鼠大部分交给 731 部队本部，林口支队在 1945 年 4 ~ 7 月，先后送交 731 部队本部的老鼠达 2.6 万余只。海拉尔支队每年向 731 部队送老鼠 10 次，每次至少送 1 000 只。1945 年上半年，牡丹江支队共捕鼠 7 000 多只，每月往 731 部队送黄鼠 150 只、家鼠 200 只、灰鼠 200 只。直至日本投降前两天，731 部队的日本人都逃跑了，还有装黄鼠的火车运抵平房站，只是无人接货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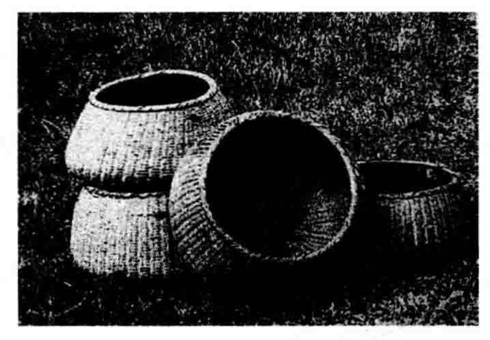
不仅各支队必须向 731 部队送老鼠，关东军其他部队和伪满当局也把捕获或饲养的大量的老鼠送往 731 部队。伪满军医少校爱新觉罗・宪均于 1935 年秋至 1939 年 10 月，供给 731 部队和 100 部队豚鼠 1 万只以上。1939 年春，双城县警察分署巡长佐藤福次强

迫群众捕获老鼠 1.5 万只以上，全都送给了石井部队。曾在哈尔滨警察厅任职的松木英雄也看见过用卡车往 731 部队送老鼠，他说："每周用卡车由哈尔滨往 731 部队送两次老鼠，我看见的有 4 次，每次一辆，都是用木箱子装的活老鼠，全是白的。装老鼠的箱子用铁丝围着。1943 年 7 月，有一辆汽车在新发屯附近出了事故，装老鼠的箱子坏了，老鼠跑了出来，由新发屯分驻所的人员协助才弄好。"[①] 据在 731 部队当过马车夫的马清林回忆，他知道老鼠是从外地用火车运来的，老鼠运进后，在日本人的监督下，由中国劳工卸火车。他曾经用马车从火车站台拉运老鼠，每个笼子装有 30 ~ 40 只老鼠。他们把成笼子的老鼠运到石井班或田中班的饲养室，饲养室是水泥地面，墙四周镶有 1 米多高的铁皮，老鼠根本跑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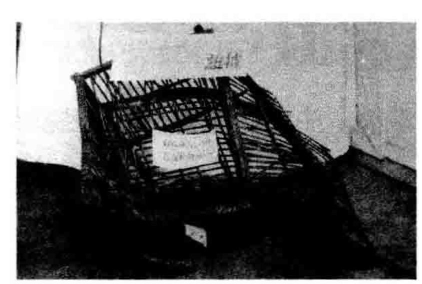
捕鼠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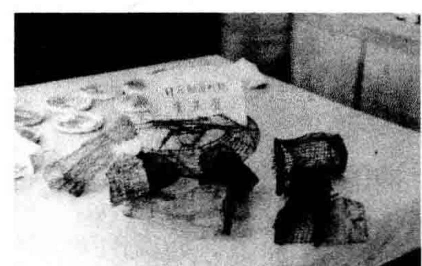
装小动物的筐



动物饲养笼



动物饲养笼



捕鼠笼



捕鼠笼

731 部队驻地周围的居民都为 731 部队捕捉过老鼠，伪满当局平房特别军事区域事务所为 731 部队征集老鼠，规定每月每户必须上缴 5 只。附近居民将老鼠交给分区事务所，事务所再派人送往 731 部队，有时 731 部队派马车把集中起来的老鼠取回。正黄旗居民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48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李忠祥说，从 1941 年开始，平房区事务所每年都给各村屯分派捕鼠任务，谁家不交也不行。大伙都到野外去捕鼠，附近的荒地挖遍了，就跑到 10 多里地以外的荒地、坟茔去挖。捕来的鼠都交给了村公所。那年，李忠祥捕获了 50 多只老鼠，交给了 731 部队。距 731 部队 10 公里以外的双城县第二区郎家烧锅、南烧锅一带的居民也被摊派了捕鼠任务。村民王启奎说，当时各村不能完成捕鼠任务，于是，731 部队就从劳务班抽调 30 名劳工组成"收鼠队"，到各村督促。"收鼠队"队员持有 731 部队颁发的身份证，他们下到各村后，由村长派人配合捕鼠。在日本人的监督下，收鼠队每天去附近各村屯转一圈，拉回两马车鼠。铁路沿线和各支队附近地区，征集鼠类任务量大，包括学生在内，每人每月上缴 5、6 只鼠。日伪当局还发给群众捕鼠笼，鼠笼长 2.5 尺，宽、高各 1 尺，网状，由日本人供料，当地百姓编织。各家各户必须尽捕鼠的义务，731 部队派人定期去收缴老鼠。当时，为了完成捕鼠任务，东北地区荒野上，许多人拎着鼠笼子奔波，四处捕鼠。各城市的学生也动员起来，参加捕鼠活动。在伪满佳木斯市公署卫生科防疫股当过雇员的许文章曾帮助日本军队把老鼠箱子往汽车上装，知道佳木斯市学生捕鼠的详细情况，他说："大约在 1944 ~ 1945 年的时候，是春天，佳木斯市西南岗子部队，通过市公署卫生科，叫全市学生捕鼠。当时，我亲眼看到每天往卫生科送老鼠有 300 多只，当日就由住西南岗子的部队来汽车用木箱子装上拉走，每箱子装三四十只。捕鼠前日本军队发了捕鼠铁笼，学生捕到老鼠后天天往卫生科送。"[①] 曾在佳木斯市协和校优级部念过书的周绍濂也证实说："1945 年春季，学校曾让学生捕鼠，并发给捕鼠笼子和捕鼠食物 (元宵那么大的面丸)。捕的老鼠送给学校，也有几个同学联合送交市公署。我当时也参加了这活动……家里也曾帮助捕鼠。捕鼠时间共有 3 个月。"[②] 从军队到地方，从农村到城市，从居民到学生，全部参加捕鼠活动。尽管这样，捕鼠目标也很难实现。1945 年 3 月 8 日，伪满洲国兴农部次长给四平、奉天、龙江、滨江、北安、锦州等省发出通知，要求本年完成 30 万只的捕鼠任务，结果没有完成任务。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149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148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为了增加捕鼠数量，731 部队采取奖罚制度向居民征集老鼠。据长春市和顺区警察署特务主任三品彦八供认：“1940 年 9 ~ 10 月间，关东军以发生鼠疫为名，强迫居民注射和捕鼠。居民如果不捕，就不发给警察署所发的一切证明。当时和顺警察署卫生系每天收到活鼠 120 只，死鼠约 240 只。全市共收活鼠约有 720 只，用木箱装好后，交给石井部队做培养细菌使用。”[①]

关于奖励捕鼠人员，731 部队向群众宣传说，交一只大耗子奖给极光牌香烟两支，交一只小耗子就奖给一支烟卷；或者交一只大老鼠奖励 1 角钱，交一只小鼠奖励 5 分钱。日伪满当局也制定了捕鼠奖励措施，下面摘录一封信函：

兴农部次长山岛崎庸一致龙江省次长函[②]

（1945 年 5 月 17 日十二兴林政第 8 号之 15）

关于本年度搜集征购军需试验用田鼠一事，特经阁下努力，已取得预期成果。为促进交售，曾拟向学童特配铅笔。但因种种情况，直至搜集期满，铅笔尚未能制出，只好特配代用品。请按征购数量，在贵省特配品分配数额内，适当分配为荷。

此项特配品业已调拨贵省合作社支部。

计开

一、四平省

手册	一捆 2 200 册	0.39 元 (单价)	858 元
小刀一捆	1 000 把	0.63 元 (单价)	630 元
计	3 200	1 488 元	

二、奉天省

手册	二捆 4 400 册	0.39 元 (单价)	1 716 元
小刀	一捆 1 000 把	0.63 元 (单价)	630 元
计	5 400	2 346 元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137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144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三、龙江省

手册	三捆 6 600 册	0.39 元（单价）	2 574 元
计	6 600	2 574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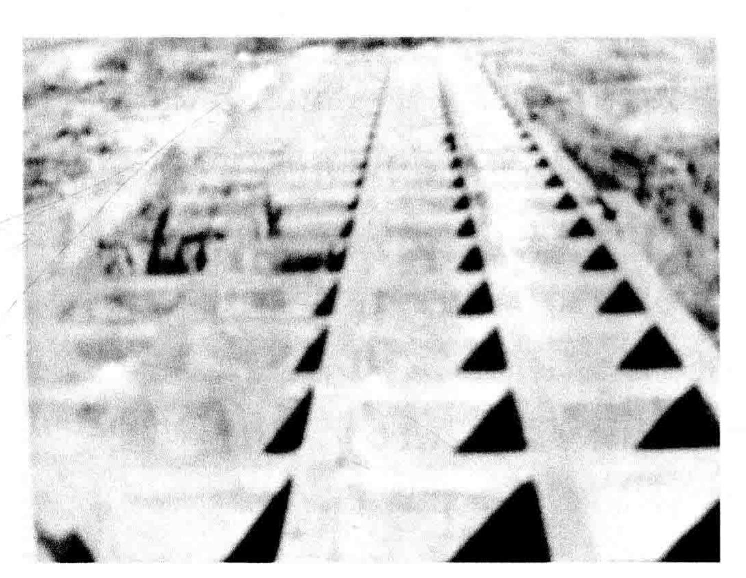
（四）鼠类饲养

1. 日本军队为细菌战饲养老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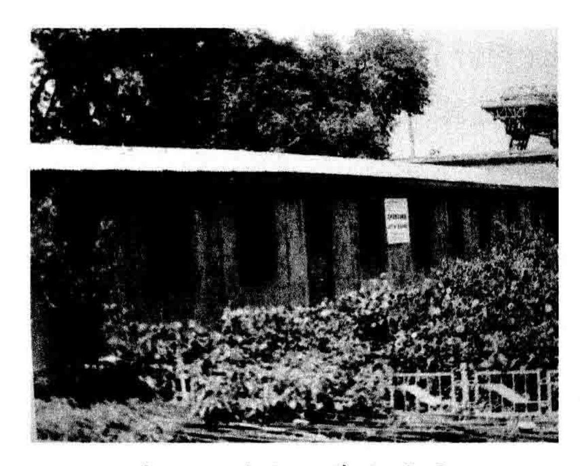
为准备细菌战，日本关东军命令各军事团、陆军医院以及各地军用仓库，都要饲养白鼠，以便供给 731 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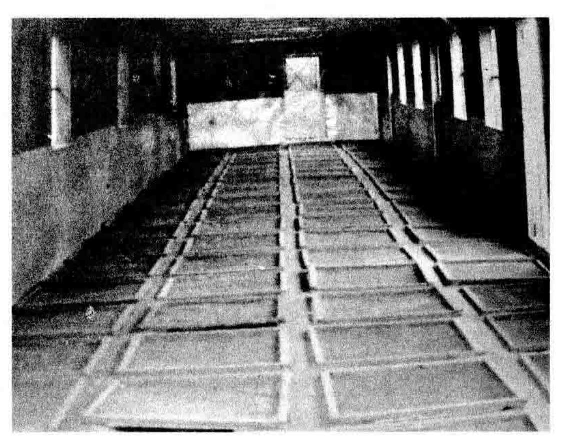
731 部队老鼠饲养员郡司阳子



黄鼠饲养室遗址



复原的黄鼠饲养室外景



复原的黄鼠饲养室内景

731 部队有个田中班饲养老鼠。白武斌维修房子时，在石井班东南角，见过一座木

板房鼠舍有24米长、4米多宽。他说："1944年春天，工务班监工原田让我干镶铁皮的活，他把我领到这座板房。这座板房门很多，东、西两头各有一个门，正南面有4个门。原田领我从南面的一个门进去。我看到里边4排卧入地下的连在一起的水泥槽子，每个槽子有1米见方，透过铁丝网看到大眼贼在里边直蹦，互相撕咬，吱哇乱叫。原田让我给板房内壁四面镶一米高的铁皮。我知道这是怕老鼠啃板墙。干活时，我顺便数了一数水泥槽子，每排24个，共96个。第二天，我继续干活时，来了四、五个日本人，他们都穿着白色工作服，戴着口罩和手套，脚穿胶皮靴子，是田中班的人。有两个人各拿一个铁夹子，伸进水泥槽里捉拿大眼贼，挺熟练，铁夹子一张开就夹住大眼贼的脖子，提上来，一松手就放进他们带来的大铝箱里，抓够几十只后，就带回田中班。在我干活的那几天，他们每天来抓走一批大眼贼。"用大眼贼搞细菌实验。鼠舍里饲养着数千只白鼠和黄鼠。白鼠是从日本运来的，供不应求。田中班还有两栋大房子里饲养红眼黄鼠，用以繁殖跳蚤。731部队还搜集来大批灰鼠，这种灰鼠毛短，不适合跳蚤繁殖。日本军医就给灰鼠注射鼠疫菌液，一两天后再从灰鼠身上抽血，检验鼠疫菌的效用。抽白鼠血，每次只选10来只，每只每次抽半酒盅，由于血型不同，实验的目的不一样，抽取的白鼠血，有时混装存在一个瓶子里，有时单装一只白鼠的血。中国劳工负责给老鼠运送饲料，清理粪便，不准进入白鼠舍。日本人自己调配饲料，喂养白鼠。

731部队许多少年队员都饲养过老鼠。秋山浩形容说，鼠舍里有数不清的老鼠，仅小白鼠就有10来万只。营房里到处都散发着尿臊般的老鼠的臊臭气味。书中叙述了饲养、捕捉、解剖老鼠的情况："营里边住着40几个满洲人夫役，做些除草、搬运饲料和煤炭等工作，他们绝对不能离开营房一步。这些人都是终身没有生还希望的劳工。这些动物的主要饲料是麦类、黍类和豆饼等等。仅仅饲料仓库就有四、五层钢筋结构的大楼那么大。鼠疫班给我们的任务是观察鼷鼠和豚鼠的生活状态以及熟悉管理它们的方法。我跟佐川技术员学习，从捕捉方法开始以至注射、采血、宰杀和解剖方法等等，都一次接着一次地练习着做……捉（老鼠）的方法是把鼷鼠放在铁丝网上让它爬，随后一抓住它的尾巴，它就会紧蹬着四条腿，想往前爬，这样一来，它的身体就固定下来。趁这个时候，用手捏住它的两耳和颈皮，向上提起，不过，它总是要用通红的小爪，紧紧地抓住铁丝网，

这时候必须硬拉开。”[①]饲养班的日本人从事的工作不仅仅是喂养老鼠，更重要的是捕捉、解剖老鼠，繁殖跳蚤，培养采集鼠疫菌。

安达细菌工厂也饲养老鼠，1943 年春天，鞠守忠去安达飞机场给日本人劁猪，曾见过穿着白衣服、戴着胶皮手套，穿着胶皮靴子，戴着口罩的日本军医往来于地下室。现在看来。这些人是细菌实验工作人员。新中国建立后，鞠守忠、刘兴州、杨君等人在烧毁的房子旁边，看见过装有耗子、大眼贼的铁笼子。731 部队各支队都喂养老鼠。海拉尔支队原队员谷崎说，他和另一个人一年要养 3 000 只黑鼠。1945 年夏天，该支队饲养各种老鼠达 13 000 多只。孙吴支队的 15 间双层饲养室中，收养老鼠 1 000 多只。林口支队饲养的大白鼠有 5 000 多只，小白鼠 1 000 多只。牡丹江支队有两个鼠类繁殖班，平时饲养白鼠和黄鼠千余只。

2. 日本民众为细菌战饲养、输送鼠类

从某种意义上讲，731 细菌部队得到了本土民众的支持。日本土奇玉县立庄和高级中学地理历史研究部的高中生们，在挖掘乡土历史的过程中，了解到自己生活的乡镇曾细菌部队提供了大量的老鼠。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由远藤光司、野泽丈二、小谷中政树、藤谷元文撰写了调查情况报告《731 部队与土奇玉鼠》。下面摘录这篇调查报告中有关饲养老鼠的 3 个部分：

白老鼠从何处而来

军部的老鼠增产计划之中心地，是把土奇玉县东部作为老鼠的供给地。据陆军省医务局医事课长金原节三大佐的日记，可以看出（1945 年）老鼠生产的情况。

“1. 以粕壁（今土奇玉县春日部市）一带为主力，每家 30 只，每 4 000 家为一个组合，本年度预定：土奇玉 47.5 万只，茨城 20.5 万只，枥木 6.45 万只，计 74.45 万只。2. 如果对土奇玉县补给饲料，预计增产 20 万只，最大产量可达 100 万只。”

另据《井本日记》，“土奇玉预计 5 月间 5 ～ 7 万只，6 月 10 万只，7 月 15 万只，8 月 20 万只。20 万只的老鼠饲料，每月需碎米 90 吨。”可见，土奇玉县处于老鼠增产

① 〔日〕秋山浩：《七三一细菌部队》，第 18 页，群众出版社，北京编译社译，1982 年。

计划中心的地位。

以下，介绍土奇玉鼠向中国南方细菌部队输送的几份证言。

据原防疫给水部陆军主计天野良治证实：“1942 年，该氏根据满洲的‘订货’前往土奇玉收购老鼠，除土奇玉外未去它处，主要从春日部、南樱井、小边（现庄和町）每月运出 5 万只，再通过防疫给水本部分派给各部队，其中半数以上输送给 731 部队，利用运送‘马路大’尸体的飞机，从立川直抵平房。”

春日部业者 A 氏证实：“防疫给水部队每周六约运送 3 次老鼠，特别是 731 部队需用的食饵量为多，‘731 部队’这个词是引为自豪的话语，经常被使用。”

新加坡细菌部队宰领官（监督、管理官—译者注）B 氏证实：“1944 年 10 月，三架 731 专用飞机运至新加坡 5 万只老鼠和 5 吨跳蚤，那些老鼠每 50 只关进一个笼子，是从土奇玉运来的。”

从上述的证言和军人的记录中可知，大量的老鼠是从土奇玉运送给各细菌部队的。

大量生产老鼠的农民们

访问春日部市和庄和町的农家，当时几乎家家都饲养过老鼠。土奇玉县东部的老鼠饲养，是从明治时期饲养玩物鼠开始的，大正时期作为实验品提供给各大学。贫苦自耕农居多的这个地域，仅仅把饲养老鼠作为副业收入。所以，饲养老鼠这一副业是受欢迎的。

饲养方法是利用一面有金属网的木箱子，放入一只雄鼠，五只雌鼠使其繁殖，这一工作由老人进行，每人可饲养 10 箱左右，喂一些碎米野草等，不需要特别的费用。巡回往农家收购老鼠的中介人称之“老鼠屋”（屋为 ×× 商之意——译者注）。据某“老鼠屋”介绍，昭和初年每周可收购 150 只左右，其所在町计有 10 家“老鼠屋”，这样计算开来，两个町每月可繁殖老鼠 600 只左右，然后通过“老鼠屋”各研究所或东京的中介人。

与军部建立联系的“老鼠屋”

战争条件下资材的欠缺，饲养箱需用的金属网和木材很难搞到，然而，小泽氏却从军部搞到了大量的木材、金属以及豆制品等，小泽以这些物品为报酬招募生产者，他们的 3 个仓库里豆制品堆积如山。

小泽经常去艺居行招待生产者，制作宣传饲养老鼠的影片，在学校里招集农民观看。战败之前，据说陆军省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利用全国的学校辟为（老鼠）饲养场。这样，一个时期以来，在春日部一带“为了国家”必须饲养老鼠的舆论甚嚣尘上，“土奇玉县领先自身的力量便可以增产（老鼠）”，“整个家庭都要被强制饲养老鼠”等流言，是以军部的力量为背景，虽然具有讽刺意义，却使战争中老鼠的繁殖事业呈现热潮。

这样，力图改变小规模经营方式的“老鼠屋”小泽市三郎登场。他是从1930年开始收购老鼠的，为了尽早成为军部专属的实验动物收购业者，他设立了土奇玉县医科学试验动物生产实行组合，在战争时期，把其他“老鼠屋”业者集中于伞下，几乎形成了垄断状态。如同前述，由于小泽氏老鼠繁殖业的组织化和扩大化，他与军部的关系可以从《土奇玉新闻》1943年12月10日的报导得以证实：

“粕壁小动物增产协议会。

由陆军军医学校特定土奇玉县农会指定的医科学试验动物生产实行组合主办的小动物增产协议会，于9日下午一时在粕壁町东武座召开。国民仪礼后，小泽组合长致词，因小动物增产在决战时局下具有重要之使命，故签订了关于增产之决议。县官与军部来宾作了训示与讲话。”

联络小泽与军部建立关系的是731部队员小林喜作。小林毕业于军医学校，731部队服务9年，他的新宿若松住所与石井四郎是近郊，又与小泽是老朋友。

小林担任731部队资材调达官不久，劝说小泽为军部服务。战后，小林效命于小泽的手下，担当会计主任。

饲养老鼠的农民们对细菌战一无所知，可是，一些“老鼠屋”却知道细菌战与老鼠的利用法。战败时因失去买主，大量老鼠“库存”，某“老鼠屋”的儿子问其原由，其父明确地告之道：“满洲不再购买老鼠，老鼠是用于细菌战的。”（其子证言）。战时，“老鼠屋”们都频繁出入防疫给水部，同小林喜作建立了密切关系。

该文还讲了战后土奇玉县农民持续饲养老鼠，通过小林向美军406部队供应老鼠的

情况。[1]

（五）疫鼠跳蚤培养

731部队使用老鼠及其他鼠类动物培养染有鼠疫的跳蚤，该部队内拥有4 500具用鼠类血液繁殖跳蚤的孵育器，这种孵育器在一个生产周期内（3 ~ 4个月）就能培养几公斤染有鼠疫的跳蚤，这几公斤跳蚤的重量相当于数千万个用来制造细菌武器的跳蚤。该部队第二部有4栋专门饲养跳蚤的房间，房间里分成许多格子，格子上摆放着一排排铁盒子，这些铁盒子是孵育跳蚤的繁殖器。川岛清供述了生产繁殖跳蚤的设备及生产过程，他说："培养跳蚤这种传染病媒介物的仪器设备如下：本部队第二部有些特别装备的房间，其中可以存放约4 500具孵育器。每具孵育器内在一个月过程中轮流放进三四个白老鼠，用一种特别管制器把这些老鼠固定在孵育器内。那里面放有营养液和几个跳蚤。孵育期为三四个月，在这一个期间内，每具孵育器约培养出10公斤跳蚤。这样，在每三四个月中，该部队内总共培养出约45公斤能传染鼠疫的跳蚤。"[2]他还说，这种繁殖跳蚤的房舍内经常保持着摄氏零上30度的温度。用来繁殖鼠疫跳蚤的是些高30公斤宽50公分的铁盒子。这种盒子内撒有一层米壳来保养跳蚤。之后，放1只白鼠，白鼠的四肢用绳线捆住，以免伤害跳蚤，再放入几个种跳蚤，跳蚤以白鼠作为食物，3 ~ 4个月后，便可收获跳蚤了。一般情况下，一只培养器可收获跳蚤10 ~ 15公斤。一个生产周期最高可生产45公斤跳蚤。为了便于采集跳蚤，在跳蚤培养器的相对方向各设置一个小孔。采集跳蚤时，从一侧的小孔里射入强光，厌光的跳蚤就会从光线弱的方向从小孔里逃出来，落入事先备好的器皿里，将其捕获。新繁殖的跳蚤为无菌跳蚤。把无菌跳蚤放入疫鼠饲养笼里，当跳蚤吸食了疫鼠的血液后，跳蚤就毒化了。进行细菌战时，施放疫鼠疫蚤，就能达到攻击的目的。

731部队原队员镰田回忆，他在降旗班做鼠疫、疫苗的研究助手，该班把跳蚤确定

---

① 杨玉林、辛培林：《细菌战》，第64 ~ 6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119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为鼠疫传染媒介物。他们在田中技师指导下繁殖跳蚤。每个鼠笼里放20只疫鼠，每只疫鼠身上附着千余个跳蚤。当疫蚤培养成以后，那些疫鼠就死了。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把疫蚤收进专用的盒里带走，再把死老鼠用火烧掉。原少年队员小笠原当年也是专门培殖跳蚤的，他们把染疫的黄鼠、白鼠、褐鼠放在跳蚤培养箱里，每只箱子里放20只老鼠。当数万跳蚤吸食毒化后，那些老鼠就死掉了。他们把鼠疫跳蚤采集后，交给航空班，运到细菌战场上去了。小笠原还证实，田中班培殖大量的跳蚤，需要动物血作饲料，最好用人血。每当需要人血时，他奉命到731部队监狱里去取“马路大”的2 000 ~ 3 000cc血，来作饲料，繁殖跳蚤。

1940年春天，731部队原少年队员筱土家良雄参与了田中班大量繁殖跳蚤的活动。他说：“这次是用类似石油罐这样的容器，里面放有未脱粒的小麦。其间有装着黑色老鼠的笼子，如果笼子里的老鼠死了，就换另一只。这项工作也是少年队员被命令轮流做的。我们怎么处理这些跳蚤呢？3个月后开始进行跳蚤和跳蚤的分离。具体情况是：当时，用很浅的浴缸，是白色陶瓷的那种来进行。怎么进行呢？浴缸一侧放一个红色电灯泡，在浴缸放水的小洞上方接有一个玻璃容器，比较大一种有3 000cc容量。放在洞旁边，把红色灯泡通上电，然后将装满跳蚤的罐子放在浴缸中打开，再搅拌一下，跳蚤有向暗处跑的习性，因此它们就跑到容器中去了。这样跳蚤又大量增加，总数大概多少不清楚。我做的就是这种工作，这样将跳蚤分离的工作我只干过一天。”① 这些鼠疫跳蚤运到南京去了。

1941年，731部队在充分条件下，年产染有鼠疫的跳蚤约200公斤。石井四郎在本部队各部部长会议上说，他接到了日军参谋总长的指示信，信中的主要内容是陆军总参谋部肯定了731部队在准备细菌战方面，特别是在大批繁殖鼠疫跳蚤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绩，鼠疫跳蚤有巨大的战略意义，要加紧研究生产鼠疫跳蚤。石井四郎认为731部队工作还不够好，最大的弱点是繁殖鼠疫跳蚤的生产能力很低，满足不了细菌战的需要，因此必须集中全部注意力去大批繁殖跳蚤。此后，生产鼠疫跳蚤的指标愈来愈高，到

① 金成民等：《跨国取证七三一》第3 ~ 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1945 年，要求最高达到 800 公斤，实质上没有完成跳蚤生产任务。

后来，在中国战场上，731 部队多次用撒布的方法投掷这种鼠疫跳蚤，从而导致了鼠疫大流行。

二、马匹实验

（一）马血的抽取

731 部队石井班和二木班饲养了许多马，这些马有从日本用船运来的洋马，也有从内蒙古运来的马。马刚运来时，都很瘦。石井班、二木班的喂马的劳工起初以为日本人养的是战马，后来发现养马是为了抽血，搞细菌实验，制造血清等。他们经常看见穿白色防疫服的日本人给马量体温、注射药水、抽马血。正黄旗二屯的赵官喜从 1939 年开始在 731 部队做了 6 年劳工，期间喂了 3 年马。他说，日本人养的马，马屁股上都烙上了号码，按马的编号搞实验。抽马血前，每隔几天，日本军医就来马厩转悠，选中几匹马，吩咐中国劳工对某某号马要精心喂养，甚至单槽饲养，劳工们就知道这匹马即将被抽血了。马上膘后不几天，日本军医就带着粗大的注射器（针管长 1 尺、粗 2 寸）、铝制的圆型大肚血清瓶，来到马厩，让劳工把事先选定的马牵到在一个单间里，用绳子在拴马架上将马的四条腿拴牢，而后日本军医在马脖子上消毒扎针抽血。每次抽 1 000 毫升，隔周抽一次。总共抽四、五次，马就死了。有时，日本军医用抽血泵抽血，几分钟后，马的血就被抽干了。干杂活的方振玉多次见过日本军医给马抽血。他说，那次日本人选了 4 匹马，从每匹马身上抽 6 大瓶血，转眼间，马就死了。

劳工黄国荣在石井班喂马，他刚去那年，石井班从齐齐哈尔地区买来 70 多匹马，他分养 13 匹。半年后，他们喂养的这批马个个膘肥体壮，日本人先后选中 5 匹马抽了 6 000 毫升血。第二天，日本军医又拿来血泵抽血，准备抽血。使用血泵之前，设法让马剧烈运动，黄国荣亲眼看到日本人让一个劳工骑着马狂奔。马回来后，喘息未定，日本军医立即把马捆绑在桩子上，打开血泵一抽，那马就四肢哆嗦，不一会儿就耷拉了头，一松绑就栽倒在地上，日本人命令劳工把死马运到北岗焚尸炉烧掉。抽血前，日本军医在瓶子里放一颗类似玻璃球大小的白色药丸，药丸溶进血液里，血就不凝固了。

王继学证实：他曾亲自用马车把 3 匹被抽血致死的马运到焚尸炉烧掉。

有个劳工问日本军医抽马血做什么？日本军医回答说：“制造药品。”

供抽血的马，没等这批用完，又从外地运进一批，石井班的马总保持 100 匹左右。

二木班是结核病研究班，从事人体实验。他们也养马，因为结核病是人畜共患的疾病。劳工赵官喜说：“我在石井班干了 2 年，后又被调到二木班，还是喂马。二木班在石井班南边，紧挨着，那里有一栋马厩，还有一个猪圈。二木班的研究室是平房，里面很干净。二木技师每日都摆弄些瓶瓶罐罐，不准中国人看，因此外人摸不准实情。但有一点大家都知道：他们和石井班都抽马血。他们也养猪，保存猪血。”

日本人物色了一个叫潘义发的中国人往四方楼里送马血。潘义发，正黄旗三屯人，为人特别憨厚，在别人看来他有点缺心眼，因此被日本人看中。日本军医抽完数十管马血后，放到一个铁篮子里，让潘义发挎着送到四方楼门口，不准进屋。潘义发很守规矩。日本人夸他是“挺好的良民”。有一次，潘义发病了，就让其父顶替他送了几天马血。潘义发病好上班后，有一天，他把马血送到四方楼门口交给日本人，不经意随日本人走进四方楼。他站在四方楼的走廊里，透过玻璃窗看热闹。被日本人发现后，挨了两个耳光。随后，潘义发去挖壕沟去了。由日本人自己采送马血了。

（二）马炭疽病实验

1934 年 8 月，石井四郎部队在马身上进行栽种炭疽菌实验，用炭疽菌大批注射，杀死马匹，观察实验结果。种村文三在铁道第三联队第一大队任卫生曹长时，受大队长阿久井萨雄工兵少佐的命令，在黑河线辰清站，督促 15 名中国劳工掩埋石井部队用细菌杀死的 100 多匹马。在处理死马过程中，种村文三曾把一匹死马扔进了河里，污染了河水，给下游人民带来了危害。他还配合石井四郎派来的两名军属，在一匹死马身上采集炭疽菌式样。两名军属将死马伤口上的血沾在馒头上，带回了哈尔滨。

种村文三供述了石井部队进行马炭疽菌实验的事实，他说：“当时有关这百余匹中国马死的情况，是正在向辰清站搬运铁道器材时，我听森岛军医说，是石井四郎为了实验炭疽菌的效力。用这些马实地实验杀死的；同时在哈尔滨未出发前，我听大队长说辰清站发生了炭疽菌传染病，要带上滤水器。并且森岛军医大尉说，患炭疽病死后，血不凝固，当我埋死马时，见到马口流出的血和被狼所咬伤的地方流出的血，均不凝固，证

明这就是炭疽菌病的症状；加上我亲眼看到石井四郎所派的军属在死马身上取炭疽菌拿回哈尔滨，因此我知道这些马是石井四郎用炭疽菌杀死的。”[①]

这次马炭疽菌实验，是否造成人间炭疽病流行，因未调查，种村文三不清楚。

三、虱子喂养

劳工郑学贵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1940 年的春天，731 部队平房镇住满了日本人，他们不知从哪里征来一批劳工。当时，劳工棚正在维修。郑学贵负责运施工材料。一天，他看见日本人从工棚里带走 10 个年过半百的老头。日军头目让翻译李初亭传达他们的意思说：“你们年纪大了，去干些轻活吧！”这 10 个人不知道日本人要的是什么花招。没过多久，正值炎热的夏季，郑学贵到田中班大院干杂活。他看见从一间低矮的茅草房里走出一个穿着翻着棉花的破棉裤棉袄的人，他挑着一副水桶，去井边打水。郑学贵见没有日本人，走过去问老人大夏天怎么还穿棉衣服？那个老人讲了他们的悲惨遭遇：“日本人不让换单衣，让我们 10 个人养虱子。每天交 100 个，都得像火柴头那么大，不够数不行。每天都有日本军医来取，一收就收一铝盒。为了养虱子，我们整天穿着‘开花’的棉裤棉袄，连睡觉都不准脱。大热天连捂带咬，俺们都喘不过气来。小虱子，他们不要，还得放回身上去养。交不够虱子就挨打。每天还打预防针，扎得胳膊上都是针眼。”这 10 个劳工不堪虐待，相继死去了。日本人把他们偷偷地埋在正黄旗五屯的劳工坟里。



动物饲养班班长石井三男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50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四、动物饲养班

（一）石井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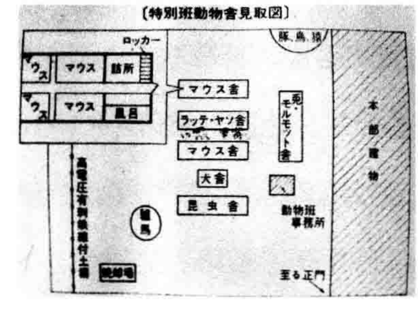
在四方楼两侧有 10 余栋砖瓦结构、水暖设备齐全的平房，这里是 731 部队的动物饲养场。石井班主要饲养马、牛、羊、骆驼、江豚、老鼠、狗、鸡、猪。这些动物均为细菌实验材料。

石井特别饲养班有 10 来个日本人，中国劳工 40 多人。班长石井三男，是石井四郎的三哥，为畜牧技师。石井四郎委任他三哥管理动物班，是为了实行家族式的统治。在 731 部队，石井三男很受器重，他身着军服，为佩红色刀带的佐官，而大多数班长佩蓝色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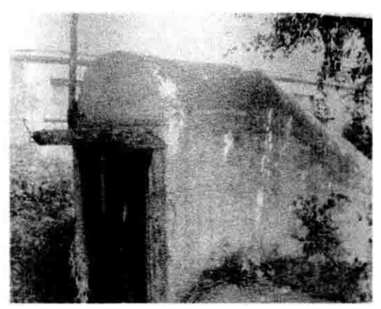
该班下设事务所，有马厩 4 栋，马存栏 120 匹左右。此外还有临时供实验用的露天马圈，养有当地或朝鲜马 40 余匹。有数千只老鼠，最高达数万只、80 口猪、5 只羊、10 多头牛、13 头骆驼、20 多条狗。还有鹿、骡子、猴子、鸡、江豚、麻雀等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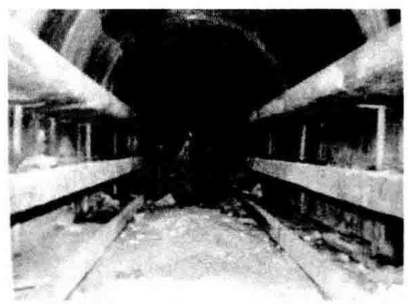
动物饲草、饲料由八木班供应。该班有 4 个菜窖，贮存着大量白菜、胡萝卜等。还有饲料、菜类加工房。中国劳工负责加工、保管、运输各种饲料。老鼠、江豚、猴子由劳工送饲料，日本人喂养。白鼠、狗舍不准中国人进出。中国劳工负责饲养马及清理粪便工作。

动物主要来源于中国各地，白鼠是从日本专程运来的。



石井班部分动物舍分布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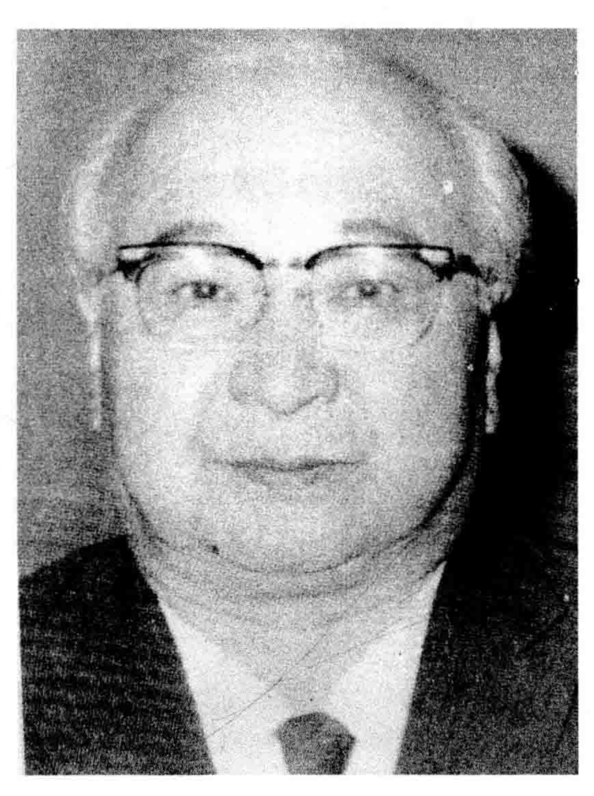

小动物地下饲养室外景


小动物地下饲养室内景

黄国荣曾在石井班饲养马，他说，石井班大院简直就是一个动物园。吕万山在石井班搞维修时，曾见过日本人用金属笼子运来数以万计的各种老鼠。王继学给石井班运送饲料，他说，石井班南部为大动物的棚舍，劳工大都在这里干活。北边是鼠类动物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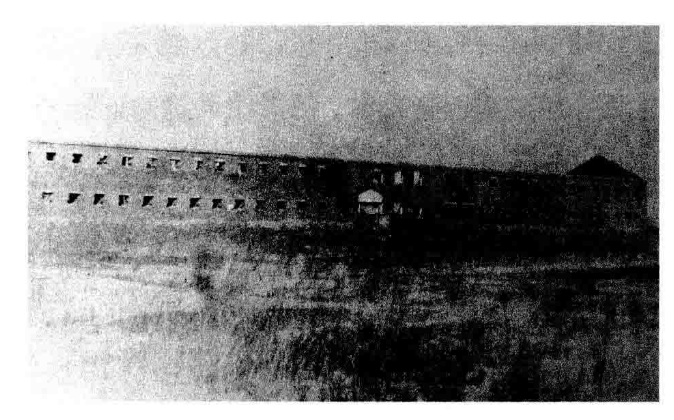
劳工去清理粪便，喂养由日本人承担。他从八木班运饲料，主要饲料有苞米、高粱、大麦、胡萝卜、白菜、苜蓿、饲草等。粮食类运到粮库，蔬菜类运到菜窖。每天往动物舍运送一、两次饲料。给鼠舍送饲料，只送到门口，由日本人自己往屋里搬运。隔几天就拉一次动物粪便，送往八木班作肥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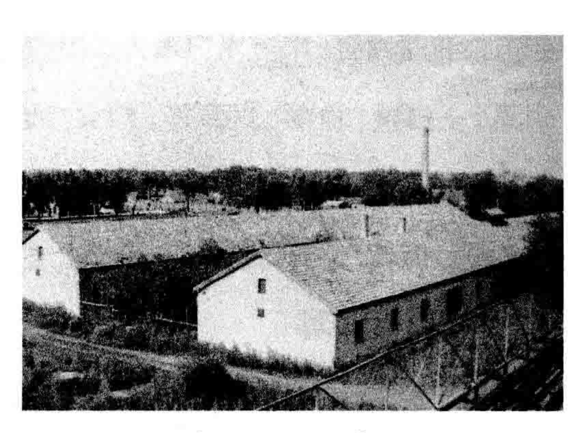
（二）田中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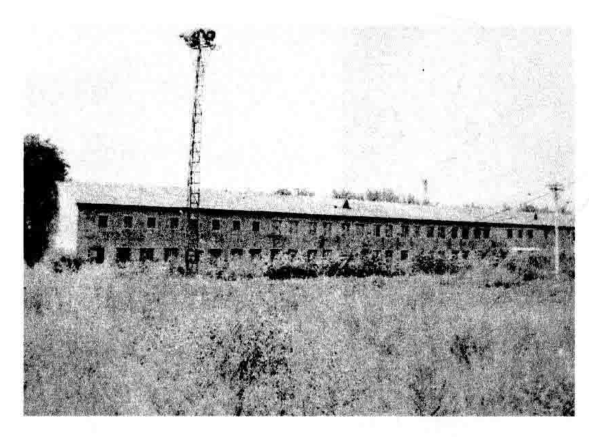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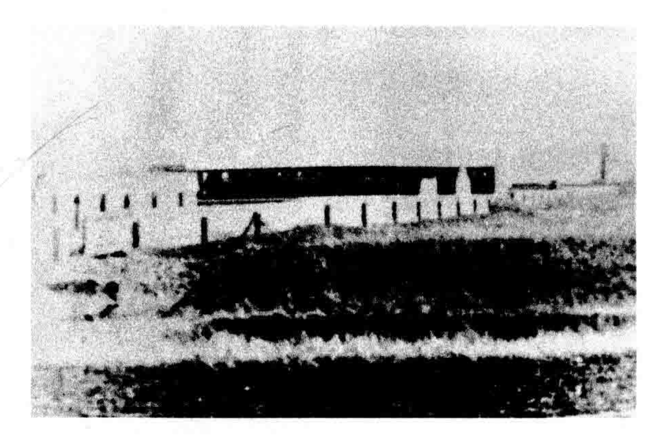
昆虫班班长田中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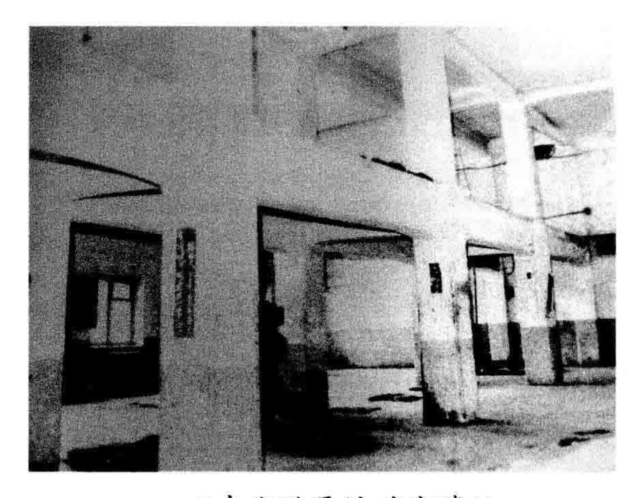
田中班在四方楼东北侧，为单独院落，面积很大，院北有一座门型大瓦房，往南是一座工字型的瓦房，最南面有 2 座 200 米长的二层楼。窗户很小，宽 30 公分、长 45 公分，不像住宅。其余为空场。四围是 2 米高的砖墙，西、南面均有门，是昆虫研究班，也称田中研究室。班长是田中大佐。主要饲养老鼠、跳蚤、虱子。这里是鼠疫菌培养基地。为了保密，日本人经常使用隐语，称老鼠为“饼”，白鼠为“白饼”，黑鼠为“黑饼”；跳蚤为“粟子”，虱子叫“穗子”。田中班西侧修筑了一个排水池，细菌研究所的废水通过这个排水池流往新五屯旁边的沟子里。污水有剧毒，饮用或落入水中的动物，均会致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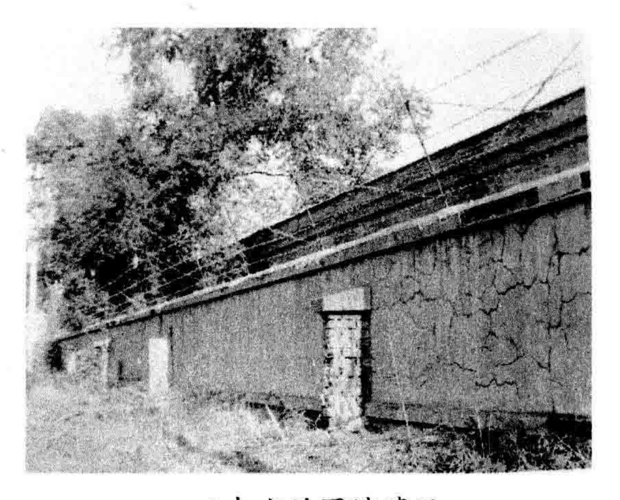

田中班外景


田中班昆虫舍遗址


田中班昆虫舍遗址


田中班昆虫舍遗址


田中班跳蚤培殖室遗址


田中班的围墙遗址

这个班还有陶瓷炸弹。另有坂井班汽车队，有两台罩着帆布的大汽车和一辆内座上备有铁脖链、铁腰链和铁脚链。据说这是拉“犯人”的车。石井四郎每天都到这个班检查部署工作。山田乙三曾视察过田中班，他说：“在另一间屋子里，我看见一些装有极

多活跳蚤的特别箱子。有人告诉我说，这些跳蚤是专门用来染受鼠疫的，跳蚤染上鼠疫之后，就能用去传染鼠疫病。”①

吴邦富在田中大院割过野草。他看见日本人经常往老鼠舍搬运铝箱和汽油桶，还看见鼠房里有许多金属笼子，笼子里装的都是红眼老鼠。日本军医用红眼老鼠繁殖数以万计的跳蚤。

此外，安达飞机场以及各支队都饲养了供细菌实验用的各种动物。

第二节　植物实验

731 部队八木班位于四方楼以西，东乡村道北，有一座平房建筑。班长是农牧技师八木泽，下设事务所、实验室。农忙季节有劳工 50 多人，还从附近村屯雇用短工。冬季，部分劳工转到石井班干活。该班专门从事植物病毒研究，经营一个实验农场，有土地 10 多垧，分 3 片，一片在八木班事务所北面，主要种植黍类、豆类及各种蔬菜；一片在教育部东南，主要种植小麦；一片在建设班南面，是苜蓿地。此外，还有蔬菜暖棚。



植物病毒研究班班长八木泽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93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该实验农场所种粮食、蔬菜、饲草等农作物，主要供应石井班。另一部分农作物则用于植物病毒实验。八木班有一大片麦田，专门培植“乌米”麦子，麦子长成后，麦穗为黑穗，称“乌米”。日本人特别看好“乌米”，麦子秀穗时节，派劳工日夜看守，防备鸟吃掉。“乌米”麦子成熟后，日本人监督劳工连麦棵一起拔掉捆好，运到北岗的大院里垛好。“乌米”麦田附近的不少农作物都得了黑穗病，小麦、苞米的“乌米”特别多。附近田地里的“乌米”长成后，日本人就抽调劳工采集“乌米”。每年秋季，731 部队还从外地成车皮地运来“乌米”麦捆，裴富卸过“乌米”麦捆，日本人让裴富他们赶马车把“乌米”运到了火磨大院。他们迫使中国劳工把“乌米”麦穗粉碎后，装进麻袋，再用火车运走。731 部队把“乌米”运到外地后，在麦子、苞米、谷子、高粱等农作物扬花季节，遍撒在田地里，大面积地传染黑穗病，造成粮食绝产。

八木班为了加工“乌米”，还从哈尔滨运来一套粉碎设备，动用 700 余人建筑粉碎车间，还没有竣工，日本人就投降了。

曾在八木班种地的关文明回忆，八木班的大田主要种麦子，每块地种一个品种，试验田里都插着木牌，田间由中国劳工管理。麦子秀穗时，日本人派关文明和于孔达看麦田。他们在田里插上假人，吓唬麻雀；麻雀一来，他们就敲铜盆，轰跑麻雀。秋收时，麦子全是“乌米”。日本人不让用刀割麦，让用手拔。轻捆轻放，统一用马车运到火磨大院。到了冬季，日本人亲手将“乌米”连麦杆全都粉成碎末，装上麻袋，成车皮运走。日本人还让劳工去附近庄稼地里采“乌米”。1945 年夏天，动力班的金国忠等 10 多个锅炉工也被抽调去采“乌米”。日本人给他们配了一辆马车，20 多条草袋子。到正红旗头屯、五屯苞米地里采“乌米”。大热天，日本人不让吃饭、喝水，直到把草袋子全都装满，运到火磨大院，才让回家。侯安钦见过火磨。火磨是一台小型粉碎机，用来粉碎饲料和“乌米”。

日本人还从外地成车皮地运进“乌米”，裴富卸过“乌米”，日本人让裴富他们赶马车把“乌米”运到了火磨大院。

鞠家窑吴殿有及富本村的教师证实：“1944 ~ 1945 年，日军通过合作社向群众要麦子、高粱、苞米、乌米，佟家屯妇女因采乌米手都磨破了。向富本村学校每班要

100 斤麦子、乌米。日本军在安达县城南边设立一处 5 垧麦地，作毁灭麦田的试验场，当麦子灌浆时，日本军强迫学生用药水接种（隔一步远注射一棵或二棵），日后所有的麦子都得了黑穗病（麦粒黑色硬化）。”[①] 由此可见，日军的“乌米”是培植出来的，又运到各地进行撒播，其根本目的是用细菌大面积破坏农作物，从农业经济上给人类带来危害。

第三节　人体实验

一、人体实验的发明与组织实施

为检查细菌武器的效能，石井四郎发明了利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他说：“鼠疫流行在自然条件下是容易发生的，但要用人工办法来造成流行病就不那么容易了。原因是，仅有传染源和传染媒介还不足以促成疾病的流行，为此还要明白知道人的生理条件和生理特点。只有在研究人的生理特点条件下，才能知道用人工办法引起疾病的流行的条件。研究生理特性的工作，是要用活人作实验的，进行这种实验时用的中国人，它既可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也可在野外条件下进行的。这就是本部队的秘密中的秘密。”[②] 各种材料证明，石井四郎和他的731部队利用残酷的方法进行人体实验，成千累万地杀害活人，凡是被用作“实验的材料”，押解到 731 部队监狱里去的人，他们包括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就不可能有生还的希望。

这种罪恶的实验，是经过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的认可和同意的。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供认：“从北野和田村两人的报告中，我知道有用活人进行实验的事实……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一举，原是由我的前任人梅津将军或植田将军批准的。在这点上，我承认我的罪过是，我明知道有对活人进行实验的事实，却准许人们去进行此种实验，因而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81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第 41 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

我在事实上也就是批准了强行杀害那些都是由我所管辖的关东军宪兵队机关和各日本军事团送去受实验的中国人，俄国人和满洲本地人。”[①] 在伯力审判时，山田乙三企图推卸责任，他说：“从前我个人以为送到第 731 部队去的都是些已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所以我当时得出了结论，认为这些人都是由满洲国法庭判处了死刑。”[②] 其实，山田乙三在接任关东军总司令职务之前，即 1943 年 3 月 12 日，从关东军宪兵队颁发的命令可以确认，当时把活人押到 731 部队去杀害是未经任何调查和审判的。关于这一点，山田乙三很清楚。731 部队长北野和关东军干部部长田村都向山田详细汇报了 731 部队内部监狱里监押着大批用来实验的活人。而且，在山田继任关东军总司令之后，731 部队继续进行残暴的活人实验。因此，山田乙三及其前任对石井部队进行人体实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实石井四郎的人体实验原比这更早些，他的实验活动得到了日本参谋本部的支持，据梶塚隆二供述，石井四郎最初开始这一罪恶活动时起，就获得有日军参谋本部方面的支援。有事实表明，石井四郎早在东京陆军军医学院研究细菌武器时，就已在活人身上从事罪恶的实验。迁移中国东北后，在哈尔滨南栋的诊疗部，表面上，它是治病的场所，实际上那里的日本军医给“犯人”治疗，无论病情如何，治疗效果如何，他们最终都是不会活命的。在背荫河时期，731 部队除少数暴动越狱的人外，监狱里数以千计的“犯人”无一幸免。在哈尔滨平房镇，731 部队第一部管辖“四方楼”秘密监狱里关押着受实验的人，他们的遭遇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这里是一座人间地狱，通过特别移送，进来的是活人，抬出去的是尸体，他们都是不同的实验对象，但有共同的命运，最终都被送进焚尸炉。其实，731 部队不仅仅限定在第一部和第二部进行活人实验，据田村良雄讲，诊疗部经常与其来往，柄泽班也进行过人体实验。他说：“1941 年我亲自看见柄泽班的细矢中尉及雇员石井恒久等常去特别班。同时我自己是柄泽班的班员，亲自用中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45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291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国爱国者进行过活人实验，而将其杀害。”[①]

据川岛清供认：“为尽量完备研讨细菌对人的传染作用，及尽量迅速研究出制造细菌武器以供战时使用的方法起见，第 731 部队内广泛进行过用活人作对象来检查一切致命细菌效能的实验……每年都有五六百犯人被送到第 731 部队里去。我曾亲眼看见，这部队第一部工作人员从宪兵队方面领到大批大批的犯人。这些犯人都被关在监狱内的两座房屋里……要是犯人受过致命病菌传染后又痊愈起来，那他也不免要接二连三地实验，直到因传染病死去为止。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方法，对已受传染的人也曾加以治疗，给他们吃正常的饭食，等到他们身体完全复原之后，就把他们用来作另一种实验，用另一种细菌传染他们。无论如何，从来都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死人的尸体经过检验后，就被放到该部队的焚尸炉里去焚化……当本部队驻扎在平房站附近的 5 年之内，即从 1940 ~ 1945 年间，通过这个杀人工厂，因染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 3 000 人。至于 1940 年以前被消灭的人究竟有多少，那我不知道……”[②] 川岛清承认，他亲自参加过在活人身上实验细菌武器的效能。柄泽十三夫知道：“第 731 部队内在实验室条件下有系统地对活人进行过实验。这里是强迫被实验者染上各种细菌，然后就来观察这些受实验者的病症，以求研究出最有效的传染病媒介物。直接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就加速了解决该部队所负的任务，即研究出最厉害的细菌战武器以及大量传染人的方法。”[③]

“四方楼”的监狱里，从各地源源不断地将“马路大”押进来，而后提供给各实验室。在实验室里进行过各种实验之后，有的被送进解剖室，被解剖过的尸体大部分送进焚尸炉焚化，少数被肢解的尸体被放进陈列馆。731 部队究竟有多少人死于细菌实验呢？川岛清说，每年被押进监狱里用作实验材料的有 400 ~ 600 人。每年因受实验而死去的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66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120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③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71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大约至少有600人，5年间至少有3 000人丧失性命，这是最低限度的数目。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第三课长吉房虎雄中佐回忆说，据估计至少有5 000名爱国者，通过我们宪兵转到石井部队，最后成了实验品。《跨国取证七三一》一书中说："用作活人实验的，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也有部分朝鲜人、蒙古人、苏联人。根据新近发现的'特别移送'原始档案分析判断，在731部队长达13年的时间里，至少有5 000人被以活人做实验的手段而杀害。"①

1942年10月或11月，上田弥太郎和伊藤、伊东新平在731部队门口看见3辆运"实验材料"的汽车，伊东说，"丸太"（日本人对称爱国者的侮称，即圆木）被捆住后，他们知道他们会死？伊藤说，当炸弹落地后，他们就死了。

在伯力审判时，问上田弥太郎在平房杀害了多少人？他回答说，在平房两次警备演习就杀害了200人。还有一天晚上，他洗澡时，听几个警备队员说，今天又运来了"丸太"。731部队每月运一次，每次运两汽车人。据此断定，可能每个月杀害两汽车人。每车装多少人，他不知道。

二、受实验者——"马路大"

731部队有个特别班，负责看管为提供实验而收容的人们。在特别班里，他们把实验对象叫做"木头"，人数以"根"计算。该部队的"实验材料"各有隐语，人叫"圆木"，日本人称他为"丸太"，音译为"马鲁他"、"马路他"或"马路大"，按字意说，"马路大"就是木头，或者说是原材料，日本人根本不把那些"马路大"当人看待。林口支队长榊原秀夫供认："据他（七夕曹长）说：'实验材料'各有隐语，人叫'圆木'……在731部队将领来的死刑囚称为'实验材料'，死刑囚是中国人及苏联人。"②

日本作家森村诚一说："'木头'的来源，大致有三方面：1. 在华中和华北战场上俘获的八路军战士、干部，国民党军军官，还有在各城市和农村逮捕的进行抗日活动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们。从各地的俘虏收容所用军用列车把他们运到哈尔滨，再直接输送到

① 金成民等：《跨国取证七三一》，第9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64页，中华书局，1989年。

731 部队去。2. 从哈尔滨市内及郊区逮捕的苏联红军士兵（情报员）和白俄及其家属。先把他们收容在哈尔滨市内的保护院里，然后再由哈尔滨特务机关或宪兵队负责押送到 731 部队去。3. 哈尔滨市郊外‘忠灵塔’附近的集中营关押的一般中国市民。这些人恐怕都是被骗来而沦为‘木头’的命运的吧？……其中好象也有犯了盗窃罪的刑事犯。”[①]

据各种材料证明，“受实验者”有不同国籍，其中有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不同性别，有男子、有妇女；不同年龄，有老人、有青年、甚至有小孩。除了抗日的爱国者之外，还有不少平民百姓，其中有被骗来的中国劳工，这些劳工在修筑完秘密工程后，便被投进监狱，变成“马路大”；有在城市“圈街”被抓来的无辜市民，所谓“圈街”，就是在“马路大”不足时，到大街上去抓人；有误入平房特区被抓的“嫌疑犯”，这些人有的没有什么过错，也被投进监狱。

关于这些“实验材料”来源及处境，原 731 部队的军官和队员作了供述或回忆：

川岛清说：“第 731 部队内设有一个监狱，专门禁闭这些作实验的犯人，监狱设在部队内面，受实验者被严格与外界隔离开来，本部队工作人员称他们是‘木头’。受实验者这种名称，我从第 731 部队长官石井将军口中多次听到过。”[②]“1941 年 4 月，当我刚到该部队任职的时候，我就视察过这个监狱，看见有一间牢房里关的有两个俄国女人，其中一个女人带有她在该监狱内生下而还不满 1 岁的孩子。当我在该部队内任职期间，这个女人还是活着的。以后她们的命运怎样，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她们决不会从监狱里活着出去……”[③]

“伪满洲国”军宪兵署日本顾问，证人橘武夫供认：“……有一种被抓来审讯的人，按我所管辖的宪兵署特务部路线，是应当加以消灭掉的。这种人就是……游击队员，激烈反对日本驻“伪满”当局的分子等等。这些被捕的人并没有提交法庭审讯过，因为我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 88、89 页，群众出版社，1984 年。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60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③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121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们总是径直把他们送到第 731 细菌部队去消灭的……”①

关东军干部长田村供认：“我曾向山田报告说，……我在视察过的那部分监狱内看见有四五十名被囚禁的人，他们都是中国内地人和俄国人，其中有一名俄国女子。我曾通知山田将军说，我所见到的这些被拘禁的人都戴有脚镣，并且据部队长石井将军说，他们都是被用来实验作为细菌武器的致命效力的。”②

1942 年 1 月，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第三课长吉房虎雄中佐，陪同关东军司令官原守少将视察了 731 部队。石井四郎陪同原守一行参观了细菌研究室、人体解剖标本及关押“马路大”的监狱。吉房虎雄亲眼见到了 731 部队监狱的情况，他回忆说：“从本部正门进去，再打开几层厚实坚固的门才能进到里面。在宽 1.5 米、长 15 米的中心走廊深处向右拐有个通道。通道两侧便是焊有铁栏杆的一大排拘留所，这就是进行鼠疫感染的地方。当时我看到在 1 号牢房里，有一个穿浅橙色衣服、大约 40 左右的中国男子，他仰卧着无奈地在接受鼠疫感染实验，在暗淡的灯光下，他面色发青，犹如蜡人一样。不知是捆绑的紧，还是用了什么药物，他闭着眼睛昏睡着静静地躺在那里，好像是太平间里的尸体。与他相邻的牢房里，有一个 35 岁左右的男子，他瘦得皮包骨，被反手捆绑而坐着。戴着胶皮手套、穿胶皮衣和靴子、戴白色口罩的一个日本军医，使劲地压住他那已经萎缩成一小把的大腿，让跳蚤去叮咬……从他那破乱不堪的薄衣服中露出的胸部，瘦得看出了肋骨。他的胸部还有 5 块直径约有 1 寸的已经溃疡的疮痂，整个胸脯变得发红，看他有疼痛难忍的样子。石井四郎说明，这是鼠疫感染的痕迹。这个凶狠的军医用皮鞭子朝那人身上一抽，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东倒西歪地迈了两三步，立刻倒了下去，并发出喃喃的声音。石井又说，鼠疫患者的特征就是脚步不稳，摇摇晃晃。在走廊的尽头向右一拐，那里有 3 个戴着手铐、脚镣的农民模样的人，大约 35 岁左右。他们都是一样：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20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376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两手放在支立的两膝上，安静地坐在那里，都是瘦弱不堪，6只眼睛充满愤怒的目光直瞪瞪地射向我们。他们每人的手指从第二关节起全烂掉了，断掉的部位呈现出溃烂状。石井说，这是将冻伤的手指浸入50摄氏度的热水里，进行缓冻实验的结果……”吉房虎雄回想当年的情景，深感那是罪恶呀！

关押在731部队里的“马路大”不断地被细菌实验致死，又不断地加以补充。在哈尔滨市忠灵塔附近有一个特殊的“马路大”集中营，关押着300多人。731部队在“实验材料”不足的时候，马上从集中营里移送过去。这个杀人工厂，不停地进行活人实验，犯下滔天罪行。

三、实验方法

731部队采用多种方法在活人身上进行各种实验，他们在一个人身上或使用一种方法，或兼用几种方法，其手段残忍，直至致死人命，肢解尸体，焚化灭迹。

（一）菌液注射

日本军医把带菌溶液或注入“马路大”的血管里，或皮下注射，而后观察被细菌感染者的病情变化。有时对幸存的“受实验者”注射抗菌素，予以治疗，其实这也是一种实验。“受实验者”侥幸康复后，又被作另一种实验，直至其没有利用价值后，解剖焚尸。石井部队早在背荫河时期，就利用活人进行实验。该部队从中苏边境鼠疫流行区域抓来40只疫鼠，从这些疫鼠身上抓了200来只带鼠疫菌的跳蚤，再提取疫蚤的毒液，给3名抗日工作者注射。结果，这3个人都患上鼠疫，在19天后先后发高烧达39 ~ 40摄氏度。他们在昏迷状态中都被解剖了。石井四郎亲自写了检验报告。

1. 一个助手的供述

1942年4月，上田弥太郎被允许进入731部队的七、八栋监狱，协助江田武一和小林技手做人体实验。进监狱之前，先去照相馆照相，把相片贴在出入证上，才能出入。他的工作是每天测量并记录受实验者的血清、血沉、血压、体温。给“马路大”注射或植入菌液，绝对不让新来者看见，由班长或技手来进行。在这次实验中，受实验者感染了相当强烈的细菌，仅2天时间就有3人死亡。这3人都被解剖后火化了。

1943年4月，731部队第四部第三班（川岛队三谷班）雇员上田弥太郎作为助手，

在曹长江田武一的指挥下，对 5 名中国人使用鼠疫菌进行活体实验的观察。他的工作是，每天将这 5 个人的血液进行检查、培养，进行体温测定等。在观察的一周内，有 1 人死亡，推测是被解剖后烧掉了。同年 5 月，又对 5 名中国人进行了活体实验的观察。这次他是小林技工的助手，与上次的工作一样。他供称："这次实验使用的是鼠疫菌，使用的方法我推测是注射，因该日早晨，在小林技工的桌上有注射器和菌液，在被检查者的肘部有注射时刺的痕迹。在我观察的第 2 日，有 2 名死亡，第三日早晨又有 1 名死亡，随即一面向小林信报告，一面由该处警备员将尸体由监房抬出，我看着放到平板车上后，拉到解剖室去了。尸体拉到解剖室后，不费事地进行了解剖，事后将尸体投入锅炉中烧了。被害人约 50 来岁，手指特细，是一个不大劳动的人。同日下午又死亡 1 名，第四日又死亡 1 名，尸体处置我没有参加，推测解剖后烧了。以上实验的目的，是将在研究室内实验的细菌，用活人进行实验，确定实际的效力，作为进一步研究强毒菌的资料。"[①] 这次使用鼠疫菌给 5 个人作注射实验，仅仅 4 天就全部死亡。

上田弥太郎笔下描述了受实验者的悲惨境遇和反抗情绪以及实验者的凶残行径："1943 年 5 月，北满的 5 月还是乍暖还寒的季节，到处的洼地里，还有未曾融化的残雪，正等待着春天的到来。在高高耸立的第 731 部队的建筑物上，仍飘扬着太阳旗。就在其中 7 栋的一个房间里，正在进行着可怕的杀人勾当。昨天体内被注入鼠疫菌的中国人，今天，他的生命即将被夺去。'哎呀！'由于无可抑制的愤怒、仇恨和临终前的痛苦，他用力地瞪着眼睛，双手在空中乱抓，不停地呻吟着，但力气终于逐渐地减弱了。一旦进来再也无法出去的牢房，紧闭的牢门，无情地将他们与外界隔绝了。

在他那已经不能站立的脚上，仍然戴着沉重的脚镣，每当移动脚时，便发出'叮叮口当口当'的铁器的钝音。同牢的人们围着这个同胞，紧张屏息地守护着他，但却没有一个人开口，只有牢房中厕所的流水，发出瘆人的声响。外面戒备森严，提着手枪的警卫在严密地监视着，警备司令蓬田卫生上尉也在向里面窥视着。然而，对于这种临终前的叫喊却无人介意，因为，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不足为奇。警卫人员只要监视住这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67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200 个中国人，让他们老老实实地被杀掉，毫不进行反抗，乖乖地成为豚鼠的代用品就可以了。如果这些中国人企图反抗，不肯老老实实地被杀害，那么，警卫人员有权当场将他杀死。警卫人员手中的枪，不仅仅是用来吓唬人的，它的保险栓是经常在打开着的。

关押在这里的人们，已失去任何做人的权利。他们一旦进到这里面，他们的名字便变成了钉在胸前的阿拉伯数字的号码和‘木头’这种名称。我们平时都说有几根木头，至于 × ×x 号木头，究竟是从哪里和怎样到这里来的，我们是不清楚的。一个蓬头垢面，看上去像是农民的男子，由于营养不良，颧骨突出，身体裹在一件褴褛不堪的破棉衣里，只有两只眼睛在闪闪发光。

昨天的成绩足以使班长三谷军医少佐喜出望外，空前未有的感染率，血象的典型变化，我对今天的血液变化怀着极大的期待进入了 7 栋。带着手枪的两名警卫站在牢房门口监视着。我往里一看，只见 × × × 号即将死亡。如果死了可不得了！若是就这样死去，不能采血，那么好不容易进行的重要实验会失去结果。我慌了，喊了一声‘× × × 号’，不见他回答，我便利用手势，告诉同一牢房的 4 个人：‘把他的手拉到门口来！’4 个人都踌躇着一动不动。我骂他们：‘快！快！混蛋！还不快点吗！’警卫将手枪对准他们，用中国话威吓着。他们似乎下了决心的样子，把那个人已经软瘫的身体轻轻地扶起来，送到了门旁的窗子附近。我所需要的不是他的死亡本身，而是他临死之前流在这个活人豚鼠体内的血液。

从入口处拿出的手，已经呈青紫色，变得冰冷。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胜利感。‘班长是多么渴望这一成果啊！’我抑制着难以名状的兴奋心情，拿起了注射器。注射器‘噗哧’一声刺进了肘静脉。红黑色的血液一点点地被吸入注射器。三毫升、五毫升……，他的脸渐渐变得苍白，连呻吟声也听不到了，只是喉咙里发出像虫鸣般的声音。由于难以忍受的屈辱和愤怒，双眼一眨不眨地瞪着我。但是，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无所谓。‘只要采到 10 毫升血液就可以了。’这就是所谓研究工作者的喜悦和使命，我认为人在死亡时的痛苦是不值得同情的。

我尽快处理完血液，再次向牢房望去，只见他那正在痉挛着的脸，在微微地抽搐着，呼吸变得越来越弱，已进入利钦斯托克氏呼吸状态（临死前出现的一种呼吸状态）。处

于同一命运之中的同一牢房的人们，可能是再也无法忍受了，便拿了水喂到即将死去的同胞口中。啊！这该是何等的暴虐！有多少人曾经为此而牺牲！从不停息地冒着黑烟，高耸入云的烟囱，究竟吞噬过多少人的遗骸！人的宝贵生命被作为豚鼠的代用品遭到任意践踏，最后变成了一份表格……细菌战犯石井四郎曾说：'科学无国境，研究者有祖国，要为祖国而研究！'侵略者的这一骗人口号，俘虏了我那人类应有的良心，以至我现在可以做到，当我看到一个人被使用灭绝人性的残酷手段而遭到杀害时，能够发出满足的微笑。

四五个卫兵拿着手枪打开了牢门，牢门发出一阵沉重的响声。他们把尸体拖出来放在手推车上。

同牢房的人们似乎已经看到明天正在等待着自己的命运，用他们那难以抑制的愤怒的目光，目送着刚刚死去的同胞。

手推车向着烟筒高耸的解剖室走去，不久便消失了。"[①]

2. 活体防御力及毒力实验

田村良雄是第四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少佐的助手，他供认："在第一部特别班里，对被关押的 5 名抗日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了活体实验。目的是进行活体防御力及毒力实验。我与宇野诚一起，对被关押在特别班的 5 名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各取 5c.c. 的血液，测定免疫价。第二天，对其中 4 人注射了 4 种疫苗（加温疫苗、混合疫苗、包装疫苗、生菌疫苗）。一星期后又注射一次。然后将他们的血液取出，测定免疫程度之后，又注射了含 0.05 瓦的鼠疫液 1c.c.。其中 3 名 3 天以后死亡，在第一部笠原班进行了解剖，以后就在特别班附设的火葬场烧了。其他 2 人作为鼠疫患者，提供给诊疗部做活体实验了。"

"1943 年 1 月中旬，我协助柄泽班技手宇野诚，在第四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启之少佐指挥下，对监禁在特别班的 2 名抗日地下工作人员，以进行毒力实验为目的，注射了含有 0.03 瓦的鼠疫菌 1c.c.，3 天以后，均患了重鼠疫，而被杀害了。"[②]

---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68 ~ 71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65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鼠疫疫苗的毒力实验范围不仅仅在监狱里给“犯人”注射，而且在平房附近的老百姓身上做实验。田村良雄说，1940 年 9 月，731 部队本部菌苗班在铃木启之少佐的指挥下，医务室用约 2 000 只 50c.c. 的鼠疫疫苗在部队附近，给中国人做实验性注射，结果“被注射的中国人受到强烈的毒害，仅我听到的就有 2 人死亡。其他的注射液附上‘大连卫生所研制’的商标，送到长春地区为‘防疫’使用，给中国人民造成很大危害。”[①]

秦正氏供认：“1945 年 1 月前后，第一部军医少佐高桥正彦，对 3 名爱国者注射了鼠疫菌，使之感染了严重的肺鼠疫和腺鼠疫，然后用日本制的磺胺剂实行‘治疗’，终于使之死亡。”[②]

3. 拿活人当老鼠

一天，秋山浩被派去做人体实验的杂工。他沿着阴森可怕的走廊，来到地下实验室。走廊的顶棚、护墙板和窗户上，都涂着大红色，像乱抹了一层黑红色的血液的隧道似的。走廊里不透阳光，吊着几个灯泡，周围幽暗无光。

秋山浩来到实验室门口，忽然听见一个人的惨叫声。他看见在实验室门前，有一个“木头”被 3 个队员架着两只胳膊正在那里叫唤。一个工作人员从背后好容易才把他推到实验室里去。在实验室的第一道门里面，有消毒用的喷雾设备。他用石炭酸水喷了全身，然后穿上防毒服。在打开第二道门后，他看见：“一个被当‘木头’用的人，被绑在一张像涂过沥青似的黑黑的铁床上，在那里呻吟挣扎着。助手们恶狠狠地用力按着他。穿着仿佛像潜水服似的防毒服的人们的手，像无情的机械一样，毫不犹豫地扑上这个‘虏获物’。‘木头’使出平生的气力拼命地挣扎着，因为‘木头’的营养既好，又有适当的沐浴，身体完全是健康的，所以就是捆住了手脚，他的力气仍然是强大得令人吃惊。这和必须用健康的动物作实验一样，在用活人的时候，如果他的身体不是健康的而是衰弱的话，那就得不出带有普遍性的实验结果。因此这个部队的监狱，就不得不特别注意营养和卫生。这一点，可以说是和普通的监狱就完全不同的地方……我一边按照指示，

---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58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73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搬递着药品和器具等等，一边注视着军医对这个‘木头’进行注射的经过情况。我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要作这个实验，注射的又是什么。可是，由于看到计算时间的人，手托着表，注视着因注射而引起的病变经过……这个‘木头’痛苦已极，声嘶力竭地嚎叫，拼命地挣扎了一会儿之后，也许是精力耗尽了才断了气。时间觉得似乎很长，实际上只不过两三个小时就结束了……‘木头’的尸体，真是惨不忍睹！从前胸到面部，因为皮下出血完全变成了黑紫色，腋下和两股之间的淋巴腺也肿得非常厉害，皮肤呈现着暗淡的粉红色。”[①] 尸体被火化了。

（二）口服染菌食品

把实验用的细菌掺入饭食、饮料、水里或注入瓜果、蔬菜里，对受实验者强迫灌服或让人误食，以观察各类细菌的效能。石井部队用霍乱菌、赤痢菌、伤寒菌、鼠疫菌进行过实验。该部队把蔬菜、水果、鱼肉类等食物都掺入细菌进行比较实验，结果最容易感染细菌的是蔬菜，特别是叶子多的蔬菜，如白菜类，块茎表面光滑，较少使用。把细菌注射到水果类的食物里，效力更大。据石井说，散布传染病最适当的媒介物是蔬菜、其次是水果，再其次是鱼类，最后是肉类。

1. 灌　服

731部队“A”队一分队队长山下升供认：“在731部队监狱里关押有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这些人被用来进行细菌实验。实验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往嘴里灌细菌，一种是皮下注射。实验时把人绑上，将细菌混入水中从嘴灌进去。我们队每天用10 ～ 20人进行实验，用灌的方法有400多人，进行皮下注射的有250多人。被实验的人中，有苏联人，最多的是中国人，谁是朝鲜人我们分不清。被实验的人中，有五六个是女的。他们大多数是战俘，年龄都在19 ～ 40岁。灌细菌时有宪兵在场。有时被实验的人反抗，宪兵在场镇压，对反抗厉害的人，当场用手枪打死。在场的宪兵是按军医的指示行动。我们都是助手，灌菌和注射的数量由军医规定，我们只是按他们的指示做。用什么菌当时也不知道，只是后来根据发病的情况判断是什么菌。我们队用的多为鼠疫菌、肠伤寒菌、

① 〔日〕秋山浩：《七三一细菌部队》，第65 ～ 66页，北京编译社译，群众出版社，1982年。

白喉菌。这些人被实验后，有 3 天死的，有 7 天死的。因为菌的毒力、性质不同。不是所有被实验的人都会死，没有死的送回监狱下次再实验。将实验死的人拉去火炼；有时当时还有气，也拉去火炼。火炼场的大烟囱每天冒着烟。”[①]

731 部队卫生兵古都供称：“大约在 1943 年初，我奉第 731 部队长官田部井的命令，初次参加对该部队监狱内犯人作传染伤寒病的实验。我预先准备了一公斤投有伤寒菌的甜水，然后把这一公斤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就分给约 50 名中国犯人喝了，据我记得的，他们都是战俘，其中有几个人实验受过预防伤寒菌病的注射。”[②]

731 部队进行内服实验时，暗中把各类细菌掺入食物中，让监狱里的受实验者吃喝。受实验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误食带细菌的饭食后，被感染发病，导致不少人死亡。狱友们知道了日本人的阴谋，集体进行绝食斗争。日本军医诱骗无果，便与宪兵队一起，采取强制手段灌服菌液。对于反抗的人，轻则鞭打，重则当场击毙。在实验中日本人观察到鼠疫菌毒力最强。用灌服，霍乱、伤寒菌等胃肠道感染细菌，致死率较高，一般在一个星期内，不治身亡。

2. 瓜果细菌实验

上田弥太郎供认：“在平房 731 部队北门附近，伤寒班种有西瓜，给瓜里注射有伤寒菌，曾有来部队搞建筑的工人（日本人）偷吃西瓜以后，患了伤寒病的事件发生。当时小林或江田，曾警告队内人员不许采食。在我看来他们用这种方法对爱国者进行实验，并进行细菌战的准备。”[③]731 部队内部人员误食瓜果、蔬菜、粮食，或在生产细菌、人体实验过程中而感染传染病的事时有发生。

用伤寒菌传染瓜果进行实验，人吃后都会被传染。古都说：“1943 或 1944 年间，（731 部队）进行过传染瓜果的实验；当时用来受传染的是西瓜和甜瓜；当时正是瓜熟的时期。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79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17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③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84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在一部分西瓜和甜瓜上注进细菌而使其受到感染，把另一部分留下来不加以传染。用药针把伤寒病菌注进这批瓜果后，就来检查细菌密度，为此就把这批瓜果送到实验室里去检验注射到瓜果内的细菌发育得怎样。在检查时若查明有大量细菌，就拿这些瓜果分给五六个中国的内地人和满洲本地人吃下去。（这些受苦的人吃了此种瓜果后）都受到传染了。”凡是吃过这种细菌密度极大的瓜果的人都患了伤寒病。①

（三）比较实验

日本军医在受实验者身上交叉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细菌实验。他们把这些“实验材料”分成若干组，或在每组人的身上使用的细菌菌液剂量不同，注射的次数不同；或分别使用注射、灌服、埋入等方法，以观察其结果，写出比较表。

1. 分类实验

古都供认：“1943 年末，当时为了检验病菌的效力，（731 部队）曾用 50 名中国内地人和满洲本地人来当作进行实验的材料。首先给这 50 人注射了防病的药水，并且是分别注射的，即给一部分人注射了一次，而给另一部分人注射了两次。除此而外，给各人注射的防病药水多寡不一，并且，这 50 人中有一部分人根本没有打过防病药针。所以，这 50 人是被分成了 5 类。然后就强迫所有这些人喝进了染有伤寒菌的水，接着就来观察这种传染病媒介物在各种场合所引起的结果怎样：即检验在是否被注射过防病药水的人身上，在被注射过若干次以及注射过多少药水的人身上所起的作用怎样。”②结果，这 50 个人大部分生了伤寒病，其中 12 人或 13 人因病死亡。

2. 注射、内服、埋入

上田弥太郎作为助手参加了鼠疫菌比较实验，亲手制作了鼠疫比较表，他供认：“我是从江田武一处拿来统计的，这是利用中国爱国分子实验后的结果。统计表的根据是：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381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382 ~ 383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首先将爱国分子 5 名，注射上 0.1 克鼠疫菌，又用 5 名注射 0.2 克，再用 5 名注射 0.3 克，观察其结果，做出第一种比较表。其次又各用 5 名中国爱国分子，分别埋入 0.1 克、0.2 克、0.3 克（鼠疫菌），观察其结果，做成第二种比较表。第三种比较表，仍各用中国爱国分子 5 名，分别内服 0.1 克、0.2 克、0.3 克（鼠疫菌）观察的结果制成。如不这样做，是不能制出统计比较表来的，因此也就必然要经过如此的实验。主要实验者是三谷。”①将鼠疫菌的注射法、埋入法、内服法，作出比较表，结果注射法最快，一日即可死亡。其次是埋入法。最慢是内服法，6 日才能死亡。上田弥太郎在统计时，发现用这种比较方法实验过的有四五十人。

3. 超音波菌苗实验

1939 年 6 月以前（注：1938 年 7 月，山内丰纪调入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工作，当时，他们还兼任神奈川县立卫生试验所的工作，1939 年 6 月，石井四郎命令山内丰纪辞去试验所工作），山内丰纪在日本神奈川县立卫生试验所制作细菌生物制品，并作检验工作。当时，他是所长渡边博士的助手。在应用超音波发生装置研究细菌学时，曾发表过很多实验报告，博得学术界的重视。这项研究引起了东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主任石井四郎大佐的重视。他把渡边博士调到防疫研究室继续从事研究超音波业务。山内丰纪仍然作渡边博士的助手。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改良霍乱菌苗。石井四郎要求渡边博士等人到哈尔滨 731 部队工作，遭到渡边博士等人的反对。石井四郎利用军部的命令，想尽一切办法把渡边博士调到哈尔滨去。渡边博士提出可以到大连去。石井四郎妥协，同意他到大连，但要先到哈尔滨。1939 年 6 月，山内丰纪和渡边博士一起到哈尔滨石井部队。此后，渡边博士领导菌苗制造班制造菌苗，供给关东军需要的各种菌苗，即伤寒、副伤寒、四种混合菌苗及赤痢菌苗、霍乱菌苗、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菌苗各 60 万份，保管期 3 个月就放弃，然后另作新的。因此，该班工作非常忙。此时，超音波装置未安装好。1940 年 2 月，4 台超音波装置运到哈尔滨，安装完毕。石井部队长命令渡边博士做超音波霍乱菌苗的人体实验。命令是 3 月中旬下达的。按照石井的命令，编成了人体实验班，渡边博士和山内丰纪负责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72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用超音波制造菌苗，中黑大尉及细井雇员负责按军医学校的方法制造菌苗。人体实验班有川名技手、千叶技手、小林嘱托。5 月中旬正式开始进行人体实验。

山内丰纪供认："关于人体实验，用什么人，我曾问过小林准尉，他说：'是匪贼（抗日志士），都是被判处死刑的，不是部队随便捉来的，是军司令部许可后从外部送来的死刑犯。你不要关心这些，好好工作就可以了。'预防接种超音菌苗的共 8 人，注射陆军军医学校所制霍乱苗的共 8 人，无处理（供对照用）的 4 人。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中国人。这些人都被关在石井部队特别管理班的第七、八栋房里，该特别班的人员都由石井四郎的家乡千叶县千代田村出身的人所组成，班员全部配有手枪，一般部队人员严禁出入，出入有队长特别许可证。此七、八栋周围有三层高的大建筑物，二层楼以上是一般研究室，一楼是大量生产菌体的地方，出口入口都是铁门，监视很严。七、八栋分建在左右两侧，那里有很多约 3 平方米宽的小屋子，排列在小走廊的两侧，每个小屋中有三四个中国人。此七、八栋就是石井部队的人体实验室。关于人体实验感染情形是：令上述接种的 16 人和没有预防接种的 4 人，把生菌混入的牛奶喝下去。感染用的细菌是石井部队保管的所谓'细菌武器'，其毒力对人致死量为千分之一克。当时感染量是五百分之一克，目的是要得到能预防强毒霍乱菌的有效霍乱菌苗和对敌人撒布强毒霍乱菌，进行细菌战。人体实验结果证明，超音波菌苗效力特佳，接种超音波菌苗的人都很精神，仅一人有头痛和腹痛之感，第三天也就复原了。但注射军医学校制菌苗的人多数下痢，其中 3 名重症，死亡一名。对照的 4 人全都发病，在第三日都死亡。石井四郎知道超音波菌苗有效后，命令我们大量生产。9 月下旬长春发生鼠疫，石井四郎组织所谓防疫，菌苗班昼夜不停地制造鼠疫（伊母诺根），结果因菌体中杂菌多、单位低，拖延了制品的生产期。渡边博士在电话里受到石井四郎的严厉叱责。渡边博士决定辞职，当夜出发到长春，第二天早晨在长春大和旅馆前由于交通事故而死亡。对于渡边博士的死。我有很多疑问，我认为可能是被石井四郎杀死的。根据石井四郎的品质，他对下级能施行任何残酷的手段。"①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17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田村良雄说，关东军为了鉴定超音波经口疫苗的效力，按在伪奉天市同善堂铁西俘虏收容所进行研究的 731 部队技师指示，对同善堂的幼儿进行实验。

诊疗部部长永山太郎中佐曾指导日本军医和技师进行破伤风实验，他们把破伤风菌的毒素分为最低致命量的千倍、百倍、十倍，接种给 10 个人。他们还把进入人体内产生的毒素芽孢，又接种给另外两个人。这次实验共死亡 3 个人。

除此之外，他们还把细菌掺入墨汁内，写传单散发，造成大面积传染人群。

四、细菌实验拾遗

（一）汽油桶里的人头

荻原英夫在平房工作时，一天，他往 6 栋的三楼搬运研究器材。当他路过一个房间时，那房间的门敞开着，无意中他走进去了。他说："只见房内堆着许多汽油桶，大约有 150 个左右。我想装的可能是酒精，我拿起一个摇荡时，果然是液体，但又发出固体和桶撞击的声音，当时我并未在意。后来，我听叔父石井或舅父柳青说，那是用作实验的人头。从此以后，吓得我再也不敢进这个房间了。如果每个汽油桶中装一个人头，就是 150 个，如果装两个，就是 300 个，如果装 3 个，就是 450 个，这么多的爱国者和有爱国行动的人，就是这样作为石井的实验材料被残酷地杀害了。"①

（二）四方楼院内的血腥味

平房特别军事区正黄旗三屯的老户王英富在 731 部队第一库房做杂工。一天，他在库房外边干活，随西南风闻到一股腥臭味。他看见四方楼西北角的一座大烟囱正冒着浓烟。他问日本人清野说："那炉子是烧什么？怎么这么难闻？"清野说："人的死啦，马、羊、狗死啦，那边火的给。"劳工都知道，那里是炼动物的炉子，而不知道也炼人，因为中国劳工死了，都埋在正黄旗五屯北门的劳工坟里，日本人死了都在北洼地的炼人炉里焚化。王英富还看见过 731 部队的囚车开到四方楼院内，马车往四方楼里送过粮食和蔬菜。他后来推测四方楼里关押着人，那座焚尸炉火化过被细菌实验致死的人。

正黄旗四屯的苏海祥被迫去 731 部队做苦工。1944 年的夏天，为检修暖气管道，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35 ~ 36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苏海祥进了四方楼西北角的一个大院里干活。他看见日本人从一个板房里推出一个棺材，进了焚尸房。不一会，鼓风机响了，大烟囱里冒出黑烟。苏海祥过去听说这里是炼马炉，这次，他亲眼看见了炼人。

劳工黄国荣在 731 部队石井班喂马。马厩对着四方楼。一天，黄国荣干完活后，他看见有个穿白色工作服的日本人从四方楼的西角门推着一辆平板车出来。平板车上苫着的白布被风掀开，露出一具尸体。那个日本人把尸体送到炼马炉去了。

（三）四副人骨架

平房特区大乔屯的乔世兴在 731 部队第一仓房 4 号库房做劳工。1943 年的一天，劳工们打开了 4 个大木箱子，这木箱约有 2 米长，宽、高各 0.6 米。他们发现每个木箱里放一具用铁丝串连的人骨架。这人骨架是从四方楼运来的，送到陈列室展览。

（四）四方楼见闻

1943 年 5 月的一天，为了迎接关东军司令部的长官来视察，在 731 部队高等食堂做伙夫的付景歧等劳工打扫卫生，他们干了一上午也没干完。劳务班长工藤与四郎不让劳工吃午饭，他自己去午休了。付景歧好奇，走进四方楼从窗户往里看。一层楼的玻璃不透明，他什么也没看见。他就搬来刷墙用的梯子，爬到二层楼的地方，透过玻璃往里看。他看见几个穿白色工作服的日本人在一个机器旁操作，立式的轮子飞速转动，鲜红的血浆溅在日本人身上，还有个日本人摇晃着一个装血的大玻璃瓶。劳工鞠复昌轻声告诉付景歧快下来。付景歧刚下梯子，就看见工藤拎着一根铁筋朝他走来。付景歧忙说自己去擦玻璃。工藤明知他在撒谎，抡起铁筋砸在付景歧的头上，把他打昏在地。工藤以为付景歧死了，让劳工把他送到焚尸炉火化。劳工们偷偷地把他送回家，半路他苏醒过来，捡了一条命。付景歧看见的是研究血清的内海班。

1944 年的一天，乔世兴正在第一仓库的 4 号库房里干活，忽然从四方楼里来了 4 个穿白色防护服的日本人，他们推来两台小推车。日本人让劳工往推车上装一些药瓶、还有玻璃瓶、手套、胶皮服装等。日本人让乔世兴和另外一名劳工帮忙推车往四方楼里送东西。走进四方楼时，乔世兴看见走廊里灯光暗淡，从前边的房间里射出强烈的灯光，有一条双轨间距 1 米宽的小轱辘马子铁道往里面延伸，地面上有水在流淌。来了几个穿

白色工作服的人，他们将手推车接过去，打发乔世兴他们出去。

劳工侯安发回忆说，一个日本技师让他帮忙把一个白布包裹送进四方楼。他被蒙上眼睛，走到四方楼内日本人规定的地方，就不让往里走了。侯安发按着日本技师的吩咐守在那等候。等了好长时间，不见日本技师回来。侯安发不耐烦，偷偷地把蒙眼布拉开一道缝，朝中心走廊走去。走廊里每隔不远就挂一道布帘。当他掀开第三道布帘后，他看见右侧的门开了，一个日本人押着一个戴手铐脚镣的人走过来，进了标有号码的房间。突然窜上来一个日本兵，问侯安发看到什么没有。侯安发来不及说话，便挨了几记耳光，被赶出四方楼。那个日本技师回来后，见侯安发没在规定的地方等他，又把侯安发痛打了一顿。

（五）细菌陶瓷弹壳

1943 年夏天，乔世兴、刘风志、鞠家珍、张守发等人在 731 部队弹研班院内拔草。那天，天气炎热，日本人都去歇凉了。乔世兴他们在东南角的一座楼前发现许多木箱子。从一个破碎的箱子里面，他们看见了陶瓷弹壳。这个弹壳有 90 公分高，30 公分粗，外面是酱紫色。旁边还有一个破碎了的弹壳，里面是乳白色的，弹片上积存着红色液体。

乔世兴趁机还偷看了那座楼房里的东西。他们发现楼内空无一人。在一个 3 米多长、1.5 米宽的木制平台上，放着一个天平，旁边摆了 20 多堆小铁块，每个铁块约 5 厘米长。看上去是方钢筋拧成八角型后切成的。

这种铁块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田村良雄做了解释，他说，山口弹研班曾制造过炭疽弹丸。这种弹丸和乔世兴看见的铁块一模一样。日本关东军在诺门罕战争中使用过炭疽弹丸。

平房特区正黄旗五屯的裴富也给山口班搬运过陶瓷炸弹壳。他说，有一次，日本人运来一车皮木箱子，让我们往山口班扛。这木箱长 1 米多，高 0.3 米。箱子不太沉。搬运时，他发现有个箱子裂开了一条缝，用手一扣，缝更大了，看见里面是陶瓷弹壳。这些陶瓷弹壳有紫红色的，还有白色的，大约长 0.7 米，粗 0.2 米，外壳有几道小沟，头上没有引火冒。新中国建立后，山口班驻地还有一堆碎弹壳。

正黄旗三屯的王志宏，曾在 731 部队赶过马车。他说，有一次日本人让他去临时站

台上往山口班拉货。站台上有一大堆陶瓷弹壳，没有用木箱装。他往马车上摆，一层摆20个，二层摆18个，三层摆16个，四层摆14个。用绳子拢好后，日本人让马车慢点走。站台距山口班200米，竟走了10来分钟。日本人不让马车进院，陶瓷弹壳都卸到了大门口，日本人自己往屋里搬运。那天有4台车拉，运了半天。

（六）细菌兵器

1945年的一天，为检修暖气管道，苏海祥进了兵器班。他看见日本人把套着木制防护套的引火帽往木箱里装。每箱装20来个。屋外的日本人把箱子装上汽车，运到火车站，准备外运。731部队兵器班的细菌武器分两类，一类是进攻性武器，即各种传染性细菌及其带菌媒介物和炮弹。一类是防疫性武器，如疫苗、血清等。苏海祥发现的兵器主要是细菌炮弹。

（七）水银和牛肉干

平房特区腰二道沟的韩行斌在平房站当过挂车员，他和日本人松村优一负责往日军8372部队和731部队甩车皮。从平房站引出一条专用线，一直通往731部队。他们有机会看到中国劳工卸车。有一次甩进一列货车，其中一节敞篷车装着用铁皮包着的木箱，里面装的是瓷坛。箱子上的标签上写着“汞”。有两个劳工抬箱子时，不小心摔坏了一个瓷坛，里面淌出来的是汞。汞就是水银。把水银稀释后可用以消毒。731部队在生产细菌、疫苗的场所，或搞人体实验时，常用水银稀释水作消毒液。

还有一次，在731部队铁路专用线上甩了6节闷罐车皮，都上着锁。日本人打开锁后，中国劳工开始卸车。箱子很大，但不沉。趁日本监工不在，有个中国劳工撬开了木箱，撕开防潮纸，发现里面装的是牛肉干。牛肉干是细菌培养基的主要成份。将牛肉干煮后，提取汤汁，就可以当作细菌培养基使用。煮牛肉汤最好用鲜牛肉，但731部队生产细菌量相当大，鲜牛肉供不应求，不得不从外地运来牛肉干做补充。

（八）川上班的人体图

731部队有个川上班，也叫计算机班。这个班的负责人是川上渐博士，工作人员有4个日本人，8个中国人。对外保密，工作人员不准与外人接触，连吃饭都在内部食堂。对外声称这个班的工作是给日本人计算工资，测量身长、体重。实际上，他们每人一台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731 部队宪兵室分期分批地给他们送来人体构造图画册。每人每次发给一本图册，每册 20 页，每页只画 1 个人，每个人体构造都有区别。计算机班的工作人员按照要求，在图上测量与计算人的手掌的大小，手指、脚趾各关节的长短，胳膊和腿的尺寸。这些数据都准确地标在有关部位旁边。把一本人体图册计算完后，由日本宪兵拿走，再发给新的一册。

计算班的工作是日本人进行病理研究的一道程序。他们研究各个人种的抗菌能力，主要以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为研究对象。川上班工作了 4 个月，因川上猝死而停止工作。

平房特区韩四家子屯的韩冈村老人在川上班工作过。他说，日本人说测算人体的尺寸是为了给部队队员和劳工检查身体。后来他们听到日本人复核数据时议论，某种族人体含多少血量，对某种细菌适应性如何等等，劳工们知道，日本人干的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后来，韩冈村借口文化水平低，调到动力班干活去了。

（九）黑板记事

在 731 部队内部，通往 7 栋和 8 栋的院子里，有一个很宽敞的房间，屋里有黑板和桌子。这个房间就是特别班办公室。“在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号码和记事，具体内容经常变换，”例如，某年某月，某某某号，石川班使用，病理实验；某某某号，凑班使用，霍乱实验等等。这些记事就是给“马路大”下了死亡通知书。“黑板上写的‘鼠疫活注’，就是往‘木头’身上注射活鼠疫菌。特别班黑板上的记事——根据各研究室的要求事先预定的活人实验一览表——就是‘木头’们自己不可能知道的死亡预告。”[①]

（十）“间苗”

1943 年，日军对重庆进行轰炸，从中国各地押送的俘虏用火车源源不断地运送到 731 部队。731 部队特别监狱里的单间牢房都改做集体牢房了，原来一个房间只关押 1 个人，现在挤进来 3、4 个人。在“实验材料”急剧增加的情况下，731 部队采取了“间苗”的做法。所谓“间苗”就是立即处死一些“马路大”的方法。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 86 页，群众出版社，1984 年。

起初，731 部队的“间苗”实验是这样进行的。不足 8 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3、4 个人睡觉、吃饭挤在一起，处于过密状态。他们给一个受实验者注射鼠疫活菌后，把他投进拥挤的单人牢房里，企图造成集体感染鼠疫。但除了肺鼠疫外，其他传染病没有蔓延开来，因为“马路大”当中有许多知识分子掌握预防感染各种传染病的知识，把这种预防方法传授给其他难友，并付诸实行，与 731 部队进行斗争，使细菌的毒性出现减弱的性质。这时，高桥班的班员想出了在“马路大”身上连续“移注”鼠疫菌的方法。即“给‘木头’A 注射上活菌，‘木头’A 确实会患鼠疫而死亡。但是，在死亡前的人体内部，人的血液和淋巴液中产生的抗体，一直在和鼠疫菌进行激烈的斗争。在鼠疫菌和抗体的斗争中，战胜抗体的鼠疫菌的毒性相应增强，这时再把‘木头’A 的血清注射到‘木头’B 的身上。在‘木头’B 的抗体和侵入体内的毒性更强的鼠疫菌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又产生出毒性更强的病菌。再把这种病菌注射在‘木头’C 的身上，进一步提高鼠疫菌的毒性。这是将‘木头’用做培养剧毒性细菌的架桥作业。”[①] 这种架桥作业制造出更毒的鼠疫菌，同时，有的“木头”也获得了对其他细菌的免疫性。731 部队对顽强活下来的“木头”从牢房提到特别处置室来，把装着 20 毫升哥罗仿麻药的注射器针头扎进“木头”的手腕，“木头”就立即死亡了。这样以来，许多“木头”就被“间苗”处死了。

（十一）预约“马路大”

731 部队各研究室的班员在特别班班员的陪同下，经常到牢房预约实验材料，预定选择某某“木头”进行细菌实验。有时连这种当面选择预定也省略了，直接打电话定“木头”，什么体形都可以，只要挑选健康的就可以了。进行预约“木头”，搞细菌实验的日本人是文职身份的医生、研究人员和他们的助手。[②]

（十二）一个卫生伍长的证言

我叫大川福松，于昭和 15 年在陆军卫生部入队，后被分配到了北安陆军病院，经过 3 个月的训练后，立即被分配到了病理实验室工作。在那里我们用老鼠、豚鼠、猿等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 91 页，群众出版社，1984 年。

②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群众出版社，1984 年。

各种动物进行伤寒、赤痢、疫痢、鼠疫、霍乱等接种实验，及各种成果的观察。同时对各中队定期进行咯痰、便检、尿检等工作。现在作为问题的“慰安妇”问题，无论在哪里的部队都有 30 到 50 人不等的数量，我们要在周六、周日之前对她们进行梅毒检查。

北安陆军病院也是在石井 731 部队长命令下进行人体和动物的日常实验。以利用麸子开发研究青霉素理由调入 731 部队是 1944 年的事情。此时，我知道来到一个不一般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里首先有“不许看、不许说、不许听”的三训命令。在这个三训命令下没头地每天做病毒及立克次试体等科目在研究。特别是进行冻伤、霍乱、鼠疫人体实验，同时用人体制作标本，这就是日常工作。

用作实验的人都一律称马路大，没有名字，只有番号，有苏联人、中国人、朝鲜人及日本人，都是受到刑事处分的人，名字全都不知道，这也是秘密。一开始由于心情不好，怎么也没效果，过了一些天后一点点适应，一天大概解剖 2 ~ 3 人，多的时候能够解剖 5 个人。不仅要知道冻伤、梅毒、鼠疫、霍乱实验的感染状况，而且要把病毒放进玻璃瓶中，同时要和吉村班的许多人一起将血液进行培养，每天还要用孵卵器进行增菌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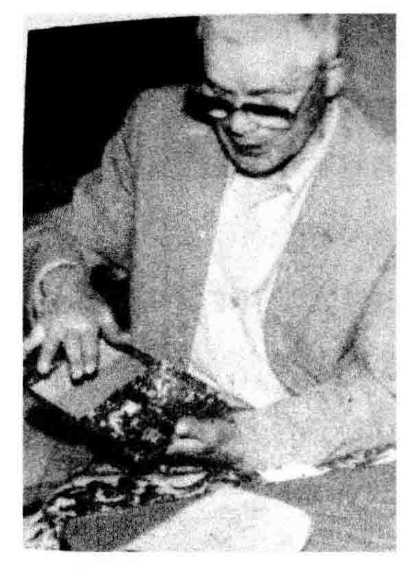
我的原名叫村田福松，回到日本后改了名字，隐藏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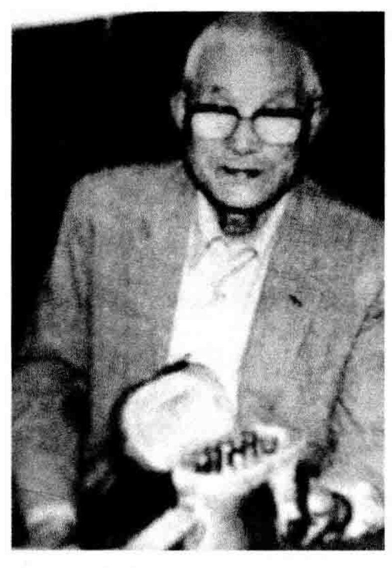
五、人体解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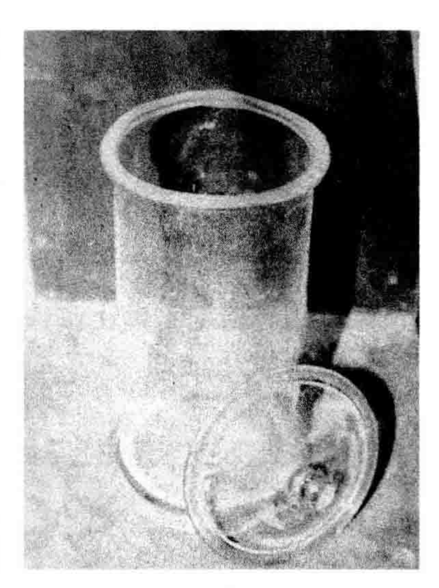
731 部队进行人体实验，要经过临床观察、解剖观察、病理观察 3 个阶段。人体解剖观察，一般是人感染细菌患病死亡后解剖尸体。石井部队也进行人体活杀解剖，把人当作动物来宰杀实验，而且不打麻药。活人解剖最早只在 731 部队进行，以后扩展到日本在华所有的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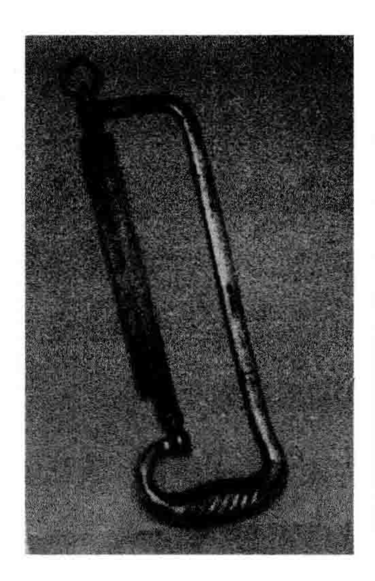
（一）解剖设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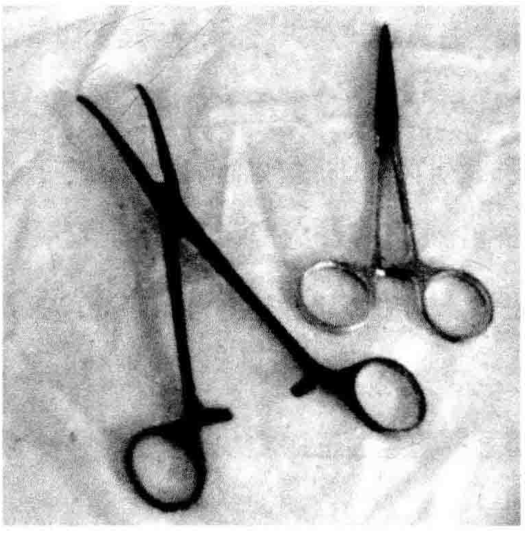
731 部队的人体解剖室房间里面，屋顶天花板上吊着许多特别大的灯泡（相当于现在的无影灯），室内设置了 3 张解剖床，室内有好几个水桶和装着福尔马林溶液的大型玻璃标本容器，而缺少其他的手术医疗器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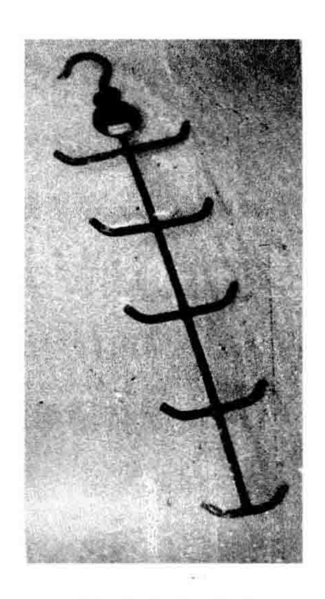

解剖技手胡桃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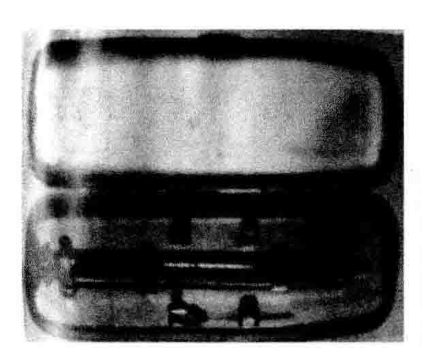

回忆当年研制细菌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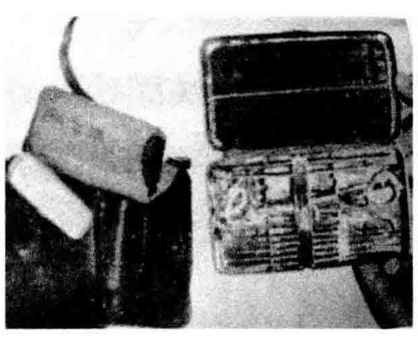

脏器标本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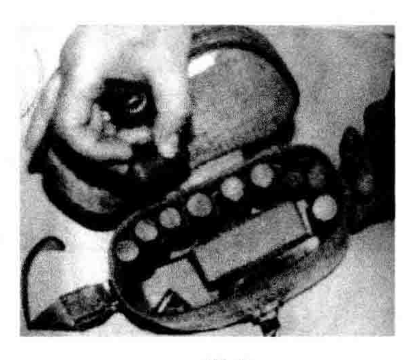

活体解剖时使用的
截骨锯


活体解剖时使用的
手术剪、止血钳


解剖时使用的
脏器挂架


注射器


手术用具


药盒

室内走廊里有运送尸体和活体的小铁轨。731部队原少年队员石桥回忆说：“我从中心走廊偏门进入地下道，当往特设监狱走的时候，看到三栋一阶的走廊里放着细菌生产班使用的3个大型消毒罐。地面上还铺有小铁轨，后来知道这小铁轨不仅供我们研究班往解剖室里运活体和尸体用，而且知道那是细菌生产班搬运细菌所必须的。”

人体实验用的还有其他材料。731部队原队员土屈田说：“在视察一处库房时，我发现了一些铁板，于是我就向雇员富土冢问到这种铁板是干什么用的。他回答说，这种铁板虽非军需品，但存放在仓库内，是预备在用人进行实验时使用，使用的办法是将铁板盖到受实验者胸前和背后，免使他们受伤……此后，雇员富土冢曾拿出一捆棉被给我看，并请求我把这捆棉被在可能范围，当作不能使用的废物一笔勾销。这捆棉被总共约有80条，上面显露出许多凝结的血团。这些棉被已破得不成样子。当我问到为什么这样时，他回答说，这些棉被也是在用活人进行实验时用来掩盖受实验者躯体的。”[①] 受实验者在不具备任何手术条件下，被残忍地杀害。

（二）解剖事例

1. 细岛的解剖实验

田村良雄供述：“有一天早上被我浇上消毒水的中国人，不管是死了还是没死，都预定今天解剖。中国人的脸胀紫着沾满了血，从担架上滴滴答答地流下来。‘两只樟脑液！’大木伸出两指命令我去注射。被注射了樟脑液（强心针），用脚镣手铐固定的中国人猛然睁开眼睛，好像要弄清这次行凶情况似地转过头来。但是，身体不自由了，眼里充满气愤的泪水，凝视着顶棚。转着摸中国人脖颈的细岛，用右手的手术刀咔嚓一声，沿着中国人的颈动脉切下去，血流了出来。中国人因鼠疫病和被宰割的痛苦，把头左右摆动。细岛用手术刀背敲击着中国人的心脏部分叫道：‘樟脑强心剂两支！’随后便切断了中国人的颈动脉，中国人留下了一句满怀仇恨的话：‘鬼子！’迅速地变了脸色，咽了气。细岛倒拿着手术刀，从上腹部到下腹部，再从下腹部到胸部，洋洋得意地切割下去。拉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401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开骨锯，切断肋骨，露出全部内脏。20分钟后，中国人的肉体被脔割了。滴着血的肉块散乱地丢在解剖台上……”①

2. 豚鼠的替代品

上田弥太郎供认：“1943年4～7月，在此期间，曾不断发生监狱的人死亡，我亲眼看到的就有4人，我帮助将尸体运往解剖室解剖。这4人全是为了实验细菌的效力而被害的，其他我未见的还很多。同时在这期间我亲自解剖过一个人。”上田弥太郎在三谷班作为活体实验的观察助手，起初，他只是每日对受实验者的病体进行采血、验血、检查，并观察病情发展变化情况。后来，他亲自参与解剖和焚化尸体。他供述有200个中国人被当作豚鼠的代用品让他们杀害了。②

3. 军刀军带奖获得者

山下升说，他“在外科还进行解剖。将被实验死的人进行解剖，由军医们将死者的头、膀子、腿割下，由我们再分别进行解剖，研究细菌的作用。731部队里死人、活人都解剖。我因为工作好，手术做得好，晋级为见习士官，受军刀军带奖。”③1943年，山下升在关东军军医部外科干了一年多，因为杀人太多，不愿再干了，于1944年夏同中野、渡边一起逃跑。在山海关一个饭店吃饭时，被宪兵逮捕，先后在山海关、哈尔滨宪兵队关押3个月，送回731部队后，继续做人体解剖工作。1944年8月，他释放不久，因人体解剖技术好而被晋升为见习士官兼“A”队一分队队长。

4. 一个课长的回忆

1942年1月，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第三课长吉房虎雄陪同关东军司令官原守少将视察731部队，见到了血淋淋的解剖现场。他回忆：“我们沿着走廊向前约走3米向左一拐，就到了解剖室。在那里，有3个日本军医挤在一块在俯视着什么，一看石井部队长来了，都立即站起，立正举手敬礼，直到石井发出‘照常进行’的话后，他们才敢恢

① 郭素美：“人性的泯灭与复苏”，发表于1995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座谈会”。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66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③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80页，中华书局，1989年。

复正常的活动。那屋里的地中间放置一个大解剖台，上边有一具躯体，血还滴落着，一根根肋骨清晰可见。头盖骨被打开，露出脑浆的脑袋滚落在躯体的左侧。被切得七零八碎的手和脚散扔在房间的右角。血腥异味扑鼻而来，连戴口罩的我们都觉得恶心。石井四郎冷笑着说，在这里工作得有胆量呀！可是有的军医却成了疯子！”

吉房虎雄所在的宪兵队至少向石井部队特别移送了5 000人，这些人最后都成了实验品。

5. 一个老人的遭遇

1939年，木夏田英雄参加了石井部队，开始在吉村班研究梅毒，以后又调入三谷班进行鼠疫菌实验。当年，他进行活体解剖时，觉得这是学习的好机会，很愿意执行上边的命令，他亲自参加了活体解剖实验，他回忆说：“记得那是个50岁左右的中国人。他被感染上鼠疫菌后，由我主刀进行了解剖。因为没有进行麻醉，所以将四肢绑在手术台上。由于经常做这样的不麻醉解剖，解剖台上都设有捆绑‘马路大’的装备。固定好后，我用刀一直从胸部割到腹部。为了防止喊叫，‘马路大’嘴里塞满了纱布。我将内脏摘下来，交给病理班进行研究，其他的事情我就不管了。解剖大约做了十二三分钟，剩下的躯体还在不停地痉挛。”①

6. 被活杀的少年

1943年春季的一天，731部队“协防班”班长裴文才被宪兵室的翻译官春日中一找去，说是去外地执行特殊任务。第二天，裴文才、春日和一名日本宪兵，乘火车到了新京（今长春）车站。春日对裴文才说，这次任务是抓间谍，但不能只注意年轻人，小孩子也要留心。

他们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行走。春日突然发现一名沿街乞讨的流浪儿，他示意裴文才和日本宪兵去抓小孩。裴文才走上前与小孩说话，日本宪兵趁机抓住小孩，给他戴上手铐。当天，他们把小孩押回哈尔滨，监押在劳务班的拘留所。春日出去办事了。裴文才和日本宪兵看守小孩。小男孩很坚强，连骂带咬。那宪兵把小孩绑起来吊在房梁上，用皮鞭子抽打。那孩子被打得遍体鳞伤。不一会，春日回来，假惺惺地说：“不能这样打，

① 王一汀：《白衣恶魔》，第4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把他交给我处理吧。”春日带走了小孩。第二天，春日在“协防班”说，那小孩没审出什么问题，当晚就释放了。

1982 年 9 月，日本作家森村诚一访问平房时披露了这件事，他说，一个曾在 731 部队宪兵室当翻译的日本人曾把一个十三四岁的中国男孩骗到解剖室，被日本军医活活解剖了。那个翻译病重来不了，让森村诚一代为向中国人民道歉。

森村诚一记述了解剖中国少年的过程：“这个中国少年，按照 731 队员的命令，光着身子上了手术台。（看上去），他还不过只有十二三岁。全身麻醉后，用酒精擦净了少年的身体。雇员 k 从围在手术台旁的田部班班员当中走出来。手里拿着手术刀靠近这个少年，k 在少年胸部拉了一个 y 字形的口子，血块扑哧扑哧地从止血钳子旁边往外冒，露出了白色的脂肪……k 从处于睡眠状态的少年体内，把肠子、胰脏、肝脏、肾脏、胃等各种脏器，熟练地一个一个取了出来，扔到桶里。马上又有人从桶里挪到事先准备好的装满福尔马林溶液的大玻璃容器中，把盖封好。”[①] 另据《跨国取证七三一》一书中记载：“（这个少年）被强行扣在手术台上，然后注射麻药，在实习医生的围观下，主刀的日本军医将中国少年从脖子到肚皮一刀剖开，一边讲解，一边将鲜血淋漓的内脏从胸腔中一一摘出，放入标本瓶中。然后众实习医生一涌而上，你一刀，我一刀，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死在 731 部队的实验室里。”[②]



解剖班班长冈本耕造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 65 ~ 66 页，群众出版社，1984 年。

② 金成民等：《跨国取证七三一》，第 96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

这个少年没有参加抗日活动。他被当作“实验材料”的原因是731部队想解剖一个健康的少年做一次对比性病理研究。但监狱里的“马路大”没有合适的人选。731部队按照北野政次的指示，从外地抓来一个流浪儿，暗中进行解剖实验。这个少年无端地丧失了性命。

7. 女性解剖

森村诚一笔下有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性被活体解剖的事例。据说这个年轻妇女是抗日英雄宋哲元的情人，还有个婴儿。731部队原冈本班班员回忆：“参加这个‘女木头’的活体解剖的，不仅有冈本班的人，还有石川班、田部班、凑班、内海班等各班的技师和技术员。”



解剖班班长石川技师

担任执刀的是冈本、石川两个班的人，预先通知了其他班成员。活体解剖需要带上止血钳子，否则解剖室的天花板和墙壁上，就会溅满血浆。麻醉方法是用在哥罗仿中浸泡过的纱布把嘴和鼻子捂上，5分钟后，受实验者就会失去知觉，执刀者从这个年轻女性的咽喉部位拉开，一边止血一边向下拉，从腹部一直拉到阴部。那个女“马路大”被杀，大概是1944年。这次实验是指导观摩性的，花费了3个小时。“因为要边解剖，边进

行各种实验。特别是女‘马路大’，要以女性生殖机能为中心，利用各种测定仪器贴在许多部位进行测定，如调查排卵机能啦，做细致的解剖啦……所以很费时间。”[①]

在731部队的供词中，还有许多女性被侮辱被杀害的事例。上田弥太郎供认，1942年4月，有一天，他问：“八号房的姑娘怎么样，伊藤答说在上次实验就用了，小林接着说，‘把我的小孩都杀害了’(意思是将姑娘强奸后怀孕又被实验杀害了)。”[②]

8. 解剖台上的日本雇员

田村良雄说，须藤良雄是第四部第一课的雇员，因为生产鼠疫菌而感染了鼠疫。在特别班解剖室里，由铃木启之少佐指挥，细矢技师执刀，进行活人解剖实验。田村良雄是细矢技师的助手。细矢先解剖了一个中国人。紧接着，铃木下令解剖须藤良雄，他说：“让须藤良雄到这里来，都是为了效忠天皇陛下呀！”731部队为了细菌战的需要，把自己部队里染有鼠疫的、生命垂危的须藤良雄送进了解剖室，但这次解剖是不许说的绝密。须藤良雄赤裸着身体，由特别班班员抬到解剖台上。几天前，谈起女人还很活跃的须藤，已瘦得皮包骨，全身有无数的紫色斑点，胸部搔伤了一大片，血从伤口里流出来。他痛苦地流下眼泪，呼吸困难了。田村良雄用消毒水给须藤的全身进行了消毒。由于消毒水的作用，须藤恢复了知觉，睁开茫然的眼睛环视四周，每动一下，颈部的绳索就勒紧一下。铃木把须藤全身检查完毕，下令开始解剖。田村良雄把解剖刀递给了细矢。反握着解剖刀的细矢走进须藤又把解剖刀交给了宇野。宇野接过解剖刀，开始抚摩须藤的肚皮。他的手有些震颤。这时，铃木歇斯底里地喊道：“快干！”宇野反握着解剖刀，刺进了须藤的上腹部，往下切去。血流向解剖台的血池。“畜生！”须藤最后喊出这样一句，便死了。解剖台上，内脏露了出来。几个小时后，在第四部第一课的研究室里，铃木启之用显微镜观察着活蹦乱跳的鼠疫菌。731部队进行细菌实验连自己部队的雇员也不放过。为效忠天皇而进行细菌战让石井部队的队员丧失了人性。[③]

---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73页，群众出版社，1984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86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③ 韩晓、辛培林：《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第118～11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9. 第一次参加活人解剖

731部队原少年队员筱土冢良雄说，为了测试细菌的毒性力，取得毒力很强的毒株，增加菌株毒性，必须用动物去实验，而最好的实验材料是活人。最初的实验，他所知道的一次有3个活人被解剖。

解剖实验开始前，先进去采血，测量抗体值，3个活人：第一个是不接种疫苗的，另一个是接种过731自己培养的疫苗的，还有一个是接种过苏联生产的疫苗，这是第一阶段的工作。还有另一队做另外一份工作，好像用了其他国家的疫苗做实验，经过一段时间，再抽血测试了抗体值。通过抗体值显示的指标看看对于鼠疫抗病能力有多大提高，我想这就是我们进行测试的目的。接着我们在知道这个抗体，这个数据之后，刚才我也提到一点，把做过菌数测试鼠疫苗注射到3个人中的两个人的体内。注射这个菌让他们感染鼠疫，观察那个人濒临死亡的情况并进行解剖，解剖的场所在7号楼，有一个像处置室的地方，很干净，也很大，一侧放着显微镜之类一些仪器，中间有个台子，向下凹陷，台子中间有个洞，下边下斜，旁边还可以动。我第一次进去时，腿发抖，浑身打颤。这个解剖室是特别班管理的，那个人被运到这里，所有的人都经过防菌处理（或有防菌保护），同伴间语言无法沟通。对那个人用什么方法做的我不敢正眼看。我最初被安排做的事，是用刷子把那个要被解剖的人刷洗一遍。我问，脸怎么办？他们回答说，脸也要刷洗。我把那个人的脸也刷洗了。当时我听说过脸也要刷洗的，剩下的情况就没敢看。有一个人用听诊器听了一下，就开始解剖了。我们的目的始终就是为了采集细菌，我就从被解剖的人的内脏中收集鼠疫细菌，我们做完手术后就走了，现场并不清理。我第一次参加活体解剖的情况就是这样。[①] 筱塚良雄还证实，那个人在7号楼的处置室被活体解剖了。这是一个非常正规、手术器具齐全的处置室，下边、周围都有瓷砖。进入处置室的人肤色已经变黑了……不用消毒，用水冲洗后，活着进行解剖。他参加的那次解剖活动大约有5个军医，一个是执刀医生，一个是听诊医生，一个是技手，另外两个人制作标本。

① 金成民等：《跨国取证七三一》，第9～1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10. 诊疗部的“治疗”

731 部队原少年队员中村在“南栋”诊疗部当卫生兵，参与过对人体的治疗实验。他住在哈尔滨马家街的一处日本风格的平房里。他的一位朋友住在“秋林”南边不远的白桦寮。

这个三阶欧式建筑物原是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1936 年迁至车站街以后，这里变成了 731 部队队员宿地白桦寮。

据中村回忆，他感到迷惑不解的是，那位朋友看到本部队宪兵室的人经常出入那里的地下室，但居住在白桦寮的单身队员谁也没进去过。后来逐步知道那地下室是监押俘虏的牢房，731 部队作实验时，就派宪兵把“犯人”提走。

中村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证言。他说：“我曾去白桦寮考察过，那地下小屋都有牢房的痕迹，监视窗口、锁门的加固铁板和吊人上刑的滑轮还依然存在。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设有‘马路大’转运站的事是确实的，那么，日本领事馆迁移后，这个地下牢房是否继续使用，外人一无所知。森村诚一在《食人魔窟》著作中曾写道日本领事馆设地下牢房的情节，但连我都没想到 731 部队还延用。”

731 部队的诊疗部，从表面上看，它是治病的场所，并在平房本部大楼里设有分部。该部队的军医在那里给患有传染病的队员和“犯人”治疗。结果对“犯人”来说，无论治疗效果如何，他最终是不会活命的；而对队员来说，通过治疗，他还有活命的希望。无论是怎样的情况，都是通过“治疗实验”取得细菌研究的成果。

中村证实：“诊疗部收留的患者大部分是得各种传染病的中国人，个别患者是日本人，轻病患者在诊疗部医治，重病患者都送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去。起初不知那些中国患者是从哪儿收进来的，个别人是从外地疫区运来。有几天，我奉永山部长之命到本部去取血液，交给另一位同事进行化验。那些装血液的试管上没有注姓名，只标有号码，不久我在传染病室看见了同样号码的患者，治疗几天，不知怎么回事，都说他们医治无效而死亡。而从本部公开转来日本患者注射了抗体血清，有不少得到康复。有一次，从靠蒙古边境地区传来一个蒙族村落发生斑疹伤寒传染病的消息，有 3 名患者，病情都不太重。不知什么原因，引起了 731 部队的关心，派出军医乘专用汽车连夜赶到疫区。我作为助

手陪同哈医大的日本人山崎教授也去了。在那儿对患者进行了初步检查后，当即运回‘南栋’治疗。我虽然不知道他们后来的命运怎么样，但我想他们是不会活命的。还有一次收到昌图县一个村屯发生肠伤寒传染病的情报，有二三十名患者。诊疗部的内科医生村田等人前去进行病理检查，然后以治病为名把他们运回平房，由所安夫医生秘密地进行了活体解剖。”

1944 年 4 月的一天，731 部队原少年队员小笠原奉命到田中淳夫军医大尉的办公室里搞卫生，在写字台上看有一些病历表和附有使用鼠疫跳蚤记录的人体画图。看样子，这些人体实验的资料是刚刚收到的。田中大尉尽管让小笠原进办公室，但没经本人允许偷看资料是违反保密纪律的。可是小笠原没顾这些，一种好奇心促使他翻看，发现病历表上没有患者的名字，只用汉语标有“姓”。他清楚地记得有孙 ××、马 ××、刘 ××、冯 ××。那记录有的是用日语写的，有的是用德语写的。他特别详细地看了一张病历表，那上面记有姓、年龄、性别、种族外，还记有病历：第一天，患部红肿；第二天，淋巴腺肿胀；第三天，死亡。

这些人体实验的材料在 731 部队队员内部并不是绝密的，否则小笠原是看不到的。后来，小笠原也参加了人体实验的演习。

有材料表明，侵华日军所控制的各个医院都进行残酷的活体解剖实验。受难者不仅仅是中国人，还有苏联人、德国人、朝鲜人、甚至有日本人；不同性别的人，特别是在解剖女性时，往往作为观摩讲解实验课，让更多的人参加解剖实验；不同年龄的人，有老人，有青年，甚至有小孩。解剖的对象不只是积极抗日的分子，还有普通百姓，他们没有任何过错，连日本法庭也无法审判，这样的人往往被秘密解剖。

11. 小出中校满洲出差报告

据当时的大冢医事科长的日记所载，1944 年 5 月 23 日的陆军省科长会议简报上有一个叫“小出中校满洲出差报告”，内容是视察 731 部队的情况报告。其中较重要的部分如下：

伤寒菌携带者的治疗：胆囊部超短波，注射六〇六（salvsnsan）有效。

六〇六，注射疫苗——正要着手，手术性治疗——活人实验，胆囊口——缩、放入

浓菌、有效。

蛆虫弹(陶瓷炸弹)——有望制造、汇报给宫田参谋,答复是可上报所需器材和预算。

有关“保号”事宜:

从高空集中攻击,尚存命中及浓度构成问题。现在几乎没有提高效果的可能。px(鼠疫菌)制造生产,田中少校的研究,使用老鼠量可达十二分之一。

局长:把老鼠换成狗如何,已有使用狗实施之例,也有用煤油罐代替培养罐者。

今冬至明春的演习成果:

液体鼠疫菌。使用炸弹(弹片带入)致伤者 10% ~ 30% 发病。蛆虫弹致伤者 20 人中只有两人发病。

干燥鼠疫菌未能成功。估计是 1 立方米需 4 毫米浓度。

混合菌在寒冷地区因冷冻不发病。

将来关东军打算使用干燥菌(用 x 不行的菌)试验摸索耐寒耐热的胶着性。

炭疽菌:能否引起食道感染留存疑问,但有效果。

计划使用蛆虫弹。

局长:从消化器传入不至于死亡吧。

辰巳大尉及部下 2 人感染。皮肤传染,命是保住了。参加第二部攻击的军官们干得很出色。

炭疽菌:无消毒药。生产该菌亦需必要的研究。(略)

◎军部中央认为,使用活人做实验,是为了解决全军性存在的重要问题,px 弹丸的功勋奖章问题。

草地参谋:秘密事项。

高山参谋:联系授受功勋奖章事宜,考虑公布方法(略)

预防治疗发疹伤寒液,有 5 万人份。

如关东军使用在劳工身上收效一样,制作疫苗时的残渣只有在凝聚反应时才明显反应,亦可使用到军队。大连卫研,第四性病的诊断试剂良好(大家备忘录)。

以上摘录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以治疗伤寒病菌携带者为名。对活人施行手术

实验。另外，在“保号”事项里说他们拥有500名活人，这一条也很重要。在1943年末至1944年春进行的活人实验时，把鼠疫菌装入炮弹，是飞散的弹片上附着的鼠疫菌传入人体内感染，其负伤者的10% ~ 30%发病。而蛆虫炸弹的情况是20人中有两人发病；干燥鼠疫菌却失败了，而在炭疽菌实验中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有食道感染之效果，蛆虫炸弹可以投入使用。同时也透漏了在该试验中有过3名731部队军官引起皮肤感染，险些丧命的事故。至于对这些实施细菌战而进行的活人实验，视察报告的作者还以中央军部的名义特书了一笔评价曰：这是为了解决全军性面临的重要问题而进行的。并决定秘密授给研制鼠疫菌弹、蛆虫炸弹者以“陆军技术功勋奖章”。另外，这份报告提到以下两个事项也很重要，引人注目：一是有关研制蛆虫弹问题上提到了关东军参谋宫田（竹田宫恒德王）。二是关东军在劳工身上实验使用了新开发的发疹性伤寒疫苗。[①]

第四节　野外实验

在实验室条件下，对人进行的各种实验的同时，731部队还使用一部分“实验材料”在野外进行实验。这种实验由731部队第二部在最接近于战斗环境的条件下，组织实施进行。该部队在东北有固定的野外实验场地，主要有安达特别实验靶场、城子沟、佳木斯、陶赖昭等地设置的实验场。另外，还有一种临时实验场，在东北山区及呼伦贝尔草原等地都进行过野外实验。在野外实验中，731部队既使用细菌、病毒，也使用毒气，大规模地杀害“马路大”及无辜的平民百姓。石井四郎曾对梶塚二说：“他部队内在进行实验，即将细菌装在炮弹和飞机弹内进行实验；从飞机上投掷细菌的实验，是在平房站该部队飞机场旁边的一个实验打靶场上进行，至于最危险的细菌，则是在一个什么荒野地方来

① 〔日〕吉见义明：1995年在哈尔滨中日联合召开“反侵略维护和平座谈会”论文《陆军中央与细菌战——摘自日军军官业务日记》。

实验的，究竟在哪里，石井并没有说出。”①

在野外对活人进行实验时，最常用的办法是投掷细菌炸弹，或从低空飞行的飞机上，直接撒布细菌和染有鼠疫的跳蚤。在地面上传染居民点、蓄水池和牧场等等。在打靶场上，日本人把细菌弹放在离被绑在柱子上的受实验者一定距离的地方，然后由实验者在战壕内用电器设备来引爆。实验后，经过两小时左右的观察，把受实验者押回监狱，继续观察他们的病情。受实验者一般不进行治疗，能使他们全体致死，是实验者最为得意的。对各种细菌的效能，731 部队在打靶场上都用活人实验过，最常用的是鼠疫菌、炭疽热菌、霍乱菌和伤寒菌。



将装满菌液的桶运到现场



准备往江河里投撒细菌

同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活人实验一样，野外实验也是由军政当局直接批准的。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供认：“第 731 部队为了实验本部队内所产细菌武器效能起见，曾在实验室内以及近于战斗环境的野外条件下，进行过对活人使用此种武器的实验。野外条件下的实验是由 731 部队在安达站附近一个有特种装置的打靶场上进行的。从北野和田村两人的报告中，我知道了有用活人进行实验的事实。此外，我从我看过的那张影片上，同样也知道实验细菌武器效能一事，是在活人身上进行的。1944 年 11 月，我从北野的报告中知道了在安达站打靶场那里是拿活人来作实验的对象。1945 年 6 月，我从田村的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106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报告中知道了受实验的是一些被关在第 731 部队特别监狱内的人。”①



向水泡里投撒细菌



野外实验场上进行通讯联络



日军人员也自受其害



野外细菌试验后进行现场消毒



在野外实验场上



松花江畔进行滤水器功能实验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45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731部队搞野外细菌实验，目的是为进行细菌战争作准备，该部队在多次实验中，找到了进行细菌战的方法。石井四郎对梶塚隆二说，进行细菌战的方法就是：第一，军事破坏的方法，第二，使用炮弹，第三，使用飞机炸弹。据梶塚隆二供认："石井四郎对我说，炮弹和飞机炸弹装上细菌的话，那么金属爆裂时因大量火药爆炸引起很高热度，就会使细菌失去生机。所以石井部队决定采用瓷制炸弹，并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工作。他曾对我说，若是采用从飞机上撒放细菌的办法，那就从很高的空中撒放，而这是不能产生良好效果的，所以为要使细菌不致失掉生机，就必须从不很高的空中撒放。石井接着又说，若是把细菌单纯地撒放，那么细菌从高空撒下时就会失掉生机。要把细菌装到某种外壳内撒放才行。而这种外壳就是跳蚤。因此就决定使用传染上鼠疫细菌的跳蚤。再则，据石井所说的话看来，用传染媒介物去传染饮水及食物，乃是使用细菌武器的一种有效方法……石井说，进行细菌实验时用的中国人既在部队内实验室条件下进行，又在野外条件下进行。"[①] 该部队在野外实验中，引爆细菌炸弹，致死率最高的细菌是炭疽菌。



在松花江南岸进行细菌战演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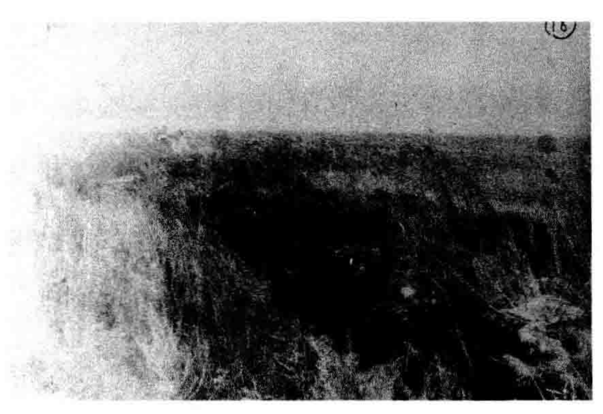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313～314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一、安达特别实验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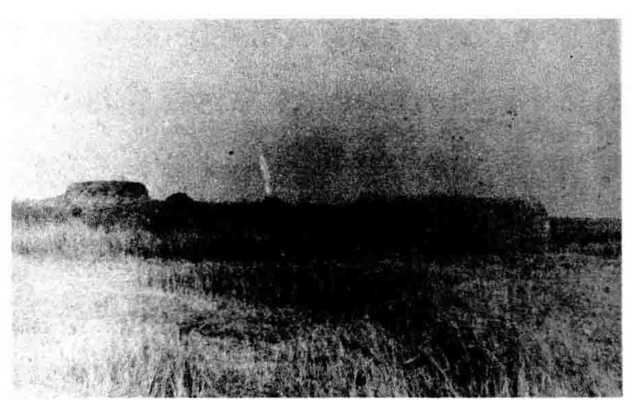
1941年，731部队在安达镇东48公里处的鞠家窑附近设立了一个特别实验场，也叫安达特别靶场。实验场距鞠家窑1公里，位于一个土冈上，周围是大草原。它隶属于731部队第二部，为细菌实验部。该实验场由附近村屯的中国劳工修建。建筑材料是731部队从外地运来的。实验场有地面和地下工程。建有4栋约20多个地下室，有营舍、实验室、汽车库、食堂、浴池。地面有仓库及各种动物棚舍。在实验场区有4个三角形的铁架子，为投掷细菌炸弹的标志点。四周有铁丝刺网，设置岗哨。

鞠家窑的老户关占和亲眼目睹了731部队建筑安达靶场。1940年，一伙穿便衣的日本人来到安达镇一个日本人开办的旅店。他们在鞠家窑附近勘察地号，说是要建“兵营”。731部队在附近村屯雇用了一批劳工，修建半地下房舍，四周拉上了铁刺网，还建了个飞机场。1941年建成使用。关占和也干了几个月的活。日本人在实验场内竖了4个铁架子，上面都插着小红旗，日本的飞机瞄准它投弹。日本人每次“演习”时，实行戒严，在村口设岗，不准外人靠近，连在附近地带放牧、干农活也不允许。“演习”结束后，允许老百姓在附近地带放牧、割草，但不让靠近铁刺网。

鞠家窑的老户于万纯也看见了731部队修建打靶场的情况。1941年的春天，一伙着便装的日本人来到我们屯，落脚在大地主鞠三爷家。随行的有3个中国人，孙忠仁和侯文权是日语翻译，潘善忠是招工把头。日本人平时住在安达镇日本人开设的“佐贺旅店”，侯文权的哥哥在佐贺旅店给日本人做饭。当时，潘善忠承包了日本开拓团的宿舍工程，这次修建靶场也由他招工。安达打靶场开工后，日本人在鞠守信家吃住，佐贺旅店成了联络点。安达打靶场建成后，日本人不让中国人靠近。附近村民从远处能看见日本人的飞机搞演习。光复那年秋季的一天，我割草时去那里看过，地下建筑物已炸毁，只剩下几个大土坑。猪舍、马圈有痕迹，马骨头到处都是。那年，雨水好，草特别茂盛，明显看出一条飞机跑道。



安达特别实验场遗址



安达特别实验场遗址



安达特别实验场地下通道遗址



安达特别实验场遗址

鞠守信说，他是鞠家窑的富户，1941 年，修建安达打靶场时，日本人在他家落脚。他说，其实他不情愿和日本人打交道，而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招待日本人，他也在靶场当过劳工。他回忆说，安达打靶场有 4 栋房，全是地下室。营舍修建完后，日本人设立了岗哨，不允许中国人进营舍，劳工只能去牲畜棚圈干活。安达打靶场隔几天就来飞机。飞机一来，日本人就在鞠家窑村东头设岗，不让村里人出去。演习结束后，才解除戒严。当时，鞠守信正在打靶场做工，他看见日本人穿戴特别，在黄色军装上贴有红、绿、蓝等各种颜色的布条。老百姓管他们叫“变色龙”。有一次，一架日本飞机卡在土井里，日本人让劳工帮助去往外拽。因飞机太重，拉不出来。后来，日本人让把飞机里的货搬出来。他们从飞机里抽出 100 多根铁杆子，每根重 30 多斤。卸重后，才把飞机拽出来。靶场还有马、猪、牛。日本人也用动物搞实验，他们把马、牛、猪固定在靶场，实验后，把死动物掩埋。被实验的人用汽车拉走。

潘善忠说，他是河北省丰润县人。1940 年 9 月来到安达县城。在一个厂家柜头当仆役，挣钱不多。有一天，他碰见一个叫丁五南的日本人，通过翻译孙忠仁得知，日本人要在鞠家窑附近修营舍和飞机场，让他做工头招工，由日本人付工钱。他就去了鞠家窑。承包日本人的活，为了挣钱，没有政治目的。承包工程，当头的是 3 个人，潘善忠、孙忠仁和侯文权。表面上，潘善忠是监工，实际上，他们 3 个人分钱。飞机场工程在 1940 年 12 月竣工。他听孙忠仁说，飞机场是 731 部队修的，当靶场用。靶场营房建在一个土岗上，里面有住房、车库，日本人住在里面。抓来的中国人也关押在里面。地面上有板房仓库、井房子和牲畜棚圈，四周是铁刺网。验收后，来了 30 多个日本兵在这里驻守。我认识永松大尉。

田村良雄供认："1941 年 5 月初旬，以第二部山口班为主体，在航空班附近的平原上，在课长碇常重中佐、班长山口技师指挥下，进行了细菌弹爆炸之活体实验。在此次实验中杀害了 12 名抗日地下工作人员。这次我是在第四部柄泽班班长大尉命令下，与其他 4 人一起，带着装有平板培养器 200 块的灭菌罐，与特别班员 1 名、山口班员 5 名一起先到实验场去，把 10 余个实验用的器材从车上搬下来，在山口技师的指挥下，在 50 平方米内，与其他 8 人一起，挖了栽木桩子的坑，准备把被实验者绑在木桩上。当宪兵室田坂曹长及其他 4 人用汽车将抗日地下工作人员拉来的时候，我和柄泽班的另外 4 名奉命离开了现场，而未能看到活体实验的情形。"[1]

川岛清在 731 部队兼任第一部部长期间，除了在各实验室内用活人进行实验外，同时还在第 731 部队各打靶场上近于作战情况的环境中，拿活人进行实验。他供认："1941 年 6 月，我同本部队人员们一起在安达站附近本部队打靶场上参加过检查鼠疫跳蚤炸弹效能的实验。在这次实验时，是对 10 ~ 15 个被绑在柱子上的犯人来检验细菌飞机弹的效能。当时从飞机上投了 10 多个炸弹。"[2] 川岛清是以 731 部队总务部长的资格参加这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64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60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次野外实验的，他主要检查这次实验中的组织情形，实际领导这次实验的是第二部部长太田大佐。他还详细供述了这次在安达附近实验装有鼠疫跳蚤的“石井式”瓷壳炸弹效能的具体情况。他说：“用来进行实验的场所曾严加卫护，禁止行人通过。场所周围设置有特别的岗哨，专门守卫这个地方，不许任何一个旁外的人进到那里去。在这种实验时用来进行实验的 15 个人，从部队内部监狱运到之后，就被绑到实验场上专门栽入地里的柱子上。为使飞机容易发现目标，即易于找到打靶场起见，所以在打靶场上插有许多小旗，并放起一簇乌烟。一架特备的飞机由平房站方面飞来了。飞机飞到打靶场上空时，投下了 20 来枚炸弹，这些炸弹离地 100 ~ 200 米高的空中全部爆炸，于是装到炸弹内面的鼠疫跳蚤就落到了地面上。当时鼠疫跳蚤散满了整个打靶场。掷下炮弹后又等候过相当长的时间，让跳蚤能尽量散开而传染到受实验的一些人身上。随后对这些人施行过一种消毒手续，就用飞机把他们送到第 731 部队设在平房站的内部监狱去，在那里对他们加以监视，看他们是否染上了鼠疫。”[①] 这次野外实验因为当时温度太高，致使跳蚤所起的作用很低，效果并不好。

据在 731 部队担任司机的越定南证实，1943 年冬，731 部队在安达特别实验场进行一次鼠疫菌炸弹的效能实验，由于疏忽，没等实验，30 个绑在十字架上的被实验者松了绑，四散逃去。枪击没镇压住，就用汽车碾压，最后枪杀轧死 29 人，有一具尸体，他们没找着。1944 年春天，关占和在打靶场南边的草原上放羊，他发现草地上有一具尸体。死者穿着一件破旧的蓝棉袄，袖头上凝固着一大块血迹，像是中弹身亡的。尸体没有腐烂。推测这具尸体就是 1943 年冬日本人没有找到的那具尸体。

柄泽十三夫先后两次参加过在安达特别实验场的活体实验，每次用 10 个“马路大”进行实验，一部分受实验者染上了炭疽热，死掉了。他供认：“我两次参加过在安达站附近打靶场野外条件下用细菌传染活人的实验。第一次是在 1943 年末用炭疽热细菌进行实验。在这次实验时使用过 10 个受实验的活人。他们被押到打靶场上时，就被绑到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267 ~ 268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彼此相隔5米的柱子上，然后就用一枚放到离他们50米远地方的破片弹施放细菌来传染他们。这个炸弹是用电流来爆炸的。这次实验的结果，是一部分受实验者遭到了传染。对他们采用过种种办法后，就把他们送回到第731部队中去。后来我从报告中知道，那些用作实验对象而染上了炭疽热细菌的活人，都死掉了。第二次实验是在1944年春季举行的。这次是实验鼠疫细菌使用法。传染办法就是经过呼吸器官来传染。这次处置受实验人的手段，也是与实验炭疽热细菌时一样。在离这些受实验者10米远的地方，放置有一个盛满鼠疫细菌的铁桶。这个铁桶爆裂了。但据我所知，在这次实验后查明，传染没有成功，病菌没有通过呼吸器官。”①

秦正氏供述了对“马路大”进行野外实验及治疗实验的情况，他说：“1944年12月前后，在北野政次队长、第二部部长碇军医大佐的指挥下，在安达实验场，将约6名爱国者（其中至少要有1名苏联人）戴着脚镣从押送的汽车上拖下来，将他们倒背手绑在间隔约20米的木桩子上，叫他们跪在地上，使飞机从100～200米的高度投下炭疽菌的细菌弹，随着细菌弹的爆炸，使纯粹培养的炭疽菌撒布在这几名爱国者的鼻子、咽喉的黏膜上（根据供给研究会观看的影片得知的）。在数日至数十日后，诊疗部长永山太郎军医大佐，对于染患炭疽的爱国者，实行了各种的‘治疗’之后，终于使之死亡。我翻译的‘炭疽二例’中的治疗法，曾被永山用来进行实验。”②

731部队用强迫的办法对“马路大”进行传染致命细菌的实验，藉以实验细菌武器的效能，西俊英说，1944年10月，在安达站打靶场对5个中国战俘做过传染鼠疫（用鼠疫跳蚤）的实验。1945年1月，他参加了对10个中国战俘进行传染坏疽病的实验。他供认：“这次实验的手续如下：把10个中国战俘绑在柱子上，距装有坏疽菌的开花弹10～20公尺远。为了不让这些人立刻被炸弹炸死，就把他们的头部和背部都用特种金属板和厚棉被掩盖着，双脚和臀部则露在外面。电门一开，炸弹爆炸了，带有坏疽菌

---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279、280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72～73页，中华书局，1989年。

的霰片落到受实验者所在的小坪上。结果全体受实验者的脚上或臀部都受了伤，他们经过 7 天惨痛之后都死去了。”[①] 这次实验是第二部部长碇常重及科学工作员二木两人指挥的。实验完结后，把这 10 个人押回 731 部队特设监狱。他们全部感染了坏疽症而死掉了。

石井四郎曾组织有关人员参观了在安达打靶场的野外实验活动。1945 年 4 月，731 部队支部长会议后，石井四郎说，在安达有实验演习，支部长如果愿意，可以参加。会议结束后的一天午后，林口支部长榊原秀夫、第一部的肥之藤少佐、海拉尔支部长加藤少佐、牡丹江支部长尾上正男，还有一名技师一同乘轻型轰炸机到了安达。榊原秀夫供认：“（这天下午 1 时），在安达早有第二部的演习员在第二部长碇大佐的指挥下进行着演习的准备。不久来了一架重轰炸机，从机上下来了 4 名中国爱国者和警备人员。这 4 名立即被绑在安达演习场有间隔 25 ～ 30 米的埋在地里的柱子上。3 点左右，石井四郎、第一部二木技师、总务部企划课长田部中佐，乘飞机来到了现场。3 点半左右，一架轻轰炸机飞到演习场上空，从 150 米的高度投下了陶器炸弹，在 50 米的空中爆炸。我穿上了全套预防衣，从五六百米的距离观看了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这个炸弹是填着可怕的炭疽菌的炸弹，让他们从鼻咽腔吸进绝对没有生存希望的肺炭疽，或因破片让他们发生皮肤炭疽，是一个特别残暴的行为，我也参加了这种罪恶活动。将近 4 点的时候，我和其他支部长乘飞机回到了哈尔滨。这几位中国人在我们走的时候仍在那里绑着，听说消毒后，放在 731 部队的监狱里观察他们的发病情况，杀害后又作了死后解剖。投弹的飞机是 731 部队平泽少佐、增田少佐操纵的。”[②]

在安达打靶场用活人实验，梶塚隆二供认，北野政次向他说：“在第 731 部队设于安达站附近的打靶场上，利用放置在一定距离的特种炸弹进行着把细菌传染到人及动物身上的实验，在进行这种实验之后，人及动物都传染上炭疽热。可见，这种传染人及动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66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81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物的实验，是经过炸弹来进行的。”北野政次所讲的是用炭疽菌进行的实验，感染炭疽菌的受实验者全部死亡，无一幸免。

1943 年以后，平房特区鞠家窑的村民经常看见日本的飞机在安达打靶场起落，投弹演习。村里经常戒严，至少是几个小时，甚至是 1 天的时间。村民关占和在 731 部队当劳工时看见日本人用马进行了 4 次实验，每次 10 匹马。投弹前，把马拴在等距离埋好的木桩子上。实验后，经日本人查验，把死马掩埋。日本人还解剖细菌实验致死的各种动物的尸体来检验细菌武器的效能。据战后 731 部队的原队员证实，在安达打靶场先后用 100 多匹马进行了细菌实验。

731 部队去安达参加实验的装备还有汽车，汽车参加实验回来，轮子的尘土上沾满了细菌，把尘土抹在培养基上又生出来细菌。染过细菌后，再将汽车全面消毒。

森村诚一在《食人魔窟》中写道，731 部队材料部有大量的被子、毛毯和铁制盾牌。这些物品用以人体实验。为了掩人耳目，让“马路大”都穿上 731 部队文职人员的衣服，戴上手铐脚镣，把他们用飞机运到安达靶场进行人体实验。在实验场内，让他们脱光身子，用硬棉被裹起来，用带子紧紧地捆上，外边用铁盾牌贴在前胸和后背，再从外边捆紧固定好，以 5 米左右不等的距离，把他们捆绑在木桩子上。然后，飞机从不同的角度和高度投掷炸弹，实验人员就爆炸地点和细菌污染范围的相互关系，观察实验结果，收集整理资料。在实验时，“马路大”若被炸死，这次实验就得不到相应的结果。因此，731 部队在实验时提供必要的保护。731 部队的实验是各种各样的。有时叫受实验者只露出臀部，进行瓦斯坏疽菌的强制感染实验。用瓦斯坏疽弹，对准受实验者的臀部，近距离引爆。弹片打进他们的臀部，造成感染。然后，把他们拉回 731 部队特设监狱，不进行任何治疗，观察记录他们从发病到死亡的全过程。这种细菌从伤口处侵入人体后，6 ~ 8 小时就会发病。病人发高烧，全身的肌肉开始坏死。一个星期后，所有的被实验的人都因肌肉溃烂而死亡。731 部队进行坏疽菌实验，使用过自来水笔型手枪、手榴弹、来福枪等武器，从不同的角度射击“马路大”的躯体，射中头部，再解剖开脑子，制成标本。或者用木棒乱打，以观察肌肉挫伤的情况，写成材料。

二、城子沟实验场

城子沟实验场距 731 部队西南 5 公里，面积 10 万平方米，四周围有土墙。这里是辽金古城址，俗称“金兀术马圈”。731 部队侵占平房后，把城子沟设为野外实验场。

1941 ~ 1945 年，平房特区正黄旗三屯的村民鞠复庆、侯安钦等人多次看见日本人进行细菌或毒气实验。土城中间有几十米高的木架子，上面插上红旗，为细菌实验的标志。土城四周设有日本岗哨，每次实验时，周围村屯全部戒严。村民们看见过日本人整汽车地往实验场运送过马、牛、羊、老鼠等动物。这些被用作实验的动物固定在木架子周围。日本的飞机在城子沟上空 200 米左右高度对准红旗投掷细菌陶瓷炸弹，而后，实验人员去现场检查实验结果。附近村民在野甸子上经常看见烧焦的草和动物尸体。

731 部队石井班的马夫黄国荣回忆说，他在石井班喂马，分白班和夜班。上夜班时，他好几次看见日本人来马厩挑马，连夜装上汽车往西运走。后来，劳工们都知道这些马拉到城子沟搞实验去了，马的尸体火化或掩埋了。有的劳工去现场看过，发现有烧焦的老鼠、猴子的尸体。

工务班的劳工韩行岩家住大乔家屯，距城子沟 1 公里多。他 13 岁那年夏天，去城子沟玩，看见从 731 部队来了一队日本兵，往空中打枪。紧接着，附近村屯都戒严了，实验场周围设了日本岗哨。韩行岩藏在土城北边的苞米地里偷看。他看见从 731 部队方向开来几辆汽车，车上装着马，还有铁笼子里的老鼠、江豚。最后一辆是铁篷汽车。车到城子沟北门口后，日本人搭上跳板，从汽车上牵下两匹大洋马，进土城去了。那些笼子里的小动物也搬进去了。从铁篷汽车上押下几个戴手铐、脚镣的中国人，他们都被蒙上眼睛，押到土城里去了。之后，日本人用席子遮住了北门。不一会，飞来一架飞机，对准插有红旗的木架子投炸弹。第二天，日本人都撤了，韩行岩好奇，又跑到了实验现场。他看见了 3 个熄灭的火堆和几只死老鼠，火堆旁的草地上有血迹。

731 部队二木班的马夫任广全回忆，1944 年的一天早晨，他上班时发现少了几匹马。上夜班的劳工告诉他说，昨晚 9 点多，几个日本人挑了几匹马，让劳工拴在木桩子上，用洋刀砍伤了马腿，用汽车拉走了。

731 部队劳工中队长朱有礼和宪兵室的翻译春日很熟。春日曾对他说，城子沟是细

菌和毒瓦斯实验场。日本人在土城里用动物搞实验。毒气弹毒死的动物就地解剖，取样带回 731 部队搞研究，剩下的动物尸体就地掩埋。

正黄旗三屯的劳工鞠复庆说，我们屯西南 2 公里的城子沟，方圆 9 垧地，四周是土墙。有 4 个门。老人们说，那是金兀术马圈（辽金古城址）。731 部队在那里围了个土城，中间竖起个 20 多米高的木架子，上面插着红旗。日本人以木架子为目标，进行军事演习。1942 年，他在 731 部队酒保班做杂活，每天两班倒，烧酒、做糕点、面包。一天，他上夜班，后半夜，他们就干完了活。那里没有宿舍，又不让回家。他去石井班马厩找熟人唠嗑。他刚到石井班，就看见几个日本人往外牵马，把马装上了汽车。那汽车从营区向西往城子沟开去了。早晨，他下班后，没回家，偷偷地去了城子沟。他藏在距城子沟 1 公里远的庄稼地里，看见日本人布了岗哨，一架飞机围着大木架子盘旋，往下投了几颗炸弹，那炸弹冒出一股白烟。又过了一会，从城子沟开出来几辆汽车，其中还有一辆囚车，返回了 731 部队。日本人走后，从屯里又来了几个青年，鞠复庆他们一起去城子沟里看热闹。他们发现，地面上有烧焦的马骨头，还有几块陶瓷炸弹碎片，弹皮外边是绛紫色，里面是乳白色，好像还有几道黄格子。城子沟平时没有日本人站岗，所以，经常有人去城子沟。

三、陶赖昭实验场

陶赖昭实验场在陶赖昭车站附近，松花江畔的一个天然沙场。这里是 731 部队野外实验场之一。

1941 年 3 月，和野参加 731 部队，当卫生兵。后来调到 543 支队。他多次参加了野外实验。他回忆说："那是夏季的一天下午，负责细菌实战的第二部突然接到石井部队长下达的'野外训练'命令，因为第二天就行动，所以有关的几个部门分别地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首先组织了 30 名以第二部人员为主并由第一部、第三部、第四部人员参加的野外训练队，然后由有关人员分头作准备。细菌研究班备好鼠疫菌炸弹，卫生防疫班准备足够的卫生消毒材料和卫生滤水器。实战研究班负责选好被实验对象和警备武器以及运输车辆。第二天早晨，总指挥碇常重中佐看各班的准备工作就绪后，便命令和野等 10 名领到三八式步枪的卫生兵，到特设监狱里提出事先选定的 10 名戴手铐脚镣

的人，押上带篷的汽车。其他日本队员也登上敞篷汽车，队伍就出发了。下边的队员谁也不知道目的地。汽车往西北方向开通过满洲国军用飞机场后，转而向西南行驶了两个多小时，来到一处多积水的沙砾开阔地，实验场有本部队的人等候。10 名‘马路大’被分别绑在事先埋好的木桩子上，日本队员都撤退到很远的地方，除和野等负责警备的人员在四周执行任务外，其余的人都隐蔽好，紧紧盯住实验场中心。731 部队的专用飞机在实验场上空盘旋一阵后，便投下细菌炸弹。穿着防护服的队员冲进实验场，把带伤的被实验者都押上囚车，部分队员留在现场进行消毒。训练结束后，队伍返回平房。路况不好，100 多公里，走了 8 个来小时。在回来的途中，天已大黑，坐在敞篷汽车上的和野等人听见前面囚车里放了几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回到本部后才得知，有个农民窥看囚车，被当场击毙了。”

当时，和野不知道这次野外实验究竟在什么地方。根据他的回忆，当时，执行实验任务的队伍行驶的路线、地理环境及行走时间，有关学者推定，这次实验是在陶赖昭实验场。

上田弥太郎供认：“1941 年 9 月，我在松花江省陶赖昭车站西北 2 公里的地区，参加细菌武器效力的实验，两次共 7 天时间。我担任气象观测工作，到现场看投扔的炸弹，并将弹皮拾起作化验。当时我是一个雇员，负责消毒工作，在去演习的头一天，我奉小林助手的指示，准备了 200 多个培养皿，同日下午又三班副江田传达命令，并宣布了前往陶赖昭地区演习人员的名单，共 50 名，包括我们三班的 19 人。于第二天的上午，乘汽车到哈尔滨车站，转乘专用火车到陶赖昭。当晚休息于日本人开的旅馆内，第二日休息，第三日向西北方向出动。约有 1 公里半，到达后，即搭盖临时帐篷。事后由小林或大西技术助手进行了业务分工，共分三个组。第一组负责收拾弹片，第二组担任培养菌的效能实验工作，第三组担任准备工作。另外，我和利本雇员担任气象工作（观测风速、气温等情况）。准备后，就由东北方向飞来一架飞机，旋转一周后投弹 1 个（约有 100 公斤重），即飞去了。约 30 分钟后，即叫我到投弹处，因为时间的限制，让我帮助做培养工作（将弹片放入试管内，再加入食盐水 50c.c. 搅拌后涂上‘寒天’，即放在培养器内）。以后又来了一架飞机，将已准备好的培养器等运回平房。至于效果，因当时

不做研究工作，详情不知道，我听说把培养器全部拿到四部一班的孵卵室去培养了。”[1]731部队这次实验连续进行了两次。第一次从731部队押来30名“马路大”，把他们分散绑在木桩子上，发出实验的信号后，一架飞机在实验场上空，大约500米的高度，投放了一颗陶瓷炭疽菌炸弹，进行活人实验。第二天，又进行了炭疽菌投弹实验。细菌实验后，一批队员负责把“马路大”押回731部队。上田弥太郎等一批队员留在现场，收集陶瓷细菌弹片，检验细菌实验效果。经验证，在高温条件下，炭疽干细菌有很强的耐热力，染菌的弹片上，细菌还有不少存活着，上田等人把带炭疽菌的陶瓷弹片捡回去，装进玻璃器具里，经简单处理后，用飞机运回731部队，又培养出新的菌株。而30名受实验者经过观察“治疗”，陆续死亡。

四、松花江中小岛上的实验

1944年11月，榊原秀夫去林口支队任职，他与前任荒懒少佐办理交接手续时，看到了731部队第二部野崎少佐关于迫击炮弹破片飞散情况的调查，也就是细菌弹基础实验的文件。榊原秀夫说，这份调查报告记载了1942年，“在松花江的小岛上（哈尔滨附近）发射迫击炮弹，从落下的地点测量散布距离，证明从中心点直径8 ~ 10公尺的范围有杀伤能力。迫击炮弹是陶瓷制的，其中装有细菌，是耐热性的炭疽菌。”[2]这次实验是731部队野崎少佐指挥的，他们从731部队提出10多名“马路大”绑在木桩子上，用飞机投放陶瓷炭疽炸弹而进行的一次临时野外实验。实验后，野崎写出了这篇调查报告，赠送给他的同学荒懒。

山内丰纪到大连卫生研究所任技师后，一次，他在食堂吃午饭时，听二木技师讲述了日军投放炭疽弹进行人体实验的事例，将瓦斯坏疽菌液装入石井式炮弹内，把“马路大”捆绑固定在木桩子上，向他们进行炮击，然后检查负伤的人是否发生了炭疽病。

五、庄稼地里的实验

1945年7月的一天晚上，731部队发出空袭警报。营区一片漆黑。日本人命令上夜

---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81 ~ 82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83页，中华书局，1989年。

班的劳工钻进了防空洞。731部队附近的瓦盆窑屯、新五屯的村民看见南边庄稼地里灯火一片。他们猜测日本人在搞军事演习。

工务班的白武斌回忆，那天下午4点多钟，他去731部队上夜班，走到瓦盆窑南边农田西道边时，被日本哨兵截住了。他看见地里的还没成熟的苞米、黄豆、谷子被砍倒好几片，一个做农活的也没有，停着10来辆大汽车，日本人从车上往下卸大铝箱。隔不远就摆一个，铝箱都敞开盖，箱子里都安装上电灯泡。庄稼地里还铺设了几条电缆线。日本哨兵说是搞军事演习，实行戒严，不让白武斌过去。白武斌拿出"劳工证明书"，说是上夜班，才让他过去。

天刚黑，731部队发出了空袭警报。营区的灯都关了，劳工们都进了防空洞。日本的飞机全都起飞了。白武斌猜想，日本人这次行动可能和白天看见的情况有关。第二天，向瓦盆窑的熟人打听，他们所见到的也一样，日本人戒严、砍庄稼、拉电线。到了夜晚，飞来两架飞机，在天上盘旋，瞄准庄稼地里的灯火，连续投掷炸弹。他们还听见了"扑哧扑哧"炸弹的爆炸声，声音不太大。这次演习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后来，劳工听日本人说，这是一次实验活动。附近村民担心日本人在地里撒了传染病细菌，很长时间没敢下地。没过多久，日本人就倒台了。

战后40多年，一位原731部队队员来平房访问，当问及这次军事演习时，他说，那是一次跳蚤指数调查实验。为了测试鼠疫跳蚤弹的效能，731部队事先进行模拟实验，投掷陶瓷炸弹，观察跳蚤的成活率及分布情况。

进行跳蚤指数的实验，目的是解决鼠疫传染途径问题。731部队根据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的数量来测定鼠疫的流行可能性。为此731部队经常派人到鼠疫源地或正在发生鼠疫的现场去调查跳蚤的指数。他们计算跳蚤指数的方式是跳蚤指数等于老鼠繁殖跳蚤的总数量除以老鼠总数量。

六、细菌的"雨下实验"

731部队原少年队员镰田回忆，他在降旗班作鼠疫、疫苗的研究助手。他以实习的角度多次参加过进行细菌传染的野外实验。实验对象都是身体健壮的"马路大"。他所在的研究班多是在野外搞"雨下实验"。所谓"雨下实验"就是把霍乱菌液或伤寒菌液

或鼠疫菌液装进喷撒器里，到空中往下喷撒。经过验证，用这种方法喷撒霍乱、伤寒菌效果好，但不适于鼠疫菌。实地投撒细菌的事，镰田听说，731部队在诺门罕战争中使用过，731部队参战的有几十人因被细菌感染而死亡。

田村良雄供认，1940年7月，731部队编制了大量的细菌生产队，在川岛清指挥下，大量制造各类细菌。“7月初旬，奉总指挥川岛清大佐命令进行细菌撒下实验时，我在宫崎中尉指挥下，与其他12人一起，分成2人一组，带着50个培养器到田地里，当航空班的飞机撒下‘大肠菌’时，取掉培养器的盖，撒完后盖上带回来，由研究人员进行撒布条件的研究。”[①] 这次实验是在距731部队3公里的一片黄豆地里进行的。田村良雄他们把培养器分散摆在黄豆地里，揭开盖，撤离演习现场。实验开始后，飞机下雨般喷撒伤寒菌液，菌株撒落在培养器里。实验后，田村良雄等人取回培养器，交给柄泽班进行细菌培殖，结果又培殖出伤寒菌来，而且分布均匀。

731部队多次进行过细菌的“雨下实验”。上田弥太郎曾做过跳蚤分别从500米、1 000米、1 500米、2 000米高空抛撒下来结果的比较表。结果越是在高空，抛撒效果越差，在2 000米高空投撒的跳蚤全部死掉了。

飞机投撒鼠疫跳蚤，效果不理想，高空投撒细菌容易死掉，低空投撒，飞机又容易被对方击落。731部队曾设想用无人驾驶的气球代替飞机。在气球上设装置，附带陶瓷细菌炸弹，在预定的经纬度发火，使炸弹落在指定的地点爆炸。这种武器也称“经纬度炸弹”。这种新式武器由石井四郎主持，由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所主任内藤中佐与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的技师们于1943年进行研究。1943年，《每日新闻》发表了一则新闻，说在美国洛衫矶的山里落下一个载体气球，使山中失火。美国分析，这是日本人干的。事实确实如此。它是在有气象观测站的筑波山上发放的，成功落在了预想的地方。但炸弹里没有装细菌。[②]

原731部队军属人员冲岛所在的细菌检索班，任务是为细菌实战做准备，配合在野

---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8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② 韩晓、辛培林：《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第14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外进行设想性的实验。他回忆说，为了探讨细菌撒布的有效范围和程度，我们经常把鸡蛋作为代用的实验材料，在 731 部队本部专用的飞机场进行实验。事先把一批鸡蛋用大卡车运到飞机库，打破数百个鸡蛋，在容器罐里，用棒搅拌，然后把盛有蛋液的容器罐装在飞机上；另一伙人把检知板间隔一定距离摆到飞机场空地上。气象班人员测定风向、风速以后，飞机选定适当的角度和高度，随机人员开动投撒器，那蛋液变成雾状落下，不同程度地粘结在检知板上。如果撒布的不理想，就得改进方法再进行实验。一旦取得良好效果，就把菌液掺入蛋液里，即可在实战中使用了。为了检测实验用的液体在无风状态下落地的速度，我们在哈尔滨南郊一隅的忠灵塔内做过一次实验。为准备在江河中投撒细菌，我们还在松花江的僻静河段进行流速和投撒液体散布状态的实验，即把掺有色素的液体投入松花江，观测其流速和散布状态，以取得经验，在实战中应用。

七、防疫给水演习

石井四郎发明了滤水器。“帝国医疗株式会社”从陆军那里接受订货，大量生产石井式滤水器。为了推行这种滤水器，石井四郎曾在参谋本部进行宣传，让参谋集合起来，他用滤水器将参谋本部前的池水加以过滤，自己当场喝下，证明没有细菌。“据说石井四郎曾把自己的小便用滤水器过滤透明的清水，带到陆军参谋总部，让大家看着他喝光。”[①] 他用这种方法证明滤水器性能非常出色。



进行水源调查



进行水源调查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 197 页，群众出版社，198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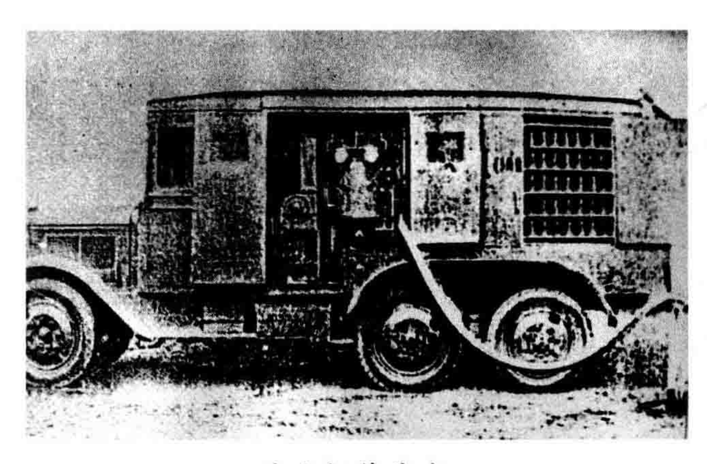
731部队成立后，早在加茂部队期间，石井部队就开始进行防疫给水演习。榊原秀夫说，1940年11月，我在陆军军医学校学习时，石井四郎给学员讲了两小时的课，当时石井是731部队部队长，就像当年防疫学校教官那样，以内行的身份这样做的。他结合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反映防疫给水班的活动的影片，讲解如何在军中实施防疫给水问题。



进行水源调查



取水样准备进行水质分析



滤水机装载车



石井式滤水器的实际操作演习

石井四郎在731部队多次进行防疫给水演习。在诺门罕战争后，日本制造了各式各样的大小滤水器。大的是装载在汽车上的水槽，小的可以随身携带。日本军队在各个战场上都携带这种滤水器。

731部队各支队也多次进行了防疫给水演习。

第七章　其他实验

第一节　冻伤实验



冻伤研究班班长吉村寿人

1938 年，石井四郎针对在高寒地区作战的实际需要，设置了冻伤研究课题。在严寒的冬季，在活人身上进行冻伤实验。在四方楼北侧，有一座二层楼高的筒子屋，和它连栋的还有一座平房，这里是吉村班。1940 年，石井部队建起一座冻伤实验室，成立了冻伤研究班。冷冻室内密封性良好，室内设有隔温层，设备有冷冻机和低温空调。制冷后，室内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冻伤实验。冻伤研究班班长吉村寿人，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系，是专门研究冻伤的病理学博士。

冻伤实验室的一个平房里，浇筑了一个长 3 米、宽 2.5 米、深 0.5 米的小水池，临时灌水，专门用于搞冻伤实验。日本人经常让受实验者站在水池子里做实验，让人的上肢或下肢浸泡在水里，水温逐步降低，直至结冰，再把冰凿开，把人押回牢房，观察冻伤情况。731 部队的监狱和冻伤实验室有地下通道连接，受实验者被秘密押解到冻伤实验室进行残酷的实验，外人无法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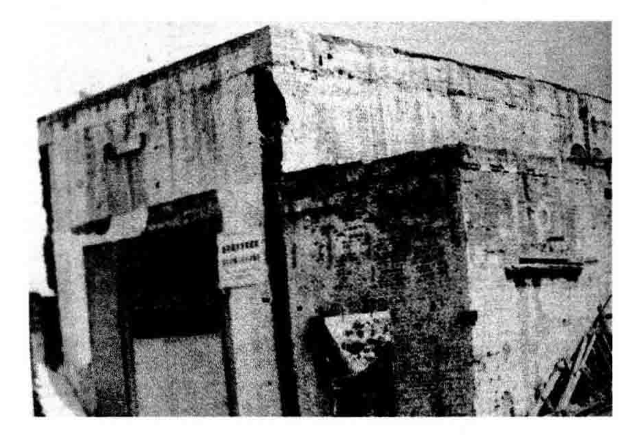
吉村班采用各种方式进行冻伤实验，在严寒季节，让“马路大”穿着单衣冷冻，做“抗

寒”实验。731部队菌苗班雇员山内丰纪说：“（1940年冬天），从我们研究室的小窗，可以看到在寒冷的冬天被实验的人。吉村博士让6名中国人背着一定重量，在一定的时间内，往复一定之距离，不管怎么冷，只让穿夏服。眼看这些人，日渐消瘦，渐渐患了冻伤，逐一地减少，到12月上旬全部不见了，想必已死亡。”[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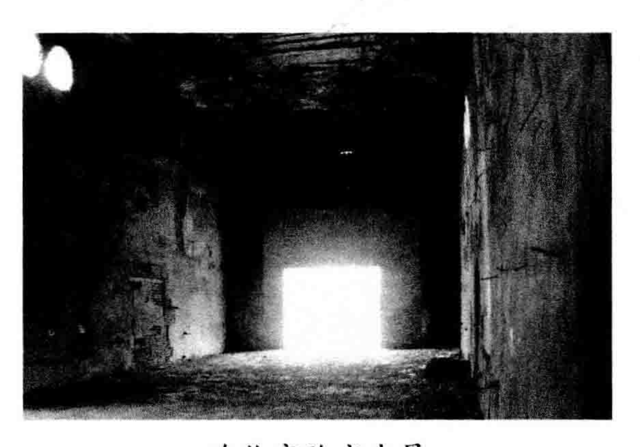


冻伤实验室遗址



冷冻实验室遗址

上田弥太郎说，1943年4月上旬，他看见3名冻伤班的班员在做冻伤实验。他们强迫1个中国爱国者把手浸泡在冰水里冷冻，而后拿出来再用小电扇吹，致使受实验的人痛苦不堪。



冻伤实验室内景

在日本治疗冻伤一向是实行低温摩擦法。石井部队在“马路大”身上进行了冻伤的治疗法研究。据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中尉军医吉泽行雄供述，1943年3月中旬，在山西崞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78页，中华书局，1989年。

县城内旅团司令部讲堂，准尉以上的人参加的讲演会上，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司令部军医部长石井四郎讲了冻伤治疗法。石井四郎说，“根据在伪满洲国的部队用中国俘虏进行研究的结果，人的体温降到摄氏 32 度时即会死亡，但及早放到摄氏 37 度的温水中还能挽救，手指冻伤的时候，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治好，而过去的摩擦的方法是不好的。”①

1944 年 8 月，秦正氏翻译介绍了苏联的冻伤治疗法，即用摄氏 22 度的温水进行治疗。为了验证苏联的冻伤疗法，在 1944 年冬季，吉村班对分娩不久的苏联妇女进行了冻伤实验。秦正氏供认：“首先让（这位苏联妇女）将手指浸入水槽中，然后让她拿出来在寒冷的天气里冻着，使之由激痛发展到组织被冻结，这是进行的冻伤病态生理学的实验，进而用各种温度的水对此实施‘治疗’，改日重新反复的实施，终于使其手指被冻伤而坏死脱掉。另一名苏联青年，也被做了同样的实验。”②

古都证实：“（731）部队内用活人实验冻伤一事，是每年在最冷的那些月份，即在 11 月、12 月、1 月及 2 月间进行的。进行这种实验的手续如下：在晚上 11 点钟时，把受实验的人赶到寒冷的露天里，迫使他们把手放到冷水桶里。然后又叫他们把手拖出来，在寒冷的露天里带着浸湿的手长久站立。或者是采用如下的办法：把穿着衣服而光着脚的人赶到外边去，迫使他们在夜间最冷时在露天里站立。在受实验的人已被冻伤之后，就把他们赶进房屋里去，先叫他们把脚伸到大约零上 5 度的水里，然后再把水的温度逐渐提高。治疗冻伤的办法就是这样来探求的。把这种人赶到房屋里去以后进行实验的情形，我没有亲眼看见过，我只是在担任值日官时看见过把人赶到寒冷露天里去使他们受冻的情形，而关于在房屋内叫人把手放到水里进行实验的事实，我是从亲眼见过这点的人那里得知的。”③

731 部队训练部部长西俊英供认：“我从科学工作员吉村口中听说，在严寒天气下，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86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85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③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385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即在冷到零下 20 度时，常把部队监狱里拘禁的人赶到外面去，然后就把他们的手脱光，用人造冷风使手冻伤。随后就用小棍敲打冻伤了的手，直到被敲打的手发出与木板声音相似时为止。除此而外，我还阅览过吉村关于实验情形的报告。关于这点也摄制有电影片。影片上首先表明把四五个戴脚镣的人赶到露天去，他们身穿棉衣，两手光着。随后就用一架巨大的扇风器用人工方法加速冰冻过程。然后用小棍敲打冻僵的手，以便检查他们是否已经完全冰冻，接着就表明如何把手已冰冻的人送进屋里去。吉村对我说，此种研究是为了将来对苏战争而进行的。”[①]

吉村班做冻伤实验，不分场合，不分季节，随时都可以进行。既在室外，也在室内；既在监狱院内秘密进行，也在城乡偏僻无人的地方随意进行。

吉村班有个玻璃小屋，这就是冷冻实验室。“马路大”经常只穿着裤衩被推进冷冻室搞实验，他们被冻得浑身青紫。受冷冻实验者轻则造成冻伤，手指和脚趾烂掉，重则丧失性命。曾当过宪兵的仓原在监狱里见过被冻伤的“木头”，他供认：“……在每一层楼上都有几个供实验用的房间，中部有几个小牢房，那里禁闭有受实验的人，或如曹长田坂告诉我说，这就是该部队内所叫作的‘木头’……我记得很清楚，这个监狱里除了中国人外，还拘禁有俄国人。在一间小牢房里，我看见有一些中国妇人……关在牢房里的人都戴有脚镣……3 个中国人没有手指了，其余的人只剩下手指骨头。吉村向我解释说，这是对他们做过冻伤实验的结果……”[②]

日本人的冻伤“实验品”，有不少平民百姓。1943 年冬天，他们在安达正亚街抓了不少沿街讨饭的人。晚上被押到东门外无人地方，将上衣脱光冻着，用凉水往他们身上泼。后在正亚街南城沟发现 4 具尸体，被冰包裹着。在北门外也发现了 2 具同样的尸体。

《跨国取证 731》一书中写道，“冻伤实验是 731 部队重要的实验种类，在严寒的冬季，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302 ~ 303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19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731部队吉村班人员强迫‘犯人’裸露身体或仅穿单衣到室外接受冷冻，如果是夏季，他们就把人赶入冷冻室。冷冻达到一定程度后，他们便拿着小木棒打‘犯人’的肢体，当发出很硬很脆的声音后，他们便把人抬入另外的实验室以不同的方式给予解冻。有的用冷水浇，有的用温水泡，有的用滚开的热水烫，以求得最佳解冻方法。被实验者在极大的痛苦中，有的当场死掉，有的烂掉皮肉露出白骨。为了病理实验的需要，他们有时给被实验者的冻伤处涂上各种药膏，以观察病变过程。经过无数次这种毫无人性的实验，731部队得出的结论是用摄氏37度的温水浸泡是治疗冻伤的最佳方法。”①

第二节　毒气实验

一、大久野岛毒气工厂

日本大久野岛毒气工厂遗址上建有一个毒气资料馆。1993年，毒气资料馆馆长是村上初一。毒气资料馆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大型瓷罐，这就是毒气制造罐。展厅里有制造毒气的各种设备、用具等实物，还有不少文字资料和历史照片。生产芥子气的工厂遗址的一个半山坡上，还堆放着一些残缺不全的瓷器和大量的瓷器碎片。岛上还有弹药库、毒气制品库、水利发电站的遗址。

大久野岛是濑户内海域中500个岛屿的大岛之一，历史上为军事要塞。它是一个毒气岛。1917年，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内设置化学武器研究室。1918年成立毒气临时调查委员会。经过一年的考察，设立陆军技术本部，并设陆军科学研究所。自此，日本化学武器的研究正式开始。1923年，日本的一次大地震，使位于东京户山的“科研”及兵器工厂遭到破坏，处于分散设置的考虑，日本当局决定将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武器制造工厂移到广岛以西的地方。1927年东京兵器工厂所属的忠海武器制造所成立。这时，日本开始在大久野岛建设毒气制造工厂，两年后正式生产毒气。

① 金成民等：《跨国取证七三一》，第9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大久野岛的毒气工厂西南部是较低的开阔地，中部、东北部的山丘成了濑户海外的天然屏障。在开发建设毒气工厂之前，日本当局就把岛上的居民撵走。从日本国内各地招募生产技术人员建立军事要地。生产毒气的技术人员从几十人逐步发展到6 000多人。这个毒气工厂把生产的各种毒气成品，装填成毒气炮弹以及发烟筒，通过陆军广岛兵器补给厂忠海分厂运往中国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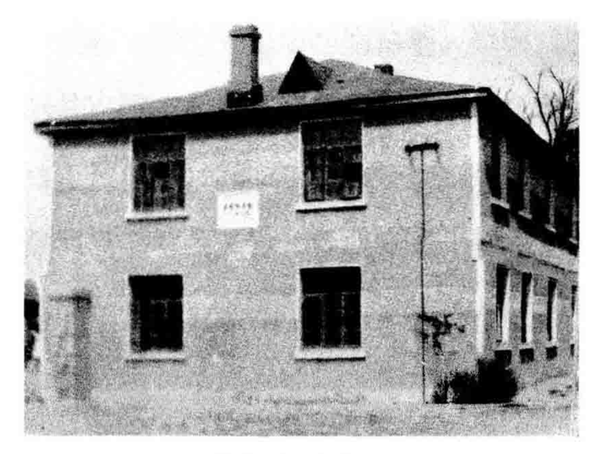
1939年8月，日军将50罐装的1 000公斤氰酸毒液运到大连港，准备转运到驻扎在齐齐哈尔的侵华日军胜村部队。胜村部队是日本关东军技术部化学班。1939年9月改称关东军化学部。1941年称满洲第516部队。1939年，在诺门罕战争中，胜村部队使用了生物化学武器。

大久野岛生产的毒气及化学武器不断发往侵华日军的各个师团。在美国国立档案馆保存的东京审判材料中发现，侵华日军于1937年7月至1942年11月，在中国较大规模地使用化学武器。至少有56次。根据小柳津政夫的调查，1941 ~ 1942年间，忠海兵器制造所生产的发烟筒、毒气制品大量发送到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供侵略日军使用。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期间，大久野岛毒气制造厂昼夜不停地生产毒气制品。在制造毒气过程中，有不少生产人员中毒。据村上初一证实，大约有2 200人中毒，其中死亡229人，大部分患者留下后遗症。战后，迁移到大久野岛的居民仍有4 000人有不同程度的中毒反应。

二、731部队的防毒和放毒实验

731部队第二部设毒气研究班，以活人为材料进行毒气实验。实验人员把“马路大”推进密封的玻璃柜内，分别进行一度、二度、三度的毒气实验，直至把他们毒死为止。该部队平时对监押的实验材料进行防毒和施放毒气的实验，一旦遇到受实验者的反抗，日本人就使用毒气将牢房的人全部毒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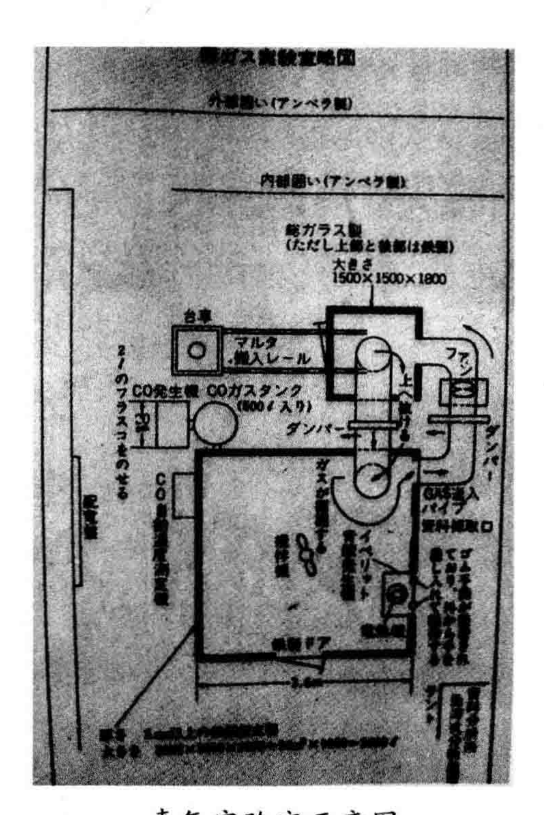


毒气实验室遗址



731部队毒气贮藏室

石井部队来东北不久，便与奉天宪兵队联合进行了多次毒气实验。奉天宪兵队庶务主任平中清一供认，1934年10月，奉天宪兵司令官派人在四平进行细菌演习，杀害中国人1 000余名。“1935年9月10日，在毒瓦斯演习时，用伪新京、吉林监狱内收容的中国人约200多名做了实验。”①



毒气实验室示意图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62页，中华书局，1989年。

1934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25 日，奉天附属地宪兵分队警务系的宪兵渡边长太夫被派到伪满四平省四平街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四平支部担任警戒。这个防疫给水部就是哈尔滨平房石井细菌部队的前身。他供认：“在我被派遣宪兵期间，以活人进行电气和瓦斯等化学实验而被杀害的中国和平居民约 60 人。我的具体罪名是：先后两次在四平站受领由日本侵略军守备队某军曹用火车运来的 60 名无辜的中国和平居民，我将这些人用汽车运到防疫给水部四平支部的拘留所，加以监禁，由我每天进行警戒，以防止脱逃。同时根据实验的需要每天交出两名至三名中国和平居民作为电气、瓦斯实验的牺牲品。更为严重的是，我先后数次协助实验员，以电气实验惨杀了 4 名中国和平居民。尸体在所内的火葬场焚烧了。”[①]

1939 年春天，日本千叶县的芦田才尔和同期少年队员来到石井部队，被分配到第二部的毒气研究班工作。他和石井四郎是亲戚，经常得到石井四郎的关照。一次石井四郎把芦田叫到办公室关心地问他说：“我没有时间过问，不知芦田先生最近的工作是否顺心？”芦田回答说：“我在毒气班负责对防毒面具的研究工作，一切都很好，请部长放心。”芦田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石井四郎对芦田的工作表示极大的关心，给他增加了工资，还增加了危险工作和保密工作岗位津贴。芦田的工作更卖力了。不久，他们制作成一种防毒面具样品，需要进行防毒效能的实验。一天上午，毒气班的工作人员集合起来，在四方楼东南，铁路专用线东边的一片空地的用土墙围着的简易实验场进行防毒面具效能实验。他们把几个“马路大”押到实验场内，这些“马路大”和动物分别安置在实验场中心不同的位置。他们有的给戴新研制的防毒面具，有的不给戴。然后施放毒气，实验结果表明，防毒面具是有效的。这样的实验是经常进行的。

上田弥太郎供认，731 部队在警备和瓦斯演习中，大量地屠杀“马路大”，他记得两次演习就杀害了 200 来人，其中是否有苏联和蒙古人他不知道。上田弥太郎说，1942 年 2 月，由于“马路大”的反抗，打乱了伊藤技师的细菌注射实验计划。他气急败坏，施放毒气将 7 号牢房的人全部毒死。他毫无人性地说：“正好要搞一次毒气实验，那就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63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让他们好好享受享受吧！”[①] 同年4月，上田弥太郎参加干燥细菌生产时，一天，他去第一班取细菌，路过特设监狱时，“闻到浓厚的瓦斯气，使他睁不开眼。回来后，他问及此事，小林技手说，这是进行警备演习。”[②]

上田弥太郎还供述了731部队在特别监狱里大规模施放毒气杀害“马路大”的事实。他说：“（那是在1945年），当时，7号牢房二楼的一个房间发生了暴动，发起者是一位苏联人。这些被关押者采取的办法是，有人向特别班谎报说那个苏联人得了病，把看守的日本人骗进牢房时举事。果然，在日本警备人员进入牢房内查看时，那个苏联人突然地跳起，抡起铁铐将其砸昏，随即夺了手枪和开牢门的钥匙。然后各室也冲出牢房，但因整个监狱的大门锁着，造反的人在走廊里东冲西闯，跑不出来。于是，石井四郎当即命令使用毒瓦斯，把7号房的人全部毒死。为此，731部队还曾受到关东军司令部的责备。”[③]

1945年，731部队败退时，用毒气把特别监狱的“马路大”全部杀害。731部队原少年队员小笠原说，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他们首先进攻的目标是日本关东军。当晚，苏军的轰炸机出现在哈尔滨上空，并连续投照明弹。日军看到战败的形势迫在眉睫，731部队慌乱了手脚。从10日那天开始，按照石井部队长的命令，首先将最后在押的“马路大”用毒气毒死，其尸体投入临时挖好的大坑内焚烧，陈列的各种人体标本都扔进松花江。

2000年7月，哈尔滨电视台出资与731馆共同进行跨国取证时，采访了第731部队本部的司机铃木进，他说，1945年8月10日左右，731部队把被实验的人员全部用毒气杀害。当时，来了一群工兵，那群士兵用毒气把“犯人”全部处死了，第七栋和第八栋的“犯人”大约有80人左右。他们把尸体摆在第七栋和第八栋楼中间的空地上，烧得一干二净。烧后的残骸，就堆在我的车上，运到松花江扔掉了，因为是烧过的，所

① 中央档案馆档案：上田弥太郎供词。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85～86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③ 中央档案馆档案：上田弥太郎的供词。

以没剩下多少东西。扔残骸的地点在松花江大桥下面。当时还掩埋了一部分“马路大”。

2001年10～11月，731遗址保护开发领导小组与哈尔滨报业集团联合进行了第二次跨国取证。同年11月5日，铃木进再次作证，他的说法和第一次作证时有所不同，80多名“马路大”被毒死之后，被抬到室外，花3天时间烧掉。我们进去（运尸体）的时候，这些尸体已用草袋子装上，然后我开着车运到松花江一个铁桥下游被扔下。铃木进只负责开车，车上有四五个士兵把这些装尸骨的草袋全部扔掉。铃木进只拉了一次，而当时所去的车不只是一辆汽车。另外，他说：“那时道路很不好走，大概用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为了防止尸体在途中掉下去，车厢上都装了铁栏杆，并紧紧地系牢。”[①]而他第一次证实：“因为（尸体）是烧过的，所以没剩下多少东西。”80人左右，全部装上了汽车，“虽说是全部，但因为烧过后也没有多少东西了。一个人就这么多而已。”[②]。两次所说的汽车上装载的尸体残骸有较大出入，第二次证实车上装的尸体残骸比第一次要多。铃木进还证实：“当时在烧人（尸体）时，建筑物还没被炸毁，人被烧毁后，建筑物由工兵炸掉，没被拉走的也被埋上了。”[③]

731部队林口支队的卫生下士兵沟渊也证实了1945年8月10日左右，特别监狱里的“马路大”全部用毒气害死的情况，他说：“由于尸体太多，特别班的队员累得筋疲力尽了，于是只好把少年班队员调来继续执行灭迹任务。”他还说，由于焚尸的队员逃跑心切，尸体烧得不彻底，按照部队长的命令，用汽车把一部分尸体运到松花江沿，趁夜扔进江里；一部分运到部队附近的洼地里埋掉。为掩人耳目，竟在人尸上边摆放几具马骨。这方面的证言还很多，将放在后文叙述。这里用几个材料对比，至少可以证明，铃木进所说的80多人被毒气杀害，可能是他个人所见的尸体，因为他在第二次证实时说，他们进去拉尸体时，“这些尸体已用草袋装上。”

铃木进还亲眼看见过被毒气毒死的苏联女孩。他说：“入狱时，小孩非常小，非常

① 金成民等：《跨国取证七三一》，第8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② 金成民等：《跨国取证七三一》，第2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③ 金成民等：《跨国取证七三一》，第8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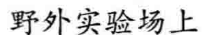
可爱，后来被毒死了。这在我脑海中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每天睡觉的时候像幽灵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日本人经常在城子沟实验场进行毒气实验。正黄旗三屯的劳工李增邱看见过日本人搞的毒气实验。他家靠马路住。一天，他休病假，听见了汽车的声音。他看见有两辆汽车朝城子沟方向开去。过了半天，日本的汽车才返回731部队。随后，他和村里的几个人去城子沟看，闻到了毒气的味道。

在731部队高等食堂当伙夫的付景歧充当过一次毒气实验对象。他回忆说，1945年春，他从训练教育部食堂被调到高等官食堂，给日本军官做饭。这一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教育部的大院里停了四、五辆汽车。一队日本兵排队集合，他们头上都戴着柳条圈。教育部的教官田中少佐说，部队要进行一次军事演习，食堂的10名伙夫要带着炊具随部队行动。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上了汽车，10名炊事员也带着炊具、粮食、蔬菜上了第二辆汽车。所有汽车都用绳子编织的网罩上，上面还插了些带叶子的树枝。半夜时分，汽车出了营区一直往西开。连续走了两个多小时，天刚蒙蒙亮，来到了一个城镇。付景歧知道这是双城堡。汽车没有停，转了一圈，又往东行走了1个多小时。汽车停下来。付景歧发现汽车回到了城子沟。他们心里都明白，谁也没敢说话。下车后，田中少佐命令几个日本兵在城子沟周围站岗。一个日本兵发给10名伙夫每人一条白毛巾。让各自尿上尿，捂在嘴上。外面套上防毒面具，然后命令我们趴在土城东边的土墙上。其余的日本人都调到北门口去了。伙夫们都看见了土城中间的20多米高的木架子，顶端插着一面红旗。木架子被苇席围起来，里面的东西看不见。不一会，又来了几辆汽车，其中有一辆囚车，停在了北门口。日本人从汽车上卸下几匹马，还有小动物笼子。他们还从囚车里押出几个犯人。一直带入木架子那里的苇席子里面。“各就各位”，田中少佐发出命令。这时，来了一架飞机，在低空盘旋。连续往苇席子里面投掷炸弹。爆炸声不大，却从土城里冒出一股浓烟。烟柱把芦苇席子遮住了。烟雾散了后，几个戴防毒面具的731部队队员跑到苇席子里面，抬出些“东西”，装上特别囚车，开回731部队。日本人根本没让伙夫在野外做饭。回到731部队后，也没让他们上班。派来日本军医给10名伙夫检查身体。并问他们闻到什么味道没有？大家回答说，除了尿臊味，什么也没闻到。到了第三天，

日本人又让这 10 名伙夫做饭了。但警告说，不准把看见的情况告诉别人。





野外实验场上



在野外毒气试验之前

731 部队送进毒气场搞实验的“马路大”，有不少是搞冻伤实验和血清实验后幸存的人。这些人肢体残缺，生命垂危，再用毒气进行实验，直至摧残致死，解剖尸体。

731 部队的毒气实验室是个镶有玻璃的小屋，受实验者从特别监狱提出来，绑在台车上。这种台车上面有一根柱子，用来捆绑受实验者。台车可以在通毒气实验室的轨道上移动，受实验者沿着轨道直接被送进实验室。受实验者有时穿衣服，戴防毒面具，做防毒实验，有时只穿裤衩进去，进行毒气实验，不足 4 平方米的小实验室里，经常把老鼠、鸡、狗、猴、人等一起放进去，施放毒气，进行实验。该部队的毒气实验场主要在城子沟，另外，在距 731 部队西北 4 公里远的洼地，731 部队飞机场北边 500 米左右的空场上都设置过临时毒气实验场。731 部队在附近地区修筑了一个半卧式掩体，外人称之为航空班特别靶场，在这里，731 部队也进行过毒气实验。

第三节　“烤人”与穿透实验

731 部队在安达打靶场，以“马路大”为实验材料，不仅进行细菌实验，也进行一般武器的杀伤力的实验。

1943年夏季的一天，这天很炎热。在安达实验场排列着10多辆报废的坦克和装甲车。731部队从特别监狱押来10多名“马路大”，731部队队员强制那些被迫穿着草绿色的军队文职人员服装的“马路大”登上了旧坦克和装甲车，周围有配备着轻机枪和步枪的特别班班员包围着他们，想反抗和逃跑是办不到的。每辆坦克里塞进两个人，装甲车里进1个人，然后盖上盖，让“马路大”憋闷在里面。当所有的“马路大”进入坦克和装甲车里面后，一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来的士兵，背着草绿色的大桶，桶里装着用汽油、柴油和空气配成的燃烧剂，桶的右上角有一个胶皮管，胶皮管头上装着金属喷嘴，那是火焰喷射器。命令下达后，日本士兵们在距离坦克和装甲车20 ~ 30米不等的地方射出白热的火焰。这火焰包围了坦克和装甲车，1 000度以上的高温炙烤着车辆，并响起轻微的爆炸声。10多秒后，停止了射击。这时，红黑色的烟雾中，露出了被烧坏变形的坦克和装甲车。过了一会，到车内进行检查时，“马路大”全被烧焦了。

另一种实验是：把押到安达打靶场的“马路大”的眼睛蒙上，分成组，每组10人。各组的“实验材料”，分别把身体贴紧，前后排成一行。有的组的人穿棉衣，有的组的人穿单衣，有的组的人裸体。731部队队员把这些“马路大”当作用枪弹穿射的“实验材料”。他们把上膛的三八式步枪对准排在队列前的“马路大”。命令下达后，士兵们开枪射击。“马路大”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731部队的队员们记录下用三八式步枪在离××米的地方被射穿的几个“马路大”的数据以及人体的穿透性能。这种实验，731部队进行过多次。[①]

第八章　日军对美、英、菲战俘的人体实验

第一节　《死亡工厂》一书中的披露

美国作家谢尔顿·H. 哈里斯在《死亡工厂》一书中引用大量资料证实731部队在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群众出版社，1984年。

奉天战俘营利用中、美、英等国战俘进行人体实验的事实。该书主要资料内容如下：

1985年8月13日，英国独立电视台播出了电视记录片《731部队——天皇知道吗？》，该记录片揭露了侵华日军对在中国沈阳美、英、菲战俘营（POW）所进行的人体实验，片中解说词暗示裕仁天皇知道满洲的细菌战人体实验。片中对美国微生物学家、退役中校墨瑞·桑德斯进行了采访，桑德斯称：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授权他同那些对这些暴行负有责任的日本人作交易。他说，最终达成的协议是：这些“科学家”的罪行免于追究，条件是他们与美国细菌战“科学家”合作。该片播出前，伦敦《旗报》《星期天镜报》《星期天邮报》《卫报》等报刊纷纷刊登介绍文章，说一部关于日本人在奉天战俘营里利用各类细菌进行实验的记录片即将播出，表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战俘是731部队日本“科学家”进行一系列实验的受害者。

该书说关于731部队利用美国及其他盟国战俘做实验品的指控并不新鲜。1946年1月6日，美国军队报纸《太平洋星条旗》刊载了一篇由日本共产党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石井在奉天和哈尔滨指挥用美国人和中国人进行细菌战实验。《纽约时报》根据同样的消息来源，说战俘们被接种了腺鼠疫细菌。

同年9月，东京的盟军司令部收到一封检举信，控告石井的3个同事在“‘满洲’新京（长春）100部队的野外解剖场上解剖了很多盟军战俘，目的是检验牛瘟病菌（注射后的效果）。”

1947年，美国情报部门编写了一份长篇报告，其中下面一段文字具有代表性：“1946年2月10日，一个自称纪野猛的人……给法务局寄来一封信，揭露一位住在萩市的人……曾负责在中国新京（长春）孟家屯的实验部队把盟军战俘作为活人实验豚鼠。”这份报告还引述了1946年10月4日一个名叫植木广志（Ueki Hiroshi）的人写给麦克阿瑟将军的信。该信指控，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石井四郎中将……对许多盟军战俘实施了野蛮残酷的实验。”另一些人指控，这些“科学者”“为了实验目的让战俘感染上鼻疽菌。”这份报告一共收录了12项以上指控片段或概要，都说石井或他的同事在战俘身上进行细菌战实验。

在另一份情报备忘录记载：法务局、盟军最高司令部，电报号：C53169，日期：

1947年6月7日，日本共产党指控：石井细菌战集团在奉天于被俘的美国人身上作实验，与此同时，同样的研究也在东京和京都进行。

1956年3月13日，送交J. 埃德加·胡佛局长的一份机密的联邦调查局内部备忘录中，一位情报员说：DOD（陆军部）特别行动办公室的詹姆斯·J. 凯勒尔先生主动进一步说明了这一事实，即美军在占领日本之后已经确定，1943 ~ 1944年间，在满洲的日本人确实把美国战俘作为实验牺牲品，用“细菌战”病原体作实验。他还补充说：“上述的这一类情报受到严密控制，并被认为是极其敏感的。”

1976年11月2日，东京公司（TBS）播出了吉永美子制作的电视纪录片《伤痕——魔鬼般的731部队》，该片确信石井的受害者中确有美国战俘。几周以后，《华盛顿邮报》报道了吉永的节目。

20世纪80年代，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出版了《食人魔窟》，该书也讲到盟军战俘被作为石井的实验对象。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森村认为：“受害者主要是中国人、朝鲜人和白种俄国人。但是我从各种资料来源得知：他们当中也包括英国人、荷兰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美国人。”

《原子科学家公报》1981年10月号上刊载了资深记者约翰·W. 小鲍威尔的文章《日本生物武器，1930 ~ 1945年，隐蔽的历史一章》。文章指控：“在那些活人类实验豚鼠中还有数目不详的美国士兵，他们被俘于战争初期，关押在满洲的战俘集中营里。”文章称：“美国官方报告披露，在决定放弃起诉这些日本参与者之时，华盛顿是知道这些事实的。”鲍威尔关于细菌战和战俘受害者的言论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播出；大众期刊《人民杂志》予以转载。文章发表1年后，《原子科学家公报》发表重要评论。

鲍威尔的文章和森村诚一的小说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国会第一次承认731部队的存在和它犯下的战争罪行。《华盛顿邮报》在报道这次国会辩论时评论说：“（石井的731部队）据说杀害了3 000多人——其中也许还包括美国兵……早有传说，言之凿凿，说有一小部分美国战俘也死于这些实验之中。”美国陆军首席档案官约翰·H. 哈切尔博士表态说：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战俘在满洲被用作生物

实验的说法，至少从1956年就已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最近它又引起了美英电视记录片界的关注。他指出：“甚至日本人也发表了一些有关此事的记述材料，但我认为这些记述在英文资料中找不到佐证。”而且，“所有这些消息来源，使这个问题煽起了公众的想象力。”

1982年，蒙大拿州民主党众议员帕特·威廉姆促成一次议会听证会，议会的退伍军人事务小委员会在蒙大拿州的海伦娜市举行会议。会上，来自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的沃伦·W.（帕比）威尔切尔向委员会讲述了他的经历。他们被关押在奉天战俘营时，有五六个日本军医“对这些美国人分别注射了不同的药物，给战俘们注射的不是同一种东西。”他们“觉得我们正在被用于细菌免疫实验，为准备他们可能对远东的盟军部队实验的细菌战。”他还回忆说：有人被检查了口腔、直肠体温，有人被检查了因注射引起的肿块，还有人被提取了直肠组织，作了直肠分泌物涂片检查。所有人脸上都被喷上某种喷洒剂。日本军医还给每个战俘都作了观察记录。格莱格瑞·小罗得里奇斯以他父亲及另一些前奉天战俘的名义作证。他说：他父亲等人是日本细菌战实验的受害者……美国战俘被日本人在奉天做了实验。他陈述：“……道格拉斯·A. 麦克阿瑟将军在1942年抛弃了他的士兵，又在1946年5月许诺不起诉战犯石井将军，如果他石井交出731部队的资料，从而将那些美国士兵的命运掩盖起来，麦克阿瑟与石井之间的这一交易卑不可言。这些被731部队在奉天作了实验的美国远东战俘的生命，就这样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被出卖了。”听证会听取了支持退伍军人权益的委员们的发言，但仅此而已，没有任何结论。

1986年9月17日，在美国联邦议会，众议院召开了听证会。听证会上，前奉天战俘北加利福尼亚的弗兰克·詹姆斯控诉说：“我们被作为731细菌研究部队的实验用豚鼠。”詹姆斯于1942年11月11日到达奉天战俘营。一进营地，日本军医给他们脸上喷洒药液，打针。在奉天，詹姆斯被分配到殡葬队。他说，冬天，天寒地冻，无法挖坑埋人，尸体被堆放到附近的一个旧木头房子里。第二年春天，他和另一个战俘被派去帮助日本人，准备埋葬200具尸体。他回忆说：“一队日本医务人员，731部队来了，带着一个解剖台来取标本。”詹姆斯他们的任务是“把尸体从台子上抬下来，即那些被选

中的尸体……然后，那些日本人就把尸体切开……包括头、胸、腹部——取出想要的标本，装入容器并标上战俘的号码。”这些标本后来从营地运走……听证会上关于 731 部队对美军战俘进行人体实验的事实仍然没有被证实。

杰克·安德森和代尔·范·埃塔等人于 1987 年为报纸撰文，再次罗列了以往的各项指控。1988 年，澳大利亚学者田中幸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撰文指出：“还有迹象表明，这些特殊军团（731 和 516 部队）用毒气和细菌在中国、俄国、美国和波兰战俘身上作实验。”1990 年 8 月，《纽约时报》报道：“在距石井四郎中将战时实验室只有数步之遥的地点”，发现 35 具非日本人的“表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人头盖骨和腿骨。”这个报道还说：“在石井将军的指挥下，战俘主要是中国人，有些记载表明还有美国人和俄国人悲惨地死在日本占领区的秘密墓地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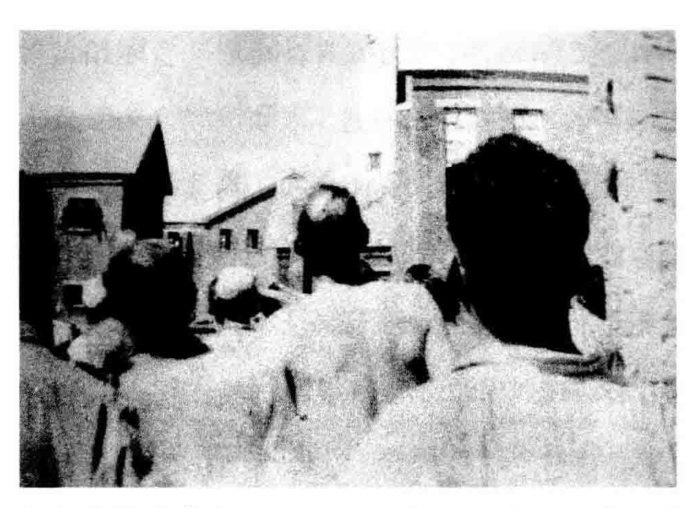
谢尔顿·H. 哈里斯说，关于日本细菌部队利用美国等战俘进行人体实验的事实，有几位幸存者的经历的回忆确有文献资料可资佐证，他们的说法具有相当的可信度。除此之外，还有两本日记为当时发生在奉天战俘营的事提供了线索。一本是战俘营中军衔最高的英国军官罗勃·皮特少校的，皮特的日记对战俘营里每天的活动逐一作了记录，在下文近藤昭二的文章中有交代；另一本日记是来自康涅狄格特州新不列颠市的 23 岁的西格蒙德（西格）·施瑞纳尔。他从 1942 年 4 月 9 日巴坦半岛陷落记起，详细记述了他们在奉天战俘营里的经历。

皮特少校和施瑞纳尔都记载，战俘营里定期用玻璃管作直肠检查。日本医生例行为战俘们作粪便涂片。偶尔也采血样，这也许是为了测定美国人对各种疾病的可能免疫力。据皮特少校记载“1943 年 9 月 12 日，营中每人都被采血化验。”关于这一点，柄泽十三夫供称：“我记得这是 1943 年初的事。当时我在沈阳军医院内养病，部队中一位姓凑的科学工作员来看我，他对我谈到他自己的工作情形，并说他在沈阳是为了研究美国战俘对于传染病的抵抗能力大小问题。”凑氏是由 731 部队专门派到盟军战俘集中营里来考察盎格鲁·撒克逊人种对各种传染病的免疫能力的。

美国战俘在奉天被作过细菌战实验吗？至今，美国政府的见解与当时听正会的结论

一样，即找不到足以作出最后定论的证据。[①]

第二节　《731部队与其隐蔽工作》一文的披露



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美、英军战俘被进行细菌试验

1995年，在哈尔滨由中日联合召开的“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座谈会”上，日本作家近藤昭二发表了《731部队与其隐蔽工作》，文章再次揭露了731部队对美、英、菲等国战俘进行人体实验的情形，现摘录如下：

关于被731部队残忍迫害且被当作人体实验材料“马路大”的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及蒙古人之事实，于榊原秀夫及上田弥太郎等队员的审判口供书上、哈尔滨特务机关的特务北泽隆次的证言，以及黑龙江公安厅的档案中都已明确地被证实。

日本人的队员若被病原体感染的话，被称之为“业务感染”（即实验室感染），将同样地被当作研究材料处理。731部队除了对上述人种外，是否曾将安格鲁萨克逊人种，也拿来当作实验与研究的对象？

1986年9月17日，在美国联邦议会，众议院召开了公正会。公正会为了调查原美军的控告。在位于现沈阳的当时日本奉天战俘集中营里，731部队曾于该集中营进行所谓的人体实验。根据调查法兰克·杰姆斯、威廉·特理普烈特等5人的控诉主张的结果，

① 〔美〕谢尔顿·H. 哈里斯，王选等译：《死亡工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公正会上关于 731 部队对美军战俘进行人体实验的事实并没有被证实，最后以当于收集到证据时再做检讨作为结论。至今，美国政府的见解与当时公正会的结论一样，毫无改变。但是，明显证明 731 部队涉及该战俘集中营的战俘之有关资料，不仅在过去曾发现过，最近又新发现了数个新的资料与证言如下：

1.1942 年 4 月 9 日，巴坦陷落，5 月 6 日，克列比多尔陷落时有 8.8 万名战俘被日本逮捕。经过那恶名昭彰的巴坦“死的行进”，其中有 1 485 名的美国、英国及澳洲、新西兰的战俘于 1947 年 11 月被送到奉天（沈阳）的集中营去。后来，在东京裁判的负责搜证之国际检察局英国检察团押收的文书资料（1948 年 2 月 17 日）中明确地记载着“为了某种目的”而遣送集中营的，收容 3 个月后，一名叫做永山的部长曾对这批战俘的营养失调情形作了报告。这称为“永山”的人，不正是 731 部队诊疗部长永山太郎上校军医吗?

2. 英军的罗勃 · 皮特少校在被俘虏的当时每天只能分得一张卫生纸的状况下，悄悄地在卫生纸上以秘密的密码文字写了日记。在其日记中，于资料 1 的文书之 4 天前，写着“今天大约有 10 名的日本军医及 20 名的下士官抵达”。

这个军医调查团在此进行了连续 10 天的调查。到这天为止共进行了 105 天调查工作，这期间就有 186 名死亡，而且全都是美国人?

根据英国检察团所押收的“关东军作战命令 98 号”，梅津司令官下达命令，命令派军医 32 名人员前往奉天战俘集中营。接到此命令的梶塚（关东军军医部长）乃派遣 32 名人员前往奉天战俘集中营，言为系为了传染病之预防。

皮特少校的日记所记载该军医团到达奉天的 12 天前，即是 2 月 1 日下达命令的行文日期。施行伤寒、副伤寒、天然痘、霍乱、赤痢、破伤风的预防接种而已，并无对生病的施与治疗及给药，且对死亡的遗体进行解剖。

3. 美军军曹哈曼 · 卡斯提欧在被注射时，被日本军医说：“你将会是一生的带菌者”。其后经常为赤痢发生高热而烦恼，被监禁在独身的监狱房，此监狱房酷似背荫河时代加茂部队所使用，被称为“露肢”的监狱房。

4. 在奉天被捕，被遣送到苏联伯力审判的 731 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长柄泽十三夫，

保存在苏联当时他的审讯记录中，即有涉及奉天的美军战俘的审讯记录。

（1）1947年1月1～2日审讯记录——“关于部队的细菌战之实验乃是以中国军民为对象的。但是也有使用欧洲人民的可能性。为此，各种人种的血液之免疫也被纳入研究。凑氏乃是使用美军战俘的血进行研究的。”

（2）同1947年1月1日东京裁判时，从苏联检察团送交美国的有关柄泽十三夫的调查记录之英文翻译——在部队内的研究，乃是为了解免疫性血清的反应，人种的不同是否会有所不同，才施行的。为了要达成此目的，乃从第一部调来专门技师内海氏族为该小部队的队长，自1943年起开始，前往蒙古中部。同样的专门技师凑氏也于1943年夏天期间，以被收容在奉天附近集中营的美军战俘的血液进行调查研究。对此。凑氏如此地对我说“不仅是强化细菌的实验，同时进行了该项的血液研究之结果，才正式判别出血清免疫是不同的人种也同样并无不同。”再根据这个结果，以平常的方法进行细菌的培养。

依上述的供词不能不说是为了做细菌战之准备才以人体做实验。

第三节　关于平房本部目击者的证言

1. 第一次前期的少年队员 N.K. 曾在部队大讲堂（63栋）里，看过陈列的人体标本之名簿中，记载着“美国人”、“英国人”等字样。

2. 曾在第四部的柄泽细菌制造班工作过的森下清人说：“苏联人与英、美人是可以看出、分别得出的。在‘马路大’里面曾看过有美国人或英国人，也曾在‘马路大’的人里听到说英语的人。”

又，在联合军的战俘被送往奉天的战俘集中营的1947年11月，原为731部队教育部担任英语教官 K.H. 也被奉派转职为奉天战俘集中营担任翻译。

美国的 OSS 或 CH，在早期即已获知日本的细菌战部队进行人体实验。

战后进行731部队的战犯负责与研究资料交换的幕后交易，系双重构造的。

负责调查与追究 731 部队的科学技术调查团成员（M. 桑德斯）或狄特利克堡区的医学专家（A. 汤姆森）的行动之外，定有其上层上司的 GH 与原陆军干部之间的勾结存在。在天皇的敕令下，被供与资金，且牵动了陆军整体的配合与行动，当 731 部队的罪行实态暴露被发觉，其战犯问题根本不可能只是 731 部队的责任范围就能平息解决的。

石井四郎的女儿春海说："与美国的交易，我父亲完全是遵照服部（卓四郎）参谋的指示行事。全是服部氏（向塞班岛进行细菌攻击作战的立案者）所做的准备的。"

美国方面的 GH，早于终战前即已掌握到细菌战的中心人物为石井四郎的情报。现留存于麦克阿瑟纪念馆的提交麦克阿瑟的报告书——在终战 2 个月前被提出的"日本违反战争法"中，也有关于日本陆军的南方军以战俘进行赤痢或疟疾实验的报告。在德国被逮捕而被遣送美国的石井的主要好帮手之一的北条圆了，几乎供述了大半的事实。在日本的 GH 情报局对美国本土保持秘密的，对获得 731 部队的成果却寄予重大的关心。但是，其间详细的行动如何，目前由于 GH 的文书资料尚未公开，因此尚无法证实。然而，在幕后暗地里勤于奔走扮演双方密约交易的中介者，除了石井的心腹人物内藤良一之外，明确地是还有国会议员亀井贯一郎。原为众议院议员，且担任大政翼赞会的东亚部长的亀井，于 1943 年设立财团法人圣战技术协会，协助飞弹与气球爆弹的技术开发，与石井都是知己之交，特别是支援其有关细菌爆弹与脾脱疽菌的弹药武器的开发。在亀井备忘录的 1945 年 9 月里，明确地记载着："战争结束，将依陆军委托而设立的协会之有关为日本陆海军所开发的一切秘密武器全部复元后，转交美国国防部的承办者，已征得其了解同意对有关研究开发者将给予战犯之特别赦免。"

在幕后交易谈成后，有关美国本身的军人之受害者当然的就置之不问，不得不进行隐蔽工作。

如此，直到 1947 年苏联对石井等人员的审讯要求与人体实验被暴露，目标被集中美国本土，想自美国获得答案。但是，尽管如此，美国的国务、陆军、海军三部门的调整委员会在"日本的生物战资料的价值，对于国家安全上而言，极其重要，远较过去追究'战犯'更来得重要"的果断决定下，为了支持幕后的密约交易起见，关于联合军战俘的受害问题，从此再也不曾在公开的场面、表面的舞台出现过。

据日本《朝日新闻》1994年5月30日电报道说1945年初夏，侵华日军731部队组建了一支“细菌特攻队”，准备用潜艇等夜间登上美国西海岸，投撒鼠疫菌，这一进攻代号为“夜樱花”，进攻时间定于1945年9月22日。但由于苏联1945年8月9日对日宣战后，这一行动随之化为泡影。这是当年参加特攻队的731部队的几名士兵向《朝日新闻》记者揭露的（摘自《光明日报》1994年6月1日）。

美国《纽约时代》3月17日文章题为《日本应该对残酷的战争暴行负责》，其中有一段“夜樱花”行动的内容，摘录如下：

1944年，当日本快要战败时，东京战争策划者发现一条攻击美国心脏地带的不同寻常的途径：他们向美国方向放出巨大的气球，这些气球顺风飘到美国大陆。虽然美国政府当时严密监视有关报道，但还是有200个气球落在美国西部，那些气球携带的炸弹使蒙大拿州的一名妇女和俄勒冈州的6人丧生。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有材料表明当时的情况可能还要糟糕得多。当时一些日本将领建议用气球携带细菌武器到美国，在那里引起鼠疫和炭疽病的流行。另一些部队希望把牛瘟病菌或引起谷物黑穗病的病菌传播到美国，以破坏美国的畜牧业和农业。

日本军队显然还是想用生物武器对付美国。例如，在1944年春天，美国准备进攻太平洋上塞班岛时，一艘日本潜艇曾向日本守军运送生物武器，但是不清楚是哪一种。后来因那艘潜艇被击沉，日军才不得不依靠常规武器进行反击。在1945年，战争临近结束时，731部队准备实施它最野蛮的计划，即代号为“夜樱花”行动。该计划打算让“神风突击队”队员把鼠疫菌传播到加利福尼亚。当时任731部队新兵教导员的沟渊说，他们的计划是从1945年6月到哈尔滨的500名新兵中挑选20名，然后用一艘潜艇把其中几个人送到加利福尼亚南部附近圣地亚哥地区投撒带有鼠疫菌的跳蚤。实施该计划的日期定在1945年9月22日。

现住在爱媛县、已73岁的小幡知道，当时他曾被内定为参加“夜樱花”行动的攻

击队队长，但他拒绝透露有关计划的详细情况。[①]

第九章　中国劳工

第一节　强征劳工

1933 年，加茂部队（石井部队）在黑龙江省一常县背荫河圈定了 500 米见方的地盘，划定为军事用地。然后通过日伪当局，在附近村屯强征近千名劳工和几百辆马车，兴建“兵营”。这个“兵营”不到一年时间就建成了，人们称它为“中马城”。1933 年 12 月 8 日，关东军参谋远藤三郎视察背荫河时说，初具规模的 600 平方米的大兵营，令人产生一种好似要塞的感觉。其实，这里是石井部队的细菌工厂。

1936 年，石井部队开始在平房地区大规模地营建，对外说是修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及部队营舍。石井部队的营建是秘密工程，由日本株式会社设计施工。日本方面有大林组、藤田组、松村组、铃木组承担施工任务。其中铃木是石井四郎的老乡。铃木组员工大多数是从石井四郎的故乡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加茂的人。他们作为石井四郎的员工参加秘密工程的兴建，获得大量财富。外围工程建筑多是诱骗和强证中国劳工修建。他们通过“工头”游说，从哈尔滨、海伦、佳木斯、牡丹江、海城等各地招骗来。

1936 ~ 1939 年，石井部队在平房地区大规模地营建，盖厂房、宿舍、监狱、飞机场，强征了 1 000 多名中国劳工。北洼地、正黄旗五屯南门外和黄家窝堡屯搭起数十栋劳工棚。在忙的时候，日本人从附近村屯强迫农民出工出车搞建筑。当地村里的头面人物当工头，负责招工。平房特区有 40 多个村屯，每天出动 500 多名劳工和 100 多台马车。每人每天 8 角钱，每台车每天 4 元钱。工头抽取 10% 的工钱。

①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出自〔日〕近藤昭二，《731 部队与其隐蔽工作》，发表于 1995 年在哈尔滨中日联合召开的“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座谈会”上。

平房地区主要建筑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后，外地劳工大量逃跑，不少人被殴打或充当“实验材料”而死亡。此时，731 部队细菌工厂投入生产，附属工程也需要人力建筑。雇佣当地劳工不仅费用高，而且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因此，石井部队决定通过日伪当局从东北各地强征劳工，使用廉价劳工。每年，731 部队提出需用劳工的计划，由伪满洲国劳动部给各省下达招工指标。各省按计划强征劳工，并负责把劳工押送到 731 部队。日伪当局把哈尔滨、阿城、双城以及平房特别军事区域作为征集劳工的重点，规定这些地区承担为 731 部队提供劳工的义务。这项工作由伪哈尔滨市公署动员科下达指标，各地区事务所负责招工。731 部队劳务班、石井班、动力班、工务班、八木班、建设班、仓库班、运输班共需要劳工 1 000 多人。

平房地区事务所为配合 731 部队的招工工作，做出了特殊规定：

（一）正黄旗四屯、正黄旗三屯、正黄旗二屯等较大的村屯，每村每天出劳工 80 名、马车 10 台；新发屯、新王屯、瓦盆窑以及特区之外的大乔屯，每村每天出劳工 40 名、马车 5 台。除特殊情况外，各村屯必须保证按规定出劳工和车辆。

（二）凡是年满 16 ~ 60 的男性劳动力都必须承担这个专项劳务义务。即使“国兵漏”在勤劳奉仕之前或期满后也不例外。如果实在有困难，经过批准可由男性少年代替。

（三）平房特区的每一个男性劳动力，每年必须服劳役 4 个月；特区之外征集的劳工服役期限，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定为 6 个月、1 年或几年。

731 部队强征劳工，给不少家庭带来灾难。正黄旗二屯的孙如学从山东巨野县逃荒来到东北。12 岁就给地主放猪。1942 年，他父亲积劳成疾病死。全家生活的重担落在他 18 岁的哥哥身上。这一年，731 部队从他家抽劳工，15 岁的孙如学不得不代替哥哥去 731 部队当劳工。

平房特区正黄旗二屯的赵官型，当年，他的两个叔叔体弱多病，全家 10 余口人靠他父亲维持家庭生活。他家也被派了劳工。正在念高小的赵官型代替父亲出劳工。日本劳务班长工藤嫌他小，不要他。不得已，他父亲拖人给劳工中队长朱有礼送了两包果子，求他说情，731 部队才收留了他。

劳工张朝清回忆：“我是平房特区正黄旗四屯分区三家子屯的老户。记得 1938 年

迁屯撵户以后，731部队通过‘把头’向附近各村屯招雇劳工。当时当劳工是自愿的。我也去干了一些日子。我在731部队里看见过近千名外地劳工，他们都是招工来的。到了1940年，情况就不同了，外地的劳工都是强征来的。平房特区事务所也做了新规定：附近村屯每个男劳动力每年必须到731部队服劳役4个月。如果不去，轻则挨打，重则就出劳工到外地煤矿、铁矿去。我这一年开始，每年去731部队服劳役4个月。”

正黄旗三屯的老户退休教师侯安钦回忆说，1944年，平房特区事务所向四屯、三屯、二屯各征招劳工80名和10台马车。向附近较小的村屯招收40名劳工和5台车。三屯有200来个劳动力，先前有一些人已经在731部队当劳工，再抽80人相当困难。村公所只好从老人身上打主意。正黄旗三屯有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梅永才，家里只有老两口。1944年，区事务所让他家出劳工。他干不了重活，不想去，结果被区事务所的人打了一顿。他只得去731部队服劳役。干活时，他体力不行，日本监工经常打他，他差点死在工地上。侯安钦的岳父60多岁了，也被派了劳工，如果没有人顶替，就被抓去当劳工。侯安钦当年21岁，是“国兵漏”，等待去勤劳奉仕，可以不出劳工。他见岳父挨打，便提出替岳父出劳工，很快就获准了。

当时，平房地区有1 500多个男劳动力，常年在731部队当劳工的就有600来人。

1944年夏天，731部队扩大细菌生产，需要增加1 000名劳工。这些指标下达给锦州和海城地区。锦州、海城两地的日伪当局感到招劳工困难，他们用先前锦州和海城送到去兴安北省乌诺尔挖山洞的1 800名劳工顶替，让731部队派人去乌诺尔领取。731部队派工藤带着4个日本宪兵和劳工大队长王庆久、翻译李初亭去押解。这批劳工在乌诺尔干活，天气寒冷，劳动繁重，待遇低下，服劳役期间不少人冻饿而死，731部队去押解时仅剩800余人。关于从乌诺尔押来的这批劳工，下文设节详细叙述。

不少劳工是被骗招到731部队当劳工的。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的退休工人赵殿启回忆，1936年春，他和两个同乡从河北省献县逃荒来到锦州，流浪1个来月，找不着活干。一天，有个把头说，哈尔滨要建工厂，招建筑工，那里吃大米、白面，工钱高。赵殿启等100多个人报了名。他们从锦州站上了一辆闷罐车，车厢上了锁。在火车上每个人发了3个高粱米面、苞米面、橡子面混合

的窝窝头。乘火车走了一天两夜，又步行七里多地，来到一个用刺网围着的大院，给人阴森恐怖的感觉。这里就是731部队平房驻地。第二天早晨，一个日本人训话，李初亭当翻译，意思是让大家为日军效力，偷懒不给工钱，逃跑枪毙。吃完早饭后，赵殿启他们来到建筑工地，他和两个同乡做力工，搬石头、倒砖、筛沙子。一日三餐都是窝窝头、土豆白菜汤，而且不定量，根本吃不饱。工地有日本监工，动辄打骂劳工。按规定每天工资8角，把头抽去20%，再扣除伙食费，每人只能挣3角钱。这3角钱不发给劳工，而是存在柜上。平时，劳工换季、看病都没有钱。工地上经常有劳工莫名其妙地失踪，有的劳工被当场打死。赵殿启预感到劳工的悲惨命运，与两个老乡相约逃跑。那年秋季一天深夜，他们借上厕所的机会，钻出北边的铁丝网。日本岗哨发现后，开枪射击。他们迅速逃进苞米地，拐进西边的正红旗五屯，辗转逃到双城县，脱离了险境。

裴富在731部队做了6年劳工。他是北京人，来东北挣钱。他先在兴隆镇修铁路，因活累，伙食差，不挣钱，他辞去工作，来到哈尔滨。一天，把头王省三招工，说有个建筑工程招工，吃住条件好，挣钱多。他就报名参加了，来到731部队第一仓库当装卸工。在日本监工的控制下，他没机会逃跑，一直干到日本垮台。

铃木进在731部队开汽车，有两个中国劳工经常跟车干活。他回忆说，1938年，石井四郎回到千叶县招工。他跟随铃木组来到平房，被派去驾驶汽车，运输建筑材料。到了1939年，平房营区建筑基本竣工，细菌研究、生产工作全面启动了，外围服务性工作严重缺员。731部队通过伪满当局招进了近千名中国劳工。工地的建筑任务减少，而修缮任务加大。731部队加强了建设班、工务班、动力班的组建。铃木进被分到工务班开车。装卸建筑材料的装卸工都是中国劳工。铃木进开汽车搞运输，经常接触四方楼及特设监狱的日本人，从他们那里听见过731部队搞人体实验的事。

第二节　劳 工 棚

1938年，石井部队把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五屯、刘家窝堡和黄家窝堡等4个屯的老

百姓强行移民，选中正黄旗五屯为“劳工村”。村子周围架设了铁丝刺网，门口设岗哨，监视中国劳工，防止他们逃跑。正黄旗五屯原村长的住宅改作劳务班办公室，旁边有劳工食堂和拘留所。屯内有给工藤和李初亭改建的住宅。其余老百姓的住宅都改为劳工棚，又在屯西南新搭了 20 多栋劳工棚。731 部队从外地招来的劳工集中居住在这里。附近村屯的劳工经石井部队长批准，可以通勤。

第三节 劳务班和劳工大队

731 部队设劳务班，隶属总务部，由日本退伍军人组成。关冈是代理班长。后来由工藤与四郎担任班长。工藤退伍后，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嘱托的身份来到 731 部队。他没有军衔，是个判任官，享受高等官待遇。关冈是带班主任，真田、木田负责劳工调配，青木管理财务，西尾办理劳工证件，菊池管理日本人，加藤、安寿、秋花、中代、方本、高桥、竹田、秋叶、佐藤、申马、千山、山室、德永等日本雇员是日本监工。731 部队劳务班班员属于宪兵室的特工人员。

劳工大队在日本人控制下，负责管理劳工工作，下设中队、小队。劳工组织，随着劳工人数的增减而变化。当地劳工回忆，劳工中队的劳工大多数是附近村屯的农民，外地劳工仅编制了 1 个中队。根据有关材料分析，731 部队从平房以外地区，招收了大批劳工，这些劳工集中居住在正黄旗五屯的劳工村里。当地和外地劳工加起来最少时有 1 000 人左右，平时保持在 2 000 人左右，最多达到 3 000 多人。在外地劳工增加时，当地劳工到 731 部队上班是通勤的，也就是说，在劳工村里居住的大多数是外地劳工。外地劳工中有不少人从事秘密工程的建筑，这部分人大多数没有生还的希望，其中一部分人被 731 部队当作“实验材料”，死在监狱里。731 部队劳工大队劳工最多时，下设 9 个中队，其中外地劳工仅有一个中队。笔者认为他们所回忆的主要是 731 部队对平房一带劳工的管理情况，而对外地劳工的管理还不够清楚。该部队对锦州、海城、大石桥、赤峰、黑山、海伦、佳木斯、牡丹江、阿城等地的劳工管理，比对平房地区

劳工的管理更为严格。他们单独编队，不准与本地劳工接触，不准离开731部队驻地，上下班由日本士兵武装押送，食宿起居都受到日本士兵的监视。

大乔家屯的劳工鞠复智回忆：“我是1941年去731部队做劳工的。那时，外地劳工和本地劳工加在一起，平时保持2 000人左右，最多达3 000多人。731部队设立了劳务班，由日本陆军嘱托工藤与四郎担任班长，负责管理劳工工作。日本人关冈是事务主任，协助工藤工作，主要负责防谍工作。贞田负责管理劳工工作。青木、西尾负责后勤工作。

劳务班把中国劳工编成劳工大队，王庆久任大队长，李初亭是翻译。这两个人都是大连人，是亲属关系，在中国劳工中有实权。”

初期，劳工大队下设6个中队。1942年增加到9个中队。第6中队是外地人，其余8个中队都是平房特区附近村屯的劳工。

第一中队，由正黄旗二屯的劳工组成，朱有礼为中队长。

第二中队，由正黄旗三屯的劳工组成，付尚谦为中队长。

第三中队，由新发屯、瓦盆窑的劳工组成，王国柱为中队长。

第四中队，由正黄旗四屯的劳工组成，王治国为中队长。

第五中队，由新五屯的劳工组成，文立帮为中队长。

第六中队，由锦州、大石桥、海城等外地的劳工组成，董万玉为中队长。

1942年新增设3个中队。

第七中队，由后续的正黄旗四屯的劳工组成，孟继洲为中队长。

第八中队，由双城县第六区大乔屯的劳工组成，鞠复智为中队长。

第九中队，由双城县第六区正红旗头屯、正红旗二屯、正红旗三屯、正红旗四屯、正红旗五屯的劳工组成，姜风祥为中队长。

侯安钦说，1944年，外地的劳工大多数都逃跑、死亡了。731部队又从阿城、佳木斯、海伦等地招来一批劳工。劳工人数1 000人左右，分3个中队。第一中队，朱有礼为中队长。第二中队，侯玉书为中队长。第三中队，王国柱为中队长。1945年7月，又增加了两个中队，第四中队，叶福堂为中队长。第五中队，文立帮为中队长。此时，又从赤峰、黑山、阿城等地抓来一批劳工，没有和平房的劳工混编，单独设立一个劳工队，归劳工大队管理。

每个中队 200 人左右。

劳工中队下设小队。各劳工都被分配到 731 部队的外围的一些班里劳动。所以也把“小队”称为“班”。劳工班有工务班、石井班、二木班、植村班、谷口班、兵器班、运输班、劳务班、动力班、瓦斯班、仓库班（第一仓库、第二仓库）、八木班、建设班、给水班、汽锅班、马车班、火磨班、服装修理班、食堂班、酒保班、糕点班、东乡宿舍班等 20 多个班。这些班由中国人担任班长，班长只能是干活，监工由日本人负责。

第四节　从乌奴耳转运来的一批劳工

张朝清在 731 部队赶马车，他见过从乌奴耳来的这批劳工。他说：“我在 731 部队里是马车夫，拉煤、运沙子、拉土，什么活都干。记得 1944 年夏季的一天，日本人西尾让我赶马车跟他到平房火车站去。到车站后，我看见有几百个劳工在站台排队站着。他们的衣服都被扒光了。跟前地面上有 3 具尸体。日本人堆起柴火，浇上汽油，就地焚烧尸体。西尾让我把堆在地上的劳工们的衣物装车，拉到四方楼大院东角门外。装车时，我看见那些光着身子的劳工被持枪的日本兵押着往‘北厂’走去。装满车，回四方楼卸车时，那些劳工也从我们旁边过去，朝劳工村去了。拉第二车衣物回来后，先头那些衣物已经不见了。拉完最后一车衣物时，我看见几个穿白色工作服的日本人又把这些衣物送回来。每件衣物都用汽锅消了毒，湿漉漉的，冒着白气。那些狍子皮和狗皮褥子聚成了团，根本不能用了。我刚卸完车，来了一个日本人，用喷雾器给我的马车和我喷药水消毒。那天下午，西尾让我把消过毒的衣物送到劳工棚。在劳工棚，我看见日本人正在给光着身子的劳工照像。劳务班长工藤让那些劳工到衣物堆里辨认自己的衣物。劳工们认领自己的衣物后，看见那些皮褥子都毁坏了，心疼得哭起来。当时，我不知道这批劳工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我听劳工中队长朱有礼说，春天，731 部队通过哈尔滨市伪公署向海城、锦州征招 1 000 个劳工。海城、锦州方面，想用先前他们征招的派到乌奴耳挖山洞的即将到期的 1 800 名劳工顶替，让 731 部队派人去乌奴耳接劳工。731 部队在

劳工实在难招的情况下，派工藤带着劳工大队长王庆久、翻译李初亭和几个日本宪兵去乌奴耳押运劳工。他们赶到乌奴耳后，车站拉运劳工的10节闷罐车已经准备好了。而那批劳工在沉重的劳役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大部分都死亡了，还剩下800来人。朱有礼还说，那些乌奴耳的劳工服役期已满，准备回老家去。正在这时，731部队的工藤他们去了。李初亭骗他们说，‘我俩（王庆久）是大连人，和你们算是老乡，给你们找份挣钱的活干，别回老家了。’这些劳工不知道是骗局，要求把工友的骨灰盒带上，工藤答应了。劳工们被押上闷罐车后，发现闷罐车上了锁，每节车厢都有两个日本人把守，而每个劳工只发3个窝窝头。他们知道上了当，可是没办法逃走了。这些劳工过度疲惫劳累，在车上死了2个人，工藤命令把尸体扔下火车。第二天早上，到平房车站后，又发现死了3个人。日本人怕是瘟疫，就把那3具尸体就地焚烧了。这800来个劳工被押送到731部队劳工村。”没过多久，这批劳工又死了几十人被拖进劳工坟掩埋了。也有劳工禁不住折腾，趁机逃跑了。到1945年，日本垮台时，这批劳工仅剩下50多人。

第五节　劳工生产

在731部队的劳工主要从事建筑、维修、养殖、种植、缝纫、烹饪、锅炉以及各种杂活。生产环境恶劣，工作繁重。他们在吃不饱，穿不暖，被迫干重活的情况下，稍有不慎，或生病无力时，就会遭受日本监工的毒打。731部队附近的当地劳工虽说挨打，但还能坚持下去，外地劳工遭受非人的待遇，他们在731部队或病死、或累死、或被打死、或被当作“实验材料”、或被抽去修筑秘密工程而杀人灭口，这些外地劳工除少数逃跑的外，绝大多数都死在了731部队。

劳工陈芳新回忆说，1938年，当时，731部队的房子还没有盖完，他赶着马车往工地运猫爪石，看到近百号人挖地沟，他认识里面家住正黄旗二屯的邵长海。邵长海家境贫寒，每天都吃不饱。整日挖地沟，累得他直不起腰来。一天，邵长海连累带饿，浑身冒虚汗，他实在干不动了，停下来用袖头抹汗。日本监工贞田硬说他偷懒，不由分说，

扇他的耳光，还放开狼狗撕咬他，咬得他遍体鳞伤。

曾在动力班锅炉房烧锅炉的金国忠回忆说：“动力班负责给营区内供热、供电、供水。这里有 3 台锅炉，每天启动两台。一昼夜耗掉 150 吨煤。锅炉房总共 20 来个人，实行两班倒。从运煤供烧锅炉，到倒运炉灰，实在是干不过来。平时 3 个人推一台轱辘马子，还有点吃力。日本人非让两个人推一台，这样一来，人吃不消，有的劳工就累病了。劳工小队长董万玉就把机械保养工方永和、清扫工老车头抽出来打替班。凑足了 10 个人烧锅炉、倒煤渣，还是供不足气。总务部管理课打电话把日本监工骂了一顿，日本监工就打骂我们。日本人不给增加人，我们只好在日本人在时就拼命干，不在时就磨蹭起来。一天晚上，方永和头痛。我就让他干我的活——往炉灰渣上浇水。我替他推轱辘马子。当他准备打开灰斗清理灰渣时，发现灰渣冻成一块，漏不下去。尽管我帮忙用凿子凿，可是方永和还是晕倒在地。我们想把他送回家，日本人硬是不让。方永和实在挺不住了，我通过在场的劳工中队长朱有礼向贞田说情，我们才把方永和送回家，没过多少日子，方永和就病死了。我们动力班的劳工就更累了。”

白铁工白武斌说，白铁工房是用板皮搭成的。一到冬天，劳工们可就遭罪了。工棚四处透风，日本人又不让生炉子。我们只好使劲干活来防寒。吃一口冰冷的饭，紧接着还是拼命干活，一天到晚不停地干，累得筋疲力尽。

八木班是农田种植班。在这里干活的多数是临时工，农忙时有 80 多个劳动力。到了冬季，只留下 40 人，在菜窖里倒菜。还要抽一部分人去别的班干活，待来年农忙时再回来。新五屯的裴文胜回忆说，一年冬天，他被抽去烧锅炉。日本人让他去东乡宿舍去烧锅炉。他不识字，拿着日本人开的条子去了动力班。到了动力班，日本监工一看条子，劈头就是一顿打，还逼他跪着在露天地里冻了一个钟头，腿脚都冻麻木了。后来朱有礼说情，才饶了他。他跑到东乡事务所报到时，日本人嫌他迟到了，又把他打了一顿。幸亏他们着急让裴文胜运煤，才算饶了他。

鞠兴信是正黄旗三屯的人。1940 年秋季，他被抽调到 731 部队东乡村事务所当杂工，清理垃圾。他经常接触外地劳工，得知外地劳工更累更苦。他说。外地劳工冬季没有衣服穿，趁日本人不在时，用水泥袋子防寒。他们冬天搬运石头，夏天挖地沟，活计很重。

因为吃不饱，他们个个骨瘦如柴。他们饿得经常到东乡村宿舍的垃圾箱里捡东西吃。对那些体弱干不动活的人，日本监工动辄拳打脚踢，还放狼狗撕咬。他们带病干活，不少人被折磨死。有时，一天死好几个人。死后都埋在劳工坟了。鞠兴信说，现在到劳工坟，只要挖一尺来深，就能看见劳工们的骨头。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的退休工人于忠尧，当年在新五屯居住，1942 年，他到 731 部队动力班做工。有一次，他得了伤寒病，上不了班。日本人派人来催他上班说，没死就得上班，他带病只得去上班。到了动力班后，他看见一个劳工正在罚站。日本监工见于忠尧来了，二话不说，逼着他俩互相打，直到两个人的脸都红肿起来，才算罢休。中午，别的劳工都去吃饭了，日本监工还逼着他们俩去倒脚手杆子。脚手杆子有一大垛，每根六米多长。他俩带着病，又没吃饭，扛了几根就干不动了。他俩硬挺着干，直到天黑才干完。第二天，又带病坚持上班去了。

正黄旗四屯的劳工王应魁在 731 部队高等官宿舍当了 3 年仆役。别人认为他干的是好差事，其实不然。他们被日本人称做苦力，经常挨打。有一次，他忘了给日本军官问好，就被痛打了一顿。

张朝清说，有一次，他们几个劳工在干活时小声嘀咕了几句，日本监工起了疑心，凶狠地命令他们几个互相打“协和嘴巴”，让劳工互相打，这是日本监工惩治中国劳工的常用的手段。

正黄旗三屯的劳工付世英在 731 部队酒保班做杂工。有一天，日本人命令他赶马车到 731 部队铁路专用线拉货。马车走到铁道口时，马套断了。他修理马套时，看见一个劳工，拿着一个像打气筒似的东西往外压黄油，他没见过这种东西，好奇地多看了几眼，就挨了一顿打。还有个赶马车的老张头，日本人让他去四方楼拉东西。到了四方楼门口，日本人接过马车赶了进去。老张头往四方楼院里面看了看，就被日本监工痛打了一顿，结果他连受伤带窝火，病了好几天。

马清林在 731 部队赶马车。有一天，他去第一仓库拉玻璃。卸车时，他发现碎了一块玻璃。他正在捡碎玻璃，被日本监工发现。那个监工让他把马车赶到仓库事务所门口停下来。用竹棍打他的头，竹棍打折了，又从屋里取出一个镐把，猛击马清林的头部。

马清林躲闪不及，被打昏在地。当他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了劳工坟地。幸亏那时日本人不再掩埋劳工的尸体，他被人发现抬回家，捡了一条命。

侯安钦他们几个劳工被抽去酒保班倒运食品箱子，他们从63栋楼底层往楼上扛。箱子又多又重，每人每次只能扛一个。上下楼搬运，他们累得实在受不了，日本监工还不让休息。侯安钦小声对工友说，干不动咱就悠着点干。这话让日本监工听见了，上去就扇了侯安钦一顿嘴巴子，把他打得鼻青脸肿。那次，日本监工寸步不离，罚他们把食品箱子全部搬完，一直干到半夜。

于连奎是阿城县蜚克图镇的人，幼年学裁缝。1945年5月，731部队在阿城县招800个劳工，蜚克图镇摊上40个人。伪镇公所从18岁以上的男劳动力中挑选，不论从事什么职业，挑选上就得去。于连奎和他的师弟范业林、刘福都被挑选上了。他们的成衣铺一下子抽去3个裁缝，只得关闭了。一天下午，他们自带行李来到阿城车站集合，800来个劳工差不多聚齐了。他们坐一辆闷罐车到了平房车站，被日本人押到劳工棚。这里是劳工村，没有居民。日本人让于连奎师兄弟三人和从哈尔滨市来的孙北海组成一个服装部，从事服装裁剪修补工作。他们的车间是两间草房，一间是服装裁缝部，一间是修鞋部。工头是王彦飞。

裁缝铺里堆放着发霉的破旧衣物。这都是逃跑和死亡的劳工留下来的。这些破旧衣服经过缝补后，再给劳工穿。于连奎他们接活后，每天改裁这堆破旧衣服，也接受新收来的破衣服。工藤命令王彦飞从工棚里收被褥、衣服、鞋帽。收上来的破衣物有土布、有更生布，什么颜色都有。没有人拆洗，简单消毒后就重新改装。于连奎他们东拼西凑把窟窿补上就行了。修补好的衣服各式各样，长短不齐，大小不一。破旧棉活只好对付去做，擀毡的棉花撕不开，就死板板的絮进去。就是这样的破衣物，劳工也有分不到的。那些得到衣服的平时舍不得穿，干活时光着膀子，只是在冷天和下雨天才穿上挡风遮寒。

第六节　劳工生活

进入 731 部队的劳工，没有人身自由，挨打挨骂是经常的事。劳务班的班长工藤及其手下的关冈、秋叶、青木、西尾、安秀等日本人采用各种手段处罚劳工。给劳工制定了重重清规戒律，劳工稍有不慎，触犯律条，轻则体罚，重则放出狼狗撕咬，直至摧残至死。劳工在 731 部队每天要过“五关”。

第一关是朝礼关。每天天刚亮，劳工听到日本人的集合哨后，都必须去工棚外集合，附近在家食宿的劳工也要准时赶来排队。迟到者就会受到体罚。劳工们立正排队后，全体脱帽，由日本监工点名，然后劳工们跟随日本监工，面向日本国方向鞠躬，表示效忠日本天皇。接着，用日语背诵“国民训”。在朝礼时，劳工动作跟不上去，就会遭受毒打。1942 年的一天，有个叫李昶的劳工，年纪大，驼背，腿脚有毛病，不能挺胸站立。日本监工贞田恶狠很地把他从队伍里拽出来，拳打脚踢，还不罢休，又用铁棍子猛击他的头部，打得李昶鲜血流淌，又放出狼狗来撕咬。其他的日本人站在旁边观看狂笑。李昶身受重伤，被抬回工棚，不治身亡。正黄旗三屯的张作礼说，1943 年，他在 731 部队动力班烧锅炉。一天下班后，他忘记了脱帽子，被贞田发现后，抡起枪把子朝他的胯骨打，打得他胯骨疼痛难忍，好几天下不了炕。

劳工黄国君回忆说：“我的耳朵怕冻，天一冷就得戴棉帽子。这个毛病是在 731 部队做劳工朝拜时落下的。那时，日本监工让我们每天都去东乡神社朝拜。在严寒的冬季，气温降到零下 35 摄氏度，朝拜的劳工必须脱帽，默祷 15 分钟。耳朵冻了，也不让戴帽子，就这样落下了毛病。”

第二关是门岗关。731 部队营区有 5 个大门，都由日本人设岗哨昼夜把守。南门是为日本人开的，西门日夜上锁。规定劳工从两个东门和北门通行。劳工们在规定的时间，集中上下班。路过门岗时，劳工们手持“劳工卡片”通行，日本哨兵逐一登记劳工的上下班时间。接着是搜身。后来劳工上下班改用“劳工证明书”，证明书上贴有劳工的照片，盖有钢印，注有劳工的身份及劳动地点。检查更为严格，有时让劳工脱衣检查。在隆冬

季节也是如此。

冬天，那些自己带饭的劳工在冰天雪地里干活，吃不上热饭菜。有一天，正黄旗二屯的劳工刘晓虎带了一盒火柴，被日本门岗查出。结果，他被痛打一顿，几天上不了班。

有个姓王的外地劳工，家贫，冬季还穿着破旧单衣。他捡了条水泥袋子包裹在膝盖和脚上。日本人发现后，说他是盗窃军用物品，把他打了一顿，还关了 7 天禁闭。正黄旗二屯的穆业举，他一家 5 口全靠他养活。1940 年，他被派了劳工，没钱雇人，只得自己去干。工棚被外地劳工住满了。穆业举来回通勤。为了让他干活，家里省吃俭用，给他带橡子面和玉米面窝窝头。冬天，穆业举还穿着夹衣服上班。他拣了几条水泥袋子包裹在身上御寒。下班时，日本岗哨说他偷东西，扒掉水泥袋子，痛打了他一顿。

路过门岗时，劳工们必须向日本人鞠躬行礼。一天，新来的劳工张作礼忘记了行礼，结果被贞田打了一顿。

劳工们编了一个顺口溜来形容上下班的情景。

卫兵所是鬼门关，阎王贞田把岗站；

搜身检查还验证，挨打受骂家常饭；

人间地狱鬼子设，过关还比上天难。

第三关是监视关。731 部队分内营和外营。内营包括本部大楼、四方楼及特设监狱，即 731 部队的细菌研究、生产、部门。外营是 731 部队的生活区域。内营管理严密，筑城墙架电网，岗哨林立。

从事一般劳动的中国劳工只能在规定的地点干活，给 731 部队做秘密工程的劳工，很少有生还的希望。日本人在劳工中实施“10 人联保制”，1 人出事，其余 9 人都受到连累。劳工们在劳动时，有日本监工监视，有时日本监工脱离岗位，劳工们才有片刻的自由。

第四关是监禁关。731 部队的劳务班大院里，有一个专门关押劳工的“巴篱子”，劳工们称这里是“刑衙”。里面有各种刑具。731 部队把不少劳工抓在这里拷打审问。白武斌说，日本人强迫佟玉臣做了一个“匣床”。这种“匣床”是案台式的，离地面半米高，床面长 2 米，宽 1 米多。内侧各有 2 个皮带扣环，用以捆绑人的胳膊和腿脚，床两头各有一个 30 厘米的木匣子，床分上下两扇，一侧镶着折页，一侧安有两个铁扣卡，

用以卡住受刑人的头部。有一天，白武斌和佟玉臣去“刑衙”修门窗，看见了日本人正用这种“匣床”给中国人上刑，惨不忍睹。佟玉臣看见日本人用自己做的刑具给中国人上刑，痛悔不已。不久，他就逃离了731部队。

1945年7月，正黄旗四屯的方振生得了伤寒病，日本人给他放了7天假。他休了两个星期病也没好。这时，731部队正加紧进行细菌生产，催他去上工。他因病上不了班，日本人就以“泡蘑菇”为由，把他抓进了“刑衙”。里面关押着10来个劳工，大小便都在室内，臭气熏天。不几天，食堂伙夫穆芳来送饭，告诉他们说日本人快要垮台了，并砸开窗户，帮助他们逃跑了。

第五关是生活关。平房本地的劳工生活够苦了，外地劳工的生活更苦。劳工棚四处透风，棚内不能御寒，劳工们挨冻难忍。工棚盖在臭水沟旁边，臭水沟里流淌着细菌生产排放的污水，严重污染了居住环境。白武斌说，731部队建立初期，从东北各地抓来不少劳工，他们大部分住在潮湿的席子工棚里，少数住在村民留下的草房里，不少人得了关节炎。食堂伙食差。每个劳工每天发给3个玉米面、高粱面、橡子面混合制成的窝窝头，菜是清水炖土豆、白菜汤、酸黄瓜。劳工们吃不饱，经常到垃圾堆里拣食物吃。春、夏、秋三季劳工们穿一套旧单衣，冬天穿一套补丁摞补丁的破旧棉衣，甚至有穿单衣服过冬的。

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的退休工人董玉发说，当时，731部队对外地劳工特别狠。那些外地劳工每天从日出干到日落，吃三合面窝窝头，还不管饱。住的是夏不遮雨，冬不御寒的席棚。有病不给治。他们中间经常发生死人的事。刚开始，劳工死了，日本人还用薄板给钉口棺材。后来，劳工死得多了，就用席子一卷抬出去，有的还有一口气，也给活埋了。再后来，日本人把死去的劳工的衣服扒下来，留给活着的劳工穿。埋劳工的坟一个挨一个，没地方挖新坟了，日本人就派人挖一个大坑，里面埋好几个劳工。最后，连挖坑的地方都没有了，就把尸体扔在荒郊野外。

日本人不管劳工的死活，劳工有病不给治疗。1939年，新五屯有个外号叫王大个子的劳工，在731部队动力班烧锅炉，他患了肠梗阻，疼痛难忍。日本人不给治疗，致使他死亡。中国劳工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因冻饿疾病而死的不计其数。据不完全统计，

731 部队在中国强征劳工 5 000 多人，除本地的 2 000 多个劳工外，其余 3 000 多个外地劳工大多数都死在了平房，尸体掩埋在正黄旗五屯北边的劳工坟里。劳工坟面积达 1 万多平方米，掩埋着数千个冤魂。劳工们死后，衣服被扒光，给后招来的劳工穿。

第七节 劳工被当作“实验材料”

731 部队的劳工中都知道，那些外地劳工被抽去修筑秘密工程，待工程竣工后，他们中间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充当细菌“实验材料”。在 731 部队中，经常有劳工莫名其妙地失踪，这部分人中大多数也成为细菌实验的牺牲品。

1938 年下半年，一天下午，从阿城等地来的 30 多个劳工被日本士兵押送到 731 部队营区北大门。劳务班长工藤只留下几个木工修理门窗。其余 20 多人都被带走了。他们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谁也不知道。第二天，一伙日本兵闯进劳工棚，把那 20 来个劳工的行李、衣物装上汽车拉走了。

1939 年，731 部队平房地区的工程基本竣工了，转入内部装修和地下秘密工程的建筑。几年间，劳工们走死逃亡，所剩无几。此时，731 部队正准备大规模地进行细菌研究和细菌生产。该部队又从石桥、海城、锦州等地强征来一批劳工，修建内部工程。这一年，连续发生劳工失踪现象。食堂伙夫付景岐讲了这样一件事，他说：“正黄旗的住户被撵走后的第二年 (1939 年)，劳工村又来了 1 000 多个劳工。村民留下来的草房里和新搭建的席棚子里都住满了劳工。劳务班的总务主任关冈从本地劳工中挑了 10 个人去劳工食堂做饭，我也被分配去做饭。一天早晨，关冈通知伙房每天准备另外 300 人的 3 顿饭菜装进桶里，等他派人来取。当天来了一辆马车拉饭菜。车老板我认识，他叫刘仁吉，是从正黄旗四屯征用的当地劳工。刘仁吉回来送饭桶时，我问他把饭菜送到哪里去了？他回答说送到四方楼东北的一个脚门口。到地方后，由 4 个日本人把饭菜抬进里面去了。里面的人吃完饭后，由日本人把空饭桶送出来。后来，我从劳工大队长王庆久那里打听到，有 300 多个劳工在四方楼地下修筑工程。他们是从石桥、海城、锦州等地新招来的劳工。

这批劳工被隔离了，晚上也不让回工棚睡觉，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他们的行李还在劳工村的工棚里。到了夏天，关冈通知伙房另做 200 个人的饭菜就行了。我暗想，那 100 多人到哪里去了呢？一天，刘仁吉来取晚上的饭菜时，他见没人，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他说：'我把午饭送到指定地点后，在车上等候接空饭桶，突然，从不远处传来老乡的喊声。透过铁丝网往南看，那人从露天厕所里探出头来对我说，昨天晚上有 100 多个劳工被日本人提到四方楼里去了，今天早上没见他们回来。那人想告诉我他的家庭住址，托我给他母亲捎个信，话没说完，那送饭的 4 个日本人来了，那人退回了厕所。'到了秋天，关冈通知伙房说，不用另准备饭菜了。那 300 人又神秘失踪了。我想，他们一定被 731 部队害了。为了摸清情况，那天下午，我抽空去了劳工棚，看见日本人派劳工收拾那些失踪劳工的行李，送往劳工服装修理部。"

日本垮台后，曾在 731 部队劳务班监工的一个队员供认，因为怕修筑四方楼地下工程的劳工泄密，就把他们送进特设监狱，充当了"实验材料。"

劳工刘广才差点被日本人用作"实验材料"。他是辽南人，1941 年 3 月 28 日早晨，在锦州街头被日本宪兵圈街时抓住，押送到 731 部队平房站。他们被押在石井部队营区西北的一个房子里。没过几天，日本人用汽车拉走 30 来个人，一去不复返。隔了 10 多天，日本人又拉走 30 多人，也是音信全无。6 月 9 日晚，刘广才趁日本人不在，逃到劳工村的一个有熟人的工棚里。他说，日本人把劳工押到四方楼去了，听说他们被抽血后，都被鬼子杀了，咱们快逃吧。话没说完，一个日本兵闯进来。劳工们一拥而上，把那个日本兵勒死了。趁天黑逃跑了。

辽宁省黑山镇的吕万山回忆说："我出生在辽宁省黑山镇安乡东边壕村。1940 年那年我 28 岁，因家境贫困，到黑龙江省谋生。凭我的木工手艺，在哈尔滨一个日本人办的建设株氏会社找到了活干。日本头目铃木茂负责铃木组的基建工作。他是日本千叶县人，来中国后，专门给日本军队搞建筑。1945 年 2 月，我被骗到 731 部队做劳工，和我一同去的有 7 个木匠，其中有一个人是哈尔滨市的刁乃东，我们是朋友。我们住在劳工村，管我们的日本人是劳务班长工藤。木匠刁乃东体弱多病，又吃不饱，穿不暖，不能正常上班。工藤说他是'八路军探子'，把他投入劳务班的拘留所，毒打拷问。后又

秘密押进四方楼。日本垮台后，我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得知他死在了731部队。”①

第十章　反抗斗争

第一节　抗联的活动与中马城暴动

据原抗联第三军侦察员张林回忆，1933年农历5月，抗联第三军首长决定组织抗联小分队在端午节去攻打背荫河的中马城。由于抗联小分队对地形不熟，带路人带错了路，被中马城的哨兵发现，未能攻城。抗联部队转到五常堡后，部队首长商定，先派人侦察，待摸清情况后，再攻打中马城。侦察任务交给了张林。

1934年4月，张林动身去中马城侦察。张林得知有个叫刘国会的伙夫为日本人收买，认日本人为干爹，给日本人采购货物，当密探。张林想利用这个人为突破口，打进中马城。他通过熟人，以找活干的名义，来到刘国会家。张林尽力与刘国会一家交往，认刘国会的母亲为干妈，和他妹妹也混熟了。平日，刘国会不回家，张林始终找不到机会进中马城。有一天，刘国会的妹妹去中马城找他哥哥办事。张林跟了进去。日本守备队对张林产生了怀疑，开始盘问张林。刘国会的妹妹一口咬定张林是她的表兄，是来找活干的。刘国会听信他妹妹的话，也向他的干爹中马大尉打保票说张林不是密探。张林顺利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归队后，张林向赵尚志军长作了汇报。抗联再次派部队袭击中马城。因中马城戒备森严，攻城行动没有实现。

抗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冯仲云在《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史》回忆录中，记述了中马城越狱暴动的事件。这次暴动是老李和王子扬组织领导的，有30多名难友参加了暴动，其中20人死在暴动现场，12人逃出了虎口，他们都参加了抗联第三军。

抗联的袭击和监狱的暴动迫使731部队向平房地区转移（暴动过程详见本书前文“中

---

① 韩晓、辛培林：《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马城秘密的暴露与迁移”）。

第二节　侦察细菌基地

1936年夏天，东北国际情报组领导庄克仁在哈尔滨道里中央大街的一个僻静处，与中共哈尔滨特委负责军委工作的王东周接头。王东周是庄克仁的前任。庄克仁从苏联学习回来接替了王东周的工作。这次接头的任务是，中共哈尔滨特委得到情报：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南郊平房一带建立一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特种部队。王东周委托庄克仁组织人员侦察，探明这支部队的规模、性质和任务。

庄克仁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的部下地下情报员史顺臣、赵忠博和敬恩瑞。他们多次聚会商议打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办法。敬恩瑞知道有个铃木组正在平房地区承包建筑工程，他熟悉的一个外号叫“摩托王”的中国人经常驾驶摩托车送铃木去建筑工地。他们听“摩托王”说，平房的日军还叫“石井部队”。他们商定找机会去“石井部队”当劳工，趁机侦察。夏天，史顺臣他们3人到平房附近村屯打短工锄地。铲完二遍地的时候，石井部队来村里招劳工，他们3人经过那家大户掌柜的推荐，进入石井部队建筑工地，当马车装卸工。他们跟马车装卸沙子、石头、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跑遍了各个工地。从日本监工、翻译、劳工的言谈中，他们判断这支部队与细菌有关。他们返回哈尔滨后，凭记忆绘制了石井部队的建筑分布图。

731部队把嫌疑人员以各种最残酷的手段折磨致死。1941年秋季的一天，劳工韩行岩跟随汽车去运木材。汽车行驶到石井班跟前时，日本监工命令乘车的劳工全部趴下，不允许向四下看。韩行岩趴下时顺势扫了一眼，看见石井班的狼狗圈里的木桩子上捆绑着一个人。一群狼狗扑上去撕咬。那个人被咬得血淋淋的。卸完木材返回石井班狼狗圈时，那群狼狗正在啃人骨头。趁日本监工不在，韩行岩向日本司机山田打听被狼狗吃掉的是什么人？山田同情中国劳工，厌恶731部队。他告诉韩行岩说，那个人昨天在营区外窥探，被哨兵发现。他逃跑后，被汽车追上抓了回来。日本宪兵说他是探子。

原731部队判任官斋藤回忆了他在731部队时亲身经历的两件事：1942年的一天，731部队准备进行一次军事行动。斋藤担任警戒。他在动力班厂房顶盖的了望哨上，用望远镜看见一个人在日本军用火车上查看物品。他通知日本宪兵去抓捕那个人。不一会儿，日本宪兵就抓住了那个人，押送到北门卫兵所审问。那个人始终不肯招供。气急败坏的日本宪兵，就把那个人押到一个露天的厕所审问，不招供，就往那个人嘴里灌粪汤。那个人宁死不屈。最后被用粪汤灌死了。日本宪兵说，那人是个顽固的抗日分子。

第二件事是：1944年冬季的一天，731部队从四方楼附近逮捕了5个行动可疑的人。经审问，他们说是劳工，可是说不出在哪干活。日本宪兵用烧红的炉钩子往那几个人的头上刨，活生生地刨死两个人。又用鞭子抽打另外3个人，他们也被日本宪兵活活打死了。[①]

第三节　安达打靶场事件

1943年冬，731部队在安达打靶场进行鼠疫菌传播实验。日本士兵把押解来的“实验材料”绑在柱子上，然后撤退到300米以外的安全地带。忽然有一个人挣脱了绳索，紧接着，相互松绑，四处逃散。日军指挥官下令驾驶汽车用机枪扫射追杀。他们残忍地把这30个人全部杀害了。返回平房时，他们发现少了一具尸体，又开车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安达打靶场附近的鞠家窑村的村民都知道这件事。老户关占和说，那年（1943年）冬天，鞠家窑村忽然戒严了。村民们看见几辆731部队的军车向安达打靶场驶去。不一会，汽车停在打靶场门口，从车上下来不少人，看不清是干什么的。上午10点钟左右，来了一架飞机，没有投弹就飞走了。紧接着靶场那边枪声大作，好几辆汽车到处穿梭，好长时间才散去。

① 韩晓、辛培林：《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第二年春天，关占和去草地放羊，发现了一具带枪伤的尸体。据分析，这具尸体就是那次实验后，731部队收尸时没有找到的尸体。虽然30名“受实验者”进行了殊死的反抗，但在没有遮拦的大草原上，无一人幸免。

第四节　狱中斗争

在731部队监狱里关押着中共党员、抗联战士、爱国志士、苏联红军战士，他们采用各种方法与敌人进行斗争。在秘密相互隔绝的坚固的各个牢房里，“有一件特别班班员百思不解的怪事，那就是各单人牢房之间保持联系的通讯输送网。”[①]狱中的“受实验者”彼此都了解情况，当一个人新入狱后，其他牢房里的人就知道这个人的姓名及被捕经过。监狱里的斗争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据《日军731部队罪恶史》书中介绍：“在押的牡丹江铁路员工孙朝山、木工吴殿兴、修理工朱之盈、大连的钟民慈和奉天的爱国者王瑛之所以能够留下姓名，就是因为他们是进行绝食斗争的带头人。他们的行动就是在监狱里的某些人的引导下进行的。”[②]地下党员崔得恩，不惧严刑拷打，保守党的秘密。731部队对他进行了多次细菌实验，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可是他始终没有变节，最后被杀害。森村诚一在《食人魔窟》中写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有个新入狱的“马路大”，牢房里的人很快知道了这个人的基本情况。没过几天，日本人选用这个“马路大”进行人体实验时，狱中被关押的人全体绝食。还有一件事，731部队为了搞细菌实验，在给监狱做的糖包里掺了伤寒菌，结果大家都不吃。731部队的队员猜想，监狱里的“马路大”可能知道了饭食里面有细菌，否则他们的行动是不能理解的。也曾发生过各牢房之间传送物品的事。推测可能是从牢房里的换气筒传递的。

731部队平房特设监狱曾发生过暴动事件。1945年夏天，目黑邀请海拉尔支队的军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97页，群众出版社，1984年。

② 韩晓、辛培林：《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第27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需官崛田到他那个实验室去做客。崛田耽误了一些时候，后来走到他那里时，忽然看到目黑“非常惊慌并有点气愤的样子。崛田说，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时，他解释说监狱内的犯人进行过抵抗。我经过第三层楼房走进监狱里去。当时我是第一次到监狱里去观察。房顶上有两个人手持步枪，从上面看守监狱。监狱门口站立有四、五个人，也是手持步枪。所有这两个人以及四、五个人的小队，都是特务队人员。但当我走到那里的时候，监狱内已是平安无事了。过两三天后，目黑告诉我说，有一个受实验的人大闹过一顿，用门环打了实验员一下。这个被拘禁的人打了实验他的那个工作员之后，就从囚室里钻出来沿着走廊跑去，他抢去了钥匙，开开了好几间囚室。有一部分被拘禁的人钻出来，但这只是一些勇敢分子，并且这些勇敢分子都被枪毙了。”[①] 崛田的供词证明特设监狱发生过暴动。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对崛田的供词进行过考证，他采访过参加过镇压造反，目睹了现场情景的原部队队员，了解了这次暴动事件的详细情况。他在《食人魔窟》中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1945年6月上旬某天上午，特设监狱7栋的一间单人牢房里关押着2个苏联“木头”。其中一个人佯装身体不舒服，另一个人招呼看守。在7栋巡查的特别班班员去那间牢房查问，他发现有个苏联“木头”躺在地板上，发出呻吟的声音，另一个人守在他身边。这种场面对于特别班班员已经司空见惯了，那个特别班班员毫不介意地打开了房门。这时，那个病“木头”猛地跳起向那个看守扑上去，另一个“木头”也上来揪住那个看守。那个看守的印堂部位狠狠地挨了一铁锁（手铐的锁），这两个“木头”已经把手铐打开，两个苏联“木头”趁那个看守昏迷之际抢走了牢房钥匙。瞬间，那个看守清醒过来跑到走廊和楼梯隔开的铁门那里，钻出铁门，上了门闩。这样一来，第一道关口——牢房门打开了，但第二道关口——连接走廊和楼梯的铁门是通不过的。紧接着，那个看守按了警报器，去跑到特别班办公室报告发生暴动的事。与此同时，那两个苏联“木头”打开了各单人牢房的铁门，催促囚犯们逃跑，一些“木头”从牢房里跑了出来。731部队经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403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常提取或补充“木头”进行细菌实验，为了方便，特别班使用的是一把能打开所有牢房门的万能钥匙。迅即，731部队派来了增援人员，楼内楼外，围住了特设监狱。他们当场击毙了那个领头的苏联“木头”之后，他们拿来了高压瓦斯瓶，接通胶皮管。一个手拿胶皮管子喷嘴的戴着防毒面具的队员从他们竖立的高大的梯子爬到7栋楼房的最高层，接通特设监狱的换气筒，打开瓦斯阀门，速效毒瓦斯通过换气筒从7栋二楼的各单人牢房的通风孔涌了进去，仅仅几分钟，监禁在7号监狱的“木头”都死去了。[①]

第五节　“火球”事件

1939年，731部队平房军事城镇建成后，平房镇外围发生了“火球”事件。日本军方认为，这是地下抗日工作者为侦察731部队的情况而发射的联络信号弹。于是731部队宪兵室立即组织人力，准备侦破“火球”事件。731部队宪兵室在中国劳工头目中物色并秘密发展一批特工联络员，成立协同防谍班，简称协防班，由日本宪兵室的春日中一牵头办理。为日本人当翻译的李初亭担任防谍班总班长。

1940～1945年，在731部队外围发生了10多次“火球”事件，日本宪兵室和协防班曾多次侦察，但始终没有抓到施放“火球”的人。曾在731部队当劳工小队长的协防班成员文立帮回忆:“我们劳工小队长都是协防班成员，经常在一起谈论有关火球事件。发生信号弹事件后，宪兵队的日本翻译官春日担心破不了案，不敢向哈尔滨宪兵队队长731部队长报告，竭力想捕获肇事者。他组织日本宪兵队队员和协防班成员，白天在各村屯设卡堵截，夜晚在‘火球’多发地蹲坑，都一无所获。731部队长问起火球事件时，春日敷衍说是坟茔地里的‘鬼火’。可是731部队长知道这是地下抗日工作者发射的信号弹，命令春日破案，否则将受军法处置。命令刚下达不几天，又在老五屯和新五屯之间发射了一颗‘火球’。春日立即带人赶到发射地点。他担心交不了差，就转到劳工村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群众出版社，1984年。

去搜查。他们查到一个叫李放文的老头，这个人没有劳工证明书，也没有临时居住证明书。春日让日本宪兵逮捕了他。经审讯得知老头是来劳工棚探望儿子的。还有一个老人也是来看望儿子的，也没有证件。春日就拿他们两个当嫌疑犯，怕找不到证据，审不出结果来，就让日本宪兵把这两个人打死了。回 731 部队向部队长谎报说，做案人拒捕，被当场击毙了。”

自此后，很长时间没有发生“火球”事件。春日为了加强防范，继续组织协防班员在各村屯站岗放哨，把守路口，盘查过路人员。有一天，有个协防班员查出一个过路的朝鲜人没有居住证明书，就以“特嫌”的罪名交给宪兵室，押进了劳务班拘留所。日本宪兵对他进行刑讯逼供，硬是把他打死了。

1943 年夏季的一天晚上，在瓦盆窑、小南沟一带又发射了一颗“火球”，731 部队宪兵室派协防班总班长李初亭带人去搜查。他们出动 6 个人，都穿着日本军装，骑着“富士”牌自行车，李初亭还佩带手枪。当天晚上，他们什么也没搜着。第二天，李初亭他们继续去搜捕。

关于李初亭他们这次的具体搜捕活动情况，731 部队的劳工瓦盆窑屯的老户朱景臣了解事情的经过，他回忆说，瓦盆窑屯离 731 部队本部东北 2.5 公里，位于僻静的丘陵地带。当时这一带经常有人发射信号弹，日本人把瓦盆窑屯当作重点控制区域。白天在与新五屯交叉的路口设立岗哨，晚上经常有日本人或协防班成员来屯里突击检查。1943 年夏季的一天晚上，朱景臣的伯父瓦盆窑屯的屯长朱学孟家的两个长工被李初亭他们抓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李初亭带着 6 个协防班成员在瓦盆窑屯蹲坑，虽说是夏季，天气还是有点凉，李初亭决定去屯长朱学孟家歇歇脚，喝点酒。朱学孟是富户，单独住四合院。平时一到晚上，就把大门插上，生人上门是不给开的。李初亭带着人敲朱学孟家的大门，敲了半天不给开。外边的人说是李翻译来了，朱学孟对长工说，不认识李翻译，还是不给开门，李初亭非常恼火，附近村屯没有人敢得罪他，朱学孟竟敢不给开门。他命令手下砸门。朱学孟没办法，只好把门打开了。朱学孟见李初亭一行人的派头，知道来人不好惹，急忙让伙计端茶递烟，准备酒菜。李初亭不理这个茬，把手枪、手铐子放在桌子上，让朱学孟拿出户口来查看。结果，他发现有两个雇工没有临时居住

证明书。李初亭命令手下把人带回平房警察所拘留室审问。后来，朱学孟花钱托人，才把人放回来。朱景臣说，从那以后，“火球”事件照常发生，日本人和协防班天天出动，可是一无所获。

194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731部队高等官宿舍西侧的何家沟子上空，连续发射了3颗红色信号弹，在东乡村值宿的黄恩东等4个协防班班员和李初亭他们又去出事地点搜查。

黄恩东回忆说，那天晚上，他们在东乡村事务所值宿，半夜时分发现何家沟子上空连续发射了3颗信号弹，春日命令黄恩东他们立即出发。

黄恩东他们四个人骑着自行车，不到10分钟就赶到了出事地点。他们隐藏在沟子旁边的深草丛里，不一会，春日也骑摩托车赶来，他也隐蔽在草丛里。

又过了一会，李初亭带着人也赶到出事地点。李初亭想，信号弹已经发射过了，作案人早就跑了，再蹲在草丛里守株待兔，不可能抓到可疑人。他带人到附近的正黄旗三屯搜查。从村里一家的麦秸垛里，搜出一老一少两个要饭的，押回731部队。结果什么也没审出来，就把人给放了。

第十一章　731部队的覆灭

第一节　731部队官兵生活

731部队是日本天皇的宠儿，自1932年8月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设立以石井四郎为主任的防疫研究室开始，到1941年，731部队迅速发展成辖有4个支队、8个部，人员扩编到3 000人的日本关东军的一支王牌军队。不仅如此，石井四郎还组建了华北、华中、华南的细菌部队，在28个师团里都设立了防疫给水部。这些细菌部队分布在侵华日军的各主要战场，形成庞大的细菌战体系。其归属为所在地的各集团军，而进行细菌战的指挥权都听命于石井四郎。

随着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不断地为731部队增加经费，到1940年，该部队的军费增加到1 000万日元，其中研究事业费500万元，人事费500万元。除此之外，该部队还可以特别得到50 ~ 100万元的“临时机密费”。当时，“军队的最高级将官（从中将到大将）的年薪为8 000 ~ 10 000元，这是根据内阁总理大臣的指示规定的。下级军官的年薪包括战时补贴平均为2 500元，雇员为1 000元，佣人400元。”[①]而731部队的人事费和研究费远远超出了日本其他军队的平均军费。以丰厚的待遇和诱人的研究条件，该部队吸引招纳了大批科研人才，增加了生产细菌的各种设备，成为日本侵华和对苏联防御作战的战略力量。

731部队是日本陆军中首屈一指的美餐部队。这里有一份珍贵的资料，就是原731部队会计部门的一个队员战争结束后带回来的该部队的队员日常伙食菜单一例：

高等官早餐：鸡蛋豆腐、猪肉丁酱汤、烧干鱼、腌山蓟菜、咸梅子等小菜，水果、白米饭、或面包、咖啡。

高等官午餐：汤或桔子汁、扒烧牛肉、炸大虾、猪肉炖牛蒡、小菜、水果、白米饭或面包、冷果、咖啡。

高等官晚餐：啤酒或白酒、金枪鱼生鱼片、蒸猪肉豌豆、豆腐、醋拌萝卜肉丝、小菜、水果、白米饭、甜食、咖啡。

判任官以下早餐：猪肉丁青菜酱汤、醋拌笋、腌山蓟菜、咸梅子等小菜。

判任官以下午餐：猪肉炒花生米、炖猪肉、小菜、水果、白米饭、有时有冷果。

判任官以下晚餐：生乌贼片、葱头炒鸡蛋、古老肉、白米饭、甜食、绿茶。[②]

731部队生产细菌，而细菌也需要肉、蛋类等营养丰富的食品培养，因此，该部队除日常生活供给之外，还能以细菌生产或实验的名义领到大批的肉类、果类、面类及各种蔬菜。

731部队东乡村文化、体育、娱乐场所俱全，该部队上层人物决定，每星期五晚上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203页，群众出版社，1984年。

②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152、153页，群众出版社，1984年。

在63号楼放映故事影片，春天举行棒球比赛大会或从内地请来歌舞团进行慰问演出，夏天举行盂兰盆舞和相扑比赛大会，秋天举行运动会或戏剧、音乐会。



外出的队员在哈尔滨大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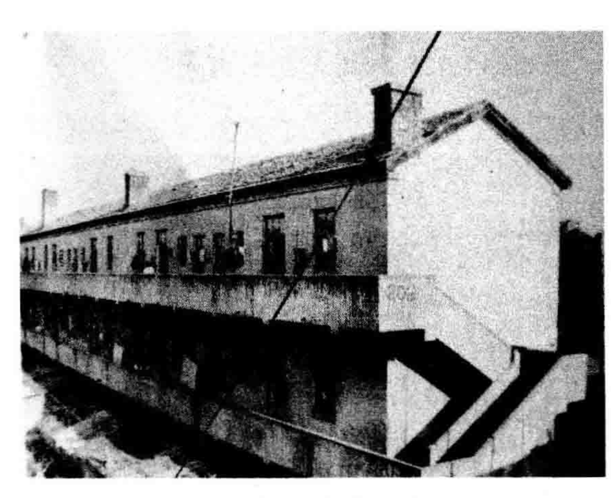
少年队员上“朝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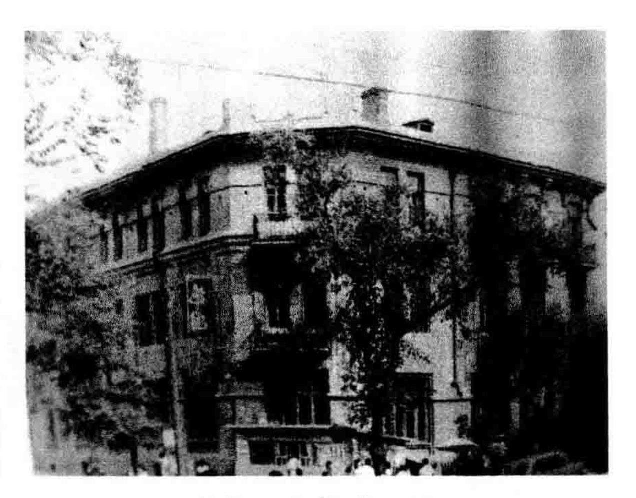
队员越定男



拍演话剧《军神》的演员合影



东乡宿舍旧址之一



宿舍—白桦寮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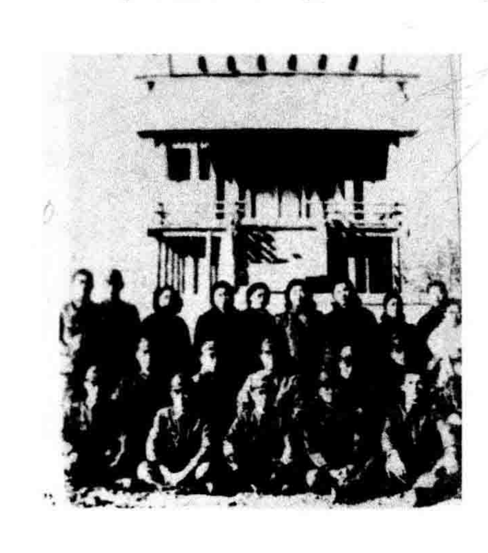
原运输班的队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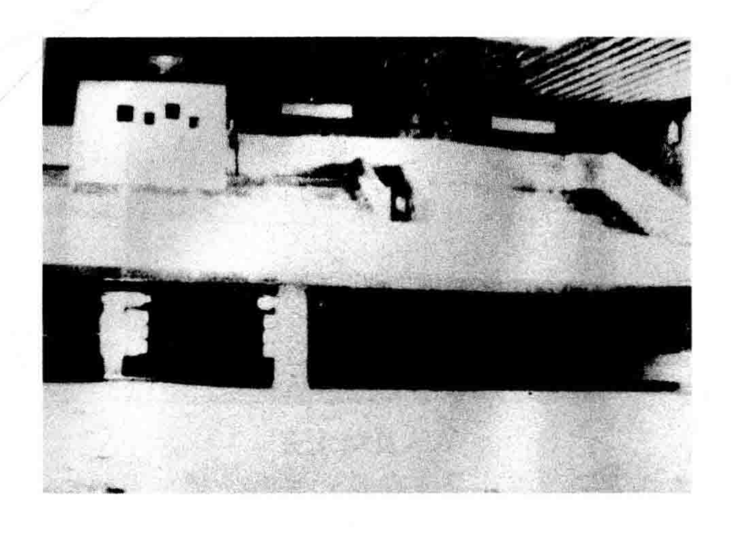
原 731 部队队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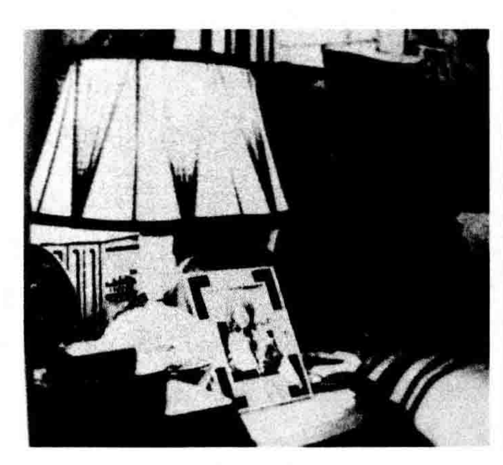
化装成“满洲人”的越定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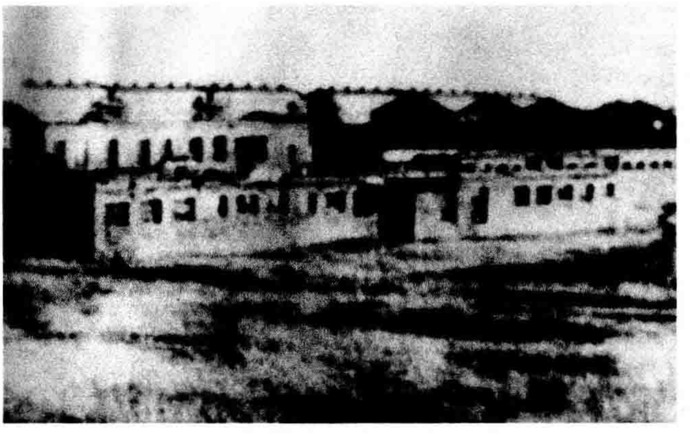
部分队员及女军属在“东乡神社”前



731 部队大礼堂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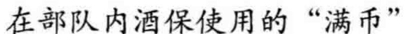


单身队员宿舍



731 部队医院残迹




在部队内酒保使用的“满币”



731 部队使用的图书章

731 部队的巨额机密预算经费，培养了该部队上层人士的腐败作风，石井四郎等人有贪污作弊的嫌疑。他经常到新京（长春）、奉天（沈阳），终日花天酒地，数日不归。他是有名的嫖客，身边常有年轻的艺妓陪伴。在 731 部队，人性蜕变了，他们不仅疯狂地屠杀中国人民，而且对他们同族也毫无人性。部队里强奸女军属的事件屡屡发生，甚至强奸之后，将其杀掉。森村诚一在《食人魔窟》中记述了女文职人员被杀事件。1943 年秋，在高等官宿舍发现了一具女文职人员的尸体。这个女文职人员姓大月，是总务部庶务科的科员。她是个不辞辛劳、很爱劳动，还擅长烹饪和裁剪，善于写字和养花的姑娘。她死在某高等官的宿舍里，死后解剖尸体，已经怀孕了，她是服毒致死的。使她怀孕的那个人，被部队领导调到内地去了，大月在烧“马路大”的火炉中火化了。大月之死是一个例子罢了，在 731 部队有人传说：“石井四郎部队长带头搞不正当行为，也就难怪下边的干部效仿他了”，这是原 731 部队队员的证言。① 同 731 部队有关的特务、宪兵也挥金如土，生活腐化。

731 部队近 3 000 名队员在生活上享受着优惠待遇。可是他们每天都从事细菌生产和实验，处在被细菌感染的危险境地。不少队员反悔、厌烦、恐惧，思乡心切，而又不得不为效忠日本天皇卖命。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细菌生产、实验和细菌战中死于非命。原 731 部队某队员说：“731 部队队员死的相当多……仅就我认识的，就有 30 多人死于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 161 页，群众出版社，1984 年。

鼠疫。”另一个队员说：“一年之内，731 部队队员死亡不下 30 人”，“在原 731 队员中有传言，遗体被解剖的队员和家属，不止二三十人。”①

荻原英夫供认：“石井部队的牺牲者很多。全面情况虽不了解，但据说南岗陆军医院病人中相当多的是石井部队的工作人员。以我身边发生的事例而言，石井在五常从事研究工作期间，以他的故乡千代田村加茂为中心募集并带到五常使用的 20 人中有 2 名死亡（佯称阵亡）；在平房，并未直接参加细菌研究，只是工程建筑的千叶班，约有 60 人，有 1 名死于肠伤寒，名叫谷正男，萩原隆感染肺结核。我所认识的从千叶县招募的 4 名少年队员（今井三郎、石井正敏、土屋某、萩原三雄），其中今井和土屋死于肠伤寒，石井和萩原感染了肺结核。少年队的这 4 人都是在研究班工作的。从这一较小的范围中很难看出全面的统计数字，但如以百分比表示，则在五常工作的牺牲者为 10%，平房 3.3%，少年队为 100%。而据说在五常工作的约 20 人，一部分负责监视用于实验的活人，大部分在炊事班或机车库劳动，如果他们也直接参加研究工作，可能牺牲的数字会和少年队相差无几。”②

731 部队原少年队员中村回忆说：“731 部队一位在第四部（细菌生产部）工作的人员，把染上的鼠疫病，误认为是梅毒性病，因为怕暴露去道外桃花巷逛妓院的丑事，所以不好意思去进行检查和治疗。病重时，当去南栋检查确诊是鼠疫病的时候，病情已到晚期，因无法医治而死掉了。”

731 部队原少年队员鹤田参加过诺门罕战争，他听说，石井部队参战人员有 30 多人病亡，他的班长因患伤寒，病死在海拉尔陆军医院。

731 部队对本部队那些有同情心的人加以处分、甚至杀害。该部队中个别人也有反对法西斯战争的行为。渡边博士成功地研究了霍乱、伤寒等疫苗。他被石井四郎强征到 731 部队。后来农安县发生了鼠疫。石井四郎亲率防疫队员奔赴新京。他连夜催调本部继续增补防疫人员。渡边博士不愿意为虎作伥，在电话里与石井四郎争论，提出辞职。

---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 38 页，群众出版社，1984 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32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在石井四郎的命令下，他不得不连夜来到新京。第二天早晨，他刚走出大和旅馆，就被一辆大卡车轧死。他的死是存在疑问的，渡边博士的助手山内丰纪认为可能是石井四郎杀害的。

石井四郎回家乡招募队员时，青年农民山田和他的姐姐、妹妹一同来到了731部队。姐姐在诊疗部当护士，妹妹在酒店当服务员，山田在劳务班负责管理劳工。山田的妹妹性格温顺，她常常暗地里将一些生活用品卖给劳工们，劳工们也经常和她交谈。山田在管理劳工时，也不像其他日本监工那么凶狠，劳工韩行岩与山田有过交往。一天，韩行岩他们在仓库前的专用线上卸货，站台上堆满了大米、白面、豆油等生活用品。卸货时，有一袋面粉口袋破了，面撒了一地。按规定，劳工们必然挨打受罚。这次是山田监工。劳工们央求山田，把撒了的面让他们吃了吧，山田默许了。劳工们又弄了点豆油，在工棚里烙油饼吃。他们还送给了山田一张油饼。这件事被劳务班长工藤发现了，狠狠地打了山田几记耳光，后来山田和他的姐姐、妹妹都调到新加坡当兵去了。

第二节　覆灭前夜

1945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续战败，使日本大本营感觉到形势不妙。陆军参谋本部企图利用731部队进行细菌战争，做最后的挣扎。同年3月，石井四郎被召回东京，破格参加了陆军本部的参谋会议。这次会议研究了以攻击性强、死亡率高的鼠疫菌为主进行细菌战的问题。会后，石井四郎再度担任731部队长，组织指挥进行细菌战。731部队的秘密番号改为25202。

1945年4月，石井四郎在731部队本部召开支队长会议，研究部署大批捕鼠、繁殖跳蚤工作。他说：“根据日苏必然开战的形势，731部队要尽全力增产细菌、跳蚤和老鼠。”他在会上宣布：“为了挽救太平洋战争的不利，要制造大量细菌武器，8月底要完成大批捕鼠工作，并准备1～2吨跳蚤。”

731部队下达了以“增产300万只老鼠”为目标的命令。他们打着灭鼠除害的旗号，

给各省下达捕鼠任务，强迫居民、学生大规模地捕鼠，一时四起，东北城乡遍地是捕鼠的人流。731 部队组织成立了专业捕鼠队，队员们穿便衣投入捕鼠队伍，他们还把大量的捕鼠器装在卡车上，四处宣传鼓动老百姓参加捕鼠。731 部队各支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捕鼠、养鼠。宿舍、厅堂都改成繁殖老鼠的场所，昼夜增产老鼠。

与此同时，731 部队开始大量地培育跳蚤，不仅在本部生产，各支队也配备了大量生产跳蚤的设备，培养器不够用，他们就用煤油桶进行生产。

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石井四郎在组织生产细菌的同时，也组织成立了鼠疫特别攻击队。据沟渊俊美先生提供："在日本战败前的 1945 年 3 月，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刚重返 731 部队不久，考虑将来一旦关东军撤退，将实行'本土作战'，就准备在敌人（指中国、朝鲜抗日军队）阵地，投撒染鼠疫的跳蚤，于是秘密地组成了一支'夜莺特攻队'。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起初，关东军召集了受特别训练的兵长 60 名；同年 6 月，731 部队又补充了 18 名受特别教育的人员，我以卫生兵的资格也被编入特攻队；同年 5 月 15 日又招募 500 名现役兵作了补充。同时，石井部队长下令柄泽班、田中班，要求他们分别按进度生产出足够数量的鼠疫菌和跳蚤。关东军根据苏军可能于 9 月以后对日宣战的情况，预定夜莺特攻队于 9 月 22 日出征，以做好秘密进行细菌战的准备。可是战势发生了突然地变化，苏军提前于 8 月 9 日进驻中国东北，关东军一败涂地，731 部队的细菌特攻阴谋也就半途而废。"

1945 年 5 月 2 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5 月 8 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与此同时，中国各条战线抗日战争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8 月 9 日，在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统帅下，150 万苏联军队，包括 5 500 辆坦克，5 000 架飞机，许多海军舰艇，苏联红军开始对侵华日军全面进攻。

日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提前发出了 731 部队准备撤退的指令，石井四郎将鼠疫特别攻击队转移到通化。

8 月 9 日那天，石井四郎部队长不在平房镇，据说是指挥向通化转移工作去了。8 月 10 日，关东军司令部给石井四郎发了急电，让他"前来接受命令"。石井四郎不在，代替他去关东军司令部的是某副官。某副官接到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命令是"731 部队

可以视情况随机应变”，实际上是让 731 部队退却逃跑。据说石井四郎于 8 月 10 晚回到平房镇。731 部队召开了部署撤退的会议。据森村诚一的《食人魔窟》记载，石井四郎对 731 部队的撤退提了 5 点意见：一是保守 731 部队的秘密；二是派西俊英向 731 部队各支队传达毁灭证据和全体队员自杀的命令；三是准备命令住在东乡村的 731 部队队员全体家属也自杀；四是全部杀死“马路大”，并炸毁细菌工厂；五是 731 部队全体队员统一撤退到通化。石井四郎的“让支队队员和东乡村军属自杀”的意见遭到了菊池少将等人的强烈反对，最后石井四郎部队长让步，同意队员家属立即开始撤退。会后，石井四郎安排把 731 部队细菌实验积累的各种材料以及菌种带回日本去；安排 731 部队撤退的列车优先通过；安排特别班成员紧急避难。接着，石井四郎下达杀死“马路大”、炸毁细菌工厂的命令。

第三节　731 部队败逃前夕二三事

一、战备防空掩体

731 部队在平房镇盘踞不久，就开始修筑防空洞。正黄旗三屯的文立国回忆，1939 年春天，731 部队在平房特区强征 200 名劳工，给 731 部队挖防空壕。防空壕从刘家窝堡开始，经过正黄旗五屯，到正黄旗头屯，大约 5 公里长。工程规格要求上口宽 5 米、下口宽 4 米、深 4 米。日本监工要求每个劳工每天必须挖土方 10 立方米。劳工们日出而作，日落方归，吃不饱，干重活，不少人都累病了。

正黄旗头屯的金方良说：“我们连续干了 3 年，战壕工程延伸到正黄旗头屯后，日本监工选址在村东头的高岗地，迫使劳工挖一条 3 米高、3 米宽的地下防空洞。洞的侧壁和洞顶用木方支撑。挖洞时，劳工三班倒。为了保密，在洞口盖上苇席子。这项秘密工程到日本垮台时，只掘进 100 米。

1944 年，太平洋战争日本军队吃败仗后，731 部队部分队员和劳工开始在营区挖防空洞。1945 年 3 月，石井四郎回到 731 部队任部队长后，挖防空洞的任务更紧迫了。从

营区到东乡村，到处都是防空壕（洞）。正黄旗四屯的金国忠回忆，1945 年 8 月 9 日晚，我们正在动力班锅炉上夜班，清理炉渣时，731 部队突然发出空袭警报。营区内外实行灯火管制。哈尔滨市上空升起了照明弹。日本监工命令我们钻进防空洞。那些日子阴雨连绵，防空洞里积水 1 尺来深，蚊子成群。日本人也顾不了这些，一听到空袭警报，就往防空洞里钻。日本人还在东乡日本小学的西边，挖了防空洞，经常看到日本军属到里面隐蔽。第一仓库和第二仓库大院里修筑了一个大防空洞，里边能容纳几百人。那些日子，时常响起空袭警报，日本人紧张、忙乱，惶惶不可终日。

正黄旗四屯的车朝义回忆，1945 年 8 月，劳务班抽调了 100 来个劳工在 731 部队专用飞机场的西北角修筑飞机掩体。没过几天，劳工们就听说苏联红军攻打日本军队了，日本人快垮台了。

二、太平洋战争阵亡军官的追悼会

1945 年春天，731 部队派到太平洋战场上的 5 名军官阵亡了，731 部队要在 63 栋楼开追悼会，731 部队的各个班都派代表参加。那天早饭后，曾在 731 部队高等官食堂当伙夫的付景歧也去看热闹。他看见大礼堂舞台上挂着 5 张大照片。他认识其中的中留中佐和田中少佐，其余 3 个人也面熟。石井四郎致悼词，他说，这些参战人员“在大东亚圣战”中立下了战功，并给战死者家属发了抚恤金。这次追悼会后，劳工们知道日本军队吃了败仗。

三、石井四郎的阅兵

那次追悼会后，石井四郎在 63 栋大礼堂门前检阅军队。付景歧目睹了那次阅兵活动，他说，那次阅兵持续了 1 个多小时。731 部队排成方阵，一队一队地从大礼堂门前经过。他感到很奇怪，731 部队从哪里来了这么多兵。看了一会，他看出了破绽，后边的队伍和前边的队伍是一伙人。事后，他听别的劳工说，那些日军队伍在东乡村转了一圈，又回到石井四郎面前。这是石井四郎导演的一幕闹剧，佯装 731 部队队伍壮大。

白武斌经历过一件事，他说：“1945 年 8 月，731 部队队员预感到末日来临，对中国劳工看管得松了。一天，我们去航空班的一个飞机库修房。站在房顶上，向东望去，看见数十架银灰色的战斗机停在停机坪上。731 部队有 11 架战斗机，我们早就知道，怎

么一下子来了那么多飞机？第二天，我们去干活时，发现那个停机坪上只剩下3架飞机了。我们也没听到飞机起飞的声音，那么多飞机一夜之间飞到哪儿去了？日本投降后，我们几个劳工到离731部队不远的日本空军8372部队的仓库里拣东西，发现了有数十架飞机模型，被分解得七零八碎，堆了一大堆。我们这才明白，上次我们看见的停机坪上的几十架银灰色的战斗机原来是模型。石井四郎摆在那里，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

第四节　毁灭证据

1945年8月，731部队官兵都知道日本无条件投降已成定局，他们形成了内紧外松的状态。劳工裴富等人证实，在劳动现场，日本监工一反常态，不再那么凶狠了。他们躺在地上唉声叹气，言语中流露出日本军队即将垮台的消息，对劳工的管理放松了。731部队各班的队员都紧张忙碌起来，他们都在毁灭证据。

那些日子，731部队的队员都在清理文件、资料，把这些资料打成捆，装入箱子里，用马车或汽车运到动力班的锅炉房，统一销毁处理，连装细菌的玻璃瓶、试管、显微镜以及各种仪器都投进锅炉烧掉了。

在动力班当杂工的韩建国说，1945年8月初的一天夜里，他在锅炉房干活，看见开来一辆装满货物的汽车，停在锅炉房前。从汽车上下来6个日本人，他们命令劳工躲远点。然后，一个尉官指挥日本士兵把车上的纸捆和各种规格的木箱子搬下来，投进锅炉，烧成灰烬。还有一次，日本人让韩建国他们帮忙烧纸捆，只是不让他们扛东西，在日本人的监视下，让他们在锅炉底下收拾纸灰，把那些没有烧净的纸张划拉成堆，继续焚烧。韩建国看见日本人烧的全是带字的纸张。他还说，日本人烧的东西太多了，两台锅炉烧不过来，又开动了一台平时不使用的锅炉，专门烧各种仪器和玻璃瓶子等。日本人连续烧了10来天。

平房特别军事区正黄旗四屯的苏海祥，曾在731部队动力班服劳役。他说，1945年8月的一天，他看见日本人用汽车从四方楼往动力班运东西，这天运了10来趟。日

本人把一包包文件，一箱箱仪器投入锅炉焚烧，一连烧了好几天。苏海洋清理炉灰时发现烧变形的铁器和玻璃。除了在锅炉房烧东西外，四方楼院内，各个班门口也在焚烧东西。

劳工金国忠说，每年夏天动力班就启动 1 台锅炉，其余 2 台锅炉检修。多余的劳工都到别的班干活去了。1945 年 8 月，动力班的劳工全都调回来，推煤，清理炉灰。3 台锅炉全部启动了。日本人把秘密的东西全部烧掉了。

乔世兴、李启余、王子余他们看见兵器班的院子里，百余台“福特”牌大卡车被烈火吞噬着，成箱的子弹爆炸了，后来有个劳工从那里拣了几个子弹头。东乡村宿舍、大礼堂、神社，日本医院也燃起了大火。高等官宿舍西侧的地下燃气罐爆炸了，四方楼也塌了一大片。

正黄旗三屯的潘义明说，1945 年 8 月 11 日，他去动力班上夜班，看见炼人炉南边的那 3 个麦秸垛着火了。他担心日本人对劳工下毒手，连夜逃回家。8 月 12 日早晨，侯安钦、李启余来找潘义明。他们相约去 731 部队探听情况。他们刚穿过头屯往劳务班走，忽然一声巨响，四方楼塌了。侯安钦鼓动他们去看热闹，顺便拣点生活用品。他们走到营区北门，顺着铁路专用线往日本医院走。当走到石井班西侧时，看见四方楼、兵器班、动物舍都在燃烧。他们没敢进营区，也没心思拣东西。转身回家，他们看见东乡村里一片火海。他们刚跨过何家沟河，忽然听到一声巨响，营区西边的油库爆炸了，顿时浓烟滚滚。幸亏他们没去营区，不然，他们早就没命了。

黄家窝堡的关文明说，1945 年 8 月，日本监工领着他们八木班的劳工去 731 部队附近农民的苞米地里掐“乌米”，一共装了好几马车，都运到八木班的磨房大院里，用囤子装起来。没过几天，他又准备去掐“乌米”，可是日本监工不管事了。那几垛“乌米”化成了灰烬。8 月 11 日夜，侯安钦也看见了“乌米”垛起火了。

石井班的劳工王清义说，1945 年 8 月 12 日，石井三男命令中国劳工集合，可是石井班的大部分劳工都逃跑了，只剩下 8 个上夜班的饲养员。石井三男把 8 个人分成 4 个组，每个组都有 1 个日本人带着，向各组发了一小桶汽油，让他们把沾有汽油的线团扔进动物舍，然后点燃。顿时，动物舍火光四起，各种动物丧身火海。

日军独立混成 131 旅团 79 大队中尉大队长千田谦三郎供认，1945 年 8 月 13 日，

在哈尔滨市旅团司令部召开了专门研究炸毁平房细菌工厂的会议。会议由旅团长宇部少将主持召开。当时，旅团参谋、高级副官、各大队长都参加了会议。他说：“参加会议的有：旅团长宇部少将、参谋谷村五郎中佐、高级副官山下大尉、炮兵大队长椎名大尉、突击大队长某大尉、工兵大队长石原大尉、通信大队长曾田中尉、辎重大队长某大尉、步兵 79 大队长千田中尉（我自己）、步兵 80 大队长石井大尉、步兵 81 大队长某大尉、步兵 82 大队长某大尉。”宇部少将口头传达命令的要点是：“根据情报。苏联军队已突破了牡丹江，在阿城附近已有伞兵降落。旅团准备在哈尔滨市内巷战，各大队各就各位。工兵部队要立即炸毁石井部队在平房的全部房舍。会后，石原工兵大队长直接指挥部下，于 13、14 两日，把平房的全部建筑炸毁。这完全是为了消灭细菌部队的罪证干出来的。我在哈尔滨市内也听到了爆炸声。”[①]

当时，破坏建筑物，特别是用特殊钢材和将近 50 厘米厚的钢筋水泥结构的特设监狱是不容易的，石原工兵大队长指挥工兵及 731 部队的队员在这些坚固建筑物的地板、楼梯下挖深坑，在多处装置炸药进行爆破。

根据劳工的证词和 731 部队队员的供词及回忆，关于炸毁平房建筑物的时间无法确切地表述，许多劳工说是在 8 月 10 号左右炸毁了平房的主要建筑物。秋山浩在《731 细菌部队》一书中详细描述了炸毁特设监狱的具体过程，他说，在工兵到来之前，731 部队的队员试图炸毁监狱，但徒劳无功。工兵到来之后，于 8 月 10 日上午 9 点，“随着震撼早晨大气爆炸声，火焰高高地冲入了天空，墙壁的瓦砾一齐飞进到四方形的正厅的屋顶上。从昨天的惨剧（指屠杀‘马路大’）前留下的痕迹，被破坏得无影无踪了。”[②] 而千田谦三郎的供词中说，石原的工兵大队于 8 月 13、14 两日炸毁平房的主要建筑物。

---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151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日〕秋山浩：《七三一细菌部队》，第 123 页，群众出版社，北京编译社译，1982 年。

第五节　杀人灭口

一、屠杀“马路大”

731部队撤退前，特设监狱里究竟关押着多少人?1945年8月10日左右，731部队用毒瓦斯究竟杀死多少人？众说纷纭，无法一一考证，主要说法有以下几种：

森村诚一说：“到8月10日为止，被关押的‘原材料’剩下的已不到40人。”[①]

731部队本部司机铃木进证言：“（1945年8月10日左右），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部队，来了一群工兵队，那群士兵用毒气把犯人全部处死了，大约有80人左右。在第7栋和第8栋里。”[②]铃木进没有亲眼见到屠杀这些人，派他开汽车去松花江扔烧后的尸体时，他在731部队营区见过80多具尸体残骸，但他不清楚这些尸体是不是被杀害的“马路大”的全部尸体。

王一汀编著的《白衣恶魔》一书中记载:“最重要的是首先处理掉‘马路大’。当时，监狱里还押着430人，焚尸炉不可能一下子烧掉这么多人。于是，他们便在监狱的外面挖了一个深坑，然后开动了通往各牢房的毒气开关，窒息性毒气立刻弥漫了整个牢房，大多数‘马路大’都在窒息中死亡，部分没有死的都用手枪击毙了。这些尸体被扔进深坑，再浇上汽油进行焚烧。”[③]

韩晓、辛培林著述的《日军731部队罪恶史》中叙述：“那两座特设监狱里还监押着没来得及使用的活人‘实验材料’，这对731部队来说，是更为要害的罪证。由于‘实验材料’达400人之多，所以，他们采取了更加惨无人道的手段，……使用了速效能的毒气，在不到几分钟时间就把这些‘囚犯’置于死地……据原731部队‘运输班’司机越贞夫证实，除惨无人道地杀害了所有被关押在特设监狱的中国人外，对在日本战败前被抓进731部队并认为已经不再需要的中国人，还用注射氰酸化合物的方法毒死了一大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214页，群众出版社，1984年。

② 金成民等：《跨国取证七三一》，第2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③ 王一汀：《白衣恶魔》，第9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批。”[①]

731部队撤退前夕，关押在特设监狱里的“马路大”的人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不一致，而对处死“马路大”的方法和尸体的处理的记述基本相同，这就是用毒气毒死了“特设监狱”里的全部“马路大”，尸体就地焚烧后，一部分投入松花江，一部分就地挖深坑掩埋了。据一些专家学者的跨国取证和731部队原队员的回忆，1945年8月，特设监狱里被毒死的人的确很多。

1945年3月，林口支队的卫生下士官沟渊俊美来到平房参加培训。接着，受训的卫生下士官大部分回各支队去了，沟渊等几个人留在平房本部。8月10日那天早上，沟渊被编入留守队担任警备班长。1988年，他在日本大阪“为了和平，反对战争展”实行委员会举办的恳谈会上说，1945年8月11日那天下着小雨，731部队各个班的队员都在连夜地烧毁机密资料，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由于队员家属先接到撤退的命令，因此她们都慌忙地收拾行装，酒保门前挤满了抢购食品的队伍。原定那些当年新入伍的少年队员也先行撤退，可是当备好干粮、等待火车的时候，突然接到执行新任务的命令。原来部队为了毁灭人证，把特设监狱里的“马路大”全部用毒气害死，并拖进事先挖好的大坑里焚烧灭迹，可是由于尸体太多，特别班的队员累得精疲力尽了，于是只好把少年队员调来继续执行灭迹的任务。由于焚尸的队员逃跑心切，没等尸体烧净就埋上了。石井部队长发现尸体烧得不彻底，便命令把埋土扒开，再行用汽油焚烧。可是这太费时间了，于是队员按照部队长改变的命令，用汽车把一部分尸体运到松花江沿，趁夜扔进江里；一部分运到部队附近的洼地里埋掉。为了掩人耳目，竟在人尸上边摆放几具马骨。

岛田是731部队的最后一批少年队员，他1945年4月入伍。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听说部队让我们少年队员提前撤退的消息后，高兴得没有一点睡意，连夜准备行李和途中需要的食品。心想，我们不久就和家人团聚了。可是，8月11日早晨刚起床，田中教育官来告诉我们说，石井部队长命令少年队员，立刻集合到特别班去执行特别任务。这一消息就像当头一棒，打灭了我们立即回国的希望。田中教育官安慰说，不要丧失信

① 韩晓、辛培林：《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第28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心，只要抓紧完成任务，还是让我们优先回国的……随着紧急集合的命令，我们 50 名少年队员都按照平常规定的程序，抓起步枪，跑步到广场上站好队。田中教育官让我们把枪放回原处，再回来集合。田中命令我们去四方楼特别班执行任务……特别班长细谷少佐嘶哑地发出命令：'前 25 人去 7 栋，其余的去第 8 栋，行动吧！'他说话时不时地揉着带血丝的眼睛，我们猜想他大概一夜没睡觉了。其实，细谷少佐只说了半句话，田中教育官补充说：'要把里边的死尸拖出来，交给外边的人员，由他们焚烧。'我们恍然大悟，昨天我们参与销毁机密资料时，来到四方楼。发现 7 栋、8 栋实行了戒严，细菌生产班的雇员警告我们不准靠近。事后我们知道特别班的队员在里边进行毒杀作业。为了灭迹，他们把'马路大'的尸体拖到室外焚烧。由于尸体太多，拖不过来，于是顾不得保密的事，才把我们少年队员调过来帮忙。石井部队长命令我们严守秘密，不许到外边乱讲。我们进入牢房，一股腥臭味袭来，大家都感到恶心。牢房里面，尸体遍地，我们没有穿防护服，也没戴手套，因此都感到束手无策。田中教育官说：'还愣着干什么，不想回日本啦？'他的话说到我们心里去了。于是我们一咬牙就干了起来。我们进入的是第 7 栋牢房，里面都是男性尸体。我们少年队员拖一具尸体相当费劲，拖了 1 个小时也没拖出去多少。有个队员想出了砸开玻璃窗，往外扔的主意。我们分头砸开玻璃窗，两个人拽着尸体的两条腿，一悠就扔出窗外。一楼清理干净后，就登上二楼，我在一个牢房里的墙上看见用血抹成的标语：'打倒日本军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是被关押的爱国者涂写的。地上有一具尸体，他的右手指头全磨秃了，还滴答着血……我被他那瞪得溜圆的眼吓住了，一种良心的责备，促使我趁乱躲开。为此，细谷少佐关了我一天禁闭。后来，同期队员放了我，我们挤进了撤退的列车，回到了日本。"

佐藤也是最后一批少年队员，当年他 15 岁，他也曾奉命去特设监狱往外拖死尸，还去过细菌实验室里清理东西，他在实验室里看到清理了不少沾血的枕头。

731 部队原少年队员小笠原回忆说，从 1945 年 8 月 10 日那天起，按照石井部队长的命令，首先将最后在押的"马路大"用毒气害死，其尸体投入临时挖好的大坑内焚烧，陈列的各种人体标本都扔进了松花江。

秋山浩在《731 细菌部队》一书中描写："尸体堆成的山在燃烧……干着这种恐怖

勾当的（指拖运和焚烧尸体），几乎要有200来人……尸体陆续被收拾出去，楼下的几乎已被搬运一空……但是二层楼上还残留着无数的尸体……焚烧尸体的人，也着了急，不等下边的尸体烧光，就往里面扔新尸。（晚）7点钟左右，8个大坑被填得满满的，剩下的尸体再也无处可埋……”[①]秋山浩还叙述了处理尸体过程中的一件事：用卡车把部分焚烧后的尸体运到野外洼地掩埋，上面放上一些马骨头做伪装。

沟渊、岛田、秋山浩等731部队的原少年队员都参与过拖运“马路大”的尸体，根据他们的叙述分析，1945年8月，731部队特设监狱被毒死焚烧灭迹的“马路大”至少有400多人。

二、李初亭之死

李初亭是大连人，会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下江一带的伪满森林警察队给日本人当翻译。1936年，石井部队搞建筑时，他在铃木组当帐房先生，有一次，铃木茂的儿子从731部队建筑工地拉走一汽车钢材去哈尔滨倒卖，被李初亭发现，报告给哈尔滨日本宪兵队。为此，得到石井四郎的赏识，让他到731部队劳务班当翻译。李初亭投靠日本人后，与日本翻译官春日中一拜了把子，他组织成立了“协防班”，还在劳工棚附近开饭馆，利用他女儿搜集情报，为日本人监督劳工，抓政治嫌疑犯。在731部队占领平房期间，他是能够进入四方楼的少数中国翻译之一，知道731部队的一些秘密。731部队劳务班有一个马车队，由李初亭控制。表面上他说是把抽股的钱用于“协防班”开销，实际上，这笔钱他揣进了自己的腰包。马车队有近200台马车，负责731部队建筑及生产生活用，还有两台“斗子车”，供日本下层军官使用。郑学贵赶一台“斗子车”主要送劳务班的工藤、春日等人。

森村诚一采访春日中一时，春日中一提供了李初亭被杀的情况，他说：“李初亭是根据石井部队长的命令，被骗至四方楼大院，趁他不防之机，我们开枪打死了他，并撸下他的一块金壳手表。在海船上，我被噩梦惊醒，为防李初亭阴魂来报复，把那块金壳表扔入大海中”。

---

① 〔日〕秋山浩：《七三一细菌部队》，第117页，群众出版社，北京编译社译，1982年。

李初亭之死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1945年8月10日，春日中一从宪兵队给马车队打电话要车。郑学贵被派出车。他赶着斗子车来到本部大楼门前接春日。春日说要去李初亭家。李初亭家住在老五屯的十字路口东南角，距731部队劳务班不远。郑学贵赶着马车走到老五屯路口，迎面遇到两台装满家具的马车。这两台马车是新五屯屯长于春元的。

春日问车老板给谁搬家？头车老板回答说："给李先生搬家。""往哪儿搬？"春日问。"沙曼屯。"头车老板回答。

往沙曼屯搬家不照直走北门，而从南门走，春日感觉有问题。他知道李初亭想逃跑。催促郑学贵加快速度往李初亭家赶。

到了李初亭家，春日对李初亭说："石井部队长有要事请李先生去一趟。"

李初亭的媳妇孙爱珍见事不妙，搪塞说："有事让老李照办就是了，何必麻烦部队长？"

"部队长的命令，谁敢不照办？"春日说。

李初亭没有办法，只得跟春日去731部队。春日让郑学贵把车停在四方楼门外，他和李初亭走进四方楼。大约过了10分钟，春日出来对郑学贵说："不用等了，李先生要坐飞机和部队长一起去东京。"

郑学贵返回李初亭家报信。他刚到李初亭家就听见四方楼"轰"地一声爆炸了。孙爱珍预感到李初亭被杀害了，嚎啕大哭起来。

果然，李初亭被枪杀了。

三、报复劳工

731部队撤退之前，日本监工借机对中国劳工找茬。侯安钦说，8月10日那天下午，劳务班长工藤对中国劳工说："我们要转勤了，仓库里的东西你们可以挑些拿回家去。"劳工们信以为真，就从第二仓库挑了些衣物，堆在劳务班大院准备分用。第二天早晨，工藤看见后大骂，掏出手枪想打劳工。春日翻译官与工藤嘀咕了一会，他们让劳工给他们装火车，劳工们这才幸免于难。

那些日子，日本监工企图杀害得罪过他们的劳工，8月12日那天，加藤提一把战刀，

到处找食堂的大师傅陈怀仁。陈怀仁听到信后，躲藏起来。加藤要杀陈怀仁的原因是，有一天，劳务班的仆役小杨因病没有给日本人烧开水。加藤狠狠打了小杨一顿，打得他上不了班。第二天，工藤见小杨没来上班，问陈怀仁原因。陈怀仁把加藤打小杨的事如实说了。结果工藤把加藤打了一顿。还有一次，劳工的午饭不够分，工藤当面训斥了管食堂的加藤。转而加藤大骂陈怀仁。陈怀仁不服，因为每顿饭做多少，都是加藤安排的。他找工藤评理，结果加藤又挨骂了。这就是加藤企图杀害陈怀仁的原因。

1945 年 7 月，劳务班的方振玉因病没有上班，被日本监工抓进了劳工拘留所。里面被拘留的还有 10 来个人。8 月的一天，在劳务班食堂做饭的的穆芳给方振玉他们送饭。他俩人是老乡，都是四屯人。穆芳对方振玉他们说："日本人快垮台了，可能要杀你们，等一会，我和陈怀仁砸开铁窗，你们逃走吧。"没过一会，穆芳他们果然锯断了铁窗栏杆。方振玉他们从室内使劲推开铁窗，逃了出去。他们奔北门逃去，幸亏日本人慌乱间没有设岗，他们才跑了出去。刚逃回家，就看见那拘留所火光冲天，日本人晚去了一步，不然这 10 来个人就会被杀掉了。

白武斌、侯安钦、付景歧他们讲述了工具库劳工班长潘德亮被日本监工杀害的经过：8 月 12 日，日本监工工藤、菊池、秋叶在一块喝酒。工藤提起了因潘德亮告状而打过菊池、秋叶的事。潘德亮保管仓库，他的上司是工藤。有一年麦收季节，正赶上连雨天。菊池来领镰刀。按工藤的吩咐，应发旧镰刀。菊池硬是拿走了新镰刀。工藤发现库里剩下的都是旧镰刀，就把潘德亮打了一顿。潘德亮说明了情况，结果工藤又把菊池打了一顿。秋叶来库房领靴子，仓库里只有加藤的一双靴子，结果被秋叶穿走了。潘德亮把这件事告诉了工藤。工藤把秋叶打了。于是，菊池和秋叶都怀恨潘德亮。

这次，菊池、秋叶经工藤挑唆，就拎起战刀寻潘德亮报仇。碰巧，潘德亮从劳务班院里出来。菊池抡起战刀朝着潘德亮砍去，潘德亮本能的一挡，一只手被砍下来，他拼命逃跑，又被工藤截住，逼他跪在地上。秋叶赶过来一刀劈下了潘德亮的膀子，紧接着，工藤又补了一枪。潘德亮被日本侵略者残忍地杀害了。

第六节　溃　逃

731部队于1945年8月10日左右，开始进行溃逃前的准备，石井四郎把一部分特别重要的资料带回了日本，剩下的工作就是毁灭证据。该部队在慌乱中销毁了大部分有关细菌研究和实验的资料，动用工兵炸毁了平房镇的全部建筑物，用毒气杀害了关押在特设监狱里的"马路大"，并杀害了部分劳工以及用作实验的各种动物。销毁罪证之后，731部队开始大溃逃。

败逃的经历和具体时间，据731部队老队员的回忆，各不相同，很难统一口径。大体是从1945年8月11日开始，截止到8月15日，731部队前后开出15列火车，每列火车20节车厢，大约撤退2 500人左右。石井四郎等上层军官是乘坐飞机逃跑的，石井四郎乘坐着由他的女婿增田美保少佐驾驶的飞机逃回了日本。撤退前夕，731部队内部乱作一团。平房镇接到从外地运来的老鼠，也无人接管了。那些日子，整个平房镇成为一片火海。据一个老队员回忆："邻近的8372航空部队看见火势大为震惊，慌忙派来了消防车。我们的上司对他们说："请不要担心，这是作战措施，不必干预，请回吧。"就把他们挡回去了。731部队的机密和开始撤退的情况，连友军都没有告诉。"[①] 数以千计的鼠疫跳蚤遗留下来，给平房地区带来了灾难。

为了保守731部队的秘密，731部队把草味班制作的氰酸化合物（毒药），发给了部分731部队队员的家属。这是自杀用的毒药。在撤退过程中，一部分挤不上火车，来不及撤退的士兵和队员家属服毒自杀了。

据731部队原队员回忆，从8月11日开始，731部队铁路专用线上甩了一列闷罐火车，日本人好不容易抓到了几十个来不及逃跑的中国劳工，迫使他们把大米、白面、罐头、蔬菜、水果等食品和一些衣物装上火车。平房镇的"酒保"小卖部里挤满了抢购逃跑时的必需品的日本家属。731部队的日本军官和队员们，都强迫食堂的中国劳工昼夜不停地准备食品。731部队的队员们和家属肩扛行李，手拿提包，拉家带口，涌向车站。他

① ［日］森村诚一，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219页，群众出版社，1984年。

们本应按计划分批撤退，可是没有人顾忌这些，争着往火车上挤，车厢里挤得满满的，以至火车延续几个小时，才开出平房站。连续发了15列火车，还是有些日本士兵和家属挤不上火车。他们中间有的绝望地自杀了。日本人逃跑后，有人在731部队营区发现了3具日本尉官的尸体。

731部队原少年队员山内回忆了731部队撤退时的情况，他说："那几天营区内外都很乱，部队考虑要防止意外的干扰和破坏，立即组成留守队，同时制定了分批撤退的计划。我被抽调到官舍区负责警备。因为部队决定部队家属先行撤退，一辆专用的运输车车辆早停在铁路专用线上，所以在男队员都奉命忙于销毁证据的情况下，女队员和队员家属只好自己动手准备行装了。她们一撤走，我们除了给执行任务的队员留下临时住的地方之外，其余房舍全部烧毁。原定我们第四期少年队员是第一批撤退对象，可是临时增加了任务，因此我们撤离的时间改在8月12日晚上。因为临近日本投降的日子已不远，各地的日本人都为争先回国而挤在车站上，所以专用列车一路上也是走走停停的。15日那天刚过新京站（长春），18日那天才好不容易到达朝鲜釜山，当回到本土山口县工东萩港的时候，已经是8月30日了。临在平房上车前，我们都分到一包氢化钾，临时小队长说石井部队长有令，一旦发生被俘情况时吞下。我领会，对部队长来说，让战败的731队员体现什么'武士道精神'是没有意义的，最为重要的是，绝对保守731部队的秘密。这一点，在撤离平房之前就体会到了。石井部队在认为已销毁了证据万无一失后，石井部队长在本部广场上发表了恐吓式的讲话：今后，任何队员也不准暴露731队员的身份，不准相互联络，不准从事与部队同样业务性质的职业。要明白，我石井还在，一旦发现违纪现象，我石井是不客气的。据另一批撤退的队员讲，他们分别在釜山、萩港也听到石井的同样的训令。侥幸的是，我们在撤退的途中没有遇到严重的麻烦事，因此在釜山一上船，上司把毒药收回并扔进海里。"这批少年队员回国后，迫于新的政治压力，始终不敢讲真话。直到40年后，队员们才陆续站出来揭露731部队的秘密。

731部队军医秦正氏在总务部企划课工作。1945年8月9 ~ 13日，秦正氏奉命将苏军进军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海外消息提供给课长，根据情报，石井四郎做好了逃跑的

各种打算。秦正氏说：“同苏军开战时，石井指使部队向吉林省的山里退却，拟订了抵抗的计划。指使将重要器材捆包，并命令第一部吉村班研究山区抗战时的营养问题。我还译了苏联的‘牧草营养分析表’及其他有关营养的文件数篇，介绍了‘蔬菜中维他命丙的保存法’，作为他们研究的参考。”[①] 据其他材料分析，731 部队没有来得及到山区作战，就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向日本逃跑了。秦正氏还供述了 731 部队大量生产带鼠疫的跳蚤及枪杀 30 名爱国者的事实。据他说，731 部队预感到失败的命运，于 1945 年 6 月，731 部队就让部队家属中的 200 来个老人和孩子回国了。到日本投降的前 5 天，731 部队开始烧毁文件，处理老鼠，炸毁了全部建筑物。8 月 13 日，731 部队约 2 500 来人陆续乘火车逃跑，石井本人乘飞机逃跑了。

劳工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 731 部队溃逃的情况。正黄旗四屯的车朝义说，1945 年 8 月的一天，我们听说苏联红军和日军开了战，731 部队的日本人都慌张起来。我们到东乡村锅炉房上班时，发现东乡宿舍事务所静悄悄的，一个日本人都见不到了。过去，事务所楼上是日本人的单身宿舍。为探查日本人的动向，周士珍到楼上去看，回来后，他高兴地说：“小鬼子收拾行李，准备逃跑啦！”那几天，731 部队成了一片火海，日本人几乎跑光了。

金国忠回忆说：“8 月 13 日晚，我和另外两个人在动力班上夜班。一个外号叫‘大红脸’的日本监工喝过酒后睡着了。那天晚上，我不敢回家，看见四方楼院里火光冲天。铁路专用线上挤满了日本人。第二天早上，我们想回家，日本哨兵不放行，后来‘大红脸’写了个纸条才放了我们。”“大红脸”名叫河野，是 731 部队的留守队员。那天，他放走了金国忠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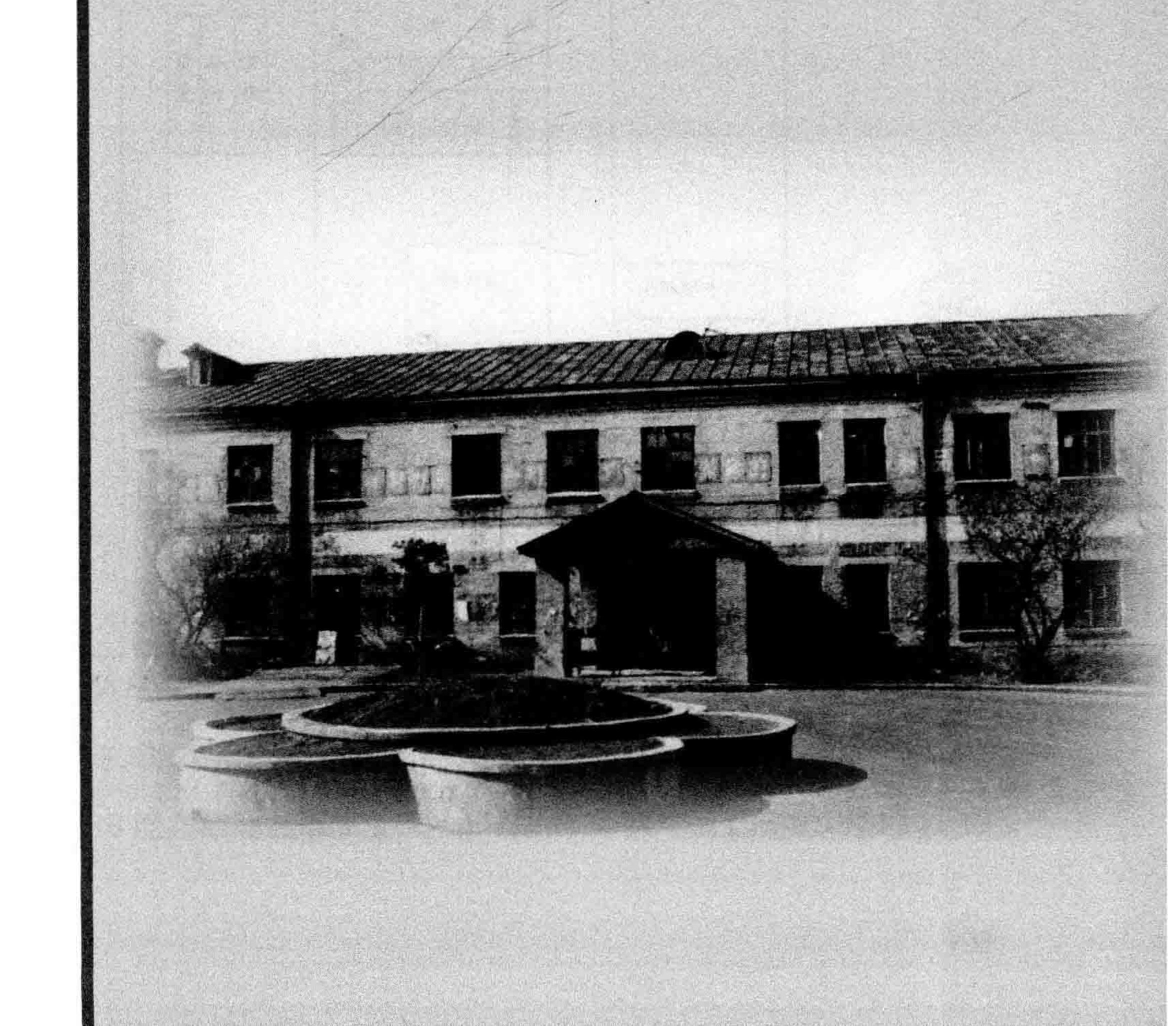
731 部队撤回日本后，太田大佐在东萩组建了 731 部队临时本部，组织支付遣散经费，发放战灾证明书和离队证明书，训示队员保守 731 部队的秘密。之后，731 部队疏散了，他们大都过上了隐居生活。

---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150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第二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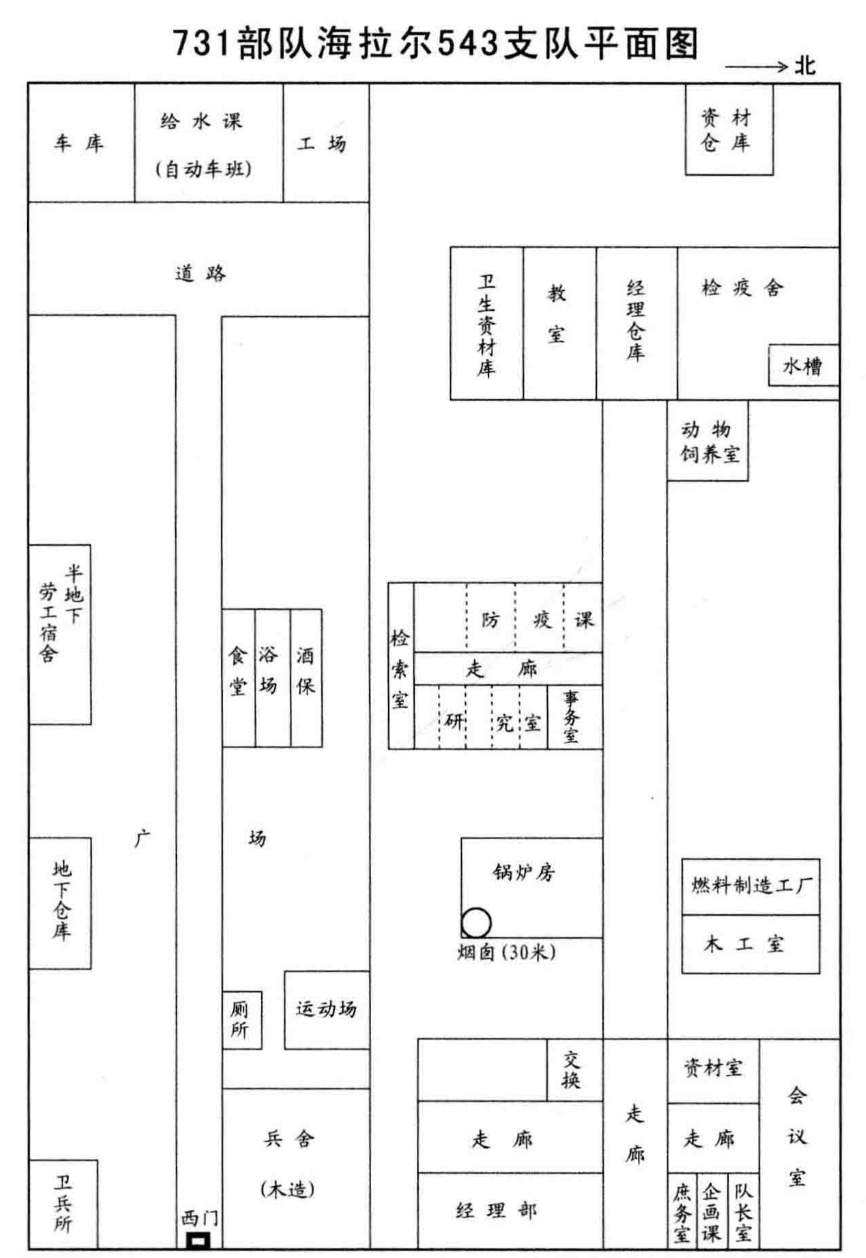
731 部队各支队



第一章　海拉尔支队（满洲第 543 部队）

第一节　支队概况

731部队海拉尔543支队平面图



731 部队海拉尔支队是规模较大的支队，1940 年 12 月建成，对外称“防疫给水班”。支队设在海拉尔伊敏河东岸的东南山下（今奋斗镇辖区）。东部是丘陵台地，海拔 668 米，比高约 40 米，坡度约 10 度，台地上是戒备森严的海拉尔要塞地区（东南山阵地）。山

上有钢筋混凝土永备火力点和碉堡及防坦克壕等，南部是226部队营房，北部是汽车运输联队，东北是飞机场，西部是海拉尔滨洲铁路线至伊敏河放排贮木场的铁路专用线和菜地。营舍占地南北长1公里，东西宽1.5公里，面积1.5平方公里。四周有铁刺线围圈，其内还有1.5米高的土围墙，墙上有近一米高的铁刺线。门设在西侧，设有卫兵室，营舍内建筑均为青砖青瓦，有兵舍、动物舍、饲料库、材料库、汽车库、教室、锅炉房、浴池、小卖部、卫生所、食堂、跳蚤室、菌苗地下仓库等，共有房舍300余间。

海拉尔支队有日本研究人员226人，他们身着日本军服，但不戴军衔，对外称“日本军属”。首任支队长清水富士夫，继任藤井莫太郎、蓬田正二、伊藤加明、天野勇，末任支队长为加藤恒则。支队内设总务课(计划、经理、庶务)、第一课(培养老鼠和跳蚤)、第二课(细菌研究)、资材课(器材保管供应)和教育课(业务教育培训)。海拉尔支队守卫森严，其他军营中国菜农可赶马车入内至门卫房送菜，唯有这个“单位”不用菜农送菜；这个支队的人员除有业务联系者外，不许与其他军方和社会人员接触，否则要受到严厉制裁；购物、医疗、文体活动均在支队营区内进行。

该支队新入伍的卫生兵都要接受3个月的培训教育，学习细菌培养以及疫病防治等知识。培训教育活动是必须的，1944年，该支队全体学员都学习了霍乱的防疫知识，以准备进行细菌战。学员结业后，被分到各课工作。

第二节　动物饲养

一、繁殖跳蚤

海拉尔支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繁殖致命细菌的传染媒介物——跳蚤，除支队本身用于实验外，还要按731本部下达的指标上交。于是，支队投放大量的人力去专门研究和繁殖它。由第一部专门负责培殖跳蚤，设置了专用的地下跳蚤培养室。1945年5月，战场吃紧，石井四郎向各支队下达了大量繁殖跳蚤的任务。于是，6月海拉尔支队派2名专业人员去哈尔滨731部队本部受训，接着又有3人前去参加培训班。7月又派数人专

程去哈尔滨取回相当数量的“母本”跳蚤。由于没有现代化设备和培育器具不足，他们就把近百个洗涮干净的空汽油桶摆放在培养室里，把切得很碎的干草放在空汽油桶里，然后将喂得很肥的老鼠固定在桶底上，再把跳蚤放进里边。闻到动物热量的跳蚤飞快地扑到老鼠身上，吸吮其鲜血，由此跳蚤不断繁殖。待到把老鼠吮食成一个骨架或者吸死后，铁桶里就有 20 ~ 30 万只跳蚤了。1945 年 7 月至 8 月初，海拉尔支队就两次派专人将 10 多公斤跳蚤送到哈尔滨 731 部队本部。这些跳蚤染上疫病菌，就成了细菌武器。如果使用鼠疫、霍乱、伤寒菌， 500 公斤就可使 17 万平方公里，即相当于东北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染上鼠疫、霍乱、伤寒，将会使数千万军人丧失战斗力，数十万居民死亡。

二、鼠类饲养

海拉尔支队的主要任务之二是饲养各类动物，他们配置了动物室，由十几个人负责动物饲养，修建了各类动物房舍。这些动物一是本支队用于细菌实验，二是供给 731 部队本部使用。支队养的动物有 10 匹马，还有羊、猪、兔、苏雀、鸽子和老鼠数千只。对于 731 部队来说，老鼠是最有用的动物，它既可以培殖用于传染鼠疫的跳蚤，又可做细菌实验的先行“牺牲品”。同时用它的血还能培养细菌。所以，海拉尔支队便把培殖鼠类当作主要工作来做。有专门培殖老鼠的房舍，在里面分排、分层摆放老鼠笼子。一个个用粗铁丝编制的一尺见方的小笼子，底层有铁皮包着的抽屉。抽屉分前后两格，前边放饲料，后边放草做鼠窝。每个小笼子里放着雌雄两只老鼠，每排有 30 个小笼子，有七八层高。731 部队进行细菌实验必须有足够的鼠类。于是日本关东军便命令哈尔滨附近各县和各支队所在地区大量捕鼠，交哈尔滨 731 部队。

1941 年 7 月，日军参谋本部总长提出了要加快细菌战步伐，731 部队短期内必须完成培殖 200 公斤跳蚤的任务。当时 731 部队包括各支队最大生产能力是 3 ~ 4 个月能繁殖出 45 斤 (1.45 亿只) 的跳蚤。200 公斤则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培殖出来，但日军参谋本部规定的时间是 3 个月。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扩大生产规模，但存栏的鼠类远远满足不了采血和繁殖跳蚤的需要。于是，731 部队要求寻找新的跳蚤宿主。海拉尔支队利用呼伦贝尔草原鼠类众多的条件，找到了可作为跳蚤宿主的土拨鼠 (旱獭)、松鼠 (灰鼠)、黄鼠和灰田鼠，并大力进行繁殖。由伪海拉尔市公署卫生科通过开展所谓“防疫周”的

活动，发动学生捕鼠，捕的鼠交到学校，学校交到市公署，再由海拉尔支队派车取走。老鼠不够，就在牧区收购土拨鼠，到林区收购松鼠顶任务。1945 年 5 月，由于战事更加紧张，日军参谋本部要求在短期内生产 1 ～ 2 吨跳蚤，老鼠供不应求的矛盾更加突出。石井四郎在本部召开了会议，海拉尔支队长加藤恒则也前去参加。会后，加藤恒则支队长回到海拉尔立即命令支队内能出动的人员全部换上便衣，除在市内继续号召市民和学生捕鼠外，还到有关地区收购鼠类，上上下下掀起了捕鼠“大会战”。至 1945 年 7 月，除上交哈尔滨 731 部队本部外，海拉尔支队内存老鼠 1.3 万只，支队能装老鼠笼的地方全摆满了，甚至各排房舍的走廊里也都摆上了鼠笼。

543 支队老兵谷崎等证言：

我是第三课的，每天早 8 点至晚 5 点工作，负责在一个能有近 300 平方米的大房子里饲养黑鼠，即田间老鼠，别人养的是白老鼠。上面给我们下指标，我和另一个人一年要养 3 000 只黑鼠。为了让这些老鼠长得快一些，我们就给白鼠喂高粱，给黑鼠喂马肉。因为黑鼠生存能力强，我们就把很大的一块马肉扔进笼子里，让它们自己撕食。等到哈尔滨 731 部队来取的时候，大的就送走，小的接着饲养。731 部队需要的老鼠非常多，一开始是从日本运到中国，后来就在中国直接培养。有时要得急了，543 部队要发动所有的人到田间去捕鼠。我们每年要往 731 部队送 10 次老鼠，一次 1 000 只。我知道，还有一部分老鼠就在第一课进行细菌培养。战败后，我们按照上面的要求把没有送走的老鼠和其他动物埋入深坑销毁。

2001 年，金成民等赴日本取证时，谷崎证实说：

海拉尔支队大约养了 1 万多只白老鼠，除老鼠外，还饲养了豚鼠。养老鼠的房子很大，两边有用混凝土浇灌的饲养槽。我们饲养的是田鼠，这些老鼠都是从草原或农田抓来的。为了让老鼠长得快，我们用马肉喂养，6 ～ 8 个月就养大了，然后就送到 731 部队本部去。其他队员饲养白老鼠。该支队第三课饲养老鼠，然后送到第一课使用。第一课负责在老鼠身上繁殖跳蚤，培养鼠疫菌，传染鼠疫。该支队每年向 731 部队本部送 1 万只老鼠。

第三节　细菌实验

在海拉尔支队建立前，石井四郎曾于1938年3月下旬亲临海拉尔视察，对进行细菌武器及细菌战问题做了重要指示，并为海拉尔陆军医院增设了大型设备，以加强细菌研究工作。对此，1954年8月21日，在沈阳对日本战犯审讯时竹内丰的供词说：1938年3月，我被调到内蒙古海拉尔市海拉尔陆军医院，任军医中尉。3月下旬，在海拉尔市入舟饭店，听过细菌战犯石井四郎对全体军医的讲话。他说："日苏战争只是时间问题，迟早是免不了的。现代化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细菌武器，日本对细菌战是有把握的，你们身为军医，就得在平时提高自己的业务，学习新的科学知识，一旦战争爆发，马上就能用上"。石井四郎为了加强细菌研究工作，大量制造细菌，曾亲自与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塚隆二中将联系，在海拉尔陆军医院增设了大型孵卵器3个、大型干热灭菌器2个、病源检索器2个、显微镜2架及病理实验设备，建筑上也扩大了两倍。

1944年，柄泽十三夫奉北野政次的命令，亲自到海拉尔支队考察工作，准备在该支队安装大批的培养细菌的设备，以扩大细菌生产能力。后因日本战败投降，这一阴谋未能得逞。他还供认，1943年，他在沈阳军医院养病时，731部队一位姓凑的科学工作员来看望他，并对他说，他（姓凑的科学工作员）到内蒙古去过，在那里检验过蒙古人的血液，也是为了研究蒙古人对于传染病的抵抗能力问题。

一、以人和动物为材料的实验活动

731部队海拉尔支队组建后，便利用该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的优势，成为细菌战实验的急先锋，颇受731部队本部和石井四郎本人的赏识，石井四郎和其他将校军官多次来海拉尔视察。海拉尔支队根据731部队本部的指示，培殖伤寒菌、副伤寒菌、赤痢菌和结核菌，配备了专业人员和数台蒸煮营养液的锅炉以及其他必需的设备。支队内还设有储存菌苗和疫苗、血清的地下库和地下饲料库。为了对731部队生产的细菌进行效能实验，731部队和海拉尔支队在呼伦贝尔地区进行了大量的以活人为材料的实验。据长春卫生技术厂（伪满洲国设在长春承担细菌研究任务的"大陆科学院"的下属单位）

工作人员关孝证实：

“原731部队队员松村，在与他的朋友岛崎的谈话中透露，731部队在海拉尔一带把活人绑在大柱子上，把小动物装在很坚固的小铁笼里，然后从空中投下细菌炸弹，进行细菌传染实验。他参与了实验效果的调查和采样活动。”①

和野是1941年3月加入731部队的卫生兵，在平房本部工作不久便调至海拉尔第543支队。他在回忆调到海拉尔支队以后的情况时说：

我在石井部队平房本部仅工作了几个月，便调到了海拉尔支部。一年前，号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731部队，出于战略的需要，分别在东满和北满边境地带密设了4个支部，不久日本陆军大本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而今由于战势紧张，731部队的细菌试验活动也更加频繁了。我刚一到海拉尔支部就奉命参加了细菌实战的演习。他们的“阴谋破坏班”多次秘密地潜入蒙古人部落，在居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霍乱菌、伤寒菌投入水井等饮用水源地。在事先和事后，我要两次去水源地取回水样，进行水质检查。这种事我干了好多次，实质就是检验细菌野外试验的效果。海拉尔支部的任务和其他支部一样，就是繁殖备用的实验动物和细菌传染媒介物，同时配合731部队本部的专业人员进行疫情调查以及细菌传染的野外试验，后期还担负分散生产各种传染病菌的任务。我去海拉尔支部的第二年，那细菌生产的设备、原材料等都从平房本部运来了，同时还把专业人员送到本部去培训，有时支部也组织些短期的专业人员培训。②

山本明司原在731部队海拉尔543支队任职，给支队长加藤恒则军医少佐当秘书。

山本明司先生回忆说：

1944年2月，我加入731部队不久，就调到海拉尔支队去了。因为部队对外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海拉尔支部，所以它给我的印象是军队防疫给水部队。这样，看到那里培殖老鼠、跳蚤一类动物，加上到处捕鼠一些事情，也就不以为奇了。可是，到了下半年，从平房本部运来了大型灭菌锅炉、细菌培养箱以及60吨生产细菌的各种材料，

① 长春市公安局存敌伪档案。

② 韩晓、金成民编著：《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行见证》，第52～5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才知道731部队的真正意图。当时德国对苏战争得势，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告急，关东军改变了“南防北进”为“南进北防”的策略。于是731部队按照陆军大本营的命令，要求迅速把海拉尔、孙吴、海林和林口支队变成细菌生产基地分支，如果战争需要，可直接对苏进行细菌攻击。一旦平房本部或某一支队遭到破坏，也不会影响战势大局。海拉尔支队在原有培殖实验动物、细菌传染媒介物的基础上，增加细菌生产任务，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山本明司发现海拉尔支队在野外用活人做试验的秘密，是他担任支队长秘书的时候。山本明司先生回忆说：加藤支队长起草的文件，都经过我抄写并按照文件处理程序上呈下达的。有一天，他将一篇要在什么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让我抄写，我一看，是鼠疫跳蚤实验的报告。那是不久前，支队在附近的村屯组织一次鼠疫传染与防护的演习，结果是一次检验鼠疫跳蚤的效能试验。由此可见，海拉尔支队和整个731部队一样，表面上都以防疫为目标，而秘密地进行细菌武器的实战研究。

森冈宽介作为侵华日军731部队海拉尔支队一名军官，因为在防疫室和解剖室工作，接触并掌握了有关543支队的核心内容，并直接参与了细菌培养和人体解剖实验。他披露，海拉尔支队曾挖掘中国百姓尸体进行解剖实验，同时还进行过细菌培养。

以下为森冈宽介的证词：

我是1942年参军的。最早入队是在哈尔滨平房区，在那里受训了5个月。在这5个月当中，我首先受到了卫生教育的训练，培训结束以后，我被分到了海拉尔，成为731部队海拉尔支队的队员。无论是我们这里，还是孙吴支队，所有的队员都是在哈尔滨731部队受训后才分到各地的。长官告诉我们，731部队海拉尔支队就是为哈尔滨731部队服务的。海拉尔防疫给水部队分三个部分，即防疫部、给水部、总务部，在这里我又接受了一次卫生训练和治疗训练、细菌培养训练和传染病预防训练。我在防疫部当伍长。在那里，我学习了有关细菌、各种传染病菌方面的研究方法，并直接参与了伤寒、赤痢、鼠疫、霍乱、普通霍乱菌等细菌的培养和研究工作。我每天负责把病菌放在器皿中观察。我们首先在跳蚤身上培养细菌，后来在老鼠身上做细菌培养。老鼠不够用时，我们就四处征集老鼠。我记得我们部队曾用钱在孙吴买过老鼠。我还记得海拉尔给水部队曾发动整个支队和附近部队的队员在全地区范围内捕捉老鼠，这些都送给了哈尔

滨的731部队。我以前从未对别人说过，海拉尔支队曾挖掘中国百姓的尸体进行解剖试验，把我们需要的脏器掏出来，再把尸体躯壳扔回坟墓。我还记得，1945年，一名叫伊豆加明的军医在731部队海拉尔支队防疫室做过人体解剖试验。供我们用作试验的是宪兵抓到的“间谍”。这个用做试验的人被伊豆军医用刀从脖颈一直剖到腹部，我们就负责往外拿所需要的内脏。在我们的部队里有一个最高的烟囱，能有30多米高，那里是焚尸炉，专门用来消灭尸体。此外，还有埋尸体的地方。

二、在辉河一带进行的细菌实验活动

海拉尔支队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以鄂温克人和蒙古人为主要对象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细菌实验。其实验手段五花八门，仅细菌的传染实验就有四五种，通常使用的是“菌液注射”和“菌液内服法”。他们对实验对象采取诱骗和强制相结合的手段。在进行细菌液注射实验时，他们说是给打“预防针”；菌液内服实验的方法是偷偷把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赤痢菌掺入牛奶和水里，或者把各种菌液注入瓜果、面食内。实验证明霍乱、肠伤寒等胃肠道传染病菌致人死亡效果明显，死亡率高，人在不治疗的情况下3 ~ 7天即可死亡。因为当时索伦旗(今鄂温克族自治旗)距海拉尔较近，加之有鄂温克族、厄鲁特蒙古族、布里亚特蒙古族等多种民族成份，所以遭灾最重，成了海拉尔支队的细菌战实验场。



幸存者哈勒珠

海拉尔以南 150 公里的南辉和北辉苏木，是鄂温克族牧民的聚居区。1941 年春天，日本特务上牧濑三郎带着一些警察在南辉苏木将布拉尔嘎查（村）反抗日本人统治的牧民马赛尔、鲁温泰、胡利抓到海拉尔兴安北省警务厅的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多。马赛尔和鲁温泰在严刑拷打和非人折磨下相继死亡。海拉尔支队派人到监狱以打"防疫针"为名，给胡利注射了菌液，并让他吃了放进细菌的面包和奶茶，然后把他放回家乡。1942 年初夏，胡利回到辉河白音敖拉。一年多监狱里的非人折磨已使他神经不正常。他上身不穿衣服，只穿一条破裤子，到处乱走，谁家都进，这样把疫病传染给了鄂温克族牧民们。许多人家同时发病，病人个个发高烧打冷战，上吐下泻，四肢痉挛，昏迷不醒。得病 3 ~ 5 天便开始死亡，牧民们称这种病为"哈伦病"（即"热病"，发高烧之意）。牧民洛坨一家人全死亡。桑布、班加日钦、乌力吉、额杰顺、嘎哈顺、哈勒珠等人家只剩下一个孤儿，其余亲人全都死亡。其中乌力吉家有 7 个孩子，父母和 6 个孩子全死亡，只剩下一个孩子；哈勒珠一家五口死了奶奶、父亲、母亲和哥哥，他若不是被及时送到喇嘛医旺吉德（藏族）处治疗，也活不成了。当时传染病从南向北蔓延，在额莫勒图、敖拉给勒、哈库木、乌兰布拉格、喜桂图、白音敖拉直至查干阿木吉都有人患病，家家都有人死。牧民们迅速将疫情上报伪索伦旗公署和伪兴安北省公署，要求给予防治。但日本人根本不到辉河去，并别有用心地说，这是一种汉族人常发的病症，没有灵丹妙药，就是"天神"也无能为力。鄂温克族牧民在这次细菌实验中共死亡 80 多人，其中杜拉尔姓就死了 30 余人。

1944 年 7 月，海拉尔支队又在辉河一带进行了细菌实验，南辉和北辉到处蔓延着传染病，比上一年的疫病来势更猛，规模更大，死人更多。至 9 月末，共死亡 240 多人。南辉和北辉苏木因海拉尔支队进行细菌实验两次就死亡 320 多人，南辉死人最多，苏木所在地哈和木南 15 里处的伊万那日斯的沙坨子里，是埋葬死人较多的地方。1945 年 4 月，人们看到，春风刮过，沙坨子里露出了一层层白骨，令人不寒而栗。

1942 ~ 1944 年辉河地区日军进行细菌实验死亡人员名录

被害人姓名	年龄	性别	民族	遗属姓名	与被害人关系	住址	被害人姓名	年龄	性别	民族	遗属姓名	与被害人关系	住址
花拉	47	女	鄂温克	谢拉	母亲	辉道村	额吉松	40	男	鄂温克	巴音其木格	大爷	辉道村
扎来	21	女	鄂温克	谢拉	婶婶	辉道村	孟格	36	男	鄂温克	巴音其木格	大爷	辉道村
其其格	2	女	鄂温克	谢拉	侄女	辉道村	乌日吉玛	20	女	鄂温克	吉日嘎拉	奶奶	辉道村
斯皮勒	10	女	鄂温克	谢拉	妹妹	辉道村	格德日	26	男	鄂温克	吉日嘎拉	爷爷	辉道村
汉德玛	65	女	鄂温克	谢拉	奶奶	辉道村	格乐塔	2	女	鄂温克	吉日嘎拉	姑姑	辉道村
浩日嘎	34	男	鄂温克	谢拉	叔叔	辉道村	干哈松	30	男	鄂温克	巴图孟和	父亲	辉道村
班迪	41	男	鄂温克	哈勒珠	父亲	哈库莫村	玛吉嘎	30	女	鄂温克	巴图孟和	母亲	辉道村
敖波日	38	女	鄂温克	哈勒珠	母亲	哈库莫村	乌力吉	45	男	鄂温克	占布拉	父亲	辉道村
额尔和木	14	男	鄂温克	哈勒珠	兄	哈库莫村	格日乐玛	46	女	鄂温克	占布拉	母亲	辉道村
阿杰	66	女	鄂温克	哈勒珠	奶奶	哈库莫村	斯色日	9	女	鄂温克	吉日嘎拉	妹妹	辉道村
班吉日格其	36	男	鄂温克	利希尔	父亲	喜桂图村	宝丁	6	男	鄂温克	吉日嘎拉	弟弟	辉道村
格日乐	32	女	鄂温克	利希尔	母亲	喜桂图村	宝桑	5	男	鄂温克	吉日嘎拉	弟弟	辉道村
呼杰	31	女	鄂温克	宝力图	母亲	喜桂图村	工林	47	男	鄂温克	斯仁巴图	爷爷	哈库莫村
拉特尔	39	男	鄂温克	巴敖登高娃	爷爷	辉道村	宝力嘎	35	男	鄂温克	斯仁巴图	爷爷	哈库莫村
苏米尔	36	男	鄂温克	巴敖登高娃	奶奶	辉道村	玛吉格玛	32	女	鄂温克	斯仁巴图	奶奶	哈库莫村
孟和	5	男	鄂温克	巴敖登高娃	叔叔	辉道村	希希布	20	女	鄂温克	斯仁巴图	母亲	哈库莫村
盖哈颀	44	男	鄂温克	巴敖登其木格	爷爷	辉道村	冷兵	44	男	鄂温克	本布日	父亲	哈库莫村
马吉格	41	女	鄂温克	巴敖登其木格	奶奶	辉道村	阿米日图	18	男	鄂温克	本布日	哥哥	哈库莫村
额吉颀	39	男	鄂温克	巴音其木格	爷爷	辉道村	吉木太	21	男	鄂温克	敖和乐图	大爷	哈库莫村
满达拉	10	男	鄂温克	巴音其木格	叔叔	辉道村	德黑	43	女	鄂温克	敖和乐图	奶奶	哈库莫村
阿格尔	67	女	鄂温克	呼格吉尔	奶奶	辉道村	塔普	10	男	鄂温克	萨如玛	弟弟	哈库莫村
图士列	36	男	鄂温克	呼格吉尔	爷爷	辉道村	阿拉腾扎布	8	女	鄂温克	萨如玛	妹妹	哈库莫村
内库乐	22	女	鄂温克	呼格吉尔	母亲	辉道村	塔思	5	男	鄂温克	萨如玛	弟弟	哈库莫村
苏荣	10	女	鄂温克	呼格吉乐	姑姑	辉道村	朋色迪	32	男	鄂温克	斯格米德	父亲	喜桂图村
和力提尔	5	男	鄂温克	吉日嘎拉	叔叔	辉道村	兴娜	32	女	鄂温克	斯格米德	母亲	喜桂图村
乌力吉	46	男	鄂温克	占布拉	爷爷	辉道村	朋苏格	35	男	鄂温克	斯格米德	大爷	喜桂图村
哈斯乐玛	42	女	鄂温克	占布拉	奶奶	辉道村	丹琼	15	女	鄂温克	潘其日	妹妹	喜桂图村
斯斯格尔	8	女	鄂温克	占布拉	姑姑	辉道村	乌义登	37	男	鄂温克	扎瓦	爷爷	辉道村
宝定	6	男	鄂温克	占布拉	大叔	辉道村	斯乐其	34	女	鄂温克	扎瓦	奶奶	辉道村
宝升	4	男	鄂温克	占布拉	二叔	辉道村	敖登	6	女	鄂温克	扎瓦	叔叔	辉道村
乌日吉日玛	22	女	鄂温克	哈斯托雅	母亲	辉道村	马萨日	42	男	鄂温克	诺日吉玛	父亲	哈库莫村

续表

被害人姓名	年龄	性别	民族	遗属姓名	与被害人关系	住址	被害人姓名	年龄	性别	民族	遗属姓名	与被害人关系	住址
吉拉塔	2	女	鄂温克	哈斯托雅	姐姐	辉道村	伊敏花	43	女	鄂温克	诺日吉玛	母亲	哈库莫村
孟和	8	男	鄂温克	胡德勒	叔叔	辉道村	额努和	20	男	鄂温克	诺日吉玛	哥哥	哈库莫村
章瑞	21	女	鄂温克	额日德氏其其格	母亲	辉道村	嘎丽玛	20	女	鄂温克	诺日吉玛	嫂子	哈库莫村
尼斯呼勒迪	47	男	鄂温克	同贡	爷爷	辉道村	胡久	1	男	鄂温克	诺日吉玛	侄子	哈库莫村
宾巴	8	男	鄂温克	同贡	叔叔	辉道村	鲁温太	45	男	鄂温克	乌日根毕力格	爷爷	喜桂图村
额格日玛	6	女	鄂温克	同贡	姑姑	辉道村	胡萨布	43	男	鄂温克	乌日根毕力格	爷爷	喜桂图村
占斯瑞	20	男	鄂温克	阿珠	丈夫	乌兰宝日格村	伊先	46	男	鄂温克	乌日根毕力格	爷爷	喜桂图村
苏和	25	女	鄂温克	苏讷木	母亲	乌兰宝日格村	巴音花	46	女	鄂温克	乌日根毕力格	奶奶	喜桂图村
汉达	27	女	鄂温克	苏讷木	伯母	乌兰宝日格村	胡列	32	男	鄂温克	巴亚列	哥哥	喜桂图村
希林花	40	女	鄂温克	郎头	奶奶	嘎鲁特村	额盖布	53	男	鄂温克	巴亚列	父亲	喜桂图村
哈拉	51	男	鄂温克	玛杰	爷爷	伊拉勒特村	汉都玛	51	女	鄂温克	巴亚列	母亲	喜桂图村
达希	36	男	鄂温克	玛杰	叔叔	伊拉勒特村	后日钦	55	男	鄂温克	巴亚列	大爷	喜桂图村
苏如黑	24	女	鄂温克	玛杰	母亲	伊拉勒特村	通列	42	男	鄂温克	巴亚列	叔叔	喜桂图村
阿迪雅	4	女	鄂温克	玛杰	大姐	伊拉勒特村	蒙克岱	40	男	鄂温克	劳合玛	父亲	哈库莫村
阿日塔	1	男	鄂温克	玛杰	二哥	伊拉勒特村	花拉	38	女	鄂温	克劳合玛	母亲	哈库莫村
顺迪	55	男	鄂温克	龙给扎布	爷爷	伊拉勒特村	西什勒岱	45	男	鄂温克	车仁	爷爷	哈库莫村
老登森格	27	男	鄂温克	龙给扎布	叔叔	伊拉勒特村	额合莫	9	女	鄂温克	车仁	姑姑	哈库莫村
老得布	17	女	鄂温克	龙给扎布	婶婶	伊拉勒特村	宾巴	7	男	鄂温克	车仁	叔叔	哈库莫村
阿拉楚迪	29	男	鄂温克	龙给扎布	叔叔	伊拉勒特村	姜克来	21	男	鄂温克	阿珠	丈夫	辉道村
格日乐	37	女	鄂温克	力斯日	母亲	辉道村	苏克	25	女	鄂温克	索诺木	母亲	乌兰宝力格村
阿拉孝嘎	57	男	鄂温克	额尔登挂	爷爷	辉道村	汉德玛	23	女	鄂温克	索诺木	婶婶	乌兰宝力格村
讷苏和	60	男	鄂温克	额尔登挂	爷爷	辉道村	昂库列	47	男	鄂温克	苏古尔	爷爷	喜桂图村
哈拉	58	女	鄂温克	额尔登挂	奶奶	辉道村	汗岱	51	男	鄂温克	宝布扎布	爷爷	喜桂图村
芬东	20	女	鄂温克	额尔登挂	婶婶	辉道村	加吉玛	50	女	鄂温克	宝布扎布	奶奶	喜桂图村
塔日巴	35	男	鄂温克	陶格通太	父亲	辉道村	道登曾格	26	男	鄂温克	宝布扎布	大叔	喜桂图村
玛龙花	37	女	鄂温克	陶格通太	母亲	辉道村	老道布	24	男	鄂温克	宝布扎布	二叔	喜桂图村
胡那屋	59	女	鄂温克	陶格通太	奶奶	辉道村	阿拉楚岱	21	女	鄂温克	宝布扎布	姑姑	喜桂图村
帕仁嘎	21	男	鄂温克	陶格通太	叔叔	辉道村	德格吉玛	25	女	鄂温克	宝布扎布	婶婶	喜桂图村

续表

被害人姓名	年龄	性别	民族	遗属姓名	与被害人关系	住址	被害人姓名	年龄	性别	民族	遗属姓名	与被害人关系	住址
特布新吉日嘎拉	7	男	鄂温克	陶格通太	弟弟	辉道村	索伊勒	5	男	鄂温克	宝布扎布	孙子	喜桂图村
苏荣	5	男	鄂温克	陶格通太	弟弟	辉道村	苏和布	37	男	鄂温克	杜道尔吉	舅舅	嘎鲁特村
拉达日	22	男	鄂温克	巴图	叔叔	辉道村	道波迪	35	女	鄂温克	杜道尔吉	舅母	嘎鲁特村
苏米荣	23	女	鄂温克	巴图	嫂子	辉道村	优吉玛	64	女	鄂温克	杜道尔吉	岳母	嘎鲁特村
孟和	5	男	鄂温克	巴图	弟弟	辉道村	高通	9	男	鄂温克	杜道尔吉	长子	嘎鲁特村
阿嘎日	67	女	鄂温克	呼格吉米	奶奶	完工村	曼古德	7	男	鄂温克	杜道尔吉	次子	嘎鲁特村
陶都日	39	男	鄂温克	呼格吉米	大爷	完工村	耶列	5	女	鄂温克	杜道尔吉	女儿	嘎鲁特村
内胡乐	22	女	鄂温克	呼格吉米	母亲	完工村	满都热娃	3	女	鄂温克	杜道尔吉	妹妹	嘎鲁特村
苏斯德	10	女	鄂温克	呼格吉米	妹妹	完工村	孟都拉	30	男	鄂温克	巴音其木格	大爷	辉道村

三、在伊敏一带进行的细菌实验活动



学者赵玉霞（右）向伊敏苏木萨格道布嘎查
幸存者额尔登（左）和敖日勒玛（中）取证

1944年春天，索伦旗(今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苏木北起向南从萨格道布、苇特坑、阿贵图、毕留图至红花尔基，凡是有人居住的蒙古包、土坯房附近，都出现了大群的跳蚤。饥饿的跳蚤满地乱蹦，追着人咬。牧民们用各种盆子装满水放在草地、房子或蒙古包内，

晚上月光下盆里的水发亮，跳蚤就往里边跳，早起一看，盆里水面上爬满了一层跳蚤。这是海拉尔支队在伊敏苏木搞的一次鼠疫杆菌的实验。跳蚤咬人后，人就发高烧，同时打冷战，眼睛结膜充血，步行困难，随之淋巴腺逐渐发肿，全身火烧，在 5 ～ 7 天里即死亡。这次传染病死了许多人，使本来人口不多的厄鲁特蒙古人几乎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仅萨格道布嘎查就死了 20 余人。苇特坑、阿贵团、毕留图、红花尔基等嘎查的死亡人员尚待进一步调查。

1944 年伊敏苏木萨格道布嘎查日军进行细菌实验死亡人员名录

被害人姓名	年龄	性别	民 族	遗属姓名	与被害人关系	住址	备注
延吉玛	35	女	蒙古	额尔登	母 子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额当时 5 岁
巴图苏和	32	男	蒙古	额尔登	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那木吉拉	68	男	蒙古	额尔登	舅爷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米兰	30	女	蒙古	额尔登	舅妈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额日木德	7	女	蒙古	额尔登	姐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旦德格	40	男	蒙古	额尔登	姐夫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德力格玛	34	女	蒙古	额尔登	妈妈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脑海	18	男	蒙古	额尔登	邻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查干喇嘛	40	男	蒙古	敖日勒玛	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好日劳	39	女	蒙古	敖日勒玛	舅妈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斯格木德	43	男	蒙古	敖日勒玛	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查干喇嘛之兄
尼亲	50	男	蒙古	敖日勒玛	大爷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丹都玛	50	女	蒙古	敖日勒玛	大娘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尼亲之妻
阿优喜扎布	45	男	蒙古	敖日勒玛	邻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额仁沁	43	女	蒙古	敖日勒玛	邻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额仁沁之妻
拉拉	11	女	蒙古	敖日勒玛	邻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额仁沁之女
格日	58	男	蒙古	敖日勒玛	邻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希日巴之父
希日巴	40	男	蒙古	敖日勒玛	邻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格日之子
达日黑	38	女	蒙古	敖日勒玛	邻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希日巴之妻
根登	55	男	蒙古	敖日勒玛	邻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第四节　支队灭亡

海拉尔支队败退时，一些日本老兵回忆了当时的情景，谷崎证实说，该支队第三课为了销毁罪证，把老鼠就地挖坑掩埋，用10辆汽车装满了设备，准备逃跑，其它设备全都销毁了。森冈宽介说，我清楚地记得，1945年8月9日，我们战败了，这一天，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苏联红军打进来之后，按照上面的指令，我带领部队的几个队员把当时培养细菌的全部器具扔到了兵舍附近的沼泽地里，把兵舍都烧毁了。我们把器材装上汽车，向兴安岭逃去，又从兴安岭向齐齐哈尔方向逃跑。《侵华日军在呼伦贝尔进行的细菌毒气战》中记述了543支队灭亡前后的经过，现摘录如下:

1945年8月9日晨4时左右，苏军飞机空袭海拉尔。海拉尔支队的官兵们知道苏军已开始进攻，大势已去，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窜来窜去，满院子吵嚷声和谩骂声连成一片。一笼笼捕捉和饲养的老鼠、支队培殖的跳蚤和保存的细菌，正准备按731部队本部的命令启运哈尔滨，看来已办不到。9日晚，按731部队本部的命令，将支队饲养的所有动物、贮存的细菌、营房、动物舍、实验设备、各种文件资料、细菌实验数据档案等，全部焚烧。支队的队员拎着装满汽油的铁桶，泼到动物的身上，再引火点燃。顿时动物舍火光四起，浓烟滚滚。各种动物被烧得乱叫，空气中散发着烧焦的马、羊、猪等动物的糊味。大火整整烧了一夜。8月10日凌晨，海拉尔支队官兵分乘八辆汽车向大兴安岭方向逃去。一路上走走停停，不时与穿插迂回作战的苏军交火。有的战死，有的被俘。[1]

---

① 赵玉霞:《侵华日军在呼伦贝尔进行的细菌毒气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原543支队队员大仓一郎

原543支队的大仓一郎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败逃及被俘后的经历：

8月9日早晨四时左右，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号声，全副武装在院里集合，是苏联宣战进攻满洲的事，一时吓傻了。苏联飞机开始轰炸海拉尔，黑烟滚滚。一片黑云化为海洋一样，一个跟一个升起来。我们的部队把可用的物品集中在一起，准备把部队营房全炸毁。这个准备持续到傍晚，把有用的东西装上另外的六台大卡车上。部队出发时天已黑，对面看不清人脸。从苏军的轰炸机上投下来的炸弹成排落下的样子与电影上演的一样。对这样的空袭，日本军是没有还击能力的。为了转向大兴安岭的阵地，部队爬上山岗的时候，后边部队爆破了营房，爆破部队营房的烟火和轰炸的烟雾飞起来一片乌黑，整个市街成了地狱的模样。这时联想到在阵地里有同样的状况时寻找死亡的场面的情景。可能还是很幼稚的关系吧，勇气增加了百倍。这个时候苏军的战车好像已经开进了海拉尔市郊外。8月10日，昨晚通宵继续前进，早晨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在途中有民间的日本人携带小孩，背着行李，一边哭着求叫让她们搭乘我们的卡车。她们举手苦苦哀求的叫喊声，现在也像留在我的耳朵深处。我们携带的枪是小枪，带200多发子弹，只有这些。

卡车用草木伪装着，什么也做不了，时而有过苏军扫射的枪声，但是没有伤亡。途中还追过中国农家养的猪，打死后吃了。到中国人逃跑后的家里找有用的物品。不能到外边活动，只有用石头在卡车上磨所带的佩剑。到了这个时候虽然还想着上下级的节度，但是没有什么制裁，用米做成饭肴又有足够的肉吃，有了这个根本就不考虑死的问题了。

8月12日，午后有了转移的命令。离这里不远的坡下有个小街叫博克图。在移动的路两侧，有插着卷起来的日本旗的战车和带着炸弹的兵，用草盖着进行隐蔽。这时才感觉到确实是战争了。在此处有个小丘岗，上面有砖瓦结构的房屋，我们进到房子里等待机会。在这里我们根本没有应战的武器，而苏军飞机仍低空飞行反复地进行扫射，有时老兵们也借着隐蔽物进行射击，当然也尽是无情的灰心罢了。

8月13日，谣传组织了一支决死队，要到山岗的深处去。傍晚命令传达下来，全副武装通过岗下的道路到了一个木刻楞房屋，好像是烧炭人所住的小屋。我们被告知，这就是我们决战的地方，据说是要在下边的道路上阻击苏军的进攻。没有武器，只好听天由命。谁也不吱声，也没有谁睡觉。过了几个小时又有转移的命令，要到昨天住的博克图兵舍去。此处还没有遭到苏军的进攻。8月14日，早晨天还未亮的时候，到了博克图，这时有通知说，日本已战败。广岛遭原子弹袭击继又有长崎遭原子弹，说广岛今后在十里四方的原野上连草也不可能生长了。我家正好在十里边上的郊外，也可能免遭这场灾难吧。还有一个弟弟是在广岛，可能再也见不到了吧，家里的人们也可能都完了吧，这也是从最坏处着想所作的思想准备吧。中午时分接到命令，傍晚要把给水部的装备全部放弃，只携带自己的物品，与其他部队乘无盖车南下。途中停了好几次车，又前进了。8月15日早晨停车的车站是昂昂溪，到了当地的兵舍。结果是全部武装都被苏军解除了。武器就堆在野外像山一样，看到这种情景，真是叫人难受到极点而落泪了。从此成了俘虏，也像日本军里一样被强制劳动管教了，稍有差错就有被枪决的危险。兵营里有装甲车横下倒着，兵舍是空兵舍，粮仓有很多的粮食，被服库里堆放着新的制服。我们换上了新的制服，在这里上级（军官）和老兵们都特晋了一级，根据队长的命令，在新衣服上换上了领章。8月17日，根据转移命令，各部队去齐齐哈尔，午后步行军出发了。背包里有服装、饭盒、水壶和从海拉尔出发时带的装在一支袜子里的干面包干，加上从这

里发的毛毯等所能携带的一切东西。这时让人感到俘虏的行列好像是被赶往屠宰场的羊群。行军几公里大家就累了，先头部队一有休息的命令大家就地坐到地上。我们的部队因为是在尾部，我们刚坐下时，先头部队又出发了，往前看远处是一条长长的队列。深夜了行军还在继续，水壶的水已喝光，在月光的照耀下见到水面就趴下用嘴直接喝，可能昼间看的话是泥汤子吧。每到休息的时间，前面人立即倒下，后来的人被绊倒，很多人把饭盒都压坏了，那种疲劳的情况真是让人难以想像。8 月 18 日，通夜行军。突然眼前出现了我们未曾见过的背着自动步枪、有的还弹着“曼得令”哼着歌曲走着的苏军。苏、日军真是不可比喻的样子，苏军乘的是美国造十轮大卡车，我们在兴安岭所乘的简直是个玩具，装备完全不同的军队。在满洲特有的干燥沙尘里行军，从尾部看去好像是一条黄烟下行走的部队。脸上和嘴里全是沙子，一咬就吱吱作响。到了齐齐哈尔郊外，看到了相当大的部队，有先前到达的部队，一眼看去很难估计有多少人。完全置于苏军指挥之下的部队，虽有日本军的上下纪律，在这里完全是俘虏生活开始的第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初年兵只是每天做饭、扫除。有时也派工，但总之还是闲呆着。但过了酷热的夏天和环境的突变，出了不少病人，初年兵的三好节男因高烧而入院，因为苏军方面不出护理，我陪他同去医院住一个月左右。没有工作，苏军配给的食物很少，非常时吃的干面包一个两个地也吃光了，记得还用火烤着做了一些像干面包似的东西，把它装在军袜里保存过。

9 月 27 日，近来尽为回日本的事高兴总算集合了大约有 2 000 人左右，领队的军官是其他部队的铃木大尉，海拉尔来的只有堀田少尉，其他军官因身体不佳等原因留下二十几名。堀田少尉以外有军医军官，他因不愿透露防疫给水的关系，也知道这次不是回日本，而是去苏联过俘虏生活的事好像故意采取了别的行动。最终还是全员入苏了，海拉尔支部有军官 5 ～ 6 名，初年新兵 40 名，军属 10 名，另有老兵 20 名，共 120 名。7 月部队长公出到本部，开战后为部队合流了。

731 部队本部对于情况的变化多少有所了解，开战前把一部分干部都派回了日本内地，所以没有人去苏联，这是以后才得知的。突然把行李物品都装进上边有小窗的带盖货车嘎嘎地跑起来，从小窗口看着太阳随便推测行进方向。有几回停下来补充食物，看

到有苏联兵和大群的中国人，无论咋说这个列车是向苏联方向走着。10 月 8 日，到达的终点站是在稍高的丘岗长着松树的专用线处下了车，这已经是苏联领土了。在这里傍晚集合后，通知说把贵重物品都统一保管，并说以后归返。这样我把印鉴、2 000 现金和表都交给当局了。过后听说把东西全裹到一起送到部队的某部门，连部队名称都没有问清，装在一个箱子里，像是起初就根本没有返还之意，而没收了事。有些人没有交出东西保管，是因为前不久就拿东西与苏联人换面包吃了。苏联兵手上戴着三四块表，不时地看看表显出高兴的样子，看到这种情形，可以猜测物资的缺乏程度。这天晚上彻夜点燃篝火野宿，比起寒冷还是疲劳厉害，连靴子都忘脱下就睡了。早晨一起来身上落了一层白白的霜，挨一宿冻的事现在也常能想起来。10 月 19 日，各部队在收容所里都有了自己的屋子，随后海拉尔部队被分配到罐头厂劳动。撒了盐的牛皮很重，搬运起来很困难，然而苏联人却喊着“达瓦依”“达瓦依”(快点！快点！)催促着干，让人卖劲干活的事现在想起来也都头疼。空着肚子干活饿得不行了，直打晃，看见牛皮里撒盐的肥油(肥肉)抠下来就吃，这个时候才知道人饿了，就根本不会考虑什么叫面子和什么叫可耻，偷也是理所应有的举动。休息时三三五五地串入仓库里，偷几个罐头踩瘪了带回去吃了，真是无法形容，就是吃到了马上眼睛就亮了似的，真是难以忘却。约一个月后，又接到命令要转移出发了。

11 月 10 日，是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迪地区的收容所，附近也有苏联人居住。收容所围着二层刺线，中央还有高高的板墙，四角有高高的监视塔，常有拿着自动步枪的兵在监视。兵舍二栋，炊事房和厕所各一栋，附近有铁道和火力发电厂。在这里约干了三年，每天傍晚收工，星期天大半是休息。海拉尔支队大致上是在同一地分住在不同的大屋里。屋里分上下两层，大约住 60 人，可脱衣服睡。紧连着有十几个大屋子，总员大约是 1 500 名的混合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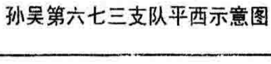
从 11 月起到一个叫丹巴的地方修堤防工程。外边是零下二十度左右，虽有防寒衣服和手套，具体的工作内容是用镐锹刨挖冻的土地。冻土像是水泥块，根本就不能想像是挖，挖一饭盒土，需要许多的时间，然而监视人还是一个劲儿的喊“达瓦依！”“达瓦依！”(快点！快点！)催促。这时想出了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在场地上烧火把地熔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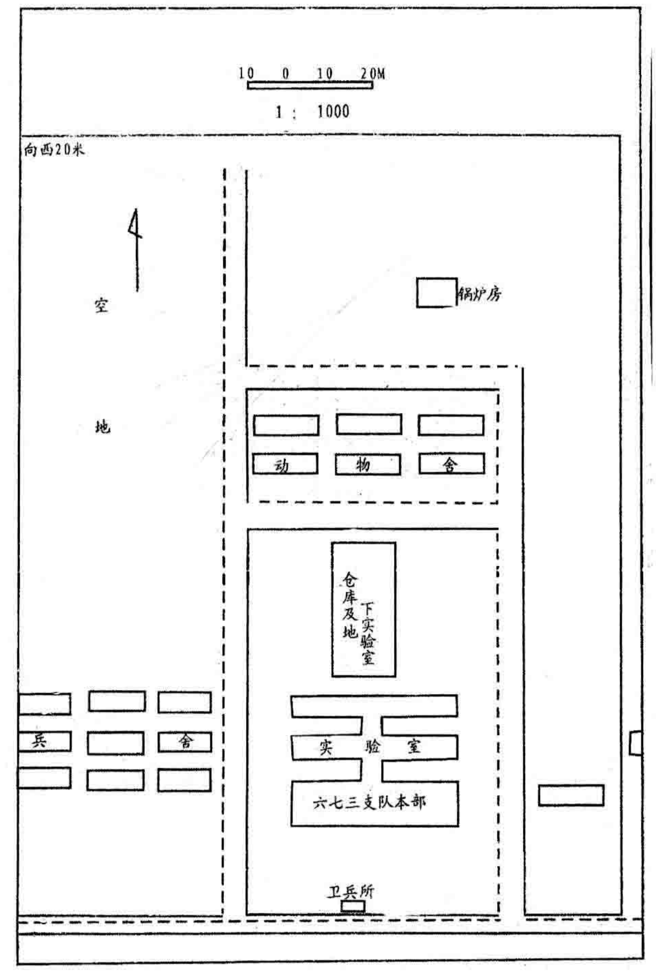
再挖就省事了，监视人高兴了说：“哈拉少！哈拉少！”(好！好！)。看来监视的苏联兵也学到了土木知识了吧，拿最初见到的苏联兵对表的珍惜程度和种种无知的举动等一比较，到底还是有差异的，真使人大吃一惊。过了几个月提出了招募技术人员、木匠和懂工艺的技术人员。我们是住在三十分所，离这还有徒步一小时的路程到那里的电气工厂劳动，并有其他的活也得干，实际上有各种各样干不完的活。最辛苦的活是半夜起来到下边的发电厂去卸煤、装煤和推煤的工作了，一卡车煤由二人分担装卸推，需要干五个小时，满脸漆黑，累得喘不过气来。体验过俘虏生活的人都一样，一想起来真是充满了辛苦。在这个三十分所我干了三年，享受了地狱般的苦难。但是突然天上飞下了好消息，总算是为这一天的到来活下来了。昭和二十三年(1948)9月份，终于等来了“东京达毛依”(回东京去)的消息，乘上了回东京的列车。然而高兴太早了，我们分乘的两列车人到哈巴罗夫斯克被赶下了车，命运决定了我们到哈巴罗夫斯克的二十分所。在乌兰迪都分散了的老兵数人又重新住到一起，由于命运不好而下了车的我们又重新干起了苦役。此后虽说与苏联人有了交流呀、民主化运动呀等等这些都是以后的事儿。新兵到哪里都一样的。早晨起床了同时就是地狱生活的一天开始了，净是苦事。好不容易晋升到一等兵后，就向往着晋上等兵时，突然听到了日本败战的事，其结果是到西伯利亚当俘虏，在酷寒旷野里，没有足够的食物供应，到了归国的时候，还处于生死没有保障，这种苦恼仍在继续着。回想当时的苦境流着眼泪，写了这段路程记录。[①]

① 寺本真：《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的毁灭》，167～172页，平成11年8月15日。

第二章　孙吴 673 支队（满洲第 673 部队）

第一节　支队概况





孙吴第 673 支队平面示意图

731 部队孙吴支队，位于孙吴镇西南 1.5 公里的小山上，日本人称之为铃兰台。于 1940 年 6 月始建，12 月完成。孙吴支队对外番号是 673 支队。内设总务课、第一课、第二课、资材课、教育课。建有青砖房 300 余间，有 15 间用于饲养实验用动物，其余为支队官员办公室、制菌室、训练室、守备部队营房、食堂、仓库、汽车间、锅炉房、家属宿舍、卫兵室等。安装大型锅炉一部，还建有环山公路，电力电讯、自来水管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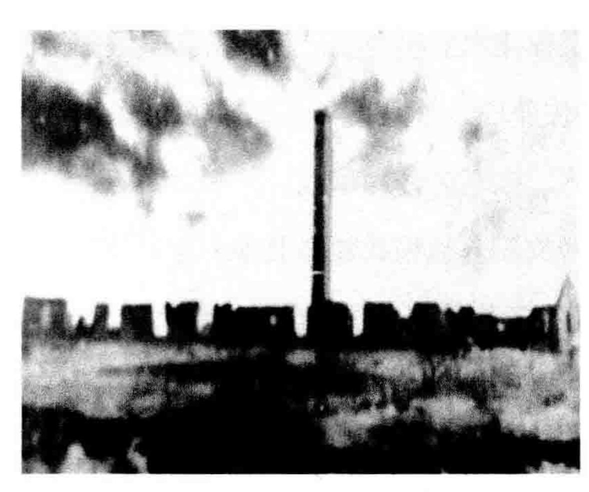
等设施。731部队孙吴支队初建时期的队长是佐佐木义孝少佐，后由松平丰太郎接任，1942年由731部队训练教育部部长西俊英中佐兼任。孙吴支队人员初期30多人，1941年增加到80多人，到1945年8月已达120人。按职务分为军医、药剂师、卫生军官、技术军官、教官、下士军医官、卫生兵、财务文职人员和武装警卫等。管理劳工的叫金子，管理水泵的叫一条，管理锅炉的叫大熊，管车库的叫多井。金泽少尉负责培训学员，每年培训两批。两年中训练出学员50多名。由于西俊英中佐仍任731部队的训练教育部部长，所以孙吴支队成了731部队本部和各支队及相关部队人员的培训中心。孙吴支队经常举办细菌研究、制造等专业培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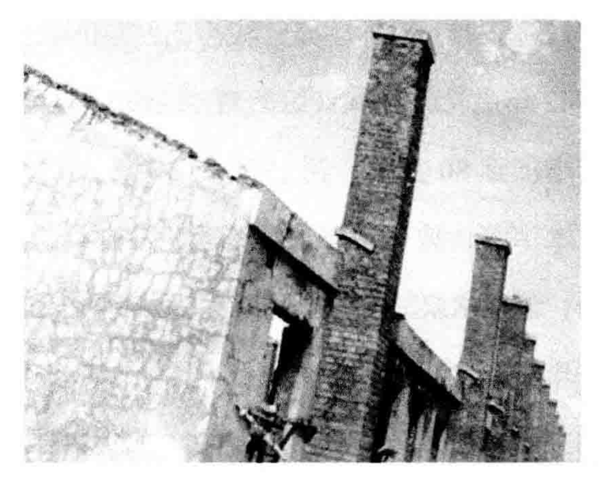
1953年3月，黑龙江省的佟明贤曾去孙吴调查日军制造培养细菌的情况，他采访了当地的村民和曾在673支队干活的中国劳工，目睹了孙吴一带日本兵营、飞机场以及细菌工厂的残迹，将有关情况记述下来：日军在此地建筑了大批兵营、军用仓库及飞机场，并修建了好多山洞和培养细菌的工厂。佟明贤还对该支队的人员编制、设备设置以及细菌生产、人体实验情况进行了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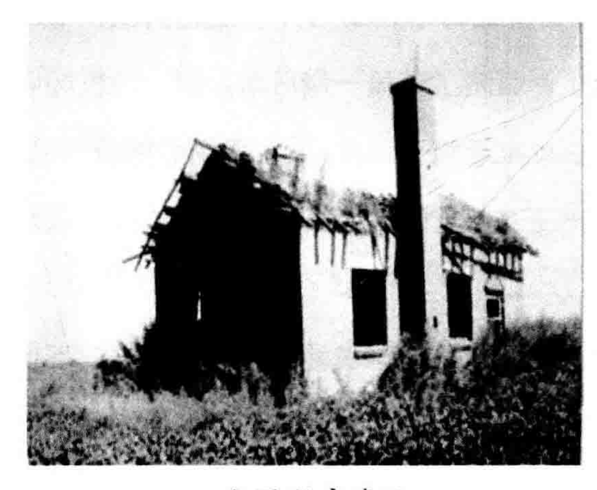
第731部队选址孙吴建立支队，其主要原因是这里是国境地带，距中苏边界不足百里，便于对苏联发动细菌战；再就是孙吴地区人口少，可用地多，细菌基地周围平坦，没有山谷、沼泽地等自然障碍；此地交通方便，为铁路沿线，且劳工多，“实验材料”充足；这里适宜老鼠生长，有各种鼠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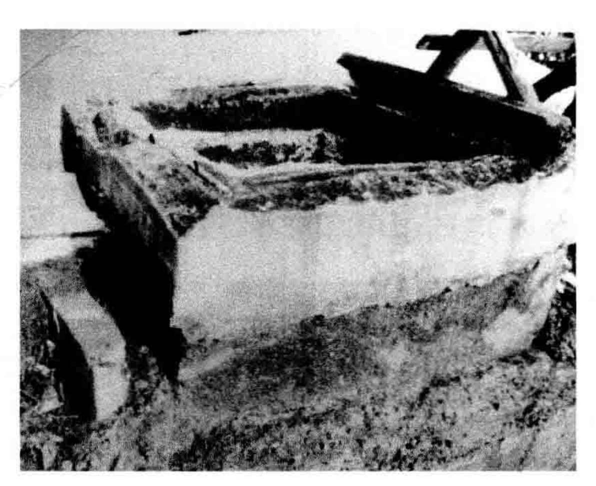


孙吴673支队遗迹


2645部队细菌实验房遗址


673支队兵舍遗址


水源泵房遗址


水井遗址

第二节　老鼠、跳蚤繁殖

孙吴673支队主要任务之一是繁殖跳蚤和培殖鼠类及动物，主要用于细菌实验。其繁殖跳蚤的方法和手段与其他支队一样。在培殖鼠类动物方面，孙吴673支队是往哈尔滨731部队本部上交最多的支队之一。为了能有大量鼠源，在孙吴城乡强迫群众交田鼠，责令学生停课捉老鼠。支队的15间饲养室鼠笼多达22层，地下有试验室和贮存饲料的地窖，上层是成排的鼠笼。饲养老鼠1万多只。还有黄色老鼠，民间称之为“大眼贼”，还有兔子、山羊、灰鼠、白鼠、麻雀、江豚，每周在这些动物身上轮抽一次血。

据西俊英供认，从1943年1月到1944年7月，以后从1945年7月到同年8月，他担任第673支队的支队长，这个支队曾专门养育白鼠、老鼠、豚鼠，以及捉捕鼠类和培养跳蚤。他们把老鼠和跳蚤等送到第731部队本部，用于制造细菌武器，以便进行细菌战。1945年3月，日军在南洋一带遭受挫折以及由于准备对苏作战等缘故，石井四郎命令第673支队，加紧工作，特别是饲养鼠类、捕捉鼠类，繁殖跳蚤等工作成为支队的中心工作。该部队在孙吴城乡强迫群众交田鼠，责令学生停课捉老鼠。1944年5月，673支队扩建了设备室，从731部队本部运来了两台大锅炉等一批新设备，其中1台大锅炉已安装完毕，尚未投入生产，673支队就垮台了。据孙吴县党校离休干部孙书志回忆，1945年8月，孙吴支队的日本兵都跑了，他和一群孩子在第673支队遗址西山去玩，从一个被烧毁的房框子里发现了地下通道的铁盖，他们掀开盖子顺着通道进去，发现两边有一些地下室，里面到处是老鼠笼子。地下室的工作案台上，摆放着数不清的玻璃试管和圆型玻璃盘。该县建委退休干部杨乐先说，他在第673支队遗址残垣断壁中，曾发现蠕动着的一团虱子。

在孙吴县北面，还有一个第2645部队，群众曾叫它东仓库，1939年建，1941年竣工。这个部队与日军物资仓库紧挨着，拥有营舍25间，其中制药室、化验室占用15间，另外10间是动物舍。据证实，在这里饲养白鼠、红鼠、灰鼠等200余只，兔子40余只，江猪50多个，还饲养着苏雀。化验室有中村少尉等5名日本人，养鼠班有山口班长等。他们除了每星期给动物抽血外，还以检查身体为名抽过3 000名劳工血并化验。这是日本军事集团所设的一支细菌部队。[①]

第三节　细菌研制

731孙吴支队队长、兼任731部队训练教育部部长中佐西俊英在细菌学方面受过系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69页，中华书局，1989年。

统的专业教育，因此在 1944 年 7 月起兼任 731 部队的训练部长，孙吴支队也就成了 731 部队培训的基地，由他主持在本部和孙吴培训了许多细菌战的骨干分子。从这个意义来说，孙吴 673 支队不仅是细菌试验与生产基地，也是细菌战人员培训的中心。1941 年 8 月，孙吴 673 支队接受的主要任务是“生产细菌武器的必要材料的全盘工作”，即培殖传播细菌的媒介物及生产细菌和防疫血清。这个支队还培育大批鼠疫菌，除自用外，还定期送 731 本部以供使用。1944 年 5 月，北野部队长派柄泽十三夫视察各支队，研究增设设备，提高细菌生产能力和解决保证连续性生产的问题。孙吴支队因此得到一批培殖细菌的现代化设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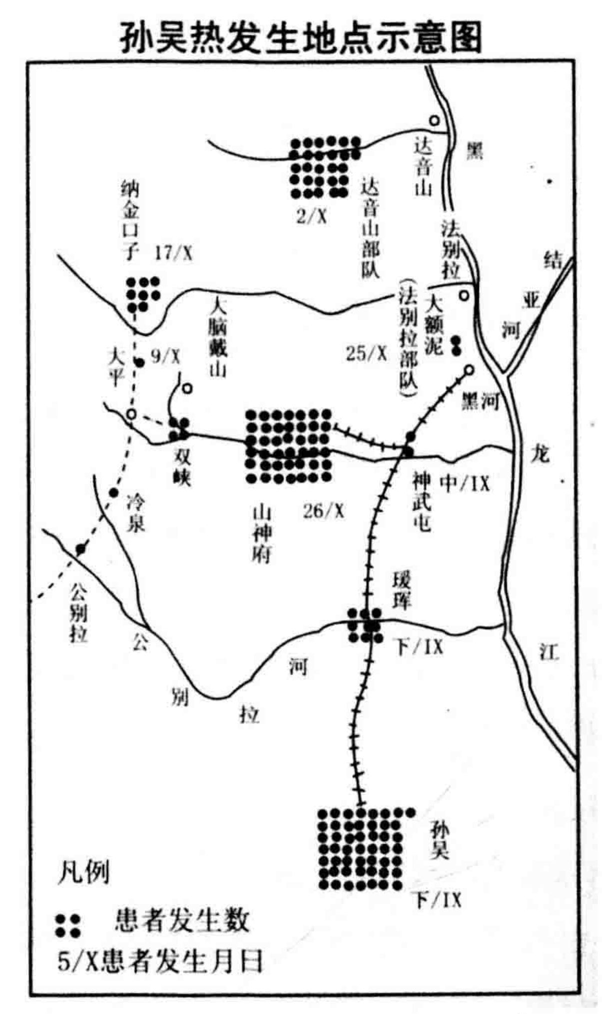


人体及动物解剖池遗址



细菌制品地下贮藏井遗址

第四节　细菌实验



673 支队建立以前，日军细菌部队就在孙吴地区进行过人体实验，据《逊克县志》载：1937 年日本兵强行给居住在浦拉口子的鄂伦春人注射“防疫药物”，结果一次死亡 50 多人，占这个县鄂伦春人总数的 1.8%。

1939 年，从山海关转运来 90 名俘虏，其中 30 名留在 731 部队本部，60 名被押送到孙吴站，关进日军管区的监狱里。731 部队及 673 支队利用这些俘虏进行“孙吴热”研究，做流行性出血热人体传染及治疗实验。据杨柏林编著的《孙吴蒙尘岁月》记载，1939 年 9 ~ 12 月，中苏边境孙吴地区侵华日军中有 20 多人又感染上这种不明原因的疾病，死亡 6 人。其症状为发热、蛋白尿、皮肤出血并呈现紫斑。当时按发病的地名命名为“孙吴热”。到 1941 年，日军中先后有 10 000 人患“孙吴热”，患病死亡率约占

15%。孙吴县是我国流行性出血热最早的疫区之一。“孙吴热”这一病名被沿用多年，后定名为“流行性出血热”，但在我国医学文献中，仍然提及“孙吴热”这一原始名称。

这一疾病的迅速传播，引起日本侵略者的关注。731细菌部队对“孙吴热”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对该病的流行特点、病情变化、临床表现、治疗措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731部队长北野政次曾组成研究班，并直接领导，对“孙吴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班中有个代号为“A”的军医少佐供认，1941年，在孙吴地区，他用注射器采患有“孙吴热”的日本兵的血，注射在地区医院干活的两名中国劳工身上，以传播疾病。“A”军医还回忆说，“孙吴热”是可怕的病，曾用一些动物作实验，但总是搞不清楚，用人作实验后，置于实验台上的人的症状清晰地出现了，全身突然出现斑点……他说：“我尽管作了实验，但也全部进行了治疗。”研究班还对尸体进行了充分的解剖。1942年，日军军医少将伊吹目雄在日本军医团杂志上刊载文章说：“加茂部队对此进行了解剖，阐明了特有的变化，将其血液对猿及豚鼠进行实验，获得病毒移植成功，发烧、浮肿及出血症状传种9代。”[①] 有资料证实，1942年，北野政次领导的研究班在孙吴地区捕获40只黑线姬鼠，在鼠身上收集到耶氏历螨203只。他们将螨制成悬液后，再注射进黑线姬鼠体内，25天后，将鼠杀死。用鼠的肝、脾、胃制成乳状液，经病毒过滤器过滤后，将乳状液注入猿体内。19天后，该猿发病。再采病猿的血，注射在另一只猿体内，引发出血热，以确定本病由病毒引起。这里所说的“猿”到底是什么呢？日本作家森村诚一著书说：“1938年以来，前金泽医大的二木秀夫博士在第731部队新定的研究课题——关于探索‘孙吴热’病原体的研究上，一直执刀宰杀‘满洲猴’，干得相当利落。满洲提供实验的‘猴’，不拘是苏联产的还是中国产的，一律都叫‘满洲猴’。最近苏联当局对细菌战犯又有些披露，据说二木博士一听到这个消息，情绪立刻就变得特别消沉，其实这也是无可奈何的。”森村诚一还提到，石川博士率领各种研究班，陆续到满洲所有的国境地带，对凡是认为同病源有关的老鼠……都做了采集，并对疫病感染者即“满洲猴”做了彻底的解剖。现今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病理研究室的某博士说：“凡是提到

① 转引自杨柏林编著的《孙吴蒙尘岁月》，第7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猴的地方，只管把它理解成人就是了。”为使人们格外注意这个问题，作者采访曾在731部队工作过的北里研究所过滤性病源菌研究部部长笠原四郎博士时，问他猴究竟是什么猴？笠原四郎回避说：“你可别再逼我啦！要问那个东西你最好去找军人。”[①]1983年，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的论文《流行性出血热的新进展》中指出：“日本学者40年代在中国东北用人的志愿者实验，发现了从人到人的传播的感染因子，1945年，日本战败后，所有的资料和记录被遗弃。”[②]上述资料证实：“满洲猴”与“马路大”一样，只不过是人的代名词。731部队与673支队的“孙吴热”研究是利用人体进行的。

673支队附近的2645部队也进行人体实验活动，曾以验血检查身体为名，抽取3 000多名中国劳工的血作实验。673支队还多次接收“特别移送”的“实验材料”进行人体实验。除上文提到的那60名俘虏外，还有其他资料可以佐证：据日野需供认，1945年，他在孙吴县特务股工作时，曾将两名爱国者送到孙吴支队作人体实验。

此外，该支队还实施过细菌攻击。据日军细菌部队成员加地信证实，1941年731本部汇同孙吴673支队在孙吴毗邻的德都县传播霍乱菌与炭疽菌，造成人畜大量死亡。日本医学教授卢田说，此次发生的马炭疽病相当严重，时间不长即死掉数千。七星泡村仅50余户，有30多人感染病菌死亡，村长魏志清饲养的50头牛，只剩5头。



农民迟连升指认埋人坑

孙吴县西兴县西兴村，原名叫西窑地。1932年秋，侵华日军占领孙吴后，在这里

① [日]森村诚一：《魔鬼的乐园》第三部，第124、12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 转引自杨柏林编著的《孙吴蒙尘岁月》，第7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建砖窑烧砖。当地农民迟连升 12 岁那年，闯关东来到西窑地，在窑上挑沙子。距窑地 3 里多的小南山上，松树染翠，铃兰花盛开。日军看中了这个地方，称之为“铃兰台”，1940 年，日军在此地修建了细菌基地，即 673 支队。当年，迟连升就在日本军队里做劳工。1999 年，孙吴县文物考古工作者采访迟连升时，他回忆说，在原 673 细菌支队驻地的西山脚下，50 多年前，他亲眼看到了草草掩埋的中国被害者的白骨 100 多具。迟连升说：大约是 1944 年，我 15 岁，赶上西南沟小河涨水，冲下来不少鱼，我抓些鱼进城卖了几毛钱，为了避开警察我绕道从小南山下回家。走到山坡下通往细菌部队的道路西边，看见一群猪在一个大坑里拱什么，走近一看吓了我一跳，只见一大片白花花的人骨头、人骨架，我赶紧跑回家。现在回想起来，足有 100 多具尸体，不会是日本人也更不会是中国人的坟。迟连升的儿子说，我小的时候到细菌部队山上去玩，在解剖消毒池旁边也看见过死人脑瓜壳。迟家父子在解放前后的发现，是 731 细菌部队孙吴支队用中国人做人体实验的见证。

第五节　支队灭亡

8 月 11 日，孙吴、黑河一线的北正面，苏军为防止日军从远东红军背后突袭苏联，而晚于东正面、西正面两昼夜向日军发动了全面进攻。日军 123 师团长北泽贞治郎依照作战方案，调动各部队进入作战阵地。8 月 12 日，各部队陆续进入阵地，同时组织“烧却处理班”焚烧营房、仓库等军事设施。

8 月 12 日，在孙吴西山，673 支队驻地一片混乱，支队长西俊英中佐特地从长春赶回孙吴处理支队撤退事宜。此时的 673 支队还有 100 多名主力队员和 50 名家属。支队长西中佐以下有军医大尉金泽一久，医药少尉井上正男，主见习士官梅冈孝，第一分队军曹神田信雄以及二、三、四分队的伍长铃木菊一、河野孝树、船奥勇。支队长西俊英按照石井四郎销毁细菌实验罪证以及孙吴战区 123 师团长北泽贞治郎的命令，锅炉班的大熊带领 4 人把机密文件、研究资料、图书、实验用小动物塞进锅炉里烧掉。命令井上

少尉为首的烧却处理班放火烧房，爆破军用建筑。西俊英中佐带支队按123师团长北泽贞治郎的命令，进入孙吴北部的北水台阵地进行防守。8月14日，673支队全体人员集合，听西俊英中佐的训示，并给每人发了1瓶剧毒药——氰化钾，要求他们必要时随时自决，当时士兵东条明即把药片吃了下去，立刻毙命。整个支队除去哈尔滨本部运送机密文件档案及奉命护送“家属”和少数“自由南下”去北安者以及个别人“自决”外，其余89人包括支队长西俊英在内，都于8月17日向苏军投降作了战俘。

该支队长西俊英说，1945年8月9日深夜，他接到了石井四郎部队长拍来的密电，他还没有弄清楚密码的内容，就颁发了销毁罪证的命令。起初，他们没有想到日本会投降，打算退到山林里，实行集体自杀。后来，他们接到了师团长命令后就有秩序地投降了，其中只有1人服毒自杀。他供认：“1945年8月11日至12日，因苏联军队已在举行进攻，为了掩盖日本关东军制造细菌战武器以及第731部队中由我领导的第673支队参与此种罪行的事实，于是我命令把本支队的公务房屋、住宅、设备、材料和文件统统烧毁了。为了同样的目的，1945年8月14日，按我的命令，发给了本支队全体128人每人一剂毒药，要他们遇有被苏军俘虏的危险时即服毒自尽。”[①]

第三章　林口162支队（满洲第162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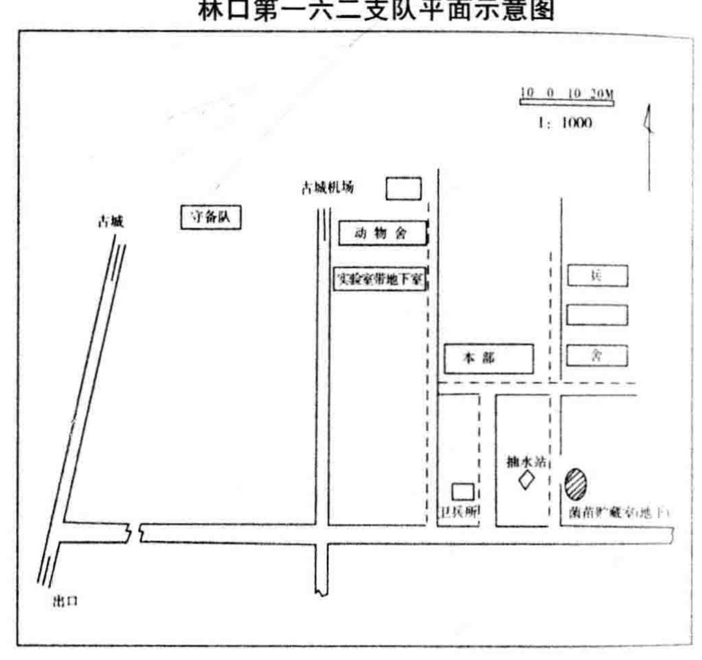
第一节　支队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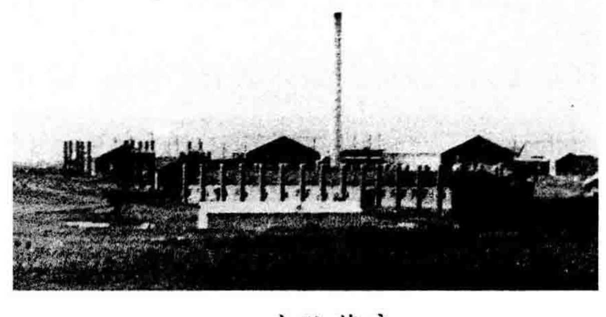
林口支队组建于1940年12月2日，1941年8月，改称为满洲第162支队，隶属于731部队。支队营区位于林口镇与右城镇之间的东岗梁上（现称新城），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营区内除建有支队办公室、兵舍外，还建有带地下室的实验室（约1 600平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64页，外国文书局出版局印行，19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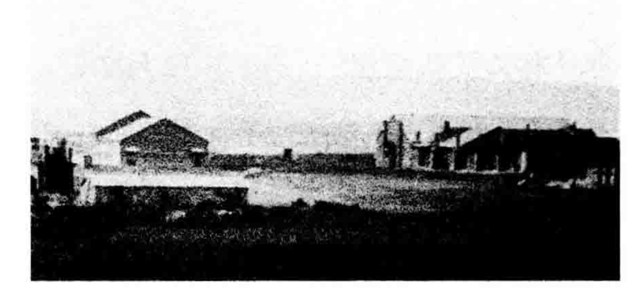
方米)、动物室及半地下圆顶式永久建筑。营区的北部是日军的飞机场，营区的西北部相距 300 米处驻有一支日军的警备队(该支队的警护部队，兵力约 100 人)。林口 162 支队是 731 部队所辖的四个支队中建制最大的一个支队，设有总务课、第一课、第二课、资材课、教育课等 5 个课。分别承担人事、经费、培养细菌、部队给水及修理滤水器、动物饲养、教育培训等任务。细矢少佐任总务课长，兼任第一课课长；渡边中尉任副课长；间所少尉任第二课课长，兼任资材课课长；渡边中尉兼教育课长。人员编制 280 人，其中军医 3 人，司药官 1 人，军需官 1 人，佐、尉级军官 5 人。历任支队长为山口吾一、荒濑精一、榊原秀夫。还有十几名中国人在林口 162 支队作苦役。

林口第一六二支队平面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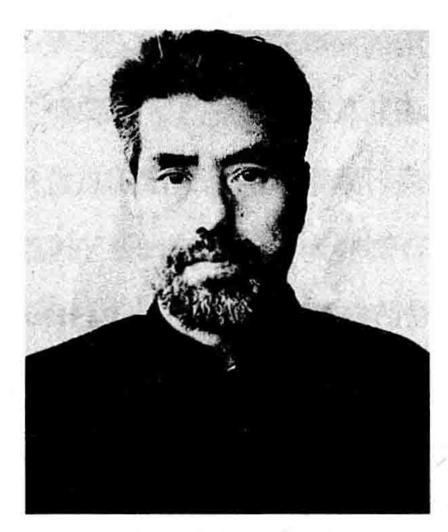




支队营房



支队营房



162 支队长榊原秀夫



162 支队总务课长兼第一课课长细矢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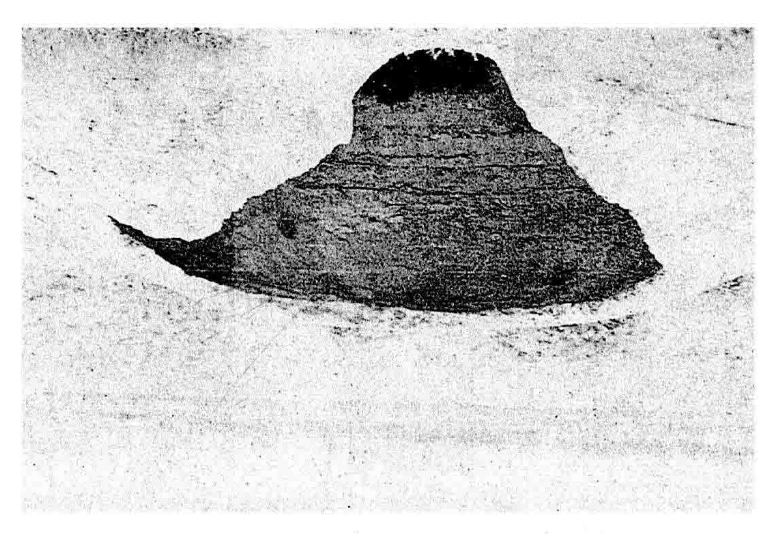
第二节　动物饲养

1944 年 12 月，第 731 部队召开支部长会议，指出 1945 年度要加强白鼠的饲养及协助各部队的防疫工作，以防止因传染病减低日军的战斗力。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部署使用鼠疫菌进行细菌战，并说明利用流行性出血热进行细菌战的可能性。1945 年 4 月，731 部队再次召开了支部长会议，石井四郎部队长讲了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作战不利的情况，指示各支队要为细菌战作准备。要求各支队全力捕鼠和繁殖白鼠，繁殖跳蚤，以协助 731 部队进行细菌战。会上，总务部长太田大佐、企划课长田部中佐和各支部长研究了有关捕鼠的人员、方法、运输等问题，决定各支队以军官或下士官为首组成常设捕鼠班，兼用挖洞、器具捕捉等方法大量捕捉老鼠，所捕老鼠交给 731 部队第二部的田中班。会后，162 支队长榊原秀夫从 731 部队领取了捕鼠器具，召集了林口支队的干部会议，全面部署捕鼠、养鼠和繁殖跳蚤的工作，准备进行细菌战。

一、跳蚤繁殖

培养繁殖跳蚤是林口 162 支队的主要任务之一。1945 年 6 月为加强跳蚤繁殖速度和提高繁殖能力，支队长 榊原秀夫派出了以七夕曹长为首的 8 人前往 731 部队本部学习培养繁殖跳蚤的方法。并由七夕曹长从 731 部队本部领回“母本”跳蚤 1 公斤，在支队

地下室内的适合跳蚤培养繁殖的环境下繁育。先期使用的培养繁殖跳蚤的工具是两个大型水槽，培养繁殖的方法是先把“母本”跳蚤投入水槽后，再每天把 3 ~ 5 只肥鼠放入水槽内充当跳蚤的食物。“母本”跳蚤透过吸食鼠血进行繁殖。随后又改用从牡丹江日军仓库取回的 1 000 个空汽油桶作为繁殖跳蚤的工具。同时为了加强培养繁殖跳蚤的能力，由细矢少佐任教官在支队内训了 10 名新的专门培养繁殖跳蚤的人员。1945 年 6 ~ 7 月末，林口 162 支队共培养繁殖跳蚤 1.3 公斤。



162 支队细菌制品地下贮藏室

二、鼠类捕捉、饲养

这个支队的主要任务是饲养老鼠，繁殖跳蚤。太平洋战争后，该支队的养鼠任务繁重起来，光靠养鼠远远满足不了 731 部队的需要，还必须去野外大量捕捉田鼠。1945 年 4 月，731 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根据大本营的命令，为准备进行细菌战，需要 1 ~ 2 吨的跳蚤。而要达到这个数量的跳蚤，就需要更多的鼠类。因此，石井四郎命令 731 部队各支队全力进行捕鼠和大批饲养繁殖白鼠。林口 162 支队受命后，在林口设置了以间所少尉为首的 25 人专业常设捕鼠组，同时组成了以渡边中尉、岛田准尉为首的 4 个临时性捕鼠班，全力投入捕鼠工作。他们分别在支队驻地的周边田地和千振、佳木斯、龙爪、鸡宁等地展开了捕捉各种鼠类的“大会战”。据曾在 162 支队工作过的上野雇员说：“在林口支队，捕鼠工作比培养细菌还重要。我在第二课防疫室工作阶段，曾参加两三个月的捕鼠工作。外出捕鼠时，不准提部队的名称，穿着便服让人看不出是哪个部队的。从

1944 年末开始，仅用两三个礼拜的时间就在千振、佳木斯一带捕捉了 5 万只老鼠”。[1] 又据久留岛供称：“我又两次（每次 7 天）到外处去捕过田鼠。我总共捕获了约 300 个田鼠，然后把它们送到第 731 部队去用来生产细菌武器”。[2] 他们以消灭“鼠害”为名，大肆宣传，让日本开拓团和当地的百姓为其捕捉鼠类。佳木斯市各学校也动员学生捕鼠，据周绍濂见证，1945 年春季，他在佳木斯市协和校优级部念书，学校发给学生捕鼠笼子和诱饵去捕鼠。捕的老鼠交给学校或市公署。家长也帮助捕鼠，一直干了两三个月。高吉祥说，1945 年，他在伪兴亚学校教书，曾部署学生捕鼠，而且要活的。当时，佳木斯市的全体学生都参加了捕鼠活动。许文章证实，当时，他在伪满佳木斯市公署卫生科防疫股当雇员，他亲眼看见每天往卫生科送老鼠 300 多只，当日就由住西南岗子的部队来汽车用木箱子装上拉走。

1944 年 6 月，黑龙江省林口县新城乡的张清林去 162 支队饲养老鼠、兔子、海猫等，他一直工作到日本投降。他回忆说，他刚去时，该支队仅饲养千余只白鼠，到 1945 年，白鼠增加到 2 700 多只。这些白老鼠从日本运来，在动物室东面的 1 间大房屋里由日本人亲自喂养。饲养白老鼠的日本人轮流上岗，每次约 20 多人，1 个月轮换 1 次。该支队长榊原秀夫每个月到鼠房一二次，去检查养鼠工作。西边的鼠房里饲养着捕捉来的各类老鼠，由 1 个日本兵和 4 名中国劳工负责喂养。张清林还说，1945 年，战事吃紧，日本人强迫当地老百姓去捕鼠，每家发两个鼠笼子。日本兵也去野外捕老鼠。每隔 7 天，就往 731 部队本部运送 1 次老鼠。日本人说把老鼠运到哈尔滨制药，其实是培养细菌用的。

该支队 1945 年 4 月初至 8 月初共捕捉各种鼠类 2.7 万只。同时，配备专业人员加强了白鼠的饲养繁殖工作，使白鼠的繁殖能力和数量急剧上升，由 1944 年的 800 只快速繁殖到 1945 年 8 月的 6 000 ～ 7 000 只。林口 162 支队向 731 部队本部大量输送老鼠，据榊原秀夫、田村良雄等人揭发，1945 年，“从支部员到‘开拓农民’皆被动员捕鼠。

---

① 长春市公安局存敌伪档案。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88 页，外国文书局出版局印行，1950 年。

只送到 731 部队的鼠类，4 月为 1 000 只，5 月为 1 万只，6 月 8 000 只，7 月 7 000 只，共达 2.6 万只之多。”[①] 当年，总共提供各种鼠类累计达 3.4 万只。

三、其他动物饲养

林口 162 支队为研究畜禽类的细菌传播渠道和方法饲养了其他动物，其中有马 6 匹 (其中马驹 4 匹)、羊 2 只、兔 50 多只、狗 12 条、海猫 700 多只及其他禽类。该支队饲养的这些动物主要是定期地抽取它们的血液，用这些动物的血液与研制的细菌相溶解，研究如何将细菌传染给各类动物，最终达到细菌战的目的。

第三节　细菌生产和人体实验

一、生产设备

林口 162 支队拥有大批的生产细菌的设备，其中有大型高压灭菌锅炉 5 具，小型高压灭菌锅炉 1 具，小型蒸汽灭菌器 2 具，干热灭菌器 3 具，大型孵育器 2 具，小型孵育器 3 具，远心沉降器 3 具，显微镜 35 台，天秤 10 台，氢电子浓度测定器 1 具，酒精灯 80 盏，白金条 100 只，还有若干生产细菌用的玻璃器具。设有培养室、镜检室、消毒室等。生产细菌所需材料 60 吨，即蛋白消化素 10 吨、肉精 10 吨、液汁 30 吨、盐 3 吨、棉花 2 吨等。另外，还有为准备战时的防疫医疗箱两套（每套 33 捆包），其中除小型蒸汽灭菌器 2 具、干热灭菌器 3 具、小型孵育器 3 具外，还有蛋白消化素 0.8 吨，压榨干燥肉精 0.7 吨，液汁 2.3 吨，食盐 0.3 吨。

二、生产能力

据榊原秀夫供认，162 支队有大量生产细菌的设备、器材和一切物质条件，所缺的是 731 部队的命令。他还说，该支队具备大批量生产细菌的能力，1 个生产周期，大体是 7 天左右，当时靠支队的设备、80 多名的生产人员以及第一课的生产要领和生产能力

① 《大量捕鼠繁殖细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91 辑。

等情况，该支队 1 个生产周期能生产纯细菌约 30 克，1 个月内大约生产 150 克。如在支队设立大型高压灭菌锅和孵卵室，使用 1 000 个石井式细菌培养器，即利用该支队的全部设施时，一个月内可以生产出纯细菌 15 公斤，榊原秀夫说，如果充分利用 60 吨原材料，足够制造 550 公斤细菌。

三、生产方法及流程

1945 年 6 月，该支队第一课的细矢少佐奉命研究大量生产细菌的方法，主要研究培养基的时间缩短的方法：过去，用锅灭菌，温度 100 度需用 30 分钟，间隔 24 小时，3 次即需 48 小时；使用 15 磅的高压蒸汽炉灭菌，温度 120 度只需 20 分钟。再就是研究石井式培养器的培养法：162 支队使用的是长约 50 厘米、宽 40 厘米、深约 5 厘米的带盖的金属制器具，将 300 只试管涂抹在 10 个培养器上来实验是否能增加细菌产量。这项研究因细矢奉命去敦化防疫而停止。

一个生产周期大体 7 天左右，第一天进行干热灭菌，即对培养试管进行灭菌、洗涤、干燥；第二天制造培养液，并把它注入试管里；然后 3 天，用高压蒸汽锅炉灭菌；第六天把细菌涂抹在培养基上，放在孵卵器里；第七天采集细菌。

四、细菌收集及产量

榊原秀夫任 162 支队长期间，以进行细菌战为目的，贮藏和培养了伤寒、副伤寒、霍乱等细菌。林口支队建立以来，在各部队流行传染病时收集细菌，又从第 731 部队领取了霍乱菌，并把这些细菌储存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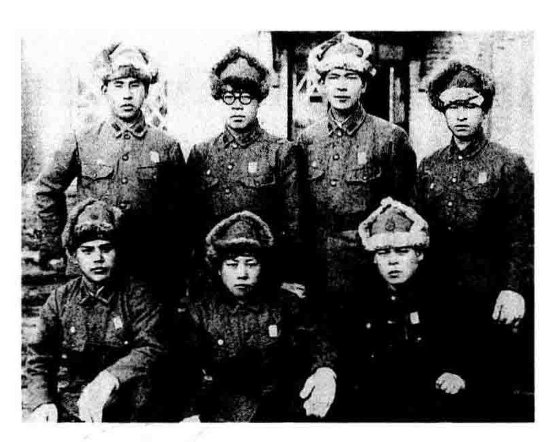
1944 年 11 月，久留岛佑司调回 162 支队，在第一课细菌实验室里担任实验见习生。他在军曹管丰和第一课课长细矢领导下，担任把结核菌、伤寒菌和副伤寒菌放置到营养液里，调剂培养细菌时孵化器内的温度等工作。

1945 年 1 ~ 6 月，林口 162 支队共生产霍乱菌 200 试管，伤寒菌 370 试管，A 型副伤寒菌 300 试管。

五、细菌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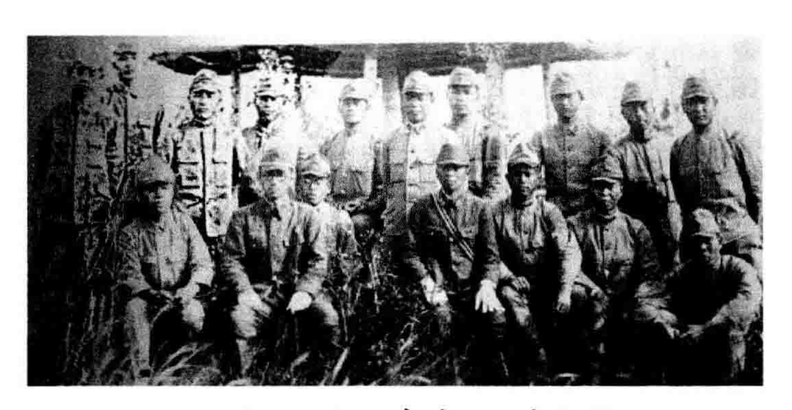
162 支队曾用老鼠实验细菌的毒力，比较它的致死量，并把强毒菌保存起来。1945 年 3 月，榊原秀夫派细矢去 731 部队本部领取霍乱菌时，把该支队培养保存的 2 管伤寒菌、

A 型副伤寒菌带到 731 部队第一部检定细菌的毒力。后来，榊原秀夫接到了第 731 部队第一部的检定毒力的报告。报告称这两种细菌合乎保存菌中的标准毒力（强毒菌、弱毒菌中间的中等毒力）。该支队曾用 4 名中国人进行人体实验，检验细菌的效能，并杀死了他们。



162 支队队员

第四节　教育培训



162 支队伍长任官特别教育合影

为准备进行细菌战，林口 162 支队组织、培训了大批专业人员，充实该支队细菌的研究和生产力量。1945 年 3 ～ 6 月末，以支队教育课课长渡边中尉任教官、以森军曹、管军曹、沟渊伍长为助教，开设了细菌研究、细菌生产、鼠类繁殖、细菌检查、细菌消毒、传染病防疫、人体构造、血液血型判断、卫生常识、细菌作战为主要内容的课程，对该支队的 70 名人员进行了 3 个月的专业教育培训。教育培训非常紧张，连淋浴的时间都

没有，只在上厕所时用水洗洗头，被受训者称为“魔鬼化的训练”。培训结束后，这70名受训人员分别配备到第一课、第二课，充实了该支队细菌研制、繁殖和细菌生产的能力。

第五节　支队灭亡

1945年8月9日下午6时，支队长榊原秀夫得知苏联军队向日军关东军全线大举进攻时，命令杉村茂夫、米谷孝弘、小山福马3名士兵将支队培养繁殖及捕捉的鼠、兔和1.3公斤跳蚤及机密文件全部送到731部队第三部南栋。8月10日，为销毁该支队生产和准备进行细菌战的证据，支队长榊原秀夫命令间所少尉将营区内的所有建筑物全部烧毁。同时命令将所有生产细菌的设备、材料以及已生产的霍乱菌100试管、伤寒菌120试管、A型副伤寒100试管和保存的霍乱菌、伤寒菌和伤寒A、B型副伤寒23试管及100个大型培养皿的霍乱菌（细菌是准备在佳木斯对进攻的苏联军队实施细菌战的），全部装载到50辆汽车上。全支队开始向佳木斯方向溃逃。8月12日，该支队在到达佳木斯附近的七星时探知苏联军队逼近佳木斯，榊原秀夫下令将50辆汽车装载的材料、设备、细菌烧毁。该支队在溃逃至桦林时与苏联军队遭遇，交战时该支队人员大部战死，支队长榊原秀夫被俘。

附：

1956年5月23日，应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邀请，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孟雨、中国协和医学院教授张学德、中央卫生研究院副研究员方刚等人对162支队长榊原秀夫及其他工作人员参与制造细菌武器、准备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案卷材料进行了鉴定，其鉴定如下：

鉴定书（节录）

162支队的工作按其专门性质和内容来说，是为了制造细菌武器和准备进行细菌战。这个结论是根据以下事实：

第一个问题：榊原秀夫所领导的162支队（林口支队）所进行的工作是为了什么

目的？

一、162支队是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所属的最大的1个支队。731部队及其所属各支队的工作是专为进行细菌战，这项事实已由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的审判材料所证实。

二、162支队中有为了大量生产细菌所需的原料约60吨、大型高压蒸汽灭菌锅5具、石井式细菌培养器1 000具及被告人供述出来的其他重要设备等。根据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所判明：用石井式细菌培养器生产出的细菌只能是供制造细菌武器使用的。

三、榊原秀夫受过高等医学教育，应该知道医学的目标是为了减少人类的疾病和死亡。但他竟不顾人类的基本道义原则，积极地参加领导制造细菌武器的工作。他自1942年起，在担任驻佳木斯前日本关东军第10师团防疫给水部长时，即已进行对细菌战的准备工作，并且在1943年，他又到731部队接受了进行细菌战的特殊训练。此后，他曾多次对部下进行了关于生产细菌武器和实施细菌战的教育。我们认为，以他的专门知识和他所受的有关进行细菌战的专门训练，榊原秀夫是有能力来领导162支队生产大量细菌武器和进行细菌战的工作。

四、162支队保存有霍乱菌、伤寒菌、A型副伤寒菌、B型副伤寒菌和痢疾菌的菌种。这些细菌都可以用来进行细菌战。该支队曾于1945年3月将所培养的伤寒菌和A型副伤寒菌，特别送往731部队在活人身上作实验，以检定其毒力，因而杀害了4名我国无辜人民。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方法来进行毒力检定，显然只能是为了进行细菌战这一罪恶目的。

五、自1945年4月起，162支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捕鼠工作，捕鼠时只捕活鼠。捕来的鼠在该支队短期饲养后即送到731部队。这种捕鼠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灭鼠除害，而是为了用这些活老鼠繁殖能带鼠疫菌的跳蚤，制造细菌武器。

162支队同时进行了繁殖跳蚤的工作。其所繁殖的跳蚤是以公斤计数的。可以肯定地说，繁殖这样大量的跳蚤绝非为任何医学科学研究所需，而只能是为了使之携带鼠疫菌以进行细菌战。

根据以上5点，我们认为已有足够的事实确切地证明榊原秀夫所领导的162支队的

工作目的是大量制造细菌武器和准备进行细菌战的。

第二个问题：162支队有怎样的细菌武器生产能力？

经过我们鉴定认为：在162支队中已经存有培养细菌用的大批原料，其数量足够生产500公斤以上的细菌，而在良好的条件下，这个产量可能达到1 000公斤。从所培养的细菌的致病性能来看，这个产量是十分巨大的。该支队已经有了大批的石井式培养器和其它大规模生产细菌所需要的设备，因此利用这些原材料生产500公斤以上的细菌是完全可能的。

第三个问题：1945年8月10日，榊原秀夫率领其部下向牡丹江出发时，所携带的细菌及其他原料和设备等是否能够供进行细菌战之用？

经我们鉴定认为：这是可以的。榊原秀夫在出发牡丹江时，携带了162支队在同年五六月所生产的320只试验管的霍乱菌、伤寒菌、A型副伤寒菌及100个培养器皿的霍乱菌，可供随时进行细菌战之用。同时，他所携带的大批设备和原料，在达到有适当条件的据点后，是可以用来继续生产细菌武器的。

第四个问题：162支队所生产的细菌武器的危害性如何？

我们认为：162支队所生产的细菌及所繁殖的能携带鼠疫菌的跳蚤，用作细菌武器，都能造成大规模的疾病流行和死亡。霍乱和鼠疫都是烈性传染病，传播力强而死亡率高，在历史上曾有过多次广泛的流行。其它如伤寒、副伤寒和痢疾菌，作为细菌武器，也可以造成居民大量发病和死亡，因为这是由于传染病本身的特性以及用这种人工撒布传染病的特殊方式进行细菌战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略）

第四章　牡丹江643支队（满洲第643部队）

第一节　支队概况

牡丹江支队组建于1940年12月2日。1941年8月改称为满洲第643支队（也称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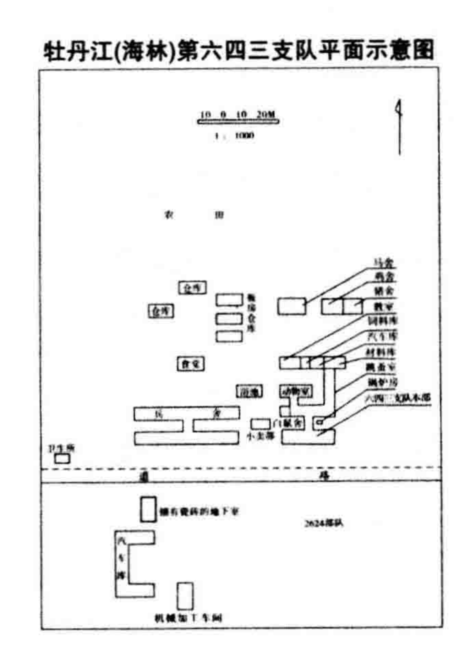
林支队、牡丹江支部)，隶属于731部队。支队营区位于海林县东北4华里处的腰屯(当地百姓称“东大营”，现称新合乡福利村)，占地面积约28万平方米。营区是长方形，四周设有铁刺线。营区西一条军用公路与距3华里处的顶岗日军飞机场相连；营区北与距4华里的斗银沟日军450部队相邻；营区东靠海林站至斗银沟日军450部队的铁路专用线；南与同驻一个营区的日军2624部队以一条东西向道路相隔。牡丹江643支队是731部队所辖的4个支队中规模比较小的一个支队。支队设有总务课、第一课、第二课、经理课、资材课、教育课。人员编制200人左右，历任支队长为池井贞夫、尾上正男少佐。牡丹江支队由日本关东军所建，是一支设备精良的细菌部队，主要建筑有宿舍工字楼、本部办公室、细菌实验室、地下室、仓库、动物舍、讲课堂、食堂、小卖店、汽车库等。距营房3里处的岗坡上建有日本飞机场，海林站至斗银沟有铁路专用线。新合乡福利村农民李宝昌曾在643支队做过劳工，他回忆说：“643支队从兵营宿舍到本部办公室，所有的房间都有完备统一的暖气设备和热水管道，只要一开水龙头，就有充足的热水流出来，简直像一所高级旅馆。离本部不远，有两台锅炉，全是雇佣中国人连续工作的……还设有地下室、实验室、饭堂、小卖店、洗澡间等。饮用水和研究用水是从斗银河边上打井铺管道引来的。水井泵房由日本人蔡田管理。雇员不穿军装，穿一身白大褂在实验室工作，当地老百姓以为这是一支‘卫生部队’。”[①]643支队大院内，还驻有2624部队，主要建筑物有地下室、车库、机械加工车间。它也是一支特种部队，与643支队有密切联系。日军溃逃时，该部队的设施全部销毁。



643支队遗址

① 中共海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程吉思：《日伪时期海林史料》，内部资料，1992年。

牡丹江(海林)第六四三支队平面示意图



第二节 繁殖跳蚤

繁殖细菌的传染媒介——跳蚤，是牡丹江 643 支队的首要任务。该支队由第一课课长中村兼管，专门培殖跳蚤，把繁殖的跳蚤送到 731 部队本部去，用以鼠疫菌培养，制造细菌武器。支队曾用灰老鼠进行研究，寻求繁殖鼠疫跳蚤的有效办法，但没取得什么成果，后来只是在白老鼠身上繁殖跳蚤。据斋藤证实，当时，第 731 部队内设立了特别训练班，专供各支队人员来学习大批繁殖跳蚤的方法。他当时是第三分部办公厅工作员，负责计算为繁殖跳蚤所必须的鼠类数量，以及计算繁殖出的跳蚤数量。他经常到繁殖跳蚤的地下室去，亲眼看见过繁殖跳蚤的设备，就是在 18 升的铁桶里用田鼠养跳蚤。该支队预备了 200 个汽油桶来当作培养器使用，第一次用了 60 个铁桶饲养跳蚤，但没有成功。后来使用了 120 个培养器，第三次使用了 30 个，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究和繁殖。设置了培养繁殖跳蚤的地下室和储存疫苗血清的仓库，由曹长须田、爱智、伍长冲山、铃木和一等兵西山 5 人专门负责跳蚤的繁殖任务。首先把切碎的干草投放空汽油桶内，然后将鼠笼内的 1 ～ 2 只喂肥的鼠固定在根底，再把“母本”跳蚤投入桶中。让跳蚤爬满肥鼠的身体吸吃鼠血自行繁殖，直到把肥鼠吸食得快成一副骨架时，桶内的

跳蚤也将繁殖到近约 10 克的重量 (约 30 万只左右)。

1945 年 5 月，731 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向各个支队下达了大批量培育繁殖跳蚤的命令，牡丹江 643 支队长尾上正男分别在同年的 6 ~ 7 月份先后派出了近 100 多名人员到 731 部队本部参加细菌实验的学习和培训，并由一名准尉带领 6 个人专程到本部取回相当数量的“母本”跳蚤准备进行大量繁殖。并从牡丹江的日军物资库领取 200 个空汽油桶作为大批量繁殖跳蚤的工具。在此期间培养出的跳蚤都按规定数目上交了哈尔滨 731 部队本部。从 7 月末到 8 月 9 日又由铃木带队先后两次专程把 25 公斤的跳蚤送到哈尔滨。

第三节　动物饲养

牡丹江 643 支队另一项重要工作是饲养各类动物。其中有马 4 匹、羊 3 只、猪 8 口、狗 10 条、兔 30 余只，豚鼠 30 余只、各种鼠类 1 000 余只。牡丹江 643 支队按各类动物的习性分别配置了动物饲养场室，由支队供给部长榊尾赖久兼任动物室主任。鼠类的饲养由日军士兵井上和雇员岛崎、小林甲等负责。早期，也用中国劳工养鼠。李宝昌、李华民曾在 643 支队饲养过老鼠。李宝昌回忆说，日本人设计了一种用铁丝编制的笼子，专门饲养老鼠。这种笼子一尺见方，底层装有包铁皮的抽匣，抽匣分两个格，前格放食，后格里垫草作鼠窝。每个笼子里养两只老鼠，一只公鼠，一只母鼠。抽匣和笼子之间开有一个圆孔，供老鼠活动。笼子里还设有转轮，老鼠进窝要经过转轮，一登轮子就转起来。鼠笼子靠墙摆放，每排 30 个，有七、八层。开始鼠房有三、四间，随着老鼠数量的增加，又从实验室腾出一间房子，专门养白老鼠。

牡丹江 643 支队饲养这些动物的目的是将动物的血液抽出，研究通过什么渠道如何将细菌传染到家畜、家禽的。在研究实验中将每匹马的血抽出半玻璃瓶，与瓶中的一种白色球状固体物相溶解，进行家畜的细菌培殖传播实验。劳工李华民见过日本人抽取马血，他说，穿白大褂的日本人每次从马身上抽大半瓶子血。这种瓶子是圆型、大肚子的，

抽血时，瓶子里放有一个白色球状的东西，用以实验。鼠类每次用十几只一同抽血，每只鼠抽出半酒盅的血，对抽出的鼠血即有单独装存的，也有几只鼠的血混合装存在一起的。并对羊、兔子等动物也定期抽血进行细菌培殖实验。

1943 年，731 部队长北野政次少将命令牡丹江 643 支队要大量地繁殖田鼠、白鼠和其他鼠类，以加紧防疫勤务。1945 年 4 月，重新上任的 731 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再次命令所辖各支队在竭力捕鼠外还必须加强饲养、繁殖白鼠的工作。牡丹江 643 支队为此成立专门捕鼠队和饲养繁殖专业队。专门捕鼠队由供给部长榊尾赖久带领，人员由原来的 10 余人增加到 30 多人，并把捕鼠的范围扩大到海林县城和牡丹江市内。成立的两个鼠类饲养繁殖专业队分别由 5 人组成，一个队负责白鼠的饲养繁殖，一个队负责黄鼠的饲养繁殖。为加速这两类的繁殖速度，还从 731 部队本部取回“母本”白鼠和白田鼠各 500 只，提高了繁殖能力。1945 年的 6 ~ 7 月，全支队的人员几乎倾巢出动，甚至供给部长榊尾赖久也亲自出马，到附近农村或田野里捕鼠。该支队在牡丹江城内的捕鼠工作最有成效，为了不暴露日本士兵的身份他们身穿便衣，经常进城捕鼠。仅仅几个月就捕获了 7 000 多只老鼠。捕来的大量黄鼠除部分留在支队使用之外，绝大部分送往哈尔滨 731 部队本部，发货单上写着“滨江站”或“平房站”，发往滨江站的黄鼠是供应 731 部队第三课的；发往平房站的黄鼠是供应 731 部队本部的。每月平均发送白鼠 350 只左右、黄鼠 200 只左右，灰鼠和家鼠 200 只左右。因此牡丹江 643 支队曾受到 731 部队本部的表扬和嘉奖。

第四节　细菌生产

尾上正男所领导的第 643 支队为研制各类细菌，训练过细菌实验员干部，先后有 160 多人参加了培训。1943 年，该支队就开始培殖各种细菌。1944 年初为增大细菌生产能力，731 部队从日本国内运来大批较先进的生产设备，并将这批先进的细菌生产设备及细菌生产原料配属给个各支队。同年 731 部队生产部分部长柄泽十三夫少佐奉部队

长北野政次少将之命亲自到牡丹江 643 支队考察，部署扩大细菌生产能力的工作。随后 731 部队本部给牡丹江 643 支队运来 6 台供制造细菌用的口径为 1 米半，高为 2 米的特种锅炉和繁殖细菌、制造营养液的原料蛋白消化素、液汁、肉精、煮盐等物资共 3 车厢(75 吨)。在实施细菌生产的过程中，该支队共配备了 5 ~ 6 名士兵和 4 名雇员专门研制各类细菌的生产、培养和繁殖。先后进行伤寒、副伤寒、赤痢和结核等细菌的培殖。为迅速并大量地生产细菌，研究出了使细菌赖以迅速繁殖并能长久保持活力的营养液。菊地则光在 643 支队担任实验员，他供认："我从 1943 年 4 月到被俘虏为止，在第 731 部队第 643 支队供职期间，曾从事于培养伤寒、副伤寒、赤痢及结核等细菌，以便研究这些细菌的属性及其引起疫症的效能。我在培养细菌时研究过细菌所赖以繁殖的营养液，目的是要制造出一种使细菌能迅速繁殖起来并能更长保存其活力的营养液。"[①] 他还说，该支队第一研究课，一旦接到上司命令时，能够迅速地大量培养细菌。643 支队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了准备细菌战。

第五节　中国劳工

在牡丹江 643 支队，曾先后有 30 余名中国人为其作苦役。日本兵对中国劳工管制很严，出入必须持证件，证件上贴有劳工的照片，并标明"仆役'字样，佩戴一种印有黄色五星及 643 部队字样的袖标。他们在日本兵营指定的范围内干活，由日本人监视。日本人工作的场所，都用白布帘子遮掩，除极少数在哪儿干活的劳工外，不准其他劳工靠近。午饭不准劳工回家，有时，劳工饿极了，去捡日本人扔在垃圾堆里的剩饭吃，被抓住后，常常挨打。他们不让中国人吃大米、白面，一旦发现有人吃，就会被抓起来，往鼻子里灌辣椒水，让人吐出来。劳工每天要干十四、五个小时的活。日本人不顾劳工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85 页，外国文书局出版局印行，1950 年。

的死活，经常殴打劳工。1943 年冬天，刚下班的锅炉房的劳工谭双庆已经疲惫不堪，又被日本人叫去刨煤炭，煤堆很大，被秋雨淋过，异常坚硬。劳工们挖了一个洞，抡镐刨煤，突然煤堆被震塌，将谭双庆砸死了。

第六节　支队灭亡

1945 年 8 月 9 日晚，731 部队本部昆虫动物研究班班长田中少佐打电话给牡丹江 643 支队长尾上正男少佐，传达 731 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的命令。命令将繁殖的跳蚤全部发送到 731 部队本部，其他的设施及物资全部焚毁。尾上正男接受命令后立即派人将 20 ~ 25 克跳蚤及密码送给 731 部队本部。1945 年 8 月 13 日，支队长尾上正男集合支队官兵将营区内的所有设施和存放仓库内的物资（包括蛋白消化素、液汁、肉精、煮盐等），及文件全部炸毁和焚毁。只留下密码和 20 ~ 25 升跳蚤，派人秘密送到第 731 部队本部去了。随后率全支队向牡丹江爱河站撤退。8 月 17 日，支队长尾上正男少佐和支队细菌实验员菊地则光上等兵及工作员斋藤在溃逃中被苏联红军俘获。

第五章　大连卫生研究所（满洲第 319 部队）

第一节　概况

大连卫生研究所原名称为满铁卫生研究所，建于 1925 年 8 月，初建时，规模很小，基础薄弱。当时主要研究有关预防流行病和传染病方面的菌苗、痘苗等。首任所长是当时日寇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金井章次博士。1938 年改称大连卫生研究所，1941 年 8 月改称满洲第 319 部队。所址位于大连市下葭街 20 号，占地面积 114 700 平方米，是日军在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细菌研究机构。设有细菌科，负责对细菌的预防、治疗研究和疫苗

的制造；病理科，负责对滤过性病毒、伤寒的预防、治疗研究和疫苗的制造；化学科，负责对化学品毒的预防研究和制造；卫生科，负责饮用水、食品消毒剂的研究和制造；血清科，负责对毒素的预防研究和血清类的研究及制造；疫苗科，负责疫苗的研究和制造。全所有医师、兽医、药剂师、农学士、职员、雇员 124 人（包括 32 名中国人）。所长满洲医大教授、军医少佐安东洪次。



大连卫生研究所遗址

1926 年 1 月，满铁卫生研究所的基本建筑工程尚未完备，就开始了对细菌、血清和疫苗的研制。1927 年又开展了对病理、化学领域的研究，同时接收了由日本中央实验所承担的药品、饮用水、食品和其他卫生实验业务。至此，满铁卫生研究所成为了一个集细菌研究、细菌实验和细菌生产为一体的完整研发生产机构。1931 年增设了注射室、采血室、第二马舍；扩建了小动物饲养舍。1935 年，扩建了预防疽制造室，新建了血清贮藏库。1936 年扩建了鼠疫研究室和新建了鼠疫预防液制造室。1938 年，东乡细菌部

队本部移驻平房细菌实验基地后，在开始大规模的细菌研究、细菌生产和细菌实验的同时，也急需细菌防疫及其他研究的同步进行。为此，关东军以军方需要血清和疫苗是当务之急为由，以不防碍军用的前提下供应民用为条件，接收满铁卫生研究所，由东乡细菌部队直辖，并改称为大连卫生研究所，对其业务和机构也进行了调整。业务以制造为主、研究为辅。机构也由原来的7个科调整为3个部。3个部和部长是：总务部，部长目里正彦；研究部，部长冈木良三；制造部，部长目里正彦（兼）。从此，大连卫生研究所开始向平房细菌基地大量提供细菌实验所需的血清和疫苗。1945年6月，由大连卫生研究所改称后的满洲第319部队成立了鼠疫防疫队。

第二节　细菌实验

1938年，该所划归石井部队，开始为石井部队生产实验菌苗。到1940年，石井四郎从平房细菌部队派去大批技术人员，其中有渡边博士的助手山内丰纪、滨野等。据山内丰纪供认："我向当时的班长中黑少佐提出要到大连，同时听说菌苗班全员最近要移到大连，我和石井雇员2人，在10月先出发，带4台超音波设备来到大连。"他还说："关于我到大连以来（1940年以来），731部队这方面（指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动态，在所谓大东亚战争开始的马来西亚作战的前夜，即关东军特别演习的前后，霍乱专家凑技师（凑是平房制造霍乱细菌的技师），来做霍乱菌的冷冻实验，利用大连研究所的强冷冻器做实验，由山口中佐率领植物班亦前来实验。""这时731部队的昆虫班队大举地来到大连，大量地搜集市内的老鼠，做跳蚤、做鼠疫感染实验，放到前线去。"山内又称："在该卫研所具有五六百个石井式细菌培养罐，在细菌室用于大量生产，日寇投降时全部扔在大连港外海里。"①

731部队本部曾派人给大连卫生研究所送过细菌，据田村良雄笔供，1941年10月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74页，中华书局，1989年。

上旬，柄泽十三夫命令他和另一名雇员将装有鼠疫菌的实验瓶两瓶约10公斤，运到大连市葭町大连卫生研究所，交给了该所的仓内技师。该所内部也培养鼠疫菌，据高田国胜检举，1943年，大连市下葭町满铁卫生实验所变成军管实验所。该所过去是进行细菌和病理研究的实验工作的。大约在1944年的秋天，该所为培养细菌而饲养的老鼠跑了，以致下葭町一带的日本人住宅区被封锁，断绝交通达1周之久，但没有鼠疫流行的记载。“九·三”抗战胜利后，日寇没有来得及破坏，该卫研所被旅大市公安局接受。根据内部设备来看，该所主要生产鼠疫、霍乱、伤寒、猩红热等菌苗。

该所曾进行过人体实验。据潮海辰亥供认，1944年2月，大连卫生研究所要求用西崛红十字医院的活人作细菌实验。当时潮海辰亥任关东州厅警察部长，他批准该所用1个人进行了活体实验。1994年10月5日，原驻大连的日本宪兵队本部战务课外勤曹长三尾丰和特情课曹长长沼节二等人专程来大连，就1943年他们所参与的破坏共产国际大连沈得龙地下电台一案，向中国人民谢罪。三尾丰当时听说该案“嫌疑犯”刘万会（鞍山人）被日本人释放了。可是刘万会始终下落不明。刘万会的亲属曾向日本政府写信，控告三尾丰说了假话。三尾丰也想通过大连史志部门帮助查找刘万会的下落。据三尾丰讲，当年，他们将沈得龙等4人押送到731部队本部活体解剖了，而刘万会不在其中。大连卫生研究所会不会用刘万会作人体实验呢？三尾丰回忆，当年，他的一个朋友在一二九街大连化物所地下室曾亲眼目睹过日本医生用中国人作活体解剖实验。日本军医用“实验材料”只要在宪兵队履行手续就可以了，有时被释放的人，也可以找借口抓回来作实验。三尾丰据此分析，刘万会很可能被当成“实验材料”了。[1]

另据大连史学工作者考证，可以基本断定：大连金州区龙王庙万人坑是一座细菌实验工厂，日军在大连的细菌实验场不止一处。1945年，日本投降前，该实验工厂尚未竣工。为防止泄密，日军把建厂的工人杀害了。

---

① 单文俊：《大连也有731》，打印稿。

第三编

其他细菌部队



日军侵华细菌部队以“防疫给水部队”的名义，在中国建立了体系完整的细菌战网络，其细菌研制、作战和人员培训等项工作，均由石井四郎直接指导或参与，而日军细菌部队的最高领导机关则是日本大本营日军参谋本部。

1936 年，根据日本裕仁天皇的敕令，日军参谋本部扩编了石井部队；设立了长春市孟家屯的若松部队，即后来的满洲第 100 部队。日军在不断扩充 731 部队的同时，还在我国各地陆续成立了 18 个师团的防疫给水部（即细菌部队），在战场上的各师团中进行细菌战活动。随着日本军队活动范围的扩大，又补设了机动性部队。主要细菌部队有关东军第 100 部队、北京北支甲第 1855 部队、南京荣字第 1644 部队、广州波字第 8604 部队、新加坡冈字第 9420 部队。而 731 部队则是日本细菌武器研究中心和细菌战指挥大本营。至此，日本细菌部队形成了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完整的细菌战体系。

日军细菌部队的公开身份是某方面军或师团的防疫给水部队，每一个方面军均设有防疫给水部本部，每一个师团设有防疫给水部，另外，每个防疫给水本部均设有支部。各防疫给水部表面上负责部队的防疫、给水等项工作，实质上专门研究、生产细菌武器，实施细菌攻击，杀害和平居民。

第一章　关东军第 100 部队

第一节　机构队伍

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是日本关东军第 100 部队的前身，于 1931 年 11 月在奉天（今沈阳）成立。第一任所长是兽医中佐小野纪道、继任所长先后是兽医专家安达诚太郎、兽医中佐高桥隆笃。1933 年从奉天（今沈阳）迁到新京（今长春）宽城子。当时，该收容所主要是对民用马匹传染病进行病源、病理调查、研究，并到病发区采集菌苗加以保存，1936 年收容所改名为关东军马匹防疫部，实际上是从事细菌战的一座杀人工厂。部长先后为兽医大佐高岛一雄、兽医大佐并河才三。1938 年迁至长春市以南 10 公里的孟家屯。

该部队位于日军营群中间地带，东西宽约 0.5 公里，南北长约 1 公里。扩建后，该部队占地面积 36 万平方米，有百余间房屋，其中实验室与另一地下监押犯人的囚室相连。第 100 部队的办公室在二楼，它与很多地下通道相通，联结着各处的实验室和众多豢养实验动物的房舍。它的规模略小于第 731 部队。1941 年，该细菌部队正式称为满洲第 100 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兽医防疫部”，由细菌学家、兽医若松侑次郎少将任部队长。该部队聚集了生物、细菌、解剖、军医、兽医、工程、农艺等多方面的研究人员。他们中还有一些人员具有博士学位，拥有日籍研究和工作人员 800 名，中国劳工 300 名。此外，这支部队里的文官（技正、技传）也都是相当于陆军校尉级的各具科技专长的人。这个部队是囊括了各方面专家和技术人员的特殊部队。本部下设总务部和 4 个细菌生产研究部门。

日本关东军第100部队营区平面图

第 100 部队遗址

1940年后，在大连、海拉尔（后迁至克山）、佳木斯、拉古（位于牡丹江市附近）等地建立所属各支队。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第100部队在关东军所属的部队里都设立了军团兽医部队，分别驻扎在四平、克山、东安、鸡宁、东宁等地区，侧重研究在野外大量使用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大规模杀害牲畜和人的方法及其效果。1943年后，关东军所属各军马防疫队均由第100部队指挥，其骨干人员由第100部队输送。

第一部，是实战研究部门，下设若干分部。研究炭疽、牛瘟、羊痘等各类细菌，并进行实验，取得并总结制造鼻疽菌、炭疽菌、传染性贫血菌以及植物的效能和传染方法。该部曾以关东军所属部队的军马为研究对象，进行炭疽菌传染实验，研究能导致马匹迅速死亡的方法。各分部的细菌研究工作在关东军兽医处处长高桥隆笃的亲自监督下进行。



第100部队遗址

第二部，也称生产部，主要负责各种细菌、病毒的研究和制造，是第100部队的主要部门。村本少佐、穗坂中佐、雄板中佐等数人曾任该部部长。该部有官佐20名、科学工作人员30名、技术人员50名。研究及生产用房为长60米、宽20米左右的三层楼房。1943年前，该部下设5个分部：第一分部为细菌分部，编制20人，由西田和山口、高秋等人负责，从事炭疽、鼻疽、牛瘟、羊痘等细菌研制工作；第二分部为病理学分部，

重点研究鼻疽、羊痘、牛瘟、炭疽热等牲畜病毒；第三分部为实验动物管理分部，实验材料有牛、羊、马和江豚、白鼠等动物，甚至有活人；第四分部为有机化学分部，研究与生产化学毒物和毒药，以及这些药物的防治、解毒方法等；第五分部为植物学分部，主要负责探求用细菌毒害或传染植物的方法。1943 年 12 月，该部队在第二分部内成立第六分部，即所谓细菌分部，委任军医中尉平樱全作为分部部长，大量生产、制造细菌武器，并在地下特种仓库内保藏这种细菌。

第三部，养马，并从马身上抽血，制造血清疫苗。

第四部，豢养大批啮齿类动物。

总务部，负责规划和总体研究问题以及后勤、医疗、卫生工作，管辖一处占地 60 多垧的“实验”农场和一处占地 20 多垧的牧场。

教育部，又称 531 部队，主要负责培训专业技术人员。1943 年，第 100 部队接替东京陆军兽医学校的培训任务，开始代培兽医干部候补生。学员毕业后由关东军统一分配到各军事团工作。后因日本国内高等农林院校增设兽医科，第 100 部队的培训工作终止。[①]

第二节　细菌研究实验

第 100 部队的工作分两种，一种是从事炭疽、鼻疽、腺疫、媾疫和传染性的贫血以及血清的制造，这些都是防疫用的东西，技术上由关东军兽医部长指导；另一种就是细菌战，这由关东军参谋部第一课指导，技术上也由关东军兽医部长指导。

第 100 部队和 731 部队一样，是一支极端秘密的细菌部队，它拥有建筑群落、特种设备和连片的土地用以细菌实验。据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供认：“第 100 部队的活动，就是制造供细菌战用的细菌武器”，此外，第 100 部队还“……负责进行军事破坏活动，

① 韩晓、辛培林：《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

即用病菌去传染牧场、牲畜和蓄水池。在这方面，第 100 部队的工作是与关东军司令部侦探部有密切联系的”。[①] 前日本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也供认，第 100 部队的任务是要准备和进行细菌战和军事破坏活动。该部队主要研究生产摧毁人类包括庄稼和牲畜的致命细菌，大量散布鼠疫、霍乱、伤寒、鼻疽、炭疽等致命细菌，藉以引起瘟疫，使无数人染疫死亡。

一、人员培训及课题研究

（一）人员培训

第 100 部队教育部，主要负责本部队人员和关东军各部队人员在使用研究细菌武器方面的培训。据安达诚太郎供认，早在 1934 年 1 月，关东军兽医部组织在长春的在乡兽医将校进行短期培训。他们10人到海拉尔进行关于在极寒地区对药品处理方法的教育，同时进行了关于在东北进行家畜细菌战的时期和方法的教育。第 100 部队建立后，对兽医科研人员经常进行细菌战教育。1942 年 4 ~ 10 月，新京（长春）畜产兽医大学在校生铃木元之曾到第 100 部队接受牲畜细菌训练，他们曾到内蒙古比尔特及比尔特帕乌斯旗地区实习，参加细菌检验活动，共同检查过羊口蹄疫达 2 万多只。[②] 原第 100 部队队员三友一男，也曾到教育部培训过，他供认：“我进入该部队后，进过炭疽热菌和鼻疽菌培养训练班。”[③] 后来，他一直从事这些细菌的培殖工作。1943 年以后，第 100 部队开始代培兽医干部候补生，专业教育由该部队的教官兼任。对兽医下士官候补生，始终由 100 部队负责教育。1943 年 8 月，该部队还办班培训了 50 多名伪满地方兽医工作人员。此后，日本国内高等农林院校增设了兽医班，接替了兽医培训任务。

（二）细菌研究

据安达诚太郎供认，1934 年以来，关东军兽医部组织马政局、畜产局、关东局、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11 ~ 12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187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③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82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关东军诸部队及长春、伪满洲国军中的畜产兽医专业人员进行学术研究，将马疫研究处研究的成果提供于研究细菌战问题。每年召开两次研讨会议，发表重要研究成果。主要成果有鼻疽：传染实验、鼻疽的症状及经过、血液检查法、马来因检查法；炭疽：预防种痘的改良法、皮下注射的效果、炭疽菌的毒力试验、炭疽菌的培养试验、炭疽菌的动物试验、菌苗的采集方法；媾疫：血液检查法、治疗法及预防法；腺疫：菌苗的采集、制造血清的动物试验、腺疫菌的种类、采集、培养法及动物试验等。还给会员看各种疫病的标本，即各种器官。各研究单位的重要研究成果每年都提供给第 100 部队，再由第 100 部队作细菌战研究。安达诚太郎指示炭疽研究的权威渡贯研究官（主任）将研究制造的炭疽强毒菌苗提供给第 100 部队，作研究细菌战使用了。关东军及伪满地方兽医专业人员和第 100 部队经常举行研讨会，据铃木元之检举，1942 年 6 月，第 100 部队并川岁三等 10 余人和马疫研究所的安达诚太郎等人召开了联席会议，研讨炭疽、鼻疽的细菌战问题。研讨会就炭疽的人工感染的试验成果、炭疽马的形态变化及其他；媾疫的感染和病理的组织变化及凝集反应；关于鼻疽等研究成果进行深入讨论，推动炭疽、鼻疽的研究工作，其成果作为第 100 部队细菌战研究的辅助资料。①

二、经费

为进行细菌战，日本政府不惜重金，凡是筹建和细菌战有关的部队或研究单位，所需经费足额拨给。据安达诚太郎供认，1933 年 4 月，关东军兽医部长渡边来到宽城子病马收容所，对他说："根据齐齐哈尔市日本部队的报告，该市外流行的马的炭疽病，好像是细菌战谋略，关东军也须着手研究细菌，准备细菌战。病马收容所须马上设立细菌室，你即着手计划，关于预算要多少有多少。"② 根据渡边部长的指示，安达诚太郎领到 10 万日元，建设了设备精良的细菌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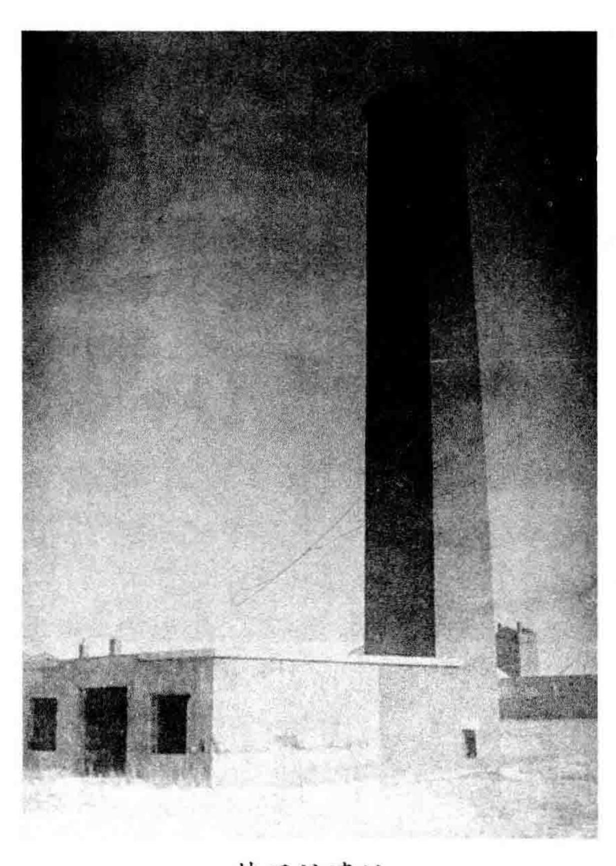
第 100 部队与 731 部队一样，都是特殊的细菌部队，其经费特别是细菌研究经费十分充足，军费来源秘密，开支巨大，甚至连日本国会议员也无从知道。据高桥隆笃供认：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191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177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第100部队“经费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是日本陆军省拨给该部队人员的给养费，另一部分是日本陆军省拨给关东军制造防疫药品的费用。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的款项是按关东军秘密经费开支路线，由第二侦探部发给的……从1944年4月1日至1945年4月1日，日本陆军省拨给第100部队人员给养费和防疫药品制造费，共计60万日元。同一期间内，由关东军司令部第二部拨给的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费，共计100万日元。但这个数目并没有限制过我们，因为必要时可按需要增拨款额。”[①]

三、细菌实验



焚尸炉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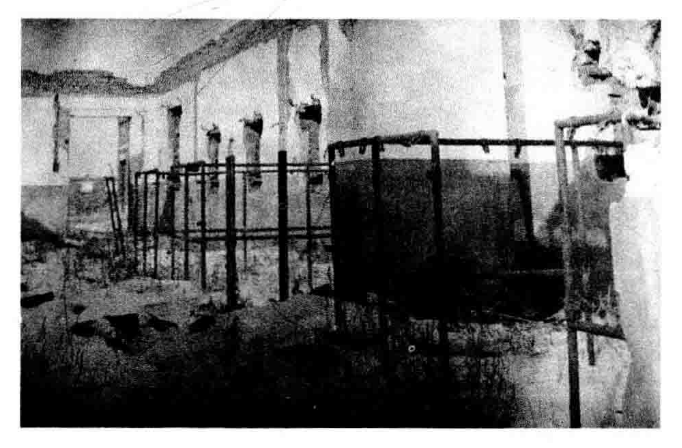
第100部队研究出传染牲畜和农作物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利用动植物进行实验，同时也进行人体实验，主要培养繁殖鼻疽、炭疽等细菌，用于细菌战，破坏土壤、庄稼，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56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毒杀牲畜，杀害中国人民。细菌实验由第二部实行，这里有庞大的细菌实验室、炼人炉。在本部右前方有一座三层楼房，楼中央竖起一个大白烟囱，不断地冒着黄烟。这里是中国人的禁区。据第 100 部队的劳工王庆友证实，周围围着铁刺网，中国人站在旁边往里看一眼都不行，如果让日本人发现，开枪就打。就连在日本人跟前挺吃香的陆翻译也不例外，有一回，陆翻译走到实验室近旁，被日本人骂得连声说“哈伊！”“哈伊！”。

（一）设备设施

该部队为了细菌战谋略，研制细菌，投入了大量的经费，设立细菌研究室，添置精良的设备。据安达诚太郎供认，1933 年，宽城子病马收容所建立细菌室，室内装备有显微镜实验台，以备放置显微镜。此外，还有孵卵室、冷藏室、小动物室、消毒室、制剂室，还有 30 间马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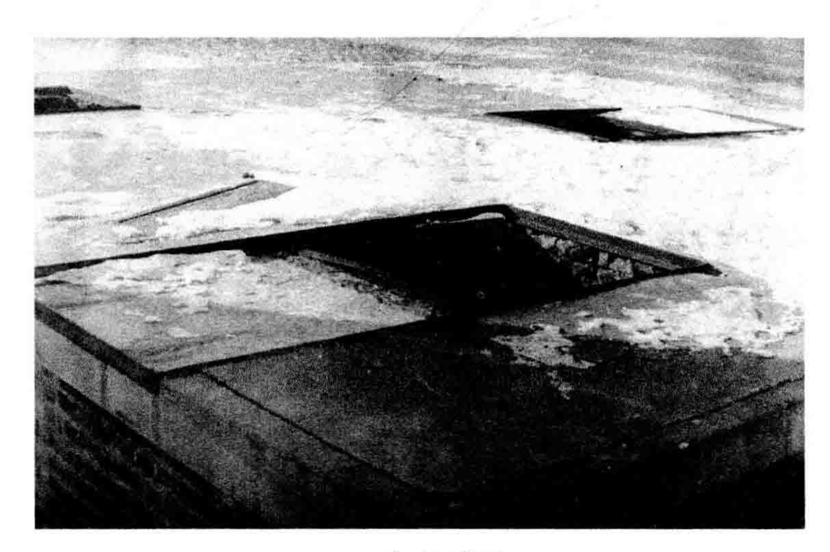


100 部队遗址

第 100 部队迁至孟家屯后，其设备是较完善的。有细菌研究室，其下又分三室：病理室、化学室和细菌研究室。另设有农事研究室。细菌研究室内有孵卵器室、冷藏库、培养室、制剂室、小动物室（兔、老鼠、海老鼠），还有动物实验室。病理研究室内有小动物室、解剖室、锅炉和实验用的马房，是检验细菌结果的地方。化学室内也有小动物室、天秤室、药物室，实验室有两个。农事研究室是研究害虫和昆虫毒害农作物的（高粱、苞米、白菜、土豆）。[1]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 年。

韩蔚与石井四郎、北野政次有过接触，他回忆说，1941年6月，他和石井四郎的妹夫、军医中佐中村吉二到100部队参观。第100部队的实验室都用代号，进一个培养室要经过5道门。他们走到一个实验室门口，被一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阻止说："现在正做实验，非本室人员不准入内。"中村又带他去地下室的实验室参观。他们洗手消毒后，换上白衣服，戴上口罩，穿上胶皮靴子，才允许走进实验室。他看见地下室实验室里有温度计、湿度表、洗涤器具等；有一排排大小不同的电解槽，里面用药水泡着洋菜，是用来培养细菌的养料；第二排案子上放着大小不一的培养皿，两边有大型烤箱，还有荧光灯、高压灭菌器等设备。再往里走，两边都是暗室，中村说是培养室。在另一间实验室里，韩蔚看见里面陈列着许多大小不一的干燥箱，还有一间屋子里全是化学药品。他还在一座特别宽敞的楼里，见过立式反应罐，总共有4个，能容纳1吨左右，形似灭菌器，正面装有冷凝管。另外几处，不但有人看守，还在牌子上写着"不准入内"。里面的工作人员不准擅离岗位，纪律特别严。[①] 该部队还有发电和变电装置，机械和一个大型的细菌和烈性毒药制造等设备。尤其是第二部细菌生产部门，仅从日军破坏后的遗骸来看，其装备有大型蒸汽机、大化验室以及生产细菌的高温和高寒设备。



100部队遗址

1950年2月12日、14日两日，长春军医大学教育主任孙瑞宗、细菌系教授刘刚、

① 韩晓、辛培林：《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讲师房希哲、药理师徐景达等人随长春市政府视察团先后两次到孟家屯第100部队废墟考察，并写出了考察报告。该报告中有关设备的内容如下："在100部队的第二处（第二部）西北侧，有4个大型孵卵室，每个约有125立方米，总计10万立方米，都是用电保持恒温的，是培养大量细菌用的……在这个庞大的孵卵室北头，还有3个长圆形高压灭菌器，每个直径约有1米，高3米，在这两种东西的周围，有十几个实验室、灭菌室、准备室、材料室等，都是很坚固的水泥制成台子，现在还能很清楚地看出来。"①

（二）细菌采集、供应菌苗

关东军兽医部以及其他细菌研究单位还到牲畜疫病区采集菌苗。1932年8月至1936年2月，黑龙江省甘南县、嫩江县、孙吴县、哈尔滨市外以及吉林省的洮南县、延吉等地发生了马的炭疽传染病。期间，关东军兽医部通知高岛、并河部队派技术员到当地调查，并采集菌苗加以保存，作为细菌战研究之用。

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其他单位研制的细菌苗需要供应给第100部队，用于研究和准备细菌战。自1938～1942年，安达诚太郎任马疫研究处处长时，供应第100部队细菌苗的种类有炭疽、鼻疽、腺液、媾液等4种，其中腺液、媾液只供应过1次，鼻疽和炭疽每年各供应两三试验管，临时给的也有一两次。1管有10瓦左右。他们供应的细菌都是毒力强的细菌。此外，马疫研究处还供应给100部队5～10万c.c.的炭疽预防液及5～10万c.c.的血清。1940年，马疫研究处给100部队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培养细菌用的硬性玻璃器具、3万倍的电子显微镜。安达诚太郎还从日本国内北海道等大学招募了300多名毕业生，部分安插在了第100部队。并河部队在宽城子时，由于他们的设施不完全，因此经常到马疫研究处使用解剖场、培养室及冷藏室等。②

（三）动物实验

第100部队扩建后，以低于市场价10倍的价格强夺孟家屯、大广村、大随窝铺等村屯的土地，建立了占地60多垧地的农场和20多垧地的牧场。为了搞细菌实验，制造

① 杨玉林、辛培林：《细菌战》，第42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

毒菌，该部队饲养了马、牛、老鼠等大量的动物，其中马和老鼠最多。1940 ~ 1945 年，第 100 部队中国劳工王腾源一直在第 100 部队养猪，他说，该部队养了各种老鼠，有六七寸长的大白鼠，也有 3 寸左右的小白鼠，还有黑鼠、灰鼠。其他还有羊、牛、猪、马、骆驼、军犬、鸡、鸭、兔子等等。据史料记载，第 100 部队曾对辽西和热河两省进行“扫荡”，实行并屯政策，迁移居民，另行划地建屯，烧毁大量房屋，破坏耕地，将 74.8 万头只牲畜收归第 100 部队，进行细菌实验。

1. 马匹实验

第 100 部队有自己的大牧场，这个牧场在距离本部 10 公里的八家子一带，他们在牧场上撒下各种细菌进行实验。第 100 部队还建有马厩，被当地劳工称为洋马圈，红砖马厩建筑一般大小，长 50 米、宽 30 米，共有 38 处。每个马厩定额养马五六十匹。该部队有 5 个解剖台，固定架只有 1 个，每个实验室都有冷却炉。大批的马都用于细菌实验。第 100 部队的劳工阎洪生说：“马厩里的马成天满登登的，砖房不足，还盖了些板棚子，平常有马起码也有 2 000 匹以上。”他说这些马的用途：“一种是一匹匹牵到打马场，那里有现成的机械铁架，把马牢牢实实地嵌好，割开脖子上的大动脉开始抽血，每匹马抽 40 ~ 50 啤酒瓶子血后，马就快死了，于是把它杀死，切成片完了晒马肉干。另一种方法，是把马牵出来，拉到掩埋场，一大帮穿白衣裳的人，在哪儿给马扎针，有时只需 1 针，马一抹弯就死了。据说用活马试验的数字也相当浩大；从开始只看见每年进来好多匹马，不见一个出来。”[①] 劳工王腾源说，日本人抽马的血，马死后，他们还给马开追悼会，行礼，然后才掩埋。第 100 部队附近大广村农民刘万银说，第 100 部队有个炼马炉和掩埋马的场地，这两个地方在本部西北侧一带，有半里多地。日本逃跑后，村里有不少人去掩马场挖骨头卖钱，结果挖出来有马骨头，还有人的遗骸，吓得人不敢挖了。日本人还用马血制造血粉，搞细菌实验。第 100 部队的劳工都见过第二部的 3 个圆筒形的熔炼炉，日

① 《东北日报》，1950 年 2 月 16 日。

本人在炉子里炼马，估计每年将近有 1 万匹马作实验后被烧掉或埋掉。[①]

1943 年，第 100 部队在安达特别实验场进行炭疽菌传染实验，他们让中国劳工挖了不少深坑，牵来 10 匹马，分别拴在固定好的等距离的木桩子上。然后，把劳工撵走，日本人也隐藏在 1 公里以外的地方，四周戒严。一架飞机飞来，对准马匹空投一种黄色物体。不一会儿，这 10 匹马都死了。他们把马就地掩埋起来。平樱全作奉第二部部长穗坂的命令，于 1943 年夏季，用 50 来匹马作实验，给马注射不同剂量的毒药液，结果有 10 匹马当场毙命。目的是取得氰化钾、马前霜碱致死马的剂量，研究在军事破坏时使用毒药的手段。

2. 老鼠实验

第 100 部队有 3 座红砖房，长约 50 米、宽约 30 米，用于养老鼠。老鼠分类饲养，有的装在铁丝笼子里，有的装在类似中医药匣子里。当地村民王占的朋友李占发，当年看耗子房，他对王占说，耗子房每天供给第二处（部）一大圆草筐（直径约 2 尺）耗子，被解剖的死耗子量无法计算，李占发每天早晨要往外运一煤油桶，约 30 斤死耗子。这些老鼠都是疫鼠，虽然李占发穿着防疫服装，但他在一次睡觉时偶一疏忽，耗子钻进衣服里咬了他一口，他感染了疫病。因为日本人还要利用他，才治好了他的病。[②]

（四）植物实验

第 100 部队强占当地农田种植农作物，用于细菌实验。日本人采用中国旧式耕种方法，用笨犁打垄，有旱田，也有水田。农作物种类齐全，凡适应中国大陆的植物，这里几乎都有。农场还有贮水池。当地村民说，实验田里的庄稼，有的长得非常茂盛，有的却十分差。大广村村长曹文学说，有一年，第 100 部队种了一块苞米，都长了很高了，却不结棒，日本兵对老百姓宣传说："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地老乡说，日本

① 辽宁省档案馆：《罪恶的"七三一""一〇〇"——侵华日军细菌部队档案史料选编》，辽宁民族出版社。

② 《东北日报》，1950 年 2 月 16 日。

人种稻子，插秧时长得好，正在灌浆时，却被他们灌进去一些污水，稻子立即蔫死了。[1]

（五）人体实验

第100部队也利用活人进行实验，大多数人受实验后被杀害。但由于严格保密，外传的信息很少。据日本战犯的供词及战后挖出的人骨来看，该部队也作了大量的人体实验。日军曹长（上士）实验员三友一男曾多次参加过活人实验，他说，第100部队内由科学工作员井田、中岛中尉、实验员松井和我负责用活人实验，这些人被囚禁在部队守卫处的禁闭室里。禁闭室在第二部的地下室里，每个小屋4米见方，门高不到两尺，宽1.5尺；墙上用软木做成隔音装置，每个小屋能监押40人左右。第100部队还有3辆"特别囚车"，秘密运送"实验材料"。在100部队当过劳工的都知道，在本部西边，几年来老是停放着3辆罩着黑帘子的汽车，平时不出动。大广村农民张凤鸣说，有一天夜里，他和一个叫白川的朝鲜人去"康生院"办事，看见一辆罩着黑帘子的汽车停在"康生院"门前，从屋里绑出来4个人，押到汽车上。他还看见汽车篷里有躺床，还有像机器似的东西。这4个人在外边还呻吟着，一上汽车就一点声音也没有了。该村党支部书记张子彬也在第100部队当过劳工，他回忆说，在伪康德1944年夏季的一天，天还没有亮，他到伪新京（长春）第二监狱送鸡蛋，曾看见100部队的3辆黑汽车开到伪新京第二监狱门口，一拉笛，监狱的门就开了，于是汽车就开进去了，第二天，那3辆汽车还停在原地。他猜想那3辆汽车准是去监狱提犯人作实验的。[2]

被告三友一男虽是第100部队的普通实验员，可是他是杀人刽子手，他的活动都是为了细菌战，他供认："我参加过用活人来作实验，是在1944年8月、9月两月间进行的。进行这种实验的办法是用一种使受验者觉察不到的方式发给他们一剂催眠药或毒药去吃，受实验的都是俄国人和中国内地人，共计七八名。实验时所用的药品有朝鲜的'韩颜'，海洛因及蓖麻毒。这类毒品都是掺进到食物内去。在两个星期内，会把这种掺上

① 《东北日报》，1950年2月16日。

② 辽宁省档案馆：《罪恶的"七三一""一〇〇"——侵华日军细菌部队档案史料选编》，辽宁省档案馆编，辽宁民族出版社。

毒品的食物给每一个受实验的人吃过五六次。菜汤里面掺的朝鲜‘韩颜’，米饭里面大概是掺的海洛因，烟里面掺的是海洛因和‘巴克塔尔’。受实验的人，在吃了掺上朝鲜‘韩颜’的菜汤后经过 30 分钟或 1 小时，就一连睡眠 5 小时之久。所有受实验的人们受了实验后经过两个星期，就软弱得再不能使用了。为了保持秘密，所有这些受实验的活人都被害死了。有 1 个俄国人是我们遵照科学工作员松井命令用注射 1/10 公分氰化钾的办法害死的。”[①] 他还说，为了保密起见，凡是被送到第 100 部队去受实验的人都要杀掉，他亲眼看见有两个受实验的俄国人和 1 个中国人被日本宪兵队枪毙了。“实验材料”被杀害后，都埋在了牲畜掩埋场。

第 100 部队的实验员，证人火田木供称：“关东军第 100 部队名义上称为兽疫预防部队，其实它是一个细菌部队，因为那里专门繁殖和培养传播鼻疽、炭疽热、牛瘟等兽疫的病菌。第 100 部队中曾用家畜和活人来实验细菌效能，所以在这个部队内专门养得有马匹、乳牛及其他牲畜，并且还单独拘禁有一些活人，我之所以知道这点，是因为我亲眼看见过。”另一个证人，第 100 部队兽医福住光由说：“第 100 部队是由许多细菌学工作员、化学家、兽医和农艺家配备起来的一个实验工作队。这部队内所进行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准备反苏的破坏性的细菌战。该部队及各支队人员曾进行一种科学研究工作……专门探求大量使用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来大规模歼灭牲畜和人命的方法。”[②]

1944 年 9 月的一天，平樱全作在第 100 部队营舍，遇见了松井。他看见松井拿着个盛饭菜的器皿，问松井去哪儿？松井回答说，去禁闭室做活人实验。

第 100 部队有一个“牲畜掩埋场”。当地农民刘万银说，1949 年春天，大广村的农民到这里挖取马骨卖钱或做肥料，结果挖出来的有马骨头也有人的遗骸，尸体有男也有女，有穿黄衣服的，也有穿劳工服的。当地老乡郑洪生说，距掩埋场西边 1 里来地，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343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22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有一块长条地，下面埋的全是人的尸体，浅处有尸骨，再挖6尺甚至1丈深还有人的尸骨。他们还在焚尸炉旁挖出个大竹筐，里面装满了人骨灰。第100部队用活人做细菌实验，也不知残杀了多少人！日本战犯的供词仅仅揭示了冰山一角。

在第100部队工作过的中村吉二曾对韩蔚说，日本宪兵队，每星期都往100部队送活人做实验。韩蔚曾和中村吉二参观过第100部队的地下实验室，他说，地下暗室里阴森森的，气味刺鼻恶臭，令人窒息。走廊两旁约有10来个门，全用红黑布帘遮着。他看见中间一扇门打开了，有3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从里面推出一辆手术车，上面装着两三具尸体，用白布盖着。他还听说过有些乞丐被弄到里面去不能活着出来。[①] 伪满军政部直属陆军军需学校学员李野光曾去过第100部队，他回忆说："那位军医大尉领我们到一间陈列室门前……满屋又粗又高的玻璃缸，黄色的福尔马林药水里浸泡着人头、手臂、大腿、心、肝、脾脏和生殖器等，简直令人无法看下去……"



焚尸炉中挖出的人骨与马骨

第100部队的劳工也见过日本人残杀活人的暴行，在第100部队赶过马车的劳工庄歧曾看见过3个"炼人"用的火化炉，上面有厚厚的骨灰。他还知道日本人杀害了一个姓孙的劳工，那个姓孙的劳工专门给部队买菜。后来，日本人说姓孙的赚钱且有窃卖部

① 韩晓、辛培林：《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队的马笼头、缰绳等嫌疑，把他投进部队守卫室里秘密杀害了。正赶上当天晚上，庄歧赶马车去送日本“官儿”回来，在门口站着，他看见日本人从守卫室抬出一个用白布裹着的尸体，送往第二部实验室去，猜想是那个姓孙的人。第二天，日本劳务头子在劳工中佯称姓孙的从守卫室的后窗逃跑了，其实那后窗很小，小得只能钻出个猫，根本钻不出人。劳工刘万仁亲眼见到一个姓杨的马车夫，被日本军医拖进隔离室，诬说他得了传染病，被杀害了。日本投降后，刘万仁在第100部队的遗址牲畜棚外，看见一个掩埋人的尸体的大坑，地面上裸露着人的尸骨。大广村农民阎喜文回忆说，1945年7月，第100部队劳工宿舍里有200来人。日本人强迫给劳工打针，药瓶上没有字，劳工们也不知道打的什么药针。20多天后，劳工中有100多人发病，没过两天，就死了八九个人。后来，病人遣送回家，不知死活。那些劳工都是长春县福仁村、大屯村、西新村的。大广村老乡王会说：“来这里干活的劳工走前，有几个人被诬陷罪名遭逮捕，不知去向……每一次劳工到期临走前，都给这里留一大管血。身体虚弱的劳工，抽血后，出去就不会动弹了。” 除了劳工，当地的农民也是第100部队的实验对象，有时，日本人以给农民打预防针为名，强行给当地农民注射药物。大广村农民阎洪喜被注射后，回家后就得上了伤寒，并传染给家人，几天内，一家5口人死了3个。①

据《死亡工厂》记载：“在若松的‘科学工作员’们进行人体实验当中，鼠疫、炭疽和鼻疽实验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长春细菌工厂运行的9年之中，用于上述这些疾病实验的“实验材料”，即使不是成千上万，至少也是成百上千。病理学者们进行过无数次的尸体解剖，有时甚至是活体解剖。”该书还引用了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炭疽的，另一份是鼻疽的。

炭疽报告的标题是“‘A’报告”，它用了406页的篇幅分析了30个病例，包括细胞组织的彩色图像和照片。该报告第54号病例中，“受试者接受了整整7天时间被暴露于炭疽芽孢，然后被‘牺牲’。解剖显示的主要病理变化是：‘局部皮肤溃疡和周边病灶

① 辽宁省档案馆：《罪恶的“七三一”“一〇〇”——侵华日军细菌部队档案史料选编》，辽宁省档案馆编，辽宁民族出版社。

蜂窝织炎（右大腿）……心脏：严重衰竭和间质水肿。肝脏：3 号浆膜肝炎症，伴有出血性变化。肾脏：肾小球肾炎，伴有上皮空泡衰竭。脾脏：感染性脾脏炎。’关于经口感染炭疽的死亡率，‘9 个试例使用食物经口感染，其食物中含有一定量的炭疽杆菌。几天以后，全部受试者都因急性腹痛和严重出血性腹水症而无可挽救地死去。’由此可见，这些细菌武器专家们跟踪记录了这种疾病在受害者体内每时每刻的发展变化。”

鼻疽报告题为“‘G’报告”，用 372 页的篇幅记述了 21 个病例。这份报告中有大量的彩色绘图和数以百计的人体组织的照片。鼻疽报告记述：“‘一些试例（21 例中之 8 例）死于败血性中毒症状和一些相邻内脏的败血性变化的急性发作阶段。尚未伴有显著的内脏变化’。第 24 号试例受了 4 天的治疗后死去。他的解剖报告显示有‘外伤性创伤，大肠和胰充血，肾间质水肿，反应性肺充血（轻度弥散性肺泡炎）’。第 180 号试例活了 12 天。这份报告中存活时间最长的是第 16 号受试者，活了 13 天。这些生存时间较长的细菌受试者都出现与 24 号试例相同的症状。此外，他们的各个器官出现了（第 180 号）‘渗出性粟粒性鼻疽结，同时伴有实质性肝功能衰竭’，还有（16 号）‘严重的胰功能衰竭’和‘转移性急性扁桃体炎’。”①

第三节　细菌武器研制

第 100 部队大量研制细菌武器，实验各种细菌的性能，生产有效的各种细菌武器。1941 年 3 月，高桥隆笃任关东军兽医处长后，积极准备细菌战和军事破坏方面的活动，9 月，他命令该部队大批生产细菌武器，包括鼻疽、炭疽热、牛瘟、羊痘和班驳病等烈性传染病的细菌。他亲自去 100 部队检查细菌武器制造工作，增大了第 100 部队培制各类病菌的潜能。1943 年 12 月，关东军司令部兽医处处长高桥隆笃中将、第 100 部队若松侑次郎部长、副部长保坂斯道中佐、山口文二少佐以及工程师井田清等人召开联席会

① 〔美〕谢尔顿·H·哈里斯，王选等译：《死亡工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议，决定增设第六分部，加强研制细菌武器。此后，第 100 部队开展大规模建筑工程，即建筑若干栋下面设有地窖的特种单层房屋，同时人员和经费也增加了，开始大量生产细菌和繁殖传染病媒介物，准备进行细菌战。据第 100 部队兽医平樱全作供认，若松侑次郎部长多次对部下说："一旦日本同苏联发生战争时，第 100 部队应当成为大量生产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的工厂，以便进行军事破坏性的细菌战争去反对苏联。"他还说："第六分部内确实制造出了大量的细菌和化学药品。我本人几次因事到过该分部附设的仓库，那里把细菌和烈性毒药保存在特种铁盒中，走进到这种仓库里去的时候必须用浸透特种药水的布片把口鼻蒙上。只有戴上橡皮手套时才准许用手去挨那些铁盒子。为了严守秘密起见，这些盒子外面只标有一个用油漆写的号码，并没写上任何其他说明。在第 100 部队内还研究过进行军事破坏活动的形式和方法，例如研究过用飞机来达到此种目的的问题……"[①] 该部队工作员三友一男说，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细菌战和军事破坏的方法大批制造细菌武器，主要研制鼻疽、炭疽、牛瘟、羊痘等细菌。他们研制的各类细菌的感染力极强，例如，"杆菌"的毒素是一种纯质结晶体，把它撒在地里，能使土壤、牧场长期中毒，破坏植物生长。给动物服用，动物立即呈现巴斯德杆菌病状，肠组织遭破坏死去。在第 100 部队工作过的中村吉二曾向韩蔚介绍了生物杆菌，他说，这种细菌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媒介，生长在普通培养基上，需要氧气，不运动。若把它放在黑暗潮湿的地方，可以存活几个月甚至几年；若在干燥的地方两三天就死。这种菌可以在米谷棉花上寄存。

关于第 100 部队所能制造的各种细菌的具体数量，高桥隆笃曾向关东军总司令梅津将军报告说："第 100 部队在一年内能制造的细菌数量是：炭疽热细菌 1 000 公斤，鼻疽细菌 500 公斤，锈菌 100 公斤……这在具有充足设备条件下是可能办到的。后来，即 1943 年 12 月起，设备已开始运来，并安置在第二部第六分部内，但这一计划未能完成……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124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只能制造出了炭疽热菌200公斤，鼻疽细菌100公斤，锈菌20到30公斤。”[①]

第四节　细 菌 战

第100部队不仅研制各种细菌攻击武器，进行各种细菌实验，而且还遵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组织别动队实施细菌攻击。1942年，根据高桥隆笃的指令，第100部队远征队在苏联边界上的呼伦贝尔草原三河地区于结尔布勒河一带进行了细菌传染实验。平樱全作供称：“我于1942年七八月间参加过到三河区作所谓‘夏季演习’的远征队。远征队的目的就是要考察在临近可能发生军事行动的区域，即在毗邻苏联边境地带的野外条件下使用炭疽热菌的可能性。在这次远征期间，进行过用鼻疽细菌传染结尔布勒河及各蓄水池的实验，以及用炭疽热菌传染田地和草场的实验。我们在行军实验室内培养过此种需要的微生物，并用马、羊、豚鼠等实验过这种微生物。”[②]另据三友一男供述，这一别动班是由第100部队第二部部长村本少佐率领的。他们还在三河地区培养过鼻疽菌和炭疽热菌，动用牲畜做各种细菌实验，并对额尔古纳河支流、蓄水池以及草场等进行实战投放细菌实验。目的是在最近似苏联国境的气候条件下来检验细菌武器的效能。

1944年6月，根据高桥隆笃的命令，第100部队组织别动队到兴安北省地区（今海拉尔地区）进行活动。这次“远征队”写在军部档案上称“别动队”。少将若松侑次郎部队长委任中尉军官平樱全作担任队长，同时配备了7名士兵和技术员，并要求队员万一阴谋失败，也不要暴露出去。6～9月，平樱全作带领一个别动班在兴安北省收集各种情报，调查中苏、中蒙边境各地区的牲畜数量、草牧场、道路和蓄水池等情况。其目的是为了一旦与苏联作战时便能大量传染牲畜，藉以进行细菌破坏活动。关于这一点，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353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79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平樱全作供认："第 100 部队长若松少将曾对我说，一旦发生战争时，日本空军就会根据我所收集的情报，在毗邻苏、蒙边境的各区域内，撒播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等，以便传染牲畜。"①

平樱全作所领导的别动队行动诡秘，佯称自己是海拉尔日本军事团工作人员，行动异常积极，海拉尔支部长天野勇于 1945 年 3 月 26 日所作的报告第七条说："别动班系依据 1944 年 3 月关东军总司令作战命令由新京第 100 部队所派，现时该别动班在班长率领下极为热心地积极执行其所负任务。"②除了实施细菌攻击行动之外，别动队还大量采办牲畜，用于细菌实验。1945 年夏季，平樱全作在北兴安省采办了 500 只羊、100 头牛，90 匹马。随后，将这些牲畜运到海拉尔西北约 40 公里的山区，由日本人饲养，并分别用炭疽、牛瘟、羊痘等细菌进行传染，并将染疫的牲畜放到附近牧场。由于第 100 部队封锁消息，加之对牲畜疫病流行情况缺乏调查，牲畜大批染疫时，当地牧民误以为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据史料记载，东北沦陷期间，呼伦贝尔地区曾多次流行马炭疽、牛瘟等牲畜传染病。

1945 年 3 月间，第 100 部队又到南岗河一带进行了细菌实验。参加这次"冬季演习"的山口少佐说，把牛瘟菌、羊痘菌撒在雪地的饲料上，检查细菌的效能，因为呼伦贝尔草原及蒙古的牲畜在冬季是靠采食野外饲草生存的。平樱全作等进行的远征活动，曾先后向若松侑次郎少将和关东军兽医处处长高桥隆笃汇报过，高桥隆笃将综合情况 3 次向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汇报。关东军拟订用飞机撒播各类细菌或给牲畜分别注射鼻疽、炭疽热、羊痘等烈性细菌，大批毒杀牲畜的办法，进行细菌战。

1945 年 8 月，第 100 部队逃跑前，他们给马注射药针，不少马都死在槽子头上了。他们还放出几十匹马，叫附近村民捉了去，结果造成附近一带马鼻疽病流行，死了许多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79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192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年，莫斯科。

马。该部队各支队也同样用鼻疽菌传染马匹，据第100部队2630支队雇员桑原明供认："1945年8月20日，当时我到本支队马棚那边去，看到马棚近旁有本支队6名工作员。这是部队工作员洼田、池田、矢田、木村、石井及谷川。马棚内关着有当时由部队畜养的60匹马。我刚走到那批工作员跟前时，他们立刻就预告我说，他们是在那里用鼻疽进行传染这些马匹，传染的办法是把鼻疽菌渗进到燕麦里面。当时我就回支队实验室去。当我回到实验室时，我看见那里有一些从前盛鼻疽菌的空玻璃试管。后来我问过科学工作员木村，究竟他们是否用这种细菌传染过马匹。他证实了这点，说他们是用鼻疽传染了马匹。那一批人进行传染之后，就把栏杆捣毁而把马匹放到四面八方去了，所有的马匹都四散跑到附近各村庄里去了。"①

第五节　毒气实验

1945年6月，第100部队参加了日军在秦皇岛的军事演习，进行毒气实验。毒气实验开始后，一架飞机在实验场盘旋，距目标200米左右时，对准事先固定好把两个"囚犯"，投放毒气弹。结果，两个被实验者的皮肤灼伤，呼吸困难，半小时后，皮肤出现豆粒般大小的红斑。还有一次，敌机投放了无声炸弹，爆炸后，地面上腾起黑绿色的烟雾，30分钟后，几个受实验者呼吸困难、晕眩咳嗽、皮肤发热、口吐白沫，吐血而亡。②

第100部队的公主岭支队，也设有监狱和禁闭室。他们也进行毒气实验，由宪兵水野、火田木执行，有一次，他们用毒气杀害了3个"实验材料"。③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415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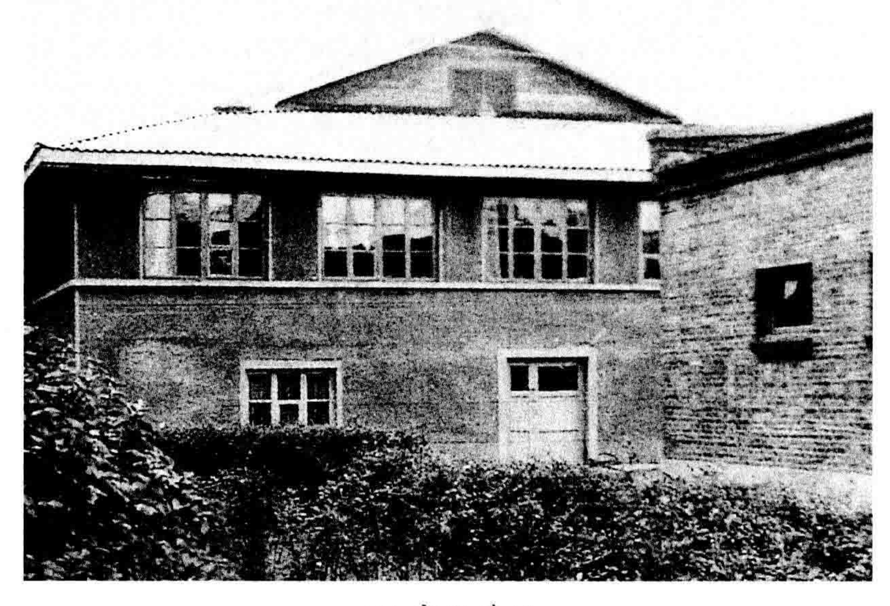
②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 杨玉林、辛培林：《细菌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第六节　销毁罪证

一、溃逃前的破坏

1945 年 8 月 8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下令："第 100 部队运走所有的贵重设备，并由工兵协助将建筑物毁掉。" 8 月 15 日光复前后，第 100 部队溃逃，有不少战犯成为俘虏，若松侑次郎带领部队及家属，乘火车取道朝鲜回国。溃逃之前，若松侑次郎命令手下人炸毁建筑物，烧毁全部器材和档案资料。把各种动物或杀死，或注射细菌后放跑。所属各支队也要这样做。有不少染疫马匹、带鼠疫的老鼠被放出来，向四处逃散，致使当地疫病流行。第 100 部队首先爆破的就是第二部的 3 层大楼。给第 100 部队当过杂役的刘方仁说："炸这座楼时，我看见了，若松那小子，直掉眼泪。"附近大广村农民阎喜文说，8 月 13 日，日本人烧第二部大楼时，叫劳工先回家，只留下几个人，把汽油桶滚到第二部的地下室里，楼上各处也有好几十个油桶，每桶有 200 公斤汽油。汽油桶点燃后，大火烧了一天一夜。石虎沟村民王均回忆说，8 月 14 日，我赶车往第 100 部队送煤，发现日本人在办公楼门前把木头上浇上汽油烧照相的底版，堆了好几千张，烧了一夜。



100 部队遗址

二、遗　址

“8.15”日本投降后，附近农民常去第100部队的遗址。大广村农民王延林说：“我进去那时候，楼上满是坏机器和破药瓶子……地下室里有两个鸭蛋圆形好像锅似的东西，敞着盖，当时有明白的人说，这是蒸药器。还有个屋子，有两个大黄桶，屋里一股不好闻的气味。”王会说，他弟弟捡到不少药水瓶，有指头大小的蓝药水瓶，上面写着“鼻疽”，底下的字认不得了。还有稍大的药水瓶上写着“炭疽”。庄歧也看见过一堆白药面，用手一摸，当时就感到迷糊。当地村民还发现了地下室里的冷藏室，屋里有不少铁架子，还有制造血粉的干燥室，在地下室西头北侧第一、第二两个屋子，四壁都是二层夹壁墙。庄歧看见这屋里有许多铁柱子，还有很多箱子，屋里热得使人难受。墙上还残存着斑斑血迹。此外，他还在地下室中间发现了3处炼炉，骨灰积了很厚，但不能推断是什么骨灰，但从炼炉口径仅1米，而且越往里越窄，可以判断这个炉大牲畜进不去，像是炼人炉。这座“杀人工厂”的废墟遗留下不少用于细菌实验的东西，诸如机器、药瓶、鼠笼子等。

1982年、1991年，邹世魁先生先后对第100部队遗址进行了调查，其结果如下：关东军第100部队旧址位于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散热器厂，原第100部队拥有楼房、平房百余座，第100部队溃逃前，炸毁建筑物60余座及各种细菌生产设备、机械等等，现存遗址38处，分别是关东军满洲第100部队司令部办公楼、标本室、马厩、牛舍、羊圈、解剖室、火化场、灰色大烟囱、小动物饲养室、菜窖、水塔、深水井、地下室等，其中不少遗址已拆除。

第二章　北京北支甲字第1855部队

第一节　机构队伍

日军北支“甲”第1855部队，其总部设在北平（今北京）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他们侵占了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利

用原有设施和设备的基础，筹建细菌战基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该部队为“北支‘甲’第1855部队”，对外称第151兵站医院，又称西村部队，隶属于日本陆军参谋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和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直辖，并由石井四郎担任技术指导。部队长先后为黑江、菊池、西村英二；主要工作人员有染田帮沾、山野武夫、河合浩、佐藤、关根健儿、夏村、小森等。定员1 500人。根据第1855部队第三课工作人员伊藤影明核实：第1855部队本部设在北京先农坛的庆成宫大殿里，大门口挂有“同仁会华北中央防疫处”和“同仁会华北研究所”两块牌子。先农坛为明、清帝王祭农神的地方，占地4.3万平方米。日军占领后，在大殿后面建造了30多间平房，作为实验室之用。该部队打着防疫给水的招牌，培殖繁育各类细菌，进行细菌战。①

关于第1855部队建立的时间，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说法有所分歧，郭成周、廖应昌等认为：“它是1939年和华中（南京）、华南（广州）同期建立的三大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之一。”②日本女作家西野留美子认为：“1938年（昭和13年）2月，甲1855部队在北京市天坛设置本部。部队直辖于北支那派遣军（后为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陆军军医大佐西村英二任部队长。”③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调查发现：“伪北平市卫生局档案记载，自‘1938年1月开始至同年12月’，进行全市水质等卫生事项调查。担负此项工作的是稽查班郭日升等‘随同菊池部队采取各区界内井水样。’关于调查情况现存多份文件，其中1938年8月25日有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稽查所长刘九如具名呈送报告说：‘协助天坛菊池部队检查本区井水一案，遵由职等每日陪同前往各井查验办理。至8月25日，已将本区35井逐次查验完毕。’有关调查结果同年10月27日由稽查班稽查长朱鼎均具名呈送报告：‘截止10月23日停止工作等情前来，查本市共计饮水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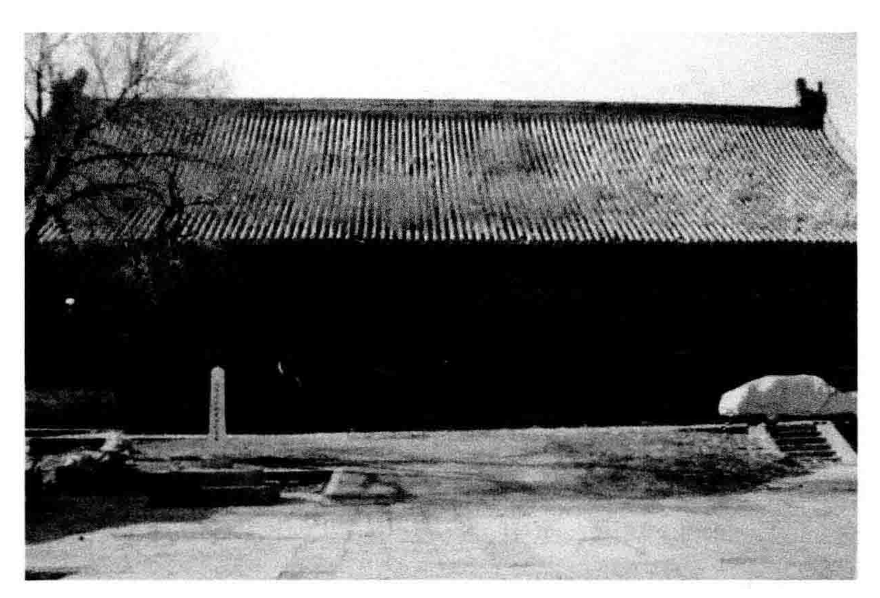
①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② 徐勇：《揭开黑幕——2002·中国·常德·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1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

③ 徐勇：《揭开黑幕——2002·中国·常德·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0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

并 397 处，综计采取水井 174 处。’”[①] 徐勇教授由此推断，1938 年 1 月，驻扎在天坛的菊池部队已经开始活动，而其主要头目为菊池。

一、本　部



北支甲 1855 部队本部遗址

据竹内丰笔供，华北防疫给水部总部下设庶务科，统辖本部各科。负责经营，传达指示及同上下左右的联系；经理科，负责制定预算、分配和处理经费。调配物资，发放工资、给养等业务；材料科，关于当地资源的药理研究，保证并提供作战、防疫以及研究所需之各种卫生材料等；计划科，制定有关华北作战的防疫、给水及细菌制造等多项业务；卫生研究科，负责生理化学实验，昆虫类、毒气及其他当地作战所需有关卫生学方面的研究业务；防疫科，研究并生产预防接种液、疫苗、痘苗、血清类，以及有关各队之菌检索、消毒、预防注射等防疫业务；生菌科，研究并生产细菌战所需各种瘟疫菌；给水科，负责野战及宿营期间的检水、滤水、饮料水灭菌，用水消毒以及运水等给水业务。[②]

另据郭成周、廖应昌教授研究，第 1855 部队本部下设 3 个分遣队，后改为课。第一课，

① 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揭开黑幕——2002·中国·常德·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204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195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卫生检验课；第二课，细菌生产课；第三课，细菌武器研究所，其主要任务为防疫给水和细菌战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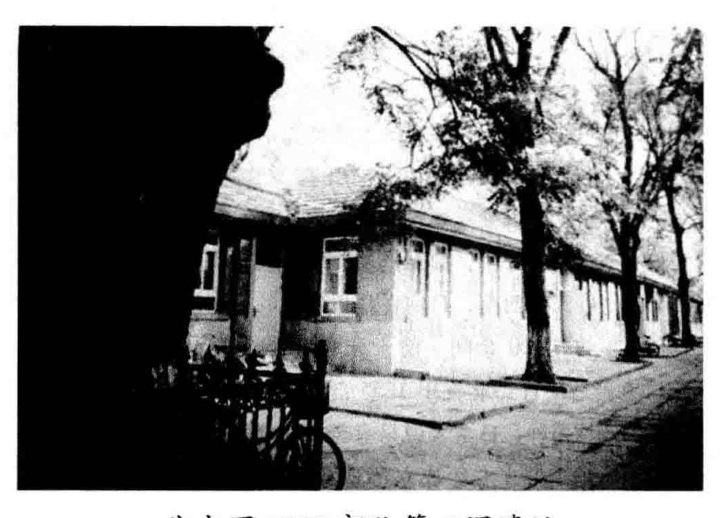
（一）第一课（卫生检验课）



北支甲 1855 部队第一课遗址

第一课设有细菌、血清、病理、昆虫、结核、生理、化学等 7 个室，首任课长小森源一，有日籍工作人员 30 名，中国劳工 20 多名。初建时在先农坛庆成宫大殿后面的工字厅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接管了美国人在城内办的协和医学院，第一课迁入该医学院内。院内“A”字楼内设血清学检验室；“B”字楼内设防疫给水室；“I”字楼内设细菌、病理、昆虫、结核、生理、化学等实验室；“C”字楼是日本人的宿舍。该课还进行过病毒战剂的研究。设在该大院里的协和医院改作北平日本陆军医院东城分院，总院设在清华大学。

（二）第二课（细菌生产课）



北支甲 1855 部队第二课遗址

第二课设在现北京天坛公园南侧墙外的前卫生署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该所于北平失守前迁往昆明。该所原为中国最大的一个血清、疫苗研制所，由我国著名的病毒学家沙眼病毒发现人汤凡教授所主持。该所有现成的疫苗生产设备，日军强占后，可利用原设备生产细菌战剂。课长为平野晟少佐。据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实地考察，其本部和第二课占地面积相当大，包括现在的中国医药生物制品检定所、天坛神乐署、北京口腔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及部分居民区。当时，日军建筑了大批房屋，其中包括7栋病房、100多间工作室、70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剧毒菌种的192平方米的地下冷库。这里成为日军大量生产细菌战剂的场所。如今，地下冷库和他们修建的水塔仍然存在。

（三）第三课（细菌武器研究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分遣队（第三课）强占了中国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该所是利用中国著名学者范静生先生捐献的房地产和生物标本而建筑的研究所，建于1928年，主要调查研究中国的动物、植物以及矿产、古生物化石等。它位于北京城北海公园前门西侧，除地下室外，共有3层，有房60多间。

据夏绰琨撰文回忆了第1855部队强占静生生物调查所的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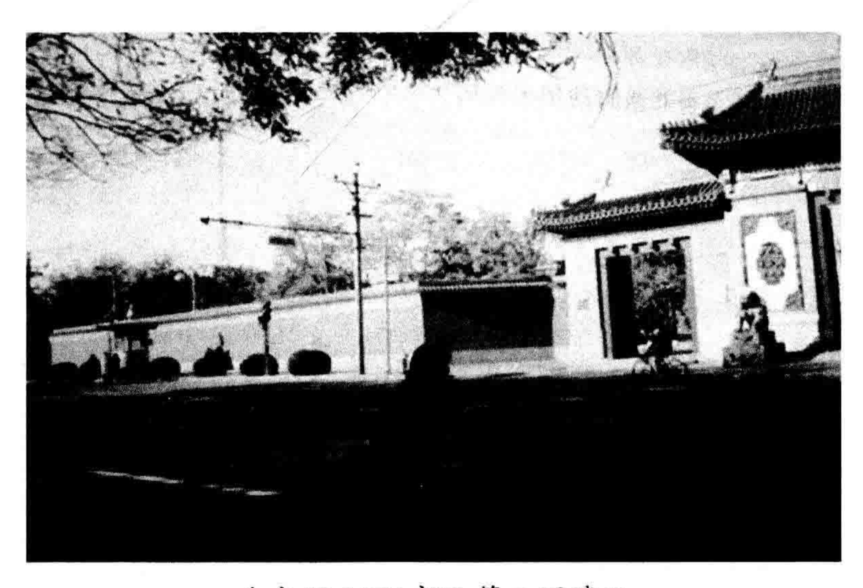
“1941年12月8日早晨8点钟的时候，日军1855部队的筱田队，强占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事前1年中（或有2年中），该队长筱田统就时常前来参观，他自称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并研究昆虫学。来所里的时候，往往是与我们所里昆虫部门研究人员谈谈。据我们看来，该筱田亦俨然学者风度，文字方面，可能通达数国，英语、法语说得都相当流利，体格很长，鼻子很高，我们常说他像是一个日本和法国人的混合人种，年岁在40左右。当那天早晨8点钟，筱田亲自率领士兵10名闯进本所，首先将本所员工已经上了班的加以监视，另一方面，让士兵把守大门，不准我们陆续来所上班的员工再进门去。经过两个小时后，将被监视的员工亦放出，而留下工友6人为他服务。过了几天功夫，他便通知我们离所的员工，各自写具履历片1张，并各自声明是否还愿欲继续服务。又过1星期后，指名召回我们干部10余人，借继续任用为名，强迫操作劳役，将静所楼房上层室内东西搬至下层。一方面于谈话中询问本所内部情形，如此10天，大概将本所情况了解清楚后，即下令将本所员工全体解散，仅留下机器匠4人，花匠1人及工

役1人。”[①]

日军强占静生生物调查所后，改为细菌武器研究所，专门研制细菌武器，主要生产跳蚤鼠疫细菌武器，并与南苑的第15野战军航空厂配合，用飞机散布各种细菌。课长篠田统技师、病理学博士，享受大佐级待遇。他的部下有军医将校2名、将校级待遇的军佐3名、卫生下士官6名、卫生兵45名，女子军佐3名、下士官3名，还吸收北京高等女子学校的日侨女生10名，此外还有中国劳工5名。

本课下设第一工作室，负责跳蚤生产；第二工作室，负责生产苍蝇、研究疟疾；第三工作室，生产鼠疫菌；小动物室，饲养老鼠等，此外还有事务室及疹疗、资料、经理等科。[②]

二、支队



北支甲1855部队第三课遗址

据有关资料表明，第1855部队支队遍布华北各地，但所列各支队数目略有出入。据1944年的《业务详报第11号》中“部队行动概要”记载：“（当时1855部队共）设置支部及派出所12个，本部直辖5个，第12军指挥4个，第1军指挥所属2个，驻蒙军所属1个。由北京本部统制业务，担负北支那全部广泛地区的防疫及防疫给水业务，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201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②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还有同防疫给水相关的教育、调查研究各种预防治疗剂的制造和补充……”[①]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谢忠厚研究，华北北支（甲）第1855部队还在天津、塘沽、张家口、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运城、济南、青岛、郑州、新乡、开封、包头、徐州、碓山16个城市先后建立了办事处、支部或分遣队，编制在数10人至100人左右。此外，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还在承德、赤峰等城市设立了支部。另据日本女作家西野留美子在《北京“甲”1855部队的验证》一文中记载：“北京防疫给水部的组织系统：（本部）以下设13个驻外地分部与办事处：第1，天津办事处（直辖于本部），负责人军医大尉立石五郎；第2，塘沽办事处（直辖于本部），负责人军医大尉黑川正治；第3，石门分部（直辖于本部），负责人军医少佐田山吉政；第4，太原分部，负责人军医少佐远藤吉雄；第5，运城办事处（在太原分部管下），负责人军医大尉松尾梅雄；济南分部”（直辖于本部），负责人军医大尉大森玄洞；第7，青岛办事处（本部与济南分部兼管），负责人军医中尉铃木武夫；第8，张家口分部，负责人军医大尉川锅里吉；第9，包头办事处；第10，郑州分部，负责人军医少佐上村秀胜；第11，开封办事处（在郑州分部管下），负责人军医大尉广濑一郎；第12，新乡办事处（在郑州分部管下），负责人军医中尉濑户丰；第13，郾城办事处（在郑州分部管下）。下文的1944年制成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编成表》中除记录了上述大部分的支队的负责人外，还有碓山分遣队负责人军医少尉田村节彦。

第1855部队还在华北各地配属了防疫给水班，其性质属细菌部队，其作战行动受驻地军、师团司令官节制，但其编成人事权力属第1855部队。例如，1944年7月，郑州支部的编成就是由西村英二签发的命令：“一、本部根据方面军作命丙第722号，编成北支那防疫给水部郑州支部……七、郑州支部编成完结之时即归第12军司令官指挥。”[②]防疫给水班的人数不等，少则10余人，多时数十人。驻山东第43军第59师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206页，中华书局，198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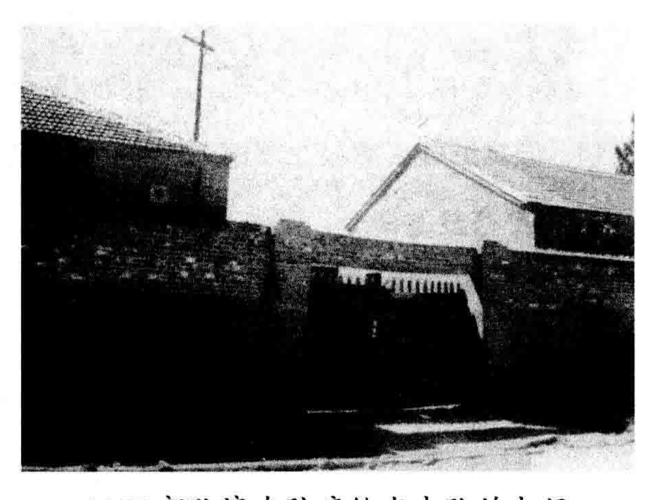
② 徐勇：《揭开黑幕——2002·中国·常德·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0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

团防疫给水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师团防疫给水班是于 1942 年 4 月 8 日第 59 师团编成的同时，作为军事秘密而密令编成的。从 1943 年 1 月起扩张了防疫给水班的业务。1943 年 9 月师团长细川忠康命令防疫给水班实行霍乱细菌战。1945 年 4 月 13 日，师团长藤田茂中将再次密令防疫给水班做出霍乱细菌战的准备。该细菌班有班长 1 人，编制 30 名左右，具有培殖细菌的各种设备和细菌战剂生产能力。据该班卫生曹长林茂美供认："防疫给水班表面上是防疫和检查水质，实际上是培养和散布细菌来杀害中国抗日军民及和平居民。"①

西村英二签发命令，于 4 月 10 日编成了 1 个野战防疫给水部，该部以军医中佐吉见亨为首，计有将校 16 人，士官 28 人，兵 103 人，雇佣人员 31 人，共计 178 人。该类是临时性机构，日军各军、师团均设有野战医院等常规战地卫生机构，这些医院有时也担负细菌战任务。第 1855 部队还设有临时性野战分队，其规模也比较大，例如，1944 年 4 月 16 日由部队动野战分队为机动性部队，随时执行细菌攻击任务，任务完成后即行解散，人员回原部队。

第 1855 部队的支队，其组织及活动能力强，具有代表性的是济南防疫给水部等支部：

（一）济南防疫给水部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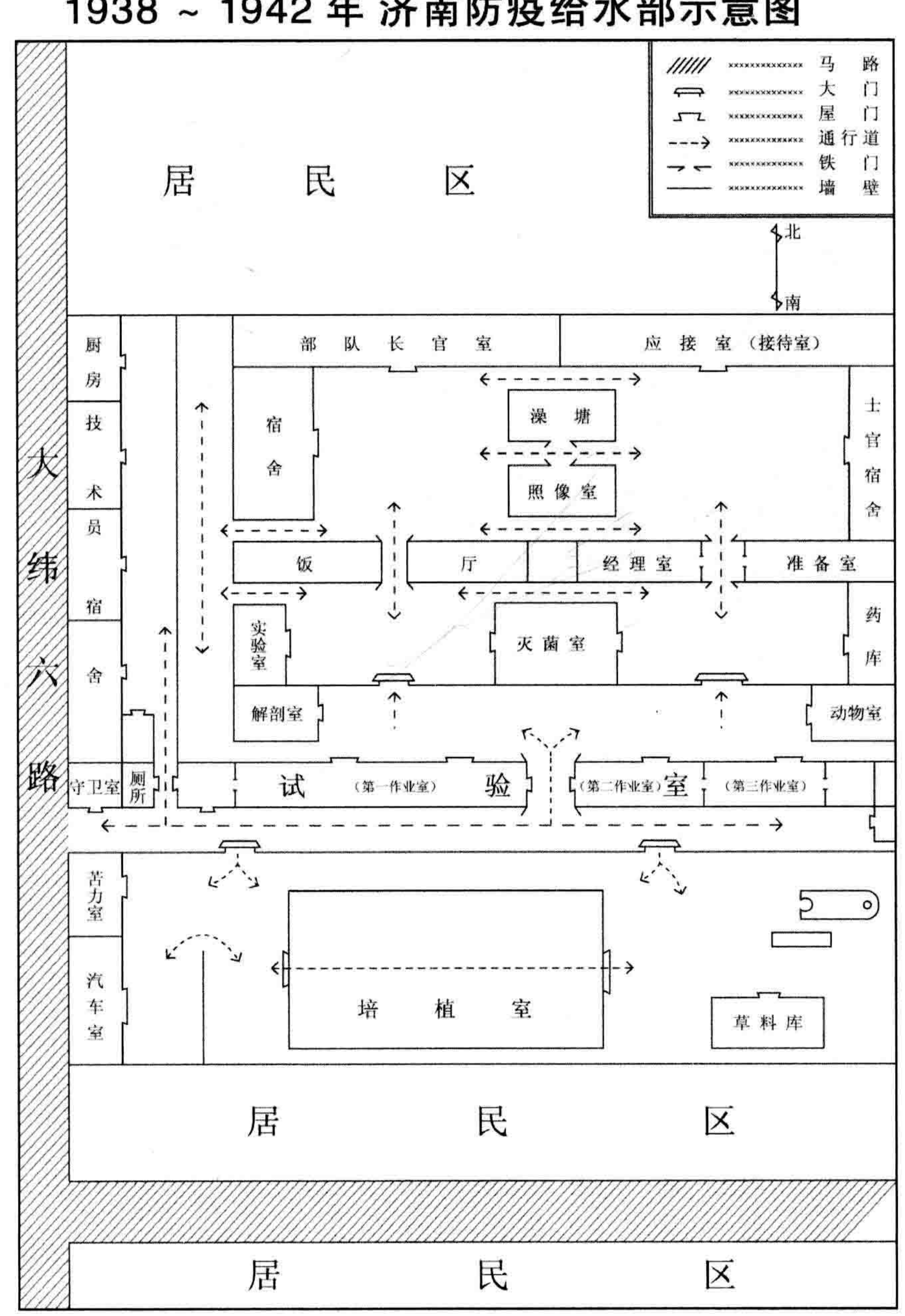


1855 部队济南防疫给水支队的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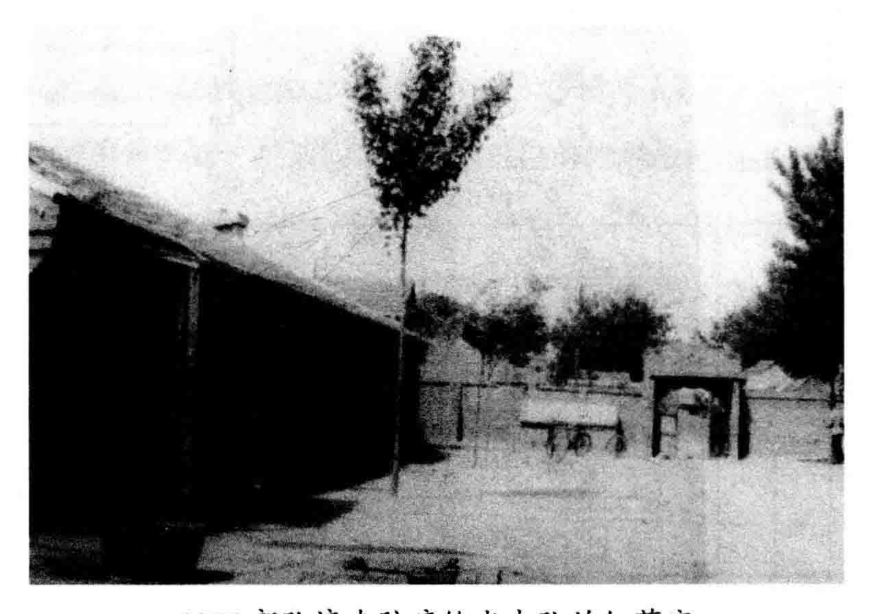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311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据原济南市人民检察署调查，1938 年，济南防疫给水部支部设于济南市经六路大纬六路，1942 年迁至经六路纬九路，对外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支部”，又称“日本陆军防疫处”，又名“第 1875 部队”。它直属华北防疫给水部本部统辖，又配属华北日军第 2 军作战，1938 年 11 月第 11 军接防后即配属该军作战。该部队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根据竹内丰凭记忆推断或当地检察机关的调查资料整理，因此只是大体情况。

1938 ~ 1942 年 济南防疫给水部示意图



据竹内丰笔供，济南防疫给水支部组织系统有：庶务班，负责支部之统辖、经营、联络等业务。卫生材料班，负责配备、供应各班所需器械、药品及消耗品等。计划班，负责根据军作战要求，制定支部计划等业务。卫生研究班，负责理化学实验以及当地卫生学方面和各项研究和有关毒气的业务。给水凿井班，负责野战及驻地之检水、饮用水灭菌、用水消毒及给水等业务，以及开凿野战用井及战斗部队给水业务。防疫班，负责细菌检索、消毒、预防接种以及其他预防瘟疫等业务。生菌制造班，负责研究制造细菌战用的各种瘟疫生苗。 经理班，负责筹集支部所需物资，并负责工资、给养等业务。



1855 部队济南防疫给水支队的细菌室

竹内丰根据 1943 年 8 月的济南防疫给水部支部编制表推断，该部队大体编制情况如下：该部队支部长是医学博士冈田军医大尉，副支部长是齐藤军医大尉。庶务室：主任，齐藤军医大尉，卫生下士官、卫生兵各 1 人，雇佣 3 人；计划室：主任（兼），齐藤军医大尉，卫生下士官、卫生兵各 1 名，抄写员 1 名；生菌室：主任，医学博士木村军医大尉，卫生下士官 1 名、卫生兵 3 名；病理试验室：主任（兼），医学博士木村军医大尉，卫生下士官 1 名、卫生兵 3 名；理化学试验室：主任（兼），医学博士冈田军医大尉、主任助理，黑川军医大尉、卫生下士官 1 名、卫生兵 3 名；卫生材料室：主任（兼），医学博士齐藤军医大尉、室附（兼），黑川军医大尉、卫生下士官、卫生兵各 1 名，雇佣 1 人；经理室：主任（兼），医学博士齐藤军医大尉、主计下士官、卫生兵各 1 名、

雇佣2人；凿井班：军医1名、卫生下士官1名、卫生兵若干名；防疫给水班：军医1名、卫生下士官1名、卫生兵若干名。此外还有动物室、解剖室。



1855部队济南防疫给水支队第一、第二细菌作业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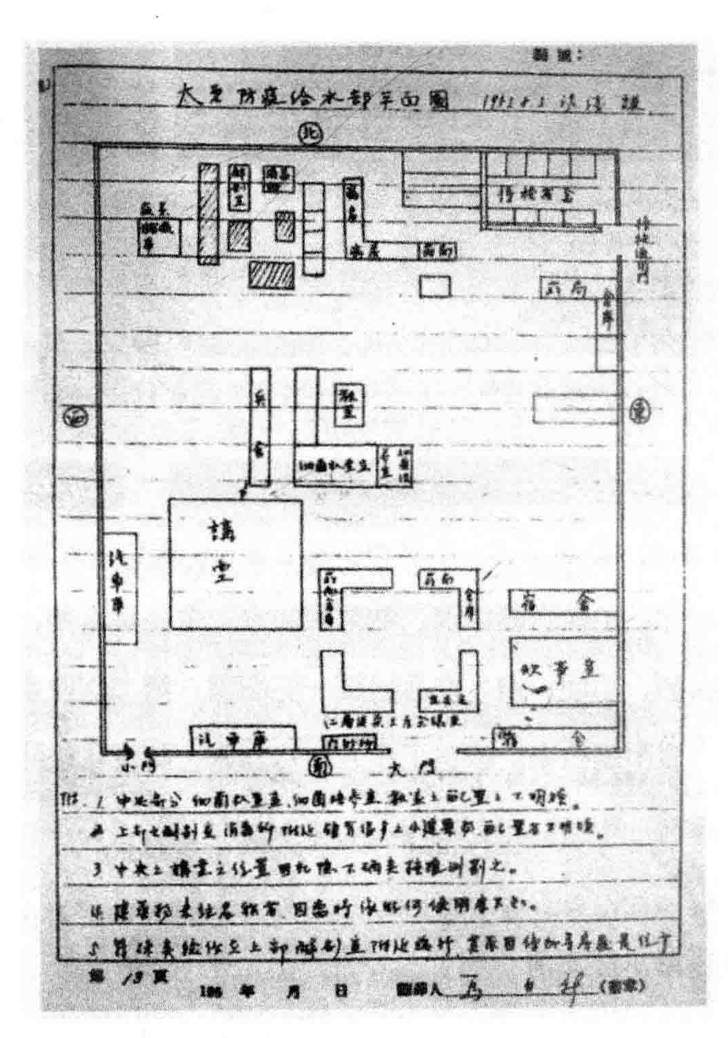
1954年5月23日，据原济南市人民检察署的调查报告，该部队组织机构及人员情况如下：负责人有3个：第一任是柳田大佐，第二任是金子（金久保，1940年时在职）少佐，第三任是大森上尉（队长，至日本投降）。组织机构及人数：庶务室：管理经济开支，主任是铃木中尉，该室有五六人；经理室：主任是吉村少尉，该室工作人员3名；准备室：主任日本人，中尉级，姓名不详，该室有3名工作员；理化研究室：主任渡边鼎中尉，工作人员3名；灭菌室：主任岩赖中尉；细菌试验室：主任是岩赖，内分三个作业室。第一作业室，培养大便、小便、痰，抽血检查一般细菌；第二作业室，组织切片；第三作业室，动物解剖，显微镜检查。该室工作人员八九人。防疫队：队长姓名不详，任务是给中国人注射防疫针，有时配合陆军医院及警备队赴外县工作，该部共有日本人百名，中国人有二三十名。①

（二）太原防疫给水部支部

太原防疫给水部支部，建立于1938年5月间，地址在太原市西羊市街12号，称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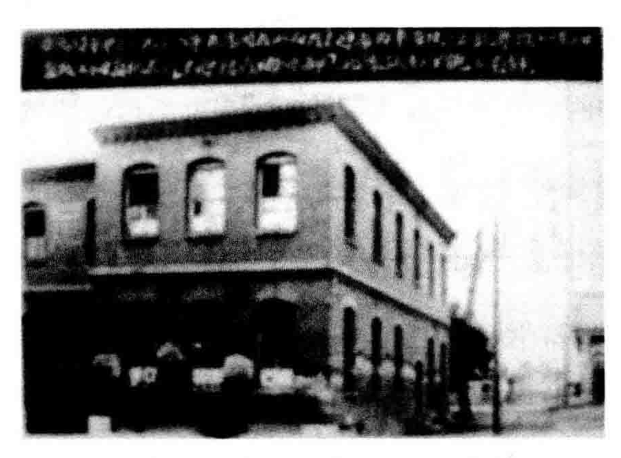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

"太原防疫给水部"。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时，潞安日陆军医院与太原防疫给水部合并。内部设有防疫给水细菌战教育室、细菌检查室、细菌培养室、解剖室、特殊实验室、消毒所等部门。太原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部长，前期为军医少佐近藤，后期为军医少佐桥本。其他主要成员有：庶务室，科长卫生大尉福井，卫生少尉近藤安作；诊疗室，科长军医大尉笠，军医大尉野口龙雄、内田、波川；药剂中尉武居；卫生准尉官川奎海。此外，有下士官 16 名左右，兵 40 余名，军属 10 余名。它虽然不隶属日本华北方面军第 1 军，但事实上接受第 1 军军医部长的指令。石井四郎曾于 1942 年 8 月至 1944 年初担任华北日军驻山西省第 1 军军医部长，直接指挥太原防疫给水分部的细菌战活动。[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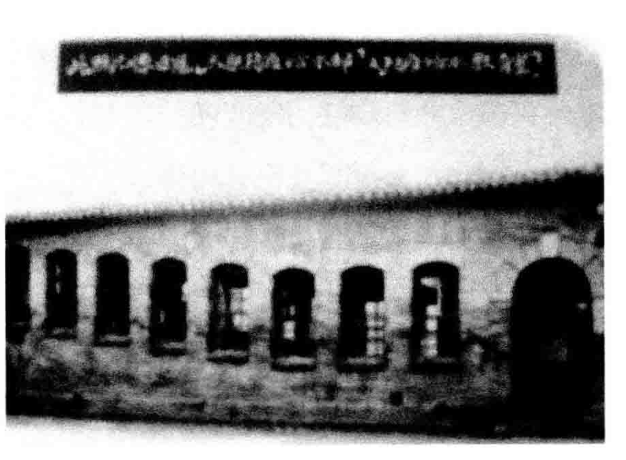


太原防疫给水部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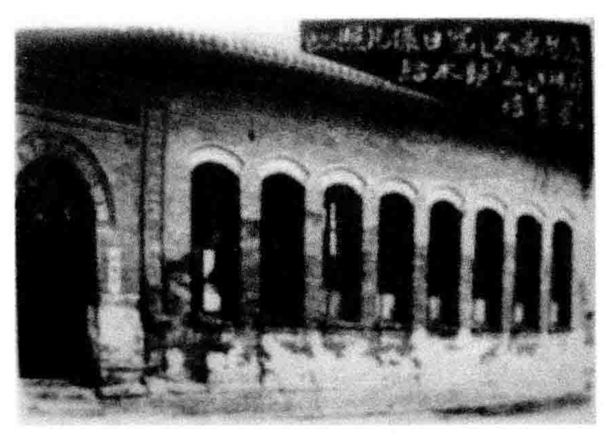
① 谢忠厚：《华北（甲）1855 细菌战部队之研究》，人民网日本版，2005 年 8 月 3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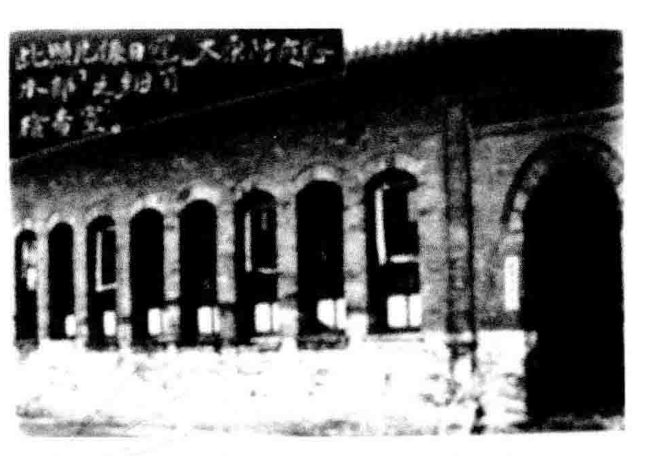
太原防疫给水部全貌的前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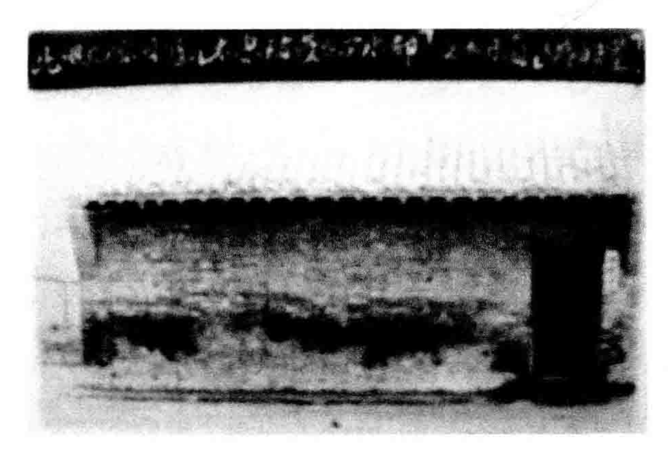
太原防疫给水部的防疫给水教育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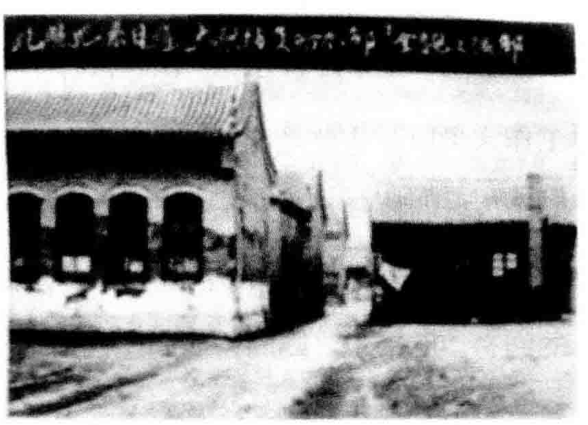
“太原防疫给水部”的细菌培养室



“太原防疫给水部”的细菌检查室



“太原防疫给水部”的细菌孵卵室



“太原防疫给水部”全貌的后部

第二节　细菌实验

第 1855 部队工作极其隐蔽，保密制度很严密。对外佯称防疫给水，实质上是一支细菌战部队，担负着防疫给水和细菌战的双重任务，是隐蔽在北京城内的一个庞大的细菌战基地。据松井宽治证实，1855 部队的重要部门筱田队主要研制细菌武器，培养鼠疫菌和跳蚤，准备对苏联作战。第三课设在北京国立图书馆西邻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内，工作是：(1) 大量生产跳蚤；(2) 大量生产鼠疫菌；(3) 结合跳蚤和鼠疫菌；(4) 从飞机上撒布的工作等。①

该部队主要工作是研制细菌武器，采用活人实验和活杀解剖的方法来实验细菌武器的效能，进行细菌战。这里聚集着大批科研人才，具有精良的设备， 它的细菌 (生物) 战剂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是相当可观，据第 59 师团第 54 旅团独立步兵第 110 大队本部医务卫生系卫生军曹长田友吉供认，该部队某军医说，第 1855 部队培养的霍乱菌，能消灭全世界的人口。

一、人员培训

据日本“原本史料”《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记载：“（第 1855 部队），对初任将校和新配属的将校，要实施有关业务之特性、以及防疫和防疫给水教育。”在培训期间，学员除听课外，还要召开研讨会，并参加实地实验。一般来说，该部队本部工作人员以及华北地区各细菌部队的卫生兵都要接受细菌战教育。关于第 1855 部队的细菌战培训教育，从日本战犯的供述材料中可以印证：据长田友吉笔供，1943 年 7 月，他以卫生兵的身份参加了河北省西华园华北卫生部候补下士官教育队培训班，同时受训的约有 200 来人。期间，他们还去第 1855 部队参加细菌检索训练。北京的西村部队和第二陆军医院分院的数名军医，对 230 来名卫生下士官候补者，进行了约两个星期的霍乱、伤寒、赤痢菌的检索教育。长田友吉和该部队的军医、学员等 250 来人，在北京市对市民进行霍乱菌检查，把霍乱患者封锁在家里，不予治疗，杀死 300 来人。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 年。

据中村三郎供认："1944 年 1 月，我在太原防疫给水部受过防疫给水训练。同年 2 月至 3 月在北京陆军医院东城分院受过细菌、防疫及毒气的训练，并听过北京防疫给水部长西村讲过细菌战问题，以及介绍给水部内设有大规模培养细菌的设备，并设有轮带式的培养器，能培养好多吨的细菌。同年，我又在北支方面军直属昆虫研究所，研究过蚊蝇的种类。当时，在标本上看到蝇子有 50 多种，蚊子有 30 多种。研究过细菌的培养和鉴别法。细菌有肠伤寒、副伤寒、斑疹伤寒、赤痢、阿米巴、黑热病、回归热、疟疾等，并参加了实地实验和学会鉴别的方法……"

日军各野战医院也对卫生工作人员进行细菌战教育。竹内丰笔供，他在济南陆军医院任军医期间，曾对卫生下士官、卫生兵、女护士进行过毒瓦斯治疗及防护、细菌战的防护法的教育。汤浅谦在山西省潞安陆军医院（乙第 1837 部队）传染病室和病理试验室及教育队任职期间，于 1942 年 5 ～ 9 月，对 36 师团新卫生兵及潞安陆军医院卫生兵共 230 名，进行了细菌的繁殖、撒布、消毒法的教育。次年，又对 200 名新卫生兵进行了同样的教育。目的是适应进行细菌战的需要。

二、设备设施

第 1855 部队逃跑前，销毁了大部分生产细菌的设备设施，国民党中央防疫处接管时仍然残存一些建筑物和设施，损坏状况最好的为 80%，最坏的为 20%。各支部也销毁了大部分设施。

（一）本　部

第 1855 部队在北京城内，利用原有设施和设备加以改建。根据《井本日记》》记载，1939 年秋，日本耗资 21 万日元，置办细菌武器的研究设施等，现已完成了 90%。 这支细菌部队占地面积相当大，建有大批房屋，其中包括 7 栋病房、100 多间工作室、70 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剧毒菌种的 192 平方米的地下冷库。这里成为日军大量生产细菌战剂的场所。并于 1941 年 12 月 8 日，强占了北平协和医院和中国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

据卫生部陆世火良在《关于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情况调查》一文中记载，日军在天坛防疫处建筑的房子不少，除去宿舍与病房外，工作室约有 100 余间。日军逃走后，在前天坛防疫处院内遗留下 3 个用来对培养菌种的器具进行消毒的大锅，分别重 11 吨、

12 吨、13 吨，长 6 米。仓库内还有大量的铝质培养箱。小动物室有 4 排房屋，共约 70 余间，每间室内可饲养数百只甚至 1 000 只老鼠。

1943 年，长田友吉在北京天坛华北防疫给水部受训时，他说，当时，西村防疫给水部设有细菌试验室，约有 10 个房间，其中有细菌培养室、灭菌室、显微镜检查室和材料室等。一天，我和几名同事一起进入了霍乱菌培养室。室内有 1 个高 2 米、长 1.5 米、宽 80 厘米的大灭菌器，其中装着 5 个高 30 厘米、长 50 厘米、宽 30 厘米铝制霍乱菌培养器。日本女作家西野留美子在《北京甲 1855 部队的验证》一文中也介绍了该部队本部院内配置的设施：进入大门有管理室、疫苗室、第 1 礼堂，对面有厨房和第 2 兵营、资材课的两个仓库、小卖部，北侧有汽车车库、兵器办公室、厂房，西侧有生产疫苗的第 2 课、小动物室、第 2 血清室和第 2 疫苗室等，南侧有粮库、第 3 兵营、第 1 至第 7 病房、灵堂、观察室、诊疗部办公室、被服仓库、护士宿舍、锅炉房等，东侧有下士官宿舍、好几栋小动物室、南端有养猪场劳工作业场和营外军属宿舍。在紫禁城东侧王府井大街街口有负责病理实验的第 1 课，在紫禁城西北侧有以生产菌鼠为主要任务的第 3 课。

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接收了第 151 兵站医院天坛分院生产班的资产，其中不动产：基地 62.7 万平方米，包括干热灭菌室（砖造平房铁板顶）、血清室（砖造平房瓦顶）、小动物室（砖造平房瓦顶）、瓦斯发生机室（砖造平房青灰雨坡顶）、烧却炉（砖造）各 1 栋，牲畜室（木造平房铝铁顶）2 栋，牲畜室（砖造平房瓦顶）4 栋，这些建筑物损坏状况为 50% 左右，保存最好的为 80%；行政设备：痘苗室、庶务室、生产室、血清室、小动物室各用锅炉（炉片用）1 部，损坏状况为 40%；事业设备：技术室用锅炉 2 部，恒温室装置（电气式）1 部，生产室工作用立式锅炉 1 部，血清室、小动物室用冷冻装置各 1 部，动物固定器（押田式日本制）20 部，动物试验器械（内容品不足）2 部，动物解剖器 3 部，动物解剖台 2 部，动物秤 2 部，动物体温计 2 个，动脉钳子 6 个，痘苗用筛子（金属制）2 个，孵卵器 11 部，低温恒温孵灶 1 部，饲养笼（柳枝制）106 个，作业台 51 个，牛固定台 1 个，动物用饲育台 18 个，动物用饲育架 10 个，

血清类格纳箱 2 个，绞肉机（马达式）1 部，马具 2 部，以上设施损坏状况 40% 左右。[①]

（二）支　部

第 1855 部队各主要支部也有精良的设备，具备独立研制细菌武器的能力。据济南市人民检察署调查，济南防疫给水部内设伤寒、霍乱、赤痢等病菌以及副伤寒血清、百日咳血清等六七个作业室，专门研究细菌。细菌第一作业室内设有显微镜、孵卵器 2 个、电气离心器 2 个、电器油灯架 1 个，是培养大小便、痰用的。第二作业室有组织切片机、动物实验器各 1 套。第三作业室有孵卵器 2 个、显微镜 2 个。灭菌室有干燥灭菌器、灭菌锅、蒸馏锅各 1 个。还有若干动物室。另据竹内丰供认，该支部有细菌战用的培养细菌的特殊设备：计有孵卵器 4 个（高 2 米、宽 1 米），许多试管、玻璃皿、白金棒等培养器械，1 800 倍的显微镜 3 架，病源检索器 2 具，干热灭菌器 3 个（高 1 米、宽 2 米），S·K·消毒器 1 具，野战蒸馏器 1 具，普通灭菌器 2 个，解剖器械 1 包，还有一切所用的药品等等。[②]

三、人体实验

（一）细菌传染实验

第 1855 部队把“实验材料”称作“猿”，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的工作人员在一张 1855 部队实验对象进出库表上，发现了关于“猿”的统计，证实第 1855 部队进行了残酷的人体实验。

1943 年 7 月，1855 部队与日军第二陆军医院的 200 多名候补下士官进行了半个月预防霍乱及细菌检验专门训练。据参与这次训练的长田友吉的供述，8 月的一天，北京城内发生霍乱，西村部队的军医和他们这些学员等 250 人，侵入北京市内，实验霍乱菌的繁殖力。他和西村部队的某军医中尉及 1 名翻译，闯入北安门附近的一个中国洋车夫家里。那个洋车夫 40 多岁，感染了霍乱，倒在地上呕吐求救。他们从这个洋车夫的吐泻物中取走可检物装进试管里，用草绳绑上门，把那个洋车夫关在家里，让他死去。他们在北京市霍乱菌检查过程中，封锁居民，杀害了 300 多人。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 年。

1943年，平川喜一人伍分配到第1855部队，在天坛接受细菌战培训6个月。1944年1月被分配到第三课饲养跳蚤，因染病，曾住过天坛陆军传染病院。1944年夏，调离第三课作警卫工作。他证实说："当时丰台（步兵训练队）有俘虏收容所。1944年夏天，从那里用汽车将俘虏带到北京，连续带来了三次共17人，直接带到了第三课（静生所）。押送的有翻译广田（军属）和我（特别警戒）两人。带到第三课后，对俘虏进行实验。俘虏都是些体格健壮的人。从收容所带出时由翻译谎称要带他们去医院。第三课有很多隔离的小房间，把俘虏关到里面。只空出几间以前饲养跳蚤的房间。俘虏们不怎么吃食物。雇了中国人做馒头等但还是无效。第一次带来6个人后，当天（也可能是第二天）从本部来了两名军医，一起进入房间里，穿着白大褂，给俘虏注射细菌。我当时没在场，不知注射了什么细菌。然后观察感染后的变化……过一夜，俘虏们都死了。"[①] 他还说，俘虏们的尸体被运到第二课解剖后，又从丰台带来第二批俘虏，继续进行实验。尸体不知埋葬在哪里去了。接连做了3次人体实验，俘虏们都穿着普通居民服装，头上围着布手巾，手上戴着手铐。

据一些第1855部队的原队员揭发，该部队以多种方式进行了人体实验。松井宽治听说，1944年，第1855部队曾进行过人体实验，有两个中国人手脚被绑着，口里塞着东西，被装在麻袋里面，在白昼间，用卡车从北京市内运到实验场所，进行人体实验，经过一个星期便死了。他还听尾崎技师说，1942年，第1855部队生产了大量鼠疫跳蚤，运到外面，用飞机撒播，进行了野外实验，得到了圆满的结果。伊藤影明说，1945年2月前后，有一辆有陆军标志的卡车把中国俘虏押运到第三课。卫兵荷枪实弹，将俘虏监禁在黑屋子里。第二天，他从监狱的窗户里看见一个20来岁的中国人。那青年已经被当作实验用的"猿"，他面容憔悴，"只有两只眼睛在闪闪发光。"

第1855部队的人体实验，经常在它的支部济南细菌实验场进行，据竹内丰笔供，1943年8月1～31日，被派到济南防疫给水支部……该支部长为了做研究实验，从济

①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出自1993年《战争责任研究季刊》（日文）第2期第49页。

南宪兵分队要来了 11 名八路军俘虏。为了实验细菌战用的伤寒菌感染力，先使 6 名八路军俘虏吃下混入病菌的食物，后对 5 名俘虏进行皮下注射，使其发病后，进行活体解剖，观察肠的溃疡及结痂期的恶化情况，观察硬食物有没有使肠穿孔、便血等情况。竹内丰还笔述了人体实验的全过程：“这 11 个人被拘留在房子入口的土地上，地上只铺一条草席和一条军用毛毯，给他们注射我们培养的伤寒菌，或将细菌投在食物里让他们吃下。不久，症状便出现了，持续高烧、呻吟、苦闷，甚至说胡话。我看到他们痛苦的样子，心中暗自庆幸，‘这个菌种的感染力相当强，用于细菌战是毫无问题的！’俘虏们的高烧和疲劳已达到顶点，为了使身体稍微舒服一点，企图转动一下，但是脚上戴着沉重的脚镣，不能自由活动，无法翻身。他们用充血的燃烧着怒火的眼睛瞪着去观察病情的我们。病情一天天加重，被折磨得极度衰弱和憔悴的样子，实在目不忍睹……由于大量摄入剧烈的活细菌，病情一直恶化下去。全身瘦得只剩下骨和皮，陷入危重状态。两颊的肉像被刀削一样，塌陷下去，只有颧骨高高突起，十分显眼。他们已经不能自己翻身了，呼吸微弱，只有鼻翼还在翕动……”[①] 俘虏们被折磨得一息尚存，便被送上了解剖台。木村军医大尉等人为了作细菌感染力试验，将八路军俘虏做了活体解剖。

1989 年 7 月 21 日，曾在济南支部当中文翻译的韩国人崔亨振在韩国《中央日报》上发表的《日军在中国的第二支细菌部队》一文揭露，该部队是用人体实验疫苗的部队。他们把鼠疫等各种病菌注射到中国俘虏身上，然后观察整个发病过程。“实验材料”是中国俘虏和韩国流浪民，有 1 000 多人。实验对象不足时，日本军医就到附近村庄随便抓人，连小孩也不放过。这支穿白大褂的细菌部队驻地用双重铁丝网围着，日本军医给实验对象注射鼠疫菌，有 10 多个人，在恶寒和高烧中死去。他第一次看到人体实验，是对 10 名俘虏注射天花病菌。被实验者全身出现了天花，声嘶力竭地喊着“救救我！”他们在痛苦中死去，被烧成了灰。日本军医还强迫俘虏们吃含有伤寒菌的饭团子。从俘虏身上收集虱子，再把虱子带的斑疹伤寒病菌注射到俘虏们身上，使他们染疫而死。为了研究中国大陆地方病，日本军医还从狗粪中提取细菌，经过培养后，把细菌掺进饭团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 年，第 227 ~ 228 页。

内让俘虏们吃。济南支部还在附近的一个 50 多户 300 多人的村子里进行霍乱菌实验。日本军医把沾有霍乱菌的猪肉等狗食撒在村子里，经过 15 天左右，该村霍乱流行，死了 20 多人。随后，日本军医抓来患者进行实验，观察防疫和治疗过程。这支细菌战部队平均每 3 个月进行一次人体实验，每次要死 100 多名俘虏，因此一年要杀死 400 到 500 名俘虏。他在这个部队服役期间，死亡的俘虏有 1 000 人。①

曾在济南支部当过练习生的阎鉴文、张森、季鸿庆等人说，1941 年，济南日本领事馆下令，日本人一律打防疫针，吃水统一由防疫给水部检查后供给。后不久，在济南车站、王官庄、东昌等地发生霍乱。日本人还从泰安招来一批劳工，每人每天 5 角钱，吃的很好，每日打针，染疫后，派到别处去，进行细菌传染。日本人还从纬八路带来一些妓女，抽血化验，培养细菌。他们在山东陆军医院进行人体实验，张森讲，有一年 6 月，日本人搞人体实验，将细菌注射到人体内后，传染人。后来，那个人又被解剖了。那天，解剖室发生火警，我们去现场担任警戒，看见了类似人的骨骼的东西，可能是被实验的。

山西细菌部队也进行细菌实验，中岛京子在山西潞安陆军医院当护士时，曾将鼠疫菌 8C.C. 注射在一个年约 20 多岁的抗日军俘虏的胸部。几分钟后，这个人面部发紫，出黑斑，嘴唇变黑，呼吸困难，很快就死亡了。他们在河南新乡一带作战时，以救济为名，把伤寒菌掺入大米、白面里，传染人群，杀害无辜平民。②

（二）冻伤实验

2002 年 12 月，笔者受日本横滨市立大学校长加藤佑三邀请，赴日本讲学期间，于东京一家图书资料馆内发现了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第 1855 部队）专业人员与驻蒙军团联合进行的一次野外冻伤试验的资料，题目为《极秘·驻蒙军冬季卫生研究成绩》，资料编成者为冬季卫生研究班，形成年代为昭和十六年三月（1941 年 3 月）。这份资料共有 10 万余字、20 余幅照片、图表百余份，是日军第 1855 部队冬季卫生研究班于 1941 年 3 月完成的人体试验研究结果。它详尽地描述了当年进行人体冻伤实验的完整过程，

①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 年。

具体包括冻伤者的姓名、性别和年龄，冻伤程度与处置、卫生滤水机、毒物检测实验及药物携带法以及蒙古包内的人体解剖等情景。

这次人体冻伤实验于 1941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11 日间，在蒙古自治联合政府锡林郭勒西苏尼特（今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西方盆地完成。日军研究班班长为外科军医少佐谷村一治，班员将校 8 名，下士官 8 名，兵士 24 名，军属 14 名，驻蒙军医部部员 1 名，北支那方面军军医部部员 1 名，总计 56 名组成。 被用作冻伤实验的受害者是 8 名中国男性，分别为：刘春（27 岁）、潘春（22 岁）、高付（33 岁）、下关（15 岁）、高百（49 岁）、郝贵（35 岁）、张义（21 岁）、陈远（38 岁）。年龄最大的 49 岁，最小的仅 15 岁。资料中照片上，这些受实验者与日本士兵穿一样的军服，说是死刑犯，实际上，他们是中国抗日军民，他们的名字也可能是日军为保密而用的。

资料称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严寒期间在内蒙古草原作战时必要的卫生服务需要。1939 年 1 ~ 3 月，在五原作战期间和齐齐哈尔、昂昂溪作战中，日军共有近 2 000 多人被冻伤，这使日军大伤脑筋。为解决这一问题，日军用活人进行冻伤实验，以完成日军在东北及内蒙古严寒期间以及侵略苏联的北进作战计划。

资料表明，在 1941 年 2 月 6 日 6 时 30 分到 9 时 30 分期间，由日军吉村大尉、岛田大尉、长屋中尉、三浦中尉、爪生中尉等人对活体进行冻伤实验，受害者在零下 24 ~ 27 摄氏度的低温、风速大概为每秒 5 米的情况下，穿着薄衣仰卧在担架上，被用来研究在穿湿袜子、过小军靴、戴湿手套、赤手、喝酒、空腹，服用阿托品等各种情况下的冻伤程度。年仅 15 岁的下关当时赤手，穿着湿袜子，由吉村大尉负责观察。资料上有关下关冻伤实验的全过程十分详细：刚过三四分钟，下关光着的左手就开始疼痛，人过于狂暴；5 分钟后，他的所有指尖从第二指骨到末梢呈蜡白色；10 分钟时，所有指尖、拇指球部、小指球部呈蜡白色，不能活动、僵硬、无知觉； 1 个半小时之后，两手的冻伤程度越来越深，两只脚开始不能活动、僵硬、无知觉。2 个小时后，左手的蜡白色部分越来越硬，右手不能活动，无知觉，左脚背发红，拇趾、小趾蜡白色越来越分明，右脚所有脚尖寒冷…… 在严寒中冷冻了 2 个多小时后，下关又被搬进帐篷进行摩擦，观察其恢复情况。10 分钟后，下关戴手套的右手稍可活动，恢复成发红状；四五十分钟后，两手发红，贴

冻伤膏，变得更加疼痛。

另一份材料中，由岛田大尉进行观察，让21岁的张义戴着湿手套，穿着过小的军靴进行冻伤实验。10分钟后，受害者开始惨叫，手、脚特别疼痛。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害者的肢体不断发生变化，120分钟后，双脚发红，脚趾呈蜡白色，发硬，肿部如鸡蛋大，呈苍白色。140分钟后，双手均不能活动，知觉高度钝麻，手背稍稍肿胀。受害者已无疼痛感，变得安静起来。其余资料对不同的实验对象的实验过程都进行了详细的记载。资料还对其他受实验者的冻伤实验情况进行了观察记录。

资料对发生冻伤的时间进行了总结，在零下27度，风速每秒5米，置于静止状态时：赤手，5 ~ 25分钟发生冻伤。戴手套，20分钟后出现冻伤，也有3小时后才被冻伤的。穿棉袜子、军靴，1 ~ 3小时后发生冻伤。戴湿手套、穿湿袜子或穿过小军靴时，发生冻伤的时间减半。空腹（1昼夜未食），发生冻伤的时间比赤手、穿湿袜子等所需的时间要长。饮酒后，发生冻伤的时间与上项基本相同。服用5片阿托品后，在零下14度，赤手，1个半小时出现冻伤；赤脚，35分钟后出现冻伤。在冻伤的初疗、第二度冻伤初疗时，以摩擦进行恢复需要25分钟至2小时。还有，在恢复过程中，针对蜡白色冻结僵硬状态，用干布摩擦，使其发红、柔软、产生温感。这就是对在零下20几度、风速每秒5米、室外静置3小时而出现冻伤进行初疗。初疗后。在8小时发生水疱，24小时出现大水疱。

这次实验结束后，日军将8名受冻伤实验者全部杀害。为掩盖罪行，日军为受冻伤实验者举行了“追悼会”。日军外科军医谷村一给少佐致“悼词”，称死者为“和平”做出“贡献”。



将被迫接受实验者捆绑而坐在地上，
进行冻伤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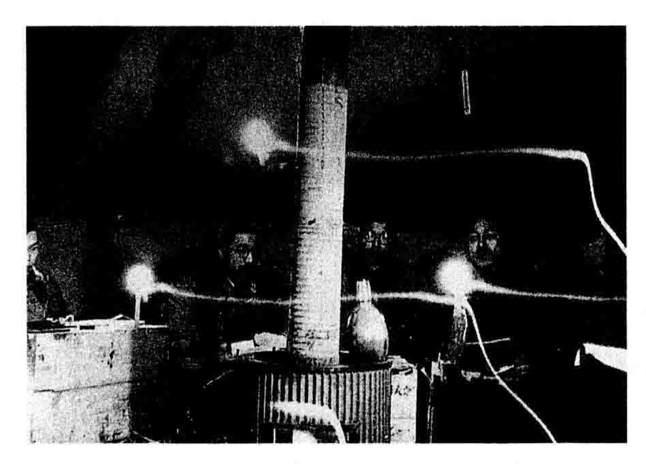
将被迫接受实验者绑在担架上，
露出手脚，进行冻伤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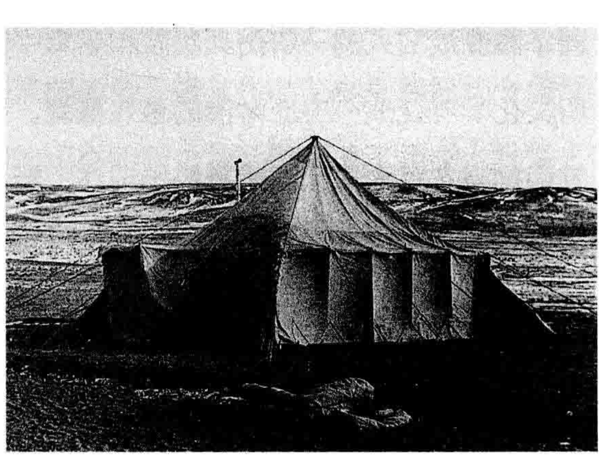
被冻伤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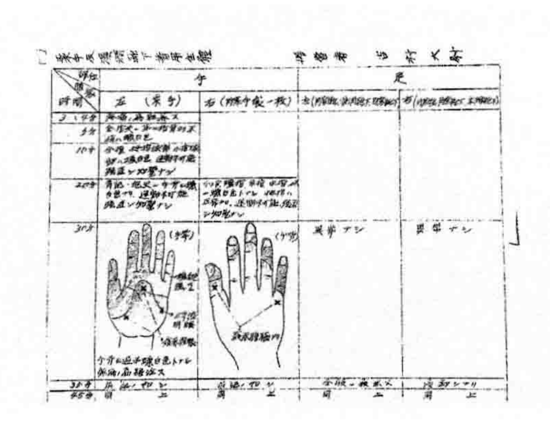
被冻伤的脚



蒙古包内会议



实验用帐篷



由日军吉村大尉负责观察
冻伤手脚的记录



为掩盖日军罪行，为被害者
宣读所谓的“悼词”

（三）人体解剖

据平川喜一等日本老兵揭发，第 1855 部队本部解剖设备设在第二课，“受实验者”都被运到那里进行活体解剖。除了日本老兵揭发的个别解剖事例外，西村部队本部进行人体实验活杀的大部分事实被隐瞒下来。但驻京其他日军部队也进行人体解剖。据有关资料记载，为了给日本人治病，日本军医竟然随意解剖中国人，摘取他们的器官，供给日本人。1982 年《清华校友通讯》第 6 期刊登的一篇文章《历史的见证 · 记日本侵略军在清华园犯下的累累罪行》中记载了日军侵占清华大学时所犯下的罪行：“1937 年 10 月 13 日，日军侵占了清华大学。最初是在校园内驻军，作为向南方进侵的转兵站。后来，清华园变成敌人的一所伤兵医院和屠宰中国人民的魔窟。更令人发指的是，敌寇竟把一所文化学府变成一座血淋淋的杀人魔窟。据几位老工友李长禄、徐锡增、奎顺、阎长海等根据当年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记述：新斋后面原回民食堂附近曾是一个‘万人坑’，这里不知埋葬了多少忠贞白骨。北院 12 号，曾是日寇的‘手术室’，名为手术室，实则是专为屠宰中国人民的魔窟。野兽们需要输血时，就把捉来的中国人捆在屋里的木桩上抽血；需要人皮，就剜中国人的皮肉来补匪徒们的创伤；若需要内脏，就把中国人开膛。无辜中国人被一辆一辆的大卡车装进清华园以后丧失了生命，被这些野兽宰割后尸体被扔到图书馆后面的煤场上专设的火化炉中化为灰烬。”[①] 这里是否有细菌部队进行人体

①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

实验，尚待调查。

据日本战犯供述，日军在华北各地的细菌战部队支部、办事处、分遣队，及各地日本陆军医院、各野战部队的军医，为了研制细菌武器，经常地做活体解剖。下面分别叙述日本战犯供述的灭绝人性的活体解剖的事例。

1. 山　东

据竹内丰笔供，他所在的原济南日陆军医院内科病室，在医学博士冈田大尉的命令下，细菌室主任、医学博士木村军医为了作细菌感染力实验，经常主持活体解剖工作。仅 1943 年 8 月间，该内科病室就连续将 11 名八路军俘虏做了活体解剖。下面摘录一段木村军医和竹内丰等人做活体解剖的情形："1943 年 8 月 6 日，我（竹内丰）按细菌室主任木村军医大尉的指示，命令细菌室卫生下士官将解剖室的器械材料准备好，命令 3 名卫生兵将感染伤寒菌的两名八路军俘虏，抬到解剖室。先将 1 名放置在解剖台上，用绳绑住上下肢固定好后，我命令卫生下士官给他进行全身麻醉，又命令 2 名卫生兵作拿器械的助手，我作手术助手，木村大尉执刀，从腹壁正中切开，我用大钝钩将创口拉开，木村大尉查看脾、肝、肠的病变后，将肠拉出腹腔外，详细检查肠管的病变。我将肠管病变处切除一部分后，将内脏塞回腹腔。继而进行胆囊穿刺，采出胆汁后，将腹壁缝合，最后，静脉注入吗啡液，将其杀害……"[①] 两名八路军战士被活杀后，日本军医将他们的部分器官装入标本瓶贮藏起来，制作了标本。由支部长与济南宪兵队联系，命令宪兵用卡车将尸体运走了。八路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解剖台，极其残酷的解剖暴行却令刽子手们窃喜，因为细菌的侵蚀力完全像他们预期的那样明显，从而研制成了用于大批杀人的毒力极强的各类细菌，预示这批细菌武器在细菌战中将要发挥作用。人体实验解剖不间断地进行着，竹内丰说："我和木村军医一个接一个地把 11 名俘虏作为效力试验的培养基而杀害了，将获得的大量细菌交给华北方面军，或附上标本，报告此次暴行的成果，为发动细菌战提供了资料。"[②]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219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229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日军各部队医疗机构还经常解剖无辜平民，进行观摩教育。据长田友吉供认，1942年4月至6月间，在济南日陆军医院卫生新兵教育队，该院院长中佐高木千年命令，铃木、井绩等军医解剖虐杀了1名30来岁的中国农民。有350多名卫生新兵观看了活体解剖实验。卫生军曹饭冈还将被虐杀者的内脏取出来当作教育标本。尸体就埋在医院的一角。同年9月，铃木、井绩等军医又解剖了两名中国男子。当350名新兵围站在解剖台前，铃木军医大尉开始做解剖实验，他让学员认真观察人体构造，他说，这两个俘虏是用来作学术实验的，让学员怀着送葬的心情活杀中国人。他们不注射麻药，拿着锋利的手术刀直接切开受实验者的腹部，取出阑尾。受实验者极度痛苦，拼命挣扎。凶残的铃木军医还在讲解，20分钟后，他才杀死这名中国人。之后，他的助手井绩、饭冈切除了肝、脾、胰、肾等腹部脏器，一一进行讲解。他们把受实验者的脏器泡在盛有福尔马林液的容器里，将尸体埋在医院内的猪圈旁。

1942年6月，第12军预备队机枪小队长小岛隆南在山东利津县小清河北岸的一个村里，抓来1个农民，迫使这个农民喝下了砒霜的水，毒杀了他。同年7月，他们在山东章丘县实验打空气针致死1名农民。1944年6月，小岛隆南在第59师团53旅团44大队机枪中队任队长，在山东朝城县，他和柿添军医指挥7个卫生兵活杀了1个农民，剖开胸膛，取出五脏，实地教育卫生兵。

据石田松雄笔供，1943年7月，日军第59师团野战医院、临清医院在山东临清县解剖了两名年青的中国人。由队长军医中尉冈野、见习士官日野甲子夫和卫兵3名进行活体解剖练习，石田松雄等担任警戒。尸体被埋在兵舍后边的空地里。

1943年8月，日军第59师团54旅团110大队侵入山东省章丘县某村，奉矢崎大郎中尉命令，永滨健勇将1个农民绑在民房院内，用刺刀挑开他的胸膛，再由军医土屋进行解剖，割下心脏。该部队医务人员和直辖小队在一旁观看，并听讲。

1944年10月10日，在山东省兖州陆军医院，种村文三教给加藤军医中尉用20C.C.麻药静脉注射解剖法，杀死1名俘虏，并进行了解剖。

2. 河　北

种村文三供认，1933年4月6日，在热河省古北营子站，他和铁道联队十字列车

的森本舍将 1 个轧伤左腿的中国工人做手术练习，锯掉他的左腿，使其成为残废。

纪仇在《从地狱中逃出》一文中记载：芦沟桥战争发生那年，他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在一个阴暗潮湿的拘留所里。里面一连串排列着 8 个人，他们 8 个都没有鼻子，耳朵那里凝结着紫色的血堆，代替了耳朵。8 个人用 1 条铁丝串连起来，铁丝通过嘴巴，把面颊穿透，从牙关中间穿过去。这些英勇的战士，是北平抗日保安队的，在北平西郊顽强作战后被俘。他们被俘后，天天遭受严刑拷打，问不出什么，日本野兽们就把串连他们的铁丝，换上一根烧红了的，烧焦了战士们的血肉。这还不算，日本人有了一种"新发明"，就是割断肋巴骨，据说这是日本一个有名的医学博士的"新发明"，拿这 8 名战士做实验。这 8 名战士中，已经有 4 人被割去了第一根肋骨。那 8 个人的小腿还被割成一条一条的缝，里面放进一些说不出名来的药。拷问时，让他们跪着，用木杠压住他们的小腿，肌肉被压成扁平的……就这样，英勇的 8 个战士惨死在日本强盗的酷刑和实验中。①

据承德宪兵分队警务系上等兵太田秀清笔供，1938 年 12 月，承德宪兵分队在河北兴隆县逮捕了 1 名抗日战士，交给关东军承德陆军医院活体解剖了。

1944 年 2 月 7 日，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召开日军暴行座谈会，揭露日军罪行，座谈会上，学员木田揭发，1939 年 12 月，日军混成第 8 旅团驻扎河北省沙河县佐野中队的伊藤军曹，解剖了 1 个老百姓，将肝取出，说是能治妇女病的一种药，而偷偷地贩卖。1941 年 9 月，安都中队长、渡边军曹、佐佐木伍长，杀死 1 名老百姓，取出他的脑子做药使用。河北省通县通州日本宪兵分队伍长庶务副主任逢见谷夫笔供，1940 年 5 月，奉宪兵分队长荒木的命令，他提出 1 名战俘交给了日军守备队的军医大尉毛利某，供他做活体解剖。逢见谷夫在旁边观看，先打针使其毙命，然后割下脑袋进行解剖。取出脑子后，命中国人听差赵某在澡堂锅炉里烧烤，然后交给荒木了。

天津日本陆军医院特设分院特别警备班一等兵德久知正笔供，1940 年 6 月至 9 月 23 日，该医院分院长军医中尉田某，为了研究第四种性病，将两名抗日军官在该院地下

---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 年。

室进行实验研究工作。日本军医切断了两名抗日军官的脚后筋，将细菌移植在他们体内，发烧时也不给药吃。后因德久知正调走，情况就不详了。

重富广一笔供，1940 年 7 月，在河北省密云县石匣镇西三四百米的田地里，日军独立守备步兵第 16 大队附松尾元治军医中尉等 5 人，将 1 名俘虏杀害。这名俘虏因口腔负伤，流血过多，不能呼吸。日本军医将其咽喉切开，使其能呼吸。之后，将其杀害，埋在田里。

河北省保定陆军医院军医少尉野田实供认，1942 年 10 月，该医院外科主任军医中尉田文男和野田实等数人，采用外科杂志上发表的脓胸手术方法，用 1 名受伤的伪军士兵做试验，手术失败，将其杀害。

军医中尉吉泽行雄笔供，1943 年 10 月，日军独立混成第 3 旅团在河北省阜平县东下关抓来 20 多个农民去山西五台县抬担架，11 月初，他们中间有 1 人患急性肺炎。日军不予治疗，反而把他杀死了。该旅团军医部长原见权一大尉命令用这具尸体做病理解剖。吉泽行雄用器具取出其内脏，将尸体埋葬了。阜平县第六区栗园铺团柏沟村村民袁二红证实了这件事：他和同村村民袁保太、袁振云、韩永生等人被日军抓去抬担架，袁保太患病死后，被日本人解剖，尸体埋在东下关东边的一个乱石堆里。袁二红逃回家后，领着袁保太的家属取尸体，看到尸体的胸部有 1 尺左右的口子，口子上用一张黑纸贴着。11 月中旬，原见权一、吉泽行雄、山部（见习士官）等人在阜平县东下关又对 1 名八路军俘虏进行了割开气管手术，3 个人轮番用手术器，从受实验者的喉节插刀，操作练习，将其杀害。

第 63 师团步兵第 66 旅团高级副官林吾夫笔供，1944 年 5 月，他擅自决定将两名八路军俘虏交给保定陆军医院进行解剖。该旅团的负责卫生事业的野田实和保定陆军医院附卫生军曹田某，还有两个卫生兵，利用两名俘虏做绑扎止血带的医学实验。连续实验 24 小时后，其中 1 名憋死，另一名处于危亡状态。在当天下午，他们给那名俘虏注射毒药，予以杀害，将尸体埋在保定城外城墙附近。6 月，野田实又领来 15 名八路军俘虏，准备做人体实验，后因他调走，以后处理结果不详。

独立混成第 15 旅团独立步兵第 79 大队第 1 中队第 1 小队长二宫正三笔供，1944

年7月，该旅团79大队在河北省平谷县井儿峪扫荡中，抓住1名未能逃跑的老人。大队本部军医大尉加藤一信将这名老人活体解剖了。

3. 河　南

德久知正笔供，1939年，日军第35师团原田熊部队驻扎在平原省阳武县西门外西北角。该部队和田军医用1个农民做空气注射试验。和田军医刺他的左腕静脉，让血流出来，将其杀害后，进行了解剖，还把他的脑袋割下来，带走了。

长田政雄笔供，1944年9月，日军第204大队军医中尉大道文男主持培训大队卫生兵。他们用军刀将1名青年的头颅砍下来，由大道文男、川上军医见习官将其胸部解剖，又由监山军医见习官将其阴部解剖，用活体解剖进行卫生兵现场教育。

第117师团野战医院附外科主任兼教育主任军医中尉野田实笔供，1944年10月下旬，他们在河南郑州第12军直辖兵站医院内受训时，将1名抗日军俘虏进行了活体解剖。他和10名受训者集体动手，将受实验者的盲肠、两大腿、两上臂的股动脉、静脉以及气管等进行解剖练习，最后又给他注射了毒药加以杀害。1945年4月，野田实在平原省焦作镇第117师团野战医院指导军医中尉新田林、军医少尉高岩、卫生部见习军官水谷等人，进行解剖练习。他们将1名八路军工作人员实施麻醉后，进行盲肠切除、四肢及气管切断术练习后，给他注射了大量空气，将其杀害了。

4. 山　西

北支那派遣军第108师团野炮兵第108联队第3大队本部陆军一等兵高梨文雄笔供，1938年4月，在山西省潞安县城西的西关村，由本部军医见习士官筑馆熊雄解剖活杀了1个农民。高梨文雄等5人，协助进行了解剖。

日军第109师团卫生队人事功绩曹长杉下兼藏供认，1938年6月26日，日军在山西长治县荫城镇与韩店扫荡时，他们用军刀杀死9名抗日战士，俘虏1人，带回太原。8月14日，在西羊市旧工业学校宿舍内，杉下兼藏等人将这名俘虏解剖，并拍了照片。尸体被扔进井里。

日军华北派遣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独立步兵第9大队第2中队少尉军医吉泽行雄笔供，1940年3月，他在山西崞县轩岗镇北约百米的河床，对1名男子进行解剖，他边解

剖边对见习的新兵讲授阑尾的部位、发炎的症状及治疗方法等。其后，桥本少尉又命令30名新兵对那个受实验者进行了刺杀练习。然后抛尸原野。同年7月，他在崞县原平镇陆军医院住院时，参加了该医院的活体药物实验，进行心脏注射法练习。他们将百倍或200倍浓度的20C.C.的升汞液注射进受实验者的心脏，然后将其杀死。这次实验由该院庶务主任某中尉执刀，被害者是两名八路军战士。

曾在日军部队的劳工，耳闻目睹了日军残杀我抗日战士的罪行：1940年秋，张存福在日军潞安陆军医院西村庆次部队医院做劳工时，听伙夫说，吉泽行雄大夫活剥了两名抗日部队战士。伙夫说，日本军医有皮带、铲子等解剖工具，他们先把人捆好，塞住嘴，不让叫唤，接着开膛取心肝，后割开小腹，再开割各部，训练日本新兵学手术。日军军医解剖当天午后，张存福看见五六个日本兵抬着两个染着鲜血的草袋子，从后营门出去了。下班后，他在后营门外铁路旁边的土壕沟里看见了那两个草袋。由于好奇，他拆开草袋看，发现是两具被解剖的尸体。崞县原平镇高福生控诉，1940年，西村部队医院将崞县六区农民苏万金活剥，把他的骨头用笼蒸水煮后，再用铁丝串联成人形骨架，作为标本。高福生见过那副骨架。还有一次，日本军医解剖两个抗日干部，因他年幼，药局主任让他去化验室送注射器。当时他听说杀中国人，心中恐慌，不留意将化验室地上脸盆盖的报纸煽开，看见两副心肝。为此，他被一个外号叫“小虎羔”的日本人打了几记耳光。崞县柳巷乡班村农民张三多控诉，1944年7月，吉泽行雄将远山神村村民贾招来解剖了，尸体抛在营盘西墙外。他哥哥贾招义雇我们寻找尸体。我们在营盘西墙外找见尸体。尸体挖出来后，是光着身子开了膛的，肚子里的心、肝、肠全没有了，塞了一些药布。我们将尸体交给了贾招义。陈水池揭发，吉泽行雄的汉名叫吉伟民，他在崞县原平镇陆军医院担任医院教官时，经常解剖人，贾招来就是其中的一个。段新宽揭发，1944年9月，吉泽行雄在崞县仓街陆军医院后院解剖了3个抗日干部。贺银柱也证实了这件事，他说，1944年9月，我在日军造第3589部队当苦力，日军在河东孙家庄俘获我军4人，当晚跑了1人，其余3人送到该部队医院，在仓街陆军医院解剖了。

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独立步兵第10大队中尉、通信班长相乐圭二笔供，1940年7月，该大队在山西宁武县接官亭或石板桥村扫荡时，在一个农户家里发现了1名八路

军伤病员。后由本部和泉军医中尉、筱田卫生军曹，将其活体解剖了。

大同日军宪兵队宪兵松永光穗笔供，他和补助宪兵莳田将 1 名中国共产党员押送到大同日军陆军医院城内诊疗所，协助该医院某军医中尉将其解剖杀害。

山西偏关县日本警备队长菊地修一供认，1941 年 9 月，驻偏关县楼沟堡的分遣队长荒谷定藏少尉，逮捕了该村村长和一个 16 岁的少年，拘押在偏关县城南门外卫生所，当晚，村长逃跑了。第二天，偏关县警备队配属军医河原估二中尉用那个孩子做肠子切断缝合手术。术后，将其杀害。在偏关城内马王庙，菊地修一命令部下杀死了 3 个居民，并将其中的 1 具尸体解剖。1945 年 6 月，菊地修一升任日军某炮兵队长，他率队在崞县西南贾村扫荡，打死居民 9 人，逮捕 40 人，让部下军医吉泽行雄等活体解剖了 3 人。

当地村民郭成则、黄招狗、裴瑞生、马合盛、刘兰、马狗孩等控诉说，日寇侵占潞安后，1941 年 3 月，他们在潞安陆军医院西村庆次部队病理室当杂工。期间，他们亲眼看见日本宪兵队用汽车押来郭金富、黄有成、裴胖狗等 7 人。该医院把 7 个人剃光了头，用凉水搅石炭酸水洗浴后，由院长西村庆次指挥外科科长松田、副科长种村文三将他们押往后院密室里，分次解剖了。同年 11 月，城北赵洼村支差者一老一少两人，在医院门外捡了几个罐头筒，被松田撞见，当时将 2 人抓到医院捆吊拷打致死，埋葬。几十天后，日本人又将老者的尸体挖出，割下头颅，用药水去掉皮肉，将头骨陈列在院长西村的办公室内。

潞安陆军医院军医中尉汤浅谦笔供，1942 年 3 月，该院军医和第 36 师团的 10 来个军医集体进行活体解剖练习，活杀了两名俘虏。他们在解剖中，进行睾丸摘除、气管切割、眼球摘除、肢体切断等各种手术练习。手术不能致死，就勒死，打药水毒死，用刀刺死，手段极其恶劣。4 月 14 日，在太原小东门街第 1 军工程队（俘虏收容所）里面，集合山西各日陆军医院和野战医院的 30 来名军医，活体解剖了 4 名俘虏。8 月，在潞安陆军医院，他们又解剖了 2 名俘虏。1943 年底，汤浅谦等军医在该医院再次活杀 2 人。1944 年，汤浅谦还制定了教育班活体解剖练习计划，即 1 年进行 6 次，1 次 2 个人。本年，他们做了两次，活杀了 4 人。1945 年，他们又解剖了 3 人。汤浅谦在潞安陆军医院工作 3 年，解剖活杀了 18 人。当年，马海水在该医院外科干杂活，1942 年，他亲眼看

见汤浅谦率4个伪兵将3个“犯人”押进解剖室。那天，他给医生送水，见到解剖室满地是血，而那3个人不知哪去了。

日军第37师团第225联队第9中队第1小队第2分队伍长森野博明笔供，1943年6月，在山西省稷山县仁义村北门外，该部队中野卫生上等兵正在解剖1个山西军伤兵，森野博明正好路过那里，看见解剖。他命令中野用石头砸开那个伤兵的头颅。他听中野讲了这次解剖的过程：先把那个伤员的脖子用绳子套上，勒成假死状态，再割开肚子，取出内脏，点教名称，最后刺扎心脏致死。

山西临汾县北支那派遣军临汾陆军医院曾任放射线理疗科陆军一等兵远山哲夫笔供，1944年1月15日，他奉命洗印了40张人的肝、脾、胃、胆囊、脑等照片，用作教育资料。这些器官是活体解剖了10个中国人照的。10月27日，他奉命拍照了1颗人头时，发现脑室内已注入空气和碘酒一类的造影剂，头是用外科刀切的。这颗人头照片由神纳光治郎作为博士论文的一部交给日本大阪帝国大学医学部小泽凯教授。11月中旬，远山哲夫等4人，用急救车到临汾城内宪兵队押来3名“犯人”，交给外科治疗室附上谷内卫生兵长，用于采血和生理实验材料及活体解剖等。

日军第1军司令部军医中尉中村三郎供认，1944年1月，他们20人在太原防疫给水部受训时，用8个中国人进行了活体解剖手术练习。他们分4组进行，葛成教官巡视指导。手术种类有阑尾切除术、疝气手术、气管切开、动脉结扎术、粪漏形成术、四肢切断术等。实习各组相互换顺序进行。最后，用5C.C.石炭酸向脑脊髓内注射将他们杀死。

潞安陆军医院卫生中尉种村文三供认，1944年10月15日，该医院为了训练日侨国防妇女50名会员，掌握战伤的急救法，把该院的1名工人抓来，把他的前臂用刀切开，实验止血法。

日伪山西桐旭保安干校竹川德寿笔供，1945年4月，他们招募了100多名学生进行奴化训练，山西桐旭医学专门学校附设医院皮肤科医师松下纪文用人皮进行实验。竹川德寿将5名学生送到松下那里。松下假借给学生治蛔虫，从这5个学生的胳膊上，每人割了长宽各2厘米的皮肉做实验。他还把皮肤实验结果写成论文。皮肤和文稿交给竹川德寿保存起来。

5. 内蒙古

日军第4独立警备队第21大队本部庶务功绩系准尉安达千代吉供认，1945年6月，在绥远省托克托县，他奉该大队丸尾勇三的命令训练新兵刺杀。他指挥12名士兵，将11个抗日志士带到托克托县东1公里的地方练习刺杀，挖了11个深4尺、长6尺的坑。他们先把6个人分别推到坑前，让日本兵进行刺杀练习。当场未刺死的，安达千代吉就用战刀刺心脏，将他们杀害。又用另5个人练习砍杀。丸尾勇三、安达千代吉亲手砍杀了2人，其余3人被军官和下士官杀死了。之后，日本军医将其中的1具尸体解剖了。[①]

四、动物实验

该部队饲养兔、鸡、荷兰猪、狗、猴、大白鼠等动物，用于细菌实验。据第1855部队第2分遣队原队员伊藤影明证实，该部队第三课还利用羊进行了细菌实验。实验时，他们“先把5～6只羊赶进蓄水沟围起来的放有跳蚤的地方，然后观察这些羊的感染情况。大约过3天，这些羊就因感染而致死。实验后，把羊的尸体烧掉，再把鼠疫跳蚤装入石油桶里带回部队。”[②]

第三节　细菌生产

该部队的细菌生产场所极其秘密，内部工作人员也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制度。据原第三课卫生兵松井宽治说，他们在工作时间内，总是在门内加锁，时常有人值班看守。工作完毕后回到营房，关于工作内容的话，是一句也不准讲的。上级吩咐过：星期天到外边去，即使遇到宪兵问起部队的内容，也不要照实回答。静生生物调查人员夏绰琨 回忆说，筱田队的内部设施与工作情形以及行动非常诡秘。据当时在该队留用的工友高德成和机器匠门子华说，静所楼房上层，绝不准中国人上去，日本人在二层楼的楼梯顶端，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

②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第237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出自《北京甲1855部队的验证》，作者西野美留子。

安了两扇门，日常总是锁着。日本工作人员都有符号，上楼时必须更换衣服，按电铃后，才许进去。平时凡有物品运入或运出，必将中国人驱使回避。大卡车开进所里后，都严密遮盖着，不让中国人靠前，而且大门紧闭，把中国人堵在后院，连下班都不让回家。西村英二部队长来时，也严密戒备，不让中国人接近。①

该部队主要培养鼠疫菌和跳蚤，准备进行细菌战。据卫生部陆世烺《关于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情况调查》的报告："日寇投降后接管该所人员夏绰琨等，曾在该所地下室内发现筱田部队第三课所留下的一张工作室说明图，证明该所为大量培养蚤种场所，图上注明：'平时只二层楼西半部养蚤种，作战时二、三层楼可全部养蚤。作战时最大生产能量是 2.47 万瓦（24.7 公斤）。平时养蚤最适合的数量是 1 600 瓦（1.6 公斤）。"此外，同一地方还发现了"蚤幼虫期的饲料和成虫发生量的关系"的图表，以及该部队在各地所搜集的跳蚤、老鼠、苍蝇的像片。楼里平时温度很高，每年只 7 月份停烧暖气锅炉 1 个月。院子里有用洋灰灌围起的 3 块直径 6 米的圆草地。日本兵嘱咐中国工人不许靠近，说草地里撒有跳蚤。日本兵每天把许多干血块碾成血粉，按着该部队残留下的研究图表的说明，血粉是养跳蚤的一种饲料。除跳蚤外，该部队还有 70 多间小动物室饲养老鼠，每间房子可饲养上千只老鼠。高文元曾负责喂几千只白鼠、灰鼠、仓鼠、兔子等物。他还到车站接过一批山东老鼠，到北京各区公所收集过大量的苍蝇。日寇还用麻袋运来大批的血粉，作为细菌培养剂用。日军逃跑后，在其驻地还挖出过血粉，下雨时还有腥臭味。②

第三课二楼全层是跳蚤培养室。松井宽治证实说："跳蚤的发育需要黑暗及摄氏 28 度的气温和 90% 的温度，因此，研究所二楼的窗户总是关起来的，玻璃的内侧涂上了黑漆，室内经常黑暗无光。为了保持湿度，在走廊和各房的天花板上，都吊着破布，每隔 1 小时喷雾 1 次，在地面上经常贮有 2 吋的水。附于各房的水蒸气管活瓣，不断输送水蒸气进房。房内整天都弥漫着水蒸气。房内摆着数列木棚，上面放着无数的汽油罐，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 年。

罐内装满着跳蚤，在罐的里面，放着小笼子，装有老鼠，每天都给与食物。老鼠经过 4 天至 1 星期便死去，因此，每天早上都要将死老鼠拿到地下室去，做养蛇室的食饵。”[①] 生产跳蚤的外围工作也有中国劳工，据当时在该部队工作的机械匠陈康延说，有 2 个中国劳工专门作刷煤油桶和揭桶盖的工作，每天有大批这样做好了的煤油桶，用卡车送到静生生物调查所去。

原第 1855 部队第 2 分遣队的伊藤影明证实，他的工作是饲养跳蚤，起初，由 10 来个士兵和军属负责生产。饲养室在 3 楼，第 1 楼是半地下室。身上只裹一条兜裆布，脚上只穿一双拖鞋，整天忙于饲养跳蚤。室内搭起几排木架子，把装进笼子里的老鼠放进石油桶里，里面撒上麦糠、血粉饲料、豆饼，然后往里面放进跳蚤，使之吸食鼠血，于是跳蚤就可以在里面不断繁殖。从他的证言来看，他是在第三课第一工作室工作，他们所饲养的跳蚤还不带鼠疫菌。第三工作室进行鼠疫菌的生产。到了 1944 年，饲养跳蚤的人员增加了，最多达到 50 人左右，开始正式大量生产鼠疫跳蚤。与伊藤影明同期入伍的 H 氏，负责饲养老鼠。他与 1944 年 1 月，感染鼠疫。同期工作人员中还有六七人感染了鼠疫，都住院治疗。另据《井本日记》记载，1941 年 12 月 22 日，“北支有石油桶 2 万”用于饲养跳蚤。1943 年 4 月 17 日，《医事会报》，参谋本部商议该计划时，有人报告说“北支那给水部生产跳蚤 100 克，老鼠 1 000 只，12 月末可以生产 1 000 公斤跳蚤，但所需老鼠急待补充供应。”报告说，每月增产 2 万只老鼠。[②]

日本投降后，留下了该部队在这里生产鼠疫细菌的直接证据。据陆世烺报告中记载，前天坛防疫处处长汤飞凡说：“我在 1945 年日寇投降后接管‘北支甲 1855 部队所占据的天坛防疫处时，曾询问有没有毒性菌种，日本人说只有斑疹伤寒的菌种，因此只交出斑疹伤寒的菌种。但本处在今年成立菌种室后，收集全处各部门的菌种时，发现 6 管只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菌种。第 一号是杉田辛平，第二号是杉田昭子，第三号是杉田奉子，第五号是水排胜子，第六号是杉田佳子，第八号是岩谷文容。6 管菌种经过培养试验以后，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209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

发现其中 5 管是毒性鼠疫杆菌，第八号的毒力可能已经消失。” 中央防疫处 (1950 年 2 月 16 日，防总字第 154 号) 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文也证实了这件事，清单中所列试管的日本女子姓名与陆世烺的调查所列姓名略有不同，该文如下：查本处接收日人遗下菌种，前经检查研究均类鼠疫菌，业已具文报告。兹经继续研究该项菌苗 6 管，均为鼠疫菌种，其中 5 管为有毒性的。兹谨列具清单连同原物照片一并备文呈报，敬祈鉴核，谨呈。

附：清单一纸

天坛防疫处原存接收日人遗下菌种清单：

1. 杉田寿平：有毒性鼠疫菌种，毒力为 100%。

2. 杉田昭子：有毒性鼠疫菌种，毒力为 80%。

3. 杉田奉子：有毒性鼠疫菌种，毒力为 75%。

5. 永渊胜子：有毒性鼠疫菌种，毒力为 100%。

6. 杉田佳子：有毒性鼠疫菌种，毒力为 80%。

7. 岩谷义宏：无毒性鼠疫菌种。

第 1855 部队除生产鼠疫菌外，还生产伤寒、霍乱等其他细菌，我们从长田友吉的供述中可以看出，该部队生产其他细菌的能力是相当惊人的。1943 年. 他在北京天坛华北防疫给水部受训时，曾和几名同事一起进入了霍乱菌培养室。(某军医中尉说)：“这里面培养着难以数计的霍乱菌，有了这些霍乱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类杀光。”[①] 这里还制作猩红热、白喉、破伤风、伤寒、斑疹伤寒、BCG、麻疯、脑膜炎等疫苗及血清，每天出品 160C.C. 的 4 ~ 5 箱，每箱 200 瓶。此外，还饲养苍蝇、蚊子、虱子等，用于细菌实验。

第 1855 部队各支部，同样具有大规模生产细菌的能力，1943 年 8 月 1 ~ 31 日，竹内丰被调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从事制造细菌武器，他供述了用人体实验制造鼠疫生菌的生产过程：“我据细菌室主任、医学博士木村军医大尉指示，命令细菌室 3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193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名卫生兵，在开始培养细菌之前，将培养皿、烧瓶、滴管、试管、不透明玻璃、玻璃棒、等细菌制造材料进行洗涤、干热灭菌、培养等准备工作。在每一次培养作业完了之后，将使用的器材先以蒸汽消毒进行杀菌后，精细地洗涤，再加以干热灭菌，准备下一次的培养工作。又命令卫生下士官准备好培养基的原料、所需的药品材料等物，同时教育卫生下士官使用关于远藤氏平板培地、增菌培地、鉴别培地、调制培养基及大量培养细菌时的涂植作业法，（木村和竹内丰给两名八路军俘虏用鼠疫菌接种感染，解剖实验后，确定该菌种有相当的感染力）他们从俘虏患者的静脉抽血，注入增菌培地，又将血液琼脂培剂涂植于摄氏 37 度的孵卵器内，静置培养 18 ～ 20 小时后，将好的菌落采取，涂植在远藤平板培剂上。于孵卵器中培养约 20 小时，根据白金耳检查，将一部分优秀菌落采取进行了预定的凝集反应检查，一部分移植到平板培剂上，放于孵卵器内，进行分离培养，又用白金耳作菌落检查和预定的凝集反应检查后，采取准确的菌落，再移植到平板培剂上。于孵卵器内静置约 20 小时进行纯培养，后用白金耳对培地面上之菌落进行精细地检查，反复进行凝集反应的检查，涂植标本施以镜检，确认没有杂菌混入后，以生理食盐水溶解，用白金耳涂植在大型平板培剂上，于摄氏 37 度的孵卵器培养约 20 小时后取出，采入于生菌容器内贮藏。又反复进行培养操作，就这样制造了很多作战用之鼠疫生菌。”①

竹内丰还供述了制造伤寒菌的过程，用伤寒菌接种感染受实验者，进行活体解剖时，进行胆囊穿刺，注入增菌培剂中，再涂植于血液平板培地上……其余生产流程与制造鼠疫菌大体相同。济南支部为了实验感染力，用 11 名八路军俘虏进行了伤寒菌的培养，制造了 16 桶半细菌战用的伤寒生菌，其容量为直径 40 公分、高 50 公分。这些伤寒细菌，于 1943 年 8 月间，连续 3 次由冈田支部长和木村主任交给北支那方面军军医部用汽车拉走。在陇海线以南特别是京汉线一带撒布了伤寒菌，使很多百姓死于伤寒病。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225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第四节 细 菌 战

第 1855 细菌战部队，由华北方面军军医部长指挥，受日本陆军大本营的统帅及石井四郎的领导和指导，是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一个重要基地。其细菌作战方法极其隐蔽，撒布细菌与扫荡作战相结合，它所造成的疫情损失之巨大，而群众还以为是天灾，因此，现存华北地区细菌战资料很少。从史料来看，第 1855 部队参与了鲁西地区撒布霍乱菌的行动，西村英二是指挥者之一。北平的霍乱细菌战也是 1855 部队谋略。此外，日军还在内蒙古临河、五原等地进行过鼠疫战，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撒播过鼠疫、伤寒、霍乱等细菌。动用惨绝寰宇、无复人性的细菌战，杀害了华北地区千百万民众。[①]

第五节 销毁罪证

1945 年 8 月 10 日，第 1855 部队组建了 1 个 20 来人的给水班，由森冈卫生准尉负责指挥。8 月 16 日，他们奉命利用院内的防空壕，开始烧掉实验仪器、动物、资料等。1945 年 10 月，他奉命接收静所，亲眼所见第 1855 部队毁灭证据的事实，他在《关于日军占据静生生物调查所及其撤退情形见闻》一文中记载："1945 年 8 月 15 日本投降，该筱田队闻讯惊慌，大肆烧毁其机要文件，据四邻看见，焚烧有三天三夜，火烟未息。同年 10 月中旬，某奉命接收静所，一进大门，便见院庭中间有一大坑，面积可有 1 亩，坑内尚有焚烧灰烬，破碎玻璃，及破煤油筒等物。日兵共约 10 人，正在移土填埋此坑；待进楼中查视，则楼房上层各室皆空空如也，有日兵数名，正用喷雾器喷刷墙壁；中层各室，除图书室等外，余亦多是空空；下层各室，多满积静所原有物品……经过 3 个月的时间，于次年 1 月下旬，日兵已将土坑填平，各室墙壁喷洗，破坏门窗代为添装。"卫生部陆世烺《关于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情况调查》也证实说："日本投降后，该部队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 年。

把中国工人都赶了出去，秘密烧毁各项文件、器具，拆毁各项设备。在投降后的10天内，门子华被叫回去修理水泵，看见日本兵正把他们安装的二楼绿色玻璃都打碎了，埋到地下，换上普通玻璃。日本人走了以后，该所还发现了七八个一尺多高的大玻璃瓶，里面都满装着苍蝇一类的东西。该所在修理水管时，曾在地下挖出20余个破煤油筒和烧过的大麦和老鼠。”曾在该部队工作过的机械匠陈康延说，日军投降后，烧毁很多文件器材，并用坦克车大量压毁或烧毁很多铝制培养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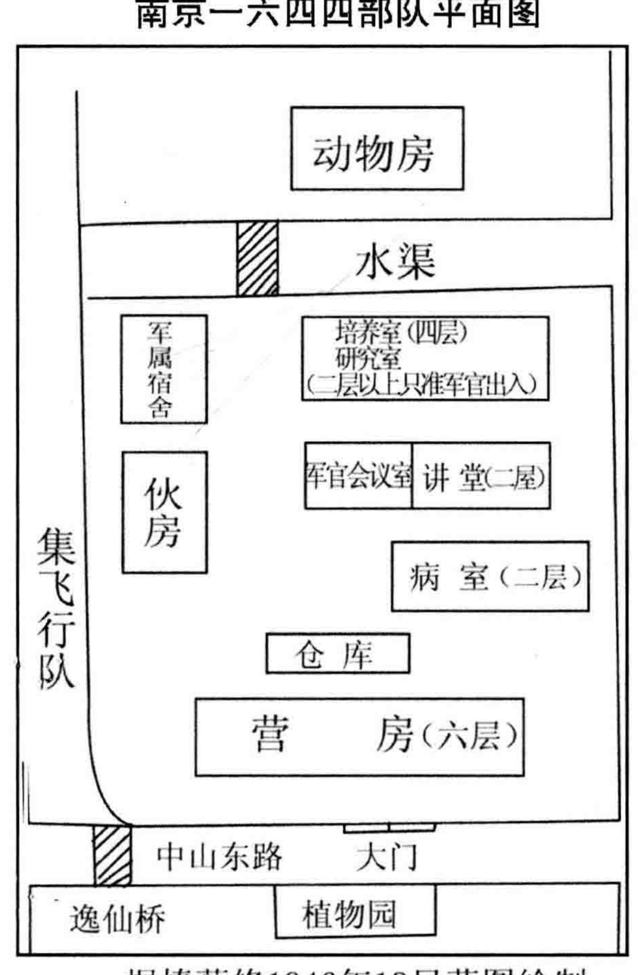
第1855部队筱田队卫生二等兵松井宽治证实：“不久，到8月15日，战事便结束了，在那天正午的无线电广播20分钟后，队长筱田便下令破坏细菌研究所。破坏工作继续了3天3晚，通宵达旦。在后园里挖了大坑，先把跳蚤放到里面去，然后洒上汽油焚烧。重要书籍和细菌培养器具也都被烧毁了。培养跳蚤的汽油罐1万个被卡车运走。战争结束后的第7天，我们便做完了破坏工作，到本部集中。同时，又下令解散部队，把‘北支那防疫供水部’的名称从华北派遣军的名册上涂去，所属官兵都转属到各陆军医院去……同年12月，队长筱田统、军医大尉高冈满和军佐技师尾崎繁雄3人脱离了军籍，穿起西装，蓄起头发，扮成日侨，搭登陆艇回到日本。前兵曹长时冈孝也转归了步兵部队，同年11月混入其他部队回国。我在1946年1月，因盲肠炎入医院，经施手术后化脓，直到3月，尚在病榻上过日子，直到同年4月4日。因此后来的事情怎样，我便不得而知。那细菌研究所的干部恐怕没有一个成为战犯嫌疑犯，全体回国了。”①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225页，中华书局，1989年。出自《人民日报》1950年2月21日，第1版。

第三章 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

第一节 机构队伍

南京一六四四部队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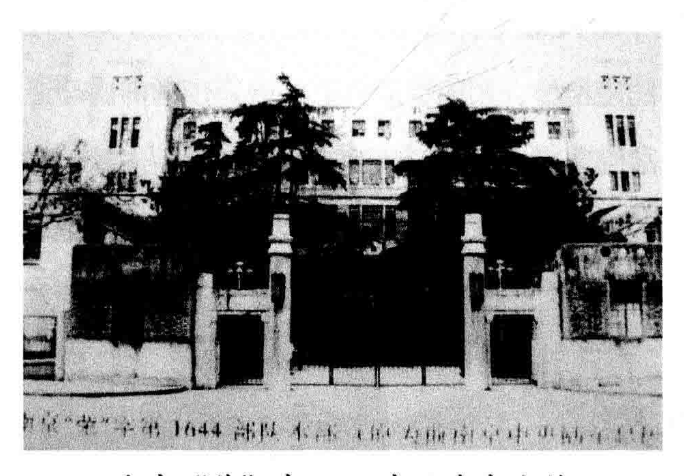


据榛葉修1946年19日草图绘制

侵华日军荣字第1644细菌战部队设在南京中山东路原南京中央陆军总医院（现址为解放军南京总医院），对外称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也称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又称多摩部队或桧字部队，1941年12月以后，又称登字第1644部队。该部队隶属日军参谋本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归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领导。该部队由石井四郎亲自组建，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后，石井四郎向日本陆军提出，在南京设立新的细菌部队，经过1年多的筹备，于1939年4月创建1644部队。该部队原班人马大多是

731部队的成员，重要设备、器材等也都是从731部队运来的。它是华北、华中和华南三大细菌战部队之一。总人数1 500人，该部队首任部长是石井四郎，第二任是太田澄，第三任为增田知贞，第四任为佐藤俊二，最后一任是山崎新直。该部队有一批学者、医师、总计120多人，还有一些从日本国内各大学挑选出来的年轻而优秀的医学者，组织一支科研队伍，专门研制各类细菌。1943年，朱洪文在日寇的华中防疫处任技士时，曾去过第1644部队，他说，“日本人内部称该部队为‘科学部队’。官兵都是细菌学专家和大学生，但他们为了隐蔽起见，并无若何特别标志，除了没有枪而外，全和普通日本兵一样。”[①]“前日本下级医官中西义雄在《赤旗报》发表声明，证实日军曾在南京设有细菌部队。他在驻在南京金陵大学内一个日本陆军医疗队服务时，曾与所谓‘华中疾病预防和给水供应部队’的人员交往。这些人后来告诉中西说：‘该部队的工作是从事培养传布疾病的细菌，他们还曾用中国人作实验。1945年8月，他们根据日本统帅部的命令，将制造细菌武器的一所大楼完全摧毁，以便灭迹。’”[②]

一、本　部



南京“荣”字1644部队本部大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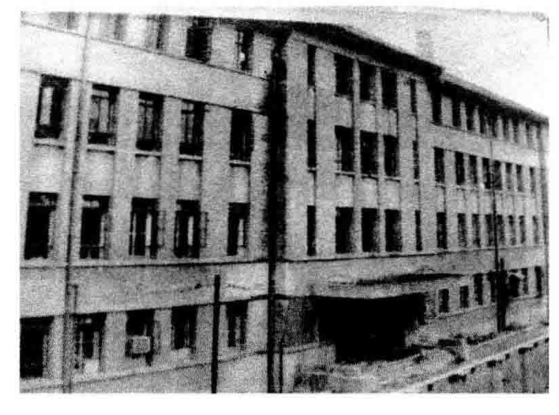
本部大楼设在原南京中央陆军总医院旧址，为6层楼。部长室、总务部、防疫给水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245页，中华书局，198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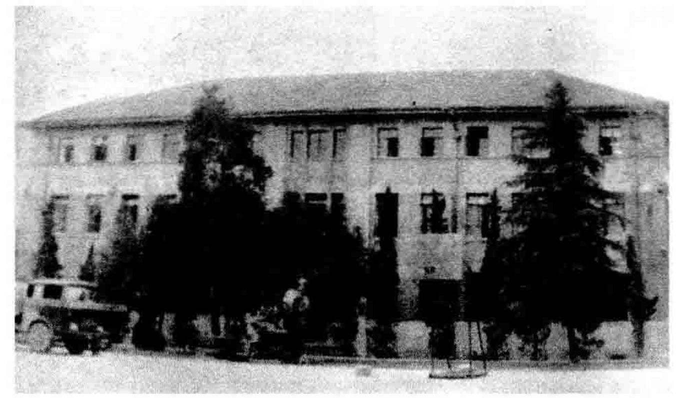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245页，中华书局，1989年。此件是1950年2月25日新华社新闻电稿的摘录，发表在《人民日报》。

课设在此楼。大门前挂有荣字第 1644 部队的木牌。 大院内的主楼后面，有一幢 4 层楼为副楼，细菌武器与毒气武器试验都在这里进行。这座大楼的第一层为霍乱、伤寒、鼠疫研究室，二层为饲养老鼠和繁殖跳蚤的地方。三层为人体实验室，四层为监禁受试者的地方。关押的房间均有铁窗，称为“打不开的房屋”，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院内其他建筑有动物舍，平房建筑；文职人员及一般军人宿舍；锅炉房；讲习楼，二层楼房；车库、食堂，平房建筑；药草种植场；日军空军部队兵舍，四层楼房；伪军军官学校。附近有陆军总司令部、宪兵司令部、日本总领事馆以及艺伎馆和日本人办的电影院、百货大楼等。马路对面有植物园和飞机场，有自备飞机 3 架。

据曾在该部队防疫科工作过的榛叶修笔供，日军华中派遣军荣字 1644 部队本部下设总务部，负责管理部队全部事务以及人事、教育、指导等事项；防疫科掌管细菌检索、培养、传染病防疫及其他防疫业务；材务科掌管各种卫生材料、给水器具及其他一般材料业务；理化学科主要负责毒物检查、制造预防注射液、水质调查和理化学方面的研究；经理科主管部队的财务。1943 年，部队长为佐藤俊二、总务部长为陆军军医少佐粟屋一步、防疫科长为陆军军医中尉大河内雅夫。该部队主要任务是为维护日军士兵健康，预防传染病，或对侨民进行防疫检查，预防注射，总之是为预防疾病而设立。另外，在作战时，组织给水班，供给作战部队净水。该部队确实生产霍乱、伤寒、鼠疫、赤痢等各类细菌，但对外保密，甚至连附近日军部队的一般士兵也不了解 1644 部队的性质。



南京“荣”字 1644 部队
细菌研究大楼遗址



南京“荣”字 1644 部队
动物培殖室遗址

1942年8月至1945年8月，石田甚太郎曾在1644部队一科任美术兵，主要从事编写部队机密文件的工作。他证实：

“荣1644部队是出于军事作战上的目的，于1939年由哈尔滨的731部队将细菌部队的一部分的人才、器材运往南京而建立起来的一支特别部队。也许是负有开发化学武器的特殊使命，我听说这支部队的规模虽然只是一个营，但它的军费却相当于一个团的份额。寄往部队的军事邮件只需写‘荣1644部队’便可寄到，由此也可看出这支部队的特殊性。该部队一般称之为华中南京防疫给水部……部队总人数有1 700人左右，根据任务分为一科到三科。三科的任务是防疫，培育疫苗，经营牧场。二科的任务是供水送水和修建，担任武器财务管理、食堂经营、卡车运输等工作。一科才是执行分配给部队的主要任务的机构，是部队的心脏部。这里日日夜夜都在进行着生化武器的执行开发的研究。1644部队还在上海、苏州、常州、九江、汉口、武昌、安庆等地设置了称之为野战防疫供水部的分部，这些分部据战斗的实际情况而设置或解散，并无一定的常数。部队中的人员，经常不断地被派往分部及返还本部。一科的总人数，第一中队（一科）队长近食中校以下各尉级以上军官、下级士官、士兵共二三十人，文职人员约15人。一科的军官、文职人员受到优待，在部队之外另有宿舍，每天由此来上班。近食中校是在1644部队初建之时，由哈尔滨731部队转过来的，直到战败为止，他一直在一科工作……一科的建筑物是一幢3层的楼房（应为4层的楼房——编者）。一楼正面进去是事务所，右边是摄影室和仓库器材室，左边是浴室和机器仪表房。此外，部队的三科借用了一楼的部分房间在进行大量灭菌工作和细菌培养。二楼有20个左右的房间，其中差不多一半是各尉级以上的军官、有官衔的文职人员（工程员和技术员）的研究室。各研究室分别从事霍乱、伤寒、鼠疫菌等研究，所有种类成百地被放入试管及其他器具、玻璃培养器皿内，然后保管在当时还很罕见的冰箱内，也有很多用于培养细菌的蒸汽锅。在二楼还有标本士兵的一科内务班休息室、杂物间，在东边有实验手术室（人体解剖室）。在三楼关押有供人体实验的活人房间。在所有的房间门下，都安置了放有煤酚液消毒池。规定在进出房间时必须用这一装置对鞋底进行消毒。白天在一科工作完了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必定要在这座房一楼和二楼的两个浴室洗完澡后才能回到内务班。”该部队还有

一个机密库，石田甚太郎说：“ 把这些机密文件进行整理后保管在一科事务所内的大书库（机密库）里也是我的工作。我虽是文职人员，但被任命为书库管理。书库内存放有 1644 部队成立以来的作战文件、研究发表日志的大量副本。即使有上级的命令，除我之外，别人不能随意打开书库。”①

二、分　部

第 1644 部队在上海、苏州、常州、杭州、九江、南昌、安庆、汉口、岳阳、宜昌、荆州等地设立了 12 个支部。杭州分部是华中细菌战的主要据点，是中心转运站，设在杭州郊区原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对外称“加茂部队”。在浙、赣、湘细菌战中，都是以此为转运战和补给的中心。由 731 部队和 1644 部队本部飞来的细菌作战部队，均在此换上杭州分部的飞机，前往作战。

三、南京九华山细菌战剂工厂

荣字第 1644 部队的细菌战剂生产工厂位于南京城东北角，设在距本部大院后部西侧约 1 公里的珠江路小营口路口西侧，北面直通北京东路的空地，是过去的兵营和靶场。这里称为小营路。空地外围有高墙和铁丝网，墙外有水沟，北边的土山名为九华山，土山内有山洞作储藏室。该细菌工厂设立岗哨，守卫森严。为了伪装和隐蔽，该地对外伪称是“血清疫苗制造厂”，无任何标志。据邻近居民说，里面都是木板和铁皮制造的房屋，不准中国人进入。他们都以为是一家制药厂。据在 1945 年 11 月协助国民党政府接收该处的原南京大学生物学系助教朱洪文说：“在接收时，那里还有一座像一间房子一样大的高压消毒残体，其旁边装置一座大锅炉，用以供给蒸气。里面有铁轨。一切培养细菌的材料先用车子载进去消毒，可见其制造规模的庞大。”他还说：“当时还接收了不少残余的东西。在试验动物方面有 2 000 多只小白鼠和几百只天竺鼠，但不久就全部死掉了。在培养细菌用的仪器方面有试管、平板各数十万只，温箱（孵卵箱）、冰箱各数十个，铝质培养箱数百个。在培养基方面有东洋菜（琼脂）30 余吨，鱼肉精膏百余箱。据大略推算，每 2 ～ 3 厘米

①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原载 1995 年 11 月 29 日上海《文汇报》，水谷尚子整理，徐静波译。

琼脂可制造细菌悬液 20 ～ 30C.C.，则仅就日寇所余的这一批培养基，就足以制造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 3 万 C.C.。”[①] 该细菌工厂拥有巨大的细菌战剂生产能力，一个生产周期就能生产 10 公斤浓缩活细菌浆，日军投降后，前上海国防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主任教授李振翩等接管南京九华山细菌工厂时，曾发现巨大的像小房般的高压蒸汽消毒锅，还有不少石井式细菌培养箱。该厂还制造血清，有马 60 多匹。后由刘学儒带回上海，转让给上海中法血清疫苗制造厂使用了。经专家勘察，该厂是细菌战剂生产工厂。[②]

四、上海细菌武器转运站

日军在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 1878 号前日本办的福民医院（现为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建立了细菌武器中转站。《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一书中摘记以下材料证实了该中转站的活动情况：

（一）军区司令部通字第 48 号通报（1943 年 5 月 23 日）

按集总转阎司令长官 15 日通报：敌近日由东京运沪（上海）大批毒菌，并指定福民医院为组织细菌培养之场所，以期到处传播造成剧烈之传染病，其毒菌共分 5 种：（1）鼠疫，（2）霍乱，（3）伤寒，（4）白喉，（5）赤痢等。该毒菌制成雪茄烟式，分蓝、黄、白色之玻璃瓶装置。敌利用各种方法，阴谋混入我各地区抛置于井中或农民室内等情，望各界特别注意并转告各当地群众，严加防范为要。

（二）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9603 号

1939 年 6 月 19 日上海电：敌遣汉奸散播病菌，冒充难民，携保温热水瓶，内藏霍乱、鼠疫、白喉、赤痢、伤寒等传染病细菌，潜入粤、桂、黔、川各地设计散发。现在上海福民医院特辟地下室，日夜监制各种传染病细菌。其派往渝、西安、桂林、金华、韶关等处汉奸，皆经敌南京特务机关 6 个月训练毕业，并经福民医院冈田博士指导。第一批已于 5 月 16 日分海南岛、厦门、温州、汉口四路出发。第二批又集虹口，往北部小学内，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 年。原载《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10 日，第 4 版。

②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

每日往福民医院学习。

（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重庆卫戍区总司令部电（1939 年 6 月 1 日）

据铁道部运输司令钱宗泽宥未运警谍电称：1. 敌利用夏初气候，派汉奸冒充难民，携带热水瓶，内藏霍乱、鼠疫、赤痢、伤寒等传染细菌，潜入粤、桂、滇、蜀设计散发于我军阵地水质中，并兼探我陆、空情况。其派往重庆、桂林、西安、金华、韶关等处者，已于 4 月 16 日分由海南岛、厦门、汕头、温州、汉口出发；第二批现潜伏虹口福民医院内实习，不久由南通、长江赴各处工作。2. 敌在海盐内掺加毒质，运往我内地，以图毒死我民众。该盐经炒后，即变黑色等语。除分电外，特电希严密查察。[①]

（四）上饶顾祝同致重庆蒋介石电（1939 年 7 月 10 日）

敌化学部队本月陆续到沪万余，分瓦斯、细菌两部，由芳勿次中将率领，集中南京，拟先编入第 8、第 9、第 13、第 15、第 16、第 101、第 103 等师团，每联队配属一中队，定灰日前分配完竣。[②]

（五）陆军 21 军 146 师阵中日记（1939 年 5 月 15 日）

奉总唐蒸戌勇中电，转司顾佳午金电，转军令部二信微亥渝电，据敌为防止我游击队蔓延，近由东京运大批菌苗赴沪，指定福民医院组织细菌培养工厂，共分鼠疫、霍乱、伤寒、白喉、赤痢 5 种，制成雪茄烟式之蓝、黄两色，用玻璃管分送华中、华南各前方，投弃于河井及茅厕中，并派特务机关及汉奸，散投各游击区各等因。希饬属严侦预防为要。等因，本部各处院站严密侦防。[③]

第二节　细菌研制

荣字 1644 部队侧重研制霍乱、鼠疫等细菌，繁殖和生产大量的鼠疫跳蚤，用以攻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377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378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③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377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击中国军民。该部队与731部队一样，拥有精良的设备和先进的技术，培养大批细菌战干部，从事研究最有效的细菌武器工作，大批量地生产细菌，密切配合731部队，进行细菌战。

一、人才培训

1644部队注重细菌人才培训，该部队第四任部队长佐滕俊二供认："南京荣字1644部队内所设训练部，在我的领导下，每年培养出300名细菌学干部，以供进行细菌战的需要。"该部队对新兵进行培训后才允许上岗，1942年，美术兵石田甚太郎入伍后，首先接受了3个月的严格的医学卫生教育，他说："因我对医学方面专业知识一无所知，所以这3个月我感到好像就在上学一样。教官是山中工程师。他教给了我如何防止传染病感染的防疫知识。"该细菌部队让学员学会防疫知识，进行自我保护，这是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培训细菌实战人才，他们采用残酷的人体实验，活体解剖等手段，让学员观摩实习，从而达到研制细菌武器、从事细菌战的目的。他们还向学员灌输武士道精神，并进行严格的保密教育。石田甚太郎说，他参加培训结束后，到一科从事编写部队机密文件的工作，近食中校差不多每天请他喝酒。起初，他以为是正常交往，后来才知道是在考验他，当他的身体和头脑都浸满了酒精时，是否还能保守机密。近食中校不断增大石田甚太郎的饮酒量，以此观察酒量与他的变化，来考察他做保密工作的能力。石田甚太郎的前任因此患上了神经衰弱症，几乎上吊自杀。的确，该部队保密工作非常成功，在南京6年期间，从事细菌武器研制和活体解剖实验，而南京当地的居民，包括伪政权，竟对此一无所知。战后，有关1644部队的证词甚少，仅存资料是佐滕俊二的供词，他还极力否认该部队进行过人体实验。再就是九江支队的榛叶修，他不了解南京本部的情形。直到石田甚太郎1993年临终前讲述给他的外孙女水谷尚子的那段特殊经历，经水谷尚子整理发表后，才披露了1644部队进行细菌战的部分罪行。

二、学术研究

据石田甚太郎说，该部队每星期五召开医学会议。在会议上，部队长、尉级以上的军医、有官衔的文职人员（工程师）都发表研究成果。这些医学研究资料的图表、显示图，会前都由美术兵石田甚太郎制作好。但对外要严格保密。该部队聚集着一大批医学

专家，村田良介是东大传染病研究所教授小岛三郎的徒弟，是东大毕业生，他在1644部队一科大楼二楼从事瘟疫的研究，收集了许多人体实验的资料。黑川毕业于庆大，之后分配到1644部队工作。村田和黑川合写的论文《关于……以及破伤风的预防接种》被收录进小岛编集的《预防接种讲本》(协同医书出版社，1949年)一书中。山中太木毕业于陆军军医学校，在1644部队一科研究伤寒、霍乱等肠道系统的传染病。他以“山中式鞭毛染色法”的提案获得博士学位。据此，即使是卫生兵，只要能简单地给鞭毛染色，就会对菌检索起很大的作用。[①]该部队的学者在防疫给水、疫苗研制等领域也有许多建树。

三、细菌生产

佐藤俊二任1644部队长时，领导该部队探求和大量生产细菌武器工作，他供认，1644部队拥有巨大的细菌战剂生产能力，主要设备有宽长各5米、高2米半的一间孵育室，口径1米半、长为2米半的两个筒形消毒器，以及“石井式”培养器约200具。该部队内还有孵育器40～50具；蒸汽灭菌器40～50具；科哈式锅炉40至50具，其中一部分安置在司令部，各支队也安置有锅炉。此外，还有蒸馏营养液的大玻璃蒸馏器。该部队能大规模地培养致命细菌，在利用全部设备时，该部队每一生产周期能制造出10公斤细菌。日本投降后，他们将南京这家细菌战剂生产厂尚存的细菌培养原料琼脂、蛋白胨和牛肉膏等约数十吨运回上海江湾的前国防医学院，竟装了10节火车厢，国防医学院又将这批原料转给上海生物制品所应用，据说用了10多年还未用完。

石田甚太郎证实说，在1644部队里，有许多医师撰写论文，都请他去他们的研究室里做插图工作，他可以自由进入任何一个军官任何一个工程师的研究室。因此，他在日常工作中，有机会了解该部队所进行的细菌研制以及人体实验等情况，他描画各类菌体时，从显微镜里看到了伤寒、鼠疫等菌体，他说：“我每天望着显微镜，用特殊的笔在B5纸上作出各种细菌的速写。我还记得曾经描画过菌体在供医疗检测用的玻璃器皿中因时间的不同而发生的变化、因毒素的反应而造成的细胞异常现象。用色素染色后的伤寒菌的母体与子体分离成红色和蓝色的染色体，看上去就像一个个糖果一般。”

---

① 《1644部队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网。

该部队还进行过繁殖跳蚤的工作，备置有100多个汽油桶。石田甚太郎证实说：

“（第1644部队进行鼠疫跳蚤研究），战争后期，日本制作了很多气球炸弹。气球炸弹实际上不是‘炸弹’，而是一种作为传播细菌武器的手段而开发出来的气球。1644部队曾进行过这种装载在气球上的‘鼠疫跳蚤’的开发研究。但是，培育出来的鼠疫跳蚤生命力很弱，随气球飘出去后马上就会死亡。因此，如何培育出健壮的跳蚤就成了最大的研究课题。（第1644部队）的鼠疫菌研究室中，靠中央的地方是监禁供试验用的活人的笼子，稍稍靠外面一点，便放置着装有已植入鼠疫菌的老鼠的汽油桶。部队中将这种吸了老鼠(暗号称之为‘年糕’)血的鼠疫跳蚤作为生物武器大量生产，并进行传播途径的研究。沿房间内的四周墙壁，设置了一圈宽40厘米、深30厘米左右的沟。里边流动着经消毒过的水。流到外面去的水经消毒后再回流。水就这样不断地巡回流动。这一装置是为了防止鼠疫跳蚤逃逸到房间外面去。一般跳不到比汽油桶更高的地方去。但是为了预防万一，还是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作为美术师的石田甚太郎还经常“画虱子和跳蚤的解剖速写。经培养的跳蚤，要比野生的跳蚤稍大些，颜色也不是红褐色，而是带点褐色的透明体，一眼看上去觉得有点怪怪的。原来这种跳蚤是‘为了传播鼠疫而专门培育起来的跳蚤’。虽说比较大，体身也就在1.5毫米。解剖时，先将一只跳蚤和熔化的蜡液注入一个纵、横、深均为25毫米的容器内，冷却后将蜡的固体取出。然后用一种比肉店里切火腿薄片的刀具更精巧的一种器具，将其切成一片片面积为2.5平方毫米、厚度为0.2毫米左右(恰如透明尼龙袋的厚度)的小薄片。这样一来，有跳蚤的部分就像一段电影胶片一样成为一片薄片。然后赶紧用镊子钳将这一片片小薄片夹在两块玻璃试片的中间，这是件很累人的活儿。稍有点呼吸，这蜡制的小薄片就会飘飞开去。夏天，工作的时候门窗都被关闭，在完全无风的房间中还须戴上口罩，而身体上只是紧裹着一块兜裆布而已。部队中，饲养了各种各样供试验用的动物，但是像供鼠疫跳蚤试验的老鼠这类小动物的消耗量相当厉害，仅靠部队内的饲养是不够供应的。因此，每年

要由陆路经朝鲜到日本的千叶县（有时候到新泻、福岛）去领取一次动物。”[①]

1943 年，昭和天皇的弟弟三笠宫曾到过 1644 部队，该部队为迎接三笠宫，制作了献纳品的照相册和电影。电影的内容记录了该部队研究室饲养老鼠和跳蚤的情形及部队作战的情形。水谷尚子说，三笠宫耳闻目睹了日军的野蛮侵略行经后，对日中战争产生了疑问，他以“若杉参谋”的假名写了一份题为《一个日本人对支那事变的内省》的文件，来揭露战争的罪行，文件被日军军部认为是“危险文件”而遭到没收和废弃。1994 年，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微缩胶卷中重发现了这份文件。从而引起了世人的注目。他被认为是皇室中思想最为开放的人物。

第三节　细菌实验

第 1644 部队侵占南京期间，一直不断从事细菌战研究与活体试验，杀害了大量中国人。1942 年 10 月，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俘虏收容所所长森田中尉将 100 多名俘虏送往 1644 部队，供注射细菌实验。这些人均被该部队长山崎新等人实验致死。中国官方对此案进行了调查，确信在 1644 部队内进行过人体实验。1945 年，南京邓府巷官方人员苏复生对此案进行了调查，他出示证据说，1644 部队侵占南京期间，该部队第一部主管特殊研究与实验秘密工作，第一部部长小野寺秀雄，继任部长岩崎少佐、山下少佐；部员近食少佐、黑川少尉、村上中尉、山中技师、后藤少尉、木村准尉、秋元曹长并矢野、小松两雇员等都参加了细菌实验，他们“选择国军俘虏而将各种病菌药品注射其身体内，作为实验上之研究，前后致死者甚多，但因其极端秘密，除该第一部人员外，则无从知悉其详情。”他在另一份调查资料中披露：“敌日在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原址设有俘虏收容所，而由森田中尉任所长，隶属于敌军总司令部第三课，乃该第三课课长广本上尉，

①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原载 1995 年 11 月 29 日上海《文汇报》，水谷尚子整理，徐静波译。

以为俘虏人数众多而开支甚巨，遂于（民国）31 年 10 月选送俘虏百人至多摩部队，以供特殊残酷之（行为）研究，用作病菌药品之实验，结果全数死亡，无一生存。而在此时之前后尚有多次，但现无人证。”

台湾籍人士谢金龙目睹了 1644 部队用俘虏进行细菌实验的事实。1945 年，日本投降后，他向南京首都地方法院控诉了 1644 部队长山崎新等人用细菌杀害人民的罪行。他控诉说：“……缘于民国 31 年（1942 年）10 月，（我）亲见敌军俘虏收容所所长森田中尉受敌日总司令部第三课课长广本上尉之命，选送百余人至中山内中央医院原址多摩部队，以供残忍之特殊实验，而将其作为秘密研究之牺牲品，结果该百余人全数死亡，无一生存。”[①]

中国法庭曾将调查材料，呈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 年 8 月 29 日，国际法庭在东京开审，代表中国方面的美方控告人萨顿，宣读了这一材料，说“日军多摩部队把擒获的平民运送到医学实验室去实验感染毒血清的效能。这个部队是最秘密的组织之一。该部队所危害的人数是无法确切查明的”。这一材料引起了法庭的注意，文件宣读后，审判长韦伯对萨顿说：“这是一种完全新奇的事情，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过这点。”[②]后来，国际法庭再没有审理这一细菌战案件。据美国专家判断，在 1644 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具体人数虽说难以确定，但被杀害者至少达 1 200 人以上。

日本方面也有人证实 1644 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罪恶行径，据《每日新闻》记者朝野富三调查，该部队实验楼三层为人体实验室，四层为监禁受试者的地方。平时为 20 ~ 30 人，人多时超过 100 人，其中还有妇女和儿童，受试者一旦进入，就不可能活着回去。他们的尸体还要被日军试验人员做解剖研究。朝野富三还采访记述了 1644 部队和“九研”（登户研究所）联合进行的一次人体实验情形，为了防止泄密，直接参与人体实验的只限于“九研”工作人员 7 名，1644 部队军医 2 人和翻译。该文记载“日本军医把受试者带到三楼，绑在手术台上，‘九研’人员站在两侧，由翻译说：‘这是日

---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242 ~ 244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

本医生，不要担心，是给你治病的。’随即进行人体实验，最后注入氰酸，该受试者立即发生痉挛。仅数十秒钟，就抽搐，气息奄奄，心跳停止。”[①] 日军老兵石田甚太郎以自己的亲历披露了 1644 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情形，他回忆：

“在三楼关押有供人体实验的活人房间。这是一些特别的房间。房间的形状并不像牢房，而是像一个大教室，里面放置着几个笼子。我记得，在三楼朝南的大房间常放着 5 个笼子，在西面的小房间里有两个。这些笼子就像动物园里关狮子的笼子，其大小只有一张 3 尺床铺那么大，里面关一个供实验的活人，不同的时期关押人数会有变化，倘若不够供实验用就再补充。同室的人能互相望见。由第一年的新兵负责他们的马桶的洗刷和吃饭。在所有的房间门下，都安置了放有煤酚液消毒池。规定在进出房间时必须用这一装置对鞋底进行消毒。白天在一科工作完了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必定要在这座楼房一楼和二楼的两个浴室内洗完澡后才能回到内务班……（该部队的）医生们将三楼的房间用暗号称之为‘三界’。‘三界’为佛教用语，意为‘冥界’，是指关押供医学试验用的中国人的特别房间和实验室。也就是说，关在三楼房间内的活人，都是供活体试验用的，从来没有活着出去过，三楼就成了生与死的分界岭，‘三界’之语由此而来。‘活人体’一词在部队中连新兵都知道，但‘三界’一词所用范围有限。这是因为能进入‘三界’房间的士兵人数很少。能进入室内的人，在便帽的旁侧标上一个钮扣，或在军服的胸前戴个徽章。徽章的颜色按等级分成红色的为将官（大将、中将、少将一级），黄色的为校官，白色为下级军官和文职人员。

在一科，用活人来进行各种各样有关传染病和毒素的活体试验。一科的医生，不仅是尉级以上的军官，也包括随军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总而言之只要是医生都参加了试验。由医生组成的专门小组，对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以及蜈蚣、蝎子、蝮蛇等小动物的毒液，毒草、毒药对人体会产生何种影响进行了人体试验。此外像牙医所进行的牙槽脓漏的研究、兽医和医生共同进行的狂犬病的研究，也使用了活人体。染指于活体试验的，并不限于一科专属的医生。也有的医生专程从日本本土赶来参加试验，取得研究成果后

①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第 279 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

立即将资料归结起来再返回日本。

从宪兵队那儿去接受活人体，是二科的工作。负责运输的二科的卡车，在深夜从老虎桥的宪兵队那儿将活人体带来。卡车外面盖上罩子，从外面看不见里面。到了部队后，便由二科交给一科。在一科活人体便被关入笼栅内，供医学试验用。负责管理活人体的，是近食中校。医生们根据各自的研究小组需使用多少活人体，一一向中校申报后再领取。部队中普遍认为，‘活人体不是俘虏，而是普通便衣，可不必对其宽容。’被用来做活人体的中国人以健康的成年男性居多，也有女子和儿童。有一天带来了一个亦被当作活人体的脸上还留有几分天真气的年轻女子。我觉得好生奇怪，找了借口来到了宪兵队，实际上要问一问宪兵队‘为什么要将这样的少女带来做活人体？’宪兵说她的罪行是‘大腿内侧藏着一把手枪，怀疑她是共党间谍。’但我想她也许是个良家子女，手枪也许是用来防身的。然而我不可能以此来反驳他们，只能随其处置。于是，这样的少女也被惨无人道地用来做人体试验。最后惨遭杀害。”

（石田甚太郎）的主要工作，是将供试验的人体身上摘出的器官上所出现的毒物和感染反应当场描绘下来。他说：我并不是整天呆在事务室里，更多的时间是在哪个房间里画什么东西。当时不像现在，既无电子显微镜，也没有彩色照片、计算机。当然，也无拍摄细菌和细胞照片的技术。因此在病理解剖和病理实验的报告上，一定会有美术兵的我以左眼瞅着显微镜用右眼来绘制的画。此外，也只有我一个人无熄灯时间。常常到了深夜我还在埋首书桌。在灭菌解剖室里，人体骨骼标本、头盖骨、活体经解剖后浸在酒精里的标本，有好几个滚倒在地上，发出一股难以言诉的臭味，令人感到恶心。在这样的房间里一个人在低垂的灯罩下工作，只有纸面和笔尖部分有一片亮光，自己背后的阴暗处猛然间仿佛有个白色的亡灵站立起来，使我不禁毛骨悚然。在这样的环境里，要保持自己的精神和体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①

原1644部队卫生员松本博披露了该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事实：1942年，松本博参

①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原载1995年11月29日上海《文汇报》，水谷尚子整理，徐静波译。

加南京 1644 部队，他在南京郊外王寺井学习了 3 个月，调入 1644 部队任卫生兵，学习人体构造、医疗等。他回忆说，1943 年，1644 部队曾利用俘虏进行人体实验，由军医或军属（指后勤或文职人员）给俘虏注射，但他只负责看守俘虏，不知道注射什么。整个院子有 14 栋建筑，牢房在 7 号，共有 4 间。牢房像教室那么大，有暖气设备。每间牢房关押 6 ~ 8 名俘虏，总计 30 多人，都是裸体。他们被分别关在 1 个宽 1 米、高 1.2 米的笼子里，只能蹲着。大小便使用 1 个直径 30 厘米的罐子。睡觉也在笼子里蜷缩着。日本军医或军属往俘虏身上放染有鼠疫、伤寒、霍乱、疟疾病菌的跳蚤，然后进行观察记录。破伤风的实验在其他房间里进行。

俘虏感染细菌后，得不到治疗。松本博说，他负责给俘虏戴上黑头罩送往处置室。处置室里有手术台，台子两头有捆绑手脚的皮带，把俘虏绑在手术台上，用乙醚类捂在俘虏的嘴上，进行麻醉。旁边置放 1 个大瓶子，贴上标签，然后由日本军医执刀，割开受实验者的血管，插入导管，血就流入瓶子里。血流尽后，军医就敲打受实验者的前胸，死者的前胸发生激烈的痉挛。然后，把尸体丢进焚尸炉火化。类似的人体实验几乎每天都做。日本投降时，松本博负责看守的牢房里还关押着 3 名俘虏，其他牢房里关押多少人，他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俘虏们肯定被全部杀死了。实验后的尸体或骨骸或被烧掉，或被埋在 1644 部队附近一带。日军投降后，为掩盖罪状，将埋在 1644 部队辖区内的尸骨重新开掘，堆聚在一科大院里焚烧，骨灰抛进长江里。但其部分遗骸还是遗留下来。1998 年 8 月 19 日至 9 月 5 日，南京九华山附近搞基建深挖时，无意中挖到几十具被肢解的尸骨，散发着浓烈的刺鼻药味，经化验，里面含有霍乱弧菌肠毒素基因。“在挖掘现场对遗骸进行检验，出具了南京市公安局（98）公刑物鉴法字第 350 号物证鉴定书。结果认定，遗骸女性尸骨 1 具，男性尸骨 27 具（另一具暂未检，公安局取样后，该工地又挖出 12 个头颅骨，合计 41 个头颅骨），年龄为 17 岁至 38 岁左右，均为青年、青壮年。这些遗骸，呈散在凌乱掩埋，有的头颅骨和肢骨被埋在简易木盒内，有的头颅骨和肢骨埋在木盒外，有的为完整的尸骸，有的为单一同部位骨骼集中掩埋，散在骨骼周围有残存的腐料草类物质。结合现场特点分析，该研究所认定，‘该盒为多人非正常死亡后的非正常埋尸或处理的地点’。对于骨骼周围散在的残存腐料草类物质，南京农

业大学的专家进行了技术分析鉴定，认定编织物残片原料扁平结构，宽度 1cm 左右，为整体结构。经制片在显微镜下观察，残存的细胞结构均为同一类材质原料，并可辨认出不易腐烂的厚壁细胞组织。经与新鲜蒲草叶等制片比较对照，确认‘包裹尸体外的草质材料为蒲草’”。[①]

第四节　细 菌 战

荣字第 1644 部队作为细菌战部队与第 731 部队的远征队联合行动，在华中地区主要进行了 3 次细菌战。他们采用“地面传染法”，由日特与汉奸，冒充难民，携带细菌战剂，潜入中国军队阵地与广大后方 地区，投弃于水源、田野以及建筑物上，或掺入食品中，实施细菌攻击。再就是用飞机空投带有各种致命细菌的疫蚤、麦粒、粟米、面粉、豆类、布块等。在人群中造成细菌传染，疫病流行。

在华中战场上，荣字第 1644 部队第一次细菌战是 1940 年 10 月的宁波（衢县、金华、义乌、东阳）等地的鼠疫战。第二次细菌战是 1941 年 11 月的常德鼠疫战。第三次细菌战是 1942 年的浙赣铁路沿线的细菌战疫。这 3 次细菌战日军使用了多种细菌战剂、杀伤与破坏力极大，夺去了无数平民百姓的生命，遗害严重，数年后瘟疫才被消灭（详见本书第四编《细菌战》）。

第五节　销毁罪证

石田甚太郎回忆了 1644 部队失败和毁灭证据的情形，他说：

“收音机里播放天皇宣布投降诏书的 8 月 15 日，从军官到士兵，部队里所有的人

① 高兴祖、朱成山：《侵华日军 1644 细菌战部队活人实验受害者遗骸的考证》，HTTP/WW.731CN.COM，细菌战诉讼网。

员都集合在大院子里，耷拉着脑袋收听广播。其时我一个人未参加集队，将极密文件搬到部队后院（从一科建筑物的北口出去，就靠近一科事务室的窗外）的防空壕内，将积成山一般的魔鬼的记录烧毁。上面对一科事务室的负责人木村准尉直至我下了一道命令：‘由石田负全责，销毁极密文件！’3年间不断描绘、记录、整理起来的所有记录资料，必须由我自己亲手来焚毁。依据上级的命令，在焚毁文件的时候，不准许有一张纸片散逸或留存下来。

我首先在防空洞里侧的顶部挖了一个洞。然后在书库中将文件全都搬出来，在纸上点上火。在巨大的、犹如西式大衣橱般的两个文件柜中，藏放着自1939年至1945年六年间所存在的日军细菌部队荣1644的所有的档案资料。

在地底下焚烧文件，外面是南京8月的热浪，里面是一片烈火炎炎，仿佛像一幅地狱受难画，这样的工作持续了3天共约40多个小时。这3天中我一刻也不得闭眼，一步也未走出洞外。受着这火焰地狱的痛苦，即使是由着魔鬼的符咒而舞蹈的偶人，也会大汗淋漓。这些日军所害怕外传的使用了生化武器的物证资料及用于细菌战的活人体试验研究记录，就这样销毁了。至18日早上，焚毁完毕，然后将防空洞的顶部塌陷到地上，用泥土掩埋了纸灰。

宣布投降后的一个星期，传来了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将要派员来接收的消息，部队里一片哗然。上面传下了命令：‘凡是带菌物，从跳蚤、老鼠直至活人体全都放入焚尸场内焚毁！’‘全体一科的人员赶紧将建筑物及室内的一切其他物品处置掉！’于是，为开发细菌武器而进行的活体试验的所有形迹都彻底地抹消了。这真是一片凄惨的场景。我在烧毁文件的时候，别的人将‘三界’的房内结构拆除，改造成娱乐室的模样。房间周围原有一圈防止跳蚤逃逸的水沟都被不留痕迹地除掉了。听说活人体则用青酸钾毒死后被焚烧了。

最令人难忘的，是士兵们在一科辖区内到处重新开掘的情景。一科借了飞机场的一部分场地用作种植药草的农场，对那里也进行了挖掘。被大量埋葬的中国人的尸体暴露了出来。中国式的布衣和头发尚未腐烂，而尸骸差不多都成了白骨，尽管如此，从泥土中挖掘出来的腐败肉体化成了水浸吸到衣服上，在炎夏太阳的照射下，引来了大批苍蝇，

黑压压的一片，散发出异样的臭气。两三个士兵拖一辆拖车，将尸体堆聚在一科的大院里。堆成山一般的尸骸，仅我所见的就有一百几十具。听说烧了好几天以后抛进了长江。我真不愿意回想起那股恶臭，但一到了夏天就会想起来”。

石田甚太郎还描述了战败回国后的一些事情，他说：

“1644 部队有一个由原队员组成的称之为“清风会”的战友会，但自复员以后，我一次也未参加过他们的聚会。第一，“战友”之类的人我一个也没有。无论从我当初的工作情况来看，还是从自己的精神状态来看，我都不可能在部队里交上亲密的朋友。记不清是 195 几年了，当时我接到一份通知，说是要在信州的温泉旅馆里举行首次战友会的活动，同时庆祝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受审后的佐藤俊二军医中将自前苏联复员归来。我犹豫了一阵后终于没有去。以后我差不多每年都接到活动的通知，但每次都拒绝了。我不愿回想过去的这段日子。细菌、药物的反应，显微镜的世界，在南京不断描绘战争日记的岁月，就像幻影一般追逐着我。战前我是一名小有名气的留着长发的、现代派的插图装饰画家。但是战后我未再重操画笔，像和尚一般剃了个光头，悄然度日，这一切都是为了躲避“南京幻影”的追逐。复员时带回的书库的钥匙和解剖刀（都是德国货）、军衔章和一本人名册，至今我仍然小心地保存着。红十字的袖章我也带回来了，但每次拿出来看的时候，总觉得上面沾着战败时‘活人体处理‘的臭气，最后就将这个烧掉了。当时通过军事邮件寄给家里的部队内外及南京的照片，也因我家未遭战火而有幸得以保存下来。[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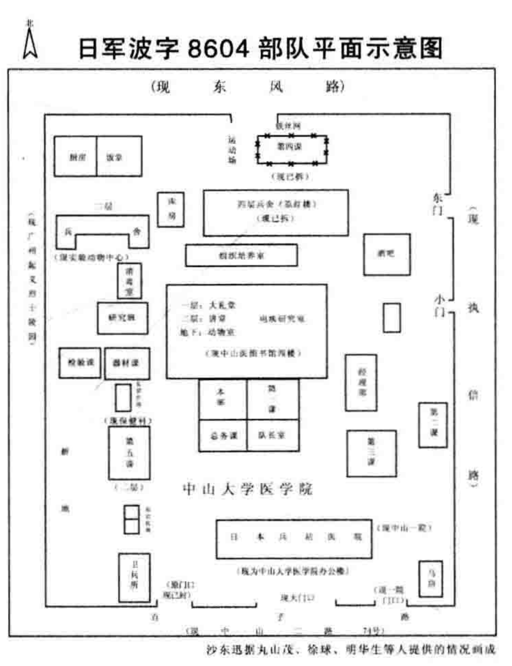
由水谷尚子整理的石田先生的临终遗言证实 1644 部队是一支细菌部队，该部队和 731 部队一样，也研制鼠疫、伤寒、霍乱等各类细菌，也曾进行人体实验、活杀解剖，甚至在战争即将结束前还把活人体用氰酸钾毒杀后焚烧了尸体。该部队是华中地区最大的细菌实验基地。

①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原载 1995 年 11 月 29 日上海《文汇报》，水谷尚子整理、徐静波译。

第四章　广州波字第 8604 部队

第一节　机构队伍

一、本　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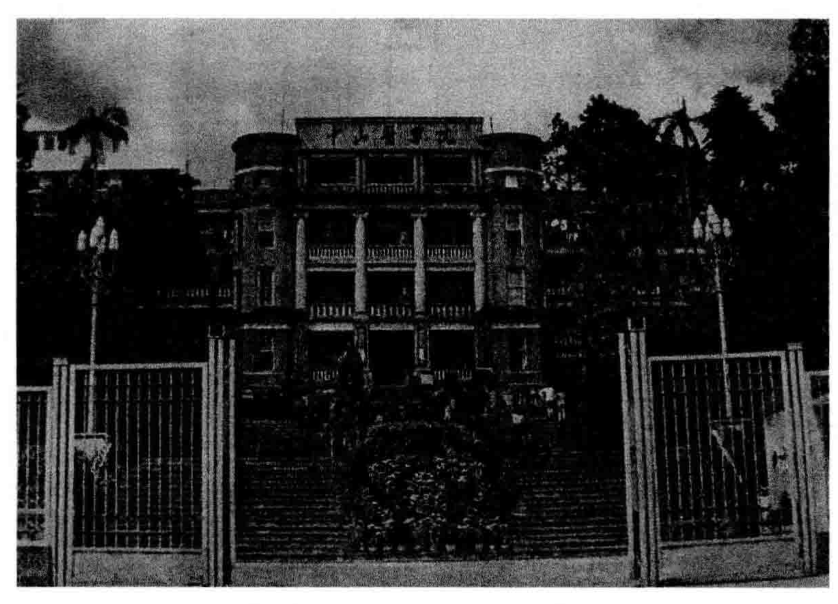


沙东迅据丸山茂、徐球、明华生等人提供的情况画成

广州侵华日军华南防疫给水部，代号为波字第 8604 部队，对外宣称“华南防疫给水部”，是日军在华的四大细菌战部队之一，隶属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下的谋略（暗杀）部队。该部队编制 1 200 人，在华南各城市设立了 12 个支部。部队长先后由田中严大佐、佐佐木高行中佐、佐藤俊二、龟泽鹿郎大佐担任。该部队创建于 1938 年 9 月 7 日，同年 10 月 12 日在广东大亚湾登陆，于 10 月 30 日抵达广州，在现在的中山大学医学院所在地设立总部，原中大医学院图书馆就是日军在华南细菌战本部。该部队本部下设 6 个课。1939 ~ 1945 年间，日军的 1 200 名专业人员，在广州从事各种细菌研究、传染病研究及鼠疫培养和病(活)体解剖等工作。

1993 年，日本老兵丸山茂在东京第一次披露 8604 部队的罪行，他说：“当时我是广州波字第 8604 部队第一课细菌检验班班长，部队对外称是华南防疫给水部，（当时）

部队长是佐藤俊二军医大佐。该机构较为庞大，是配属1 200多名专业人员的师团级单位。本部下设6个课。其中有专业将校1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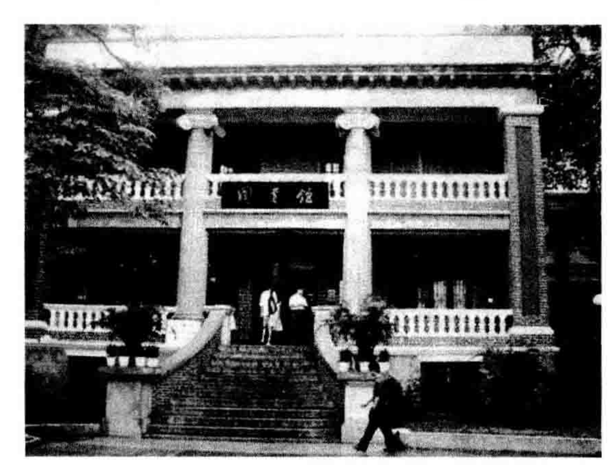
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遗址

总务课，是后勤保障、人事、财务管理部门，由熊仓少佐任课长。

第一课，是细菌研究课，由沟口军医少佐任课长。本课下设庶务班、研究班、检索班（主任：佐藤大佐）、培养班、消毒班和动物班。共80人，其中将校官10人，中国劳工7人。

第二课，从事防疫给水研究，江口丰洁卫生少佐任课长。

第三课，从事各种传染病治疗的研究工作，由小口军医少佐任课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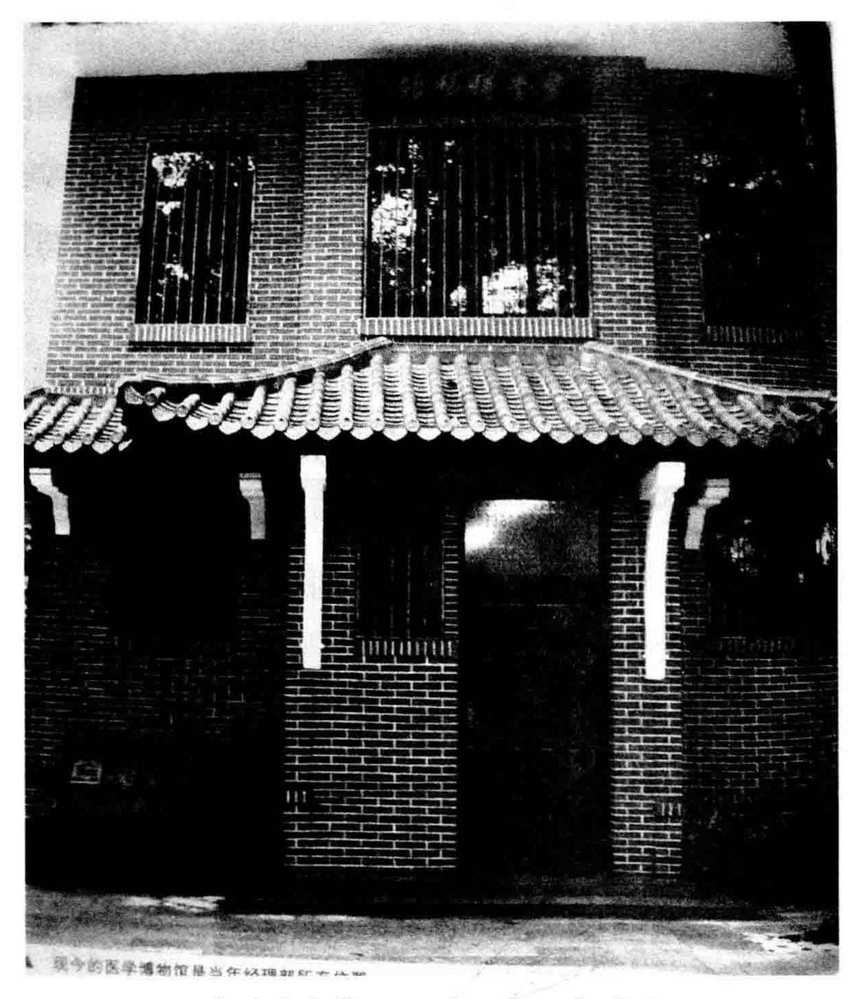
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本部遗址

第四课，从事鼠疫培养和病体解剖，渡边军医中佐任课长。该课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禁止与外部人员一切交往。食住等一切生活都在里面进行，很可怕。只有晚上点灯时才能看到里面的一些情况，里面的棚子里装满了石油罐。有时从外面运来很大的行李，连哨兵也不能看到里面装的什么东西……据日本《新泻日报》1994年11月6日载：丸山茂说，第四课地下室有很多用福尔马林浸的尸体，第四课课长每天都进行解剖。煤油桶里盛着收集到的作鼠疫实验用的老鼠。

第五课，是器材供应部门。"①

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沙东迅教授走访调查了许多中、日当事人，出版了《揭开"8604"之谜》一书，从不同角度证实第8604部队的存在及其罪恶行动：根据丸山茂两次提供的地图核实，其本部、部队长室、总务课、第一课、疟疾研究室、动物室均在现为中山医科大学图书馆旧楼（两层，另有地下室）的地方，第二、三、四、五课，经理部，宿舍，酒吧，细菌培养室，检索班，饭堂，马房等均在旧图书馆附近，也包括现中山一院部分地方。糟川良谷先生撰文介绍说，8604部队创建于昭和13年（1938年）9月7日，当时称为"第21野战防疫部"，以井佐为首，队长以下约有150人，组建于大阪市。日军总司令部于1938年9月19日根据大陆令第201号，第21军（波集团）于10月22日（按：应为21日）占领了广州市，次日第21军司令部（司令官是古庄干郎）进驻中山大学医学院，25日在东郊执信学校内设了司令部。不久，在中山大学学院内设置了第4个防疫给水部，即华南防疫给水部，波字8604部队。糟川良谷先生收集了一份日文的《华南派遣军波字第8604部队战友名簿》，波字8604部队战友会全国大会执行委员本田幸一在卷首写道：8604部队从创建到由于战败而解散历时7年零2个月（按：实为6年零11个月），在此期间服役人员多达1 100多人。据此证实，波字8604部队于1939年在广州编成，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主要任务是给侵粤日军防疫给水，进行细菌研究和细菌战。

① 沙东迅：《揭开黑幕——2002·中国·常德·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7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



广州波字第 8604 部队经理部遗址

中山医科大学行政科长徐球说：“……抗战时期，在原中大医学院也驻有许多日本军队，我见到驻在此处的日本军队不像打仗的军队，有不少日军穿着白大褂，像医生一样，还养着一些马。他们办公、居住的地方都戒备很严，有武装守卫，有的用铁丝网围起来，不让无关的人员进入。”沙东迅教授还随徐球观看了当时日军大马房，有几百平方米，顶盖是日产镀锌板，现在中山一院门诊部东南边。中山医科大学明华生副主任技师说：“50 年代初期，我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药物研究所二科听课，就发现有两张椅子背后面写着‘波字第 ×××× 部队’（号码不记得了）的字。我还看见过一些旧家具也写有这些字，听人说，这是日本仔搞细菌战用的东西。1972 年，我被派到华南农学院附近办农场，有一华农退休干部指着拖拉机站的房子对我说，日本仔曾在这里搞过细菌战。解放初期，我到广州伍汉特纪念医院（即今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旧楼）找人，看到一电线杆上钉

有一木牌，上面写着‘波字第 ×××× 部队，华南防疫给水部’的字。我还见过生理学教研室有一旧椅，背上写着日文‘系长室用’的字，此椅还在。根据日本人提供的简图看，可以肯定日军波字第 8604 部队就驻扎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即现在的中山医科大学院内……”沙东迅教授在生理学教研室还发现一个印有日、中、英文的金属商标的铁柜，写明是日本东京的产品，是日军用过遗留下来的医用铁柜。

中山医科大学图书馆退休返聘副研究馆员郭家铸说：“1953 年初……图书馆底层地库堆积了很多旧的医学中外文书刊，其中日文书刊较多……而其中日文细菌的书刊特别多……出版年代多数是昭和年间的……而所有书刊都陈旧，有些发霉破烂……前两年我馆又因为库存书爆满，而且这些日文书刊实在太旧过时，又无人看……故把解放前的日文书刊都全部当废纸卖掉。”

波字 8604 部队还占据了原设在广州北郊江村的国民党第 4 军野战医院和军医学校旧址长达 3 年之久，主要从事防疫（侦察水源、收集疫情）、病源检验、验水、消毒检诊、净水等作业，直接为日本军队和日人啤酒工厂服务。原主要建筑物还在，现由广州军区后勤部所属的医院和广州戒毒所中心使用。

查阅敌伪档案资料，可以探寻 8604 部队活动的踪迹。该部队对华南城区（主要是广东、广西、福建及港澳的）传染病进行了甚为详细的调查，为其部队的防疫和对在华南地区进行细菌战服务。沙东迅教授在广州市档案馆发现了两件不完整的日文统计图表。一是《敌地区进行传染病统计表》（1939 ~ 1941 年），内含有《两广地区（及港澳）鼠疫疫情一览表》（1867 ~ 1929 年）和《广西地区急性传染病统计表》（昭和 10 年、11 年，即 1935 年、1936 年）；二是《传染病发生概见图》，是由“波字防疫”即“波字防疫给水部队”编印，标明调查流行时间最后为昭和 19 年，即 1944 年。

二、广州伪粤海关港检疫所

广州伪粤海关港检疫所是 8604 部队秘密进行人体实验的场所。1941 年 4 月，伪广州市工务局收用南石头（珠江河畔，在广州惩教场之北）部分土地设立伪粤海关港检疫所。据广东检疫局业务处长周剑华提供的资料伪《粤海关海港检疫所职员表》中介绍，该所所长是日本人岛义雄，此人曾任台湾总督府医院院长，为医官 5 级；细菌专家岩濑祐一，

为前台湾卫生技师，医官8级；还有中、日医官、技术官、兽医官、检察官、检疫员、事务官、雇员、汽车夫等总共78人，其中日本人12人、华人66人。廖季垣曾在该所任过职，他说，当时，他只参与一般例行检查，凡外来船只人员进入广州后，必须在此做粪便等常规检查。他还说，粤海关海港检疫所除本所在编人员外，还驻有日本卫生部队一个班，约七八个人，他们穿军装，配有武器，经常去田里捞孑孓虫，捉蚊子。这个班有专门住房。检疫所靠珠江河边的西南角有一个小门口，日军卫生部队出此门走一段路从南石头难民所大门口进入难民所，日本人在难民所干什么，对外保密。据丸山茂说，这个班是8604部队本部派来执行细菌任务的。曾在难民所当过菜场农工的顺德市梁先生说，粤海关海港检疫在现南石西村西边的石岗上，门口有个高达20余米的瞭望铁塔，这里是上所。下所在日本坟场的桥边。里面多是穿白大褂的人。南石居委会干部梁檬说，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后，不久，在南石头建立了一个检疫所，一个珠江船只检查站，还有一个日本宪兵队驻扎在这里。附近村民都看见过日本兵经常进村捉蚊子，抽人的血，进行实验。由此可见，广州伪粤海关港检疫所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细菌实验。

三、南石头难民收容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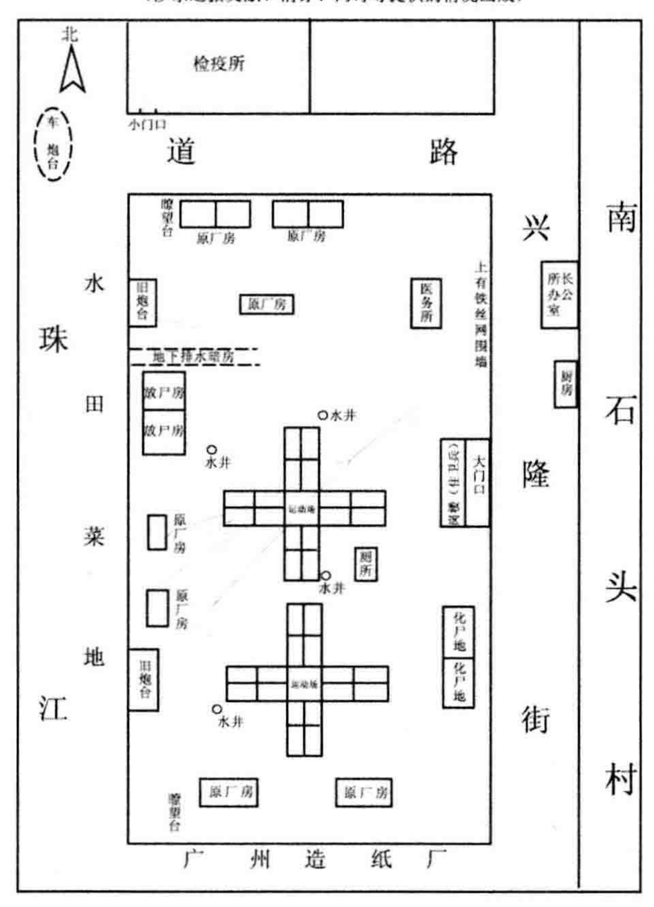
1942年，日伪在广州市河南南石头建立了难民收容所。据沙东迅教授等人考证，该所前身是广州惩戒场，建于1912年6月，利用河南南石头西边珠江白鹅潭畔的旧镇南炮台旧址改建成惩戒场。面积约3.1万平方米。场内外分两部，外场西通河岸，筑码头以泊轮船。利用其原有之深壕厚壁，又于场外四周，开辟巡逻路线，铺水泥路面1 000余公尺。该场房屋全部用井字形，中间为运动场，东西南北四面建楼，为两层楼，共有犯人房屋304间，暗室除外，能容千余人。各楼房建在四面，又成十字形，中隔铁闸。内有作业工厂6座。

1942年初，伪广东省政府决定将惩教场改为难民收容所。1月17日，伪广东省会警察局训令："查港九难民归来本（广州）市日渐众多"，并令饬通知广州市民如有港九难民留居家内由户主负责向分局登记。不久，伪广东省政务厅公布广州市南石头收容所收容乞丐暂行规定。自此，日军在南石头难民收容所，进行人体实验，屠杀了香港和

广州本地的大批难民。[①]

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示意图

（原广州惩教场、现广州自行车厂）
（沙东迅据文献、消铮、冯奇等提供的情况画成）



第二节　细菌研制

糟川良谷在《日军在广东的细菌战》一文中记载，据陆军省医务局医事课长金原节三所著《陆军省业务日志摘录》记载，1943 年 4 月 17 日医事课会记录中记载了各防疫给水部与军医学校的报告，其中南支那防疫给水部报告道“甲，饼（即老鼠），每月 1 万只，月产 10 公斤，7 ~ 8 月发生率不良。乙，从 2 月补充供应，迄今补充 2 万只”，

① 沙东迅：《揭开“8604”之谜——侵华日军在粤秘密进行细菌战大曝光》，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年。

意思是说，饲养1万只老鼠，可得鼠疫跳蚤10公斤。他说，从原部队成员的证言可知，波字8604部队本部第四课已经生产了鼠疫跳蚤。在这里生产的鼠疫跳蚤从白云机场向外空运，对此没有怀疑的余地。其攻击的目标是昆明、丽水、玉山、衢县、桂林、南宁等地。

原波字8604部队成员井上睦雄说：

“1944年，我调到鼠疫生产部门，负责恒温工作，也干其他杂活。第四课的昆虫班大约有10名卫生兵，数名中国劳工。从沙东迅绘的‘波字8604部队示意图’来看，昆虫班就在中山医科大学北门之间（现中山医院附设卫生学校一带）饲养老鼠，其中有一间混凝土结构的屋子。那建筑物的面积为10～15坪（33～35平方米）。那里饲养硕大的白野鼠，约50万只。那里有几栋像是校舍的建筑物，均是简易建筑，就在那饲养白野鼠。饲养过程中老鼠的健康状况也随时向卫生大尉报告，认真处理。打开石油罐（18立升）的盖子，在罐底铺上锯末，再撒上干血，锯末之上是一个刚够放进一只老鼠的铁笼子，老鼠在铁笼子中不能转动，铁笼有一小豁口，以便给老鼠投喂番薯。石油罐里吊根柱状液量计，测量鼠疫跳蚤的数量。接着再往鼠身上撒干血。房间里全是混凝土结构，地板上放置一块水泥板，水泥板上有一只大炉子，松木在里面熊熊燃烧。地面注满了水，于是冒起了很多蒸汽，鼠疫跳蚤就可以大量繁殖。圆柱形液量直径2～3厘米，大约放入2～3厘米刻度的鼠疫跳蚤，不知道共有多少只跳蚤。白野鼠被吸干血后只剩下皮包骨，成了木乃伊的样子，于是被扔掉，又补充新的白野鼠，源源不断。我也不清楚生产了多少鼠疫跳蚤。我们轮换工作，每次四五人当班，这是奉了提高生产量的作战命令。我记得房间里有100个左右的石油罐。（每只老鼠5～7天就被淘汰补充。）

我记得1944年空袭变得激烈前发出了增产的命令。当时的部队长是龟泽鹿郎军医大佐。譬如，鼠疫跳蚤需要10公斤，就得生产15公斤。空袭开始后，如果美军不久在中国南海岸登陆，据说，这种鼠疫战将发挥最大作用。记得几乎每天晚上美机都来轰炸，B—29战机飞来时遮天蔽日。空袭前，广州市内及中山大学医学院校园里升起了烽火，美军大概就是以此为目标进行轰炸的。1945年6月24日，波字8604部队（驻中山大学医学院）的5栋老鼠饲养舍和鼠疫培养设施（混凝土建筑物），被二十五六架B—29

战机编队炸毁，我们的工作才不得不停止。”

关于细菌生产，糟川良谷补记说，通过井上的证言，波字 8604 部队进行鼠疫战的实况更加明了。在此之前，在 1943 年 4 月 17 日“金原摘录”（业务日志）——“医事课会报”中有“华南防疫给水部”（波字 8604）可月生产 10 公斤鼠疫跳蚤的记述。井上的证言是实际参与者、生产者的证言，是一丝不苟的证言，极为可贵。它是对于上述“医事课会报”（在陆军省医务局医事课派阅的会报）的证明。

当时，8604 部队附近居民也知道该部队征收老鼠的情况。广州退休老人李俭给《羊城晚报》去信说，他在广州惠安路（现中山四、五、六路）生活了半个世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发现日军每晚向日本商店和日本人的居室发放捕鼠铁笼，每天上午由穿白大褂的日本军人用军车收集。一车一车活老鼠从惠安路向东运去。从那时起，已经流传着日军搞细菌战实验的说法。[①]

第三节　细菌实验

一、细菌传染实验

广州市河南南石头难民所是第 8604 部队秘密进行细菌实验的场所。据 8604 部队原队员丸山茂提供，在日军侵占香港期间，大量香港难民涌入广州，第 8604 部队利用难民营中缺少食品为由，向难民提供掺入细菌的食品，致使大批难民死亡。佐藤俊二部队长指挥他的部下在难民营进行了细菌实验。该难民营的日军看守的场守喜是向粥里投放细菌的主要负责人，清水清和丸山茂协助，丸山茂说，他们先在收容所的 4 个水井里投放了伤寒菌、副伤寒菌，由于难民不喝生水，这一计划没有成功。于是部队长派飞机从东京军医学校取来的肠炎沙门氏菌（副伤寒菌），再次投毒进行细菌实验。早晨趁热粥

① 沙东迅：《揭开“8604”之谜——侵华日军在粤秘密进行细菌战大曝光》，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年。

刚煮好，温度下降到一定度数，就把细菌投进去，让难民吃下去，到了傍晚就有人死了，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到最后，连掩埋尸体的土也没有了。

据糟川良谷先生提供，原第23军（广东）司令部军医部、波字8604部队队员，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所属731部队第三部部长江口丰洁在《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卷7》中刊载的《关于防疫给水与香港的卫生行政》一文中记述了南石头难民所内处理尸体的方法时明确地说建造了两个"建筑物"，即"化骨池"。他还写道"实际情况是：有时不能等待建造那种建筑物，必须另想办法。"所谓"另想办法"即把难民中的死亡者掩埋在南箕路一带。

《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的执笔者还有北条丹了、北野政次以及其他6人，他们全都是陆军军医学校出身，都曾供职于731部队的中枢部门。该书的编辑顾问金原节三也是如此。担任该书的监修731部队成员园口忠勇，他是在浙东、浙赣细菌战中负责运输的指挥官。

许多研究资料表明，南石头难民收容所虐杀香港难民所使用的细菌是从日本东京军医学校运来的革兰氏阴性菌（一种类伤寒菌，即一种沙门氏菌）。在军医学校对包括革兰氏阴性菌在内的肠炎菌的研究不仅取得成果，而且已达到实验阶段。革兰氏阴性菌所造成的食物中毒，在1935年5月就已经发生在滨松，在这个"大幅饼中毒事件时"，军医学校成员曾经前往现场。当时记载了24名患者和40名死者的情况。[①]军医学校对肠炎菌（一种类似伤寒的菌）作了许多研究，研究革兰氏阴性菌的有军医学校的岛津忠预，还有731部队的田部井和、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安东洪次、1644部队的增田知贞、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塚隆二、731部队长北野政次等人。他们在1935年以前已经进行这些肠炎菌种的研究。由此可见，革兰氏阴性菌与肠炎菌种是军事防疫学的系统的研究课题。

8604部队在南石头难民营利用从东京军医学校运出的革兰氏阴性菌虐杀香港难民，同时造成带菌者，把这些带菌者"释放"到中国内地国民党军营和村镇中去，以此扩大感染地区。这意味着人体实验与细菌战是同时进行的。

---

① 木村谦、田部井和等：《细菌学及免疫学》第191页，1967年，金原出版社。

沙门氏杆菌的潜伏期因菌种而有所异，从6小时至48小时不等，症状是：恶心、呕吐、泻肚、腹痛、发烧，尤其是有严重的泻肚症状，大便呈水状，病愈者和无症状者也继续保持带菌状态。无症状带菌状态，长者可以持续几年，在此期间，病菌一直附着在小肠上。看来日军利用了沙门氏杆菌的这种特性进行了细菌战。①

关于南石头难民所是日军细菌实验的场所这一事实，香港报纸曾有报道。据香港《星岛晚报》报道，香港索偿协会发言人吴溢兴回忆，当时香港有160万人，其中有30万人为了躲避战火，都纷纷北上广州……较早有新闻报道说当时日军曾在广州设有一个细菌实验室，这并不是一个传闻。而事实上当年有不少市民从广州返回香港之后，都向我斩钉截铁地说，确实存有此事实，死亡人数不知多少。②

另据沙东迅教授调查，8604部队在附近村屯也进行人体实验。曾在难民所当过菜场农工的顺德市梁先生说，每天晚上7时后，有很多日本兵拿着吸蚊器到附近村庄吸蚊虫，入到村民房中蚊帐内吸蚊，顺便调戏妇女。他们还把附近村民捉去喂蚊吸血，进行人体实验。晚上，被秘密捉去的人就解剖了。附近村民经常听到惨叫声，后来就听不到了，不知是否打了麻药针。其尸骨就送往难民所的化骨池。南石头居委会干部梁檬说："日本人日日如常来我村骚扰。还有一个时期，强迫威胁村民刺耳朵取人血和打针抽血做实验。我还听说日军捉了人入检疫所割脚筋抽血，有2人逃走。"南石头难民所附近的棣园村居民范有生说，检疫所有三四个日本人每天下午来我们村捉蚊子，他们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着长靴，在田里捞沙子虫，还刺农民耳朵抽血，捉人去喂蚊子，有的不久就病死了。农民见到日本人就逃跑了。当年在南石头难民所的做过难民的冯庆章说，日本人不时到难民所招些青壮年外出做工，实际上把他们送去检疫所。据说，开始几天让他们吃好的东西，等到人肥胖时，就把他们押进黑房，施放蚊虫、跳蚤吸人血，进行人体实验。这些难民一批批从难民所出去，却不见有人回来。他还说，1942年春夏间，香港

①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出自糟川良谷先生的论文《日军在广东进行的细菌战》。

② 吴正平：香港《星岛晚报》，1994年11月25日。

沦陷后，大批香港难民一船一船运进南石头难民所，收容约三四千人，与本地难民分开住。在难民所里，日本人强迫给难民打防疫针，但很多人打针后发高烧、抽筋，不几天便倒地不起。尸骨被扔进化骨池。

当时，南石头地区船上还有一个难民所，范有生说，1941年12月，天气很冷。香港沦陷后，许多香港难民坐着“大眼鸡”船（有帆，船头画有两只眼睛）回到广州，冻死不少人。许多人被收容进南石头难民所。退休前曾任广州市劳动路小学校长的何琼菊、她的长子冯芳标、女儿冯锋说，1942年初，何琼菊和儿子、女儿，婆婆等4人从香港回广州，全船有480人。在南石头被迫停泊，接受日本人的验便检查。日本人用一条管塞入肛门检查，认为有疫病的，就拉去检疫所隔离，有去无回，还有一些人死在船上，被日本人扔进河里。前后月余，最后只剩下40来人。冯奇说，香港沦陷后，他先后两次见过“大眼鸡”船从香港来广州。第一次来了4只船，第二次3只船。船上的难民被日本兵拦住，不让进入广州市内。难民所所长刘念端说，难民所里住不下，只好留在船上。1942年2月又来了一只机动大轮船，人不让上岸，在船上接受检疫。有极少数人给钱乘小艇跑了。绝大多数人进了难民所。家住上海的何荣清回忆，当年，他和伯母从香港乘难民船回广州，历经灾难，1997年9月，他给沙东迅写信说：“……（当年），我所搭乘的不是什么慈善难民的船，而应是日军相当的一级机构或头头所决策，由日军和伪政权（当然不会让他们了解内幕了）共同实施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诱逼香港回乡难民上他们设计好的细菌战实验船，是拿活人作实验的船，是直接用细菌杀害中国人的罪恶之船。否则，是难以解释的。”何荣清信中叙述了他逃难的经历，大意是，1942年1月，日军占领香港不久，他和伯母戚颜彩随难民由九龙往广州徒步前行。一日，他们行至宝安南头，被一些戴白底黑字臂章的汉奸拦住去路，对他们连欺骗带恐吓说，皇军关心难民，将免费送难民回乡，还说路上有土匪杀人越货……他们强行把难民带到停在江边的大木船上。每只船能坐百人左右，等4只船坐满人之后，就由一个小火轮拖往广州。船将要到达广州，正要停靠码头时，上来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说是要进行检疫。船又行了一会儿，就抛锚江中，后来才知道船到了南石头。船先由日本兵，后换了汉奸，押解到南石头附近水域，不准其他船只靠近，防止灾民逃跑。第二天，日本兵把船停靠

在南石头一个荒凉的岸边，将船上的难民驱赶到岸边一个干涸的河叉里进行所谓的检疫。检查完之后，又把人赶回船里，再检查另一只船。什么仪器设备都没有，检疫只是借口，可能是对难民分类登记，或深藏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船上没有食物，难民在日本人的监视下，每天下午到附近的小艇上购买。不知最早是哪个人在什么时候发觉船上有跳蚤，两三天后，不少人都在抖衣被，说有跳蚤。何荣清也被跳蚤叮咬了。船上本没有跳蚤，船抛锚江中后却有了。有人说是日本人撒放的。约 3 天后，船上开始死人，先死了个婴儿，因其母哭泣而遭汉奸痛骂。此后，船上天天死人。每天，日本人还往外带人。起初，选中的都是青壮年，都是一去不回。可能是日本人把难民抓去搞实验了。只过了七八天，一船人就剩下三分之一了。除少数逃走外，其余的不是死在船上，就是被日本人抓走了。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何荣清和伯母花重金雇小艇逃出魔窟。返回家乡后，他大病一场，高烧不退，几经诊治，才痊愈了。[①]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难民所确实人满为患，连船只也成了难民所。8604 细菌部队在南石头难民所和附近村屯，利用从东京军医学校运来沙门氏杆菌，以及在本部还培养的鼠疫跳蚤、蚊子等带菌昆虫进行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杀害了大批香港和广东的难民。难民的尸骨多在“化骨池”和南箕路处理掉了。（详见本书第四编《细菌战》。）

二、人体解剖

日本老兵井上睦雄揭露了 8604 部队进行活体解剖的过程。1943 年 2 月，他在家乡福冈应征入伍。2 月底进驻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随后半年里，他接受了军事训练和卫生兵训练。教材是《卫生教程》，是一本描写人体构造的书。他们也做实验，要求很严。培训结束后，他被分配到第四科病理解剖班。他说：“第四科有病理（解剖）班、昆虫班、疟疾班。此时，波字 8604 部队长是龟泽鹿郎大佐。第四科（同“课”，下同。）科长是山内正通军医大尉，病理班班长是桥本敬佑。病理班有六七名卫生兵，另有一名台湾籍的文职人员。昆虫班主要从事鼠疫跳蚤的培养，大约有 10 名卫生兵和数名中国劳工。

① 沙东迅：《揭开“8604”之谜——侵华日军在粤秘密进行细菌战大曝光》，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年。

疟疾班班长是寺师勇。第一科里还有战后任厚生县医务局长的金光克己。在第一科里，马场准尉从事马、猪、鸡的霍乱研究。

我所属的病理（解剖）班里，解剖执刀者是桥本，其余的人是助手等。我、佐藤吉己、高杉等常常当助手。我虽是助手，但很清楚地记得切开头盖骨的事。桥本解剖尸体的内脏时，我们同时切开头盖骨。如图示切开头、脸部，然后前后用力一掰就露出头盖骨。接着有特制的锯小心翼翼地切开中间的脑间膜，尽量避免损伤。那时一把小锯子，类似切……（原文如此）用的锯子。恰当地切开后，在切口处插入凿子，就可'啪'地打开上部头盖骨。打开头盖骨由我们负责，与此同时，桥本取出了内脏。取内脏时，从喉咙到腹部切开，把手插入喉咙抓住舌根往外拽，内脏就全被拉出来了，然后切下所需部分，剩余的又放回尸体内。那时，我们负责头部工作的助手用剪刀剪开脑间膜，一根一根地剪断脑神经，从大脑里显露出来，最后剪断集中在脑下垂体的神经，取出整个脑。随后，我们用下等棉填塞已挖空的头盖骨，并把被切开的头盖骨从上面依照原样缝合。取出的脑用福尔马林浸泡制成标本。用福尔马林浸泡，一来不腐烂，二来可作凝固。凝固后用类似厨刀，称作微米刀的器具切成极薄的片状，然后贴在物体板上，成为显微镜用的标本切片。随后染色。如果这标本片染有疟疾，则疟疾菌就会沾染到染色液上。这样，通过染色就可判明感染疟疾的程度及疟疾的类型。病理班里尸体多时每天有四五具，一天功夫解剖不完。解剖既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所以一天最多解剖 3 具左右，每具尸体花费 3 小时。我在病理班期间（1943 年 8 月至 1944 年空袭）每天大概解剖 1.5 具尸体。这样的情况持续到我离开病理班。解剖不完的尸体收入冷藏库保存。我们还把洗脸盆大小的冰块置于尸体的腹部之上。被解剖的尸体包括中国间谍，受枪击活体也难逃开膛。被解剖的尸体男性（青壮年）居多，也有少数女性、小孩和老人的尸体。既有日本兵尸体，也有中国人尸体，还有中国间谍（可能是抗日游击队员——见后述）。当时曾经认为第四科昆虫班培养生产鼠疫跳蚤的情况是昆虫班的中国苦力向外界泄漏的。那是我奉命到鼠疫蚤培养部门工作时的事，我发现了苦力偷藏起波字 8604 部队的示意图并捉获苦力而被授以勋章（'殊勋乙级'）。后来那苦力被如何处置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得到。日本战败时我烧毁了那'殊勋乙级'勋章，病理解剖时也有据说是间谍或游击队员

的尸体，是在哪里抓获的等等情况是军事秘密，所以规定不得详细打听或同事间相互传说。一看就知道那种尸体的额头被枪击过的，是宪兵队射击的。额头里有一个地方骨头两层重叠，有时即使被子弹击中会引起脑震荡但不至于死。（虽然我不大想说）确切地说，那不是尸体，而是活体。心脏仍在跳动，为了止血，用钳子钳制血管。把血管拉出来在显微镜下观看，只见红血球和白血球都聚拢成簇。心脏跳动时，它们就滚动，煞是美丽。没有进行过鼠疫的病理解剖，好像疟疾的病理解剖较多。到 1944 年，由于美军常来空袭，不能进行解剖了。病理解剖后的尸体浸泡在地下室的水槽里。解剖室是中山大学医学院带圆形座位的教室，解剖台就在中间。地下室里有浸尸体的水槽和很多用福尔马林浸泡，装在坛子或大瓶子里的头颅、内脏标本很多，虽不是 100 个，但确实有 50 个以上。”关于人体解剖，糟川良谷补记说，井上的证言酷似 731 部队病理解剖班（湖桃泽正邦，已故。）的证言。解剖是为各班的实验结果和检验死者的细菌而进行的，把病理解剖的结果制成标本也是应各班的要求而进行。井上的证言所指的切断头盖骨曾在（东京）军医学校旧址发现过，在确认证言中的部分的切断物时，井上的回答是：“有”，所以怀疑是同样的东西。（但不能断定乃是同一东西。其他的部队譬如荣字 1644，甲字 1855 也可能做过，731 部队也搞过。）[①]

1995 年 7 月，丸山茂来广州考证时，在 8604 部队原址的一幢建筑物旁说：“这个地方就是当年 8604 部队第四课最为机密、戒备最为森严的从事培养鼠疫与病体解剖的实验室。”他亲眼看到里面用福尔马林浸着许多尸体，日军实验人员有时进行活体解剖。

日本老兵井上睦雄、丸山茂等人的证言，披露了波字第 8604 部队，与“731”细菌部队同样在暗中进行活体解剖，残酷地进行人体实验。

① 沙东迅：《揭开“8604”之谜——侵华日军在粤秘密进行细菌战大曝光》，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年。

第四节　细 菌 战

波字 8604 部队除了给日军做防疫给水工作外，主要是进行细菌战。1942 年，香港沦陷后，有大批难民涌入广州，日军 8604 部队对香港难民和广州当地难民进行谋害。他们在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广州伪粤海关港检疫所以及“大眼鸡”船上，由佐藤俊二部队长下令，从东京日本军医学校运来沙门氏菌，秘密使用细菌战剂，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该部队还利用本部队生产的鼠疫跳蚤以及先后从东京运来的各种病菌，于 1939 ~ 1942 年间，在广九铁路沿线、广东阳江、乐昌、廉江、湛东和海南等地投放，造成华南地区鼠疫、伤寒、霍乱等疫病流行，杀害了大量中国军民。另根据原部队成员的证词，这个部队在 1941 年参加了福州战役，并事后掘起尸体作了鼠疫鉴别检查等。1942 年，又参加了香港战役，另外和南方军防疫给水部（新加坡）一起进行了人员转移。由此可见，这个部队进行细菌战的范围还要更广些。糟川良谷说，8604 部队生产的鼠疫跳蚤可能对重庆、昆明等内陆地轰炸时使用过，但现在尚无确切的资料和证言。（详见本书第四编《细菌战》。）

第五节　部队溃逃

据井上睦雄说，1945 年 6 月 24 日，波字 8604 部队（驻中山大学医学院）的 5 栋老鼠饲养舍和鼠疫培养设施（混凝土建筑物），被美军二十五六架 B － 29 战机编队炸毁，我们的工作才不得不停止。这时，部队也开始了撤退行军训练准备撤到朝鲜的釜山。他说："我于 1946 年 6 月回国。我乘坐的是一艘排量为 1.3 吨的大船，船上发生霍乱，死了 200 人。9 月，抵蒲贺上岸。九州的久留米还残留着日屋百货店，除此之外全烧成荒野了。

8604 部队溃逃前，也销毁了生产细菌的设备及档案资料。甚至想封住知情的 8604 部队原队员的嘴巴。丸山茂说，当时按日军规定，在前线作战 3 年以上者，可分批返回日本，可是的场守喜和清水清不能返回，被派到新几内亚作战，这大概是他们参加了南

石头细菌战而要封住他们的嘴巴吧。后来，的场守喜换姓为加藤逃回日本，但不敢回故乡，而是到处流浪。

8604部队的成员绝大多数逃回了日本，逃脱了战争罪的审判。

第六节　遗　害

在广州还遗留下一种恙虫病。据广东细菌学专家、中山医科大学退休教授钟之英说，1950年，他在中山大学医学院卫生细菌研究所工作时，听岭南大学医学院内科教授汤泽光说，抗战胜利后，在广州发现恙虫病，而日军侵占广州之前，广州从未发现这种病。1951年，钟之英教授赴中央卫生部请细菌学专家赵树萱来广州调查证实是恙虫病。恙虫附在老鼠身上，当年，钟之英教授等人进行疫病调查时，在广州市大石街捉到的老鼠所带恙虫率很高，这一带恙虫病人也较多。1951年，广州约有500人患恙虫病，到1955年，这种病基本消失。据大石街的老居民说，日军侵占广州后，有人看见日本人在大石街3巷西边的广东女子师范学校养了不少黑老鼠，还养了许多马。据钟之英教授讲，日本有恙虫病，对此病很有研究。由此可见。广州流行恙虫病很可能是日军进行细菌实验的结果。

据原广东防疫站副站长、广东医药学院教务长、主任医师施复晋说："1946年春，在广州收治回归热病人50例以上，是由体虱叮咬传播回归热螺旋体而发病的。广州气候比较温暖，居民习惯冲凉，体虱较少，一向少见此病，何故会在广州流行，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回归热流行还未停息，又发生天花流行，夏季霍乱流行达千例以上。1947年，仍有天花、霍乱流行。1948年夏秋，发现恙虫病流行……抗战初期。广州民房被炸，如小北一带破屋瓦砾成堆，正是鼠类栖身活动场所，当时小北一带，也有恙虫病人就医……广东虽早在千余年前有此病，但千余年来，未见有此病流行，而为何1948年又在广州流行，当时未作详细研究。1949年，广州解放前后，广州仍有流行。50年代在珠江三角洲也有流行，而且有爆发流行（即一次发生数十例）。" 1952年，广州市民梁文坚2岁的女儿曾患恙虫病，到中山医院急诊痊愈。这种病是从老鼠身上传染过来的，主要症

状是：发高烧，腋下和手臂上长出一个个结核状的小包。[①]

第五章　南方军（新加坡）冈字第9420部队

第一节　机构队伍

1942年5月5日，根据日本陆军第552号命令，南方军冈字第9420防疫给水部（细菌战部队）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成立，该部队隶属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编成后曾上报天皇备案。部队长先后为羽山好夫大佐、佐藤大佐和小野寺中佐。本部设在新加坡昭南爱德华七世医院（现为新加坡卫生部药品管理局）。该部队编制208人，实有人员最多达590人。下设3个队，井村队，负责捕鼠、饲养老鼠，并在马来西亚的中部设有一个小分队；中安队，负责繁殖和研究跳蚤；江本队，负责研究收集鼠疫菌，保存和繁殖以及感染老鼠，并制造少量疫苗。细菌武器的制造主要在马来西亚淡环精神病院进行，在缅甸和泰国也设有支队。

竹花京逸在《见到跳蚤、鼠和鼠疫菌》一书中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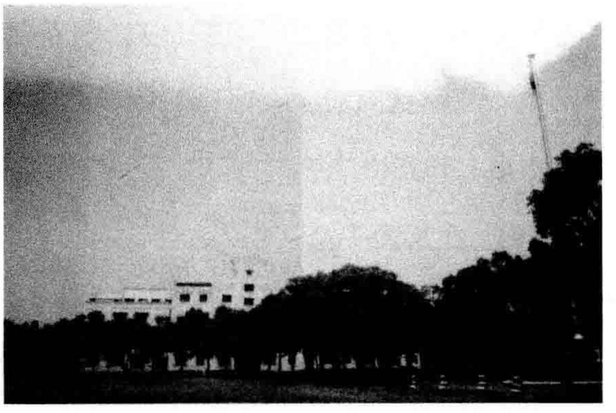
新加坡冈字第9420部队总部遗址

① 沙东迅：《揭开"8604"之谜——侵华日军在粤秘密进行细菌战大曝光》，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我被分配到日本南方派遣军冈字第 9420 部队，部队长是陆军军医大佐羽山好夫。部队的公开名称是南方军防疫给水部。部队总部驻地在新加坡郊外的爱德华七世医科大学，该大学的全部设施均被部队占用……我们在新加坡总部大约接受了一周多的新兵入伍教育。之后，除了全体女子军属和若干男子军属留在总部做勤务工作外，其他人员都被派往属于原勤务部队的制造细菌武器的秘密部队，该部队的名称是梅冈部队。渡过分隔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柔佛海峡，再乘坐卡车跑了大约 30 到 40 分钟公路，爬上缓坡，视野一下就开阔了。在一片茂密的灌木林中，带有钟塔的淡粉色的二层楼房的建筑物就是总部。以总部为基点周围散布着很多形状各异的建筑物。这里就是以卫生兵和军属混合组成的梅冈部队的所在地……（该部队驻地）是椭圆形的建筑格式，其中央部用混凝土制作的很厚的围墙区分为南北两部分。在北侧散落着十几栋特殊型的病房。病房与病房之间有相当长的距离。在南侧散落着总部事务所、研究室、各队业务所、将校军官宿舍、兵舍、军属宿舍、食堂、酒馆等附属建筑物。从南端的卫生哨所到北端最里面的病房之间目测的话，大约有 8 公里左右。那个庞大的建筑地都用带着蓬盖的铺装道路连结起来。在小岗、小沟谷到处都修筑了整齐的排水沟。这里就是有名的疟疾的发生地……梅冈部队以久保军医少佐为部队长。”①



新加坡冈字第 9420 部队总部遗址



新加坡冈字第 9420 部队总部遗址

① 杨玉林、辛培林：《细菌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出自〔日〕竹花京逸《见到跳蚤、鼠和鼠疫菌》一书。

第二节　细菌研制

一、人员培训

竹花京逸说，他们这些新入队的军属暂时住在部队最里面的病房里，被编成内务班。病房的构造很特殊，床是用 10 英寸粗的铁管制作的，在那管子的内侧设置了 1 米宽的板铺。除了便所、洗漱室外，什么生活设施也没有，是拘禁性极强的结构。

他写道：“新入梅冈部队队员的教育是在总部附近的讲堂进行的。每天早晨点名非常严厉，饭后就等着，招呼进去就开始上课或者训话，授课的内容主要是和以后所从事工作有关的，在门口写有消毒液的有效使用方法及吸烟的方法等防止感染的注意事项。授课教师是总部来的将校军官或者部队的将校军官和技师等，只有一次是陆军军属技术师给授课。”他们在一周的教育中，除了细菌战培训外，还教育学员崇拜从事细菌战的前辈，对他们以信赖为宗旨。

二、细菌生产

竹花京逸用亲身经历揭露了 9420 部队大量饲养老鼠、繁殖跳蚤、培育鼠疫菌的罪恶活动，以下摘要介绍文章的主要内容：

（一）老鼠饲养

井村队主要从事捕鼠、饲养老鼠工作。井村军医中尉为队长，有 20 几名队员。方法是化成小分遣队长期驻扎在马来半岛中部山林地带，使用当地人捕鼠。捕获到一定的数量就和总部联络，主要由姓古参的司机运送到井村队。井村队在稍南面山坡上病房和屋外饲养老鼠。那里过去是农家用箱子养兔子的地方，现在正好用那箱子饲养老鼠。饲料大部分是甘薯。

（二）跳蚤繁殖

中安队主要从事跳蚤的养殖及研究工作。队长是中安军医中尉，有 20 多名队员。跳蚤的饲育方法是像过去农家在秋天里在院子里并排铺上席子把稻子摊放在席子上晒干的方法一样。而饲育跳蚤为了避免日光直接照射，则挪到病房里。把不知从哪里弄来的

极细的垃圾做成像农家晾稻子那样的饲养床，把多条宽 1 米多、长 5 米左右的饲养床连接在一起饲养。把饲养床放在适当的位置，然后把收在捕鼠器里的老鼠作为跳蚤的饲料配置在里边。中安中尉是位身体消瘦、神经质的人，所以士兵一般都对他敬而远之。那是不久以后的事，我拿着从队长那里得到的装有证件的信封到中安队拜访了中安中尉。结束了简单的事情后，中安中尉一反常态很温和地说：“竹花，今天我让你看件很珍奇的东西，过来”，说着，他把我带到了一个很小但极坚固的建筑物中去了。一进屋，中尉就把一个 18 升大小的罐子的盖子取下，罐子里塞得满满的跳蚤。打开盖子，跳蚤闪着亮光，互相向里面蠕动着滚成一个团子。我一下闭住了气息。中安中尉显出盛气凌人的样子问我：“怎么样？惊奇吧？”那些大量的跳蚤以后怎么处理了，我也不知道。开始我以为把跳蚤寝床上的大量的细碎垃圾和跳蚤分开是很困难的事呢，后来我才知道利用跳蚤的厌光性用工具很容易就能把它们分离出来。

（三）鼠疫菌培养

江本队（研究室）主要负责培养鼠疫跳蚤。队长是陆军军医大尉江本修。还有栗原少尉。有队员 25 名（根据不同场合也可以增减卫生兵）。这个队的特征是具有很多多次处理细菌经验的技术人员。像栗原少尉，他在日本提交了博士论文，在此是为了补充其论文而进行研究的。他让部下誊写提出的论文。这些将校经常说“磺胺”之类的学术名词。部队的工作除要明白自己的范围外，还要懂得保持鼠疫菌株，繁殖培育细菌，毒化作业（把鼠疫菌注射给老鼠，然后使跳蚤吸老鼠的血液），制造少量疫苗，以及和免疫有关的研究等，要求知识面的范围很广。除以上所述外，还要做一些虽然自己不明白，但属于各将校的研究题目的工作。这支部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毒化作业。即给老鼠注射鼠疫细菌、使发病的老鼠身上爬满跳蚤，跳蚤的胃吸入鼠疫菌后就成了细菌武器。上述作业即称为毒化作业。顺便说明一下，鼠疫病只是老鼠和人感染得病。总之，江本队是梅冈部队的中枢。

竹花京逸接受训练后，被分配到江本队，做灭菌、洗涤工作。他说，当时不知怎的，我对分配到研究室工作感觉很不好。这个疑问我一上班马上就解开了，那是因为研究室里每天有大量的脏物和危险物质产生。例如，为了繁殖细菌，要把牛肉浸膏、胆汁、春

日末（精制淀粉之类的东西）、精制盐和其他细菌喜欢的物质按一定比例混合、煮沸，然后把琼脂溶入做成软体琼脂，注入大小试管玻璃器皿等试验容器里，制成细菌培养基。这个培养基使用过之后的残液牢牢地粘在器皿的边缘，拿到处理室去，这些玻璃容器都要灭菌、洗干净、分类，包上硫酸纸加热灭菌以备下次使用。简而言之，我所做的就是研究实验员的工作。但是，因为有残活菌疫苗的危险性，所以这是要特别加以小心注意的工作。不过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我只是很多做这项工作人员中的一员。以后工作稍熟悉之后，一有闲暇时间就让我做些在放大镜下解剖跳蚤的观察、解剖老鼠等工作。或是让我学在培养基上接菌种。

在细菌生产过程中，细菌武器部队——梅冈部队有不少人感染细菌死亡。竹花京逸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该部队）开始出现牺牲者。除了在出入口的旁边放有消毒液和防止老鼠咬脚的措施而外，再没有采取防护措施。虽然上边经常提醒工作人员“要小心”，大家也很小心。但是不管怎么注意，因为对手是跳蚤，是细菌，特别是那种跳蚤的养殖方法可以说还是相当原始的，所以跳蚤的飞散、扩散总是难免的。我认为，因这一工作性质关系，即使有某种程度的牺牲、得病者，把死亡者的姓名、人员数字等在部队展示也是符合情理的。我入队后不久就去了作为部队核心的研究室帮忙，因此我敢断言，在不长时间内就出现了 2 名牺牲者。其中一人的姓名我忘记了。但是记得他是和我们一起入队的军属。他非常熟悉细菌处理作业。他能用白金制的带齿的小工具很轻巧地把菌接种在培养基上。但是人们经常看到他总是用处理活菌的那支手夹香烟。和他很对脾气的同事山口仙寿君曾悄悄地对我说过：“那个混蛋，处理细菌时抽烟，想是要和细菌成为亲戚吧！”另外一个人叫奥野唯夫，从军前以职员的身份在大阪师团司令部工作……他也感染了鼠疫。为了救他的命，把右脚从大腿根部截掉了。是在外面的陆军军医院做的手术。江本大尉名不虚传，夜里很晚了，还以捧持的姿势用车把包着硫酸纸的奥野君的一条腿带回来了。我们行了 45 度的鞠躬礼，江本大尉行了举手礼就把他埋了。还有某队的士兵得了病，被转移到部队内的一个房间，给他注射了部队内制造的疫苗，但是由于疫苗内混进了不纯洁物质，正如文字所描述一样，痛苦得满地打滚。以前在部队出现因事故而死亡的时候，要把死者的棺材安置在最上层，以香和花装饰得非常庄严，祭坛

的两端站立着带刀的士兵，将校军官和士兵们依次前去烧香，有时还用美味食品招待祭奠人，要搞一个非常气派的通宵葬礼。现在死了人连通宵的场面也没有了。那个火葬场后面的山丘上放着好多遗体。竹花京逸还说，部队因研制细菌，有很多人染疫身亡。部队既没埋葬也没祭祀，一切都没有公布，秘密处理掉了。①

另据原 9420 部队队员大快良明证实：1944 年，他奉命回国，去土奇玉收购老鼠，共收购了 5 万只，用卡车运到一所医学校，那里有一个飞机场，然后用飞机运到新加坡，用 3 架飞机运，共运了 3 次。

据郭承周、廖应昌教授研究整理资料，南方军细菌部队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大量研制细菌武器，其主要资料有：

1. 竹花京逸的著作《见到跳蚤、鼠和鼠疫菌》的发现及调查

1992 年 5 月，日本静冈县近代史研究会会员武内康人发现了竹花京逸的著作《见到跳蚤、鼠和鼠疫菌》，将这本书摘要发表在静冈县近代史研究会会报第 166 号（1992.7）上，同时共同社静冈分社也报道了这一消息。同年 12 月，武内康人将该文章交给筑波大学附属在校的高鸣伸欣教授，该文章得以发表在《月刊 731 部展》第 3 期（1992 年 12 月 26 日）。

在日本全国展期间，接到了无名电话，即证言人 A，由高屿进行了采访。1942 年 12 月至 1945 年日军投降，A 在 9420 部队工作。他写出了该部队的《军历表》，他所说的对弄清事实具有重要意义。A 说竹花京逸书中的本部建筑物照片，就是当时本部的原样。它就是爱德华七世医科大学的一部分，还回忆在其二楼的房间是培养鼠疫菌的地方。A 还说，当时从日本运来 5 万只老鼠，在马来西亚半岛的一家私立中学里饲养，就是目前的 TUNKU MOHAMED 中学。这个中学又是当年捕杀华侨的地方……以上的事已被高屿和林博史的现场调查所证实。

1993 年间，通过陆军干部的业务日记，也记述了在淡环精神病院进行过鼠疫跳蚤

① 杨玉林、辛培林：《细菌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日〕竹花京逸《见到跳蚤、鼠和鼠疫菌》一书。

的大量生产的事实。为了确认这大量生产鼠疫跳蚤的地方（该医院的隔离病房），高屿等于1993年再度去那里，拍下了隔离病房和全景的照片，再经竹花京逸的鉴定，他判断出这肯定是井村部队用于培养鼠疫菌的设施。

《朝日新闻》的记者竹信悦夫将这些调查的前期情况刊登在1993年10月18日朝刊上。高屿又写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细菌部队》一文，刊载于《季刊·战争责任研究》1993年第2期上。

忠欣文在《精神病院竟是细菌魔窟》一文中说，在马来西亚南端的一所精神病院内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南方军所属的细菌战设施。竹花京逸在《与跳蚤老鼠和鼠疫菌为邻的往事》的回忆录中揭露9420部队利用这一设施基地院培养细菌，将鼠疫菌注射到老鼠体内，再用病鼠的血饲育跳蚤，开发制造细菌武器的事实。日本另一民间学术团体找到的当时日军参谋部第一部真田穰一郎的日记也印证了这一事实。据有关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共有5支细菌部队，即关东军满洲第731部队、关东军满洲第100部队、北京北支甲第1855部队、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①]

2.1991年9月19日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了一则消息

前曾任新加坡社会部长（1963～1977年）、新加坡驻印度尼西亚大使（1977～1980年）奥斯曼（Othman）先生对记者说，他于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时，年方17岁。为了谋生，他叔父介绍他到学院路一家古老医学院里的“血清研究所”又称羽山部队里当青年工。其中的鼠疫研究部设在Tan Teck Guan大楼里，即今日的卫生部药品管理所所在地。当时他的工作是从麻醉的老鼠身上用钳子取下跳蚤，放入有水的瓶内（这项工作做了两年），下一步的工作是在大汽油桶里饲养繁殖跳蚤和使其感染鼠疫菌，再把它取下放入玻璃瓶运往泰国，其间也发生过两次工作人员感染鼠疫的事故。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均穿白大衣、长统靴子，戴橡皮手套和白帽子作为安全防护。但不知其作何用途，也不敢问。直到战后，在报上看到了日军在中国投放鼠疫跳蚤的消息，才明白了这件事的真相。[②]

① 《华商时报》，1993年11月23日，忠欣文。

②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第三节 细 菌 战

南方军冈字9420部队在中国滇西地区设有支队，与731部队密切配合，研制细菌，在滇西实施细菌战（详见本书第四编《细菌战》）。

据资料证实，日军还企图对美、英、菲律宾等国进行细菌战。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英、菲发动战争。1942年1月，日军第14军占领了马尼拉。美、菲军为了躲开大决战，固守在巴坦岛上。日本南方军第14军进攻巴坦岛遭到失败。当此之际，于1942年3月11日，日本陆军参谋部的井本熊男来马尼拉视察战况，他和南方军参谋部第一课长石井正男达成了使用细菌战的协议。从井本日记第17卷中看出，当时需要10吨细菌战剂，分10次向美、菲军投放。为了实施这一计划，需要两架MC中型运输机，还需要人员100名。由于第731部队和南京1644部队细菌生产能力有限，有必要由东京供应。东京陆军军医学校每日可产30公斤的细菌，则以每3天一次将生产的细菌途经台北运至目的地。还有老鼠需由日本土奇玉、茨城、枥木、千叶县饲养，预计5月份生产5 ~ 7万只，6月份生产10万只，7月份生产15万只，8月份生产20万只……正在此紧张的备战中，4月上旬，在巴坦岛的美、菲军投降了。

1942年3月中旬，日军对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军企图实施细菌攻击，因美军投降，未付诸实施。4月，日军又把萨摩亚、阿拉斯加、荷兰港也列入攻击目标，但还看不出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的形迹。以后败势明显的1944年4月，又制定了针对悉尼、墨尔本、夏威夷、中途岛的细菌战计划。6、7月又把塞班岛、关岛列入细菌攻击目标。塞班岛攻防战时，由岩崎光郎大尉指挥的小组和伊藤邦之助大尉指挥的小组受命实施“鼠疫散布计划”，但他们未能完成任务。这是因为生产跳蚤、老鼠能力不足，以及飞机数量的不足，未能完成计划。到了1945年7月24日，陆军省决定全面中止细菌战。

然而731部队企图用“细菌特攻计划”挽回败局。“细菌特攻计划”的内容是：9月22日，从日本出发，目的地是美国的圣地亚哥军港。20名特攻队员乘潜水艇接近距军港500公里处，改乘舰载机着陆于军港背后，特攻队员手持鼠疫跳蚤，自身也成为感

染源，向周围散布鼠疫菌。特攻队骨干为此接受了为期1个月的训练。为了实施这一计划，从1945年6月前后起，细菌工厂实行24小时连轴转体制，并且研制了毒性比平常大10倍的变异菌种，开发了干燥鼠疫菌的保存技术。但因日本战败，未能付诸实施。[①]

德国《焦点》周刊发表文章《致命的樱花》，文章说，按计划，日本海军的一架飞机应在1945年9月22日飞临加利福尼亚上空，将鼠疫菌撒向美国大地。战斗机飞行员应在这一夜晚带着千万只受病菌感染的跳蚤向圣地亚哥俯冲，使敌人感染鼠疫病。这一死亡小分队的代号为“夜樱花”。但这一行动没有进行。在这一日期前6个星期，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②]

① 〔日〕森正孝：《731部队与细菌战》，发表于1995年在哈尔滨中日联合召开的“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座谈会”上。

②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